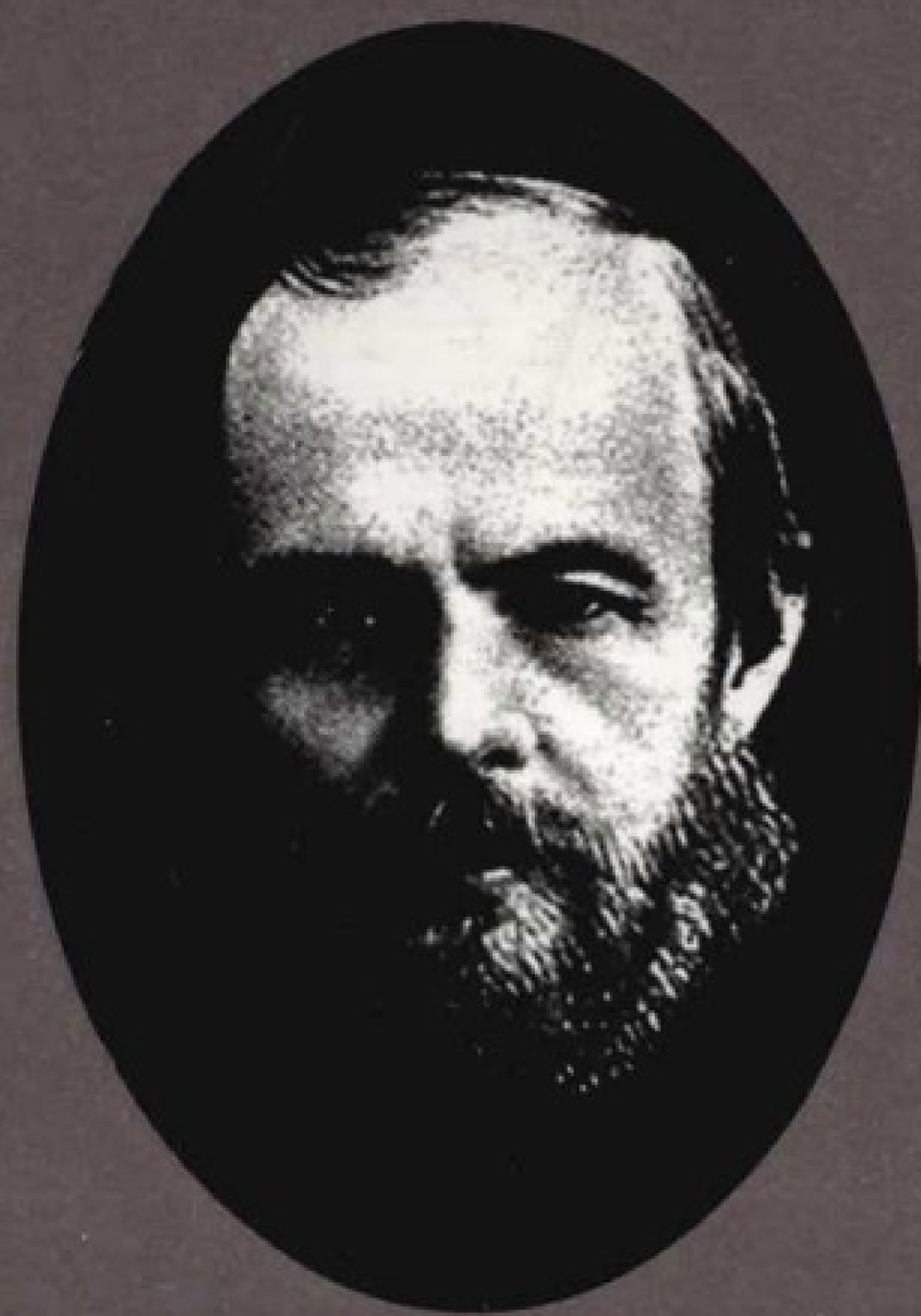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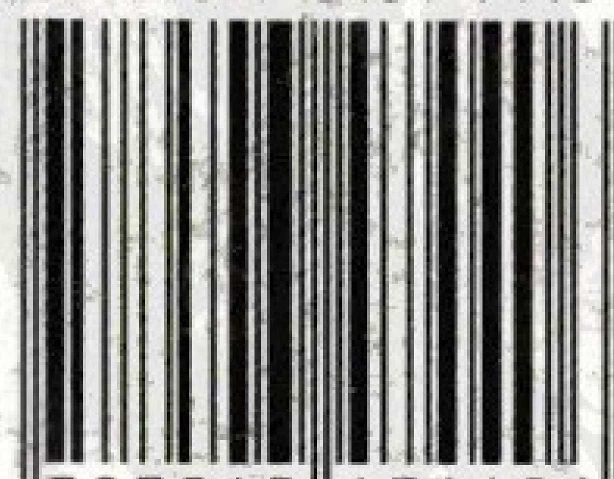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作家日记 [下]

张 羽 张有福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434-7440-6
9 787543 474406 >
定价 69.00 元（上、下）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作家日记[下]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张　羽　张有福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附录

题解

三种思想

（《作家日记》，1877 年，1 月号，第 1 章，Ⅰ）

让我从去年搁笔的地方开始我新的一年的工作。去年 12 月号《日记》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差不多所有我们俄国人的分歧与隔阂都只是由于误解，甚至是最愚蠢的误解，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和不可逾越的东西。”我不妨再重复说一遍：我们所有的争论和分歧只是由于思想的差错和偏颇而产生，而并非由于内心有什么芥蒂，这一取向才是我们分歧的实质所在。这类实质性的东西还是相当令人感到欣慰的。思想的差错和误解要比内心的芥蒂会消失得快得多，而且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纠正思想的差错和误解与其说靠争论和逻辑性的解释，不如说靠的是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无可辩驳的逻辑；生活中的诸多事件自身就常常包含着必不可少的和正确的结论，而且，如果不是突然地、不是在事件出现的最初时刻，那么也会在很快的时期内，有时甚至不必等到下一代人，就指明笔直的出路。内心的芥蒂却不是这样。内心的芥蒂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事物：这有时甚至是一种感染全民族的精神，它随身带着程度很深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甚至没有任何事实可以治愈，诸多事实无论怎样为它指明坦途都无济于事；相反，它会依照自己的理解将这些事实加以改造，使之同化于自己的精神，而且甚至还会导致整个民族很快消失、自觉地消失这样的事。也就是说，甚至在理解了自己的盲目性之后却不愿意进行治疗。请人们不要预先讥笑我，说我认为思想的差错太轻微和很快就会消解的念头过分荒唐。无论是谁，更不要说

是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想扮演一个消解思想差错的角色，扮演一个坚定地、心安理得地相信此刻能用语言强烈影响社会信念并使之彻底转变的角色，那都未免太滑稽可笑了。我能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而感到惭愧。如今也没有这个必要，谁有话要说，就让他说。不必担心人们不听他的话，甚至也不必担心人们讥笑他，说他不能对自己同代人的思想产生任何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日记》任何时候都不会偏离自己的道路，如果它认为具有影响力的权势是不公正的，那么它也永远不会向这种势力、向时代风尚让步，也永远不会随声附和、阿谀奉承、虚与委蛇。在刊物发行经过整整一年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说。要知道，在去年我们就已经很好地而且十分有意识地理解到，我们怀着热烈的心情和坚定的信念所写的很多东西实质上只有损于我们自己；相反，如果我们以同样的热情随声附和另一种调子，那么我们会有利可图。

让我重申：我们以为，如今对所有人都应该尽可能坦诚和直率地发表意见，用不着为某种坦率和幼稚的思想而感到不好意思。“很可能的确会有特殊而非常巨大的事件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全俄国发生。可能会有某些非常巨大的突发事件让我们的知识界措手不及，那么那时岂不晚了？”——我在去年结束的12月号《日记》里正是这样讲的。说这话的时候，我指的不仅仅是“不远的未来”的诸多政治事件，尽管最浅薄和最“自私成性”的头脑除了自我之外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但他们的注意力对这些政治事件也不能不感到惊讶。事实上，不只是在这残存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甚至（谁又知道这一点呢？）在今年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毫无疑问，欧洲是动荡不安的。不过这种动荡是暂时的吗？瞬息即逝的吗？全然不是。因

为，显然在世界上从它的文明创始以来积累的千百年的、天长日久的东西已到了它寿终正寝的时候。世界正面临着三种思想，而且，似乎这三种思想正在最终形成之中。一方面是在欧洲边缘的天主教思想，它受到了谴责，正在巨大的苦难和误解中等候裁决：存在或者不存在[①]，它还有生命或者已经到了它的末日。我说的不只是天主教这一宗教，我说的是天主教思想，说的是诸多民族的命运，因为诸多民族千百年来是一直受这一思想的熏陶和浸润的。比如说法国，可以说若干世纪以来它就是天主教思想的体现者，是这一思想的领头羊。当然，这一思想还是从罗马人那里承袭下来的，并且也具有罗马人的那种精神。这个法兰西，这个如今差不多全国都丧失了一切宗教信仰（耶稣会教徒以及无神论者在这里毫无区别，一模一样）的法兰西，这个不止一次关闭过教会、甚至还使上帝本身受到大会投票表决的法兰西[②]，这个从 1789 年的那些时日里[③]

---

① 原话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卞之琳译为“活下去还是不活”。（见《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82页）但在此处似可译为“存在或者不存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是德国历史学家 Ф. К. 施洛塞尔（1776—1861）在自己的《世界通史》中提到的1789—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施洛塞尔在《世界通史》中是这样写的：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决定禁止天主教的祈祷上帝活动，以崇拜智慧取代天主教崇拜的神明。指定巴黎圣母院以智慧为自己崇奉的新的上帝，其他教堂也分别得到具有其他寓意的上帝，如自由、青春、婚姻爱情等等。施洛塞尔还指出国民公会的主要成员对待教会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成员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如罗伯斯庇尔，他发现明目张胆的无神论造成恶劣的影响，于是他就摆出上帝的捍卫者的面孔，宣称自己反对无神论，称无神论是贵族观点，称反对自己的人为无神论者。这样一来……罗伯斯庇尔就成了不接受无神论的极端观点的大多数被压抑的法国人的最后的救星。按：这里所谓“大会投票表决”，当是指国民公会。

③ 指法国大革命。

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法兰西式社会主义的法兰西——这种社会主义也就是已经没有基督以及将基督排除在外的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安乐，也正是天主教曾经想要并能在基督身上体现的那种人类社会，——就是这个法兰西，无论是从它的国民公会中的革命者来看，从它自己的那些无神论者来看，还是从它的社会主义者来看，从它现今的公社社员来看——它现在仍然是，今后也仍将是最高程度的、完全彻底的一个天主教民族，从里到外都浸润着天主教精神的法兰西，用自己最最臭名昭著的无神论者的口喊出 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ou la mort[①] 这些字眼的法兰西，——也就是说，教皇本人也会丝毫不差地喊出这样的字眼的[②]，如果他不得不以教皇的语言和精神、真正中世纪教皇的语言和精神规范的天主教的 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 这几个词的话。现在的法国社会主义本身，显然是对天主教思想的一种激烈而致命的抗议，是所有受天主教思想折磨和压制的人们和民族的抗议，这些人民和民族极想过没有天主教也没有它的诸神的生活，并且无论如何也要这样生活下去。这种事实上已经从上世纪末（而实际上还要早得多）开始了的抗议其实并非别的什么，只不过是天主教思想最忠实和坚定不移的延续，是它最充分和完美的结束，是它多少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注定的后果。因为法国社会主义不是别的，而是强制的人类统一，这还是渊源于古罗马的一种思想，此后这种思想在天主教

---

① 法文：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在《冬天记的夏天的印象》中谈到这个口号，后来在长篇小说《白痴》中把这个口号与天主教联系起来，此后又在长篇小说《群魔》与 1876 年 3 月号的《作家日记》中提到过这个口号。他认为，1789 年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这个“全人类联合的新口号”是有缺陷的，在这个口号的实践中受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法国人，即夺取了“政治领导权”的资产阶级。

中全部保存了下来。这样看来，从天主教束缚中解放人类精神的思想正是采用了天主教的种种最狭隘的形式，这正是天主教的精神核心，它的词语，它的唯物主义，它的独裁专制，它的道德情操。

另一方面，旧的基督教[①]奋起反抗罗马已有十九个世纪之久，反对罗马和它的思想，即反对它的古代多神教的和革新了的天主教思想，反对它在精神和物质上统治全球人类的世界性思想，反对它的文明，——早在阿尔米纽斯以及条顿堡森林山时代[②]就已经开始反对了。这时有一位日耳曼人[③]，他盲目地相信人类的更新只是体现在他的身上，而不在天主教的文明中。为了宣扬自己高傲的思想，在自己的整个一生中，他都在幻想和渴望自己的统一——这一思想早已形成并统一为路德的邪说[④]。如今，由于在五年前粉碎了先进的、最主要的和最笃信耶稣教的天主教民族法兰西，这位日耳曼人无疑确信自己已经胜利了，确信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取代他成为世界首脑并使世界复兴。他傲慢地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点；他相信，世界

① 耶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中国习惯上称新教为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就是耶稣教。

② 阿尔米纽斯（公元前17—19），古日耳曼赫鲁斯克人的部落首领，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山击败法鲁斯统帅的罗马三个军团，阻止了罗马向莱茵河北推进。条顿堡森林山即今德国威悉山脉中的低山。

③ 此处所指的可能是俾斯麦（1815—1898），在他当政期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被迫签订《法兰克福和约》（1871年5月10日；此前曾草签《凡尔赛和约》）。

④ 德意志基督教（新教）领袖马丁·路德（1483—1546）于1520年6月15日被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通谕斥责。1521年1月3日教皇予以“绝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秉承其意旨，斥之为邪教徒，并下令逮捕他，但路德得到萨克森选侯的庇护而幸免。

上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比德意志的精神和语言更崇高，而且也只有德意志才能够使用这种语言。如果设想说，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事物，即便是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它自身能够拥有注定要领导世界而且是德意志自身所不具备的东西，那么他会觉得这是可笑的。与此同时，指出以下一点并不是多余的，哪怕把这一点放在括号之中也好。这一点就是，德意志在其存在的十九个世纪中所做的只是抗争，自己却还全然没有做出过自己的新的成就，一直在否定和反抗自己的仇敌。比如说非常非常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即德意志在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并且一举摧毁它十九个世纪以来所反抗的东西，从而它自己也不得不在精神上突然随着它的仇敌的死亡而死亡，因为它没有了赖以生存下去的东西，它要反抗的东西将不再存在。就算这只不过是我一种暂时未能兑现的空想，然而这在路德的新教[①]中则是事实：这一种信仰是一种抗争的信仰，而且只是一种否定的信仰，天主教只要从大地上一消失，随之新教也将消失，因为将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了，大概它将以直接转变为无神论而告终。不过这也算是我此时的一种未能兑现的空想。对斯拉夫的思想，这位日耳曼人也如同对天主教思想一样蔑视，其区别仅仅在于，对后者他总是当做一个强有力的敌人予以重视，而对斯拉夫思想他不仅不重视，而且直到现今最后一刻也根本不予以认可。不过不久前他却心存很大疑问地触及斯拉夫人。尽管到目前为止他认为可笑的是，甚至竟能设想斯拉夫人也会有什么目的和思想，以及某种也来“对世界说话”的希望，然而从粉碎法兰西那时开始，他的莫须有的怀疑却增长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了，当然，去年和当前所发生的事件不可能缓解他的不信任感。如今德意志的处境有点麻烦，无论如何它应该在解决各种各样的东方问题之前先解决掉自己在西方的事务。谁会否认说，法兰西，未被彻底打垮的法兰西，在它被击败的这五年中，不曾而且不正在让这个日耳曼感到不安呢？使它不安的是它没有把法兰西彻底打垮。1875 年，这种不安在柏林甚至达到极限，大概德意志本来会乘机冲上前去彻底打垮它的死敌的，如果不是某些特别强有力的事态从中作梗的话。如今，即在今年这一年，法兰西随着一年年过去已经在物质方面强大起来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情况比起两年前更让德意志感到可怕。德意志明白，不去争斗，敌人是不会灭亡的。何况当敌人觉得它已完全恢复过来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挑起争斗。再过三年，再过五年，那时可能对德意志来说就为时已晚了。由于欧洲的东方完全沉浸于自己突然兴起的思想之中，而它此刻正有太多的事缠身——因此非常非常有这种可能，德国觉得自己的手脚暂时不受束缚，它就最终扑向它西方的仇敌，扑向让它寝食不安的噩梦般的东西，——而这甚至可能发生在非常非常不远的未来。不妨这么说，如果在东方事情变得紧张而艰难起来，那么德意志的处境差不多就会更坏一些。尽管它此刻调子过于骄横不逊，但看来不会有很多危险和各种可怕的事，——这起码可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与此同时，在东方，一种世界性的思想的确正在热火朝天地兴起，这第三种思想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世人闻所未闻的。这就是斯拉夫思想，新生的、正在成长起来的思想，很可能这就是解决全人类的以及欧洲的命运问题的第三种可行的思想。如今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东方问题的解决，一种新的因素，一种新的自发势力就会进入人类中来。这种新的自发势力

迄今一直处于消极和保守状态之中，而这种势力无论如何起码不能对世界命运起着极其有力的和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思想究竟是何物，这种斯拉夫人的统一本身究竟蕴涵着什么？——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太容易捉摸，但它的确应当有所作为并且有新的内容，——对此，几乎已经没有人怀疑了。这三大世界性的思想差不多就这样同时汇合在一起，就这样差不多同时要得到解决。当然，所有这一切并非是任性行为，也并非如同上一世纪为了获得继承权或者为了两位高贵女士的拌嘴而发动战争[①]。这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和最终确定性的东西，而且尽管并非决定人类全部命运的，但毫无疑问，却蕴涵着欧洲人整个过去的历史终结的因素，——也就是说，蕴涵着解决它未来命运的因素，而这种命运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人要猜测这种命运差不多是不可能的，虽然能够有所预感。

现在，不经意地展现在每一位有思考能力的人士面前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些事件是否能够在自己的流动中停滞不前？如此规模巨大的这样一些思想是否能够听命于渺小的、自私的、三等的想象力呢？最后，它们的解决能否推迟，推迟是否有利？无疑，聪慧的头脑应当保卫住民族，并为仁爱以及人类服务，但是别的一些思想也有它自己保守的、强大的和吸引人的力量。一只手支撑不住崩塌的山峰。我们俄罗斯人这里有远胜于全世界其余一切力量的两种可怕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千

① 指的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以法国为一方，以英国、荷兰、奥地利等国为另一方。两位高贵的女士指的是英国宫廷所宠信的希尔小姐和马尔博罗公爵夫人，前者代表托利党的利益，对女王安·斯图亚特（1664—1714）施加影响，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议和并且得逞；后者代表辉格党的利益，力图劝说女王与法国继续战争，结果未获成功。

百万人民的不可分割性和精神上的完整性，以及千百万人民同其君主的紧密无比的团结一致。当然，这最后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人民的思想不但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我们那些警醒之后的彼得们”[①] 也根本不想去理解。

① 见《旧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6 章，第 40 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第 41 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福马·达尼洛夫，一位被折磨死的俄罗斯英雄

（《作家日记》，1877 年，1 月号，第 1 章，Ⅲ）

去年春天，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俄罗斯残疾军人报》上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报道了第二土尔克斯坦步兵营军士福马·达尼洛夫的惨死情况。福马·达尼洛夫被俘后遭受多次居心险恶的折磨后于 1875 年 11 月 21 日被野蛮地杀害于马尔格兰，被杀害的原因是他不想为他们服务，也不想皈依伊斯兰教。可汗本人曾答应赦免他，并给他赏赐和荣誉，条件是他得背叛基督。达尼洛夫的回答是，他不能够背叛十字架，而且作为沙皇的臣民，尽管被俘，但他仍然应当履行自己对沙皇和对基督教的义务。折磨他的人虽然将他折磨至惨死，但也对他的精神力量惊讶不已，并称他为壮士。当时，尽管所有的报刊登载了这则消息，但是这则消息却在社会上没有引发特别的谈论，何况各报也只是将它当做一般的报纸报道发表，并没有认为有必要将它特别加以宣扬。总之，正如交易所中常说的那样，福马·达尼洛夫一事“平息下来”了。之后，众所周知，斯拉夫运动开始了，出现了切尔尼亚耶夫[①]、塞尔维亚人、基列耶夫[②]、捐献活动、志愿人员等等，于是受折磨至死的福马就被完全置

---

① 米·格·切尔尼亚耶夫，俄国退役将军。在土耳其与塞尔维亚战争中，他任塞尔维亚军队总指挥。当时他的事迹经常见于俄国报刊。

② 尼·阿·基列耶夫（1841—1876），俄国退役的近卫军骑兵团大尉，他组织并指挥俄国志愿军赴塞尔维亚等处与土耳其作战，十分勇敢，最后阵亡。

之不顾了（也就是说在各报刊上），只在不久前才在原先的消息上补充了详情细节。又据报道说，萨马拉省省长调查了达尼洛夫的家庭，原来他的家庭是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基尔桑诺夫卡村的一个农户，他身后留下的是处于贫困中的二十七岁的妻子叶芙弗罗西尼娅和六岁的女儿乌莉塔。由于萨马尔省省长的倡议，她们得到了救助，高尚的省长请求某些人士帮助被折磨而死的俄罗斯英雄的遗孀和孤女，并提议萨马尔省地方自治会议应将达尼洛夫的孤女作为享受助学金的学生送进一所学校学习。随后，人们募得一千三百二十卢布，其中的六百卢布留作孤女成年后使用，而其余的悉数交给遗孀，达尼洛夫的孤女也已被安排进一所学校里。此外，参谋总长通报省长说，奉极其仁慈的谕旨，将为达尼洛夫遗孀从国库中颁发终生抚恤金，每年一百二十卢布。之后——之后这事大概又将会被人遗忘，因为当前有当前令人惊骇的事，有政治上的忧虑，有期待解决的众多重大问题，有崩溃要发生，等等。

啊，我根本就不是想要说，我们的社会对待这一惊天动地的行为如同对待无足介意的事那样无动于衷。可事实是，很少有人讲这件事，或者不如说，没有人特别讲一讲这件事。或许，有人还是私下讲了的，比如商人、神职人员们，然而却不是在社会上，不是在我们知识阶层中间。当然，在人民中间这一伟大的死亡是不会被遗忘的。这位英雄为基督而受难，因而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人民对此高度评价并将永志不忘，人民对这种事将永远牢记在心。可是我现在就仿佛听到我非常熟悉的声音："精神力量嘛，当然很有精神力量，这我们也承认，不过，终归嘛——有点暗淡无光，这么说吧，表现出了过分落后的、官样文章的套套，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呢？不是我们圈子里的事；如果是有文化修养、自觉地表现出来的

精神力量，那将是另外一码事。据说，还有另外一些受难者和另外一些精神力量，还有无可比拟的崇高思想——比如说，共同人性的思想……”

尽管听到了这种理智的知识界的声音，我仍然觉得可以而且非常抱歉地想就达尼洛夫说某些特别的话；此外，我甚至还这样想，如果我们的知识界曾经比较关切地对待这一事实，那么他们就根本不会如此贬低自身了。使我感到大为惊异的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惊异；是的，就是惊异。我不是说人民，人民对此无须惊异，人民中间也不会有惊异；仅仅根据人民对自己和对自己的心灵的伟大信念，人民就不会觉得福马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人民对福马这一功勋的反应只限于一种极大的情感和极大的感动而已。如果类似的事发生在欧洲，也就是说，类似这种表现伟大精神的事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那里发生，那么他们大概会大喊大嚷吵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不，先生们，请听我说，你们可知道我是怎么设想这位没有知识、默默无闻的土尔克斯坦步兵营的士兵的？要知道，这是俄罗斯的标志，是全俄罗斯的，是我们全体人民的俄罗斯的标志，是俄罗斯的真正形象。可正是在这个俄罗斯中，无耻之徒以及我们那些极端聪明的人如今却否认有伟大的精神，否认伟大思想与伟大情感出现与高涨的任何可能性。请听我说，你们毕竟并非这些无耻之徒，你们只不过是一些欧化的知识界人士，也就是说是一些最善良的人。要知道，你们并没有否认我们的人民在夏季曾经在一些地方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人们撇下自己的家园和儿女，为了信仰和为了受欺压的人前去赴死，像九个世纪之前的欧洲十字军战士一样前往天知道什么地方和运用天知道的什么方式去战斗，——正是这样一些十字军式的

战士的重新出现，有的人，例如格拉诺夫斯基[1]，却认为“在我们这个有正当的任务需要去解决和正在前进的时代”，差不多是可笑的和令人感到遗憾的，等等。照你们看来，就算这次夏季的运动是盲目的和甚至仿佛是不明智的什么“十字军式的”，但是只要目光略微开阔一些的话，那么不能不意识到这次运动是坚定不移的和胸怀慷慨的。伟大的思想觉醒了，很可能它已唤醒千百万心灵，而一下子就超脱了他们曾经置身于其中的因循守旧、厚颜无耻、道德败坏以及不成体统的事物。你们也知道，我们的人民到目前为止虽然被认为是仁慈的和非常富有聪明才智的，但是毕竟还是一群愚昧的、没有自觉性的自发的群众，普遍驯服于恶习与成见，而且差不多是胡作非为之人。不过，这么说吧，请允许我斗胆说出一个公理：要判断人民的精神道德力量和人民在未来能做什么，不应该拿胡作非为的程度作为设想的依据，尽管人民暂时或者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会非常卑贱，而应该拿人民在一定时间内、在大多数情况下达到的精神高度来作为设想的依据。因为胡作非为只不过是暂时性的不幸，它差不多总是取决于未来和过去的处境状况，取决于奴役地位，取决于世代的压迫，取决于粗鲁野蛮等等，而胸怀宽阔慷慨的天赋则是一种永恒的天赋，自发性的天赋，是同人民在一起发展起来的天赋，更何况它在延续了多少个世纪的奴役地位、重负和穷困中始终还在人民的心田里毫无损伤地保全了下来，那么它是值得敬重的。

福马·达尼洛夫看起来可能只不过是俄罗斯人民中间一个最平常和最不引人注意的人，如同俄罗斯人民本身那样。（啊，

---

[1] 季·尼·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历史学家，西欧派代表人物。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现在还根本没有引起注意！）或许，他当时也玩乐，也喝酒，或许，尽管他总把上帝记在心里，却不怎么祈祷。于是突然有人命令他改变信仰，否则就得接受千种万种折磨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想一想这种种折磨，这亚细亚式的折磨通常该是怎样的呀！可汗本人就在他面前，可汗亲自允诺赦免他。达尼洛夫也知道，如果他回绝，肯定会激怒可汗，也会刺激那些俘获他的人们的自尊心。他们会说，“怎么，一个基督狗竟敢如此蔑视伊斯兰”。但是不顾由此引发的后果，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俄罗斯人接受最残酷的折磨而赴死就义，从而让折磨他的人惊叹。先生们，要知道，我们之中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当众受苦受难有时甚至是很壮丽的，但是，这件事发生在不为人知晓的地方，发生在一处荒僻的角落，没有人看着他。恐怕连福马本人也未能想到，大概也未曾设想，他的功勋会在整个俄罗斯大地上被公开宣扬。我想，那些伟大的殉教者们，甚至是世纪初那些基督教的殉教者们，在接受苦难的时候，他们也会因为确信他们将成为胆怯者和动摇者们的榜样，会把更多的人引向基督而感到欣慰和觉得松快。对于福马来说，甚至连这种伟大的宽慰也不可能有：谁又会知道他是受难者中的一位呢？他还很年轻，在某处还有他青春年华的妻子和女儿，如今他再也见不到她们，不过，就让它如此这般吧：“无论我在何处，违反我良心的事我不会去做，而苦难和折磨我则会接受。”——这真正是为真理而坚持真理，而非哗众取宠！对良心丝毫没有作假，丝毫没有诡辩：“不妨表面上接受伊斯兰教，但是我将不受罪恶的诱惑，没有人会看见的，日后我再祈祷免罪。生活是漫长的，我将向教会捐献，我将要行善。”上述的话根本就不存在，只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原始的、自发的忠诚。不，先生们，我们未必能够做到这样！

请让我再重复说，达尼洛夫的功勋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或许甚至没有什么惊人之处。问题就在于这正仿佛是一幅肖像画，一幅完整的、描绘我们人民的肖像画，因此这一切对我，当然不言而喻，也对你们，是值得珍视的。我们的人民正是这样为真理而热爱真理，而不喜欢哗众取宠。尽管人民粗鲁，没有文化，还有种种毛病，而且平庸无奇，但是一旦时机来临，一旦开始了全体人民共同为真理奋斗的事业，那么那种精神自由的程度就会使你们感到惊异。人民的这种精神自由就表现在对待物质利益的压力方面，表现在对待欲望、金钱和家产的醉心方面，甚至表现在对待残酷之极、折磨至死的恐惧方面。所有这一切人民都将做得并表现得简单、坚定，无须报偿，无须表彰，也不自我炫耀：“我信奉我所信仰的。”这里甚至连极端醉心于争论的人们对人民理想的“顽固落后性”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因为问题已经不在于理想是否顽固落后，而仅仅在于为了高尚胸怀的壮举能否表现出最伟大的意志。（为了彻底公道起见，我才把这种滑稽可笑的理想的“顽固落后性”的思想引述在这里。）

先生们，你们也知道，应该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我直率地认为，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教导这样的人民的。不言而喻，这是诡辩，不过它有时让人想到它。啊，不用说，我们比人民多一点文化，然而我们又能教他们些什么呢？——这才是糟糕的事！我说的当然不是手艺，不是技术，不是数学知识，——如果我们不去教，那么雇用外来的德国人也会教这个的，不是指这个，我们到底该教什么呢？要知道，我们是俄罗斯人，是这一人民的同胞兄弟，因此我们有义务给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在崇高的道德情操方面我们又能给他们什么，又能用什么来开化他们“愚昧无知的”心灵呢？使人民得到启蒙——

先生们，这是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义务，这种权利是崇高的基督教意义上的权利。凡是知道善的人，凡是知道生活的真正意义的人，他们都应当、都有义务把它告知给那些尚不知道、在黑暗中彷徨的自己的兄弟，要按照福音书的教导行事。那么，究竟彷徨在黑暗中的人有什么东西不如我们知道得多而需要我们告知呢？当然，首先，学习终归是有益的，应该学习，不是吗？人民早在我们之前就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学习——是光明，不学——是黑暗。”比如说，要学习消除偏见积习、推翻偶像？可是要知道，我们自己本身也有数不清的偏见积习，而偶像我们也塑造了不少，人民会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①]（我们的那些偶像，人民都非常善于观察！）那么，就学习自尊自重，学习自身的优秀品格？但是，我们的人民，我们全体人民，就其总体来说，远远比我们更自尊自重，远远比我们更尊重和更了解自己的优秀品格。事实上，我们虽然自尊到了可怕的程度，但是我们却并不尊重自己，在我们身上根本谈不上优秀品格，不论在哪方面都没有。那么，比如说吧，竟然能够让我们来教导人民去尊重别人的信念吗？早在彼得大帝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就已经证明他们是尊重别人的信念的，而我们相互之间却不能容忍别人稍许不同于我们信念的东西，对于稍微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我们干脆就称之为坏蛋，全然不记得，凡是轻易丧失对别人尊重的人，他首先就是不尊重自己。那么，是否由我们来教导人民相信自我本身和相信自己所具有的力量呢？可是，在人民中间有福马·达尼洛夫这类人物，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可是我们却根本不相信俄罗斯人的力量，甚至于还把这种不相信视之为高层次的文化

① 引自《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4章，第23节。

素养，而且几乎还是一种高尚品质。最后，我们究竟能教导人民什么呢？我们差不多恶毒地鄙弃我们的人民所喜爱和敬重的一切，鄙弃我们的人民心向往之的一切。我们是怎样的一些人民的爱护者呢？有人会反驳说，如果我们鄙夷人民的无知而只希望他们更好一些，那么这岂不是我们更爱人民？啊，不是的，先生们，远非如此。如若我们事实上果真爱人民，而不只是在什么文章里和什么小册子里写写爱人民，那么我们就该更紧密一些地靠近人民，并且去关注和研究如今我们完全不加考虑地按照欧洲的教条想要消除的人民身上的什么东西。或许在这时，我们自身才能学会很多东西，学到我们此刻甚至无法设想到的那么多的东西。

现在我们还有一点可以告慰之处，在我们的人民面前还有我们的一种极大的骄傲感，因此我们才蔑视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是具有民族性的，并且竭尽全力坚持这一点，可是我们却是坚持全人类的信念的，而且我们的目的就是致力于全人类性，因此我们就无比高于我们的人民。瞧，这正是我们的全部分歧所在，正是我们同人民的全然隔绝之所在，于是我要坦白直率地声明：如果我们纠正这一点，如果我们找到和解之点，我们立刻就会结束同人民的分离状态。要知道这一点是存在的，找到它也是非常容易的。不妨让我坚定不移地重复说一句，甚至连我们之间最截然不同的分歧实质上也只不过是幻景而已。

那么这和解之点又是什么呢？

排除科学的和解幻想

(《作家日记》，1877 年，1 月号，第 2 章，Ⅰ)

首先让我提出一个最具争议性和最敏感的论点，并从它开始我的话题：

“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它想长久生存，就要相信并且应当相信，只有在它的身上才有赖以拯救世界的东西，它的存在就是要居于各族人民之首，就是要把所有的民族合并到自己方面，结为一体，融洽和谐，带领它们向共同制定的最终目标前进。”

我确信，从古到今，所有伟大的民族全都是这样做的，也只有具有这种信念才使得它们、使它们中的每一个民族会达到尽可能高的位置和在它们那一时期会对人类的命运施加巨大的世界性影响。无可争辩，古罗马就曾经是如此，随后，天主教罗马在它存在期间也曾经是如此。当法兰西承袭了天主教的思想之后，法兰西差不多在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也仍然是如此。法兰西一直到它被击败和它自己感到懊丧之前还自认是世界的首领，一向如此而且无可争议，起码在道义方面，而有时在政治方面，它也是世界走向的领头人和未来世界的指导者。但是德意志一向也幻想着它能够这样，它起而反对世界性的天主教思想和反对天主教的权威，推出新教和良心以及探讨的无限自由，并把它们当做自己的旗帜。我再重复一次，对所有伟大的民族来说，或多或少，在它们处于发展的上升时期同样如此行事。人们会对我说，全然不是这样，这是错误的；他们也会指出这些民族本身的意识，指出那些学者和思想家们的意

识，那些学者和思想家曾经撰写文章讲述共同参与创建和最终完成欧洲文明的欧洲诸多民族浑然一体的意识，不言而喻，对于这种意识我将不会否认。且不说这种意识的最终结论，一般来说，仿佛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现实生活的终结，不妨让我指出一点，那些思想家和先觉者们不管他们对有关诸多民族的世界性融洽写了什么，与此同时，终归仍然经常以直接的、亲身的和真挚的情感，同他们的人民群众完全一样，继续在相信，在构成世界的融洽和共同创建了文明的诸多民族的和谐之中，——他们（比如说，也就是法兰西人）依然是这浑然一体中的首领，依然是最先进的人，依然是那些注定要负有领头作用的人，而其他民族则只是跟随在他们后边走。假如说他们也从别的民族那里采用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么采用的也只是少量的东西；然而，别的民族则反而会从他们那里拿走一切，拿走最主要的东西，并且只有靠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思想才能生活下去；更有甚者，别的民族除了同化于他们的精神而或迟或早最终同他们融合之外别无可图。在当今这个心灰意冷和精神上已分崩离析的法兰西，还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它代表着一种新的阶段，但就我们的看法来说，它完全是先前那种世界性天主教思想的自然而然的阶段及其发展，现在有差不多半数法兰西人相信，不仅他们自己的得救，而且甚至是世界的得救，就蕴藏在这种思想之中，——这种思想就是他们的法兰西社会主义。这种思想，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社会主义，当然是虚伪的和极坏的，但是现在问题还不在于它的品质，而在于这种思想如今存在着，生机勃勃地生存着；而且还如同在法兰西其余巨大的地区内一样，在于信奉它的人们丝毫没有对它产生怀疑，也不对它感到灰心。另一方面，请看看英国人，看看他们中的差不多每一个人，无论他是社会上层或下层，无论他是勋

爵还是普通工人，是学者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你们只要看看这些人就会确信，每一个英国人首先就是努力要成为英国人，并且要在生活的所有阶段都保持一个英国人应有的面貌而不使之受损，私人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是这样，政治生活中和人类共同生活中也是这样，甚至在尽力爱护人类方面也要不失其作为一个英国人的面貌。人们会对我说，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如果一切果真如同我所肯定的那样，那么，这样的自我陶醉和自视甚高对于那些伟大的民族来说甚至是有损尊严的，是它们的利己主义、荒诞的沙文主义贬低了它们的意义，而不是赋予它们以活力，恰恰相反，在一开始就会损害和败坏它们的生机。人们会说，诸如此类狂妄和傲慢的思想不值得模仿，相反，倒是值得用消除成见的理智之光予以根除。假如说，从一方面来看这是很真实的，那么仍然必须从另一方面来看一看，只有这时才能得出结论说不只不是贬低，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还没有见过世面的少年幻想着有一天成为英雄，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请相信，如此傲慢和自高自大的幻想对这位少年只能是大有裨益的。这要比另外一种慎重的少年强得多，那种慎重的少年在年仅十六岁时就已经相信十分聪明的准则，就是“幸福比勇士气概更好”。请相信，这位幻想成为英雄的少年即使经历了贫困和失败之后，总的来说，他的生活仍将比他那位慎重的童年伙伴的安乐生活壮丽得多，尽管后者一辈子注定要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这样的一种自信感并非是不道德的，也完全不是庸俗的自我吹嘘。在各族人民中亦是如此：有些人明事达理、正直并且平易近人、安分守己，没有任何激情和冲动，这是些生活富裕和衣冠楚楚的商人和船舶制造者①。上帝保佑他

① 这里作者分别指的是英国人和荷兰人。

们，他们终归不会鹏程万里的。这是一种中庸状态，它对人类毫无用处，他们没有精力，他们缺乏伟大的自命不凡，在他们身下没有涌动的那三条大鲸[①]，而所有伟大的民族是靠这三条大鲸的支撑才得以立足天地之间的。相信自己希望并且能够向世界讲出决定性的话，相信自己能以充沛洋溢的活力最终使世界获得新生，相信自己理想的神圣性，相信自己热爱人类并极愿服务于它的力量，——这样的信念就是诸多民族最崇高生活的保证。只有靠这种信念，诸民族才能给人类带来那本当带来的益处，带来那本当带来的自己的生命力和与自己肌体同在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与生俱来的，并注定应传给未来的人类。只有具有这种信念的强大民族，才有权享受崇高的生活。古代传说中的武士相信一切障碍都将在他们面前崩溃，所有的幽灵和怪物全都将倒在他们脚下；古代传说中的武士相信会战胜所有的人和一切困难而取得要取得的一切，只要他信守他的誓言："公正、忠贞和贫穷。"你们会说，所有这些都是只有堂吉诃德一人才信以为真的传说和歌曲，民族现实生活的准则并非如此。嗯，先生们，我这是有意让你们上钩，你们才是这样的一些堂吉诃德之类的人物呢，你们有一种自己信赖的思想，你们想通过它使人类获得新生！

实际上，你们在相信些什么呢？你们（我同你们一样）相信全人类性，也就是说，相信有一天面对理智和意志之光，那受民族私利的要求而迄今隔阻诸民族自由交往的自然障碍会要倒塌；相信只有到那时，诸多民族才会兄弟般地和睦生活，理智而友爱地去追求共同的和谐。怎么样，先生们，有什么能够比你们这样一种信念更高尚和更神圣的呢？但是，要知道，主

---

① 西方传说，宇宙是由几条大鲸鱼支撑着的。

要的是，这样的一种信念在世界上你们再也无处可找了，比如说吧，在欧洲的哪一个民族中都没有这种信念。在欧洲各民族的个性都已经异常鲜明地勾勒定型，在那里即使有这一信念，那也不会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处于某种思辨意识层面上的东西，尽管是热忱而激烈的，却只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空谈而已。你们那里，先生们，也就是说不是你们那里，而是在我们所有人中间，在我们俄罗斯人这里，——这种信念是一种共同的信念，有活力的、最主要的信念；我们所有的人都自觉地、自然而然地相信它，无论在知识界，无论在凭直觉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中间都是如此，普通老百姓中的宗教也令老百姓相信它。是的，先生们，你们原以为只有你们才是俄罗斯知识界中仅有的“全人类的人”，而别的人则只不过是一些斯拉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那么看看吧，事实并非如此：斯拉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相信的和你们相信的一模一样，毫厘不差，只不过比你们相信得更坚定！

就让我只拿斯拉夫主义者来说吧。他们借自己先进的活动家们、他们的奠基者们和他们学说的代表人物们之口宣扬了些什么呢？他们坦白直率地用清晰而准确的结论宣称，俄罗斯与斯拉夫主义一起并带领它向全世界说出最伟大的话，这种话全世界在某时曾经听到过，正是这种话将成为全人类团结一致的告诫，这已不是在利己主义精神上的结合。现在人民和诸民族是本着利己主义精神人为地和不自然地在自己的文明中结合起来，出于为生存而斗争结合起来，在以实证的科学为自由精神界定道德标准的同时，相互之间又各为对方设置陷阱，说谎，诽谤。斯拉夫主义的理想是，以真诚广泛的爱的精神团结一致，没有谎言和唯物主义，以个人的宽广胸怀的表率为基础，作为自由的全斯拉夫团结的领袖，俄罗斯人民注定要亲自为欧

洲做出这种表率。你们会对我说，你们相信的全然并非是这个，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空洞抽象的议论。但是，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谁有怎样的信仰，而在于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我们终归会在一点上殊途同归，这就是全人类团结一致这一最终的思想。这是一个毋庸置疑而本身又很惊人的事实，因为这种情感达到如此有生命力和极为重要的需求的程度，这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是没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有一种坚定和确切无疑的民族的思想；说的正就是*民族的*。由此看来，如果这种俄罗斯的民族的思想，归根结底，就只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团结一致，那么，我们的全部利益就在于我们全体，暂时消灭一切不和，从而尽快成为俄罗斯人并成为民族的一员。我们获救的出路仅仅在于不要事先争论什么这种思想是否存在和以什么形式存在，是依你们说的那种形式存在还是依我们说的那种形式存在，而在于都从书斋中的空谈中走出来，一起直接转而去干实事。

那么，就在这里打住吧。

我们在欧洲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作家日记》，1877 年，1 月号，第 2 章，Ⅱ）

你们到底是怎样转而去干实事的呢？要知道，你们早已而且已经很早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你们究竟为全人类做了些什么，也就是说，为你们的思想的胜利做了些什么？你们开始在欧洲无目的地流浪，怀着一种哪怕仅仅是在外表上变成欧洲人的渴望。整整一个 18 世纪我们做的就只是这个，但暂时还是学到了一些皮毛。我们迫使自己具有欧洲人的口味，我们甚至忍住不皱眉头而吞下种种难以下咽的肮脏东西，说什么："我算什么英国人，没有克恩辣椒[①] 我什么也吃不下。"你们以为我是在挖苦？毫无此意。我太了解啦，不如此就无法开始我的话题。早在彼得大帝之前，莫斯科诸沙皇及总主教当权之时，曾经有那么一位当时年轻的莫斯科花花公子，一位先进的人物，他穿上法兰西式的西装，还在身旁佩带了一把欧洲长剑[②]。我们原本正应该从鄙视我们自己的东西和鄙视我们自己人做起，如果整整两个世纪之久都停滞在这一点上既不后退也不前进，那么这也是我们命中注定的期限。不错，我们是向前推进了：对于自己的事物和自己人的鄙视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当我们较为认真地开始了解欧洲之后更是如此。不过，在欧

---

① 一种极辣的辣椒，因原产南美克恩而得名。

② 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指的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亲属 H. И. 罗曼诺夫、A. M. 科利佐夫-莫萨利斯基公爵以及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宠臣 B. B. 戈利岑（1643—1714）。

洲，泾渭分明地将诸多民族加以区分以及生硬地确定了的各民族性格的类型，却从来也没有使我们感到难堪。我们首先做的是，直截了当地“排除所有的矛盾对立”从而获得了“欧洲人”这一般的人的典型例证——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发现了一种共同的、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很有特色的。随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变得聪明些之后，我们就一下子抓住了文明这个东西并马上就盲目地和义无反顾地相信，那注定要将人类结合在一起的“普遍性”就存在于文明之中。看着我们这些陌生的外来人，甚至连欧洲人自己也对我们这种热情洋溢的信念感到惊异，因为可悲的是，他们那时早已开始逐渐对自己失去信心了。我们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卢梭与伏尔泰，我们同当时正在欧洲旅行的卡拉姆津一起深深感动地为在1789年召开法国“国民议会”而欣喜[①]，如果我们后来，在本世纪前四分之一的末期，也同先进的欧洲人一起共同为他们破灭的幻想和被粉碎的理想而陷于绝望的话[②]，那么我们的信念毕竟还没有丧失殆尽，而且甚至还来得及安慰那些欧洲人。在我们国内，甚至最“白色的”俄罗斯人在欧洲立即变成了“红色的”[③]——这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特点。之后，在本世纪中叶，我们之中的某些人[④]有幸接触并研究了法国的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大约于1866年得知作家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对1789—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持的同情态度。当时发表的卡拉姆津致诗人伊·伊·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的信中有同情法国革命的议论。

② 当指十二月党人。

③ 这里讽刺的主要是那些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达官贵人和其后代，这些人去国外后盲目奴性地接受西欧的思想和种种习俗等等。

④ 这里指的是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辽夫以及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

社会主义而且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它，把它当做是最终解决全人类大团结的办法，也就是说，把它当做是迄今为止吸引我们的幻想所取得的成果。这样一来，我们视为达到目的的东西却是那构成利己主义顶点的东西，构成无人性的顶点的东西，构成经济混乱无序、杂乱无章到了顶点的东西，将人的天性诽谤到了极点的东西，将人的各种自由消灭到了极致的东西，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我们感到难堪。相反，见到有些饱学的欧洲思想家们对此所表现出的忧虑和困惑不解，我们则以满不在乎的态度立即称他们是些坏蛋和蠢人。那时我们完全相信，而且现在也相信，实证科学完全有能力对个别人的个性和诸民族的个性之间的道德界限做出界定。（仿佛科学，——假定说它果真能够做到这一点。——即在实验之前，也就是说，地球上人的所有命运最终解决之前，能够揭示其秘密。）我们的那些地主卖掉了自己的农奴并去巴黎出版社会主义的杂志，而罗亭之类的人物则死于巷战之中①。与此同时，我们如此严重地与自己的俄罗斯乡土脱离，以致这种学说与俄罗斯人民的心灵有多么不投合，我们都缺乏任何了解。何况我们不只不把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当一回事看待，甚至还不承认在人民中间有什么性格。我们早已忘记了考虑它，而且还以一种十足的独断专行的坦然态度确信（也不提出疑问），我们的人民立刻就会接受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实质上就是接受我们命令他们接受的一

① 作者在这里指的是赫尔岑。赫尔岑离开俄国后起先旅居巴黎，曾无偿资助蒲鲁东（1809）巨额款项（一万四千法郎）办《人民之声》报，没有这笔巨款出报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其次，作者在这里还暗指屠格涅夫，他卖掉了庄园并迁居国外。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1855）在1860年的版本中补充了罗亭死于巴黎巷战中的场景。提到罗亭时，作者还暗示蒲鲁东（罗亭的主要原型），他曾积极地参加了1848年的德累斯顿的起义。

切。在这方面，我们总是有一些有关人民的极其可笑的笑话。我们的那些全人类的人对待自己的人民完全如同地主对待人民一样，而且这甚至还是在农奴制改革[1] 之后。

那么，我们取得了什么结果呢？取得了奇怪的结果。主要的是，在欧洲所有的人都讥笑我们，而他们对在欧洲的优秀的和无可争议的聪明的俄国人也傲然视之，甚至连从俄国移居去的侨民，也就是那些与俄国完全脱离关系的政治侨民，也免不了受他们的傲慢对待。欧洲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把我们当做他们的自己人看待，无论我们做出什么牺牲，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欧洲人都不会把我们看成是自己人，说什么：Grattez le russe et vous verrez le tartare.[2] 我们已经被编进了他们的谚语里。我们越是迎合他们的看法而蔑视我们的民族性，他们就越是蔑视我们自己。我们在他们面前摇尾乞怜，我们卑躬屈膝地向他们吐露我们的“欧洲的”观点和信念，而他们甚至傲慢地连听都不听我们的话，并且通常总是带着一种仿佛想尽快摆脱我们的样子，礼貌地冷冷一笑补充说，我们“没有正确理解”他们的这一切。他们深感惊异的正是，如此这般的鞑靼人(les tartares)，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成为俄罗斯人；我们从来也没有让他们弄明白，我们并不是想要成为俄罗斯人，而是要成为全人类的人。不错，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甚至有所领悟。他们领悟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乃是他们感到可怕的和危险的东西；他们领悟到，我们人数众多，泱泱八千万之众，我

---

① 俄国农民改革在 1861 年。

② 法文：在俄国人身上刮一刮，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按：这一谚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前曾多次引用过。

们知道并且也理解欧洲的种种思想，而他们对于俄国的那些思想则一无所知，即使能知道，也并不能理解；我们会讲各种语言，他们则只会讲自己的语言，——嗯，还有许多需要他们猜测和怀疑的东西。结果就是，他们直截了当地称我们为敌人和欧洲文明未来的摧毁者。这就是他们对我们要成为全人类的人的这一热烈向往的目标的理解！

与此同时，我们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摈弃欧洲。欧洲是我们的第二祖国，——我第一个要站出来热情地宣扬这个，而且一向就是这样做的。欧洲对我们来说差不多也如同俄罗斯一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珍贵的；在其中都是雅弗的部族，而我们的思想就是要让这一部族的诸民族统而为一，甚至于进一步，更进一步一直到把闪的部族和含的部族的民族都联合起来①。怎么办呢？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成为俄罗斯人。如果共同人性是俄罗斯民族的一种思想，那么每一个人首先要成为俄罗斯人，也就是说，自己要成为自己，那时，从第一步开始一切就会改观。要成为俄罗斯人，就意味着不要再蔑视自己的人民。一旦一个欧洲人发现我们已经开始尊重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民族性，那时他也就会立即开始尊重我们。的确是这样，我们越是坚强有力地和独立自主地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就越会获得欧洲心灵的回应，而且在与它接近后，也就会立即为它所理解。那时人家就不会再高傲地不理会我们，而是会聆听我们说些什么

① 《旧约全书·创世记》故事中，诺亚的三个儿子分别叫闪、含和雅弗。洪水之后，诺亚的三个儿子分居各地。闪成为闪族人的始祖，含成为非洲地区部族的始祖，雅弗的后代组成印欧种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欧洲各族人民，即“雅弗的部族”，也属于印欧种族。

了。那时，我们在外表上看起来也将成为另外一种人。我们成为我们自己之后，我们终将获得人的面貌，而不再是猴子的面貌。我们将获得一个自由的人的面貌，而不再是奴隶，不再是仆从，不再是波图金的面貌；那时人家就会把我们当做人看待，而不再把我们看做国际流浪者，不再把我们看做西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足重视的角色。我们也将比现在要聪明得多地同他们交谈，因为在我们的人民之中，在我们人民的精神之中，我们找得到欧洲人必定会更加理解的新的语言。而且那时我们也将懂得，过去我们所鄙视的人民中间的东西并非是黑暗，而正是光明；不是愚蠢，而正是聪慧。只要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必定会在欧洲说出在那里闻所未闻的话语。那时我们就会确信，真正的社会话语的载体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人民；人类大团结的迫切需求存在于人民的思想之中，人民的精神之中，这种大团结充分尊重并保留诸民族的个性，还要保持人们的充分自由，并要指出这种自由表现在何处，——这种仁爱的大团结赖以保证的是事业，是活生生的范例，是真正博爱的付诸实施，而不是砍头机，不是千百万落地的人头……

不过，难道我真的想要说服谁？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但是——人是软弱的，说不定会有某个未成年的人，少年一代中的某个人将会读我写的东西……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的往事

（《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2章，Ⅲ）

众所周知，此刻正在对参与去年12月6日喀山事件[1]的人员进行审讯，有关审讯进行的情况我们的读者诸君大概已经从报纸上得知。但是在一份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有关过去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评论使我感到吃惊——这个小组在19世纪40年代末曾是一个著名的犯罪社团，我也曾是该社团的参加者，为此我付出了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并忍受四年苦役生活的代价。这则评论是《彼得堡报》在它论述喀山事件的激烈的社论中谈到的。此外，在这篇社论中还转载了斯特罗宁[2]先生的著作《政治是科学》中的若干行非常精彩的文字，这几行文字我全部转引在下面。这是对“到民间去”的青年们的忠告：

> 与其到人民中间去，不如乘此机会来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有仆人，有厨娘，有女仆，有车夫、听差、管院子的人。如果您想成为民主主义者，那么请把他们邀到桌旁与自己坐在一起吃茶，把他们引入到您的家庭生活中来。与其对他们讲述什么没有上帝而只有传单，讲述什么种种愚蠢的自由派人士如何开始行动，不如告诉他们加减乘除，文字和字母。与此同时，但愿您对您的这些学生们老老实实，关怀备至，严肃认真，而不要过于随便。总之，您要做出良

---

① 1876年12月，在喀山广场发生了革命示威活动。1877年1月18日对示威参加者开始审讯，彼得堡和莫斯科各大报都刊登了有关审讯的材料。

② А. И. 斯特罗宁（1827—1889），社会学家。

好的或者起码来说脾气最好的榜样。

现在特别说一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下面就是在社论里作者说的话：

> “喀山事件”所提示的另外一种思想就是，社会意识中较可告慰的一面就是，参与所有这类悲惨事件的人物一次比一次来得更渺小，甚至热情的思想界对此也不感兴趣。五十年前，犯有政治罪的是那些出身于上层社会和知识界的人士（十二月党人）；19世纪40年代，俄国政治犯的人物则卑微得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19世纪60年代初，政治犯则渺小到了所谓有思想的无产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分子”）的程度；19世纪70年代初，政治犯降落到了半途辍学而无知的学童和劣等虚无主义者的地步（“涅恰耶夫[①] 分子”）；多尔古申[②] 事件中，在台上宣传鼓动的人物已经是一伙半文盲的恶棍，犹太分子和工厂酒鬼的色彩还很浓。这样一种越来越卑微下去的趋势是一种最好不过的证明，它证明在本

---

① 谢尔盖·格纳迪耶维奇·涅恰耶夫（1847—1882），俄国无政府主义者，1868—1869年彼得堡学潮参加者，1869—1871年曾与巴枯宁有密切联系，1869年在莫斯科成立阴谋组织“人民惩治会”，搞恐怖活动。曾遭逮捕而又逃亡国外，1872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沙俄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曾借此人的言行以丑化当时的革命青年。

②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多尔古申（1848—1885），俄国民粹派革命者，秘密宣传和印刷的组织者。1872年在彼得堡成立“多尔古申分子”小组，“到民间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小组中产生的。1874年被判处十年苦役，1881年由于参加囚犯的暴乱苦役期被增至十五年。1884年被关押在施巴吕瑟尔堡要塞并死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中将此人作为小说中人物布尔加乔夫的原型。

朝[①] 经过所有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之后，犯罪的政治宣传已经不可能指望从社会上招引多少有点认识的分子。至于对人民群众，这种宣传就更加不大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表明他们是怎样对待不请自到的预言家们的……

社论作者[②] 指出我们的革命宣传活动微不足道，这一思想无疑是对的，尽管表达得还欠清楚；为了对事情有所裨益，这里有很多地方需要说得更确切一些。不过我将只说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的情况，当社论作者用他们作为例证指出他们比起十二月党人来不过是无足重轻的政治犯时，社论作者的这种说法就未必正确了。我还要补充说，这种有关“卑微论”的思想我早已听说过，它已在报刊上多次出现过，既然我在这里又碰到这种论调，那么现在就不妨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以为，政治犯人物构成的根本变化在我们这里也仅仅是近二十年的事；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同十二月党人完全是一种类型的人，就如社论作者指出的那样，起码就其本质的特征来说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社论作者说，十二月党人是些“出身于上层知识界社会的”人。那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的不同又在哪里呢？在十二月党人的成员中的确可能有更多的人与上层或者最富有的社会阶层有联系；但是，就数量来说，十二月党人要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多，而在后者的成分中也有不少人与上层社会很亲近，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是富有的人。上层社会丝毫也没有同情十二月党人的想法，甚至

---

① 指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代。

② 这篇社论的作者是匿名的，实际上是《彼得堡报》的编辑 И. А. 巴塔林。

也没有间接参与其事，因此从这一方面说，不可能赋予上层社会任何特别的意义。十二月党人更多是军人，但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军人也不在少数。总之，我不明白，社论的作者到底在他们之间找到了什么区别。十二月党人也好，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也罢，他们都同属于，这么说吧，地主老爷的、“贵族老爷的”社会，在当时政治犯人物，也就是说，在十二月党人以及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中间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区别。如果说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中间也有过若干名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为数甚少），那么也仅仅是受过教育的人，作为受过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也会在十二月党人中出现。一般来说，无论在十二月党人中，还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中，小市民和一般的平民知识分子不可能为数甚多，这仅仅因为这种人当时还为数不多。至于说十二月党人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在“知识分子性质”上更高一筹，那么社论的作者在这方面的论述也是错误的：十二月党人这个团体的构成人员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在文化程度上相对要低一些。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中间，大多数都毕业于最高学府——毕业于大学、政法专门学校、法律专门学校和最高专门技术学校等。有很多人曾是从事教学和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后来即在他们获得赦免之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如果就所有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来说，也就是说，不只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那一部分，也包括在俄罗斯被流放到各个要塞和高加索去的——或者发配到边远城市服役的，或者虽未被流放却留在当地受监视的很多很多人在内，那么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日后都在学术方面有出色表现，有的是教授，有的是自然科学家，有的是各种学会的秘书，有的是各种学术论文的作者，有的是各种

杂志的出版者，有的是非常出名的小说家、诗人，总的来说，都是些有益的知识界的活动家。我不妨再说一遍，就其文化素质来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是高于十二月党人的一批人物的。

不言而喻，那些持人物“卑微论”者们的说法之所以有很多不正确之处，还因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比起十二月党人来为数甚少，存在的时间也极短暂，其参加者的年龄也比十二月党人小得多。

我要说的结论就是，在整整一百年当中，俄国革命者这种人物本身就最鲜明不过地显示出我们先进的知识界是多么脱离人民，完全忘记了人民的真正需求，甚至也不想去了解这些需求是什么，非但不去操心减轻人民的苦痛，还提供他们一些与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的体质极不相宜的，即使他们能够理解却也完全不能接受的药方。我们的那些革命者们整整一百年来所说的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如今，由于众多而且复杂的原因（这些原因我们将在未来一期的《作家日记》中谈到），出现了大大有别于人民的俄国革命者的典型人物①，他们相互之间完全彻底地互不了解：人民根本不理解革命者想要干什么，革命者同样与人民隔绝到如此程度，以致连想都没想到同人民的决裂（比如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终归还是想到了），相反，不只是径直地走向人民说些最奇异的话，而且还坚定不移并怡然自得地确信人民会理解这些奇异的话语。这笔糊涂账只有它自己才能了结，但这要等到我们这一轮奉欧洲为圭臬的时期走到终点，走到结束，而我们大家又完全回到我们祖国的根

① 这里指1876年12月6日在喀山大教堂广场参加游行示威的人们。

基上来的时候。

随着当朝改革的推进，自然而然也就积极地开始了对人民需求的研究与了解，这种研究和了解并非像以前那样封闭和抽象地进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进行。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崭新的、前所未闻的俄国知识阶层，他们理解人民和他们自己的根基。这一新的阶层越来越广泛和坚强地成长并坚定起来，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全部希望就都寄托在这批新人身上……

俄罗斯的讽刺作品。《处女地》。《最后的歌》。往日的回忆

(《作家日记》，1877 年，1 月号，第 2 章，Ⅳ)

这一个月我在从事有关文学方面的事，也就是说在读小说，读“文艺作品”，很着迷地读了一些东西。顺便提一下，不久前我读到一则外国有关俄国讽刺作品的评论，有关当代的、如今的俄国讽刺作品。这则评论是在法国发表的，它的一个结论是饶有兴趣的，——我不记得它原话是怎样说的，它的意思是：“俄国的讽刺作品有点害怕俄国社会中的高尚行为。如果碰到了这种高尚行为，它就感到不安，如果不在这种行为的某处夹缝中找到一个坏蛋，它就一直不放心。一旦找到了这个坏蛋，他立即就高兴起来，并大声叫嚷说：‘这根本就不是高尚的行为，完全没有必要为之高兴，你们自己看见的，这不是也有坏蛋吗？’”

这则评论公正吗？我不相信它会是公正的。我只知道我们的讽刺作品有卓越的代表人物，而且流行甚广。读者非常喜爱讽刺作品，然而我确信，起码这同样的读者群无可比拟地更喜爱正面的美，如饥似渴地企盼能看到它，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无疑是俄国各色读者最喜爱的一位作家。

我们的讽刺作品，尽管它光彩照人，却的确有含混不清的毛病——要讲它的话，倒是可以这样说的。就整体、就一般来说，有时的确不可能从整体上、一般地想象我们的讽刺作品：究竟我们的讽刺作品想要说些什么呢？好像我们的讽刺作品本身并没有任何根底，但这是可能的吗？它本身到底相信什么，

为了什么它才进行揭露——这好像都沉没在不可知的黑暗中，无论如何都无法得知它自身究竟认为什么才是好的。

于是你就得针对这一问题奇特地进行你的沉思。

我读过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并正在期待着它的第2部出版。顺便说一下，三十年来我都在写作，在这三十年中我头脑中多次而且经常出现一种引人好笑的现象。所有我们的评论家（而我留心观察文学的情况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去世的也好，如今健在的也罢，一句话，就我记忆所及的这全体评论家，无论过去或现在，只要稍微郑重一些撰写有关当前俄国文学的某种概述，一开头（比如说，过去往往在各种杂志上都有1月份刊登的年度文学概述之类文章），——总是或多或少，然而却都以一种极大的爱护之心，使用同样的一类语句："当今，在我们的文学处于如此这般低谷的时候"，"当今，在我们俄国文学正逢停滞不前之际"，"在我们的文学不景气之际"，"在俄国文学的荒原上漫游之际"，等等，等等。千腔百调，而意思却并无二致。事实上，在这四十年中出现了普希金最后的一些作品，果戈理的崭露头角和他的陨落，有了莱蒙托夫，出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以及起码还有十几位之多的才华卓越的小说家。而这还只是就小说一项而言！可以肯定地说，在别的文学中，几乎从来也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如同在我们这里这样，能出现如此多的有才华的作家，简直是一个挨着一个、毫无间隔地出现。与此同时，甚至在现在，几乎就在上一个月，我又读到论述俄罗斯文学停滞不前的文章和关于"俄罗斯文学一片荒芜"的议论[1]。不过这仅仅是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文章《关于俄国文学的交谈（评论书信）》。

我的饶有兴趣的观感，何况这事完全无足轻重，而且也毫无意义可言，只不过可以一笑置之罢了。

关于《处女地》，当然，我不会说什么的。大家都在等待第2部的出版，何况也不该我来说三道四。屠格涅夫创作的艺术优点毫无疑问可言，我只指出一点：小说的第92页（见《欧洲通报》）从上数十五行或者二十行，我认为，这几行仿佛浓缩了作品的全部思想，仿佛表现出了作者对自己所选定的事物的全部观点。很遗憾，小说作者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深深感到，我对此不以为然，我指的是小说作者就作品中的一个小人物索洛明所说的几句话[①]。

我读过了发表在《祖国纪事》第1期上涅克拉索夫的《最后的歌》[②]。如同通常涅克拉索夫的诗那样，这都是些热情洋溢的诗歌，都是些言犹未尽的话，然而又是一个病人的多么痛苦的呻吟！我们的诗人病得不轻，而且——他自己曾对我说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那几句话是这样的："索洛明不相信近期在俄国会发生革命；但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不去妨碍别人进行尝试，而在观察他们——不是站在远处观察，而是就近观察。他很了解彼得堡的革命者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同情他们——因为他本人也来自人民；但是他懂得这人民本身的不由自主的缺席，而没有人民的参与'你休想成就什么事业'，可是这又需要长时间做人民的准备工作——这种工作又不是可以这样来做，也不是他们这些人能做的。于是他只好袖手旁观——并非要做一个投机取巧者或者骑墙派，只想做一个好人，想着自己不去白白送死，也不去残害别人。而是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听听呢？——这样做难道没有教益可汲取？"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段话表现了屠格涅夫对革命的态度。事实上《处女地》的"全部思想"并非浓缩在这段话中，而是在作品的题词中。

② 这里指的是以下几首诗：《序诗》、《致播种者》、《断章》、《祈祷》、《致济娜》、《预言者（译自巴尔比埃）》、《日复一日……空气还是那样沉郁……》、《我很快就要成为腐朽的猎物》。

过——他很清楚自己的状况。可是我却不信……这是一副强壮而又极易受感染的机体。他非常痛苦（他患了某种肠溃疡，一个难以确诊的疾病）[①]，我不相信他坚持不到春天。一到春天他就可以去温泉，去国外，去另外一种气候的地方，尽快些去，他会康复的，对此我确信无疑。有时候人们的遭遇是很奇怪的，我们在生活中难得见面[②]，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些误会[③]，但是我们曾有过一次我们终生不能忘记的会面[④]。这正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会面。不久前我去探望涅克拉索夫，他这位受痛苦折磨的病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讲他还记得

---

① 涅克拉索夫死于直肠癌。

② 《现代人》杂志转手到涅克拉索夫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见面就很少了。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的《时代》与《时世》杂志同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的争论，进一步加深了思想上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少年》在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后，两位作家于1875年后又有些接触。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两次看望病危的涅克拉索夫。

③ 1846年，以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为首的《祖国纪事》杂志的部分老同仁公然示威性地离开该杂志，以便于次年参与涅克拉索夫和伊·伊·帕纳耶夫从彼·阿·普列特涅夫手中接过来的《现代人》杂志的出版事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与《祖国纪事》发行人阿·亚·克拉耶夫斯基决裂一事犹疑不决，这一情况首先引起涅克拉索夫的愤激，因为他竭力想把优秀的文学人才汇集在自己杂志的周围。有关这一摩擦，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给长兄的信中（见1846年11月26日的信）谈到过。他被流放回来后，因为他的小说《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几乎又同涅克拉索夫闹翻。涅克拉索夫只打算给这部小说为数不多的一笔稿费，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这是对他的侮辱，认为《现代人》杂志编辑“唯利是图”（见1859年1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兄长的信）。不过，他与《现代人》及涅克拉索夫等人此后的长期疏远，主要还是由于思想上的分歧。

④ 指下文谈及的1845年把《穷人》手稿送给涅克拉索夫看的那次会晤。

我们首次见面的那些时日的情况。那时（那可是三十年前！）发生的是一种如此焕发着青春气息、清新而美好的事，参与此事的人在心田里都永志不忘。我们二人当时还都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①。那时我住在彼得堡，从工程师的职务上退下来已有一年光景②，当时我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抱有最不明晰和毫不确切的目的。那是在1845年5月，这年的冬初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此前我从未写过任何东西。小说写完之后，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把它交给谁。在文学界，我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熟人，要说有，也只是德·瓦·格里戈罗维奇③一人，不过他也只写过一篇收在一本集子里的短文《彼得堡的流浪乐师》而已。他当时似乎正准备回到乡下自己的家里去度夏，暂时在涅克拉索夫那里住一段时间。他顺路来看我时说道："请把手稿带上。"（他自己也还没有读过它）④"涅克拉索夫想在下一年度出版的集子里使用它⑤，让我拿给他看看。"我把手稿带了去，可是会见涅克拉索夫只有片刻的时间而已，我们彼此伸出手相握。我因为想到自己是带着自己的作品来找他而感到不好意思，很快就告别而去，同涅克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10月30日，涅克拉索夫生于1821年11月22日，他们初次会面时（1845年5月底）还都不到二十四岁。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申请辞职是在1844年8月，同年8月底获准。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涅克拉索夫的第一次会见距他辞职的时候还不足一年。

③④ 据格里戈罗维奇回忆，《穷人》的手稿是先给他读过才交给涅克拉索夫的。在1844年秋他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住一个宿舍。按：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900），俄国作家，以其《苦命人安东》（1847）开始引起文学界的重视。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工程学校的老同学。

⑤ 这里说的是《彼得堡文集》（184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穷人》就刊登在这个集子中。

拉索夫几乎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能否获得成功我想得很少，而对于当时人们所说的这“《祖国纪事》一派人”我有点怕。别林斯基的文章若干年来我都入神地在读着，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位严厉而可怕的人，于是有时我就想：“他会嘲笑我的《穷人》的！”只是有时我又想，我是以满腔热情来写的，差不多是热泪盈眶撰写的——“难道所有这些情况，所有我手执羽毛笔创作这部中篇小说时内心感受的那些时刻，——全都是虚伪的谎言、幻景、不真实的情感?”不过，不言而喻，只是在片刻时间我才这样想，神经过敏立即就过去了。交出《穷人》手稿的同一天晚上，我到很远的地方拜访一位过去的朋友；我们整夜谈论《死魂灵》，并且一再读它，读了多少遍就记不清了。那时，这在青年中间是常有的事：两人或者三人聚在一起时，往往就是说：“先生们，读读果戈理的作品不好嘛！”——接着就都坐下来开始读，一读就是整整一夜。当时在青年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仿佛满怀着某种激情，仿佛在期待着什么似的。那天我回到家时已是次日凌晨四点钟，是在明亮如同白昼一样的彼得堡的白夜。这正是暖和的美好时光。走进自己的房间后，我没有卧床睡觉，而是打开窗户坐在那里。突然响起了令我极为吃惊的门铃声，接着就是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向我扑过来的拥抱，他俩欣喜若狂，差不多都要高兴得哭起来。原来我拿去手稿的当天晚上，他俩提前回到家里，拿起我的手稿开始试着往下读：“读上十几页就可以看出名堂的。”但是读完十页之后，他们决定再往下读十页，到后来，一个人读累了另一个人接着往下读，就这样轮流着两个人一直朗读了整宿。“他读到大学生的死，”后来格里戈罗维奇单独同我在一起时对我说道，“当他读到父亲跟在棺木后面奔跑的段落时，我突然看见，他，涅克拉索夫有一两次中断了朗读，接着忍不住突然用手掌

拍了一下手稿说道：‘哎呀，真有他的！’这说的是你，通宵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当他们两人读完了手稿时，（整整七个印张！）一致决定立即来找我：“管他什么睡觉不睡觉，我们把他唤醒，这比睡觉更重要！”后来，当我就近观察了涅克拉索夫的性格之后，我常常对涅克拉索夫此刻的表现感到惊奇：他的性格是内向的，差不多有些神经过敏，谨小慎微，不善交往。起码我总是这样看他的，因此我们那次见面的时刻是真正表现最深刻情感的时刻。那时他们在我那里大约只待了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里天知道我们谈到了多少东西，只说半句话就能相互理解，我们惊呼着，急不可耐地说着；我们谈论诗歌，谈论真理，议论“当时的时局”，不言而喻，还谈论果戈理，引述《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的话，但是，主要的，还谈论别林斯基。“今天我就把您的中篇小说拿去给他看，您就会发现，——要知道，他是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个人啊！你们会结识的，您会看到，那是多么好的一颗心灵啊！”——涅克拉索夫神情激昂地说道，还用他的双手抓住我的两肩摇晃。“嗯，现在您请睡觉吧，请睡吧，我们这就离去，而明天则请到我们那边去！”在他们来访之后我仿佛总是不能入睡！多么令人兴高采烈，怎样的一次成功啊！而主要的是——珍贵的情感，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要是别的人获得成功，那么人们会夸奖他，会去看他，祝贺他，可是这两人却是流着眼泪跑了来，在凌晨四点钟，要唤醒你，说是这比睡觉更重要……啊，多好呀！”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还睡什么觉！

同一天，涅克拉索夫就把我的手稿拿给别林斯基看。他非常崇敬别林斯基，好像终其一生，在所有的人中间他最爱的还是别林斯基。那时，涅克拉索夫还没有能够像他很快在一年之

后那样，写出规模宏大的作品①。就我所知，涅克拉索夫来到彼得堡时大约才只有十六岁，完全是孑然一身。他差不多也是从十六岁起就开始写作的②。他同别林斯基是怎样结识的，我不大清楚，但是别林斯基从一开始就看出了他，而且或许也强烈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情绪。尽管当时涅克拉索夫年纪很轻，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也很大，但是，大概他们之间已经经历了这样的时刻，就是已经交谈过如此这般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一直起着影响并且将二人牢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新的果戈理出现了!"涅克拉索夫拿着《穷人》的手稿一进别林斯基的门就叫喊起来。"你们那里的果戈理嘛，就如同蘑菇那样容易生长。"别林斯基严厉地指出说，不过还是接去了手稿。当涅克拉索夫傍晚再次去找别林斯基时，后者"简直是激动地"接待了他，并说："请带他来，请快点把他带来!"

于是（也就是说，现在已是第三天）就把我带到了别林斯基那里。我记得，第一眼看上去，别林斯基的面貌、鼻子、额头都让我感到惊讶。不知为什么，我原来设想他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的人——"他这个可怕的、令人生畏的批评家"。他非常庄重而有分寸地接待了我。"怎么着，本应如此，"我这样想，但是，好像还没有过片刻时间，一切的一切全换了一个

① 1846年至1847年初，涅克拉索夫发表了受到文学界高度评价的诗作，如《在旅途中》、《醉汉》、《令人高兴地看到，忧郁……》、《摇篮歌》、《园丁》、《当我用热情的规劝……》、《三套马车》、《犬猎》、《道学家》等。（上述诗歌译名根据魏荒弩译《涅克拉索夫文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② 涅克拉索夫到彼得堡的确切时间是1838年旧历的7月底。他发表的第一首诗是《思想》（载《祖国之子》，1838年，第5期）。然而，涅克拉索夫开始写诗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据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证实，由于写了讽刺自己同学和老师的诗，涅克拉索夫被中学开除（1837年秋）。

样。原来其庄重并非是作为一个人物、一个接待年方二十二岁刚开始写作的作家的伟大评论家的身份而表现的，而是，这么说吧，出于他对他想要向我尽快倾诉的那种情感的尊重，是对他非常急于要向我说的那些话语的尊重。他眼睛里冒着热情的火光开始说了起来："您自己是否明白，"他如同通常习惯于叫喊着的那样叫喊着对我重复说了几次，"您写出了怎样的作品呀！"当他带着强烈的情感说话时，他总是叫喊着。"作为一位艺术家，您仅仅是凭着直觉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可是您自己是否领悟到您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理？不可能在您二十来岁的年纪就已经能够理解这一点。是的，要知道您写的那个不幸的公务员——他干呀，干呀，把自己搞到了那种地步，甚至由于自己的低下卑微都不敢把自己看成是不幸的人，几乎把极小的一点点诉苦都认为是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作怪，甚至无权认为自己不幸。而当那个好人、他的那位将军赏给他一百卢布的时候，——他惊讶得全身像散了架，整个人都垮了，像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蒙'大人阁下'怜惜，而且像您表达的，不只是普通的大人，而是'大人阁下'！而您描述的那颗断了线的纽扣、亲吻将军的手的那一时刻，——要知道，这里已经不再是对这位可怜的小公务员的怜悯之情，而是惊心动魄的可怕，骇人听闻！在小公务员的这种感恩戴德之中是令人胆战心寒的东西！这是一出悲剧！您触及到了事物的本质，最主要的东西您一下子就指出来了。我们这些政论家们和批评家们只是发表议论，我们是用话语来解释这些，而您这位艺术家则只需一笔勾勒，一下子就用形象把最本质的东西展现出来，好让手也能够触摸到，好让最不善于判断的读者也开始突然明白就里！这正是艺术性的秘密所在，也正是艺术之中的真理！这就是艺术家为真理所做的奉献！真理已经向您昭示，向您这位艺

术家宣告，作为礼物让您得到它，您要珍惜您的才能，您要忠贞不渝，愿您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这就是他当时对我所讲的那些话。这就是他后来对一直到如今还健在并能为此作证的别的一些人讲到我的时候所说的话。我怀着一颗狂喜的心从他那里走出来，我停留在他住宅旁的一个角落里，仰望着天空，看着这朗朗乾坤，环顾来来往往的行人，我全身、我整个人都感觉到我的生活里庄严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发生了永世不返的转折，一种完全崭新的甚至在我最热烈的幻想中都不曾设想过那样的东西从此开始了。(而我当时却是一个极端的幻想家。)"难道我真的是如此伟大，"我以一种怯生生的欢欣之情，自惭形秽地思量着自我。啊，请大家不要见笑，后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伟大的，不过在那时，——难道能够经受得起这个吗?!"啊，我将不会辜负对我的这种赞扬，他们是些多么好的人，一些多么好的人！瞧，好人就在这里呀！我要做得无愧于他们，我要竭尽全力成为他们那样完美的人，我将保持'忠贞不渝'！啊，我是多么轻狂，如若别林斯基只要得知在我身上有多么糟糕和可耻的东西，则当如何！而人们总是说，这些文学家们很高傲，自尊心很强。可是这类人在俄国只有他们这几位，然而正是在他们这几位手里有真理，而真理、善良、真实总是会击败罪恶和邪恶而取得胜利的，我们一定会胜利！啊，要到他们那边去，要同他们在一起！"

我当时一直想着这些，我现在还非常清晰无误地记得当时那一刻的情景。那一时刻我日后也从未忘记过，在我的有生之年这是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时刻。当我欣喜若狂，回想着这一时刻时，我在精神上就坚强起来。直到如今，每当记起这一时刻我都感到无比欢欣鼓舞。在三十年过去之后，前不久，我又一

次记起了这一时刻，那是在卧病的涅克拉索夫的床边，忆及这一时刻时我仿佛又经历了那时的感受。我并未向涅克拉索夫详细提起当时的情况，我仅仅提及我们曾经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刻，于是我看出他本人也记得那些时刻。我原本就知道他会记得的。当我从苦役中返回时[1]，他曾拿给我看一本书中他写的一首诗。"当时这是在写您，"他对我说道。一生中我们各自生活一方。在他痛苦的病榻上，他现在回忆着过去的友人：

> 他们那先知的歌儿还没有唱完，
> 正当英年，便因仇恨和背叛而牺牲；
> 只有挂在墙上的遗像对我注望，
> 流露出它那不屑的责备神情。[2]

这里，十分沉重的是这个词：不屑的责备神情。我们是否保持住了"忠贞不渝"，保持住了吗？就让每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良知来决定吧。但是请你们大家自己去读这些痛苦的诗歌吧，让我们所钟爱的、热情洋溢的诗人复活吧！对痛苦热情洋溢的诗人！……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是在1859年底，这里提到的事是之后发生的。

② 译诗摘引自魏荒弩译《涅克拉索夫文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25～326页。

过命名日的人

(《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2章，V)

您是否还记得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和少年》？那里有一个小男孩儿，这部恢弘作品的主人公。但是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儿，他与别的一些孩子不一样，与他的兄长沃洛佳也不同。他只不过十二岁，但是与他的那些同龄人的大不相同的思想和情感已经蜂拥到他的头脑和心田里。他已全身心地沉湎于自己的种种幻想与情感之中，而且知道，这种种幻想和情感最好秘而不宣。妨碍他显露这些幻想和情感的是他的羞涩的童心和他超人一等的高傲。他羡慕他的兄长并认为他无可比拟地要比自己高出一头，特别是灵巧和容貌俊美方面是如此，与此同时，他又暗自预感到，他的兄长在各个方面要比自己低一头，不过他要排除这种想法，认为这种思想是卑劣的。他经常对着镜子看自己并认定自己面目丑陋难看，经常在头脑里闪现一些虚幻的想法，认为没有人喜爱他，人们都瞧不起他……一句话，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小男孩儿，与此同时，却又正是属于贵族圈子里中上层家庭中的那一类型的孩子。遵循普希金的遗教，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完完全全是这类家庭的诗人和历史家[1]。请看，在他们家中，在他们这一大家庭的莫斯科住宅

---

[1] 这里指的是作为《叶夫盖尼·奥涅金》和《大尉的女儿》的作者的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与普希金以至列夫·托尔斯泰相反，写贵族家庭的阴暗面，而不是光明的一面，是写农奴制改革后贵族家庭的没落和瓦解。此处下文谈的就是托尔斯泰自传性的《童年和少年》中的片段。

中，宾客汇聚一起来给妹妹过命名日；许多孩子也跟随大人们来到这里，来的也都是些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开始做游戏，开始跳舞。我们的这位主人公体态笨拙，跳舞跳得比别人都差劲，他想用说俏皮话胜人一筹，但又不成功，——而碰巧这里又聚集了那么多的俊俏的小女孩儿，于是——他那永远追随着他的想法，他那摆不脱的怀疑，又在告诉他说，他不如别人。在绝望之际他打算置一切于不顾而要让大家都感到惊骇。当着所有这些小女孩儿的面，当着那些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大孩子们的面，他突然失去理智，以一种不顾一切跳进脚下张开的无底深渊的情感，向他的男家庭教师伸出舌头，并使出全身的力气打了他一拳！“如今所有的人都该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显示了他自己！”他丢人现眼地被人拖了出去并被关进了小贮藏室。感到自己已经遭到灭顶之灾，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了，小男孩儿就开始幻想起来：等着瞧吧，他要从家里出走，他要去参军，在战斗中他要杀死很多很多的土耳其人并由于受伤而倒下。胜利啦！大家都欢呼起来，叫喊说，我们的救命恩人在哪里，于是都来亲吻他，拥抱他。瞧，他已经在莫斯科，他正走在特维里大街街心花园里，手臂上还缠着绷带，皇上接见他……突然又出现一种想法，小贮藏室的门就要被打开，男家庭教师手拿树条走进来抽打他，于是他的幻想也就随之像灰尘一样消散。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想法。他突然异想天开地找出了为什么“大家如此不喜爱”他的原因：大概他是一个弃儿，别人都知道这一点，只瞒着他一个人……纷乱的思想旋风般增长：他就要死亡，人们走进小贮藏室并且发现了他的尸体：“可怜的小男孩儿！”人们全都可怜他，“他是一个好男孩儿！这是您把他毁掉啦！”父亲对男家庭教师说道……想到这里，泪水让这个幻想家窒息得喘不上气来……这个不幸的故事以这

个小男孩儿大病一场、发烧、说胡话而告终。这是一幅非常惊人的、特别严肃认真的儿童心理素描。

我是特意非常详尽地提到这幅素描的。我收到基希涅夫的一封信[①]，信中向我描述了一个小男孩儿的死，这个小男孩儿也是十二岁，那么——那么很可能这里有某种相似之处。不过，我还是把信中的某些地方摘录下来，摘录的词句不加任何改变，情节是异乎寻常的。

> 11月8日，午饭后，一条消息在全城不胫而走，消息说的是，发生了一件*自杀事件*——*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一个初中生，自缢身亡。死者当天因答不出班主任所上的那门功课，被后者留在校内直到晚上五点钟。小学生在校内走来走去，从他碰到的一团麻绳中解下一条来系在钉子上，这钉子通常是用来悬挂所谓金榜或红榜的，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榜牌却被摘掉，于是小学生就在这枚钉子上自缢身亡。在邻近屋子里擦洗地板的校卫看到了不幸自缢的小学生，就跑去告知副校长；副校长跑来把自缢者从绳套中解下来，但是却未能让他活过来……自杀的原因何在？小男孩儿平常并未表现出暴躁和爱闹事，总的来说学习不错，只是近来在班主任的课上几次不及格，因此受到惩罚……据说，小男孩儿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他与小男孩儿本人都在当天过命名日。很可能，这个年幼的过命名日的人曾以一种孩子气的兴高采烈幻想着家人将怎样接待他——他的母亲、父亲、小妹妹、小弟弟们……可是，如今，一个人孤零零地，饿着肚子，却待在学校空无一人的屋子里，想着不得

① 指基希涅夫神学校视察员助理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尤尔克维奇的信。

不面对父亲可怕的愤怒，想着自己的屈辱、羞愧，或许还想着即将要忍受的惩罚。关于结束自己生命一事，他过去也是知道的。（可是，在我们当今时代，我们的孩子们中间又有谁不晓得此事呢。）非常为死者感到惋惜，非常为副校长感到惋惜，他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人和教育家，而且他也受到学生们的崇拜；很替学校感到可怕，它自己的院墙上竟然出现了如此的景象。在这里学习的别的一些孩子们和死者的同班同学们将有怎样的感受？与此同时，在预备班上还有一些非常幼小的学童，当他们得知发生的事情时，又将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这样的教学是否太严厉啦？是否看得太重了一些？——什么两分呀，一分呀，金榜和红榜呀，而在悬挂金榜和红榜的钉子上却吊死了学生？在我们的教育事业中形式主义和冷酷无情的东西是否太多了些？

当然，非常怜惜那个可怜的小小年纪的过命名日的小男孩儿，但是我不会就这一悲痛事件发生的可能原因大做文章，特别是就“两分呀，分数呀，过分严格要求呀”等等大写特写。所有这一切以前也都发生过，但是也都过去了，并没有引发自杀的事件，看来，原因不在这里。我之所以摘录托尔斯泰伯爵所写的《少年》中那一段插曲，是因为二者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差异。过命名日的米沙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并非由于怨恨，也不是仅仅因为害怕。这两种情感——既是怨恨，又是病态的懦弱——太普通啦，而且很快会自行得到发泄的。不过，害怕受到惩罚的确可能起影响作用，特别是在病态的神经过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情感终归可能更要复杂一些。说来说去，也很可能发生类似托尔斯泰伯爵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也就是说，受到压制的、尚未被意识到的儿童问题，某种令人苦恼的不公正的强烈感受，觉得自己卑微而产生

的早得不正常的痛苦的感受，病态地膨胀了的疑问："为什么大家都这样不喜爱我?"要他们所有的人都喜爱自己的热烈愿望，——以及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复杂的各色各样的情况。问题在于，这样或那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情况必定有过，但是——也还存在着某种新的现实生活的特征。这种现实，比起我们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充当中上层社会阶层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平静的、自古以来就固定形成的莫斯科地主家庭中的那种现实来，完全是另一种现实。似乎正是在这个时刻，以过去的地主为基础建立的先前的贵族制度面临着某种新的，尚且不知其就里的，却又具有根本性质的转折，起码是向着崭新的和未来的几乎不为人知的形式，进行巨大而脱胎换骨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个过命名日的小男孩儿来说，就有了完全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托尔斯泰伯爵所描述的那个小男孩儿还可以幻想，他可以在心里流淌着软弱无力的怜悯的病态眼泪去幻想，他们将走进他被关的贮藏室，会发现他已经死去，并开始爱他，怜惜他，都开始怪罪起他们自己来。他甚至还可以幻想着自杀，但仅仅限于幻想：历史形成的贵族家庭的严格制度会在一个十二岁孩子的身上得到反应，因此不会让孩子的幻想变成事实。可是现在这里的事情就不同了——幻想过了，于是幻想也就实现了。不过，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并非只是要说当今这种自杀的流行瘟疫。有一种感觉就是，情况有点不正常，俄罗斯生活结构中的极大一部分根本尚未受到应有的观察，尚未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记述。起码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我们的小说家们非常鲜明地描述了的我们中上层的贵族生活已经是俄罗斯生活中最小和最与世隔绝的角落。谁将是其余那些似乎是非常非常众多角落的历史学家呢？如果社会生活早已尤其是现在正处于混沌之中，而一个艺术家，即使具有

莎士比亚那样恢弘的才能，也许也不能在这片混沌中寻找出正常的规律和起主导作用的线索，那么，起码也要有人即使不去幻想找出主导线索，也该哪怕是部分地阐明这种混乱吧？主要的问题是，仿佛所有的人还根本顾不上这些，仿佛这事对于最伟大的艺术家们来说为时尚早。我们这里无可争辩地有正在解体的生活和因之也正在解体的家庭。然而，必须有正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生活。谁去注意到这些，而谁又会将它们指出来？谁又能哪怕略微确定和表达这种解体的和新的建构的法则呢？或者说是为时尚早呢？但是，陈旧的、过时的一切全都已经交代清楚了吗？

继续在豌豆街制作月亮的冒牌先知和瘸腿箍桶匠。最默默无闻的俄罗斯伟人之一

(《作家日记》，1877 年，2 月号，第 1 章，Ⅰ)

东方问题也如同以前一样摆在所有人的面前。尽管我们竭力想把它忘记，尽管我们随手使用一切办法，——诸如过谢肉节呀，读《处女地》呀，经受破产、倒闭呀，搞什么红桃杰克[①] 呀，——来让自己排忧解闷；尽管我们厚颜无耻地让所有的人都相信，而在别人之前首先让自己相信，“什么事都根本没有发生，全都是空想出来的和捏造出来的”；尽管我们如同小孩子们一样把头埋在枕头里，以便躲避可怕的幽灵；——可是，幽灵终归仍然就在我们的面前，并没有跑开，仍然站在那里并正在威胁我们，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逞凶发狠的无耻之徒，哪怕他是一位正直的公民，或者是无忧无虑的游手好闲之辈，或者是一个懒汉——任何一个人都感觉到并且记得，这是某种事，——这是某种全然没有解决和尚未了结的事，与此同时还是拖延不得和必须解决的事，这是某种必定会召唤我们和要求我们迟早有个收场的事，这里必定——

总得做点什么才对，

---

① 主要由莫斯科的贵族青年结成的纵酒作乐的犯罪团伙，他们称自己的团伙为“红桃杰克”。该团伙犯下了大量罪行，1876—1877 年受到侦察审判。

总该设法予以结束。

如果无论什么事总需要去做，或者无论用什么办法总需要将事情了结，那么去做、去了结就是最最起码的事。但如果能把事情了结得更好一些岂不是最好不过吗？与此同时，时间却在不停地消逝，户外已经是春天的季节——春天将带给我们什么呢？有些人叫喊说，已经时过境迁；这只有上帝知道。对于好事来说，时间总是有的。那么，哪怕在春季能搞出点什么名堂，能最终表明点什么，也就是说，哪怕有个一年的打算？要知道，现在在欧洲没有人有比一年更长的打算，何况土耳其本身未必能够坚持一年。但是问题还不在于土耳其，而在于土耳其之后还将留下什么。一年取得最终的解决或许对欧洲有利，而对于别人则不十分有利；那么，别人，特别是多瑙河那边的别人，又将如何呢？但是，只有俄罗斯人民才考虑到他们。

不错，是在考虑着，随便您怎么想，尽管我们整整一个冬天一直都在否认我们夏季的运动，可是我看这个运动仍然如同在夏季一样持续了一个冬天，在全俄罗斯，坚定不移地，但是已经平静地怀着希望等待沙皇陛下的决策。尽管有我们那些善于观察（就是在这个夏季）的预言家们，他们在俄罗斯国土上，从芬兰湾冰冷的岩石岸到火热的科尔希达，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双手抱着大酒瓶睡不醒、十分讨厌的醉汉而已。[①] 然而，

---

① 此处暗指屠格涅夫的《处女地》（1876）第 2 部第 30 章中涅日丹诺夫的诗《睡眠》。在转述这首诗结尾几行（其中写到用手紧捏酒瓶的长眠的俄罗斯）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引入了普希金《致诽谤俄罗斯的人们》（1831）诗中的诗句“从芬兰湾冰冷的岩石岸到火热的科尔希达”（科尔希达是格鲁吉亚西部的希腊名称——译者），大概是怀疑屠格涅夫曲解了这首爱国主义颂歌。

这个运动当然还将继续进行到底。我以为，如果我们的这些预言家们看不见俄罗斯依靠什么得以生存，那么这甚至更好：他们将不会进行干预，也将不会起妨碍作用，即使要进行干预——那也不会正中要害，只是隔靴搔痒罢了。由此可见，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的欧洲主义以及我们受欧洲“文明熏陶的”对俄罗斯的观点——这依然是那同样的外来的戈罗霍瓦亚瘸腿箍桶匠所制作的那同样的一个月亮，他先前也曾经做过，而且也做得非常糟，每时每刻都证明这一点；最近几天他又证明：今后还要做得更坏，——嗯，就让他做下去吧，一个德国人，还是一个瘸腿的人，应该对他有同情之心①。

不过，诸如此类的预言家们与俄罗斯有什么相干？如今我们一点也不着急，往日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了。

报纸上提到，这个冬天，从斯拉夫人的土地上运送到莫斯科的不止一批可怜的幼童。他们的家受到战争破坏，他们就成了十足的孤儿。他们分别被安置在不同的人家和机构。这件事好就好在全俄国范围内极大规模地予以组织和不间断地进行安排。有什么好说呢，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善行；这些孩子们应该受到爱护，他们是些未来的斯拉夫人呢。顺便说一下，我曾不止一次地问我自己：这些从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黑塞哥维亚人以及其他人们中间为躲避自己的折磨者而逃出的饥饿的几万张口是怎样被喂饱的，他们是经历了屠杀和被掠夺一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继续揭露俄国西欧派欧洲主义的“站不住脚”，将西欧派的理想比作果戈理《狂人日记》中主人公的胡话：“要知道，月亮通常是在汉堡被做成的，而且做得十分粗糙……一个瘸腿的箍桶匠在做它，显然，这个傻瓜不懂得月亮应该怎么做。”标题中的“豌豆街”见《狂人日记》中“三十月八十六日，昼与夜之间”。

空之后才四散逃往塞尔维亚、黑山、奥地利以及随便什么地方去的。试想，要填饱这些人的肚皮需要多少钱，而且也知道，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全都没有这么多的钱，何况他们自己本身也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糊口。真不理解，这几万口人是用什么东西填他们自己和他们那些小孩子的肚皮，而在冬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小孩子又是穿什么东西的。听说不久前又运送到莫斯科“大批孩子”，三岁到十三岁，这些孩子都由波克罗夫斯基女护士协会收养起来了。有人讲述说，波克罗夫斯基的女护士们把这些塞尔维亚小女孩儿同先前运送来的保加利亚小女孩儿们安置在一起，并由一位会说塞尔维亚语的女护士管理，因此孩子们都很高兴和快活。当然，孩子们生活得很好，很温暖，不过不久前我从我的一位从莫斯科回来的朋友那里听到一则有关这些小孩子们的笑话：塞尔维亚的小女孩儿们待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而保加利亚的小女孩儿们则待在另一个角落里，她们既不想一起玩耍，也不想相互交谈，当人们问塞尔维亚的小女孩儿，为什么她们不想同保加利亚的小女孩儿一起玩耍时，她们回答说：“我们把枪给了她们，要她们同我们一起去打土耳其人，可是她们却把枪藏了起来，也不去打土耳其人。”我觉得这事很不平常。如果八九岁的小女孩儿用这样的语言讲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之间存在着毫无疑问的和可怕的不和睦，因为小女孩儿们的话是从父辈们口里听来并学会的。啊，斯拉夫人之间永世的不和睦！斯拉夫人之间的这种不和睦在他们的传说中有过记载，而且还保存在他们的歌曲中，如果没有一个能起团结作用的巨大的核心——俄罗斯——就不可能有斯拉夫人的团结一致，没有俄罗斯，斯拉夫人就不会保存下去，斯拉夫人就得从地球上完全消失，——不管在那边塞尔维亚的知识界人士如何空想，或者那边各种受欧

洲文明熏陶的捷克又是如何……他们之中还有很多人都是空想家，而且几乎仍然是些空想家……

你们是否还记得普希金在《西斯拉夫人之歌》中的《在大泽尼察河边的战斗》？其中描述了起义者们随拉季沃伊前去同土耳其人作战。

> 达尔马齐亚[①] 人羡慕我们的士兵，
> 也把他们长长的胡须卷起来，
> 把帽子歪斜地戴在头上，
> 然后说："请带领我们前去作战……"
> …………
> 波斯尼亚的头目带领自己的人马
> 从首府班尼亚卢卡出兵来讨伐；
> 大泽尼察河上刚一传来马嘶，
> 他们的弯刀在阳光下刚一闪现，
> 那些叛变的达尔马齐亚人
> 就落荒而逃，你东我西！[②]

顺便说一下，我曾提问说"你们是否还记得普希金的《西斯拉夫人之歌》"等等，我在这里提前代替大家回答，没有人会记得《在大泽尼察河边的战斗》，甚至连普希金的《西斯拉夫人之歌》本身也不会记得。嗯，除非是一些专家，某些语文教师，要不就是那些老得不能再老的上了岁数的人才记得。就

---

① 今南斯拉夫濒临亚得里亚海地区。

② 译文据《普希金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89～390 页。

算我出丑，说错话，不过我对我说的这一点仍然坚信不疑。与此同时，先生们，你们是否知道，《西斯拉夫人之歌》是普希金杰作中的杰作，是他众多杰作中的一部杰作，且不说早在五十年前就已出现的这些诗歌的富于预见性的和政治性的意义①。当时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些歌曲这一事实是很重要的，这是俄罗斯人对斯拉夫人的预感，这是俄罗斯人对斯拉夫人有关未来的博爱和统一的预言。我从来也没有读到过任何一篇评论文章说《西斯拉夫人之歌》是普希金的杰作。人们都认为它算不了什么，可是与此同时，它却正是杰作，正是具有极大意义的杰作。我觉得，我们尚未开始去认识普希金。这是一位天才，这是一位走在俄罗斯意识之前很长很长时间的天才，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一个用自己天才的力量转变成为俄罗斯人的人，可是我们现在还正在向瘸腿的箍桶匠学习。这是一流的俄罗斯人之一，他早已完全感觉到了自身是俄罗斯人，早已在自己身上唤出了自己这个俄罗斯人并表现了他应该如何看待事物——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民，如何看待俄罗斯家庭，如何看待欧洲，如何看待瘸腿的箍桶匠，如何看待斯拉夫的兄弟们。堪与之相比的、更人道更高尚和更清醒的眼光在我们俄罗斯人中间现在没有人具有，过去也没有过。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在这里铺开来谈，关于《西斯拉夫人之歌》我只是说一说，众所周知，它是普希金译自梅里美的一本集子“La Gouzla”②，原文为法语，是由梅里美撰写的。据作者自己承认，这是他没有走

① 此处说得不确切。五十年前出现的不是《西斯拉夫人之歌》，而是梅里美的《居士拉》。《西斯拉夫人之歌》中除少数几首外，都是普希金根据梅里美的《居士拉》不拘泥于原文而译出的。

② 法文：《居士拉》。

出巴黎而随意写成的。这位最有才华的法国作家，后来成为sénateur[①]，差不多还是拿破仑三世的亲戚。这位早已去世的人在这册“La Gouzla”中冒充斯拉夫人予以描述的当然只是法国人，而且还只是巴黎的法国人；此外他们就不会别的什么了。对于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来说，除巴黎之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普希金读了这册集子之后，就往巴黎写信咨询作者，接着根据此书撰写了自己的诗歌，也就是说，把梅里美所描述的法国人恢复成斯拉夫人，而且——当然，现在的《西斯拉夫人之歌》，是真正的斯拉夫人的，甚至是与俄罗斯人同族的斯拉夫人的。当然，这些歌曲在塞尔维亚是没有的，塞尔维亚人唱的是另外的一些歌曲，但是这也没有什么。普希金的诗歌——是全体斯拉夫人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是从斯拉夫人的心田里倾吐而出的，富于斯拉夫人的精神和形象，符合斯拉夫人的思想、习俗和他们的历史。我不妨给那些文化程度很高的塞尔维亚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今年夏天看待俄罗斯人持一种很不信任的态度）看普希金《西斯拉夫人之歌》中的《黑心乔治之歌》，或者那首《在大泽尼察河边的战斗》。这两曲歌是整部《西斯拉夫人之歌》中的杰作，是普希金诗作中颗粒头等大的钻石。（因此它们必定不仅不为我们学校中的学生所知，而且，大约也不为我们学校中的老师所知，这些老师们如今第一次惊奇地听说，这些歌曲是杰作，而既不是《高加索的俘虏》，也不是《茨冈》。）与此同时，哪怕去年能够在我们的学校中把这些歌子推行开来也好。可是，根据事情的进程来判断，塞尔维亚人未必就能很快地认识这位所有伟大的俄罗斯人士中最不知名的人——我想，可以这样来认定我们伟大的普

① 法文：参议员。

希金，关于我们的普希金到现在为止我们知识界中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并不知道他是如此气魄恢弘的伟大诗人和一个俄罗斯人，对他，我们迄今为止还未能募集到足够的钱建立纪念碑，——这一特点将写进我们的历史中。而塞尔维亚人，当他们读过《西斯拉夫人之歌》之后，当然就会发现，我们是怎样想着他们能获得自由的，我们尊重或者不尊重他们的自由，我们为他们的自由高兴或者不高兴，而且我们是否想要把他们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和剥夺他们的自由。不过，关于诗歌说得够多了。让人们不必高傲地讥笑我："瞧他尽说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并非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关于普希金我们还需要长谈，还需要说很多话。

泛论剥皮，其中也谈种种偏差。在思想卑躬屈膝情况下的憎恶权威

（《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1章，Ⅲ）

“从人们的身上剥皮？从什么人的身上？只是从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的身上，而且还是在那里的一个什么角落里，从土耳其的一个非伊斯兰教徒身上，如果不是俄国人在叫嚷，恐怕没有人会听到什么。然而，机体的其余大部分都活着，健在，安享幸福，进行着贸易，开工厂生产！”

这件有关一个保加利亚小女孩儿晕厥的事①，是人们在早晨告诉我的，而在那一天我偶然走过涅瓦大街。在涅瓦大街上，三点多钟，母亲和保姆们在领着孩子们散步。于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思想突然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文明！我想到，“谁竟然敢说反对文明？不会的，文明不管怎么说，是有它的价值的。起码，我们这些在涅瓦大街上乐融融地散步的孩子们不会看见人们将从他们父亲的身上剥掉皮；他们的母亲们也不会看见，人们怎样把她们的孩子抛到空中然后用刺刀去挑，而这些都在保加利亚发生过。起码，我们的这一成果将给文明保留下来！那么，就让它仅仅发生在欧洲吧，也就是说，让它仅仅发生在地球的一个角落里，发生在比起星球表面来说相当小的角落里。（可怕的思想！）但是，不管怎样说，终归有这种事，这

① 上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土耳其人当着孩子们的面剥掉他们亲生父亲身上的皮，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儿回想起这件事就常常晕厥过去。

种事存在着，尽管是在角落里，但它存在着，即使付出的是昂贵的代价，付出的是揭我们亲兄弟身上的皮的代价，是在某处边远地区，然而，至少这种事是存在的。只要想一想，这种事在先前，即便在不久之前还未曾铁证如山地出现过，甚至在欧洲也未曾有过，那么现在在欧洲出现了这种事，要知道这可是地球存在以来首次发生这种事。这一切都木已成舟，反悔或许是永远无望的了，——这种设想是特别重要的，它不由自主地要往心里去，这全然不是什么小事，是什么不值得予以关注的小事，何况，世界——世界照旧是一个谜团，尽管有文明以及文明的成果，但世界依然是个不解的谜。只有上帝才知道世界还孕育着什么，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事，甚至会在不远的未来发生什么事。”

那么，只有我曾想暗自欢欣鼓舞地叫喊一声：“文明万岁！”——可是突然又怀疑起一切：“那么这种事甚至也会殃及这些在涅瓦大街上散步的孩子们吗？这是否是幻景，够啦，甚至会在这里，要视若无睹吗？”

先生们，你们知道，我说到了幻景，或者不如再说得和缓一点，说到了几乎是幻景的东西，如果不是在这里，在这涅瓦大街上当着孩子们的面剥他们父亲的皮，那么，这么说吧，那么只不过“由于并非观众所能左右的局势”而偶然发生的。嗯，还有就是，不言而喻，还因为警察都站在那里。啊，我赶忙附带说明一下：我根本不是在这里暗喻什么，不是暗示我们这个世纪中某个无产者遭受的磨难，也不是暗指某位家长，他对自己七岁的儿子说：“听着，我对你的约言就是：你偷了五个卢布——我诅咒你，你要是偷了十万卢布——我祝福你。”啊，我对我说的每个字都明白无误。我明白无误地知道真真实实的剥皮的事，就是夏季在保加利亚发生的事，并且是获胜的

土耳其人似乎非常喜爱干的事。于是，关于这种揭人皮的事我不妨肯定地说，如果在涅瓦大街上，就没有这种事。那么，“由于并非我们所能左右的局势，偶然”如此呢？主要是因为暂时还明令禁止这样做。或许，虽然我们有我们的全部文明，但事情总不会就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如果说到底的话，人们害怕的只不过还是某种习俗，某种奉为信仰的规矩，差不多是成为成见的东西。但是，只要一旦有“权威人士”中的某一个人出来稍微“加以点拨”，说什么，有时从别人身上揭皮下来甚至对共同事业来说还是有益的，即使它是令人厌恶的，那么毕竟“目的决定采用的手段”，——如果说某人曾经在权威性的场合并用权威性的语言说出了他的这种想法，那么请相信，立刻就会出现执行者，而且还是最为快活的执行者。啊，就算，就算这是我的一种极其可笑的谬论。对于此种定义我首先举双手表示赞同，与此同时，我要让你们相信，这种事也丝毫不差地曾经有过。文明是存在的，也存在着它的规则，对这些规则的信念甚至也是存在的，不过——一旦有新的时尚出现，那么立刻就会有很多人也随之而摇身一变。自然，不是所有的人跟着时尚改变，然而剩下来的只会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以至于我同你们这些读者甚至会感到惊异，甚至还不晓得我们该站在哪一边：是与被揭皮的人一伙，还是同揭人皮者为伍？不言而喻，人们会当着我的面对我叫喊说，这是胡说八道，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尚，至少文明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先生们，你们是多么轻信呀！你们在笑？嗯，1793 年在法国（近的不去说）剥人皮的这种时尚不是就盛行一时①，而且还装出一副文明的最神圣原

① 指法国大革命中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镇压反革命等“恐怖统治”。

则的模样？而这种事竟然发生在出现了卢梭和伏尔泰等人之后！你们会说，这一切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且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请注意，我之所以求助于历史，或许仅仅是因为不谈当前的事。请相信，人们在思想上和心灵上的十足的偏差总是难免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偏差在我们身上不仅是难免的，而且随着事物的发展简直是不可避免的。请看，表示同意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的人多吗？这还不是指对某种“真理”表态，而只是对首先碰到的问题而已。我们这里发生的转变和蓦然回首的事又何其迅速啊！莫斯科的红桃杰克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这只不过是忍受不了农奴制改革的俄罗斯贵族中的那部分人。就算他们本人并不是地主，但是他们是地主的子女。在农奴制改革后，他们弹一弹领带就吹起口哨来了。这里的原因也不只是农奴制改革的一件事，还有就是他们简直忍受不了“新思想”。他们说什么：“如果说，曾经教导我们的一切全都是些成见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遵循它们呢？既然空无所有，就是说，可以干一切的事，——这才是好主意！”请注意——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广为流传的思想。十成中有九成追求新思想的人宣扬这种思想，换句话说，我们十成中有九成先进分子对新思想除此之外不会有别样的理解。比如说，在我们这里达尔文立即就变成掏别人口袋的小偷，——瞧，红桃杰克就是这样的货色。啊，当然，人类多少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文明中非常多的仁爱的规矩，而其中有些至今还被奉为颠扑不破的规矩。不过我只是想要说，尽管有这些规矩、原则、宗教、文明等等，而在人类中依赖它们得救的也总只是最不引人注意的少数一伙人，——不错，总是取得胜利的这样一小伙人。不过这也只是最终的结果，可是在当前的重要时刻，在历史的现行进程中，人们依旧仿佛总是这样一些人，也就是说，他们之中绝大

多数没有丝毫即便是略微稳定的有关义务感、有关荣誉感等等的概念，一旦出现稍稍有点新潮意味的东西，那么他们就立即赤裸裸地追随其后，甚至还很乐意于这样做。规矩是存在的，可是人们还根本没有修养到遵守规矩的程度。人们会对我说：用不着有什么修养，只需要找到这些规矩就行！是这样的吗？不管规矩如何好，如果那么想赤裸裸地追着新潮跑，规矩又能够保持多久呢？

依我看，只有一条：领悟和体验可以正确无误，也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要成为一个人就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精雕细琢使之成为一个人。这里需要纪律。如今我们某些当代思想家们所摒弃的正是这种永无止境的严于律己的纪律，说什么“专制主义已经太多了，需要自由”，可是这种自由只是将绝大多数的人引向对外来思想的奴颜婢膝的崇拜，因为人们非常喜欢享用现成的东西。更有甚者，思想家们宣扬一些普遍的法则，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这些规矩，所有的人无须任何雕琢立刻就会变成幸福的人。如果这种理想是可能的，那么对于那些尚未雕琢成为人的人们来说就不存在任何的规矩，甚至最显而易见的规矩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纪律中和不间断的自我约束的修养中才得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公民。应该从这种豁达的自我修养开始，以便在日后开发我们的“处女地”，否则没有必要去开发它①。

是这样的吗？但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主要之点恰恰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丧失了一切嗅觉，

① 此处作者就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在同屠格涅夫争论。按：此处的“处女地”在原文中第一字为大写，语意双关，实际上就是直接指《处女地》一书。

所有过去的权威都被打倒了，于是树立起新的。但是对于新的权威，我们之中聪明一点的人并不信服，而精神上勇敢一点的人则从一个公民变成了红桃杰克。这还不算，真的就要开始从人的背上往下揭人皮，同时还要宣称，这对于共同事业是有益的，因此，也就是神圣的。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的话，那么，如何并在何种意义上来进行严于律己的修养呢？

梅特涅之流和堂吉诃德之类的人物

(《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1章，Ⅳ)

为了不发空泛的议论，让我们就紧扣本题来谈。我们的确不揭人皮，不仅如此，我们甚至不喜爱这种事。(只有上帝才知道，喜爱此事者常常藏而不露，喜爱此事者在一定的时间感到丢人，"害怕成见"。)但是，如果我们并不喜爱剥皮一事，并且在自己这里从来也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应该憎恶在别人那里这样做。光是憎恶还不够，我们还应当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就是坚决不让这样做。然而，事实上是这样的吗？我们之中最义愤填膺的人们根本就不是像应该做的那样义愤填膺，我谈的不只是斯拉夫人。如果我们非常同情，那么就应当按照同情的程度予以表示，而不是只拿出十卢布这么一个数目作为捐献了事。人们会对我说，不可能倾我们的所有捐献呀。虽然我不知为什么，但我同意这种说法。为什么不会是全部的呢？问题在于，因为你自己对你的天性甚至根本就无所了解，而这里却特具权威性地冒出一个有关"文明的利益"的问题！

问题提得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合乎科学而且还厚颜无耻地坦率。"文明的利益"——这是生产，这是财富，为资本所需的安定。为了用可怕的增加无产者的方式减低价格，需要进行巨大的、不间断的和累进递增的生产。在偿付无产者工资时，以最低价付给他生活必需品。在欧洲越安定，要付的价格就越低。由此看来，在欧洲正是需要安定，战争的喧嚣会赶跑生产的。资本是一种胆怯的东西，它害怕战争，它要躲藏起来。如果限制土耳其人从非伊斯兰教徒的背上往下揭皮的权力，就得

开始战争行动，而一旦开始战争——俄国就会向前推进，——这就意味着可能使战争趋于非常复杂化的程度，以致战争遍及全世界；那时，就没有生产了，无产者都走上大街。无产者走上大街是危险的事。在议会的演说中已经在大声疾呼，向全世界直接而公开地谈论无产者的危险性和无产者的不稳定，谈到无产者信服社会主义。“最好还是就让他们在某个偏僻地方剥他们的人皮吧。土耳其人这种权利的不可触犯性是不可动摇的。应该扑灭东方问题而允许剥下人皮。那人皮又算得了什么呢？二、三张人皮能够抵得上全欧洲的安定吗？哪怕是二万，哪怕是五万张人皮——不全都无关紧要吗?只要把耳朵塞起来，只要我们想这样做,我就根本不会听到说什么……”

这就是欧洲的意见（或许，也就是决定）；瞧吧——文明的利益，可是——它们终归是要受诅咒的！而且更加可诅咒的是思想的偏差（主要是俄国人思想的偏差），这是无可怀疑的。直接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更合算一些——让千百万之众的工人走上大街合算，还是让几百万人中的某些人遭受土耳其人的折磨更合算？摆出了数字，用数字来吓人。除此之外，政治家们出来讲话，聪慧的教师们也大放厥词，说什么有这样那样的规则，有这样那样的学说，有这样那样的公理，这种公理说，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个体的道义是一回事，而整个国家的道义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不妨说，对于某个个体，对于某个个人来说——是卑鄙行为，而相对于国家整体来说或许就是一种最大的聪明表现！

这种学说流传甚广而且也很久远。然而，就让这种学说也受到诅咒吧！主要的是，别用数字来吓唬我们。欧洲愿意怎样就随它去吧，让我们与它不同吧。宁愿相信暴虐行为是换取不来幸福的，也不要明知实施了暴行却又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俄

罗斯从来也不能产生真正属于自己的梅特涅之流和堂吉诃德之类人物；相反，在自己的欧洲生活的全部时间内它都不是为了自己而生存，而是为别人，就是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生存。在二百年间，的确有些场合它或许也曾经模仿过欧洲，并且也曾产生过自己的梅特涅之类的人物，不过归根结底总是表明俄国式的梅特涅竟会突然之间变成堂吉诃德，并以此使欧洲感到震惊。不言而喻，对堂吉诃德则大肆讥笑；然而现在似乎时限已到[①]，堂吉诃德已经不再干使人发笑的事，他开始进行恫吓。问题是，他无疑已经好好考虑过了自己在欧洲的处境，于是就不再前去同风车作战了[②]。但他仍然还是一个忠贞的骑士，而这对他们来说则是比什么都可怕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在欧洲，人们都在叫喊什么“俄国人的侵占，俄国人的阴谋”，但是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恫吓自己的群众；一旦他们需要就这样做，而这些叫嚷者们本人则根本不相信有这等事，而且也从未相信过。现在使他们感到不自在和害怕的倒是俄罗斯这一形象所具有的真诚、过分的无私正直、对侵占和掠夺的鄙弃。他们预感到，不可能用任何政治好处来吸引它去做自私的或者暴力的事。除非是使用欺骗的办法——堂吉诃德虽然是一位伟大的骑士，但他有时也非常非常机灵，因此也不让别人欺骗自

---

① 这里指的是俄罗斯在决定欧洲命运上的未来的伟大使命。作者在这里将基督回答使徒们的话加以改述：“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1章，第6～7节)。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处提到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故事情节是为了特别说明俄国和土耳其战争之前俄国人民动机的纯正与高尚。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那些堂吉诃德与之拼杀的不是虚构的敌人，而是真实存在的凶恶“巨人”，也就是土耳其。

己。英国、法国、奥地利——它们之中，有哪一个民族不可以在适宜时机为了政治利益，出于强制性的自私自利的目的而与之联合一致呢？——只是不要错过被收买的民族出卖自己可以索取最高价钱的时机。只有一个俄国无论用什么都不能诱使它缔结不公正的同盟，用什么价码都办不到。因为俄罗斯是非常强大的，它的机体明显地在增长着和强壮着，而且这不仅仅是与日俱增，而且是与时俱增，这在欧洲，人们是看得很清楚的，并且也是非常明白的（尽管他们有时不免要喊叫什么巨人身残体病），——他们怎么能不提心吊胆呢？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俄国对外政策之不为贿买所动摇的这一观点，以及它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利益的观点都是为历史所证实的，这是极应该注意的。同全欧洲相比较，这就是我们的特点所在。且不说对俄国的特点的这种观点还鲜为人知，在我们这里也未必有很多人会相信它。不言而喻，在这里不应该历数俄国在政策方面的错误，因为现在说的只是我们政策的精神和道义性质，并不涉及它在不久前和老早以前的成败。在老早以前，在远古年代的确有过风车这类事，然而，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大战风车的时代已永远成为过去了。

严肃地说，用歪曲真理和揭人皮的代价得到的那种安逸生活是什么呢？对于一个个人来说是真理，那么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它就依然是真理。当然，可能暂时很不合算，暂时会贫困、丧失市场、减少生产、物价上涨。然而能让民族的机体因此在道义上仍然保持健康，那么一个民族无疑会因之获益更多，甚至在物质方面也是这样。让我指出一点，欧洲已经无可争辩地走到了这种地步，即它最珍惜当前的利益，最重视眼下的好处，甚至不管这利益要付出何种代价，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只生活在目前的时刻，连他们自己都不晓得明天他们会是什么样；

至于我们俄罗斯，我们还一直在相信颠扑不破的东西，我们这里正在创建的东西。因此，我们寻求的是经久存在的和实质性的利益。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政治的机体永远相信永恒的道义，而不相信只存在若干时日的暂时性道义。请相信，堂吉诃德也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也善于指望得到它：他知道他将赢得自己的尊严和这种尊严的意识，条件是如果他一如既往保持其骑士身份不变；除此之外，他还确信，在这条道路上他不会丧失真诚地追求善和真理的努力，他深信这种意识会使他在未来的舞台上更为坚强。不仅如此，最后，他确信，这样一种政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最好的学校。应该让红桃杰克不再敢看着我的眼睛说："要知道，在您那里一切也都是有条件的，在您那里一切也都要考虑利益。"应该让热血青年爱自己的民族，不要在社会之外和在社会边缘上去寻求真理和理想。一旦他经历过我们这一沉重的、非常艰难的学校的时间磨炼，他就会最终热爱自己这一民族。真理如同太阳一样，谁也藏不住它，俄国的使命最终对于我们这里的以及欧洲的那些头脑最偏颇的人们也都会一清二楚的。为什么我们这里才智卓越之士现在比别的任何地方会发生如此大的偏颇呢?因为一个半世纪的长时间以来,我们整个知识界所做的事只是疏远俄罗斯,最终则以与它不再相识而告终,同它打交道只依靠办公处所。新的时代以本朝的改革① 而开始。改革之事既已起步，停顿是不可能的了。

而欧洲读过了俄国皇帝秋季发出的告谕②并且记住了它，

---

① 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2月实行的农民改革。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指的是，就1876年塞尔维亚和土耳其战争沙俄政府发布的一项命令。命令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当指帕·尼·伊格纳季耶夫，当时他任大臣委员会主席。——译者）向土耳其帝国当局宣布，如果土耳其帝国政府不在两（转下页）

并非为了眼前这一时刻记住了它，而是长远地、为未来的日常时刻记住了它。如果需要，为了受压迫的和不幸的人们，我们将拔刀相助，即便是有损于我们眼前的利益，我们也将置之不顾。与此同时，让我们愈益坚定地相信，这就是俄国的真正使命，它的力量和真理就在于此，为了被压迫的和在欧洲被所有的人们遗弃的受害者，为了文明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就是为文明的道道地地和真真实实的利益的毫不虚假的服务。

在政治机体中也应当认可那同样的真理，即基督的真理，如同每一个信徒所应该信奉的那样。无论是在什么地方，这一真理都应当保存下来，无论在哪一个民族中都应该闪现光芒。否则又将如何？一切将沉沦于黑暗之中，混沌一团并且将陷于厚颜无耻的深渊。否则连个别公民的道德情操也保持不住，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整个机体将如何能有生机？需要有权威，为了照耀，太阳必不可少。东方已经露出了太阳，为了全人类新的日子从东方开始。当太阳当空十分耀眼夺目的时候，人们就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的利益”。不然的话，就会竖起上面写着“Aprés nous le déluge”（“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1]的旗帜！难道如此光辉的“文明”将把欧洲人引向这种口号，从而就此了结吗？可是正在走向这种结局。

（接上页）天的期限内接受六周或两个月休战的要求，如果不立即下令停止其军事行动，那么伊格纳季耶夫则将率领驻土使馆全体人员撤离，并随之中断两国外交关系。几天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莫斯科贵族和社会人士时说，土耳其已经接受了他的立即休战的要求。

① 据说这一说法来源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

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2章，Ⅰ）

或许我的读者们已经注意到，在一年多的时间刊出我的《作家日记》的过程中，我竭力尽可能少谈论当前俄国文学方面的情况，即使有时斗胆就此题目说上几句话，那么也只是大唱一番赞歌而已。可是，与此同时，在我的这种自愿约束中有着怎样的一种不真实呀！我是一个作家，我还在撰写着《作家日记》，或许，我比任何人都关心这一整年在文学方面涌现出了什么新的东西，如何可以掩饰得住最强烈的印象呢？有人说：“你自己是一位文学家、一位小说家，因此，你的有关小说作品的任何议论，除了无条件的夸奖之外，会被认为是偏颇的，除非是你只限于议论早已过去的文学方面的事。”——瞧，这就是阻碍我进行评论当前文学现象的一种考虑。

不过，这一次我却要冒险打破这一考虑。说实在的，在纯粹有关小说和评论的意义上，我将不说什么话，除非是在必要的场合下，“有由头”而发。现在由头有啦。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月之前我意外地发现了一部非常严肃的和在当前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以致我甚至惊异地读完了它，因为多时以来未曾读到过篇幅如此巨大的小说。这位作家——最高层次上的一位艺术家，而主要是一位小说家。在这里，我读到了三四页真正的“热点问题”，读到了我们俄国当前政治和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切，这一切仿佛都聚集于一点。主要的是，带有我们当前这种时刻最具代表性的特色，这正是此刻在我们这里提出的问题，提出而仍未解决的问题……我说的是列夫·托尔斯泰

伯爵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若干页，它们刊登在《俄国导报》的1月号上。

关于这部小说本身我将只说不多的几句话，而且也只是用最必须讲的开场白的形式来说一说。如同我们大家一样，我开始读这部小说还是许久以前的事。起先我是很喜欢它的；随后，尽管有些细节继续引人入胜，使我不能释手，但是就其整体来说已经感到不如开始时那样喜欢它了。我总感到我仿佛早已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原来正是在这位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和少年》中以及也是他的《战争与和平》中读到过了，不过在这些作品中甚至有更清新一些的东西。同样还是在一个俄国家庭中发生在一个老爷身上的故事，当然情节是不同的。那些人物，比如弗龙斯基（小说[①]的主人公之一），相互之间谈论的都是关于马匹的事，除了谈论马之外，甚至再也找不到有什么好谈的。当然，令人感兴趣的是，了解他们这种典型人物，都是一个脸谱，都局限于同一个阶层。举例来说，如同我的一位友人曾经称呼的那样，那匹“穿制服的公马”[②]的爱情本来好像只能用讥讽的口吻来描述。但是当作者开始用严肃的而不是讥讽的口吻将我带进他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时，我觉得这甚至很枯燥乏味。但是突然之间我的成见被击得粉碎，出现了女主人公垂死的一幕（随后她又恢复了健康），于是我明白了作者要达到的目的的实质性部分。在他们这卑微而寡廉鲜耻的生活的最中心环节显现出了一种伟大而永恒的生命的真理，瞬间照亮了一切。这些卑微的、渺小的和虚伪的人突然变成了真诚而

① 指《安娜·卡列尼娜》。

② 此处提到的友人可能是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他称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主人公为“默不作声的公狗弗龙斯基”。

实在的人，值得冠以人这个称号的人，这仅仅得力于自然规律的力量、人的死亡规律的力量。他们的全部外壳都消除干净，只露出了他们的真诚。末等人成长为上等人，而上等人（弗龙斯基）突然之间却成了末等人，丧失了全部光环而变得卑微[①]；可是，变得卑微后，却变得无比得好，变得高尚而真诚，远比曾经充当上等人和高贵人物时更好、更高尚、更真诚。憎恶和谎言开始讲出宽恕和爱的语言，取代迟钝的社交界概念而出现的只是仁爱。他们宽恕了一切并相互获得谅解，所属阶层的局限性和特异性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变得没有什么意义，这些纸面上的人物开始变得像实实在在的人！有过错的人不复存在，全都无条件地责怪自己并以此立即证实自己是无辜的。读者感到存在着生命的真理，它是最现实和最必然的，对它应该予以相信，我们的全部生活以及我们所有的焦急不安，只不过是最卑微和最可耻的东西，同样还有我们常常尊之为最崇高的那些东西，——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往往只不过是最渺小的空幻不实的世俗杂务而已，在生命的真理出现的时刻，这一切甚至会毫无反抗地衰落并消亡。主要的是这样一种提示，即生命的真理出现的时刻事实上是存在的，尽管它充分显示自己的全部光芒的情况很罕见，而在别样的生活中它甚至永远不会出现。诗人为我们找到了并且指出了这一时刻及其全部真实性，诗人向我们证明这一真理事实上是存在的，并非只是

① 指在垂危的安娜·卡列尼娜病榻旁，两个主人公（卡列宁和弗龙斯基）在道德情操方面转变（小说第4部，第17章）的意义，原文出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9章，第30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3章，第30节）：“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一种信念，并非仅仅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和有目共睹的。仿佛诗人在开始写这部长诗时想要证明给我们看的正是这一点。有关这一永恒的真理的事太应该给俄国的读者提个醒了，因为我们中间很多人开始将它遗忘了。作者用他的这一提醒做了一件好事，且不说他是作为一个具有非凡品位的艺术家来完成这件事的。

接着小说又拖拖沓沓，使我不无惊讶的是，在小说的第6部我却遇到符合真正“焦点问题”的一幕。主要的是，这一幕的出现不是有意安排，也不是出于倾向性，而正是出自小说艺术本身的实质需要。然而，我不妨再重复说一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因此我多少有点惊愕：我终归没有料到会碰到这样的“焦点问题”。不晓得为什么我没有想到作者竟会有意让自己的主人公们发展成为这样的“社会栋梁”。不错，在这些社会栋梁的身上，在这一推断的极端性上，正是小说现实性的全部意义所在，否则小说就会有一副甚至会是模糊不清的面目，既远不符合俄罗斯的当前的利益，也不符合它实质性的利益，那时小说就只会成为对生活中某个角落的描述，而置这种生活中最主要和最搅扰人心的事于不顾。不过，我现在似乎在放任自己下决心从事评论了，而这却不是我应做的事，我只不过想指出一个场景而已。突出了两个人物，从他们现在最能向我们表现自己的特点的方面展现他们，作家把这两个人物所属的那类人物的典型安置在我们认为最有趣的（从他们的当代社会意义上说）位置上。

这两个人物都是贵族，世袭的贵族和祖祖辈辈的地主，这两个人物是当做农奴制改革后的人物来写的。这两个人物都曾经是“农奴主地主”，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农奴制改革之后，从贵族意义上说，这些贵族们还剩下些什么呢？因为这两

个地主的这种典型非常普遍而广泛。于是这一问题部分地也被作者解决了。这两个人物中的一位是斯季瓦·奥布隆斯基，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享乐至上主义者，莫斯科的居民和英国俱乐部的成员。通常人们是把这种人看做是天真的和可爱的、只知享乐的人，不妨碍别人的、令人感到愉快的自私自利者，过着自己心满意足生活的机敏的人。这类人物通常都有一大家子人：他们对待妻子和儿女都很亲切，但是却很少为他们着想。这类人物非常喜爱轻佻的女子，当然是体面的那一类。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然而却喜欢优雅的东西，喜欢艺术，而且还喜欢谈论一切问题。对于农奴制改革，这位贵族立即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算计和思索过，他知道终归还会有什么东西留给他，因此改弦易辙没有必要，而且——Après moi le déluge(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关于妻子和儿女们的命运他则犯不着去操心考虑。依靠家产的残余和多方面的关系，他避免了红桃杰克的命运；但是如若他的家产荡尽而又不可能白白领取薪俸，那么他就可能成为一名杰克。不言而喻，那也是在他绞尽脑汁之后，有时甚至是竭尽其机敏的能事之后，以便尽可能成为上流社会中最体面的一名杰克。当然，在旧时为了偿付赌债或者为了支付情妇的花销，他有时也把他的人送去当兵；不过这样的回忆从来也没有让他感到难堪，何况他压根儿就记不起来了。尽管他是一个贵族，但是他对他的贵族出身从来就不当一回事，而废除了农奴制之后——连贵族身份也没有了。对于他来说，他已经由人物变成了一个幸运儿，随后是拥有一官半职的官吏，随后又是一个财主。当经营铁路的人和银行家成了强有力的人时，他就立即同他们拉关系讲交情。列文是他的亲戚，而且也是一个地主（不过，完全是一个相反的典型人物，他居住在自己的庄园里)，他同斯季瓦·奥布隆斯基的谈话是以

对后者的责备开始的，责备他同搞铁路的人们来往，参加他们的午餐聚会和节庆活动，拜访模棱两可的人物，列文确信这些人物是有害的。奥布隆斯基则用挖苦的话予以反驳。一般来说，自从他们成为亲戚以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和谐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好人进行反驳的坏人总是胜人一筹，因为他具有一种在合理思想中获得的体面外表，而好人则有点像理想主义者，而且具有一个丑角的外貌。他们之间的谈话是在一个夏夜，当他们出去狩猎时进行的。猎人们在一处农家的柴捆干燥棚里过夜，他们就睡在柴草上。奥布隆斯基证明说，蔑视经营铁路的人，蔑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蔑视他们暴发致富、企求租让、倒买倒卖等等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搞铁路的人也如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是用他们的劳动和智慧行事的，而其结果嘛——他们建成了铁路。

“不过，凡是和付出的劳动不相称的收获都是不光彩的。”

“可是这种相称与不相称由谁来确定呢?”奥布隆斯基继续说道。“你并没有界定什么是诚实的劳动和什么是不诚实的劳动。那么，虽然我的科长比我更熟悉业务，可是我的薪俸却比他的薪俸高，——这就不诚实了吗?”

“我不知道。”

“哎，那么我告诉你吧。假如说你经营农业靠劳动获得了五千多卢布，而我们这位农夫无论如何卖力劳动，获得的顶多也超不过五十卢布，这就如同我比我的科长拿得多一样，同样是不诚实的……”

…………

“不，听我说，”列文继续往下说道，“你说，不公平的是，我获得五千卢布，而那个农夫才得到五十卢布，这是事实。这是不公

平的，这一点我也感觉到了，不过……”

“是的，你感觉到了，但是你不会将你的庄园送给他，”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道，仿佛有意要刺痛列文似的……

“我是不会给他的，因为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即使我想这样做，那么我也不可能送给……而且无人可送。”

“就送给这个农夫好啦，他不会拒绝的。”

“可是我如何给他呢?去同他进城办一份房地产的过户契约吗?”

“我不晓得，不过如果你确信你无权……”

“我根本就不是确信。恰恰相反，我感到我无权将它送人，因为我对土地和对家庭负有义务。”

“不，你听我说。既然你认为这是极端不公正的，那么你为什么又还这样做呢?……”

“我是在这样做，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我尽量不拉大我与他们之间存在着的地位的差距。”

“不，请原谅我，这是奇谈怪论。”

…………

“我的朋友，是这样的。应当是二者之中取其一：要么得承认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公正的，那么就坚持你的权利；要么你就自认你享有不公正的特权，如同我现在正在做的一样，并很乐意于享有这些特权。”

“不，如果竟然会是不公正的，你就不能乐意于享有这些利益，起码我不能这样，主要的是，我应该觉得我没有错。”①

① 引文摘自《安娜·卡列尼娜》，第6部，第11章。

“热点问题”

(《作家日记》, 1877年, 2月号, 第2章, Ⅱ)

这就是列文和斯季瓦·奥布隆斯基的谈话。你们得同意, 这是一个“热点问题”, 甚至还是我们“热点问题”中的最热门的话题, 而且包含着多少纯粹俄罗斯的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啊! 首先, 大约四十年前, 所有这些思想在欧洲刚刚兴起, 那时未必有很多人知道圣西门和傅立叶——这些思想的首创的“理想”诠释者。而在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晓得那时西欧这种新兴运动的人, 全俄国也只不过才五十人左右而已[①]。可是, 去打猎的地主们在农家的干草棚里过夜时, 如今也在议论这些“问题”, 而且是以最具代表性和最内行的方式进行议论。因此, 这一问题的负面起码已经被他们解决并由他们最终签字画押。说实在的, 这都是些上层社会的地主, 他们都在英国俱乐部里说长道短。他们读报纸, 他们从报纸上和从别的渠道追踪着种种诉讼程序; 何况这已经是一种存在的事实, 即这样一种最富理想主义的胡话在远非教授和专家一类人中, 而只是些上流社会的奥布隆斯基和列文之类人物中被认为是最迫切的话题, 这是一个特点。我不妨说, 这是俄罗斯当前思想状况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之一。作家-艺术家在上述谈话中指出的第二个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 有关这些新思想的公正性的问题是由这样一种人来解决的, 这种人为了那些无产者、穷苦人的幸福, 自己是不会掏一文钱的。相反, 一有机会还要像剥光椴树

---

① 这里指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皮一样将他们掠夺一空。但是他以一种轻快的心情和一个好说双关语俏皮话者的欢乐感来签署人类历史的崩溃，并且宣称现行的制度荒谬绝伦，说什么："我对此完全赞同。"请注意，正是这些斯季瓦们总是首先表示赞成所有这一切的。他一笔就勾销了全部基督教的制度、个人和家庭，——啊，这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可言。同时还请注意，我们这里缺乏科学，然而这些先生们，不知羞耻地意识到他们不掌握科学，而且他们也只不过昨天才人云亦云地谈论起这个问题，可是今天却毫不迟疑地解决起如此规模重大的种种问题来了。还有第三个最具代表性的特点。这位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应当二者取其一：要么得承认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公正的，那么你就坚持你的权利；要么你就自认你享有不公正的特权，如同我现在正在做的一样，并很乐意于享有这些特权。"也就是说，他实质上谴责了整个俄罗斯，同样也包括他的家庭和他的子女们的未来在内，并且在判决书上签字之后，直言不讳地说，这同他毫不相干，说什么："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恶棍，但是我乐意于继续做我的恶棍。'Après moi le déluge'（我死后管它什么洪水滔天）。"他之所以还如此这般平静，就因为他还有家产，如果一旦他丧失了家产，那么，为什么他就不会成为杰克呢？——这可是一条笔直的捷径啊。这么说吧，这位公民，这位有家室的人，这位俄国人——又是怎样的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纯粹俄罗斯特点呢！你们会说，他毕竟是个例外。这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例外呢？请想想，近二十年来我们曾看到过多少厚颜无耻的事，看到过多么轻易改头换面的事，看到过何种缺乏坚定信念的事，看到过非常迅速地接受新奇事物，当然，接受也只是为了过一天后就将它用两文钱卖掉。没有任何道德情操的根基，有的只是 Après moi le déluge。

但是，最有趣的是，同这种类型的人物一起还有人数最多的、占据主宰地位的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俄国贵族和地主的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与前者是相对立的，——完全都是对立的。这就是列文，但是列文这类人在俄国多得不可胜数，差不多与奥布隆斯基之类的人一样多。我不是说他的面貌，不是说他的身材，不是说艺术家在小说中为他塑造的形象，我说的是他本质的一种特点，然而这一特点却是最根本的东西，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特点在我们这里惊人地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这种普遍性表现在我们的恬不知耻上以及加尔梅克人[①] 式的处理事务的态度中。这一特点从某一时期开始无时不在显露；具有这一特点的人们焦急不安地，几乎是病态地竭力想获得对自己的问题的解答，他们坚定不移地企盼问题的解决，热烈地相信问题的解决，尽管差不多还都不善于去解决任何问题。这一特点就完完全全表现在列文对斯季瓦的回答中："不，如果竟然会是不公正的，你就不能乐意于享有这些利益，起码我不能这样，主要的是，我应该觉得我没有错。"

事实上，在他不能解决他是否有错之前，他是不能安心的。他有错还是没有错？你们是否知道，他不安到了什么程度吗？如果需要的话，只要有此必要，他会走到底的，只要他能向自己证明这是必要的，他会与斯季瓦相反，后者说："尽管是一个恶棍，可是我乐意于继续做我的恶棍！"——而他则会变成"弗拉斯"[②]，变成涅克拉索夫笔下的"弗拉斯"。这个弗拉斯在强烈的激动和恐惧之下散尽了自己的家产。

---

① 俄国境内的蒙古族居民。

② 涅克拉索夫《弗拉斯》（1855）一诗中的主人公。这是俄国诗歌中最早揭露乡下富农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之一。他干尽坏事，但一场重病后，散尽家产，发誓要化募修建一座教堂。

于是他动身到处去募化，
决心要把神的殿堂建成。[①]

如果列文不会为建造神的殿堂而去募化，那么他也会去做如此规模的某种事，并且也会以同样的热忱去做。请注意，我再一次重复，而且急于重复说，请注意这一特点：这是众多的、非常众多的当代的一伙新人，这是一伙具有新的根基的俄罗斯人，他们需要真理，需要不带附加虚伪条件的纯粹真理，他们为了获得这种真理会义无反顾地付出一切。这种人近二十年来也已经出现了，而且如今出现得越来越多，尽管先前，长期以来，甚至在彼得大帝之前就能预感到他们了。这是正在来临的、未来的、正直的人们的俄罗斯，这些正直的人们需要的仅仅是真理。啊，他们非常没有耐性：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排斥任何的条件，甚至也不接受任何的解释。但是我只想竭尽全力声明一点，推动他们这样做的是一种真挚的感情。最具代表性的特点还在于，他们迄今都尚未协调一致，暂时还都分别归属于各种各样的类别和信念：他们之中既有贵族也有无产者，既有神职人员也有不信教者，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学者也有不学无术的人，既有老年人也有小女孩儿，既有斯拉夫主义者又有西欧派。他们在信念方面的分歧无比之大，但是他们对正直和真理的追求却是牢不可破和坚不可摧的，为了真理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会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和献出自己所有的财产，我要说，他们会变成弗拉斯那样的人。对此，人们会叫嚷

① 译诗。引自魏荒弩译的《涅克拉索夫文集》，第 1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

道，这是荒谬至极的幻想，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的正直可言，也毫无寻求正直可谈。可我却正要宣布说，有的；我看见而且也感觉到，与骄奢淫逸并存的还有这些未来的人，俄罗斯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不可能看不见这些人；艺术家在对比已经衰亡了的无耻之徒斯季瓦与自己的新型人物列文，仿佛也就是在拿那个不可救药的、荒淫腐败的、人数非常众多的、但已经自行判决而结束了自己生命的俄国社会同具有崭新真理的社会进行对比，这个具有崭新真理的社会在自己心目中无法承受自己有过错这种念头，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从自己的心灵上洗刷掉自己的过错。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社会的确似乎只能区分为这两类，——这两类社会极其广泛，而且包括全部俄国生活，——不言而喻，这里得除掉那群十分懒惰、平庸和冷漠的人。但是，作者为我们指出的“焦点问题”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富于俄罗斯色彩的特点就在于他的新型的人、他的列文，不善于解决困惑他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已经在自己的心里以不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困惑自己的问题，怀疑自己有过错，但是自己天性中某种坚定的、直率的和现实的东西却出来牵制着他，使他暂时还不能做出最后的判决。斯季瓦则与之相反，他是否有过错对他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他毫不迟疑地就能解决好，这事对他来说甚至得心应手：“既然所有的一切都是荒谬的，神圣的东西根本不存在，那么，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做，我还有的是时间，要知道，最后的审判还不会马上到来。”有趣的是，正是问题的最薄弱的一面使列文感到困惑不解并将他置于绝境，然而这纯粹是俄罗斯式的并且是作者完全正确地予以指出的：问题是，在我们俄罗斯所有这些思想以及问题——仅仅不过是理论而已，它们都是从别人的制度中搬来的，都是从别人的事物秩序中、从欧洲拿来的，而在别人那

里，这些东西早已有它们自己历史的和实践的方面。怎么办？我们的这两位贵族都是欧洲派人士，要摆脱欧洲权威的影响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应该按欧洲方式行事。于是这个列文，俄罗斯的心，将纯粹俄罗斯式的唯一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欧洲式的对问题的提法混为一谈。他将基督教解决问题的方式同历史的"方法"混淆起来。为了明晰起见，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幅情景画：列文站在那里，他站着，打猎时与斯季瓦夜谈之后，沉思得好苦，作为有一颗正直的心的人，他愿意解决早先就已使他感到困惑因此目前又困惑着他的问题。

"是的，"他想道，似解决又非解决地说道，"是的，如果认真说，如同韦斯洛夫斯基前不久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吃呀，喝呀，打猎呀，而别的事什么也不做，可是穷苦人却永远、永远在劳动'？不错，斯季瓦是对的，我应当把自己的家产分给穷人们并去给他们做工。"

"穷人"就站在列文的跟前，开口说道："对啦，你应当而且有义务把自己的家产送给我们这些穷苦的人们，并来给我们做工。"

不言而喻，可以说，如果从崇高的意义上解决问题，列文完全是对的，而"穷苦人"则完全是不对的。问题提出的全部差别就在于此，因为道德情操方式的解决不应该同历史方式的解决混为一谈；否则就是毫无出路的混乱，这种混乱的情况如今还继续存在，特别是在俄罗斯的理论头脑中是如此，而且在诸如斯季瓦之类的坏蛋头脑中以及在心灵纯洁的列文之类的人们的头脑也莫不如此。在欧洲，生活和实践已经提出了问题，尽管在其结局的理想方面是荒诞的，但在其现行的进程中却仍然是现实的，而且至少，尽可能不把两种类别不同的观点混为一谈，即不再混淆道德情操方面的和历史方面的问题。让我们哪怕用两三句话再把我们的意思加以解释。

欧洲的热点问题

（《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2章，Ⅲ）

在欧洲有过封建主义，也存在过骑士。但是在一千余年间资本主义强大起来了，并终于在各地打响了战斗，它击败并赶走了骑士，最终是自己取而代之。俗语得到了实现："Ote-toi de là que je m'y mette"（滚开，让位给我）。但是在占据了自己先前的老爷的位子并掌握了私有财产之后，资产阶级却完全置人民、置无产者于不顾，而且并不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为了自己的福利，为了一口面包，却把他们变成了劳动力。我们俄罗斯的斯季瓦还自认自己是不对的，然而有意识地愿意充当下流坯，因为他脑满肠肥地生活着；然而国外的斯季瓦之类的人却与我们的斯季瓦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自己是完全对的。当然，他在这方面是合乎他的逻辑的，他认为，这里根本就无法可依，而有的只是历史，有的只是事物的历史进程。他占据了骑士的位置，因为他是靠武力取胜，因此他也非常明白，在他同骑士争斗时那些还是微不足道和软弱无力的无产者很可能会强大起来，而且目前甚至已经日见其强大。他很清楚地预感到，一旦无产者完全强大起来时，就会将他推下台，就如同不久前他将骑士赶走一样，无产者也会对他说一模一样的话："滚开，让位给我。"这里有什么理由，这里只是历史而已。啊，他原本想妥协，好歹同敌人调整好关系，甚至他也做过尝试。但是，由于他非常清楚地料到，何况根据经验也知道，仇敌无论如何也没有和解的愿望，他想要得到的是所有的一切，而并不想同别人分享；除此之外，如果他有什么让步的话，那

就只能削弱他自己，——于是他决定不做任何让步，并且准备战斗。或许，他的境况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不过根据人类天性的本质在战斗前要鼓足精神，——他不会感到无望的，相反，在战斗中越来越强，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只要还有一丝力量，就不惜竭尽全力；他要削弱仇敌，而且目前也只能这么做。

这就是如今欧洲事情的症结所在。不错，先前，还是不久之前，也曾经有过以道德情操方式提出问题，曾经有过傅立叶主义者和卡贝主义者[①]，曾经发生过争论，发生过有关各种精微的事物的争吵和辩论，但是现在无产者的领袖们把所有这一切都排除了。他们想直截了当地开战，他们组织军队，他们把军队集结成联军，组建钱财出纳机构，他们对自己取得胜利确信无疑："胜利之后，一切都会在实践中水到渠成，尽管很可能是在血流成河之后。"资产阶级明白，这些领袖人物简直是在诱引无产者去进行抢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值得提出事情的道德情操的一面。不过，甚至在当今这些领袖之中也常会遇到一些宣扬穷人的道德情操权利的头面人物。高层领袖们之所以能容忍这些头面人物只不过为了装饰门面，为了粉饰他们要干的事，给它涂上一种崇高的正义的外表。在这些有"道德情操"的头面人物之中有很多人是阴谋家，但也有不少是热忱的信徒。他们直截了当地宣布他们不想为自己谋取私利，仅仅是为了人类而工作，他们谋求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建立事物的新体制。但是这时资产者却在相当坚实的根基上迎候着他们，并且心直口快地警告他们说，他们是想要强迫他成为无产者的兄弟，从而同无产者分享他的财产——用棍棒和鲜血来施行。

① 卡贝（1788—1856），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1847 年曾在美国试验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结果失败。

尽管这看起来与真实情况相似得很。但是那些头面人物却回答说，他们根本不认为他们这些资产者能成为人民的兄弟，因此只能用武力对付他们这些资产者，从兄弟情谊中将他们排除出去：“兄弟情谊嘛，当在以后由无产者们形成，而你们这些资产者——你们有上亿的人是注定要被砍头的，仅此而已[①]。你们已经到了尽头，这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头面人物中的另外一些人则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兄弟情谊之类的东西，基督教是异想天开，未来的人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动摇资产者和使他信服。资产者懂得并且反驳说，那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纯属荒诞无稽，无产者头面人物们心目中的人根本就不是人的天性所规定的那种人，而是另外一种；人是难以而且也是不可能放弃绝对的私有权利的，是不能放弃家庭和自由的；他们对未来自己人，对个人，要求做过多的牺牲；要造就这样的人只能用可怕的暴力和最专制的政权，对其实施可怕的暗中侦察以及不间断的管制。最后，头面人物们提出能够把未来的人团结成一个和谐的而并非强制的社会的力量。对此，头面人物们展示出自己意识到利益之所在和这样做的必要性，以至于他自己为了使自己免于毁灭和死亡而同意自愿做出要求于他的所有让步。人们反驳这些头面人物说，光靠利益和自我保护永远也不能够产生完全的和协调一致的团结，任何一种利益也取代不了自由意志和个性的权利，这种力量和动机太软弱无力，因此这一切也都照旧是难以置信的。如果他们只靠事情的道德情操方面来行

① 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群魔》中的人物利普京的话相呼应，说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在欧洲建立健全的理性，要求一亿以上颗头颅。

事，那么无产者就不会听从他们，而如果现在能够追随他们并且组织起来进行战斗，那也仅仅因为受到允许抢夺的诱惑，因为受到进行破坏和参加战斗的前景的激励。因此，最终必须把问题的道德情操方面完全排除在外，因为它经受不住很轻微的批驳，而只应该准备去投入战斗。

这就是欧洲方式对问题的提法。然而，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都是极其错误的，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都会在自己的罪恶中毁灭[①]。让我们重复说，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最感沉痛的是，我们的列文之类的人甚至也正在为这同样的问题而冥思苦想，他们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俄罗斯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不仅仅是对俄国人，而且也是对全人类来说，——存在着道德情操的，也就是说，基督教对问题的提法。在欧洲这种对问题的提法是不可思议的，尽管那里在血流成河之后和砍掉上亿颗头颅之后人们应该会承认这种对问题的提法，因为只有在对问题的这个唯一的提法中才有出路。

---

① 见《旧约全书·民数记》（第16章，第26节）：“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起消灭。”

解决问题的俄罗斯方式

（《作家日记》，1877 年，2 月号，第 2 章，Ⅳ）

如果你们觉得“吃、喝、无所事事和出去打猎”[1] 对于你们是很难受的，如果你们的确感到了这一点并且你们的确非常可怜那些“穷苦的人”，而穷苦的人又很多，那么就请你们把你们的家产捐献出来给他们，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捐献给公益事业并且同时去为所有的人做工，并“在天上得到财宝，在那里，人们既不积累，也不占有”[2]。如同弗拉斯一样，你们就去行动吧，而弗拉斯

心灵全部的伟大力量
都用在上帝的事业上。[3]

如果你们不愿意如同弗拉斯一样去为建造一座神的殿堂而化募，那么你们就为教化这位穷苦人而操劳吧，让他见到光明，教他读书识字。假如所有的人竟会像你们一样把自己的家产都统统分给“穷苦人们”，那么这全世界所有富人的钱财分给所有的人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因而应当更多地关注给予光明，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和加强爱心。那样财富就将在实际上增长起来，而且这也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它并不表现在金衣锦服

---

①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 6 部，第 11 章，但文字有出入。

② 《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 10 章，第 21 节）：“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③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弗拉斯》。

上，而是表现在团结一致的欢乐中和每一个人的坚信不疑的希望中，即在遭遇不幸时他和他的孩子们都会得到共同的救助①。请不要说你们也只不过是软弱的个别人，如果你们个人散尽财产并前去服务，那么这样做也是无济于事的，不会对事态有所改正。相反，如果仅仅有几个如同你们这样的人去做，那么事情也就会有进展。实质上倒也无须一定散尽家产，——因为在这里，在爱心这种事情上，任何的一定要求都将如同一件制服、一个小标题、字面上的意义一样。已经履行了这字面上的要求这种信念，只会导致骄傲自满，导致形式上的照办和懒惰。只应该做心灵向往的事，心要你奉献出家产——那么就奉献，心要你去为别人做工——那么就去做工，但是这里也不要如同一些幻想家那样去做，他们简直就是抓起独轮小车就去推，说什么："我不是老爷，我想要如同农夫一样去干活。"独轮小车也就终归又变成了制服。

相反，如果您觉得您当一位学者将有益于大家，那么不妨就去上大学，并且为此给自己留下资产。不是说必须散尽家财，不是说必须穿农夫的粗呢上衣，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字面上的意义和形式而已；必须的和重要的只是为了积极而有效的爱心，您要做这一切的决心，只是做您可能做的一切，只是做您自己真心认为自己能够做的一切。所有那些"平民化"的努力——只不过是一种乔装打扮，它甚至是对人民的一种不恭，同时也是有辱于您自己的②。要想做到平民化，您太"复杂"，何况您受的教育也不允许您成为一个普通农夫。您将比农夫更

---

① 此处的观点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哲理思想非常近似。

② 此处暗示屠格涅夫在小说《处女地》中所描述的"到民间去"的民粹派的活动。

好地上升到您的“复杂性”的高度。但愿您能够只是真诚和朴实无华；这要比“平民化”强得多。更不必自己恐吓自己，说什么“孤掌难鸣”[①] 之类的话。谁要是真诚地想要获得真理，那么他就是非常强大的。也不要效法那些爱说空话的人，为了让别人听他们说话，这些人总说个不停：“什么事都不允许做，捆绑我们的手脚，尽往我们的心里灌输失望和绝望！”等等。这都是些说漂亮话的家伙，扮演着懒汉的蹩脚作品中的主人公。谁要是愿意做有益的事，那么即使被捆绑着手脚也能做出数之不尽的好事。真正干实事的人一上路就立即会看到自己面前有多少事要做，就不会诉苦说不允许他做事，就必定会找到并能够很好地做点什么事。所有真正干实事的人全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这里研究俄罗斯这一件事就需要花多少时日，因为在我们这里只有极少极少的人了解我们的俄罗斯。抱怨说失望是非常愚蠢的[②]：看着正在升高的大厦而引发的喜悦应该能缓解任何一种心灵的渴望，尽管您只不过暂时为这大厦贡献了一粒沙土。对您只有一种奖赏——爱心，如果您无愧于获得它。假定说，您不需要奖赏，但是要知道您做的是爱心的事，因此您

① 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文中提到的“孤掌难鸣”是德国作家Φ. 施皮尔哈根的小说“In Reih und Glied”的俄文译本的书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孤掌难鸣》的主人公列奥与《处女地》的主人公涅日达诺夫有共同之处。与列奥相似，涅日达诺夫既是坚定的民主派，同时又是“老爷”、“养尊处优”的人，他最初抱怨自己无能为力，最后又对与人民交往感到“绝望和灰心丧气”。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肯定或赞赏涅日达诺夫式的人物以及托尔斯泰的列文型的俄罗斯青年。他在文章中多处以暗喻或以露骨的语言抨击屠格涅夫及其小说《处女地》。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指责的就是屠格涅夫《处女地》中涅日达诺夫式对人民感到“失望”的青年。

不可能不追求爱心。但愿没有人会对您说，就是没有爱心您也应当做所有这一切，这么说吧，您做这一切只不过为了一己的私利，否则人家会强制您做的。不，在我们俄罗斯应该传播另外一些信念，特别是有关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世界的当今形态中，人们以为自由就是放纵，其实真正的自由——只不过是克制自己和战胜自己的意志，从而最终达到这样一种道德情操的境界，即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真正主宰。而对欲望的放纵只会导致您的受奴役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当今的世界几乎都以为自由就在于金钱的保障以及保证金钱保障的法律："只要有钱，那么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有钱，那么我就不会消失，我就不会去求助于人，而不向任何人求助就是至高无上的自由之所在。"可是与此同时，这实质上并不是自由，仍然是受奴役的状态，受奴役于金钱。相反，至高无上的自由却是不积蓄钱，也不用钱来保障自己，而是"尽你所有把钱分给别人，然后去为别人服务。"人一旦能做到这一点，一旦能克制自己到这种程度，——那么在此之后他不就是处于自由状态了吗？这已经是最高级的意志的表现！再说在现今有文化的阶层中平等又是什么呢？心怀忌妒地相互盯着，妄自尊大："他聪明，他是莎士比亚，他以自己的才华徒骛虚名；贬低他，毁灭他。"与此同时，真正的平等说的却是："你比我有才华，你比我聪明，你比我长得漂亮，这与我何干？恰恰相反。我对此很高兴，因为我爱你。尽管我比你卑微，但是作为一个人，我尊重自己，这你也知道，因此你自己也会尊重我，我为你对我的尊重而感到幸福。如果你因你的才能给我和别人带来的好处胜过我百倍，那么为此我祝福你，为你感到惊奇并感谢你，根本不会把对你的惊奇看成是自己的耻辱；与此相反，会因感激你而感到幸福，而且如果我为你和为

别人效劳，竭尽我的绵薄，那么也并非因为要还你这份情，而只是因为我爱你们大家。”

如果所有的人全都将这样说，那么当然他们就会成为兄弟，而且也不仅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要让欢乐的生活得到充实，要让爱心得到充实。

人们会说这只不过是一种空中楼阁，说这是“解决问题的俄罗斯方式”——是“天国”，而且只可能在天国才有这种事。不错，如果天国真的来到，那么斯季瓦之流就不会暴跳如雷而大生其气的。不过应该注意到一点，就是这种“解决问题的俄罗斯方式”的空中楼阁比起解决问题的欧洲方式无可比拟地更多一些可信的成分，更少一些幻想的成分。如同“弗拉斯”这类人物在我们所有阶层的人士中我们见到过，而且现在也就在我们的眼前，而且我们甚至还很经常看见；至于欧洲那边的“未来人”我们则从未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自己曾答应要来，趟过那鲜血流成的河而来。您会说，个别人以及几十个人也于事无补，而需要的是求得某种相当普遍的秩序和原则。然而为了毫无差错地营造一个社会，如果甚至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秩序和原则可供使用，而且如果在实践之前可以求得这样的秩序和原则，即 a priori[1]，只凭借心灵的幻想以及还是从社会的旧制度中得来的“科学的”数据，一遇到事先没有准备、对此毫无训练的人们，任何的规则都保持不住，也实现不了，恰恰相反，它们只会成为沉重的包袱。我非常相信我们那些未来的但却已经开始行动的人们，关于这些人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说他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协调一致，说他们在信念方面还可怕地分成团体和营垒，但是，首先他们却都在寻求真理，而且只要获悉

① 拉丁文：先验地。

真理之所在，那么为了求得它，他们会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请相信，如果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最终能找到这条真理之路，他们就会用不着强制，而是自由地吸引所有的人追随他们。这就是个别人在第一种情况下能够做到的事，这就是能够开垦我们“处女地”的那只犁。在向人们说教“他们该怎样做”之前，就会自己先做出示范。自己以身作则，别人也都会随你前进。这里有什么空想的东西，这里有什么不可能的东西，——我真弄不明白！不错，我们很堕落，也很畏缩，因此我们就不相信，而且还加以讥笑。但是，现在问题几乎还不在于我们，而在于未来的人们。人民的心地是纯正的，但是他们需要受教育。不过心地纯正的人们也会在我们的圈子里涌现出来——而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呢！首先应该相信的就是这一点，这是需要善于看清楚的。向心地纯正的人们提一个建议，首先要迈出的一步就是自持力和自制力。要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这就是迈出第一步的诀窍所在。

俄罗斯人民已经十分成熟，足能以自己的观点正确认识东方问题

（《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1章，Ⅱ）

虽然说起来没有道理，但是土耳其人四个世纪以来在东方施行的压迫，从一方面来看甚至还有益于基督教和东正教，——当然是否定的，不过它还是促进了后者的团结，正像两个世纪之久的鞑靼人统治曾经促使我们俄罗斯教会更加巩固一样。东方备受压迫和折磨的基督教居民在基督身上以及在对他的信仰上看到了自己唯一的安慰，而在教会身上则看到了自己民族个性及其特点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残余。这曾是最后的唯一的希望，从破碎的船上存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块木板；因为教会终归把这些居民作为民族保存下来，而对基督的信仰阻止了他们与战胜者融合为一体，尽管他们之中的部分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种族和自己以往的历史而与取得胜利的人融合为一体。被压迫的各族人民自己对此很清楚，因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十字架周围。从另一方面来说，从君士坦丁堡被征服之日起，整个巨大的基督教东方不由自主地并且突然间就把自己祈求的目光转向遥远的俄罗斯，其时俄罗斯刚刚从鞑靼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他们仿佛预料到俄罗斯未来的强盛，会成为拯救自己的具有凝聚力的中心。俄罗斯则毫不迟疑地立即接受了东方的这面旗帜，并把帝都[①] 双头鹰置于自己古老的纹徽之上，这样一来，仿佛就是向全体东正教承担了义务：保护东正教以及所有

① 即君士坦丁堡。

信奉它的各族人民免遭毁灭之灾。与此同时，全体俄国人民也完全肯定了在整个东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中俄罗斯及沙皇陛下所承担的新使命。从那时起一直到目前为止都可以在人民坚定不移的语言中听到他们对自己沙皇陛下主要的爱戴的称呼："东正教的"，"东正教的沙皇"。人民仿佛在这种称呼中承认了沙皇的使命，——当上帝的旨意降临时，履行保护者和统一者的使命，——也就是充当从伊斯兰野蛮行径中和从西方异教徒手中解放东正教和基督教及其信奉者们的拯救者。两个世纪之前，特别是从彼得大帝开始，东方各族人民的信仰和希望已经在事实上开始得以实现：俄罗斯之剑已经有几次在东方为保卫它而熠熠生辉[1]。不言而喻，东方各族人民也不能不在俄国的沙皇身上看到他不仅仅是自己的解放者，而且也是自己未来的沙皇。但是在这两个世纪中他们也接受了欧洲文化，也受到了欧洲的影响。人民中间受了同等教育的一部分人，他们的知识界，也如同我们这里以及在东方一样，已经开始逐渐对东正教的思想变得淡漠，甚至开始否认这种思想对于东方也如同对于俄罗斯一样，意味着更新，以及向新的伟大生活的转变。例如，在俄罗斯，它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在这种思想中看不到甚至是不想看到俄罗斯的主要使命，俄罗斯未来的约言及其生命力；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开始到新的启示中去寻找这一切。在教会中很多人开始用西方眼光看见的只不过是僵死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指的是彼得一世的普鲁特河远征（1711），叶卡捷琳娜二世（1768—1774 和 1787—1791）、亚历山大一世（1806—1812 年的俄土战争和 1804—1813 年的俄国波斯战争）和尼古拉一世（1826—1828 年的俄国波斯战争，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1853—1855 年的克里木战争）等各个时期俄国同土耳其以及同波斯的多次战争。

的形式主义、独特性、宗教仪式等等，而从上世纪末开始甚至只看见陈规陋习和伪善行为。关于精神，关于思想，关于生命力等等则统统置诸脑后了。出现了西方性质的经济思想，出现了新的政治学说，出现了力图修正过去的道德情操并高踞于其上的新的道德情操。最后，出现了不能不带来不信任以往思想的科学……在东方的各族人民中开始有人觉醒，除此之外，更为主要的是，民族思想的抬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种担心，即从土耳其人的桎梏下解脱之后要陷入俄国的羁绊。然而在我们的千百万普通人民中间以及历代沙皇中间解放东方以及解放基督教教会的思想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去年夏天席卷俄国人民的运动证明，人民对自己远古以来的希望和信念丝毫没有忘却，这甚至使我们知识界很大一部分人感到吃惊，他们甚至惊讶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对这一运动持怀疑和讥讽态度，开始要人们相信，而且先于别人要自己相信，这场运动是一些不体面的人臆想和伪造出来的，这些人只不过想借此出人头地罢了。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知识界中间，除了不大的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人外，谁又能够想象我们的人民具有自觉理解自己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情操使命的能力呢？他们如何能够想象这伙粗鲁愚昧、不久之前还是农奴、而现在还没完没了喝着伏特加烧酒的酒徒们，能够知道并确信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基督服务，而他们的沙皇的使命则是保护基督教信仰和解放东正教。“即使这伙愚昧无知之众（农夫）总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终归既无宗教的概念，甚至也不理解基督，他们连最习见的祈祷词都不知道。”这就是人们通常讲我们的人民的话。讲这话的人是谁呢？您也许以为——他们是德国来布道成立福音洗礼教派的牧师，或者外来的欧洲人，政治报纸的记者，或者有文化的上层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信仰上帝，而如今在我们

这里却陡然繁殖得这么多，最后，这是出自移居国外的俄国人中间的某个人，这些俄国人想象中的俄罗斯和俄国人民只不过是一个手持量酒器皿的醉妇的形象[①]？啊，非也，有这种想法的却是我们俄罗斯的和最优秀社会层面的大部分；他们甚至意料不到，虽然我们的人民不晓得祈祷词，但是基督教的真髓、基督教的精神和真理在他们身上却得到了保存和加强，以至于可以这样说，别看他们身上有毛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我们的人民那样保持着基督教精神。何况无神论者以及在信仰问题上持无所谓态度的俄罗斯西欧派人士对于信仰一事只不过理解为形式主义和伪善行为而已。在人民中间他们看不到任何类似的伪善行为，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的人民根本就没有头脑，只要他们需要就对着牌子祈祷，而实质上他们是无动于衷的，他们的精神被形式主义的做法扼杀了。这些人在人民身上根本看不到基督教的精神，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自身早已丧失了这种精神，从而也就不知道这种精神在何处存在，在哪里飘荡。我们这些“淫荡的”和无知的人民却喜爱温顺者和癫狂者：在所有的传说中和故事中，我们的人民都保持着一种信念，即弱者和卑贱者、为了基督的缘故而遭受不公和无辜受难者都将在上帝旨意裁决之时根据上帝的旨意被推举到大大高于显赫人物和有实权人物的位置上。我们的人民也喜欢讲他们伟大的、纯洁无瑕的和谦恭的基督教勇士伊利亚·穆罗梅茨[②] 的光辉而伟大的生平记述，讲这位为真理而献身的人、

---

① 此处暗指屠格涅夫。他在《处女地》第 2 部第 30 章中引用一首题名为《睡眠》的诗，诗的结尾一段是：“只有小酒馆没睡也没有闭上眼睛，／额抵北极，脚踩高加索，／手持喝光酒的量酒升，／祖国在长眠，神圣的俄罗斯啊！”

② 俄罗斯 12—16 世纪的壮士歌里的主人公。

穷人和弱者的解放者和谦恭而不骄傲、忠实而心地纯正的人的生平事迹。在拥有、尊敬和热爱这样的勇士的同时，我们的人民会不相信在东方现在受屈辱的各族人民和我们的兄弟的胜利吗？我们的人民尊敬地追念他们伟大和谦恭的独居修道者们和献身者们，我们的人民喜欢把伟大的基督徒受难者们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我们的人民知道并且早已熟悉这些故事的，我本人也是首先从人民那里听到这些故事的，这些故事是以景仰和热忱的心情讲述的，而且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田里。除此之外，人民每年还从自身分离出一些伟大的忏悔者“弗拉斯”之类的人，他们的行为非常使人感动，散尽自己所有的家产前去寻求恭顺而伟大的真理的功勋，前去做工和过贫穷的生活……不过，关于俄国人民的话题以后再说；到一定时候我们的人民终将会获得人们对他们的理解，至少也会获得人们对他们的关注。人们将会懂得，我们的人民是大大值得重视的。最终，人们将会懂得，有这样一种重要的情况，那就是在俄国历史的伟大的或者甚至是略微重要的一些时刻还从来没有一次是能够离开人民而得到解决的；人们将会懂得，俄国是人民的俄国，俄国不是奥地利，在我们历史生活中每逢紧要关头，事情总是靠人民的精神，靠人民的观点，靠人民的历代沙皇与人民的高度团结一致来解决的。这一特别重要的历史情况在我们知识界常常被忽略，而且差不多不受注意，只是到了一定的历史关头总是仿佛才突然想起来。不过我说得离题了，我开始说的是君士坦丁堡……

“犹太人问题”

（《作家日记》，1877 年，3 月号，第 2 章，Ⅰ）

啊，请别以为我真的想掀起“犹太人问题”！我是开玩笑写了这个标题的。掀起一个如此规模宏大的问题，例如说俄国犹太人的状况以及为数三百万的犹太子女在俄国的处境等等，——这并非我力所能及的。这一问题不在我所涉及的范围之内。不过，终归我可以有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某些意见，结果是某些犹太人却突然开始对我的意见发生了兴趣。从某些时候起我开始收到他们的来信，他们认真而且伤心地责怪我“攻击”他们，责怪我“憎恶犹太佬”，责怪我不是因犹太人的罪过，“不是视为剥削者”而憎恶犹太人，正是作为一个种族而憎恶，也就是说，类似于“犹大出卖了基督”这种说法。是一些“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写的这些信，他们是这样一些人（我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事先作保留说明，我根本不是要把我这短文加以概括化）——他们仿佛总是竭力让我们知道，说他们以他们所受的教育而言，他们早已就不再赞同自己民族的“成见”了，连他们自己的宗教仪式也有别于其余一些浅陋的犹太人，早已不履行了，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化水准高于这个，他们还说，他们连上帝都不信啦。我不妨顺便在括号中指出，如此捍卫自己民族的所有这些“上层犹太人”之中的先生们忘记了他们四十个世纪以来的上帝耶和华①并弃他而去，岂不是

①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6章,第2节):“上帝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从此这个名字就成了犹太人民族宗教的一面旗帜。

显得太罪过些了吗？这也远远不只是因为民族感情而显得罪过，而是由于别的一些非常高的范畴的原因。不免是一桩很奇怪的事：犹太人而不信上帝终归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设想不信上帝的犹太人。不过这是一个很广泛的话题之一，我们暂时不谈这个。我感到异常惊奇的是，我竟成了一个憎恶犹太人民和犹太民族的人，这是从何说起呢？那些先生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允许我把犹太人作为剥削者和因为他们的一些恶习而谴责他们，但是——但是这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罢了。事实上很难找到有比一个受过教育的犹太人更容易受到刺激和更注重繁文缛节、循规蹈矩的事物，以及作为一个犹太人而更容易感到受委屈的了。但是我毕竟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发表了憎恶犹太人民的言论呢？因为在我的内心里从未有过这种憎恶之感，而且那些同我相识并与我有交往的犹太人也都晓得这一点，那么，从一开始和开口说任何一句话之前，我就要把这种强加在我身上的指责彻底摆脱，使得今后不会再特别提到它。责备我“憎恶”犹太人是否就因为我有时把犹太人称为“犹太佬”？但是，首先，我不曾认为这是侮辱人的；其次，“犹太佬”这个词，据我记忆所及，我总是用来表达一定的思想的，如“犹太佬，犹太习性，犹太王国”等等指的是一定的概念、潮流、世纪的特征。可以就这一思想进行争论，可以不予赞同，但大可不必为这个词而感到受辱。让我在这里摘录一位非常有文化教养的犹太人写来的信中的一段话，这封信写得很长，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也写得很出色，让我十分感兴趣。这是一封责备我憎恶犹太人民的最具代表性的信。不言而喻，给我写这封信的NN先生是严格匿名的。

……但是我有意要触及一件我简直无法给自己解释清楚的事。

这就是您对“犹太佬”的憎恶之感，这种憎恶之感差不多在您的每一期《作家日记》中都有表露。

我愿意请教，为什么您起而反对犹太佬，而不是一般地反对剥削者，我不能忍受我的民族的种种偏见也不亚于您，——我没有为这些偏见而少受痛苦，——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同意说这个民族的血液中流淌的是寡廉鲜耻的剥削。

难道您就不能够上升到任何一种社会生活基本法则的高度，那就是毫无例外在一国之内的全体公民，如果他们都尽了他们为国家的生存而应尽的义务，就应该享有为他的生存而应享的全部权利和利益，对于背弃法律的人们，对于有害的社会成员都应有完全一样的、适用于一切人的惩处尺度？……为什么所有的犹太人都应当在享有权利方面受到限制，为什么对他们存在着特殊的惩处的法律？外国人（要知道犹太人终归还是俄国国民）的剥削好在哪里？在俄国的德国人、英国人、希腊人多得不得了，他们的剥削比犹太佬的剥削好在哪里？在全俄国繁殖出了非常多的东正教的富农、恶霸、地方官、吸髓敲骨的剥削者，为什么他们就比活动范围终归有限的犹太佬好些呢？为什么有的人就要比别的人好些？……

（写到这里，尊敬的NN先生拿出几个有名的俄国富农同犹太人对比，意思是说，俄国人也并不亚于犹太人。不过，他要证明的是什么呢？要知道，我们并不夸耀我们的富农，我们并不把他们作为模仿的范例来标榜，恰恰相反，我非常同意，他们都不好。）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能对您提出几千。

与此同时，在您说“犹太佬”的同时，您将俄国境内多达三百万的极其贫困的犹太居民全部包括在这个概念之中了。而在这三百

万之中，起码有二百九十万在为可怜的生存条件而进行着绝望的挣扎，他们在道德情操方面不只比别的一些民族的人纯洁，而且也要比受您推崇备至的俄国人民纯洁。而在“犹太佬”这一称呼中，您还把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一可尊敬的数字的犹太人也包括在内，而他们在国家生活的所有事业上都表现得很出色，哪怕就拿……

（写到这里，写信的人又提到几个人的名字，除了戈利德施泰因诺夫一人之外，我认为我无权把其他人的名字列在这里，读到他们出身于犹太人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

……戈利德施泰因诺夫（为了斯拉夫人的思想而英勇地牺牲在塞尔维亚）与为社会和人类的利益而进行工作的人们来说如何？您对“犹太佬”的憎恶甚至扩展到迪斯累里[①] ……他本人大概还不知道，他的祖先们曾经是西班牙的犹太人，从“犹太佬”的观点来说他本人当然不掌管英国的保守政策（?）……

不，很遗憾，您既不了解犹太人民，也不熟悉他们的生活，最后，您对他们的精神一无所知，对他们四十个世纪之久的历史也很陌生。因此，很遗憾，尽管您这人很真诚，也特别正派，而您却在无意中给赤贫生活的穷苦人民大众带来过灾害，——那些财大气粗的“犹太佬”在自己的沙龙里接待着这个世界的财大气粗的人们，当然并不害怕报刊上说些什么，甚至也不担心那些被剥削者的软弱无力的愤怒。但是，还是不谈这件事吧！未必我能使您确信我的观

① 迪斯累里（1804—1881），西班牙籍的犹太人，贝肯斯菲尔德伯爵。他是英国保守党领袖、作家，曾任英国财政大臣（1866—1868）、首相（1868，1874—1880），他的政府推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1878 年占领塞浦路斯，策划吞并埃及等）。

点，——但是，我却极愿您能够让我信服您。

这就是我要摘录的来信的段落。在我有所回答之前（因为我不想背着这个受指摘的沉重包袱），——我注意到这种攻击的不可扼制的盛怒以及抱怨的程度。在我全年出版的《作家日记》中肯定不曾发表过大量反对“犹太佬”的文章，以至于引发出如此强烈的对我的攻击。首先，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位尊敬的来信者在他那不多几行文字中涉及到俄国人民时，也忍不住、也克制不了对穷苦的俄国人民多少持有太傲慢的态度。不错，在我国留给俄国人的已经没一处没有吐满唾沫的地方（谢德林语），而犹太人则大大“情有可原”。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残酷无情的事实显明地证实犹太人自己是如何看俄国人的。写来这封信的人果然是一位受过教育而且有才华的人（只是我并不以为他没有偏见）；从一位受过教育的犹太人领教了这一切之后，还能期望那么多的犹太人对俄国人会有怎样的感情呢？我并非为了责备才讲这话，这全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只是想要指出，在我们同犹太人存在隔阂的动机方面可能其过错不只是俄国人民一方面的事，当然，这是从两方面积累起来的，而且还不晓得哪一方面比重更大一些。指出这一点之后，让我说几句为我自己辩白的话以及一般谈谈我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我再说一遍，尽管谈论这件事并非我力能胜任，不过我还是能够讲出点什么来的。

Pro 与 Contra①

(《作家日记》，1877 年，3 月号，第 2 章，Ⅱ)

假定说，很难熟悉像犹太人这样一个民族的四十个世纪的历史，但是，首当其冲，有一点我是晓得的，就是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如同犹太人那样埋怨自己的命运，每时每刻，每走一步，每说一句话，都埋怨自己的卑贱，埋怨自己的痛苦，埋怨自己的受难等等。想想看，竟然不是由他们在欧洲进行着统治，竟然不是他们在那里哪怕只是掌管证券交易所，更不必说掌管国家的政治、内部事务、道德情操了。就算是戈利德施泰因为了斯拉夫人的思想而献身，但是归根结底如果不是犹太人的思想在世界上如此强而有力，那么，很可能，所提到的那种“斯拉夫人的”（去年的）问题早已在有利于斯拉夫人而不是有利于土耳其人的情况下解决了。我准备相信，贝肯斯菲尔德勋爵自己可能把自己的出身曾经是西班牙犹太佬一事忘记（然而，大概没有忘记），但是，他最近一年以来部分地从犹太佬的观点出发“领导了英国保守的政治”一事，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部分地”也是不能不允许的。

从我这一方面来说，就算我上面所讲的这一切都是信口开河、轻率的口吻和轻率的言论，我可以让步。不过，我终归不能够完全相信犹太人的叫喊，说什么他们非常受压制，他们惨遭折磨以及他们低人一等。在我看来，俄国农民，而且一般来说，俄国的普通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差不多比犹太人遭受的苦

---

① 拉丁文：“赞成”与“反对”。

难还严重得多。给我写信的人在另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 首要的一点是，必须让他们（犹太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利（请想一想，他们至今都被剥夺享有最根本的权利：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由此而引发出很多对全体犹太人群众来说骇人听闻的约束），只有让他们如同所有别的在俄国居住的异族享有同样的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时，才可要求他们履行他们对国家和对本土居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写这封信的先生，您在这封信的另一页上自己还给我写道，您“无与伦比地爱怜俄国人民中的劳苦大众，这种爱怜之情远远超过对犹太人的劳苦大众的爱怜之情”（这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说得太强烈了），——那么，请您也想一想，只想这样一点就足够，当犹太人“受自由选择居住地这一问题困扰的时候”，二千三百万“俄国劳苦大众”却遭受着农奴制的灾难，这种境遇当然要比“自由选择居住地”要痛苦得多。难道那时犹太人怜惜他们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在俄国的西部边陲以及南部地区人们会周详地回答您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同样也叫喊要拥有俄国人民自己也从未有过的权利，他们也叫喊和抱怨过，说他们受压制，说他们是受苦受难者，说如果给他们更多一些权利，“那时候，我们可以请他们履行对国家和对本地居民的应尽义务”。但是，盼来了解放者，解放者让本地居民获得了自由，那么又怎么样？是谁首先扑向被解放了的本地居民如同扑向牺牲品一样？主要是谁利用了这些被解放者的种种恶习？是谁用他那无休无尽的采金术蒙骗了这些被解放者？是谁在凡是能够得手的地方就立即代替那些不复存在的地主？其区别在于，尽管地主们剥削人也很厉害，但毕竟也还留

有余地而不让自己的农奴破产，当然这也是为了自己，免得将劳动力用尽耗绝；可是犹太人根本不去管俄国劳动力衰竭与否，尽自己的力量去索取，然后一走了之。我知道，犹太人读到这里会立即叫嚷说，这不是真的，这是诽谤，说我在撒谎，说我之所以相信这种种胡言乱语只不过因为“我不晓得”这些纯洁的天使们“四十个世纪之久的历史”。而这些纯洁的天使们“不只比别的种族的人在道德情操方面”无可比拟地“洁白无疵，而且比我奉若神明的俄罗斯人也干净清白得多”（这都引自上面那位来信者的话）。那么，就让他们在道德情操方面比世界上所有别的民族都纯洁吧，至于比俄罗斯人嘛，自然也不在话下，可是与此同时，我刚刚在《欧洲通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美国南方诸邦的犹太人已经成群结伙扑向几百万被解放了的黑奴，并且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黑人群众控制在自己手中，其方式就是众所周知的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采金术”，也就是利用这些被剥削者种族的缺乏经验和自身的恶习。请设想一下，当我读到这则消息时，我立即就记起，早在五年前我想到的正好就是这么一回事。当时我想，如今黑奴是从奴隶主手中解放出来了，但是他们却休想保全他们自己，因为犹太人正好要扑向这批新鲜的牺牲品，这犹太人在世界上多得很。我是想到了这一点的，而且请相信我，之后在这一期间若干次我都有这样的想法：“怎么搞的，为什么那边没有犹太人的消息，报纸上也不作报道，要知道，黑人可是犹太人的宝藏，难道犹太人会放弃吗?”现在终于等到了，报纸上有了报道，我也读过了。大约十天前，我在《新时代》（第 371 期）上读到一篇从科夫诺发回的通讯，这是一篇极具代表性的通讯，它说：“那边，犹太人是那样地向当地的立陶宛居民猛扑了过去，以致他们几乎没有把所有的立陶宛居民全都用伏特加

酒给毁掉，只是由于天主教教士的出面干预，威胁当地居民说死后他们要在地狱受折磨，在他们中间建立戒酒协会才拯救了那些贫苦的沉湎于饮酒的人。”不错，这位有文化的通讯员应该为自己本地的居民而感到脸红，因为他们到现在还相信天主教教士和他说的地狱中的折磨，但是通讯员在讲了上述情况的同时还提到，紧随天主教士之后，当地的有文化的经济学家们也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开始建立农村市场，以便“贫苦的劳动群众”能够按照真正的价格买到生活必需品，而不是按照犹太人定的价格来购买。嗯，谈到的这一切都是我读到的，我知道，瞬间就会有人朝我叫嚷说，所有这一切并不能证明什么；说这种情况都是由于犹太人自己也受压迫，他们自己也很贫穷，所有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为生存而斗争”而已；说只有蠢人才弄不明白这一点，如果不是犹太人本身也非常贫困，而是相反，如果他们也都发了财，那么他们就会瞬间表现出他们最富于仁爱的一面，以至于会使全世界都为之惊愕不已。但是，要知道，那些黑人和立陶宛人全都比犹太人贫困，后者却要从他们身上敲骨吸髓，然而那些人（请读读通讯）则非常厌恶犹太人乐而不倦的那种交易；其次，一旦过起富足和欢乐的生活时，不难成为仁爱和道德高尚的人，可是只要稍微要“为生存而斗争”① 时，那你就别想靠近我。我想，这全然不是那样好的天使般的特点；再其次，当然，我并非要把《欧洲通报》和《新时代》上的这两则消息当做已经能够解释一切问题的和最基本的事实来看待。要是开始撰写这个遍及全世界的种族的历

①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一书问世后，对于以“生存斗争”的法则论述人类社会的关系的见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不满，他认为“生存斗争”的原则是西欧以及俄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

史的话，那么立即就可以找出十万件之多的远比这要重大得多的事实，因此一件或者两件多余的事实并不特别有碍大局，不过这倒是让人感兴趣的。令人感兴趣的是，您只要——您只要因为有需要而查询一个犹太人及其事业的情况，——那么请您不必去图书馆，不必去翻阅旧书或者查看自己过去所做的札记，不必劳您的神，用不着去找，无须费力，就坐在原地，甚至不必从椅子起身，只要把手伸向您附近首先拿到的一份报纸并翻到第 2 版或者第 3 版，您就必定能够找到有关犹太人的某些事，而且必定是会使您感兴趣的，必定是最具代表性和必定是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总是同样的功绩！您得承认，即使您对这个种族四十个世纪的历史一无所知，那么在报上看到的终归是有意义的，终归给您指出点什么，终归给您揭示出点什么。不言而喻，人们会回答我说，所有的人都满怀憎恶之情，因此他们全都在撒谎。当然，很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无一例外全都在撒谎，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无一例外地所有人全都在撒谎和怀有如此多憎恶之情，那么这种憎恶感毕竟事出有因，要知道，这种普遍的憎恶终归说明点什么，“要知道所有人这个词是有其意义的呀！”别林斯基就曾经这样喊过。

“自由选择居住地！”但是，难道俄国土生土长的居民就拥有完全选择居住地的自由？难道过去在农奴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和不得人心的限制俄国普通老百姓充分自由迁移的规定不是还在继续有效吗？政府不是早已对此注意到了吗？至于说到犹太人，那么有目共睹，近二十年来他们在选择居住地方面的权利是十分地、再加一个十分地扩展了，至少他们已经在俄国先前见不到他们的那样一些地方出现，可是犹太人还总在抱怨别人憎恶他们和他们受到限制。就算我并不确切地了解犹太人的生

活习俗，但有一点我却知道得很清楚，并且准备与所有的人进行辩论，这就是：在我们的百姓当中绝对没有那种针对犹太人的偏执、臆断、愚笨的宗教憎恶，例如说什么："犹大，出卖了基督。"如果有这种说法，那也只是能从孩子们的口中或者醉汉们的嘴里听到，而我们的全体人民，请让我再重复说一遍，看待犹太人丝毫不带有偏执的憎恶。五十年来我的所见就是这样。我甚至曾经有机会同人民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住一个营房，共睡一张铺板[1]。那里曾有过几个犹太人——但是没有人蔑视他们，没有人把他们排除在外，没有人迫害他们[2]。当他们祈祷的时候（犹太人祈祷时是要叫喊的，还要穿上特别的衣服），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既不妨碍他们，也不嘲笑他们，然而，按照你们的理解来说，这正是你们所期待于俄国这样一种粗鲁的人民的；可是恰恰相反，人们看着犹太人在祈祷，就说："他们的信仰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来祈祷的。"——于是他们平静地从旁边走过去，而且差不多还带着一种赞许的神情。然而这些犹太人却在很多方面同俄国人格格不入，不同俄国人共同进餐，几乎傲慢地看待俄国人，（可是这是在什么地方呀？是在监牢里！）而且一般来说，对待俄国人，即对待"土生土长的"人民，表现出了一种厌恶和嫌弃的感情。在兵营里也是这样，在全俄国也无不如此。请去调查，请去询问，在兵营里，是否因为是犹太人，因为是犹太佬，并且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他们的习俗，人们就欺侮他们呢？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欺侮他们，在全体人民中间也是如此。但是请您相信，相反的情况却是，在兵营也好，在别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他服苦役时的经历。

② 参看《死屋手记》第1部中有关记述。

的任何地方也罢，俄国普通老百姓看到的太多了，他也理解（犹太人自己对此也毫不掩饰）犹太人不愿意同他们共同用餐，鄙视他们，尽可能躲得远远的，同他们隔绝开来，那么俄国人又怎么样，——俄国普通老百姓对此不但不感到屈辱，反而平静而清楚地说："他的信仰是这样的，根据他的信仰才不同我们一起用餐，才躲开我们。"（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他人很坏。）于是本着这种崇高的缘由，就心无芥蒂地原谅犹太人的行为。与此同时，有时我的头脑里不禁产生一种幻觉：如果在俄国国土上不是三百万犹太人，而是三百万俄国人；反之，犹太人竟有八千万之众——那么俄国人在他们那里会变成什么，并且会遭受犹太人怎样的鄙视呢？犹太人是否会让他们在享有权利方面与自己平起平坐呢？他们会允许俄国人在自己中间自由祈祷吗？不会把俄国人变成奴隶吧？更坏的是，是否会把俄国人的皮完全剥掉呢？是否会如同他们在古代，在自己遥远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对异族人所做的那样，将俄国人斩尽杀绝呢？不是的，我要请您相信，在俄国人民中间对犹太人没有偏执的憎恶感，有的可能是感到讨厌，而且有些地方这种情感甚至还可能很强烈。啊，不如此也是不可能的，其所以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根本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根本不是种族的缘由，根本也不是出自某种宗教上的憎恶感，这是事出有因的，原因并不在土生土长的俄国居民，也不是别的，过错全出自犹太人自身。

Status in statu[①]. 四十个世纪的生活习俗

(《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2章，Ⅲ)

憎恶，而且还是因偏见而导致的憎恶——这就是犹太人指责当地居民的说法。但是，既然说到偏见的问题上，那么您是怎样想的？是否犹太人对俄国人的偏见比俄国人对犹太人的偏见更少些，而不是更多些？上面我已经给您举出了普通俄国老百姓对待犹太人的例证；现在放在我面前的是犹太人的来信，而且不是普通的犹太人的来信，恰恰是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写来的，然而——在这些信件中包含着多么多对“土生土长居民”的憎恶呀！何况，主要还在于，——写管写，却连自己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要知道，为了能够在地球上生存四十个世纪之久，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人类存在的整个历史阶段，而且还是生存在紧密而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之中；由于多次丧失掉自己的领土、自己的政治独立、法规甚至几乎是信仰，——丧失掉而每次又重新团结一致，又在先前的思想上重新恢复生机，尽管采取的是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又为自己创建法规，而且几乎包括信仰在内——不，这样的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这样一个非同凡响的坚强而精力充沛的民族，这样一个世上无与伦比的民族不依靠 status in statu 是没有可能生存至今的。这个民族将 status in statu 永远地和无所不在地保存了下来，甚至在受到最骇人听闻的以及千年的驱逐和排挤的时期亦复如此。说到 status in

---

① 拉丁文：国中之国。

statu，我丝毫没有谴责的意思。然而，status in statu 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其永恒不变的思想及其思想的实质又是如何？

要说这件事需要很长时间，在这篇短文中是不可能交代清楚的，何况还有另外一种原因不能够详加评述，那就是毕竟所有的时间和期限尚未来临①，尽管时间已经逝去四十个世纪之多，但是人类有关这个伟大种族的最终的话还有待时日。但是，如果不深究这一问题的底里，那么倒是可以描述这个 status in statu 的某些特征的，起码可以就其表面加以描述。这些特征就是：根据宗教教义的规定疏远与隔绝，不与别人融合共处，信仰在世界上只存在着一个民族的个性——也就是犹太人，而别的一些民族尽管也存在，但是仍然应该认为，仿佛它们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要从别的民族中突出出来并构成自己的特殊个体，要知道从那时起，你就是上帝唯一的一个，把别的人都斩尽杀绝，要么让他们沦为你的奴隶，要么你就剥削他们。要相信取得征服世界的胜利，要相信一切总会屈服于你。你要严酷地鄙视一切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要与人交往。甚至在你的土地被剥夺、政治身份被删除，而你又被驱散在世界各地、栖身在各族人民中间时——全然一个样，——你仍要相信已经向你承诺的一切，要坚定地相信那一切终将实现，而现时你要生活下去，鄙视一切，团结一致并进行剥削，并且——你要期待，期待……"这就是 status in statu 思想的实质所在，之后，当然还有内在的、很可能还是神秘的、将这一思想防护起来的一些法规。

---

① 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 1 章，第 6～7 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作者此处引用上述的话，但文字上有出入。

你们这些有文化教养的犹太人先生们和反驳者们，你们说什么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说什么“即使有 status in statu 这种事（也就是说曾经有过，而现在嘛，只不过是一些最衰败的残迹而已），那么也只是由于压迫所致，是迫害造成的，是从中世纪和更早一些时候宗教迫害造成的，这种 status in statu 的出现仅仅是由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情感。如果它现在还继续存在，特别是在俄国，那么只是因为犹太人在享有权利方面还同土著俄国人不平等。”然而我以为，即使在权利方面犹太人享有平等地位，那么他也无论如何不会放弃他的 status in statu。更有甚者，把 status in statu 只归咎于受迫害和自我保护意识是很不够的。何况四十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靠顽强性保持自我保护意识是不够的，在这样长的期间进行自我保护会感到厌烦。而且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文明也不会持续到四十个世纪之久的一半，并且会丧失其政治力量和种族面貌。在这里主要原因并非是只有自我保护一种，而是还有某种起推动作用的和诱惑人的思想，还有某种世界性的和深刻的东西。关于它，可能人类还没有能力做出断言，这一点我在上边已经说过。在这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宗教的性质——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那个最起始名叫耶和华的营造者依靠他的理想和约言继续引导他的人民走向坚定不移的目标——这也是明白无误的。让我再重复说一遍，甚至也不可能设想犹太人不信上帝，更有甚者，我甚至也不相信有文化教养的人是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所有人实质都是一样的，只有上帝知道世人能期望从受过教育的犹太人那里得到什么东西！早在童年的时候我就读到过和听到过有关犹太人的传说，说他们现在仍在不屈不挠地等待着救世主，他们所有的人，下至最卑贱的犹太佬，上至他们之中最高贵的人和学者、哲学家以及犹太教牧师等人，都无一例外地相信，救世主重新

会把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并用自己的剑将各族人民打翻在他们的脚下；据说，因此犹太人，起码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才只推崇一种职业——黄金交易和拥有众多黄金制品，这都仿佛是为了当救世主降临时他们没有新的祖国，不因拥有土地而被束缚在外乡人的土地上，而只是拥有这种便于随身带的金银珠宝，这样一旦——

散出光芒四射的朝霞：
把钹呀，板鼓呀，芦笛呀，
连同金银和财宝完全
都搬回老家巴勒斯坦。①

让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当做传奇来听的，但是我相信，事情的实质必定是存在的，特别是在整个犹太人广大群众中，这是作为一种本能的难以抑制的向往的形式而存在的。但是，为了要保存住这种事情的实质，当然就必不可免地要留存最严酷的 status in statu。它毕竟保存下来了，因此其存在的原因，并非只是由于迫害，而是由于另一种思想……

如果事实上在犹太人中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将他们联结成某种整体的和特殊的东西，也就是这样一种内部的、严格的制度，那么，倒是差不多可以考虑将他们的权利全面地与本地土著居民的权利进行比较的问题。不言而喻，凡是人道和公正所要求做到的一切，凡是人性和基督法规所要求做到的一切——

① 引自俄国作家涅·瓦·库科尔尼克（1809—1869）的剧作《丹尼尔·瓦西里耶维奇·霍尔姆斯基公爵》，第2幕，第2场。引文与原作颇有出入。

所有这一切统统都应当为犹太人做到。但是，如果他们完全具备自己的一套制度和自己有别于人的特点，自己那一套种族的和宗教的孤傲不群，完全具备自己那一套规则和原则，而这些规则与原则恰恰又完全与那种思想起码迄今为止正好是欧洲世界的发展所遵循的思想相对立，而这后一种思想是要求在一切权利方面同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完全平等的，那么——其结果不就是他们要求比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获得某种更多的东西，某种额外的东西，某种超越了别人的东西吗？在这里，当然他们还会指出别的一些外国人，说什么："他们在享有权利方面是平等的，或者说几乎是平等的，而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则比所有的外国人要少得多，这是因为人们害怕我们犹太人，说我们仿佛比所有的外国人都有害得多。然而犹太人又何以有害呢？即使在犹太人中有坏的品质，这也仅仅因为是俄国人促成的，这是因为俄国人自己愚昧无知，没有文化教养，缺乏自立能力，经济不发达等等。俄国人需要有经纪人、领导人、事业方面的经济监护人、贷款人，俄国人自己找上门来，自己委身于他。相反的情况是，在欧洲各族人民都坚强有力，具有精神独立，具有强有力的民族发展，早已具备劳动的习惯和从事劳动的能耐，因此在那里人们不害怕把一切权利都让犹太人享有！听说过在法兰西当地犹太人的 status in statu 有害的言论吗？"

看来，这样的论断是很有力的，然而，在这里首先让人感到有那么一种放在括号中的短评，这就是："因此，对于犹太人来说，哪个地方的人民愚昧无知，或者还没有获得自由，或者在经济上还不发达，倒是好地方，——因为他们在那里是可以大走鸿运的！"他们做的不是与此情况相反，不是拿自己的影响去提高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平，增进他们的知识，使他们具有经济能力，犹太人做的不外是，不管他们居住在何处，那里

的人民堕落得更厉害，人类显得更低下，教育水平更降低，毫无希望可待的、惨不忍睹的贫困越来越令人厌恶地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就是绝望。在我们那些边远地区，请询问一下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现在犹太人的动机是什么？多少世纪以来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您只能得到众口一词的一种回答：残忍；“多少世纪以来他们对待我们的动机就是残酷无情以及只顾吮吸我们血汗的贪婪欲望。”的确，在我们那些边远地区，犹太人的全部活动仅仅是把土著居民置于只能依赖他们、别无出路的境地，他们这样还是利用当地的法规。在这些方面他们总是能够尽可能利用各种权利和法规，他们总是善于同人民依赖的那些人结交，在这里他们根本用不着向他们结交的那些人诉苦说他们享有的权利要比土著居民少得多。他们在我们这里得到的权利比土著居民何其多呀。在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几十年来，几百年来，俄国的土著居民又如何呢？——我们俄国边远地区的历史就足以证明。那么，怎么样？请从俄国的异族人中指出随便哪一个种族来，就其可怕的影响这个意义上说谁能与犹太人匹敌？一个也找不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比起在俄国的其他异族人来说，保存着他们全部的独特性。其原因当然就在于他们的那种 status in statu，其精神实质恰恰就是对一切非犹太人的东西都持残忍态度，恰恰就是对任何非犹太人的种族和人民以及任何凡是人这种生物都不尊重的态度。说什么在西欧各族人民并无受制于犹太人，因此罪责还在俄国人身上，这又能开脱什么呢？因为俄国边远地区的俄罗斯人毕竟比欧洲各民族要软弱些（仅仅是由于多少世纪以来残酷的政治状况的后果形成的），就该把他们彻底用剥削压制下去，而不是给予帮助吗？

如果拿欧洲来作为例证，比如说法国，那么，在那里 sta-

tus in statu 也未必就无害处。当然，那边基督教以及基督教思想早已衰落并且还正继续衰落下去，其罪责并不在于犹太人，而是咎由自取，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犹太人在欧洲用自己的思想取代了那里很多先前就有的思想，从而获得大胜。啊，当然，各个时代的人总是极端崇拜实利主义，并倾向于把自由理解并看做仅仅是不惜竭尽全力为自己积蓄以及不惜一切手段为自己积累金钱。然而这种追求从来也没有像我们这个 19 世纪这样，如此公开和如此值得关注地上升为最高原则，“人人都为自己而且仅仅只为自己，而任何一种人际交往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现今大多数人的道德原则①，而且遵守这一道德原则的大多当代人甚至也不是坏人，相反，还是一些劳动者，不是杀人犯，也不是盗贼。而对于下层人民大众的残忍，博爱思想之衰退，富人对穷苦人的剥削等等，——噢，当然，这一切过去也曾有过，甚至亘古如此，然而——然而从来没有上升到高于真理和高于科学的程度，然而也曾受到过基督教的谴责，可是现在，恰恰相反，却上升成为一种美德。因此，在那里犹太人到处在交易所里居于主宰地位就终归不是没有原因的了，他们之运作资本也就不足为怪，他们成为信贷的统治者也就有理有据了，让我再重复这一点，他们还是整个国际政治的主宰，而今后又将如何——当然，犹太人自己是清楚的：他们的王国，他们充实的王国即将临近！轮到他们的思想完全胜利了，在这种思想面前，什么仁爱的感情，什么真理渴求，什么基督精神的情谊，什么民族的情感以及欧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都变得微不足道。相反，继之而来的是极端的实

① 上世纪末一举取代了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思想，并在全欧洲成为现今这一世纪的主要思想。——作者注

利主义，盲目的、野心勃勃的个人物质保障的渴求，用一切手段积聚个人钱财的渴求——这就是取代了基督教那种只有依靠人们道德上和兄弟般的紧密团结一致才能济世救人的思想而被公认为最高目标，公认为明智的，公认为自由的那种东西。人们会嘲笑说，这全然不是渊源于犹太人。当然，这并非完全渊源于犹太人，不过要是犹太人最终得以在欧洲取得胜利并且繁荣昌盛起来，而且繁荣昌盛得正当其时，即正是这种新的基本思想在那里获得胜利并上升为道德情操原则的时刻繁荣昌盛起来，那么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犹太人在这里也施加了他们的影响。我们的反驳者们指出说，恰恰相反，犹太人很贫困，甚至到处都处在贫困之中，在俄罗斯则尤其艰难困苦；只有最上层的犹太人才富有，也就是那些银行家和交易所之王等等，而其余的差不多十分之九的犹太人——则简直是些乞丐，为挣一口面包而东奔西走，收取佣金，寻求在什么地方能得到买饭吃的小钱。不错，这似乎也是真实的，不过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正说明在犹太人的劳动中（也就是说起码在他们的绝大多数人中），在他们的剥削本身中正包含着某种不正确的、不正常的，某种不自然的、本身就负荷着对自己的惩罚。犹太人提供中介，把别人的劳动拿来进行交易。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犹太人喜欢拿别人的劳动进行交易！现时这还不能够改变什么；然而上层犹太人越来越强有力地和坚定地君临全人类之上并且竭尽全力向世人展示自己的面貌和实质。犹太人都叫嚷说，在犹太人中间毕竟也是有好人的呀。啊，上帝呀！难道问题在这里吗？何况我们在此说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或者坏人的问题。难道能说那些人中间没有好人？难道已故的巴黎的

詹姆斯·罗特希尔德[①] 是坏人？我们讲的是整体，是其思想，我们讲的是犹太佬现象以及犹太佬思想，即取代“败下场的”基督教义而席卷全世界的犹太佬思想……

① 詹姆斯·罗特希尔德男爵（1792—1868），法国银行家。他是欧洲著名的罗特希尔德银行世家的成员之一。在路易·菲利普执政时期，他曾垄断国债，成为法国仅次于国王的第二大富豪。

然而博爱万岁！

（《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2章，Ⅳ）

然而，我在说些什么，而且为什么要说这些呢？难道我是犹太人的仇敌？难道真的像那位对我来说无疑（根据她的信以及她这封信的真诚而热切的情感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位高尚的和受过教育的犹太姑娘写的，——照她的话说，难道连我也是这个“不幸的”种族的仇敌，我“一有适宜的机会仿佛就非要残酷地攻击”它不可。“您蔑视犹太佬种族，而它‘除了为自己打算外，不考虑别的’等等，等等，这是显而易见的”。——不，我要挺身而出对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提出异议，而且我还要对事实本身进行争辩。恰恰相反，我在说的和写的就是“仁爱和公正所要求的，人性和基督教的法规所要求的，——所有这一切都应当为犹太人做到”。上面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我现在不妨对上述的话做一点儿补充，尽管我提出了一切构想，然而我最终坚决主张在正式的立法中完完全全扩大犹太人的权利，而且只要有可能，我也赞成他们享有与土著居民最充分的平等权利。（注意：尽管很有可能，在另外一些场合犹太人如今已经享有更多的权利，或者不如说，比起本地居民来他们利用了更多的可能性。）当然，与此同时，我也想到，比如说，在头脑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幻想：如果一旦那种护卫着我们贫困的当地农民免遭厄运的农村公社由于某种原因而发生动摇，——而如果在此时，朝着这些毫无经验、完全不会保护自己免受诱惑、一直在受公社监护的、被解放了的农民，——拥来一大帮乱哄哄的犹太人——那么将会是一种什么

情况？农民的毁灭就在眼前：他的全部财产，他的全部劳力第二天就会归犹太人支配，那么即将来临的时日不但不比农奴制时好过，而且甚至也不会比鞑靼人统治时强些。

但是，尽管有这种“幻想”，尽管有我在上边写到的情况，我仍然主张权利能充分而彻底的平等——因为这是基督的法规，因为这是基督教的原则。那么，既然如此，我又何苦长篇累牍地写了这么多，如果我这样与自己作对，我究竟曾经想要表达什么思想呢？我所要表达的就是，我并不是与自己作对，从俄国方面、从本地方面来说，并不存在而且我也看不出有什么阻碍扩大犹太人权利的障碍。然而我要肯定说的却是，这些障碍存在于犹太人方面的却要更多一些，远比来自俄国人方面的要多。要是说迄今为止还没有造成所有犹太人希望得到的那种情况，那么俄国人的罪责比犹太人的罪责要少得多。就如同我曾经展示过一个普通的犹太人那样，这个犹太人不愿意同俄国人交往，不愿意同他们共同用餐，俄国人非但没有生他的气，非但没有对他进行报复，反而一下子就想通道理并原谅了他，说道：“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他的信仰的缘故。”——类似这样一个普通犹太人的情况，我们在犹太人的知识界中也可以看到，我们还经常看到他们对俄罗斯人所持的极端的和高傲的成见。啊，他们却叫喊说，他们爱俄罗斯人民；有一个人甚至这样给我写信说，他感到悲哀的是俄罗斯人民没有宗教，说俄罗斯人民对自己的基督教一无所知。就犹太人而言，这也未免有些说得太厉害啦，这里只能产生一个问题：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自己本人对基督教又懂得些什么呢？但是，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主观和傲慢是犹太人性格中最难让人忍受的特点之一。俄罗斯人或者犹太人，二者中谁更不善于理解对方？我可以发誓，我能证实俄罗斯人要比犹太人更易于理解对

方，起码俄罗斯人没有（绝对没有!）对犹太人怀有宗教上的憎恶感。至于其余的偏见之类谁更多一些？犹太人还叫嚷什么他们多少个世纪以来都受压迫和被迫害，如今仍然在受压迫和被迫害，说俄罗斯人在议论犹太人性格的问题时至少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好吧，我们考虑这一点，并且也能对此予以证明：在俄罗斯人的知识界已经不止一次为犹太人发出过呼吁。嗯，犹太人又如何？在他们抱怨并且责怪俄罗斯人的同时，他们是否也曾考虑到俄罗斯人民自己也曾经遭受过多少世纪的压迫和迫害呢？难道可以肯定说，俄罗斯人民“在自己历史上”比任何地方的犹太人所承受的灾难和残暴更少些吗？难道可以肯定说，不是犹太人经常与压迫他的人串通一气取得包收捐税权，反而倒转来欺压俄罗斯人民的吗？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有过的，都是存在过的事实；要知道，这是历史，这是历史事实。然而我们则无论在什么地方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犹太人对此表示过悔恨，可是他们却仍然责怪俄罗斯人不大喜欢他们。

但是“打住！打住吧!”什么各种族充分的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以及权利的毫无差别等，都算了吧！正好相反，对此我首先要恳请我的那些反驳者以及给我写信的犹太人士，倒是要对待我们俄罗斯人谦逊一些和公平一些。假若他们的傲慢，假若犹太人对俄罗斯种族一成不变的“可悲的厌恶感”仅仅是一种偏见，是“历史的积淀物”，而并非是什么隐蔽在他们种族法规和制度中的某种隐藏得非常非常深的神秘的东西，——那么，就让一切的一切很快就烟消云散，让我们团结一致，心神相通，充分友爱，为服务于我们伟大的事业，造福我们的乡土、国家而相互帮助吧！就让我们的相互指责缓和下来，让那种无休无止的、妨碍着明确理解事物的、激烈的相互责怪销声匿迹吧。可以为俄罗斯人民担保的是，他们会以最充分的友爱

之情对待犹太人的，尽管有信仰上的差异，并且也会十分尊重这种差异的历史事实，然而，对于友爱来说，对于充分的博爱来说，需要的是双方的友爱。请犹太人自己也向俄罗斯人多少表现出友爱之情，以便对俄罗斯人也有所鼓舞。我知道，在犹太人中间现在也可以找出相当多的一些人，他们正在寻求并且正渴望着消除种种误解，他们同时还是些仁爱之士，对此我也不会缄口不言，掩盖真实情况。为了不让这些大有裨益的和富于仁爱之心的人士悲观失望，并且为了多少能减少一些他们的偏见，从而便于他们开始他们的事业，我也极其愿意充分扩大犹太人种族的权利，但是至少得根据其可能性，即要看犹太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证明他们有能力利用这些权利，并在使用它们时不损害当地居民的利益。甚至可以先做出让步，从俄罗斯人方面再多让几步……问题仅仅在于，这些犹太人中的新派好人是否能做得很多，而且他们本身在这种同与他们信仰相异、血缘不同的人们搞真正的兄弟般亲密团结一致的新的美好事业上，能够有多少作为？

“全人类的人”的葬礼[①]

（《作家日记》，1877 年，3 月号，第 3 章，Ⅰ）

在我的《作家日记》的这期 3 月号上我本想讲很多事情，但是偏偏又发生了这种情况，原本只想要说两三句话的事却占据了所有的篇幅，而整整一年我本来准备要谈的题目却总也谈不上。正需要多费些口舌的事，结果却往往不可能说很多，甚至连点题都顾不上。

原本想在这一次，除去所有这些“事关重要的”题目之外，哪怕顺便就有关艺术方面的事说几句话。我看过罗西[②]扮演的哈姆雷特并且得出结论说，我看见的并非哈姆雷特，而是罗西先生。但是如果不打算言无不尽，那么还是不要开口说的好。原本想要说一说（略微说一说）谢米拉茨基的画[③]，更希望的是哪怕再谈两句艺术上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讲讲列宾[④] 和拉斐尔先生等等，——但是，看来，得把这一切推迟

---

① 参阅本卷下文《罕见的情况》（1877 年，3 月号，第 3 章，Ⅱ）及有关的注。

② 罗西（1827—1896），意大利悲剧演员、剧作家、批评家，扮演过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角色，从 1877 年起在俄国巡回演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加以非笑，屠格涅夫对他的演技同样持否定态度，但当时俄国报刊也发表过与这两位作家评价不同的文章。之后，导演、戏剧理论家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则对他的表演艺术给予高度评价。

③ 谢米拉茨基又名亨里希·伊波利托维奇（1843—1902），波兰和俄国画家，他的画《基督教的明灯》（后改名为《涅隆的明灯》）曾于 1877 年 3 月在美术学院展出。

④ 伊·叶·列宾（1844—1930），俄国画家，巡回展览派成员。

到更加适宜的时候去说了[1]。

然后，我原想就我的《作家日记》出刊以来的这段时间所收到的信件用较多篇幅来写一写，特别是对那些匿名的信件。一般来说，我不可能回复我收到的所有信件，回复匿名信件自然更不用说了。与此同时，在这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里，从这些来信（都是讲我们共同的话题）中我有了某些不妨说是有趣的观感，至少这是我的看法。起码根据经验可以就我们俄国如今的思想情绪，就我们那些闲不住的头脑向何方倾斜和对什么感兴趣等问题作出某些记述，其中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甚至在俄国的不同地区等等都表现出一些有趣的特征。我以为，在日后的某一期《作家日记》上可以划出一些篇幅，哪怕专门刊登匿名信件，比如说，它们的评述之类的东西，而且我并不认为这里会显得枯燥乏味，因为将是众说纷纭，异彩纷呈。不言而喻，不可能什么都说到，也不可能把一切都转达，甚至可能连最有趣的也不得不割爱。因此我害怕着手做这件事，不知道这是否与主题相符合。

不过，现在我倒是想引述一封信，不是匿名信，是我十分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并没有重提这一话题。这里说的艺术上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直接关联到俄国音乐与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家弗·瓦·斯塔索夫（1824—1906）发表在《蜜蜂》杂志上的《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一文之后一段时间引发的争论。斯塔索夫的文章中引述若干封列宾的信，在一封信中列宾甚至说："关于臭名昭著的罗马对您有什么好说的呢？要知道我完全不喜欢它！一座衰败、死气沉沉的城市……只有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有惊人之作。哪怕以拉斐尔为首的其余一切，都显得非常陈旧、幼稚，连看都不要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处的"拉斐尔先生"暗藏着他对列宾和斯塔索夫的讥讽态度，因为斯塔索夫在他有关的文章中无休止地只把列宾称为"先生"。

熟悉的Л.女士[1] 的信。她是一位很年轻的姑娘，犹太女子，在彼得堡我们相识，现在她从M.给我写信。我同我所尊敬的Л.女士差不多从来也没有就“犹太人问题”谈过话，尽管她看来是属于严肃而认真的犹太人中的一位女子。我发现，这封信来得非常奇怪，它正好赶上我刚刚写完整整一章议论犹太人的文字。就同样一个题目总往下说未免太啰嗦，好在说的并非同样一个题目；即使部分地涉及同一题目，也显得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正好是问题的对立方面，因此甚至仿佛是解决问题的暗示。请宽宏大量的Л.女士原谅我吧，我竟然在这里用她的话转述了她信中有关在M.举行的金坚布堡大夫葬礼那部分内容。她是根据对葬礼的第一印象写下的非常真挚和感人至深的文字的。我也无意隐瞒这是一位犹太女子写的，所表达的情感——也就是一个犹太女子的情感……

这是我在葬礼乐曲的新鲜印象中写的。人们在安葬享年八十四岁的金坚布堡大夫。作为一名新教教徒，先把他送往新教教堂，然后才送往墓地，在安葬仪式上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同情，这么多为死者流淌的热泪，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多对死者说的发自肺腑的话……他死在如此的贫困之中，以致无钱将他安葬。

他在M.行医已经有五十八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做了很多好事。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是您知道这是一个多好的人就好啦！他是一位大夫和助产师；他的名字在这里世代相传，有关他的事迹已经被编成传奇在流传，全体普通人都称他为父亲，都爱戴他，都崇拜他，并且都懂得，随着他的辞世人们在他身上丧失了什么。当

[1] 她是索·叶·卢里耶。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3月11日写给她的信。

他还停在棺木中（在教堂里）时，似乎没有一个人不跑过去俯身哭泣并亲吻他的脚，特别是那些他曾给予太多帮助的贫苦犹太人，一边哭泣着一边祷告着，祈求他直接升入天堂。今天，我们过去的一个厨娘，一个极其贫穷的妇女，到我这里来过，她说，在她生最后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发现她家里一无所有，就给了她三十戈比用来煮汤吃，之后他就每天来一趟留下二十个戈比，而当他看见她已经恢复健康后，就给她送来一对山鸡 。同样的情况是，有一次他被请到一个非常贫穷的产妇（这类产妇才找他接生）家里，他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包裹婴儿，就脱下自己的衬衫，并解下缠头巾（他头上是裹着头巾的），把它们撕开给他们用。

他还治愈了一个砍柴的穷苦犹太人的病，随后这个犹太人的妻子也患病，接着他们的孩子们也都病倒了，他就每日两次来给他们看病，当他把他们都治愈而能够起身的时候，就问那个犹太人说："你用什么来支付我的出诊费用呢？"砍柴的穷苦犹太人说，他一无所有，只剩下一只山羊，这是最后的东西，今天就把它卖掉。他果然这样做了，把卖掉山羊的四个卢布拿来送给大夫，而大夫则连这四个卢布在内又加了十二个卢布交给自己的仆人，要他去买一头母牛，而砍柴的穷苦犹太人则被打发回家去了。一个小时之后，仆人把奶牛牵到砍柴人家里说道，大夫认为饮用山羊奶对他们是有害的。

他就是这样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还有他经常给穷苦的人们留下三十卢布和四十卢布的例子；他给农村里的穷苦老婆婆也都经常有留下钱的事。

因此，安葬他就如同安葬一位圣者一样。全体穷人都关闭了店铺跟在他棺木后面为他送葬。犹太人中间有些男孩子，他们在葬礼上为他唱赞美歌，但是用这种赞美歌为异教徒送葬是被禁止的。可是在这里，在他的灵柩前，在送葬队列的行进中，孩子们高声唱着

赞美歌。在所有的犹太教堂里都为他的灵魂而祈祷，所有的教堂里的大钟也都在送葬的整个行进过程中轰鸣。还有军乐队和犹太人乐师们也都来为逝者送葬，他们请求在送葬过程中进行演奏，并以此为荣。所有的穷苦人都有捐献，有的拿出十个戈比，有的拿出五个戈比，而富裕的犹太人则捐助得多些，并且用鲜花做了一个十分壮观的大花圈，花圈两边系着黑色和白色的缎带，缎带上用金色的字撰写着他的主要功绩，比如创建医院等等，——我辨认不出究竟写了些什么，何况他的功绩难道可以一一列举吗？

在他的墓前发言的有基督教新教的牧师和犹太教的牧师，这两位牧师都在哭泣着，而他则穿着一身破旧磨损的文官制服躺在那灵柩之中，那颗可爱的头却缠着一条使用了很久的头巾，他睡着，他的脸色还是那样得清新……

罕见的情况

（《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3章，Ⅱ）

人们会说，这只是罕见的情况。先生们，怎么着，又是我的过错，我又在这罕见的情况中发现了差不多能解决整个问题的开端……嗯，哪怕就是解决那个“犹太人问题”的开端，在我的《作家日记》这期的第2章就是用的《犹太人问题》的标题。顺便说一下，为什么我要把这位老大夫称为“全人类的人”[①]呢？这与其说是全人类的人，不如说是一般的人。这个M.城是这个西部边陲的一个大的省城，在这个省城中有很多犹太人，有德国人，当然也有俄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所有这些种族的人都各自承认这位正直的老者是自己的人。他本人则是一个基督教新教教徒，而且正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十足的德国人：他购买奶牛并把它送给一个穷苦犹太人的做法——这纯粹是德国式的玩笑。起先使那个人感到为难：“用什么来回报呢？”当然，可怜的人，为了回报“恩人”，在出售自己最后的所有物山羊的时候，毫不抱怨，相反在心中还深感痛苦，因为山羊只值四卢布，要知道，“为他们所有这些穷苦人操劳的老人也是要生活的呀，可是四个卢布对于他为全家人所做的善事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嗯，然而老人却心

① “全人类的人”的原文是 общечеловек，“一般的人”的原文是 общийчеловек，这里指这位德国医师心怀博爱，对任何民族，不论是本民族的或其他民族的人，都悉心加以医治。因此他似乎并不专属于某个民族，而属于全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用这两个词，本卷中他处也遇到这个词（不另加注）。

里有数，他要要笑一番，心里热乎乎地："瞧着吧，我要让这个可怜的人看看我们德国人的玩笑！"要知道，他一定是暗自好好地笑了一番的吧，当人们把那头母牛牵给犹太人的时候，后者定会精神振奋，说不准还在贫穷的犹太产妇某间简陋茅屋里折腾了一宿，而这八十岁高龄的老人最好也好好睡一觉，歇息他那副老骨头。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一定要拿这一"题材"来作画，画出犹太产妇家的这一夜。我最喜爱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是在我们当代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中却缺乏道德情操中心，近日一位有雄厚力量的诗人和精细入微的艺术家[1]同我在谈论谢米拉茨基的画儿时就是这样表达的。在这里，在我为"题材"提供的情节中我觉得就是这种中心。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种丰富多彩的情节。首先，是一种理想的、非常令人难堪的、极端恶臭的一个贫穷犹太人农舍的困苦无比的状况。这里甚至可以表达出很多幽默，而且这也是非常适宜的。要知道幽默是情感深沉的一种俏皮话，我很喜欢这种对幽默的定义。艺术家以其精细入微的情感和智慧在重新调配安排这个贫苦农舍中所有这些简陋物件和家什杂物的角色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这种滑稽可笑的安排调配会一下子抓伤您的心灵。而且光照也可以搞得有意思些：在一个东歪西斜的桌子上流淌着蜡泪的油脂制的蜡烛快要熄灭，唯一一扇小小的窗户霜雾迷蒙而且沾着薄冰，然而透过它，新的一天、穷苦人新的劳作的一天的曙光已经可见。难产的产妇往往是在黎明时分娩，整整一宿都在痛苦中熬煎，临近早晨才分娩。瞧，那位疲惫的老人暂时撇开产妇，而处置起婴儿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处指的可能是诗人阿·尼·迈科夫（1821—1897）。

包裹婴儿，连一块破布都没有（先生们，我敢向你们起誓，经常有穷到这种程度的，经常有，这是最纯粹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到了幻想地步的现实主义），于是这位正直的老大夫脱下自己已经穿得很旧的文职制服，再脱掉衬衣，然后把衬衣撕开做成婴儿的襁褓。他的脸色是严峻而深情脉脉的。可怜的犹太新生婴儿在床上当着他的面蠕动着，一个基督徒用自己的手为犹太婴儿接生，并且脱下自己的衬衫将他包裹起来。先生们，这就是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八十岁高龄的大夫裸露的并在晨寒中颤抖的躯干应在画面上占据显著地位，更不用说这位老人的脸和那位年轻的备受折磨的产妇的脸的表情，她正在注视着自己的新生婴儿和正在护理他的老大夫。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基督都在上天审视着，老大夫知道这一点："这个可怜的小犹太佬长大以后回想起自己出生时的故事，也可能会脱下自己的衬衫给一个基督徒穿上的。"——这位老大夫就是怀着这种天真而高尚的信念暗自这样想的。这是否会成为事实呢？极大可能是不会的，但是要知道，实现它也是有可能的，世上的事除了相信这个是可能实现的和将会实现的之外，则别无可做的了。而老大夫有权去相信，因为在他的身上已经实现："我已经做到，别的人也会做到，我比别的人又好在哪里呢？"——他用这样的论据增强他的信心。一个劳累的犹太老妇人，产妇的母亲，衣着褴褛，在炉子旁忙些什么事，出门去取一捆碎木柴的犹太人推开了农舍的门，于是一团冷气立即侵入房子。在地板上铺着的毡毯上沉睡着两个年幼的犹太孩子。总而言之，画面上布局配置会是很不错的。甚至老大夫数出来放在桌子上用来给产妇煮汤吃的三十枚戈比的铜钱也可以构成画面上的一个细节：整齐地码成一摞的三十枚铜钱，而根本不是散乱在那里。甚至像谢米拉茨基的画儿那样令人吃惊地画有一块珍珠

贝，也可以在画里画上珍珠贝。有时候人们会送给大夫们好东西的（为了少付点钱），于是老大夫的珍珠贝香烟盒就放在那一摞戈比的旁边。不错，这样一来就画成了一幅有“道德情操中心”的画儿了。我请你们来画这幅画儿。

罕见的情况！大约两年前，从俄国南方某地（我记不起来了）有封来信说，有那么一个大夫，在一个热天的早晨，刚刚沐浴完，清新，情绪饱满，忙着要赶回家去喝他的咖啡，因此也就不想去救一个刚从水里拖上岸来的溺水者，根本置群众对他的请求于不顾。好像后来曾对他进行审讯。要知道，这可能还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和具有新思想的人，一个进步分子，但是是一个“明智地”要求制定对所有的人都共同享有的法律和权利，同时又蔑视那些罕见的情况的人士。他可能以为这些罕见的情况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对共同问题的解决，因而对个别情况的态度就“越坏越好”。然而没有罕见的情况，也就实现不了共同权利。那一位“一般的人”尽管也是一个罕见的情况，可是却在自己的灵柩上面把整个城市都团结了起来。俄国的妇女和贫穷的犹太女子们都在一起去亲吻躺在灵柩中的他的脚，都一起拥立在他的旁边，都一起为他痛哭流涕。在这座城市中五十八个年头为人类服务，五十八个春秋不知劳苦的爱心，哪怕只是一次，就把所有的人在他的棺木上联结在一起，共同兴奋，共同流泪。全城的人都来为他送葬，所有教堂的大钟都为他轰鸣，用各种语言为他唱祷词。在他还没有盖上土的墓穴前牧师流着眼泪发言，犹太教牧师在旁边等候着，当基督教牧师讲完后，他就接替着发言，眼里也淌着泪水。要知道，在这一时刻差不多已经解决了那个“犹太人的问题”！要知道，基督教牧师和犹太教牧师为共同的爱心团结一致，要知道，他们当着基督徒和犹太教教徒的面差不多就在这墓前相互拥抱在

一起了。至于离去之后，他们各自又将捡起那些陈旧的偏见。那又有什么？水滴石穿，而这些“一般的人”则将征服世界，将世人团结一致；成见则将随着每一次罕见的情况变得苍白无力，从而最终消失。这位也是犹太妇女的Л.女士也曾俯在有一颗仁爱之心的人的“可爱的头”上哭泣过，她写道，在这位老人身后将留下传奇故事。而传奇故事——这是为开展事业迈出的第一步，这是讲述这些“世界征服者们”的活生生的回忆和不断的提示，说大地是属于这些征服者们的。一旦确信这的确是一些征服者，而且这样的一些征服者确实会“承受地土”[①]，那么你们差不多就已经在一切方面都联合了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很简单，但其奥妙似乎只在于一点。确信无疑的是，没有这些个别的存在，就永远休想凑成整数，就会是散沙一盘，但是这些个别却能把一切凝聚在一起。这些个别人提供思想，这些个别人贡献信仰，以自身展示出活生生的经验，因此也可以说提出证明。根本用不着等待所有的人都变成这么好的人，变成如同他们一样的人，或者是期盼很多的人成为他们这样的好人。他们是如此坚强有力，以致为了拯救世界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类好人。既然如此，那么怎么不能寄予希望呢？

① 引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战争。我们比任何人都强大

(《作家日记》，1877 年，4 月号，第 1 章，Ⅰ)

“战争！已经宣战！”[1] 两周之前，我们这里，人们都惊呼着。“会发生战争吗?”别的一些人立即询问道。“已经宣战，已经宣战！”人们回答他们说。“是的，已经宣了战，但毕竟会发生战争吗?”那些人继续询问下去……

不错，是有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现在还有。而这不仅是因为外交上的长期拖延人们才不相信，而是另外一种情况，是本能在起作用。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结局已经开始了，最后关头已经来临，某种过去的、长期延续下来的、往昔积累下来的因素已走到终点，正在迈步走向某种全新的、某种将过去分割为二而又为了新的生活使之焕然一新并使之复活的某处，并且……俄罗斯正在迈出这一步！正是在这一点上，“聪明绝顶的”人们不能相信：“俄罗斯！但是它怎么能够、怎么就敢这样？它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是否在内在方面、道德情操方面，而不只是在物质方面做好了准备呢？那边可是欧洲呀，欧洲谈何容易！而俄罗斯，俄罗斯算什么？却要迈出这样的一步?”

但是，人民相信，人民已经准备迈出这勃然兴起的、新的和伟大的一步。这是人民自己奋起投入战争的，是在沙皇陛下率领下的。当沙皇陛下的御旨颁发时，人民都拥向教堂，这是俄罗斯大地上的普遍现象。当宣读了沙皇陛下圣谕的时候，人民画了十字并互相祝贺开战。我们都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也

---

① 当时俄国向土耳其宣战。

听说过，甚至在这里，在彼得堡，也是这样。如同去年一样，又开始出现了同样的一些事，同样的一些事实：农民们在他们各自乡村里就他们的所能捐献钱、大车，几千人如同一个人一样齐声高呼:“捐献算什么，大车算什么，我们全都要去打仗!”在彼得堡有为伤病员捐助的人，他们几千几千地捐献，而登记认捐的不计其数。这样的事实很多，能有几万起类似的事实，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奇。这些事实只不过表明，全体人民为真理、为神圣的事业而奋起，全体人民为要去参加战争而奋起。啊，聪明人也将如同对待去年的那些事实一样否认这些事实；聪明的人们仍然会像前不久所做的一样，继续嘲讽人民，尽管他们的声音明显地不那么响了。他们为什么要讥笑，他们从哪里来的那么多自信？他们之所以继续他们的嘲讽，正是因为他们仍然还把自己算作一种力量，一种离开他们你就无所作为的那种势力。与此同时，他们的这种力量却正在走向终点。他们已接近可怕的破灭，而当破灭突然临头的时候，他们就该用另一种语言说话了，但是大家都会看到，他们会借用别人的声音嘟哝别人的话，人们会置他们于不顾，而把自己的欣喜之情投向沙皇陛下及与他在一起的他的臣民。

我们自己也需要这次战争；我们不只是为了受土耳其人折磨的“斯拉夫兄弟”才奋起作战的，而且也是为了拯救自己。战争会使我们呼吸的空气清新起来，在我们现在所呼吸的空气中，我们是处在一种腐败的衰萎和窒息的压抑下，以致我们连气都喘不过来。那些聪明的人们叫喊，并且一再指出，由于我们自己内部的混乱我们正在毁灭和窒息，因此我们所应希望的不是战争而是长久的和平，好让我们从野兽和蠢汉转化而成为人，好让我们学会秩序、真诚和荣誉。“到那时再去帮助我们的‘斯拉夫兄弟’”，——他们就是这样齐声唱完他们的曲子

的。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设想的这一过程，也就是他们借以改善我们处境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呢？他们自己怎样才能用显然不光彩的手段而为自己谋得荣誉呢？最后，令人感兴趣的还有，他们怎样和用什么来为他们自己与普遍存在的人民情感的割裂进行辩解呢？不，看来的确是，真理只能用受苦受难来赎买。几百万人在涌动，承受折磨并且无声无息地在消失，仿佛他们命里注定永远不可能理解真理。这些聪明人依照别人的思想活着，寻求的也是现成的语言和榜样，他们抓的是提示给他们的事。他们叫嚷说，权威人士在他们一边，西欧在他们一边。他们吹口哨反对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反对那些蔑视思想上奴颜婢膝的人，反对那些相信自己的独立性和人民的独立性的人。那么，实际上，这一大帮叫喊着的人注定要成为因循守旧的工具，他们之中只能有个别人多少接近一点真理，或者哪怕是至少能获得有关真理的一点预感。于是这些个别人就带领所有这群人在自己身后，控制运动，想出主意，并将这种主意作为遗产留给这一大帮折腾不安的人。这样一些个别人在我们这里早已有之。我们之中某些人，甚至很多人，已经了解他们。然而这些聪明的人仍然在继续他们的嘲讽，仍然相信他们自己，相信他们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他们现在针对我们那些跨越国界的部队说，“逛了一番就会回来的，”他们甚至高声说。“并没有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啊，我们哪里是作战，只不过是军事游戏和演习，花费几个亿，为了撑面子。”这就是他们内心对事情的看法。可仅仅是内心的吗？

是的，如果竟然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被打败，或者即使我们将把敌人打败，但是在各种形势的压力下，我们会草草媾和，——噢，那时，这些聪明人当然就会欢庆他们的胜利了。又将开始起哄，又是吹口哨，又是

喧哗，又是厚颜无耻，这样要延续几年之久，又将开始他们那样的自我鄙夷、自打嘴巴和自我揶揄的欢宴，——这些当然不是为了能唤起复兴和力量，而是为了欢庆自我的耻辱、没有个性和软弱无力的胜利。于是新一轮虚无主义就将开始，这和从前那种虚无主义一模一样，都是从否定俄罗斯人民以及它的独立性开始。而主要之点在于，这种虚无主义要获得那么多的力量并且那样坚强起来，以致无疑要公开大声地恣意诬蔑俄罗斯神圣的事物。于是我们的青年又要唾弃自己的家庭和家室，并避开自己的那些老家伙，因为他们，这些老家伙，总是无休止地、倒背如流地坚持说些老掉牙的、使所有人都感到厌烦的关于欧洲如何伟大，以及我们的职责在于尽可能没有自己的个性之类的老话。而主要之点还在于，唱的都是老调，说的都是陈词，而且长时间都没有什么新鲜的货色！不，我们需要战争和胜利。新的话语会同战争和胜利一起来到，于是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而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仅只是一种僵死的废话，——先生们，怎能像从前一样一如既往到今天呢！

但是，要做好应付一切的准备，就是说，甚至设想最坏的、甚至是对如今开始的战争坏到不可能再坏的那种结局，那么，即使我们将忍受很多可耻的、从前早已令人厌恶到极点的痛苦，但是巨人终归将不会颓然倒下，并且迟早仍将取得应归他所有的东西。这不只是一种希望，这是充分的自信，巨人的这种不可动摇——就是我们面对欧洲全部力量之所在。在欧洲，所有的人都担心他们古老的大厦会倒塌，而天花板就要压在他们头上。这位巨人就是我们的人民。如今这场人民战争的开始，以及前不久的一些情况，全都只是直观地向所有善于看问题的人们表明全体人民的整体性和我们的朝气蓬勃，同时表明，使得我们的聪明人糜烂了的腐败堕落的东西并未在任何程

度上触及到我们人民的力量。这些聪明人在欧洲面前给我们效了怎样的劳啊！他们不久前还向全世界叫嚷说，我们贫穷而卑贱，他们以讥讽让所有人都相信，在我们这里人民的精神根本不存在，因为根本也没有什么人民，因为我们的人民以及人民精神只不过是不太高明的莫斯科幻想家们虚幻的发明，八千万之众的俄罗斯农夫至多只不过是几百万个因循守旧的、酗酒的缴纳赋税的个体，至于沙皇与人民的结合之事也是没有的，即使有也只是在户口登记中。相反，一切都被虚无主义侵蚀掉和推翻了，我们的士兵都扔掉武器并且像羊群一样四下奔逃，我们既无弹药又无供给，于是，做出结论说，我们亲眼看见，他们过分好斗逞强和过于不自量力，而现在我们正在一个心思地期待着有台阶可下，如何不遭受最大的耻辱而后退的台阶，这种侮辱“我们甚至已经再也忍受不起”，我们祈求西欧给我们想出这样一个台阶来让我们下得来。瞧，我们那些聪明人赌咒发誓说些什么，怎么着？甚至生他们的气都几乎不可能，这是他们的观点和理解，是他们出自内心的观点和理解。是的，的确是这样，我们贫穷；是的，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很可怜。不错，在我们这里不好的东西的确很多，以至于聪明人，特别是，如果他是我们的“聪明人”，就不能够“背叛”他自己并且也不能不喊叫说：“俄罗斯完蛋啦，没有什么好怜惜的！”正是我们这些聪明人的这种心爱的思想飞遍了欧洲，特别是经由战争前夕那些涌到我们这里来的欧洲的新闻记者们的传播，这些记者是要来研究我们并用他们西欧人的观点来考察我们，用他们西欧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力量有多大。因此，不言而喻，他们只是听我们那些“最聪明和明智的人们”说些什么。人民的力量，人民的精神，他们都视若无睹，因此传遍西欧的消息就只是，俄罗斯必败，俄罗斯算不了什么，过去算不了什么，

现在算不了什么，也将不会转变成什么。我们的死敌和憎恶我们的对手们动了心，这些人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我们在欧洲的麻烦，几千欧洲的犹太人以及几百万同他们在一起的犹太化的“基督徒”也都动了一下心；贝肯斯菲尔德也动了一下心，他被告知说，俄罗斯将忍受一切，忍受最耻辱、最不齿于人的一切，但不会走到开战的地步，并说它的“爱好和平”非常强烈。但是，上帝保佑我们，让他们所有人都瞎了眼睛；他们过分相信俄罗斯的必败和微不足道了，而主要的方面他们却忽略不见。他们忽视了全体俄罗斯人民，他们没有把它看做是一种有生力量，而且也忽视了一种非常巨大的事实：沙皇与自己臣民的联盟！瞧，他们所忽视的就仅仅只是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相信，我们的沙皇陛下的确酷爱和平，的确不忍人们流血，他们本以为我们的这一切都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甚至现在也还什么都看不见。他们叫嚷说，我们这里颁布了沙皇御旨之后，突然出现“爱国主义”。可是，难道这是爱国主义，难道沙皇与人民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团结一致就仅仅只是爱国主义？我们的主要力量就在于此，就在于他们完全不了解俄罗斯，他们完全不了解俄罗斯的事务！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战胜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可能输掉若干次战役，但终归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就因为我们人民精神的团结一致和人民的觉悟。我们不是一切都集中于巴黎的法兰西，我们不是一切都系于资产阶级交易所的西欧，西欧各国还有赖于各自无产阶级的“安定”，而这安定也是当地各政府做出最后的努力而买来的，而且也仅仅是暂时的。他们不理解，而且也并不明白，只要我们想要，那么，无论全欧洲的犹太人加在一起，无论他们的几百万的黄金，也无论他们几百万的军队，都不能战胜我们；只要我们想要，那么，就不

可能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情愿做的事，而且在整个大地上也没有这种力量可以来强迫我们。糟糕的是，不只是欧洲的人们嘲笑上面所说的话，而且在我们自己人这里，不只是我们的那些聪明人和明智的人，甚至连我们知识阶层中的一些真正的俄罗斯人也在嘲讽上述的言辞——我们对我们自己以及对我们固有的力量，谢天谢地一直到现在尚未受损的力量，都还不理解到如此地步。这些好人们不理解，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一望无际的和具有自己特色的、极端不同于西欧的国度里，甚至连战术（如此共同性的东西！）也可能根本与欧洲的不同。西欧战术的基础——金钱和六十万入侵大军训练有素的组织可能会在我们的土地上栽跟头，并且遇到他们并不知晓的新的力量的对抗，这种力量的基础就在于辽阔无边的俄罗斯的土地以及团结一致的俄罗斯精神的本性之中。哪怕暂时这一点还不为我们这里很多人和好心人所知晓（他们不知道而且胆怯），但是我们的皇上知道这一点，我们的人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亚历山大一世说，他要剃去自己的胡须并遁入森林与自己的人民在一起，但是决不放下剑而屈服于拿破仑的意志，他说这话时，他是知道我们这种特殊的力量的。当然，碰到这种力量上，整个欧洲也会粉身碎骨，因为对付这种战争，它的钱不够用，也缺乏统一的组织。一旦我们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得知我们非常强大时，那么我们也就会达到我们不要作战的目的，那时，欧洲也就如同当年发现美洲一样，破天荒地发现我们并且信服我们。但是，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在他们之前首先要自己发现自己，就要求我们的知识阶层的人明白，他们不应该再与自己的人民分离和断绝联系了。

流淌的鲜血能有所救助吗?

(《作家日记》, 1877年, 4月号, 第1章, Ⅲ)

“不过要知道流血，终归是流血。”——我们那些聪明人一股劲儿地重复说道，所有这些刻板的有关流血之类的谈话，所有这些有时只不过是最毫无意义的大话、套话的堆砌，说实在的，是有其一定的目的的。比如说吧，交易所的经纪人如今太喜欢谈论仁爱了。而如今很多谈论仁爱的人，只不过是用仁爱进行交易罢了。其实，没有战争血可能流得更多。请相信，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除非是种种内战），战争都是一种过程，正是依靠这种过程才可以最少的流血、最少的悲戚和耗费最少的力量而达到国际的安宁以及大体上建立各民族间一定的正常关系。不言而喻，这是很可悲的，可是如果事情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与其无限期地受折磨，倒不如动一次武。比起战争，现在各文明民族之间的和平有什么好的呢？恰恰相反，是和平，是长时间的和平，而不是战争，把人变得凶狠和残忍。长期的和平总会产生残忍性、懦弱性和粗鲁的、过分膨胀的利己主义，而主要的，会导致智力的停滞。在长期的和平中只有各族人民的剥削者和刽子手们才能脑满肠肥。一再说什么，和平产生财富——但是，要知道，发财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而这十分之一的人染上这种财富病，又把这种财富病传染给其余的十分之九的人，尽管这十分之九的人没有财富，传染上的却是堕落和荒淫无耻。由于一些人手中过度积累了财富，就在这些财富占有者们的身上产生了粗野的感情。本来是细腻的情感变成任性和不正常的无节制的渴求，淫

欲可怕地发展着，淫欲导致残酷和怯懦。淫欲之徒笨拙而粗鲁的心灵比任何别的心灵，甚至比罪恶的心灵，都更残忍。有的看见割破手指流出的血就晕倒在地的淫欲之徒却不能饶恕一个穷苦可怜的人，并且会为了一笔小得不能再小的债务而送他去蹲监狱。残忍导致对自我保障的强化的、过分胆怯的担心，而这种对自我保障的胆怯的担心，在长期和平的年代，最终总要转化成某种为自身安全而产生的惊慌失措的恐惧，从而感染到社会各阶层，导致积累和掠夺金钱的渴求。丧失了对人们相互间团结互助、对友爱、对社会援助的信念，以致公开宣扬这样的纲领："人人为我，个个利己。"穷苦人看到的太多了，富人是什么人呢，是他什么样的兄弟呢，于是所有的人全都各自独处，与众隔绝。利己主义扼杀了慷慨大度，只有艺术还在社会上支撑着崇高的生活，并呼唤在长期和平中沉睡的心灵觉醒。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想出一种说法，即艺术只有在长期和平的年代中才能繁荣，其实，这是极其不正确的。艺术，也就是说，真正的艺术之所以正是在长久和平的时期中发展，正好在于它同沉沉昏睡于罪恶中的心灵分道扬镳，它总是用自己的各种创作在这种时期呼吁理想，发出抗议和愤慨，激发社会，而且往往迫使那些渴望觉醒和走出臭水坑的人们感到痛苦不堪。结果却是，归根结底，是由资产阶级的长久和平促使它自身产生进行战争的要求，由它自身导致战争这一不幸的结果，而且这已经不再是出于伟大的和正义的目的，合乎伟大民族尊严的目的，只不过为了某种可悲可叹的交易所的利益，为了剥削者们所需要的新的市场，为了钱袋拥有者们获得必不可少的新的奴隶——总之，这种战争的原因甚至用自我保障的要求也无法为之辩解，相反，其原因正好证明该民族的机体所处的变幻莫测的病态状况。那些利益以及为了那些利益而发动的各种战争，

毒化甚至完全毁灭了各族人民。与之相比，为了宽厚目的而进行的战争，为了解放被压迫者，为了无私和神圣思想而进行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却会净化积聚的瘴毒感染的空气，医治心灵，驱除可耻的怯懦与懒惰，宣布并建立目标，推出并说清楚一种思想，而实现这一思想的使命就落在这个或者那个民族的头上。这样的战争以自我牺牲的意识使每个心灵坚强起来，而以构成民族的全体成员相互团结一致的意识使全民族的精神巩固起来。巩固全民族的精神，主要的还是，履行义务和做好事的意识："我们还没有完全堕落和腐化，在我们的身上毕竟还有人性的东西！"那么请看吧，我们不久前那些热爱和平和仁爱的说教者们是从哪里开始他们的说教的：他们直截了当从最无人性的残忍开始。他们自己不想而且还要阻止别人去帮助受折磨的人们，帮助向我们求助的受苦受难者。他们看起来是那么仁爱和多愁善感，冷静并且讥讽地否定了依我们看来做出自我牺牲和建立精神功勋的必要性。他们想要把俄罗斯推到最鄙俗的和为一个伟大民族所不齿的道路上去，更不要去说他们鄙视受难的斯拉夫人是自己兄弟的感情，更不要说他们傲慢地脱离开人民的意志，反而把他们"西欧"文明的假货置于人民意志之上[①]。他们喜爱的纲要就是："对医生说，自己治好你自己。""你们跑去治病救人，而你们自己这里却甚至连小学校都没有建好。"——他们警告说。我们说："好吧，我们就去好好治自己的病。当然，学校是重要的事情，但是学校需要精神和方针，——我们目前正在积聚精神并获取健康的方针。而且我们一定会得手的，特别是如果上帝赐予我们胜利。那时我们归来时将带着我们完成了无私事业的意识，带着我们已用自己

① 这里指的是自由派人士对东方问题所持的立场与观点。

的鲜血光荣地为人类效力的意识，带着我们的力量和能量都已更新的意识——所有这一切都将取代不久前我们思想上的可耻的动摇，取代徒劳无益地借助‘西欧主义’的死气沉沉的停滞状态。主要是，我们将与人民交往并且将同人民团结得更加紧密，——因为只有在人民之中我们才能够找到医治我们两个世纪以来[①] 所患疾病的良方，抛弃我们两个世纪以来毫无效果的无用的药方。”

而且一般来说，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这个社会是不健康的和已经受到疾病感染的，那么即使像长久和平这样的好事，除了不会给社会带来益处，还会变成社会的祸害。这一点一般来说甚至也可以应用到整个西欧。在欧洲历史上，从我们所看到的时间起，一代人还没有过去，战争不断发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此，可以看出，战争为了某种原因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有益健康的，能使人类减轻负担。如果抽象地想一想的话，这当然是令人愤慨的说法，然而实践的结果却似乎的确如此，这正是因为对于受疾病感染的机体来说，甚至连长久和平这种好事也成了一种祸害。但是，有益的战争毕竟只是为了一种思想，为了崇高而宽厚的原则而进行的战争，而不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是为了贪婪的掠夺，不是为了傲慢的强暴而发动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只能把各民族引入歧途并且总是毁掉它们。如果不是我们，那么我们的后辈终将看见英国会是怎样一种结局。如今对于全世界所有的人来说，“时候快到了”[②]。是的，是时候啦。

---

① 指彼得大帝改革后的两百年间。

②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6 章，第 18 节）：“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们的时候快到了……”

一个荒唐人的梦[1] ·虚构的故事

(《作家日记》，1877年，4月号，第2章，Ⅰ)

Ⅰ

我是一个荒唐的人。现在他们把我叫做疯子。如果我对他们来说不是仍然像以前那样荒唐可笑的话，那么这就算是在官阶上给我提升了一级。不过现在我已经再也不会生气，我现在觉得他们所有人全都亲切可爱，甚至在他们讥笑我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时不知为什么甚至觉得他们还特别亲切可爱。如果不是因为我看着他们心里如此烦恼，我自己也会同他们一起笑的，——倒不是同他们一起讥笑我自己，而是因为我喜爱他们。我之所以烦恼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理，可是我却知道真理。啊，只我一个人知道真理，这是多么令人苦恼的事呀！但是他们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不，他们是不会理解的。

过去我曾经因为好像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人而非常苦恼。不是好像是，而是曾经是。我过去总是荒唐可笑，这我知道，可能我刚一降生就是如此。可能我七岁时就知道我是荒唐可笑的。随后我上学校读书，随后又上了大学，瞧着吧，我越是学习，我就越觉得自己荒唐可笑。因此对我来说我在大学学的全部最终仅仅是为了向我证明和说明，我越是深入钻研，我就越荒唐可笑。钻研学术是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随着一年年地过去，与我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荒唐可笑的模样相一致的

---

① 本篇有题解，见本卷(《作家日记》)附录。

意识荒唐，也就随之在我的身上增长和加强起来。所有的人总是嘲笑我，但是他们之中谁也不知道，也没有人领悟到，如果世上还有那么一个人比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荒唐可笑的，那么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因此我感到十分委屈，因为他们全都不清楚这一点，不过这也是我本人的过错：我总是如此高傲，从来也不曾想要对谁承认它。我身上的高傲感与日俱增，而且如果我真的哪怕在某人面前允许自己承认自己是荒唐可笑的，那么我就会觉得，立即会在当天晚上用左轮手枪击碎自己的脑袋。啊，我在少年时期是多么痛苦难忍，因为我忍不住突然就会向我的伙伴们承认自己是滑稽可笑的。但是，从我已经成为一个青年人的那时起，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到我的可怕的品质，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开始多少心平气和起来。正是不知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能够确定到底为什么。或许，这是因为有一种情况使我心灵里滋长起一种可怕的忧郁，这一情况无止境地高于整个我本人。这种情况就是，我获得了一种信念，我深信，世上到处都横竖一个样。我很久以前就对此有预感，但是充分的信念却是最近的一年突然之间出现的。我突然觉得，是否存在着世界，或者如果说到处都是空虚，对我来说横竖都是一个样。我开始全身心地去谛听和感觉，我身边什么东西也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然而以前却是有过很多东西的，可是随后我就领悟到，以前也是什么东西都未曾有过，只不过那时不知为什么似乎觉得有而已。逐渐地我又确信，将来也都什么也不会有。于是，我开始不再生人们的气，而且也开始不再觉察到他们的存在了。说真的，这甚至也表现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比如说，有时候，我走在大街上，会撞在人家身上。这并不是因为我陷入沉思之中，我没有什么好思考的，那时我早已不再思考问题啦！对我来说，横竖都是

一样。如果我解决了问题岂不就很好；啊，我连一个问题都未能解决，可是那些问题有多少呀！但是，对我来说，横竖一个样，因此所有的问题也都不翼而飞了。

因此，我也就得知了真理。我得知真理是在去年的 11 月，确切说就是 11 月 3 日，从那时起，我的每一瞬间我都清楚地记在心里。那是在一个阴暗的、最阴暗的傍晚，要多阴暗就有多阴暗。那时我于晚上十点多钟回家，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就曾想，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阴暗的时间。甚至在肉体上也是如此。雨整整下了一天，而这雨又是最寒冷最凄凉的雨，甚至令人感到恐怖，我现在还记得这一点，明显带有对人们的敌意，而这时，突然在十点多钟雨停了，开始了可怕的潮湿，比下雨的时候还潮湿和寒冷得厉害，而且一切东西都冒着某种水汽，大街上的每块石头上都冒这种水汽，只要从大街上往远处看，看一眼胡同，看到它的深处，那么每一条胡同里也都冒着水汽。我突然设想，如果煤气灯到处都熄灭了，那么可能会比较愉快些，而有了煤气灯，心里就感到郁闷得多，因为煤气灯把这一切都照亮了。这一天我差不多没有用午餐，从傍晚一开始我就待在一位工程师那里，他那里当时还有两位朋友。我一直沉默不语，似乎我让他们感到厌烦。他们说了些挑衅性的话，而且突然之间甚至激动起来。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对一切都无所谓，不过这样激动激动罢了。我突然就给他们把这一点挑明了，说道："先生们，听我说，要知道，你们对一切都无所谓。"他们没有恼怒，却都讥笑起我来。这是因为我毫无责怪之意说的，而且还因为对我来说无所谓，横竖都是一样的。他们也都看出来我横竖都一样，于是他们也都快活起来。

当我在大街上想着煤气灯的时候，我朝天空瞥了一眼。天漆黑得怕人，但是明显可以辨别出散乱的云朵，而在云团之间

是深不可测的黑斑。我突然在其中的一处黑斑上看见一颗小星星，于是我盯着不眨眼地看。这是因为这颗小星星给我提供了一种思想，我决定在当天夜里把自己杀死。杀死自己一事还在两个月以前我就下定决心了，而且尽管我很穷，我还是买了一柄非常漂亮的左轮手枪并在当天就把子弹上了膛。两个月过去了，手枪仍旧躺在抽屉里；但是对我来说横竖都一样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最终想要找一个动手的时刻，那将是并非横竖都一样的时刻，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这样一来，这两月之中，每天夜里当我返回家里时，我就想着要开枪自杀。我总在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现在这颗小星星提供给我一种思想，于是我决定，在这天夜里将必定执行。而为什么是小星星引起这一想法——我不清楚。

就在我注视天空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儿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肘。当时大街上已经空空荡荡，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影。远处有一个车夫在他的车上打瞌睡。小女孩儿大约有八岁，头上顶着一方小头巾，身上只穿着一件小连衣裙，全身上下被雨淋得透湿，但是我特别记住了她那双湿漉漉的破裂开口的鞋，而且现在我还记得。这双鞋子特别一闪出现在我眼里。小女孩儿突然开始拽我的胳膊肘并且呼叫。她没有哭，但是却仿佛断断续续说出来一些什么词，这些词她不能够顺畅地说出来，因为她浑身都冷得打着寒战。她不知为什么惊恐万分并且拼命地喊叫："妈妈！妈妈！"我本来要向她转过脸去，但是却一言不发并且自顾自继续走自己的路，然而小女孩儿却跑上来，拽住我，在她的喊声中响起了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在那些非常受惊怕的孩子们口里喊出来就意味着他们处于绝望之中。我了解这种声音。虽然她没有把她要说的话讲出来，但是我理解，她的母亲准是在某个地方生命垂危，要么就是她们出了什么意外，

因此她才跑出来叫人，找寻什么东西，好帮助她的妈妈。但是我没有跟她去，相反，我却产生了一种赶她走的想法。起先我对她说，她最好去找市长。但是她突然放下她的小手，上气不接下气地抽抽搭搭地哭着，继续在我旁边跑着，没有丢下我走开。后来我就跺了一下脚并朝她吼了一声。她只是叫喊说："老爷，老爷！……"——但是，突然她抛下我径直横过大街向前猛跑：那边也出现了某个行人，她显然是撇下我向那行人跑去了。

我爬上了我的住宅的第五层楼。我租住房东家的房子，这套房子还有一些房间。我的房间简陋而窄小，而窗户是阁楼上那种半圆形式的。我有一张方格花饰的沙发，有一张堆着书的桌子，两把椅子和一把安乐椅，这把安乐椅老掉牙了，然而却是伏尔泰式的。我坐下，点燃蜡烛并且开始思索。隔壁那间房子里继续发出嘈杂混乱的声响，这种嘈杂混乱的响声从前天就已经开始了。那边住着一个退役的大尉，他有几位客人——大约六个没出息的家伙，他们喝伏特加酒，用旧牌玩什托斯①牌赌博。昨天夜里他们那边曾经大打出手，我还知道，他们之中的两个人长时间相互揪对方的头发。女房东本想告发，但她害怕大尉，害怕得很厉害。在我们那些房间住着的其余房客中还有一位瘦小的女士，属于军官家眷之类的人，是外来户，带着三个已经病倒在房间里的孩子。这位女士和她的孩子们很害怕大尉，害怕到要晕倒的程度，他们整夜都吓得哆嗦着并不住地画着十字，那个最小的孩子由于惊吓还犯了某种病。这个大尉我大概也认得，他有时在涅瓦大街上拦住行人哭穷讨钱。人家都不雇他做事，但是奇怪的是（要知道，为此我现在才讲这

① 当时的一种纸牌赌博。

件事），大尉住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月里，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反感。当然，从一开始我就回避与他结识，何况他本人首次同我接触就感到乏味，但是不论他们隔壁怎样大呼小叫以及不论他们那边有什么事，——对我来说横竖一个样。我照样坐一个通宵，而且说真的，我根本听不见他们，——我把他们忘记到这种地步。每天夜里我一直坐到黎明而并不睡觉，此种情况已经有一年的光景。我在桌旁的安乐椅里坐整整一夜，什么也不做。我只是在白天才读书。我坐着，而且甚至也不去想什么东西，就让某些思想自由游荡。蜡烛一整夜都烧尽成灰。我静悄悄地坐在桌旁边，拿出手枪并把它放在我面前。我现在还记得，当我把它放好的时候，我曾经自己问自己："是这样吗？"接着十分肯定地回答自己说："是这样。"也就是说，我要开枪自杀。当时我明白，当天夜里我大概要对准自己开枪，但是到那一时刻我还要在桌旁坐多长时间，——这我当时并不知道。如果不是在街上遇到那个小女孩儿的话，我当然早已开枪自杀了。

Ⅱ

是这样的，尽管对我来说横竖都一样，但是，比如说吧，疼痛我还是有感觉的。如果有谁打了我一下，我还是感到疼的。在道德情操方面也同样如此，只要发生某种非常令人痛惜的事，那么也如同在我还没有在生活中感到一切都横竖一个样时那样，也会感到怜惜的。不久前我也感到了怜惜之情，对于一个孩子我必定会伸出援助之手的，可是为什么我又没有去帮助那个小女孩儿呢？这是由于当时出现的一种思想：当她拽我和呼唤我的时候，突然之间在我面前产生了一个问题，而我又未能予以解决。问题本来并不成其为问题，但我却大生其气。

我生气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已经决定要在当天夜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世上的一切对我来说现在岂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当是横竖都一样。但是为什么我却突然感到，我并非对一切都无所谓，并非横竖都一样，怜惜起小女孩儿来了呢？我还记得，我非常可怜她；对她的怜惜甚至使我感到某种古怪的痛苦，在我那种情况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说真的，我不能更好地表达当时我的那种稍纵即逝的感触，但是这种感触在我回到家里坐到桌旁的时候，又继续出现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种刺激早就不曾感受到了。如同流水一样，判断接着判断一个一个过去。有种感觉是明白无误的，如果我是一个人，而还不是一个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人，暂时也还没有变成一个毫无可取的人，那么我还活着，因此我就能够感到痛苦，能够生气，还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是，比如说，再过两个小时如果我自己将自己击毙，那么那个小女孩儿对我算得了什么，什么羞耻呀，什么世上的一切的一切呀，都关我什么事？那时我变成了一个零，变成了一个绝对的虚无的零。难道意识到我马上就完全不会再存在，因此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什么也将不再存在，——难道这种意识不会对怜惜小女孩儿的情感，不会对自己卑劣行为之后的耻辱感产生最微小的影响吗？要知道，我之所以跺脚，并且用粗野的声音对那个不幸的小女孩儿吼叫，就是要说："不只是我现在没有怜惜感，而且，如果我现在要干没有人性的卑劣行径，那我也是会去做的，因为再过两个小时一切也就烟消灰灭了。"您是否相信，为此我才吼叫了呢？对此我现在则深信不疑。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仿佛生命与世界系于我一身。甚至也不妨这样说，世界现在仿佛只是为我一个人而创建的。我只要将自己击毙，那么世界将化为乌有，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更不要说，很可能，我死之

后的确无论对谁来说一切也都不再存在，而且一旦我的意识破灭，整个世界立即也会如同幽灵一样消失，如同仅仅依附于我个人的意识而存在的附属物而熄灭，整个世界会不复存在，因为很可能，这整个世界以及所有这些人——只不过是我自己一个人而已。我现在记得，坐在那里并且一直盘算着，我把所有这些新的问题，这些一个接着一个紧密拥挤在一起的问题，颠过来倒过去，甚至完全翻转过来推敲，于是又想出了全新的东西。比如说，我突然有了一种奇异的想象，就是说，如果我以前曾经生活在月球上或者火星上，并且曾经在那里干过某种最无耻和最丢脸的事，能设想成多么坏就多么坏的事，并且因此在那里受到如此厉害的侮辱和名誉的败坏，以致这事有时恐怕只能在睡梦中、在噩梦中感受到和呈现出来，而假如随后我来到了地球，我还会继续保留我在另一星球上所干坏事的意识，除此之外，我还会明白，无论如何我再也不会返回到那边去了，那么，从地球上看着月亮，——我是否会感到横竖都一样或者不是呢？我是会为我的那种行为感到羞耻呢，还是不会？[①] 这些问题是无聊而多余的，因为左轮手枪已经摆在我的面前，而我也全身心地知道，这件事肯定将要发生，然而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急躁，于是我就狂怒起来。现在我仿佛已经不能够去死，因为得事先解决点儿什么事。一句话，是那个小女孩儿救了我的命，因为我的那些问题把开枪一事推远了。大尉那边的房间里这时也都静了下来，他们已经玩完了牌，正在安排就寝，只是还在嘟嘟哝哝和有气无力地相互谩骂。这时我却突然睡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竟然在桌旁的安乐椅里入睡。我是在我全然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入睡的。众所周知，梦

① 《群魔》中的尼古拉·斯塔罗夫金也曾为这个问题而深感不安。

是非常奇怪的东西：有惊人的清晰，有珠宝首饰般精细的雕琢，还可以跨越，比如说不知不觉中还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梦嘛，好像不是理性在驱使，而是愿望在驱使，不是头脑在驱使，而是心灵在驱使。与此同时，有时我的理性在梦境中又是在玩着多么精巧复杂至极的把戏啊！在梦境中理性会产生根本无法理喻的东西。比如说，我的兄长于五年前去世，有时候我就会梦见他：他参与我的事务，我们都很感兴趣，可是与此同时，在梦的全过程中我完全明白并且记得我的兄长早已去世并且入土为安了。他虽然是一个死人，可是却仍然在我身边并同我一起操办事务，这怎么能不让我感到惊异呢？为什么我的理智竟然能够让这种事情发生呢？不过行啦，还是让我来说说我的梦吧。是的，我做了这个梦，做了我的 11 月 3 日的梦！他们现在戏弄我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梦罢啦。但是，如果这个梦向我宣示了真理，难道是梦或者非梦不都横竖一样的吗？要知道，如果得知真理并且看见了它，那么你就明白这才是真理而别的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不管是睡着或者醒着。就让它是梦吧，让它是梦好啦，而你们奉为至宝的生命我却打算用自杀将它毁灭，但我的梦，我的梦，——啊，它却向我宣示了一种崭新的、伟大的、脱胎换骨的、强有力的生命！

请你们往下听。

Ⅲ

我说过，我好像是在继续思考着同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就昏然入睡了。突然我梦见我拿起手枪，坐着，直接把手枪对准心脏——对准心脏，而不是对准头颅；先前我原本决定必定对准头颅，也就是正对右边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将手枪置于胸腔之外，我迟疑了一两秒钟，我的蜡烛、桌子和我

对面的墙壁全都突然之间动了起来并且徐徐摇摆着。我赶忙开枪射击。

在梦中有时您会从高处跌落下来，或者会有人宰割您，或者会有人殴打您，但是您却从来也没有感觉到疼痛，除非是如果您自己不知为什么在床上的确碰疼或碰伤，那么您就会感到疼痛并且差不多总会因之而疼醒的。在我的梦境中也是如此，我没有感到疼痛，但是我觉得，随着我的开枪射击，我的体内一阵震荡，我周围的一切变得一片漆黑，一切都突然灭绝了。我仿佛变得又瞎又哑，就那样躺在一件硬邦邦的什么东西上，直挺挺地仰面朝天躺着，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而且稍微动一动都不可能。人们在周围来回走动着，叫嚷着，大尉声音低沉，女房东嗓门尖锐，——突然，又是一阵间歇，人们已经将我放置在钉死的棺木中。于是我感到棺木在摇晃，我判断着这件事，于是有一种思想破天荒第一次使我感到吃惊，就是我已经死亡，完完全全死亡，我明白这一点而且丝毫也不怀疑，我看不见，也不能动，与此同时我却有感觉并且还在进行判断。但是我很快就安于这种情况，如同通常那样，在梦境中，我不加争辩地接受这一现实。

接着人们就把我埋葬在土里。人们都离去，剩下我一个人，完完全全独自一人。我一动不动。以前，当我在现实生活中设想将我埋葬在土里的情况时，我总是把寒冷和潮湿这唯一的一种感觉同坟墓联系在一起。如今我也是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很冷，特别是双脚的脚趾前端，此外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我躺着，而且，很奇怪，——并不期待什么，无可争辩地接受这一事实，死人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但是很潮湿。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个小时或者几天，或者许多天，突然

透过棺木的盖子在我闭着的左眼上渗下一滴水，一分钟之后又落下一滴水，之后又是第三滴水，一直这样往下滴着，全都是过一分钟往下滴一次。突然在我的心中升起了极其不满的怒火，同时我也突然感觉到了肉体上的疼痛。“这是我受的伤，”我这样想着，“这是因为开了一枪，子弹就留在那里……”但是水滴每分钟一次还在直接往我闭着的左眼上滴。于是我蓦地呼唤起来，当然不是用嗓子，因为我不能动，而是用我的整个躯体向对我做这一切事的主宰者呼唤：

“无论你是谁，如果你存在，而且如果真有比现在所做的事更明智一些的某种东西，那么不妨让它在这里现身。如果你是为了我的不明智的自杀行为来向我进行报复——用我以后存在下去的怪模怪样和荒谬绝伦来报复的话，那么，你就该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把什么样的痛苦和折磨加到我的头上，都不能够与我将要默默感受到的这种蔑视相提并论，哪怕这种痛苦的折磨要延续几百万年之久……”

我呼唤过了就不再言语。深沉的沉默差不多持续了整整一分钟的时间，甚至又有一滴水落下，但是我无限而牢不可破地知道并且相信，一切必定会马上就改变。紧接着我的坟墓陡然裂开，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它是否被挖掘了开来，但是我被某种黑糊糊的、我不知其究竟的生物取出来，于是我们就出现在空间。我蓦地看见深沉的夜，从来、从来也未曾有过如此漆黑的夜！我们已经远远离开大地在空间飞行。我没有询问带我飞行的那个生物任何话，我在等待，我很高傲。我让自己信服，我并不害怕，一想到我并不害怕，我就欣喜若狂得不得了。我不记得我们飞行了多长时间，也无法设想。一切完成得都如同总是梦里常见的那样，都是按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生活和理智的法则进行的，最终则只停留在心灵所幻想到的那些点上。

我记得，突然我在黑暗中看见一颗小星星。“这是天狼星吗?”我忍不住突然问道，因为原本我并不想询问什么。“不是的，这是你往家里走的时候看见的在云朵中间的那同一颗星星。”带着我飞行的那个生物回答我说道。我知道，那个生物有一副仿佛是人的面容。真是怪事一桩，我并不喜欢那个生物，甚至对它感到很厌恶。我之所以向自己的心脏开枪，原本想得到完完全全的不存在。可是现在我却落在一个生物的手中，当然它并非是人，但是它存在、生存着：“那么，在阴间也有生命!”我以一种奇特的梦境的轻率这样想，然而我心灵的实质仍然同我一起停留在最深层。“如果还需要生存，”我想道，“而且还要听凭某人摆脱不掉的意志而活着，那么我不想让人们挫败我并且损害我的尊严!”“你知道，我怕你，因此你才蔑视我!”我突然对我的同行者说道，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提出了这个蕴含着我的自供的有损尊严的问题，这时我感到我的屈辱感如同一根针扎在我心中。同行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不过我突然感到人家并不蔑视我，而且也没有讥笑我，甚至也不怜惜我，我还感到我们的行程有其只涉及我一个人的、不可知的和神秘的目的。在我的心中恐怖感在增长着。有某种东西哑然无声，但它却从我的沉默不语的同行者身上痛苦地传给了我，而且仿佛穿透了我。我们在黑暗与不知去处的空间飞行，我早已看不见我的眼睛所熟悉的星辰了。我早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些星辰在天空间，它们的光芒只有经过几千年和几百万年之后才能到达地球。可能我们已经飞越过这样一些空间。我在可怕的、折磨着我的心的苦闷中期待着什么。接着突然有一种熟悉的并且极其引诱人的情感震动了我：我突然看到了我们的太阳！我知道，这不可能是我们那个太阳，不可能是生育我们的地球的那个太阳，我还知道，我们距离我们那个太阳隔着无边无际的空

间，可是我不知为什么以我的整个身心认出了这同我们那个太阳是完全一样的太阳，完全是它的一个复制品。甜蜜的、引诱人的情感使我的心兴高采烈，生育过我的那种亲如血肉的光的力量回荡在我心中并使我的心复活了，于是我感到了生命，在我被埋入墓穴之后，首次感到了过去的生命。

“如果这是太阳，如果这就是如同我们的那个太阳一样的、完完全全是那样的太阳，”我叫喊道，“那么，地球在哪里？”于是，我的那位同行者指给我看一颗小星星，它在黑暗中发着绿宝石般的光芒。我们直接向它飞去。

“难道在宇宙中竟可能有重复的事物，难道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的吗？……而且如果那边果真也是一个地球，与我们的地球一模一样的地球……完全与我们的地球一样，也是一个不幸的、可怜的但却是珍贵的和永远受爱戴的地球，而且也如同我们的地球一样，甚至使自己的最知恩不报的孩子们对自己也怀有那种折磨人的爱吗？……”由于遏制不住对以前那个与自己血肉相连而又被我弃之而去的地球的挚爱之情，我激动不已，不禁叫喊起来。那个我曾得罪过的可怜的小女孩儿的形象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下。

“一切你都会看到的。”与我同行的那个生物回答我说，听得出来，在他的话语中含有某种悲哀。

但是我们已经很快地靠近了星球。它在我的视野里渐渐扩大，我已经能分辨出大洋、欧洲的轮廓，突然之间，某种伟大的、神圣的妒忌之奇怪情感在我的心中燃起：“怎么可能有如此类似的重复出现呢，而且为了什么？我喜爱，我能够喜爱的只有那个我舍弃了的地球，在那个地球上留有我溅洒的血，那血是我这不仁不义的人向我的心脏开枪射击、熄灭我生命时流淌的。但是我从来、从来也没有停爱那个地球，甚至在离开它

的那一夜也仍然爱着它，可能比任何时候都爱得更为心痛。在这个新的地球上有没有痛苦呢？而在我们那个地球上要真正地爱只可能是痛苦地去爱，而只有经由痛苦才能爱！否则我们就不会爱而且也不知道还有另外的一种爱。为了去爱，我甘心忍受痛苦。我希望、我渴求即刻就去亲吻，泪流满面地只去亲吻那我所舍弃了的唯一的地球，而不愿也不想要在别的无论什么星球上接受生命！……”

但是我的同行者已经把我丢下离去了。我突然完全不知不觉地站在另一星球仿佛天堂一样灿烂、美好的阳光中。我站着，好像是站在群岛之中的一个岛屿上，在我们的地球上，这群岛屿构成希腊列岛①；或者是在靠近这列岛的某处大陆海岸上。啊，一切都同我们那里一模一样，只不过到处都光辉灿烂，洋溢着某种节日气氛，而且恢弘、神圣，以致最终达到庄严的境界。亲切的绿宝石般的海水静穆地拍打着海岸，并且以显而易见的、明白无误的、差不多有意识的亲吻来爱抚海岸。高大、美妙而又繁花似锦的树木贮立在那里，我确信，它们数不清的可爱的叶片正以其恬静的、亲切的声响欢迎我，而且仿佛还在说着某些爱意的话语。繁茂的嫩草盛开着鲜艳芬芳的花朵，小鸟成群地在空中飞过，它们并不害怕我，还停在我的肩上和手上，还用它们可爱的、颤动的小小翅膀高兴地拍打我。最后，我终于看见并且认出了这块土地上的幸福的人们。他们自己跑来找我，他们把我团团围住，亲吻我。太阳的孩子们，属于自己的太阳的孩子们，——啊，他们是多么得漂亮啊！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在人的身上有如此的美。除非只是在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上，而且是在他们的幼年，才可

① 在爱琴海，是欧洲文明的摇篮。

能找到这种虽然微弱但却是来自远方的美的反光。这些幸福的人们，眼睛闪耀着明亮的光芒。他们的面容以其理智和饱含着宁静的意识而光辉照人，这些面容都是欢快的；在他们的言谈里和嗓音里可以听出孩子般的欢乐。啊，我一看到他们的脸庞马上就明白了一切的一切！这是一块没有受罪恶玷污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没有沾染过罪恶的人，就如同有关全人类的传说中说的，我们沾染了罪恶的祖先也曾经生活在与这里一样的天堂里，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在这里整个大地到处都一概是天堂。这些人们全都高兴地笑着紧紧围着我并且抚爱我；他们把我领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极想让我安下心来。啊，他们并没有向我询问什么，但是仿佛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反正我是这样感觉的，他们还极想尽快驱散我脸上的痛苦表情。

Ⅳ

你们知道吗，就算这毕竟只不过是一个梦！但是这些天真无邪而又十分美好的人们对我挚爱的感触却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而且我也感觉到，他们的爱意如今还仍然源源不断地从那里向我涌来。我亲眼看见过他们，我认识了他们，而且确信我爱上了他们，后来还为想念他们而深感痛苦。啊，我甚至在当时就立即明白，在很多方面我根本不理解他们；我这个当代的俄国进步分子和卑贱的彼得堡人，比如说吧，感到不得其解的是，他们虽然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却没有我们的那种学术。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他们是用别样的洞察力来充实和培养他们的知识的，这与我们在地球上的做法是不同的。我还明白，他们的追求也完全是异样的。他们毫无所求并安之若素，他们并不如同我们那样竭力要去认识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充实

的。但是他们的知识比我们的学术更深刻，更高超；因为我们的学术在寻求什么是生活的解释，我们的学术本身力求认识生活，以便教育别人怎样度过一生；他们则用不着学术也知道怎样去生活，这一点我也弄清楚啦，只是我还未能理解他们的知识。他们向我展示他们的树木，可是我却没有能够理解他们注视着这些树木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挚的爱的程度：正像他们不是对树木说话，而是像对类似于自己的生物说话。要知道，如果我说，他们是在同它们谈话，可能我也没有弄错！是的，他们发现了它们的语言，我深信，这些树木也懂得他们说什么。他们也正是这样来看待整个自然界的——也是这样来对待与他们和平相处的动物的，动物都因他们的爱抚而变得驯服，从来不袭击他们。他们指给我看天上的群星，还向我讲述我弄不懂的有关星星的某些东西，不过我确信，他们仿佛用什么办法与星星有所接触，不仅仅是依靠思想，而且还通过某种活的途径[①]啊，这些人也没有一定苛求我理解他们，用不着做到这一点他们也都爱我，而且我也知道，他们也永远不会理解我，

① “荒唐人”在这里讲述的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玛神父有较详细的发挥，他说，人世间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知晓，可是我们却天赋一种神秘的感触，能同另外一种世界联系，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植根于另外的世界里。这就是那些哲学家们所说的事物的实质并不在我们这里，而在另外的世界。上帝从另外的世界取来种子在人世间种植起自己的园子，于是发生了能够发生的一切。被种植的东西得以生存，全在于自己同神秘的另外世界的接触的情感。如果这种情感削弱或消失，那么种植在你身上的东西也就死亡。（详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部，第3卷，第3章）后来在同书的《加利利的迦拿》一章中，对佐西玛神父的这一教诲的“真知灼见”有进一步的阐述：仿佛上帝创造的所有另外世界的千百条线索一下子聚集到了他的心灵，他的心灵也因“同另外世界的接触”而欢呼雀跃起来。（详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部，第1卷，第4章）

因此我也就差不多没有对他们讲过有关我们地球的事。我只是当着他们的面亲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那方土地，并且无言地崇拜他们本身，他们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并且不拒绝我对他们的崇拜和宠爱，他们并不因为我崇拜他们而感到有愧，因为他们自己也都有很多东西要宠爱。当我泪流满面地匍匐在地亲吻他们的双脚时，同时在心中高兴地知道，他们会用怎样的爱的力量回报我，他们并不为我而感到痛苦。有时我惊讶地问我自己：为什么他们总是能够做到不伤害像我这样的人，而且一次也没有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激发羡慕和忌妒之情？我还多次问过我自己，像我这样一个吹牛皮大王和江湖骗子，怎么竟然能够不向他们讲述他们当然不会理解的我的学识，怎么能够不想用我的学识让他们感到惊愕，或者哪怕仅仅出自对他们的钟爱而不这样做呢？他们如同孩子一样活泼、欢快。他们在他们十分美好的树丛和森林间漫游，他们唱他们十分美妙的歌曲，他们吃清淡的食物，他们用他们树木上的果实，用他们树林中的蜂蜜以及他们宠爱的动物的乳汁来充饥。为了取得自己的食物和为了获得自己的衣着，他们只从事少许轻松的劳动。他们也有他们的爱情，也生儿育女，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在他们身上看见过那种残酷情欲的发作，而这种残酷的情欲差不多都落到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头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份，而且它成为我们人类差不多全部罪恶的渊源。[①] 他们为他们那新出生的孩子而感到高兴，他们视这些孩子为他们幸福生活的新的参与者。他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忌妒，而且他们甚至也不懂得这些东

① 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开始，情欲主题就是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的主题之一。此处“荒唐人”有关情欲的言论与卢梭在论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中关于情欲的言论相近。

西是何物。他们的孩子是大家共有的孩子，因为他们大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大家庭。他们虽然也有死亡，但是却没有什么疾病；他们的老年人死得寂静安详，仿佛是要睡觉，弥留之际，前来与他诀别的人们守候周围，垂死的人祝福他们，向他们微笑，而来送行的人们也用粲然的笑容相对。在这种场合我从未看见过悲悲戚戚和泗泪横流的情景，有的只是倍增到欣喜般的挚爱之情，而这种欣喜是平静的，有内涵的，达观的。可以认为，他们同死者甚至还有接触，死亡并没有断绝他们之间在尘世的团结一致。当我向他问及永生这个问题时，他们差不多并不理解我说的是什么，但是他们显然非常本能地确信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在他们那里没有庙宇，但是他们同宇宙整体却有某种必不可少的、活生生的以及持续不断的一致；他们没有信仰，然而他们有的是牢固可靠的知识，一旦他们尘世的欢乐充盈到大地上自然界的极致时，那时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对于活着的人，也无论是对于已经死去的人来说，他们同宇宙整体的交往也就会更加扩展。他们兴高采烈地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但是他们并不匆忙行事，并不为等待而焦急，仿佛在他们心中预感到它的来临，关于这种预感他们相互交流着。每当傍晚降临，离去就寝时，他们喜欢组成调协一致而齐整和谐的合唱队。在他们的歌曲中表达的是过去的一天留给他们的感受，他们歌颂这一天，并同这一天告别。他们歌颂大自然、大地、海洋、森林。他们喜欢编撰歌曲，在歌曲中相互讲述对方，而且如同孩子一般相互夸奖对方；他们的歌曲都是些最普通的歌曲，但是它们却是内心的流露，而且动人心扉。其实也不只是在歌曲里是如此，终他们的一生他们都是在相互欣赏中度过的。这其实是某种相互之间的爱恋之情，一种完美无缺的、全体共有的爱恋之情。他们的一些庄严而又热情

洋溢的歌曲我几乎是根本不懂的。虽然懂得这些歌曲的词意，但是却从来也未能深入了解它们的意义。其意义是我的智慧无法探求的，然而我的心却越来越无意识地对它有所领悟。我常常对他们说，我从前早就预感到所有这一切，还在我们那片土地上时所有这种欢乐和美好事物都在我面前出现过，但那是作为诱惑人的忧郁出现的，这种忧郁有时竟成为难以忍受的悲伤；我还预感到他们所有的人以及他们的美德，不过这都是在我的心灵的梦境中和我的头脑幻想中的事，在我们的那方土地上，我还常常不能不流着眼泪看那西沉的太阳……[①] 在我对我们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憎恶中永远包含着一种苦恼：既然我不爱他们，为什么我却又不能够憎恶他们，为什么我又不能不宽恕他们，而在我对他们的喜爱中也有苦恼？既然我不憎恶他们，为什么我却又不能够爱他们？在我向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倾听着我的话，但我看得出，他们想象不出我究竟说的是什么，但是我并不懊悔我对他们说的这番话：我明白，他们理解我对我所遗弃了的人们所怀的苦恼有多大。不错，当他们用他们那种亲切的、满含爱意的目光看我的时候，当我感到在他们面前连我的心也变得如同他们的心那样非常无邪和真诚的时候，我也就不再因我并不理解他们而感到遗憾了。由于体验到生活的充实，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我默默地宠爱他们。

啊，现在所有的人都当面讥笑我，并要说服我，在梦里不可能看得那么仔细，不可能看到如我现在描述的那样的详情细节，说在我的梦境中，我看到的或感觉到的只不过是我的心在神志不清时的一种感触，至于详情细节则是我睡醒后臆想出来

---

① 此处的说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经常出现的与黄金时代密不可分的一种象征。

的。而当我向他们照实说，可能实际上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时，——上帝啊，他们当着我的面又爆发出多么大的笑声，我又为他们提供了多么大的欢乐呀！不错，我只是被那一种梦境感触所征服，而这一感触是我伤得淌血的心里唯一的残留物。然而，我的梦境的实实在在的形象和形式，也就是说，在我做梦时实际上看见的那些形象和形式，是如此和谐，是如此具有魅力和如此美好，又是如此真实，以至在我睡醒以后，想把它们体现在我们这软弱无力的语言上，我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它们一定会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模糊不清，这样一来，的确很可能我自己也就无意识地不得不在事后臆想出详情细节，特别是由于我极想尽快地、哪怕多少将它们讲述一点给别人听，从而对它们有所歪曲。可是，我怎能不相信这一切都是曾经有过的呢？可能那些事比我现在讲述的好上一千倍，光辉灿烂并有趣一千倍呢？就算这不过是一个梦，但这一切不可能没有存在过。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所有这一切，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梦！因为，这里的确发生过某种事，某种非常可怕的真实的事，而这事是不可能在梦中见到的。就算是我的梦生出了我这颗心，但是难道我这一颗心有能力生出那种惊人的真实的、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独自一人如何能够臆造出或者凭心思幻想出它来呢？难道我这颗卑微的心以及我这个变化无常的、浅薄的头脑能够变得如此高超而至于发现真理吗？啊，请你们自己判断吧。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隐瞒着，现在我要把这件真实的事讲出来。事实是，我……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腐化堕落！

V

是的，一点都不错，结果是我把他们所有的人全都变得骄

奢淫逸、放荡不羁了！这怎么会发生呢？——我不知道，我记不清楚。我的梦经历了几千年而只给我遗留了一种整体的感触，我只晓得陷于罪恶的原因在我的身上。如同一条令人恶心的旋毛虫一样，如同会传染整个整个国家的瘟疫病原体一样，我自身就这样让这块幸福的、在我来到之前没有罪恶的土地受到疾病的传染。① 他们学会了说谎，而且爱上了谎言并认识到谎言之美。啊，很可能，开始的时候这是无邪的，不过是开开玩笑，卖弄卖弄风骚，玩玩可爱的游戏，很可能，事实上不过从原子开始，但是这个谎言的原子渗透到他们的心里并受到他们的喜爱。之后，很快就产生了情欲，情欲产生了忌妒，忌妒产生了残酷……啊，我现在不晓得，不记得，但是很快、非常快地溅洒出了第一滴血：他们感到吃惊，他们对此感到恐怖，于是开始散开去，各自独居起来。接着出现了各种联盟，联盟之间相互对抗。开始了相互的责难，对骂。他们得知羞耻是怎么回事，由羞耻上升为善行。产生了关于荣誉的概念，于是在每一个联盟中都扬起了各自的旗帜。他们开始折磨起动物来了，于是动物都纷纷远离他们逃到森林里去并变成了他们的仇敌。开始了为分裂、为独行其是、为维护个性而争斗，为争夺你的和我的而搏击。他们开始用不同的语言说话。他们体验了悲哀，并且爱上了悲哀，他们渴求受苦受难，而且还说，真理只能用受苦受难得到。于是在他们那里出现了学术。当他们变得凶狠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讲述博爱和仁慈，而且随之也就理解了这些词的概念。当他们开始犯罪时，他们就发明了公平，并为自己颁布了整本整本的法典，以此来维护公平，而为了保

① 此处的说法部分地可追溯到《罪与罚》的“尾声”中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启示录性质的梦。

证法典的执行，就设置了断头台。他们只是勉勉强强还记得他们失去的是什么，甚至也不愿相信他们过去曾经是清白无邪的和幸福的。他们甚至讥笑他们有过去这种幸福生活的可能性，并且将它称为幻想。他们甚至不能够设想出这种幸福生活的形式和模样；不过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的事是：既然丧失对过去曾有过的幸福生活的任何信念，既然还把它称之为童话故事，他们却非常想要重新、再一次成为清白无邪和幸福的人，以至于他们如同孩子们一样，顶礼膜拜起他们心灵的意愿来了，把他们的这种意愿神化，建造了很多很多的庙宇并开始向自己的思想、向自己的“意愿”祈祷。与此同时，却深信它是不可能付诸实施和不可能得到实现的，然而又泪流满面地崇拜它和膜拜它。但是，如若能实现他们返回到他们失去的清白纯真和幸福的状态的愿望，如若有谁果真突然能够把过去的那种状态重新拿给他们看并且问他们：他们是否还愿意回到过去的那种状态去——那么他们大概会说他们不愿意的。他们曾经回答我说：“就算我们说谎骗人，凶狠而不公正，我们知道这一点，并为此而悲泣，我们自己也为此而遭受折磨，我们为此残忍地虐待自己、惩罚自己甚至可能比那个慈悲为怀的法官更严厉，这位法官将审判我们，他的名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有学术，通过学术我们将重新找到真理，那时我们将自觉地接受真理。知识高于情感，生活的感知——高于生活。学术为我们开启绝顶的智慧，绝顶的智慧又为我们发明法则，而幸福法则的知识——则高于幸福。”这就是他们说的话，在讲述了这些话之后，他们每一个人爱自己远胜于爱别人，他们也不能够有别样的做法。他们每一个人都抱着自己的个性不放，同时又竭尽全力贬低和作践他人的个性，并认为自己的生活意义就在于此。出现了奴役，甚至出现了心甘情愿受奴役的情况：弱小无

能的人乐意对强大有势的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其目的只是为了后者能有助于他们欺压比他们更加软弱无助的人。出现了一些德行端正之士，他们来找这些人，含着眼泪劝导他们，指出他们的傲慢、轻率妄为和不知与人和睦相处，以及他们的丧尽羞耻等等。但是大家却讥笑这些贤人，并且还投掷石块打他们。神圣的血流淌在庙宇的门槛上。然而，也开始有些人在思考：如何才能够重新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如何才能够使每一个人在不放弃爱自己胜似爱别人的情况下，同时也不要妨碍别人，从而大家能够一起生活在那么一种协同一致的社会中。为了这种思想的实现，一次一次的战争发生了。那时所有参与战争的人都坚定地相信，学术、绝顶的智慧和自卫的情感最终会迫使人团结成一个协调一致的和理智的社会，因此，在目前，为了加快此事的进程，"聪明绝顶的人们"就要竭力尽快消灭所有"不太聪明的人们"和那些不理解他们这种思想的人们，免得他们阻碍这一思想的胜利。但是自卫的情感很快又变得软弱无力，出现了傲慢之徒和情欲之徒，他们径直追求一切或者一无所求。为了掠夺一切，他们不惜借助残暴手段，而如果不能得手——他们就退而自杀了事。出现了崇拜虚无和为了在卑贱中获得永世安宁而自我毁灭的种种宗教。最后，这些人疲于他们毫无意义的努力，在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于是这些人就大张旗鼓地宣扬说，痛苦是一种美，因为只有在痛苦中才有思想。他们就在自己的歌曲中赞美痛苦。我当时来往于他们中间，痛心疾首，为他们痛哭流涕，但是我还爱着他们，可能爱他们爱得比以前更甚，比他们脸上还没有出现痛苦表情时，比他们纯真无邪而非常美好时，我更爱他们。我也爱上了被他们玷污了的这块土地，而且爱得比它曾经是天堂时更强烈，这只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了苦难。唉，我总是喜爱苦

难与哀伤，不过那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自己而已，可是我却为他们伤心地哭泣，我怜惜他们。我向他们伸出双臂，怀着绝望的心情拥抱着他们，同时诅咒和蔑视自己。我对他们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干的，都是我一人所为，是我把放荡、传染病和谎言带给了他们！我恳请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教给他如何制作十字架，我不能够、我没有力量自己杀死自己，但是我情愿接受他们对我的折磨，我渴求受到折磨，我渴望在折磨中流尽我的血。可是他们一味讥笑我，最后，开始把我当成苦行癫僧看待。他们证实我是无辜的，他们说，他们从我这里接受的只不过是他们愿意接受的东西，而现在存在的所有这一切的一切是不可能不发生的。最后，他们向我宣布说，我成了一个危险人物，往后如果我再不闭上我的嘴，他们就要把我关进疯人院里去。于是，悲哀就如此强烈地袭入我的心灵，以致我的心脏紧缩起来，我感到我就要死去啦，接着……嗯，接着我就从梦中醒了过来。

已经是早晨的时光，也就是说，天还没有大亮，大约五点多钟。我醒来时依然待在安乐椅里，我的蜡烛全都燃尽，大尉那边人们还在睡梦之中，周围是我们这住宅中罕有的寂静。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惊愕地一跃而起；我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即便是类似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也都未曾有过。比如说，我还从来没有在我的安乐椅上睡过。这时，突然之间，当我站在那里并逐渐清醒过来时，——突然，我的左轮手枪出现在我的眼前，它是装上子弹备用的，——可是我一瞬间就把它从我身边推开！啊，现在要活着，要活着！我举起双手并大声呼唤永恒的真理；不是大声呼唤，而是哭喊起来；欣喜若狂，无比的欢乐之感振奋起我全身的生命力。是的，生活，而

且——去传道！关于传道一事我在那一刻马上就决定了，而且，当然，要终此一生而为之！我要去传道，我想去传道，——传什么道呢？要宣讲真理，因为我看见过它，我亲眼目睹真理的万丈光芒！

就打那时开始我一直在传道！除此之外——我还爱所有的人，爱那些讥笑我的人，而且爱他们胜过爱别的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我不知道，也不能说清楚，但是就让事情如此这般吧。他们说我现在总犯糊涂，也就是说，我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糊里糊涂，那么这样下去又将怎样呢？千真万确，我现在是糊里糊涂，而且很可能越往后就越坏。当然，在我探索到如何传道，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语言和什么样的实事来宣讲的时候，我是要有那么几次前言不搭后语的，因为宣讲教义这件事做起来也是很困难的。要知道，我现在对此事如同白昼一样看得明明白白，不过，请听着：有谁又不出差错呢！与此同时，要知道，所有的人都奔向同样的标的，最起码都竭力奔向同样的目标，从聪明人到最不齿于人类的强盗莫不如此，只是其途径各异罢了。这是一个老掉牙的真理，但它的新意现在就在于，我出的偏差不可能太厉害。因为我见到过真理，我看见过并且知道，人们能够成为十分完美和幸福的人，而且决不会因此失掉他们在大地上生存的能力。我不想也不能够相信，恶是人们正常的状态。可是，他们所有的人却正只是拿我的这一信念而讥笑我。然而我又如何能不相信我看见过的真理，——这并非是我头脑的发明，而是我看见过的，是我目睹的，它的活生生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灵中。我曾看见它是那样完美无缺，以至我不能相信它不会存在于人们中间。那么，我究竟怎样会糊里糊涂的呢？当然，有几次我会走题，甚至还可能说些别人说的话，但是这种情况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我所看见过

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将永远同我在一起，而且也将永远改正我和指引我。啊，我精神饱满，我神志清醒，我要去，我要去，哪怕要走上千年。要知道，我原本甚至想隐瞒我使他们所有的人都腐化浪荡一事，不过那是一个错误，——这是第一件错事！真理向我耳语，说我在撒谎，它守护着我并矫正我。可是如何建造天堂——这我不清楚，因为我不会用语言来表达。在我做过梦之后，我丧失了语言。起码是我丧失了主要的语言，最需要的语言。即使如此，我要去，还将继续说下去，不知疲倦地说下去，因为我毕竟亲眼目睹过，尽管我不会转述我看见过的东西。而这也正是那些讥笑人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说是做了一个梦，胡话，幻觉。"嘿！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绝顶聪明？可是他们却如此高傲！梦？梦是什么？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一场梦？让我说得更多一点，就算是这样，就算这一切永远不会实现，根本不会有什么天堂，（要知道这正是我理解的！）——嗯，但我仍旧要去传道。与此同时，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只需要一个小时——一切就会立即安排妥当！主要的就是——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所有的人，这就是主要的①，一切的一切就在于此，别的什么全都没有必要，你立即就会找到如何安排的办法。与此同时，这也只不过是一个老掉牙的真理，人们上十亿次地读到过它并且也重复说到过它，但它却如同过眼的烟云不留痕迹！"生活的感知高于生活，幸福法则的知识——高于幸福"——这就是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的东

① 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 12 章，第 31 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重要的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众多主人公以及作者本人来说，"要爱人如己"这条基督的诫命是真理，尽管这一诫命行不通，对于当代人它甚至还违反人的天性。

西！我将与之斗争。只要所有的人都愿意，那么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

而那个我在街上遇见的小女孩儿我已经探听到了……我要去！我就要去！

摘自约翰·李赫坚别尔格尔的预言1528年[1]

（《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1章，Ⅰ）

我得悉一份最古老的文件。不错，这是一份古老的、含混而具有寓意性的、有关当前事件和有关当前这场战争的预言文件。我们的一位青年学者[2] 在伦敦，在皇家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古老的大部头的《预言之书》，即约翰·李赫坚别尔格尔的《Prognosticationes》，1528年出版，它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这是一本罕见的书，甚至很可能还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一本书。在这册书中，一幅幅模糊不清的画面描述的，是欧洲和人类的未来。[3] 书是神秘性的。现在我只在这里转载我所得悉的几行，只是作为一件事实，一件不无某种兴趣的事实。

---

① 这里所说《预言之书》显然是指收藏于不列颠博物馆那册1528年出版于科隆的书。

② 这里大概指的是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53—1900）。他是俄国宗教哲学家、诗人、政论家。

③ 李赫坚别尔格尔的生平不详。从《预言之书》的书名（原文是一则很长的标题——译者）看，它是对未来几十年的星相术预告。最先它于1488年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用拉丁文出版，后来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多次用拉丁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当时在西欧很流行。尽管李赫坚别尔格尔的《预言之书》具有神秘主义的抽象性，但是它却与时代紧密结合。它出现在剧烈的社会危机时期，出现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夕，即出现在16世纪群众性反天主教、反封建的重要时期。那时，普遍对未来寄予希望并对未来怀有恐惧感，这些都反映在种种预言之中。后来，对此书的兴趣减退。不过，17世纪和18世纪也有此书的版本印行，如在英国和荷兰曾出版过此书，其目的只是为了结合当时的现实，利用李赫坚别尔格尔《预言之书》的星相术做出新的推论。

在有关法兰西革命(1789年)的预言以及在有关拿破仑一世——他在书中被称为伟大的鹰(aquila grandis)——的预言之后,接着是这样讲述未来的事件的:

Post haes veniet altera aquila ignem fovebit in gremio sponsae

在这只鹰之后,又将要到来另外一只鹰,它将掀起基督未婚妻胸怀的火,

Christi et erunt tres adulteri unusque legitimus qui alios vorabit.

还将有三只类似的鹰和一只合法的鹰,后者将把其余的鹰统统吃光。

Exsurget aquila grandis in Oriente, aquicolae occidentales moerebunt.

一只伟大的鹰在东方将奋起抗争,西方的岛民们将痛哭失声。

Tria regna comportabit. Ipsa est aquila grandis, quae dormiet annis multis, refutata resurget et contremiscere faciet

它将强占三个王国。这是一只伟大的鹰,它沉睡已经有许多年,这只被击伤的鹰将奋起抗争。

aquicolas occidendales in terra Virginis et alios montes Superbissimos et volabit ad meridiem recuperando amissa.

并将迫使贞女土地里的西方水上居民们以及别的一些最傲慢的顶峰战栗。

Et amore charitatis in flammabit Dens aquilam orientalem volando ad ardua alis duabus fulgens in montibus christianitatis.

它还将飞往南方,以便收复它丧失的东西。上帝将以仁慈的爱心激励这只东方的鹰,而它则闪耀着双翼在基督教的顶峰迎着艰难奋飞。

当然，说得含含混混，然而，不能不同意，“伟大的东方之鹰，沉睡已经许多年，而且曾经被击伤（注意：是否指二十二年前我们同欧洲的那次战争[①]），将奋起抗争并将迫使西方的水上居民战栗。”——不能不同意，这仿佛有些像当今的事态，不言而喻，我们那些西欧化的聪明人不在此列。这些欧化的聪明人至今仿佛还在“水上居民们”的面前战栗着，正好与上述的预言反其道而行之。与此同时，那鹰则已经飞去，“闪耀着双翼”。但是，战栗的只是那些聪明的人们，而不是那只鹰。接下去是“贞女土地里的西方水上居民”，如果把约翰·李赫坚别尔格尔的预言附会到当今的事件上面，显然，这里指的是英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要说“贞女的土地”呢？在1528年时，还没有伊丽莎白女王[②]。约翰·李赫坚别尔格尔的寓意是否指一次也没有遭受过入侵的土地（大不列颠群岛），也就是拿破仑关于欧洲那些曾经遭受过他的入侵的首都所说的话的意思，他说道：“遭受过入侵的首都像一个失去自己贞操的姑娘。”[③] 但是，据预言说，那鹰也将迫使另外一些“最傲慢的顶峰”战栗，要向南方飞去收复它丧失的东西，而且——极其妙不可言的是——“上帝将以其仁慈的爱心激励东方的鹰，它在基督教的诸顶峰之上闪耀着双翼迎着艰难奋飞。”不能不同意，这其实甚至有某种非常切合时宜的东西。难道不正是我们的鹰被仁爱之心激励着向受压迫者和受折磨者飞去？难

① 指1853—1855年的克里木战争。

② 此处指的是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她于1558年登基为英国女王。

③ 这是拿破仑于1812年8月在斯摩棱斯克对俄国被俘将军П. А. 图奇科夫（1775—1858）说的话。列夫·托尔斯泰曾在《战争与和平》中引用此话。

道不正是基督仁慈的爱心推动了我们的全体人民在去年和今年“迎着艰难的事”而前进？谁又能够不承认这一点呢？然而这种人民，这些来自不知其动机的人民的士兵们，却在克里木，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把受伤的法国人先于自己的俄国伤员抬起来并送他们去进行包扎：“让那些俄国伤员先躺一会儿并且等一等，任何人都会来救助俄国人的，而法国佬嘛是外人，应该先可怜可怜他。”难道这里不正是基督在起作用，在这些心地忠厚的和宽大为怀的玩笑般说出的话语中不正有基督的精神？那么，在我们的人民——在我们大字不识但善良的，愚昧但却并非野蛮的人民中，难道不正有基督的精神？当雄鹰“迎着艰难的事业”飞去时，不错，基督就是它的力量所在，就是现今我们俄罗斯力量的所在。与当前我们人民中人所共睹的真真实实成千上万表现基督精神的事实（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那些聪明人一直竭尽全力压制和扼杀我们人民全身心地参加俄罗斯和东方现今命运攸关的事业）相比，上述那一件有关塞瓦斯托波尔城下士兵的趣事又算得了什么呢？请不要指点说什么人民的“兽行和迟钝”，说什么人民的愚昧无知和没有文化，而且因此人民仿佛无法理解现在正发生的事。请相信，事情的实质人民理解得再好不过，人民理解事情的实质已有四百年的光景①。如果人民现在知道当今那些外交家们的话，那么人民倒真的根本不能理解他们了；不过，有谁又会理解那些外交家们呢？不错，我们伟大的人民是如同野兽一样被哺育长大的，从最初，在整整千年之久的时间里，忍受了太多太多的折磨与

① 土耳其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从这时算起的。他认为，俄国人民懂得“事情的实质”，也就是俄国同土耳其冲突的原因就在于此。

痛苦，这种折磨和痛苦是世界上任何人民都经受不住的，任何人民都会因之而垮掉和灭亡的，而只有我们的人民才能在这种折磨和痛苦中变得更坚强和更团结。聪明人先生们，请你们不必为“兽行和愚昧无知”而斥责我们的人民，因为你们，正是你们，从来也没有为他们做过任何事。相反，你们远离他们而去，二百年前，你们抛开他们而且自己还与他们隔绝开来，把他们变成了征收捐税的对象以及自己田租的来源。于是他们，文明的西欧派先生们，这个被你们所遗忘了的和受你们压制的，也是被你们如同野兽一样赶回到兽穴中去的人民，就是那样成长起来的。不过人民的基督同人民在一起，人民只同基督一直生活到二十年前的那个伟大的日子，[①] 那时，燃着仁爱之烈焰的北方雄鹰展翅奋飞，并用其双翼庇护人民……是的，人民之中是有很多兽行，但是请不必指指点点说这个。这种兽行是多少个世纪沉积的污泥，它会被清除干净的。存在着兽行还不算什么糟糕的事；糟糕的倒是将兽行奉为善行。我曾经多次见识过极其可怕地干过许多兽行的强盗，看见过由于淫逸和意志薄弱而腐化堕落得要多卑贱就有多卑贱的强盗；但是这些骄奢淫逸和如此堕落的野兽——起码还有自知之明，晓得他们是野兽，还感觉到他们堕落得太厉害，而且还会在光明和纯净的时刻（这种时刻甚至对于野兽们来说上帝也是会赐予的），——起码自己还会来谴责自己，尽管他们要奋力自拔已经无能为力[②]。但是，兽行一旦如同偶像一样被所有的人供奉起来，并且对之顶礼膜拜，还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善行者的行为

① 指 1857 年颁布的有关准备解放农奴的沙皇谕旨。按：农民改革至 1861 年才真正实行。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死屋手记》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时，那么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贝肯斯菲尔德勋爵，以及随他之后的我们的和西欧的那些贝肯斯菲尔德们对于整个种族的人们遭受的兽行和折磨掩耳不闻，闭目不见，他们背叛了基督——为了"文明的利益"并为了把那些受折磨的种族称为斯拉夫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具有某种新的东西的种族，因此更应该将其根除，同时也是为了陈腐的文明的利益。这就是那种兽行——也就是有教养的和被尊崇为善行的兽行，对于它，无论是在西方，也无论是在俄国都当成偶像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而"上帝在尘世的全权代理者、绝对正确的教皇"①，在他离开尘世回到上帝身边去的那段最后时日里，难道不是曾经祝愿土耳其人，也就是那些折磨并摧残基督教的土耳其人，战胜那些以基督的名义为基督教起而武装抗争的俄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据绝对正确的教皇的认定，土耳其人终归比不承认教皇的俄国异端要好得多②。难道事情不正是这样的吗？难道这样做不正是一种兽行，一种野蛮行径？是的，约翰·李赫坚别尔格尔的预言与当前的时事最吻合不过了。难道我们不该让包括教皇在内的那些受奋飞的雄鹰用双翼追迫而战栗的"最傲慢的顶峰"放明白些吗？为了结束有关预言的话题，顺便说一下：在说"将有一只鹰要来，它将燃起基督未婚妻胸怀中的火，还将有类似的三只鹰和一只合法的鹰，后者将把其余的鹰统统吃光"时，约翰·李赫坚别尔格尔指的是什么？在宗教的和神秘的语言中，"基督的未婚妻"这个词一般总是指教堂。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讽刺的是 1870 年 7 月 18 日在梵蒂冈高级神职人员大会上宣布的赞颂教皇庇护九世（1792—1878）在信仰方面完美无缺的教理。

② 罗马教皇庇护九世死于 1878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是教皇庇护九世 1877 年 4 月 30 日（新历）的一次讲话。

那么究竟谁是三只类似的鹰和一只合法的鹰呢？似乎在这里应该理解为，也就是说，如果把他当成预言者看待，那么就是三种宗教：天主教，新教，以及……不合法的第三者究竟是什么？而合法的又是什么[①]？

但是，还是不必再说约翰·李赫坚别尔格尔吧。认真地说这一切是很困难的，这都是些神秘的寓意，尽管也多少有点与真实相似。

巧合的事难道还少吗？说真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写于1528年，并且还是印成书的，而这也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可能在那时经常有类似的作品问世，尽管那时还刚刚是在伟大的新教改革战争之前，但是新教主张者、改革者以及预言家已经出现过很多。众所周知，随后，特别是在新教的军队中，总是出现一些从战斗人员中来的非常激烈的“预言家”等等。如果我从一本古旧的拉丁文书里做了一段摘抄（我现在再重复说这一点——这本书无疑是存在的），那么只是当做一件引人入胜的事实而已。并非要把它当做一件奇迹来看待，何况也不是只有奇迹才是奇妙的。最奇妙的往往是那些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我们所见到的现实生活往往总是我们想要看见的那样，总是我们自己，心怀成见，想要自以为是的那样。如果有时我们突然分辨出并在看到的事物中看出并非我们想要看见的东西，而是事实上实际存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爽直地把所看到的东西当做奇迹来看待，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我敢发誓，有时我们与相信实际情况相比，与相信真理相比，我们宁愿意相信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不合法的第三者”是伊斯兰教，他也反对天主教，而唯一合法的则是东正教。在这里也可以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教皇庇护九世1877年4月30日讲话的敌意反应。

奇迹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我们并不想要看见真理之所在。世上的事往往都是如此，人类的历史也就在于此。

论匿名的谩骂信件

（《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1章，Ⅱ）

我并没有出国，现在正待在库尔斯克省。我的医生得知我有机会在乡间度过，而且还是在库尔斯克这样的省份，就为我开出处方，说在乡间要喝叶先图基矿泉水，并又补充说道，这对已经习惯于喝埃姆斯矿泉水的我来说，是大有裨益的。我认为我有义务声明我收到我的很多读者的来信，他们在信中对我的病表达了最深切的关注之情。借此机会我还要说，自从我出版《作家日记》以来，我曾收到过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收到很多信，这些信件有的是署名的，有的是匿名的，都是些非常赞扬我和非常赞赏我，支持我这种劳作的信件，以至于我不得不坦率地说，我从来也没有指望过对我会有如此普遍的同情，从来也没有认为自己对此受之无愧。这些信件我将如同瑰宝一般珍藏，而且如果我把这个情况在刊物上公开宣布出来，这又有什么出格的呢？难道说我重视公众的关注之情是坏事吗？但是，有人却要说什么，您现在自吹自擂起来了。就让他们去说好啦，我知道我自己并没有什么自吹自擂的，我只不过是声明我的感谢，表达我真诚的情感罢了，我已经不是那种少不更事的人，以至于还不懂得我的这种声明会激怒另外的一些先生们，而这类先生们似乎还不太多。在我出版《作家日记》一年半的这段时间内，我总共收到几百封信件，其中起码有一百封（但是大约还要多一点）是匿名的，但是这上百封匿名信件中只有两封信是绝对怀有敌意的。所有信件中有些是与我的信念相左的信件，这些信件直率地陈述了自己的反驳意见，但总是

很认真，很真诚，丝毫也不涉及个人，无论是署名的信件，也无论是匿名的信件莫不如此。我深感惋惜的只是，由于收到的信件太多我无法一一作答。但是那两封匿名谩骂的信——是一种例外，它们不是为了表述不同意见而写，而是为了谩骂而写。也正是撰写这两封信的先生们因为我声明感谢而大发雷霆。这两封信中的最后一封正好涉及我宣布我生病这件事。我的这位匿名的写信人气生得可是不轻，说什么我竟敢白纸黑字刊登像我生病这样的个人私事，并在信中针对我的启事写了一则粗野的讽刺性的文字，非常非常猥亵。但是暂且先把那封信的主要目的——谩骂放下不提，我不由得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也就是：如果我由于健康欠佳的原因决定去外地治疗，从而被迫不能按时出版 5 月号的《作家日记》，只能将它与 6 月号的合刊出版，又由于在《作家日记》每次出版的时候我都要宣布下一期出刊的时间，——那么我觉得，如果不做任何解释而直截了当地、没头没脑地宣布说下一期《作家日记》将同 6 月号的一期合刊出版，岂不是有些失礼，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够宣布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呢？而且，难道在我的启事中描述我的病情的文字很多吗？但是，所有这些也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而已，如果这只是有人感到此事严重地有伤文学以及社会的体面，那么毕竟也还是一位有趣的，多少值得尊敬的先生，他也可能是在文学圈子之外，不过由于对文学无私的爱，这么说吧，怀着恪守文学的尊严的可贵的满腔热情，而将自己的志趣引导到吹毛求疵的地步，毕竟还是出自感兴趣和尊重，因此我仅仅由于礼貌恐怕也不能拒绝向这种匿名信表示某种尊重。可是谩骂却把一切都搞坏了：显然，其全部目的就在于谩骂。毫无疑问，在这里提这件事本来是不值得的；不过，我早已想就匿名信的事说几句话，也就是说，特别想就谩骂的匿名

信说几句话，因此我很高兴找到了这个机会。

问题是，很久以来我就感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多不稳定的、过渡性的、充满着变化的以及（理所当然）很少使人满意的时期，——必定要繁衍出许多这样的人出来，诸如那些受人冷落的，被人遗忘的，不受人关注的以及抱怨不休的人等等，他们说什么："为什么到处都是讲他们，而不是我，为什么人们都不关注我。"在这样一种个人非常愤怒和理想未能满足的状态下，有的先生有时准备拿出火柴前去放火，——情感已经痛苦到了如此地步，这我很理解，为了谴责这种现象，与其义愤填膺，倒不如怀有一颗仁爱之心。不过用火柴来纵火是走极端的行为，而且，这么说吧，这也是很多人的拜伦式人物的命运。幸运的是，对于此类天性并不太坚强的人物来说，还有并不如此可怕的出路。这样的一种出路——只不过是泼一通污水，进行一番诽谤，编造大批谎言，散布流言飞语，或者撰写匿名的谩骂信件等等。一句话，我早就开始怀疑，而且一直到目前还在怀疑，尽管无可争辩，我们这个时代必定应当成为一个伟大的改革和伟大的事件的时代，但是与此同时还是一个卖力书写谩骂性匿名信的时代。说到文学，那么毫无疑问，匿名谩骂的信件构成了当代俄罗斯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会伴随着它的全过程，——出版家中间以及作家中间有谁不收到这种匿名谩骂的信件？我甚至还查询过某些出版单位，正是那些突然走红的单位，骤然间就产生了影响并使读者满意（其程度如此之大，以致他们自己原本也未曾指望有这样大的成功），这些出版单位之一[①] 的一位最直接参与者曾告诉

① 可能指《新时代》，此时该报出版者为阿·谢·苏沃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1877年笔记本中曾记有该报取得成功的文字。

我说，他们收到如此众多的匿名谩骂的信，以致根本就不必再阅读它们，仅只启封而已。他本想向我讲讲此类信件中的一些详情，可是刚一开口他的话就被淹没在忍不住的笑声中了。也正应该是这样，我们尚缺乏经验的匿名者似乎还未曾料到，他们的信骂得越凶，它们就越是伤不了人，对人是无害的。这是一种良好的特征，它表明我们的匿名作者们虽然火气很大，但是毕竟没有涵养，而且也不懂得，他们恶毒的匿名信越是写得客客气气，语调越是庄重，那么它就将起到更加凶狠和强有力的作用。看来这种狡诈手法在我们这里还不发达，这种事还没有达到二级、高级的阶段，看来还刚刚处于最开始的阶段，还只不过是不可遏止的怒火刚一发作的产物，而不是深思熟虑的、教养很好的那种愤怒情感的结果。还可以说，这不是那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准备做出极大牺牲并学会忍耐的西班牙式的报复。我们的那些匿名的破口大骂的人也远远不是莱蒙托夫《假面舞会》一剧中的那一位神秘的陌生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被一个什么军官打过一记耳光，于是隐遁荒漠三十年，周密考虑自己的复仇计划[①]。不，在我们这里当前还仍然是我们斯拉夫人的天性在起作用，这种天性就是尽快来一通臭骂了事（甚至说不定当场就会握手言和），您也会同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可喜的，因为可以说，在这里一切都显得幼稚、年轻、清新，如同生命的青春年华一样，尽管应该承认，它是极其卑劣的。我认为我有责任顺便补充说说我的观感：似乎我们的青年一代，也就是最年幼的一代，少年人，是不撰写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句话中混淆了莱蒙托夫的戏剧《假面舞会》中的两个场面。剧中的“神秘的陌生人”为了复仇准备了七年，而不是三十年。

匿名辱骂的信件的。我经常收到青年们的很多很多信件，它们全都是署名的。这些信件中没有署名的只是些表达太多友好情谊的信，同我在某些方面意见相左的青年人的来信全都署着他们的名字。(而匿名的辱骂人的信件太容易辨识，而且根据其很多的特征和手法也太明确地表明不是出自青年一代人的手，不是出自年幼的少年人之手。）这样看来，我们的青年显然懂得，甚至可以写措辞非常尖刻的信，而在这样的信后面署名则赋予文词以特殊的价值，而且由于署了名，这种信件的性质就向最好的方面转变，署名赋予信件一种直抒胸臆、英勇豪迈、准备坚持和为自己的信念进行反击等等的精神，何况措辞尖刻本身也只表明信念的热切，而并非有意去伤害。这么一来，最明白不过的事实是，没有署名的辱骂者主要的愿望就是骂大街，首先就是想让自己得到满足，而别的目的则是没有的。要知道匿名者本人明白，他做的是肮脏事而且也在危害自己，也就是说，危害他匿名信的分量，但毕竟辱骂人的需求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一特点，也就是说，这种骂人的需求，应该指出来，因为它至今仍然在我们知识界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愿人们不要讥笑我，说我相信这一特点在我们这里占主导地位；我坚信，我并非夸大其词，而且我们现在正处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这么说吧，我们多数人就是如此。不妨设想一下，可以一辈子连一封匿名的辱骂人的信都不写，可是与此同时，却终生怀着一颗匿名辱骂人的心；要知道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设想。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总共才收到两封辱骂的信件，这没有什么关系；这只证明我的无辜和不惹人注意，这也等于说我活动的圈子小，除此之外，还证明我只是同一些正派的人打交道。另外一些比我更引人注目的活动家（因此，就此一点而言，就比我罪过更多一些)，就其出版的类型和性质来说，不得不在大得多的范

围内活动，收到的匿名谩骂信件可能不会是像我一样一年半才两封，而是两百封之多。一句话，我深信，欧洲的文明使我们接受的人道精神特别少，在我们这里愿意很快就破口大骂而且稍有不满的事立即开口就骂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可能多到说起来都令人感到可怕；而想要破口大骂的人——加之他们是躲在门背后受不到惩处，不暴露姓名，不担风险，就更多。匿名的谩骂信件正好也提供这种可能性：你不能把信打一顿，信也不会感到脸红。

在古代，我们还没有欧洲式的荣誉，我们的那些贵族们相互骂架，甚至斗殴，都是公开进行的，而且打耳光也不被当成是非常大的和无可挽回的有损名誉的事。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荣誉，尽管不是欧洲的那种形式，荣誉的神圣与庄严性也不比欧洲荣誉逊色，为了保护这种荣誉，一个贵族有时可以不顾一切，不顾丧失自己的家产，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甚至沙皇陛下的恩宠等等。可是，随着服饰的更改以及欧洲佩剑的引进，在我们这里也开始有了新的、欧洲式的荣誉，然而——整整两个世纪之久这种新的荣誉并没被认真接受，因为旧的东西被遗忘了和被唾弃了，而新的东西则遭到怀疑和不信任的对待。可以这样说，新的东西是机械地接受的，人们在内心里早已忘记荣誉是什么，也就丧失了对荣誉的需求，而且，不得不可怕地承认，可能例外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

在这两个世纪之久的欧化的和带佩剑的期间，荣誉和良心，说来甚至很奇怪，在我们人民中保存得更多，甚至全部予以保留了，我们历史上的佩剑时代几乎与人民无关。就算是人民肮脏、愚昧、野蛮，就让人们毫不宽容地讥笑我这种设想去吧，但是终我一生，我坚持一种信念，就是我们的人民在心灵上无可比拟地要比我们上层人士纯洁得多，他们的头脑也远远

没有那么厉害地患有双重性，也没有如同在我们知识界中经常遇到的那样，既已拥有最光辉灿烂的思想，同时却又毫不踌躇地迷恋上那种与光辉思想对立的龌龊思想，而且是两种思想同时并存，不知该相信哪一种，在实践中该以哪一种为准绳，进而还把自己头脑和心灵的这种状态称之为智力发展的丰富性、欧洲文化的财富等等，尽管享有这样的财富却不免苦闷和厌恶得要死，然而与此同时却竭力讥笑我们普普通通的、尚未受到外来文明触动的我们的人民，讥笑他们信仰的淳朴和幼稚……不过这个题目太广泛，我只简单说一下：人民中间最粗鲁的人也会对我们某个“上层活动家”的某些思想和动机感到羞愧，我深信，他也会对我们知识界人士们的许多事情感到憎恶而不予理睬。我确信，他不理解，而且很长时间也不会明白，竟然可以关起门来，独自一人，当没有人可以看见的时候，去干坏事，并且还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以被允许的，道德情操上是行得通的，只因为没有见证人，神不知鬼不觉，——与此同时这一特点却十分可怕地在我们知识阶层大行其道，而且还恬不知耻，甚至相反，极其经常地使有开明精神的智慧与高尚本性得到高度满足。人民的概念是，当众是坏事的，关起门来也是坏事。与此同时，我们在看待人民时，正是把他们看成是卑鄙无耻的人，干坏事的人，不开化的破口大骂的人，只在辱骂中寻找乐趣的人。不妨顺便提醒一下，这不过是早已过去的事，而且事情也早已有所改变。在我的青年时代，在军人中间，在绝大多数的军人中间，有过一种信念认为，作为来自人民中间的士兵，俄国的军人特别爱说脏话，是辱骂人的人和说下流话的人。因此，为了大众化，某些指挥官，比如说在训练时，放任自己凶狠地和出格地辱骂，骂得如此不堪入耳，以致连士兵们听到这种辱骂简直都要脸红，然后，回到自己的军营时，就要

竭力忘掉首长骂出的话，而对于提及此事的士兵则群起而大声吼叫制止。我本人不止一次曾经是此类事件的见证人。指挥官们这样做，心里很满意于他们自己具有俄罗斯士兵的精神！有什么好说的呢，——甚至连果戈理在他的《与友人书简选》一书中建议他的朋友在当众公开严厉申斥农奴时，必定要使用猛烈的骂人的话语，甚至还举例说正该用哪一些，也就是说要挑选其中较为浓缩的一些词，这些词要尽可能在道德情操方面显得更加卑下猥亵，在辱骂中要深沉、精巧而不表面化等等。与此同时，很遗憾，俄罗斯人民尽管也用一些粗暴的骂人话，不过远远不是全部，远远不是全部，甚至只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人们是否能相信这点呢?）而主要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他骂的时候，与其说他是带着道德情操方面的精巧，不如说是机械性的，与其说他是有意而为，倒不如说他习惯成自然，说到有意而为，那也只不过是发生在特别罕见的流浪汉中的一些个别人身上，发生在那些受人民蔑视的不可救药的酒鬼以及卑贱无用的人的身上。人民尽管也习惯性地骂人，但是他自己知道，这种习惯是可憎恶的，从而也谴责它。因此，我认为，要让人民不再口出骂人话只不过是一件机械性的抛弃习惯的事，而不需要在道德情操方面做出努力。一般来说，这种把我们的人民看成是卑劣谩骂的爱好者的想法，我认为，植根于我们的知识阶层，而主要的，这事在它同人民在精神情操方面彻底隔绝之时就发生了。众所周知，其结果就是从我们知识阶层方面来说导致了对人民的完全不了解，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关于我们的人民的错误想法。即便人们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我的见证，不认为我们的人民根本就不像迄今为止人们所描述和所设想的那样是骂人的人，那也随他们去吧，不过我深信我的见证终将会被证实的。我所寄予人民身上的希

望，我也寄予我们青年一代。人民和我们知识界的青年一代是会突然在很多方面走在一起的，而且比我们这一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会更紧密和更成功地相互理解。在我们的青年中存在着严肃认真精神，但愿上帝保佑，让它方向明确。在这里顺便再谈谈青年：一位非常年轻的朋友不久前给我寄来一封信，在信中就一个课题发表了十分尖刻的反驳意见——至于就什么课题，我且不说，在他尖刻（但完全不是不客气）的信后签署了en toutes lettres[①]，而且还写上地址。我把他请来交换意见，他应约而来，而且他对待事情的热情和严肃认真，使我感到惊讶，他同我在某些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他沉思着离去。我还要指出的是，我觉得，我们的青年一代比老年人更会争辩，也就是说，在争论的风度方面他们做得要好得多：他们倾听别人说话，让别人说下去——这正是由于对他们来说把问题解释清楚要比他们的自尊心更可珍贵。告别的时候他对他写的尖刻的信表示了遗憾，他这样做完全出自他毫不做作的高尚品格。我们的青年没有领导者，别忘了这一点！可是，他们却是非常需要有领导者的，他们常常兴高采烈趋之若鹜地追随那些本不值得去追随，只是多少比较真诚的人们！那么，这位未来的领导者该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说，该是怎样的一些人——且不管他是谁？我们俄罗斯的命运是否会给我们送来这样的人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① 法文：完全。

揭露当代生活的小说提纲

（《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1章，Ⅲ）

要知道，我还没有结束我论述匿名谩骂者的话题。问题是，这种人可以成为一个特别严正的文学典型人物，放在长篇小说或者短篇小说中都可以。主要的是，这里可以而且应该从另外一种视角来看问题，即从共同的人性的观点来看，并将这一观点对准俄罗斯性格，而且要特别对准我们这里出现这种典型的当今的前因后果。实际上，当您刚刚着手创作这一典型人物时，您就会立刻意识到，我们当前不可能没有这类人物，或者说得更进一步——类似这样的人物，恐怕我们在我们这一时代本该预料到的，至于说这类人物目前还比较少，那么也只是由于上帝的特殊恩惠罢了。事实上，这类人都是我们前不久摇摇欲坠的家庭的产物，这类人的父辈是失意的怀疑论者，传给孩子们的是对待一切眼前事物只持冷漠态度，以及很多很多对未来、可怖的梦幻般的未来怀有某种莫名的不安，而对这梦幻般的未来，那些甚至被称之为修养有素的现实主义者们以及对我们的现实冷酷的憎恶者们则倾向于去相信。除此之外，这类人的父辈传给他们的自然还有他们那种怀疑一切的、无力的笑声，尽管这笑声不是有意识的，但总是心满意足的。在近二十年来，近二十五年来，在这些可恶的、心怀妒忌的人们家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还少吗？这些心怀妒忌的可憎的人花光了赎金①，却

---

① 指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农奴为赎买应得份地而交给地主的赎金。

只留给自己的孩子们贫穷和干下流勾当的遗嘱，——难道这样的家庭还少吗？比如说吧，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谋得一份差事去做，其貌不扬，“没有说俏皮话的本领”，没有任何的关系供他利用。他只有天生的一颗头脑，不过这颗头脑任何人也都有，但是因为他的这颗头脑过去是在无目的的粗野的咒骂声中培养起来的，也就是二十五年来我们将它当做是自由主义看待的那种咒骂中培养起来的，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就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头脑看成是天才。啊，上帝，当一个人在缺乏最起码的道德毅力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时候，他怎么能不表现出无止境的自尊心。开始的时候他还极其可怕地胡作妄为，但终归他还有头脑（选取典型的话，我宁愿取比中等的人多少更聪明一点的人，而不取比中等的人更愚笨的，因为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中才可能出现此类典型），因此他很快就领悟到，粗野的谩骂终归是消极的东西，不会导致积极的结果，不会导致任何结果。而且如果说他的老爸对此曾心满意足地得意过，那么这是因为他老爸尽管是一个自由派人士，但毕竟是个上了岁数的头脑简单的人，至于他，作为儿子，终归是一个天才，只不过要表现自己暂时还有点困难。噢，他当然在心里已做好了干各种各样最好的下流勾当的准备，“因为，为什么不把下流勾当运用到事情上呢？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谁又能够证明下流勾当就是下流勾当？”等等。总而言之，他就是在这样一些现成的问题中长大成人的。不过他很快就又领悟到，如今甚至要把下流勾当付诸实施，还需要等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何况要把下流勾当付诸实施对他来说道德情操方面的准备还远远不够，这么说吧，他还需要预先在实践中变成好人。嗯，当然，如果他愚蠢一点，他立刻就会为自己安排妥当的：“打消那些高级的图谋，尽快将就在某处或找某人弄个位置，然后就恭顺地、诚

心诚意地艰苦卖力，那么——终归可以平步青云。”但是，自尊心呀，对自己才华的确信呀，暂时久久地妨碍着他，在他自己的思想里甚至还不能够将他自认为他的如此光辉的命运与某某人的命运搅混在一起。“不，我们现在还处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上。如果他们想要我，那么就让他们自己来找我——上门来恭请我。”于是他等待着有谁会来拜访他，接着就生气，生气并且一直等待着，与此同时，某某人却擦肩而过比他高升了一步，第二个也将就为自己谋得了位置，而第三人已经当上了他的上司，——这第三人，还在他们在“高等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就给他起过外号，还给他写过讽刺诗，还在那时的手抄本学校杂志上刊登了出来，他则被公认为天才。“不，这欺人太甚！为什么不是我当头目，而是他？而且，到处，到处位置都有人占着！不，”他想道，“这不是我大展鸿图的领域，而且何必要去当差做事呢，任人摆布的小卒子才去供职，文学才是我的用武之地。”——接着他就往各个编辑部寄送自己的作品，开始是 incognito①，随后则署全名。不言而喻，都没有给他答复；忍耐不住，他就亲自上门到各编辑部求告。每当收到退稿的时候，他甚至还可以说说俏皮话，怨恨地讥诮一番，泄泄怒气，但是这样也于事无补。“不，看来，这里也全给人占光了，”他苦笑着寻思道。主要地，折磨他的总是那种永远注定的操心，那就是他总在到处寻找尽可能多的不如他的人。啊，他却永远也不能明白，怎么能高兴地说比自己好的大有人在！于是他就首次产生了投递恶毒辱骂的匿名信的念头，投给那些让他受到侮辱的某个编辑部。信写好啦，也投递了出去，再来一次——心里很喜欢这样做。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后果，一切照

① 拉丁文：匿名，化名。

旧，在他的左近仍然无声无息，看不到希望之光。“不行，这算什么发迹之路。”他终于最后决定说，后来他打算“凑合着找一个位置”。他选择着人物——这个人正是自己的上司，无论如何，总可能帮他得到一个机会并给他联络一些关系的吧。要知道，果戈理作品中的波普里辛不就是因为削鹅毛笔削得好而受青睐并为此而得以进入上司阁下的住宅，从而见到了上司的千金，还为她削了两支鹅毛笔。可是，波普里辛之类人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如今也不再削什么鹅毛笔，而我们这位主人公的性格却又改变不了：他的头脑里装的不是羽毛笔，而是最异想天开的幻想。简短说吧，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已经确信，他上司的千金已经迷恋上了他，并且因爱他而痛苦不堪。“哼，这不就是进身之途嘛，”他寻思着，“如果聪明人不可能通过女人取得锦绣前程，那么她们还有什么用处呢？如果实实在在地谈论妇女问题的话，那么这一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而主要的，这也没有什么羞耻可言：通过女人而仕途通达的人还少吗？”但是，但是——这里也正如同在波普里辛[①] 那里发生的情况一样，突然碰上了一个副官！波普里辛是按照自己的性格行事的，他因幻想他是西班牙国王而发疯。再自然不过啦！以前的那个波普里辛既无关系可供疏通，又无前程好指望，更缺乏勇气和任何主动性，何况还是在彼得堡的那种时代，那么不一头钻进最无望的幻想并对之深信不疑又能干什么呢？但是我们的这位波普里辛，我们当代的波普里辛，在人世间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和那个原始的波普里辛一模一样，只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波普里辛的复制品。在他的心灵里是不安分的雷鸣电闪，是蔑视和毒辣的讽刺，而他也耽于幻想，但也是

① 波普里辛是果戈理《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

另一样的幻想。他记起，人世间可能存在着匿名信，而且他也使用过一次匿名信，于是他用自己的匿名信来冒冒险，不过已经不是投给杂志的编辑部，而是厉害一些，他觉得他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实践阶段。啊，他背着自己的女房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战栗着，唯恐有人窥视他，但他一直写，一直在写，变换着笔迹，创作出满满四页诽谤和辱骂，扬扬自得地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读着，接着坐上一个通宵，天一亮就封好信并写上收信人地址——寄给那个做了未婚夫的副官。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笔迹，他无所畏惧。于是他数着钟点，计算着信该在现在递到——这是写给未婚夫有关他未婚妻的信件。——啊，收信人当然会要拒绝他的未婚妻的，收到信他会吓一大跳，要知道这不单只是一封信，而且是“杰作”！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凭借他全身的力气都知道，他是一个卑鄙的恶棍；但对此他只能高兴：“现在是思想二重化和胸襟豁达的时代，如今别以为靠率直的思想就可以行得通。”

不言而喻，匿名信没有起到作用，婚礼还是举行了。但是既然开了一个头，那么我们的这位主人公仿佛倒是偶然碰上了自己发迹的所在。如同波普里辛一样，他梦萦魂绕的是某种海市蜃楼，他热情饱满地投入到他撰写匿名信的新的活动中来。他刺探自己将军的情况，他设想着，他要把整整几年来心中郁积的一切——不满意的差事、受刺激的自尊心、怨恨、妒忌等等一股脑儿倾泻出来。他批评将军所做的一切，他用最无情的方式讥笑将军，并把这些都写在几封信中，写进一系列的信件之中。开始时他是多么开心呀！从将军的各种行为，到他的妻子，他的情人，连他们整个部门的愚蠢情况——一切的一切他都在自己书写的那些信件中加以描述。渐渐地，他甚至设想起国家的事情来了，他拼凑给部长的信件，在信中他毫不客气地

设想将俄国加以改变。“不，部长不可能不感到惊讶，是一个天才人物让他惊愕，信会递到，或许，递到……递到这样的一位人物手里，那时……一句话，壮起胆子来，mon enfant[1]，接着就会寻找这封信的撰写者，于是我就一下子露面，这么说吧，已经没有什么好害臊的。”总而言之，他完全陶醉于自己的各种作品之中并且时时刻刻都在想象着，他的信件如何被启封以及之后在那些收信人的脸上会发生什么样的表情……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他有时甚至也让自己淘气一下，为了对某些最滑稽的人物开开玩笑，他甚至连自己的科长，某位叶戈尔·叶戈罗维奇也不放过，当匿名信使他相信他的夫人与当地的警察段长有暧昧关系（这里有一半很可能是真实的）时，就真的差一点把那个科长小老头儿弄疯。就这样过了一些时间，但是……但是突然在他的头脑里有了一个奇怪的思想——这思想就是：他是波普里辛，并不是像波普里辛，而实实在在就是那个波普里辛本人，只不过要下流卑鄙百万倍，而所有那些从阴暗角落里弄出来的恶意中伤，所有他这种匿名的威力实质上只是一种幻景而别无其他，而且还是一种最卑鄙下流的幻景，最恶毒和无耻的幻景，甚至比幻想身居西班牙王位还要坏得多。可是，这里正好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情况——可并非什么可耻的情况：“可耻算什么，可耻纯系无稽之谈，如今只有药剂师才害怕耻辱二字。”[2] 的的确确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情况，确实是很可怕的。事情是这样的，尽管他神志还正常，但是在他陶醉于他新的一轮平步青云的梦想时，即在他发出了那封给部长的信

---

① 法文：我的孩子。

② 这是套用《狂人日记》中波普里辛说的“信算什么，信是胡说八道，药剂师才写信”一语。

之后，他却忍不住脱口讲出自己书写信件的事——对谁讲的呢？对一个德国妇女，也就是对他的女房东，——嗯，当然不是讲了全部情况，即使讲了，她当然也不会全部理解，只不过稍微讲了讲，只是由于心情愉快而有所流露；但是一个月之后，另一个部门的一位不声不响的官员，也住在同一个女房东远处一间房子的房客，一个恶狠狠沉默寡言的人，在楼道里从我们的主人公身边走过时，突然不知为什么十分生气地向他暗示说，他——也就是他这位沉默寡言的官员本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会学有些先生们的榜样写什么匿名信件”。怎么样！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害怕，何况他还测探过这个不声不响的官员——为了让他有意地并且甚至不惜屈尊同他和好，——他确信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晓得。不过……嗯，他要是晓得呢？何况司里早已传说有人经市邮政给司首长写信辱骂，这肯定是自己内部的人干的，于是我们这位不幸的主人公开始沉思起来，甚至夜里都无法入睡。一句话，可以特别鲜明地把他心灵的苦楚展示出来，看出他的疑神疑鬼和他的失算。最终，他差不多已经完全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不到一定时间不开口罢了；至于撤他的职一事也已决定好，而且这事当然也不会就此了结，——总而言之，他几乎要急得发疯。一次他正坐在他供职的司里，此时，差不多对一切事和所有的人他都心怀无边无际的愤恨：“啊，恶毒的，可诅咒的人们，”他这样想，“难道可以这样装模作样！要知道，他们晓得，这是我干的，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当我从旁边走过的时候，都相互耳语，他们还知道，关于处置我的一纸命令也早已在办公室里准备妥当，而且……而且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装蒜！所有的人都只瞒着我！他们很想看我出丑，瞧着我被拖走……不行！不行呀！”于是他在一小时之后，偶然拿着一件

公文送到将军阁下的办公室去。他走进门，恭敬地把公文放在将军的办公桌上，将军正忙着，没有在意，他转身，想不声不响地出门而去，手已经抓住了门的把手——蓦地，仿佛坠入无底深渊一样，他扑倒在将军阁下的脚下，可是在这一刻之前他并不曾料到他会扑倒在地的："终归要完蛋，还不如自己坦白的好！将军阁下，只是请您小声一点，请您小声一点，将军阁下！最好别让外面有人听到我们说话。我要对您把一切都讲出来，把一切统统讲出来，毫无保留地讲出来！"他如同一个疯子一样恳求着将军大人，将军大人则惊愕地傻子一般抄着双手待在他面前。他则断断续续地，前言不搭后语地，浑身颤抖着，愚蠢地向越来越迷惑不解的将军大人坦白交代所有的一切，而将军阁下原先却是始料不及的。不过在这里我们的主人公完全坚持到底而没有退缩，——究竟为了什么他才扑倒在将军脚下的呀？当然是由于他的疾病，当然是由于他的疑神疑鬼，但是主要还是由于他，——这个既胆怯，又受到侮辱，更在各个方面进行了自我谴责的人，——仍然在幻想着，如同一个陶醉于自命不凡的傻瓜一样，将军阁下在听过他的坦白交代之后，终归可能，这么说吧，惊讶于他的天才，——会打开那双签署过很多有益于祖国的公文的手，紧紧地把他搂在怀抱中："那么是你，不幸的人，但却是如此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被搞到这种地步！啊，这都是我的过错，全都怪我，我把你给忽略啦！一切罪责我都承担。啊，我的上帝，由于我们旧的制度以及成见的过错，我们才华横溢的青年不得不落到这种地步！不过，来吧，扑到我的怀里，那么——与我共享我的位置，而且我们……而且我们要把这个司来一个彻底改变！"但是事情却是这样，很长时间过去以后，在耻辱和在屈辱中一想起将军阁下皮靴头的那踢向他面孔的一脚，他就几乎是很真诚

地责怪起命运并且怨天尤人了：“在生活中我曾经有那么一次直抒胸臆，可是我得到的回报又是什么呢？”故事的结尾应当给他设想一种最真实的和最现代的结局，比如说，他在被撤职之后，受雇去与人假结婚，拿一百卢布的报酬，举行过婚礼之后，各奔东西，他走自己的路，新娘则回到自己那个粮商的身边。“既可爱又高尚”，——就如同在谢德林作品[①] 中一个地区警察段长在类似情况下所说的那样。

总而言之，我觉得，匿名辱骂者这种典型人物——对于创作中篇小说来说，是一个满不错的题材，而且还是一个严肃的题材。这里当然需要的是果戈理这样的作家，不过……我高兴的是，起码我也偶然触及了这一思想。或许，我还真要尝试一下把他写到小说中去。如今究竟能够同谁来谈论有关外交的话题呢？这倒是一个问题。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呢！不过……

① 指谢德林《现代牧歌》（1877—1883）第3章中的一段插曲。

面对诸多世界问题的外交

（《作家日记》，1877 年，5～6 月号，第 2 章，Ⅱ）

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个题目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凡是天资聪慧的人都说，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外交的时代，是仅仅依靠外交来解决所有世界命运的时代。比如说，人们还确信，仿佛在我们这里现在还正在进行着战争。我甚至还听说，正在进行战争，但是人们对我说，而且我也到处都读到，如果那边某地有什么仿佛是战争一类的事，那么所有这一切大概也并非可以如此理解的……起码，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战争并不碍事，也就是说，并不有碍于正在运行着的民族的健全机能，据一般来说被称为“绝顶聪慧”的那种最新观点认为，这多半是，而且甚至只是一种外交而已；而且，甚至那些军事出动、军事演习等等，也总是必不可免的，——就事物的真正意义来讲，这些也只不过是高级外交的一种层次而已，岂有它哉，本该相信是这样。就我的这一方面来说，我宁愿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是很让人感到安定的，不过事实却是非常有趣而十分可怕的。比如说，在我们这里*东方*问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欧洲也正如我们这里一样，甚至还早于我们这里，它也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也是极易理解的：所有的人，甚至不是外交官们（甚至特别是非外交人士）——所有的人都早已知道，*东方*问题，据说是诸多世界问题之一，是世界性的以及最近时期解决人类命运问题的最主要*部分*之一，是人类种种命运新的未来的一个阶段。众所周知，事情并非仅仅涉及欧洲的*东方*，并非仅仅涉及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

或者还有特别是那里的某些保加利亚人，而且还涉及整个欧洲的西方，而且根本也并非只涉及海域和海峡，入海口和出海口，事情要深远得多，重要得多，自然得多，迫切得多，更具有实质性，也更居于首先的位置。因此不难理解，欧洲处于惊恐之中，外交处于多事之秋。那么外交究竟有什么事做呢？——这就是我要谈的问题！它（现今最主要的方面）在东方问题上忙些什么呢？外交界的事（否则它也就不成其为外交界了），它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将东方问题在它的各个方面全都取消，并且尽快让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否该包括在内，都相信根本任何问题都不曾发生，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军事出动和演习而已——而且甚至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就要让人们相信，东方问题不只还没有开始，而且世上也从来没有过这回事，根本不曾存在过，只不过是一百年前人们施放的烟幕，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外交姿态，而这种不消解的迷雾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可以毫不隐讳地讲，本来倒是可以相信这一点的，如果不是有这一个不解之谜的话，自然已经不是外交上的不解之谜，（真糟糕！）因为外交界无论如何从来也不会作为不解之谜来看待，加之还会不屑一顾地扭转头去，因为外交界认为这不过是不值得高级头脑去考虑的幻想。本来可以以这样的形式表述这个不解之谜的：为什么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也就是说，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越来越看得明显，越来越感触得到，为什么——当事情刚一涉及世界上某种世界性的、共同性的问题时，那么，立即就会同时与已经在某处掀起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并行着又提出所有其他的世界性问题。举例来说吧，欧洲当前有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东方问题，这还不够，出乎意外地突然又在法国提出一个问题，而且也是世界性的，即天主教的问题。提出天主教的问题不仅仅因

为据说教皇很快即将归天，那么法国作为天主教的代表应当关注多少世纪以来所确立和形成的天主教的组织丝毫不要消失，也丝毫不要改变，而且还因为，在这里，天主教显然举起维护旧事物所有固有秩序不遭破坏的共同旗帜，维护以往的所有十九个世纪的旧制度团结的共同旗帜——反对某种新的和即将来临的东西，反对必不可少的和招致不幸的东西，反对寰宇受到新秩序更新的威胁，反对社会的、道德的以及根本的天翻地覆的改变在整个西欧生活中发生，或者，如果不会发生这种更新，那么起码也要反对可怕的震动和巨大的革命，这种革命无疑会构成威胁震荡着全世界所有的资产阶级王国，这些王国都是照搬 1789 年法国的模式组织和繁荣起来的，这种革命也无疑会构成威胁把这些资产阶级王国一扫而光并取而代之。说到这里，不妨让我暂时离开正题顺便提出一项必不可少的 Nota bene[1]，因为我预感到某些聪明人，特别是那些自由派人士，会觉得可笑，说我在 19 世纪的兴旺之际却把法国称为天主教强国、天主教的代表！因此，为了解释我的这一思想，让我姑且先空口无凭地说明，法国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即使在这个国家里甚至不再有一个人不只不信仰教皇甚至也不信仰上帝时，它将仍然主要还是一天主教国家，这么说吧，还是全部天主教机体的代表，它的一面旗帜，而且这在它的身上还将持续非常长的时间，甚至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可能一直持续到法国不再成其为法国，而将要变成某种别的什么东西的那一天。这还不算，就连这社会主义本身也会根据天主教的模式在它这里开始，具有天主教那样的组织和基础，而不会是别的，——这个国家就是达到这样程度的一个天主教国家！我现在不打算详

---

① 拉丁文：注意。两字常缩写为 N. B.。

细提出什么证明，我只暂时指出一点，比如说为什么突然有什么东西促使麦克马洪元帅[①] 毫无缘由地提出并唤起人们注意的正是天主教问题呢？这位勇敢的将军（尽管到处都吃败仗，而在外交方面则以‘J'y suis et j'y reste'[②] 简短的一句话而与众不同）——这位将军似乎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一类活动家，以便能够有意识地提出这样一类的什么问题。可是他毕竟开始了，并且毕竟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古老欧洲的问题，并也正是以它原本应该具有的形态而被提出，——但主要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正巧在这种时刻提出，即正当世界的另一端另外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就是东方问题，叫嚷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为什么一个问题紧贴着另外一个问题发生？为什么一个问题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而它们之间似乎不存在任何联系？而且也不只是这两个问题一同被提了出来：与东方问题一起被提出的还有另外的一些问题，被提出的还有很多很多，假若这个问题正确发展开去的话。总之，所有欧洲的以及全人类的最主要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纪开始被提出来总是同时的。正是这种同时性才使人感到惊讶，所有的问题必定一起出现，这构成一种令人不解的谜团！但是我为何要说这一切呢，其原因就是，外交界正是对这类问题不屑一顾。外交界不仅不承认任何的这种巧合，甚至连想都不愿意想这种类似的巧合。他们会说，这是什么幻景，胡说八道和鸡毛蒜皮的小事："完全没有那么一回事，

---

① 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元帅，因 1859 年在马让塔之役得胜而晋升为公爵。1870 年在普法战争的色当之役战败投降。在 1871 年他任镇压巴黎公社的凡尔赛军队司令，1873—1879 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5—1876 年的笔记本中曾说到他正直、勇敢，但并不聪明。

② 法文："我是这样说的，那么就这样了结。"直译则为："我在这里，并仍将留在这里。"

只不过是麦克马洪元帅，更多是他的夫人，极想如此这般的吧，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我自己在本章的这一节开始的时候曾经宣布说，我们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外交的时代，而其余一切都是幻景，——我自己第一个被迫不相信这一点。不，这里有一个不解的谜团！不，这里不只是外交才能解决问题，还得有某种别的什么东西。对于这样的结论我感到异常难堪，这我得承认；我曾经是多么地倾向于相信外交，可是所有这一切的新问题——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些新的麻烦事而已，岂有它哉……

俄罗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不能通过外交解决问题

（《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2章，Ⅲ）

事实上，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并且也只是暂时空口无凭地发挥了一番。但是，早在现今这一问题提出之前很久，我就总在想着它（也就是说，同时一下子所有的世界性的问题汇总出现，只要其中的一个问题出现，其余的也就随之而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无比简单和极其自然的问题，正因为它非常简单和自然，聪明人甚至根本不注意它。这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是的，即使外交这东西过去有，现在也有，到处都存在，永远存在，是人类所有基本的以及最重要的问题的解决者，而且将来也会一如既往；不过，诸多欧洲问题的彻底解决永远取决于它吗？相反，不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在每一个问题中总有这样的阶段，总有这样的地方，不是可以用某种平和的方式、外交方式解决的，也就是说，不是可以用打补丁的办法加以解决的。尽管无可争辩的是，所有世界性的问题从外交视角看来，即从健全的思想看来，总是被解释成为，有那么一些大国想要扩张它们的疆界，要不就是有那么一位勇敢的将军个人想要有什么作为，再不就是某位名门贵夫人对什么东西不如意等等，等等（这就算是无可争辩的吧，我可以做出让步，因为这里有极大的智慧），——但是，在某种时刻，而且当存在上述这些最现实的原因以及对原因的解释的情况下，在事情的进展中是否会突然出现另外的奇特而大量的地方、阶段的情况，比如说，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和像谜一样的力量，而这种力

量却突然控制住一切，一下子就把一切全部抓住，并不可抗拒地将它们盲目地仿佛往山下推那样引向无底深渊？实质是我只想知道，外交界是否总是依托自己和自己采取的方式，是否对于任何类似的外力以及事情进程中的某些地方和某些阶段根本就不担心，而且也根本就不会想到它们的存在呢？呜呼，似乎总是这样，因此正如我相信它和信赖它的那样，我是否也能够把它看做是对如此安乐和狂荡的人类的命运的最终解决者！

呜呼，在凯达诺夫① 卷帙浩繁的历史巨著中有一句最伟大的话，那就是他在他的《新历史》一书中开始叙述法国革命以及拿破仑一世的出现时说的。这句话是在一章的开端，它终生都留在我的记忆中，它是这样说的：“当腓特烈大帝② 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时，全欧洲都笼罩在深沉的肃穆之中；在这一无比强大的风暴之前从来也未曾有过类似的肃穆！”请问，从上述的句子中能知道些什么呢？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也就是当腓特烈大帝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时，有谁能够哪怕预知在今后十三年间人们以及欧洲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说的不是那些普通受过教育的人，或者甚至是作家们、新闻工作者们、教授们。众所周知，他们这些人当时全都不知所措。比如说，席勒当时就撰写了激扬的颂诗来称赞国民议会③ 的召开；当时

① 伊·凯达诺夫（1782—1843），皇村学校的教授，著有多次再版的历史著作。

② 即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

③ 这里指的当是1789年法国第三等级代表成立的立法机构。当时法国以国王为首的特权等级，曾反对第三等级提出的三个等级共同集会、共同审查代表资格和按人数表决的要求，但第三等级仍于6月17日组织成国民议会。6月17日、23日国王一再反对，第三等级均置之不理，并通过了代表不可侵犯的决议。此后不少特权阶级代表相继加入，至7月9日国民议会改为制宪议会。

正在欧洲旅行的青年卡拉姆津也以一颗同样激动的心注视着这同样的一次会议，而在我们的彼得堡还在这次会议的许久之前，伏尔泰的大理石半身雕像就已经赫然塑立了。不，我直接求教于最高层次的智慧，直接求教于人类命运的解决者，即求教于外交家们，我请问他们：他们当时是否曾经预料到今后十三年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十分可怕的是，如果我向外交官们请教这个问题（请注意，差不多所有的欧洲外交官们都是学过"凯达诺夫历史书"的）——而且如果他们竟然屈尊肯听我提问的话，那么他们大概会发出高傲的笑声回答说，"偶然事件是不可预见的，全部的智慧仅仅在于，对各种偶然事件要有所准备。"

原来如此！不，我要对您说，这一答案是典型的，尽管是我自己杜撰的，因为没有哪一位外交官肯受提问的打扰（何况我也不敢用问题去麻烦他们），但是我最怕的事就在于，我确信，人家正好会如此回答我，因此我才把这种回答称之为典型的回答。因为，请告诉我，上一世纪末，在外交官们眼里，那些事件不是偶然事件——又算是什么呢？曾经有过，现在也有。比如说拿破仑，——简直是头号偶然事件，如果不出现拿破仑，如果他死在科西嘉[①]，三岁时死于猩红热，——那么人类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就不会手执自己新的旗帜涌现出来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②]（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而仍然待在它那巴黎，或许一开始就会结束其存在！

我觉得，问题是，在旧的欧洲，当今的这个世纪会以某种巨大的、或许虽然与18世纪不是一模一样的、但终归是那样

---

①② 拿破仑出身于科西嘉岛一破落小贵族家庭。他征服欧洲一些国家，并在那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

巨大的某种事件来结束，——自发的，而且是可怕的，甚至也是改变这个世界面貌的事件——起码是在旧的欧洲的西方。请看，如果我们最聪明的人们要肯定说什么不可能预料偶然事件等等的话，此外，如果他们的头脑里甚至也没有想过这个世纪的结局将是怎样的话，那么……

一句话：打补丁，打补丁，打补丁！

那么就让我们理智一些，让我们等待吧。如果您愿意，那么补丁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也是有益的东西，也是明智的和实际的东西。何况，比如说，还可以用补丁来欺骗对手。我们现在正在从事战争，如果发生了奥地利同我们反目的事，那么正好可以用“打补丁的办法”让它上当，奥地利自己是乐意上圈套的，因为奥地利是什么呢？它本身已奄奄一息，它很想有所发展，它如同土耳其一样，也是一个这样的“病夫”，而且或许比土耳其更糟一些。这是一种形形色色二元论的样板，各种民族、思想、敌对状态在本身内部联合的样板，各色各样不一致和取向矛盾互相依存的样板；这里有匈牙利人，有斯拉夫人，有德国人，也有犹太佬的王国等等……嗯，现在，由于外交界在讨好奥地利，它或许果真可能突发奇想，认为它是强大的，而这种强大也的确意义重大并且在共同参与决定命运方面能大有作为。这想象出来的骗局，正是依靠讨好和打补丁的办法为解决斯拉夫人的命运而引发的骗局，是有利可图的，一旦他突然发现并没有人害怕他，而他根本也并不强大，——他就可能惊愕得垂头丧气，简直非常难堪。英国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某种严重得多的事，何况如今还是在最基本的创始事业中极受关注的事。这个英国不会受打补丁和讨好之类的手段迷惑，无论怎样对英国讲，它无论如何也永远不会相信，当今世界上的一个巨大的、最强有力的民族，已经拔出了自己威武的

剑和扬起伟大思想旗帜并已经渡过多瑙河[1] 的民族，可能在着手解决它的任务时实际上愿意对自己有明显的损失，而唯一对它，即对英国有利。因为任何一种对斯拉夫种族命运的改善，在任何情况下，都明显是对英国的损害，这里用打补丁的办法无论如何也是讨好不了人的：人家不会相信！——在英国最简单不过地不会相信。又能用何种论证使它相信呢？说什么："我稍微起个头，但是我不作结束。"但是在政治上，事情的开端就意味着一切，因为开端或迟或早自然就要导致结局。至于说结局不是在今天出现，终归明天也会出现。总之，英国人不会相信，因此我们也应该不去相信英国人，或者尽可能少相信它，不言而喻，只是做到心里有数就可以。最好我们也能够料到，如今英国处在比任何时候都危急的关头。它的这种危急处境可以最精确地用一个词来形容——孤立，因为英国可能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啊，它是多么乐意现在能在欧洲找到同盟，找到某种 entente cordiale[2] 啊。但是它的不幸就在于，在欧洲还从未有过如此难于结成同盟的时刻。因为正是如今在欧洲一切都同时涌现，所有的世界性问题一下子都提出了，与此同时，所有的世界性的矛盾也都暴露无遗，因此各族人民和各个国家在自己家里都有非常多自己的事要处理。由于英国的利益并非是世界性的，而且它早已同别人割裂并仅仅只涉及一个英国，那么英国起码暂时只将处于异常孤立的状态。当然，它也甚至可能与享有共同利益却追逐另一目的的某方取得一致："我把那种东西给你，你把这种东西给我。"不过根据欧洲人当今所关注事物的性质来说，很难结成

① 俄国军队于1877年6月15日渡过多瑙河。

② 法文：诚挚的同盟。

这类 entente cordiale，起码在此刻是这样的，那么只得长久地等待，一直等到未来的发展中出现这样一种时刻，以便它能够同某方面胡乱结上同盟。此外，英国首先需要一个对它有利的同盟，也就是说，在这种同盟中它将捞取一切好处，而自己则尽可能不要付出任何代价。可如今正是如此有利可图的同盟看不见端倪，英国只得处于孤立之中。啊，要是我们能够成功地利用它这种孤立状态该多好呀！不过这里还有另一种惊叹："啊，如果我们是些不那么严重的怀疑论者的话，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的确存在着世界性问题，而它们并非是海市蜃楼，岂不更好！"主要的是，在我们俄国，我们的很大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对欧洲的看法和态度不现实，不清楚它现在的情况，总是事后才知道。对未来如何预料不到，更愿意议论过去的事，甚至是久远以前的事。

与此同时，世界性的问题却是确实存在着，尤其是我们怎能不相信它们的存在呢？这些问题中的两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而且并非是人类聪慧的发现，反而是靠它们自发之力，靠它们基本的机体的需求才引人注目。不管外交界如何打算，这些问题是不能不予以解决了。但是还有第三个问题，也是世界性的，也正在提出来而且差不多早已提出过。这个问题部分地说可以称之为德国问题，而实质上，就其整体来说，是最具全欧洲性质、最强有力地与整个欧洲的命运以及所有其余世界性问题的命运有机地融为一体。然而，表面上似乎在德国没有比现在更平安无事的了，在自己风暴强力的平静中它在注视着、观察着和期待着。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需要它，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依赖于它。然而……这都是幻景！事实是，现在的欧洲所有的人都各自有自己的事，每一家都有各自最重要的问题，各自都有一个差不多涉及本身生存这样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存

在与否的问题。德国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这一时刻恰好也正是别的一些世界性问题被提了出来的时刻，——看，欧洲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不妨先说为快，补充说一说，再没有比目前这一时刻对俄国更有利的了！因为欧洲从来也没有如同现在这样需要俄罗斯，而在欧洲看来俄罗斯也从来没有如同现在这样强大。与此同时，在这个陈旧的欧洲，还由于发生了与俄罗斯无关的、只属于欧洲的最根本的和最可怕的自己固有的诸多问题。而且在欧洲还从来没有如同现在这样高地看重过同俄国的结盟，俄罗斯还从来没有如同现在这样能够如此高兴地庆幸它不是陈旧的欧洲，而是一个崭新的俄罗斯，它自行其是，它自己是一个独特的和强有力的世界，对于它来说，现在正是踏上强盛的新的以及高一级阶段的时刻，而且也是比任何时候都能够成为独立于别的、他人的、凶险问题的时刻，古老、衰败的欧洲正好被这些问题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我同莫斯科一位熟人的谈话。关于一部新书的札记

(《作家日记》，1877 年，7～8 月号，第 1 章，Ⅰ)

在彼得堡，将我的早已误期的 5～6 月号《作家日记》交付出版之后，在我返回库尔斯克省时，特意转道经过莫斯科，同我的莫斯科旧相识之一就某些事情谈一谈。我与这位熟人很少会面，但是他的意见我却很重视①。交谈的内容我不打算全部转述在这里，尽管我当时得知时事中的某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对此我没有怀疑。同我的交谈者分手时，我对他提出说，我想利用这次机会从莫斯科绕一百五十俄里的小小弯路去拜访我青少年初期待过的地方，——早先为我父母所有，后来转手给我们的一位女亲属的村庄②。已经有四十个年头没有到过那里了，有多少次我都想要到那里去一趟，虽然这个小小的、很不起眼的地方在我日后的全部生活中留下了深刻而强烈的印象，而且在那里对我来说仍然充满着最珍贵的回忆，但是，过去我却一直未能成行。

---

① 可能是指斯拉夫派代表人物伊·谢·阿克萨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77 年 7 月 16 日给妻子的信中说，他打算在莫斯科同阿克萨科夫见面。

② 这里指的是达罗沃耶村，这个小村庄是他父亲于 1831 年购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77 年 7 月 18 日或 19 日从莫斯科来到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人就此次旅行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1877 年夏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我感觉一直很不错，我就劝他从彼得堡回密罗波里耶时顺便在莫斯科换乘去达罗沃耶的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果然这样做了。他到他妹妹薇·米·伊万诺娃家（此处地产已归她所有）住了两昼夜。"

"您终归有如此好的回忆和如此好的地方，而且我们大家也都有。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我们现在的青年，我们当今的孩子们、少年们会在他们的回忆中留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呢？而且会不会有呢？主要的是，那将是什么东西？属于哪一类的东西？"

当今的孩子们将来也会有神圣的回忆，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我们的生活就停滞不前了。如果生活中缺乏从童年的回忆中带来的神圣而珍贵的东西，那么一个人就不能够活下去。显然，有的人不会想到这一点，但是，终归这些回忆是他无意识地保存在心里的。回忆甚至可能是很沉重的、痛苦的，但是要知道，遭受过的折磨在日后也能够转变成为心灵的神圣之物。一般来说，人就是这样被创造的，那就是他喜爱他所经受过的折磨。除此之外，一个人最不免要去做的就是把他历程上的轨迹点标明出来，以便日后根据这些点勾勒出某种完整的东西好作为自己遵守的规矩和教训。此时，最最强烈而最具有影响力的回忆差不多总是那些从童年时代遗留下来的。因此，毋庸置疑的是，种种回忆以及种种印象，或许还是那些最强烈和最神圣的回忆和印象，也会被当今的孩子们带到自己生活中去。但是，在这些回忆中究竟将会是些什么东西，他们究竟将会把什么东西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去，这一珍贵的储备究竟如何形成并为他们所用——所有这一切，当然，既是一个有趣的，又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倘若对这个问题多少能够预想出答案，那么也就能够消除很多当代人忧心忡忡的疑虑，而且，很多人也可能就会高兴地对我们俄国青年抱有信心了；主要的是可以多少预测出我们的未来，预测出我们俄罗斯如此捉摸不定的未来情况。但是，糟糕的是，在我们俄国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过我们现今这样的一种时代，它为我们预感和预测总是谜团一样

的未来所提供的依据太少了。俄国的家庭还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松弛、衰败，更加不上品位和不定形。现在您在哪里找得到《童年与少年》呢？在那书里，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以严谨清晰的描写再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并把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家庭呈现给我们，或者像他的《战争与和平》中所写的呢？这两部叙事作品如今只不过是早已过去的历史画卷而已。啊，我全然并非想说，这是些如此美妙绝伦的画卷，我绝非想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再重复它们，我说的完全不是这个。我只是就它们的性质而言，就其性质的完美性、准确性和确定性而言——借助它们在托尔斯泰伯爵的两部作品中才能够那么清晰、明快地把时代描绘出来。当今所缺乏的正是这个，缺乏确定性，缺乏清晰度。当今的俄国家庭越来越变成一种偶合家庭，正是偶合家庭——这就是当代俄国家庭的定义。俄国家庭的旧日面貌仿佛突然消失，仿佛眨眼就不见了，可是新的面貌……它还能够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众望所归的和满足俄罗斯心灵的面貌吗？有一些甚至很严肃的人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根本没有”俄国家庭。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只是就俄国有文化教养的家庭而言，也就是说，就上等阶层的家庭而言，而非人民大众的家庭。不过，说到人民大众的家庭——难道当今它不也是问题吗？

“这是无可争辩的，”我的交谈者对我说道，“无可争辩的是，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里就会要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而且它们已经出现了，——一大堆问题，多得可怕至极的、从未有过的、迄今为止在人民中间闻所未闻的新问题，而所有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然而谁来给人民解答这些问题呢？我们之中有谁准备解答这些问题，谁第一个站出来，谁已在等待并准备要站出来解答呢？这就是问题，我们的问题，而且还是头等重要的问

题。”

当然是头等重要的问题。生活中如此陡然的转折，诸如2月19日的改革[1]，以及此后的所有改革，而主要的，像识字（甚至哪怕些许与此有关）等，所有这一切无可争辩地产生着并且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然后提出这些问题，将它们联结在一起，使它们确定下来，然而——事实上谁又会来回答这些问题呢？谁更贴近人民呢？神职人员吗？但是我们的神职人员早就不再解答人民的问题了。除非是那些胸中还燃着火一样对基督热忱的神父，他们常常是默默无闻的，不为人所知晓的。正因为他们丝毫不为自己打算，而仅仅为了教徒群众活着，——除非是这样一些人才能解答人民的问题。不过，唉，这样的人似乎也少得可怜。至于其余的一些人，如果非常需要得到他们的解答，——那么他们是会回答的，不过，瞧着吧，他们对此要打小报告的。还有一类神职人员，他们因无节制的勒索而远离自己的教徒群众，以致没有人会来向他们求教。对于这个话题还可以说下去，说得很多，不过，让我们以后再补充吧。此外，最贴近人民的人中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乡村教师。但是我们的乡村教师又有何用，又有何益呢？这个今日才刚刚开始的，而且就其对未来的意义来说，非常重要的新的团体是怎样的，它又能够解答些什么问题呢？对此我们最好不予回答。于是，其余的答案就是偶然的答案了，来自城镇、车站、通衢大道、大街小巷、集市，来自行人、流浪汉，而最终，还来自旧日的地主（关于官长我当然不提及）。啊，答案自然会是很多很多的，甚至答案比问题还要多得多，——回答会是善良的和恶毒的，愚蠢的和聪明的，但是这些答案的主要特征将是，每

① 指1861年的农民改革。

一个答案又会产生出三个新的问题，以此类推并 crescendo[①]。结果是混乱不堪，不过混乱不堪也不错：仓促解决问题比混乱不堪要坏得多。

“而主要的是，——用不着说这些。总会解决的。”

当然，会解决的，用不着我们也会解决的，有负责者的参与和没有负责者的参与都会得到解决的。罗斯坚强有力，它所经受过的还不止是这些。何况它的使命与目标并不在这里，它不必徒劳无益地从自己具有世纪意义的道路上折返，而且它的规模也不局限于此。谁要是相信俄罗斯，那么他就知道，它会坚决解决一切的，甚至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本质上仍然还会是它从前那个样子的，仍然还会是像它此前那样的、我们的神圣的俄罗斯，而且，不管它的面貌有多大的改变，但面貌的改变也没有什么可怕。让这些问题滞留，把它们推开，都没有必要：谁如果对俄罗斯是抱有信心的，那么他这样做，就应感到惭愧。它的使命是如此崇高，对这一使命它内心的预感是如此清晰（特别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主要是在现今这一时刻），以至于谁如果相信它的这一使命，那么他就应该高踞于所有的疑虑与担心之上，正如圣经上所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②]

那天早晨，我刚刚看到报纸，第一次看到报上有《安娜·卡列尼娜》第 8 部也就是最后一部单独发行的启事；原来整部小说从第 1 部起是在《俄国导报》上刊登的，而这最后一部却被编辑部拒登了。众所周知，小说的最后这第 8 部之所以被拒

---

① 意大利文：逐渐加强。

② 引自《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13 章，第 10 节。

绝刊登是因为它同该杂志的宗旨以及编辑人员的信念相左，而且正是由于小说作者对东方问题以及对去年那场战事的观点而导致的。我立即决定买这本书，在同我的交谈者告别时，由于知道他早已熟悉这本书的内容，就向他提出询问。他笑了起来：

“这是一本要多么无伤大雅就多么无伤大雅的书！”他回答道。“我根本不明白《俄国导报》为什么不刊登它。况且书的作者还给予他们以进行任何修正和加脚注的权利，如果他们不同意作者的观点的话[1]。因此，不妨直截了当地做一些脚注，就说，作者……”

不过，我无意于把我的交谈者提出的脚注写在这里，何

---

① 《俄国导报》编辑部因与托尔斯泰在东方问题上有分歧，拒绝在刊物上发表《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一部，即第8部，并在刊物上发表掩饰真实原因的声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时代》撰文向读者揭示真相，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俄国导报》的声明并以挖苦的语气进行解释。他在文章中说：“在5月号的《俄国导报》第472页上就《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几章为什么不能在刊物上出现作了说明，内容是这样的：‘在上一期的刊物上，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后面注明了“未完待续”。但是，随着小说女主人公的死亡，小说实际上就结束了。按照作者的计划，还应该有一个不长的两个印张的结尾，读者从结尾中能够知道，在安娜死后，弗龙斯基怀着难堪和悲痛的心情作为志愿人员去了塞尔维亚，所有其余的人都平安无事，列文仍然留在自己的庄园，他对斯拉夫委员会和志愿人员满腔怨气。作者可能把这几章要扩展为单独的版本。’我既然根据最可靠的消息来源知道《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几章不能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的真实原因，我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向读者说明全部真相。小说并没有随着女主人公的死亡而结束，小说的结尾部分原来已经由《俄国导报》排了版，准备付印，但是没能开印，因为作者不同意按照编辑部的要求删节某些部分；编辑部则不同意不加删节就付印，尽管作者已经向编辑部建议，可以附加编辑部认为必要的一切保留说明。”

况，他在做出这个脚注的同时，仍然继续笑着。但是，最后他却严肃地补充说：

“《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尽管是一位巨大的艺术天才，却是属于这类俄国思想家之一，他们所能清楚看到的，只不过是直接摆在他们眼前的东西，因此就突出这一点。至于要他们将脖颈向右或者向左转动一下，以便他们能够看见旁边的东西，显然，他们是不具备这种本领的。要他们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让他们扭转整个身躯。这种时候，他们才会说出完全相反的东西来，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总是非常真诚的。这种转折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也可能一个月之后就会发生，那时，可尊敬的作者就会用同样的热忱叫喊说，应该派遣志愿人员和应该撕扯裹伤用的棉线团，并且将会说我们现在所说的话……”

这本书我买到了，并且后来也读过了，我却根本没有发现它是如此“无伤大雅”。因为我，尽管我一向厌恶去评论与我同代的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却决定必须在《作家日记》中谈谈这本书（甚至很可能就在这一期），因此我觉得，把我就此书同我的交谈者的谈话写在这里也就不是多余的了。为此请求我的交谈者原谅我的冒昧……

渴望听到谣传和“秘而不宣”的事。“秘而不宣”这个词可能还有前途，因此有必要及早采取措施。再论偶合家庭

（《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1章，Ⅱ）

我准备要去的这些“我的童年的地方”，距离莫斯科总共有一百五十俄里远，其中有一百四十俄里在铁路线上；但是一百五十俄里的路程差不多得用十个小时。中途要停很多次，要转车，在一个站上为了转车就等候了三个小时，而且全都是在俄国铁路令人不愉快的情况下，在那些列车员以及“长官”极其不客气和几乎是傲慢无礼地对待你们和你们的需要的情况下发生的。大家早已熟知俄国铁路的一个公式：“不是铁路为公众而兴建，而是公众为铁路而存在。”所有铁路员工，从列车员到经理全部在内，没有哪一个会怀疑这个公式是颠扑不破的公理，也没有哪一个会不带着讥笑的惊奇看待你们，如果你们竟然会当着他们的面肯定说什么铁路是为了公众而兴建。而主要的还是，他们连听都不要听你们的话。

顺便说说，这个夏天我起码外出旅行走了四千俄里的路程，这一次一路上的人民到处都让我感到惊讶；人民到处都在谈论战争，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聆听和询问战事让普通老百姓更感兴趣和更好奇的了。在车厢里我甚至发现有几个农民在读报纸，多半还读出声来。随便往他们旁边一坐，就有那么一个小市民仔细打量您，开始时还小心谨慎，尤其是当他看见在您手里或者在您跟前有一份报纸时，——他就立即并且极其客气地询问：您从哪里来？如果您回答说从莫斯科或者从彼得堡

来（他更感兴趣的是，您是从南方，从奥德萨来的），那么他必定要问："关于战事听到些什么了吗？"随后，您只要略微在您的回答中带几分对他的信任并表示出愿意回答他的问题，那么他就会立即（尽管仍然小心翼翼地）将好奇的神态变成神秘的神态，向您靠拢并且提问，不过已经压低了声音："那么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吗？"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报纸上讲的更特殊一些的情况了吗？就是说，有什么情况秘而不宣呢？在此我可以补充说，人民中间没有人因为宣战而不满意政府，甚至在最幸灾乐祸的那类人中间也没有人不满意政府的，而幸灾乐祸的人是有的，但是，那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幸灾乐祸。比如说，在火车停站的时候，你在车站月台上走走，你就会突然听到说："我们的人有一万七千名阵亡，刚刚收到的电报！"你去看吧——是那么一个小伙子在大放厥词，他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凶险的狂喜，但根本不是说，说我们的人有一万七千名阵亡，他有多么高兴，不是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有些像一个人突然遭了火灾，一切的一切都烧得精光——茅屋、钱财、牲畜，于是他就说："东正教教徒们，你们看看我呀，一切都完啦，剩我光杆一个，一身褴褛！"在这种时刻，这个人往往也有某种凶险的自我狂喜的甜蜜感表现在脸上。但是，关于"一万七千人"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说，"这样一封电报是有的，只是人们把它给扣留了，秘而不宣，还不会宣布……人们看见过，都亲自读过……"——这就是一种看法。我忍不住突然走近人群说道，所有这一切全都是胡说八道，全都是愚蠢的谣传，他们不可能打死我们一万七千人，一切都很好。那个小伙子（好像出身于小市民阶层，不然，或许还是个农民）虽然多少有些尴尬，但是并不很厉害，他说："我们是些愚昧无知的人，我们道听途说，说些别人说过的话。"听众

很快就四散而去，何况这时车站的铃声也响起来了。我现在感到好奇，因为想知道，7月19日下午五点钟左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头一天，即7月18日，曾有一次普列文战役。怎么可能还会有电报呢，甚至还是发给某个什么人，更不要说还是在铁路列车的运行中间了。当然啦，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不过，我不认为，那个小伙子自己就是谣言的散布者和捏造者，更可信的是，他实际上是从某人那里听来的。不妨想一想，虚假传闻的炮制者，当然应该说，那些险恶的谣言的炮制者，在这个夏季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关于不幸和失败的谣传在俄国到处散布，当然是有其目的的，并非单纯撒谎而已。

由于人民对这场战争的热烈的爱国主义情绪；由于对这场战争的意义和任务的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在我们人民中间从去年起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由于人民对自己的沙皇陛下最热烈和虔敬的信任——那么一切扣留和保密战场消息，不仅无益，而且绝对有害。当然，谁也不能要求、不能希望把战略计划予以报道，把作战前的士兵人数，把军事秘密等等一概讲出来，但是，起码，维也纳报纸早于我们的报纸知道的事，——我们也可以早于他们知道的嘛。

待在车站上，不得不等候三个小时改乘另一趟火车时，我的心情极坏，对一切都怨恨不已。由于在等候中无所事事，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考虑一番我为什么要怨恨，这其中除了一般性的缘由之外，是否还有某一种偶然性的最近一段时间产生的呢？我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去探究，就突然自己笑了起来，找到了这个缘由。问题就在于不久前在车厢里的我的一次会晤，也就是在这个车站的前两站。那时突然车厢里来了一位绅士，道道地地的一位绅士，与俄国绅士的那一类型非常相像，即在海外漂泊的那一类型的绅士。他走进车厢，同时还带着自己的

小儿子，这孩子大约有八岁，不会大于八岁，甚至可能不到八岁。孩子穿着一身最时兴的欧式衣服，齐齐整整，上装非常漂亮，鞋很雅致，衬衣是上等细麻布的。显然，做父亲的很为他操心。这个小男孩儿刚一落座就突然对他的父亲说："爸爸，给我一支卷烟好吗?"那位爸爸立即伸手到口袋里，从中掏出一个珠母烟盒。从烟盒中抽出两支卷烟，一支给自己，另一支给小男孩儿，接着两人就以极其平常的神态抽起烟来了，这种神态足以说明，他们之间的这一做法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那位绅士在想着自己的什么心事，而小男孩儿则向车厢外看着，吸着烟，深深地一口一口吸着。他很快就把自己的那支烟吸完了，还没有过去一刻钟，突然他又说道："爸爸，给一支卷烟好吗?"——于是二人又重新抽起烟来，在他俩与我同乘一个车厢持续两站路的行程中，小男孩儿起码抽了四支卷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感到非常惊讶。如此小的一个孩子的虚弱稚嫩的、还没有充分发音的肺居然已经习惯于承受如此可怕的东西。如此反常而非自然的、早期养成的习惯能够从何而来的呢?不用说，看着父亲的样子，孩子们也就模仿起来；可是，难道做父亲的就能够允许自己的孩子遭受这样的毒害?肺结核，呼吸道黏膜炎，肺里的空洞——不幸的孩子不可抗拒地会患上这些疾病，十有八九，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正是做父亲的在自己孩子身上培养了这种不正常的早于其年龄的习惯！这位绅士原本想以此证明什么——我想象不出来，是他想证明他无视一般人固有的看法，是他想引进一种新的思想，即过去被禁止的，一概是胡说八道，却反而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我简直弄不明白。这次偶然遇到的事让我始终无法解释，这差不多是一件奇异的事。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父亲，大概今后也不会再遇

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常常会碰到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父亲！不过，我立即停止发笑。我之所以笑，是因为我这么快地找出了我心情不好的缘由。这里，尽管与我谈到的这件事没有直接联系，我还是记起了昨天我同我的交谈者的谈话。那次谈的是，当代的孩子们能将什么样的珍贵的和神圣的东西从他们的童年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其次，还提到我的关于当代家庭的偶合性的想法……于是我重新陷入一种很不愉快的思考中。

人们会问，这种所谓的偶合性是什么意思，我使用这个词有什么所指？现在我来回答。我认为，当代俄国家庭的偶合性就在于，当代做父亲的人丧失了对待家庭的一切共同思想，也就是对所有的父亲都普遍适用的共同思想，将他们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他们不仅自己相信这种思想，而且还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们也相信，将这种生活信念传授给他们。请你们还要注意到，这种思想，这种信念——甚至也可能是错误的，孩子们中间表现杰出的人日后会放弃它们，至少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孩子修正它们。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联结社会和家庭的共同思想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种行为准则的基础，也就是道德情操行为准则的基础，当然，它不免要经受改变、进步、矫正，即使如此，——毕竟是一种准则。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准则却是没有的，因为没有所有做父亲的人都相信的共同的维系大家的东西，而有的只不过是：一、对过去事物的彻头彻尾的全盘否定（一味否定，决无任何肯定）；二、也试图说些肯定的东西，但并非是共同的、能起联结作用的东西，而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只是一些分散成个体和单个人的尝试，并无经验可言，也无实践可谈，甚至连始创者们自己本身也缺乏对它们的充分信念。这些尝试有时甚至开头很漂亮，但半途而废，不能坚持到底，而有时则是一些完全不成体统的尝试，类

似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放纵，去做过去禁止做的一切，其根据的原则就是，过去的东西都是愚蠢的，于是做出愚蠢已极的乖张行为，比如说，竟然允许七岁的孩子吸烟；三、最后是对事业的懒散态度，委靡不振和懒惰成性的父亲，自私自利的人："唉，听天由命吧，我们有什么好操心的，就让孩子们去随大流吧，终归会有起色的，只是他们太烦人，要是根本就没有生他们出来就好了！"如此这般，结果就是俄国家庭的混乱、破裂和偶然性，——而希望——则只有依靠一个上帝："说不准上帝会恩赐我们某种共同的思想，于是我们就会重新联结在一起！"

这样一种状态自然而然要产生一种索然无味的情绪，而索然无味的情绪更会生成懒惰性，对那些性情急躁的人来说则产生寡廉鲜耻的、凶险的懒惰性。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完全不懒惰，相反甚至是非常勤勉的父亲，这大半是些具有思想的父亲。第一种人，比如说，听了不少甚至很不坏的东西，读了那么两三本启发人智慧的书，就把一切的教育和自己对家庭的职责归结为煎牛排这样一种菜，说"带着血丝的煎牛排，当然啦"等等。第二种人，本人最诚实不过，当年甚至还以其机智炫耀于人，解雇过三个看护自己小孩儿的保姆："无法忍受这些骗子，对她们有严格的禁令，当我昨天突然走进婴儿室的时候，请您设想一下，我听到了什么？她把莉卓奇卡安顿在摇篮里，而自己则教小女孩儿求告圣母，并且画着十字，说什么，主啊，施恩给爸爸，妈妈……要知道，这是我曾经严格禁止她做的！我现在决定要换一个英国保姆，但是能够好一点吗？"还有第三种人，他亲自为自己刚刚才十五岁的男孩儿寻找一个情人："否则，您可知道，可要养成那些可怕的孩子的恶习呢，要不到大街上去染上那种令人厌恶的疾病……不能让他这样，

最好早做预防，保证他安全……”第四种人使自己十七岁的男孩子领悟到最先进的“思想”，而后者则最自然不过地（因为早于自己的实际生活和经验而从别处获得的知识里能得出什么结果呢?）把这些先进的思想（有时往往是十分好的思想）归结为，“如果根本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那么，不就是能为所欲为嘛。”假定说，在这种情况下，做父亲的性情急躁，但是要知道，他们之中有多少人的急躁能说是由于某种严肃的东西引发的，是由于某种思想、痛苦而产生的呢？我们之中这样的人有很多吗？要知道，大多数人不过是自由主义的嘻嘻哈哈，随声附和而已，于是他的孩子带到自己生活中去的顶多也只不过是关于父亲的滑稽可笑的回忆，以及父亲滑稽可笑的形象。

不过，这是一些“勤勉的”父亲，他们为数并不多；比那些懒惰的父亲少得多。一个社会处于任何一种转型的和瓦解的状态时，它就会产生懒惰和消极情绪，因为在这种时代只有少数人才能清楚看到自己眼前的路而不会迷失方向。大多数人则感到迷乱不堪，丧失准绳，终于挥手说道：“唉，去你们的吧！还谈什么应尽职责义务之类的话，连我们自己中间都没有人能够明白地说出个道理来！只要自己一个人得过且过就行了，还谈什么职责义务。”就是这些懒惰的父亲，只要他们有钱，甚至也做他们应该做的一切：让孩子们穿得好，吃得好，给他雇家庭女教师，随后聘请男教师；最后，他们的孩子也许进入大学学习。不过……这里既与父亲无关，也与家庭无关了，青少年单枪匹马投入生活，他过没有心灵的生活，他的心与他走过的路，与他的家庭，与他的童年没有任何联系。还要说的是，这里提到的只是有钱的人们，他们很富裕，而富裕的人为数很多吗？大多数，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因此，贫穷之外再加上做父亲的懒得管家庭的事，孩子就彻底被置于偶然性的支配之下

了！父亲们的穷困、操劳，从童年起反映在他们心里的都是一幅幅悲惨的画面，而回忆有时也都是最具有毒害性质的。孩子们一直到垂暮之年都在回忆着父亲的冷漠，家庭的争吵、拌嘴、殴打，对他们令人痛苦的责骂和诅咒，怪罪他们是多余的一张吃饭的嘴。最糟的是，孩子们有时回忆着父亲的卑劣行径，为了谋取金钱或一个职位而采取的低级行为、丑恶的阴谋诡计和下贱的奴颜婢膝。随后，一生中长久地，可能终其一生，一个人都倾向于盲目地谴责这些旧时的人物，从自己的童年毫无所得，他怎么能缓解这些回忆中的丑恶东西，并且正当地，现实地，而且以理解的态度看待那些旧时的、老一代的人呢？虽然他曾在这些人跟前悲苦地度过了自己一生的最初岁月，但这还是孩子们中间较好的一些人，要知道，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只是把回忆中的丑恶东西随身带进自己的生活，而且把这种丑恶东西带进生活，甚至有意存以备用，将这种丑恶东西装满口袋上路，以便日后派上用场，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不再像他们的双亲那样还忍痛抑苦，反而心情愉快，说什么："在丑恶中全都习以为常，只有一些幻想家们才胡说什么理想之类的话，最好是同流合污。"……"可是，您究竟想要什么？他们究竟应该从童年承袭一些什么样的回忆好用来清洗自己家庭的丑恶，并且如您所说，用理解的目光，对待自己的父亲呢？"我现在就回答："我一个人又能说些什么呢，如果整个社会对此都没有答案？"我曾经说过，当代做父亲的并没有任何共同的、联结他们自己在一起的东西。伟大的思想并不存在（它已经消失了），而在他们的心目中也缺乏对这种思想的信念。而只有类似的伟大的信念才能产生出孩子们回忆中美好的东西，——甚至在童年境遇极其艰难、贫穷，摇篮时期的精神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也依然是这样的！噢，甚至不乏这种情

况，一个最堕落的父亲，但只要他心灵里还存留有哪怕只是一丝伟大思想的遥远的过去的形象，以及对这一思想的信念，他就能够而且做得到，把伟大思想和伟大情感的种子移植到自己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敏感而饥渴的心灵里去，从而在日后，仅仅就会为这一件好事而受到孩子们全心全意地宽恕，根本就不再计较别的什么了。缺乏正面的和美好的萌芽，一个人是不可能从童年踏进生活中去的，缺乏正面的和美好的萌芽就不可能放手让一代人走上人生之路。请看看吧，难道当代那些热切的和勤勉的父亲不相信这个吗？啊，他们全然相信，没有一种能起联结作用的、共同信奉的、合乎道德情操和激发公民感的思想，就不可能让后代成长起来并让他们投入人生！可他们这些做父亲的自身却全都一起丧失了整体的东西，丢弃了共同的东西，分裂为各个部分；他们只是在否定的方面联合一致，而且还是马虎行事，而在肯定的方面则分崩离析。事实上他们对自己也毫无信心，因为他们只说些人云亦云的话，依附于他人的生活和他人的思想，丧失了同土生土长的俄国生活的任何联系。

不过，我现在要重复说的是，这种热心的父亲为数并不多，而懒惰的父亲却太多太多。顺便提一下，你们还记得准科夫斯基一家的诉讼案吗？这一诉讼案是前不久发生的，即在本年6月10日在卡卢日斯基区法院审理的。在当前种种事件的电闪雷鸣中，很可能没有多少人曾经留意到这一案件。我曾在《新时代》上读到过它，我不知道它是否还在别的什么地方转载过。这一案件是关于彼列梅什利的五十岁的地主亚历山大·阿凡纳西耶夫·准科夫斯基少校及其妻子、四十岁的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娃·准科夫斯卡娅被控残酷虐待他们年幼的子女尼古拉、亚历山大和奥莉加的事……在这里，指出所谈到的这些孩

子们的年龄将是适当的：尼古拉——十三岁，奥莉加——十二岁，亚历山大——十一岁。我现在还要提前交代一下，法庭竟证实被告无罪。

在我看来，在这一讼案中异常尖锐地表露出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有典型意义的东西，与此同时其中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它的异乎寻常的普遍性和常见性。使人觉得就是目前这样的俄国家庭异乎寻常地多，——当然，并非说一模一样，并非说到处都有这样的偶然性，诸如抓挠脚后跟（此事后边还要谈到）之类，然而事情的实质所在，类似众多这些家庭的基本特征却是一样的，这正是我刚刚提到过的“懒惰的家庭”的典型例证。如果还不是完整无缺的，不是非常准确无误的典型例证的话（特别是考虑到别的一些非常特殊的和具有代表性的详情细节），那么，它终归仍然是这一典型例证的很不错的一个事例。但是，还是留给读者诸君自己去判断吧。被告是依据莫斯科高等法院的裁决而送交法庭审理的，让我们记起这一指控吧。现在我把《新时代》上的叙述原样转载在这里，也就是说以压缩的形式予以介绍。

又一例独行其是。《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

（《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2章，Ⅰ）

如今在我们俄国知识界中有很多人染上了一种恶习，常常开口闭口说：“什么人民？我本人就是人民。”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小说作者心爱的主人公列文说到他自己时，也说他本人就是人民。对于这个列文，以前有一次在我提到《安娜·卡列尼娜》时，我曾称他为“具有纯洁心灵的列文”①。如同过去一样我继续保持对他心地纯正的信念，我却不相信他就是人民；相反，现在我发现，他酷爱的是力求独行其是。在读过我在7～8月号日记开头提到的《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之后，我对此就确信无疑了。列文，事实上当然不是实有其人，只不过是小说家一个虚构的人物。不过这位小说家却有巨大的才华，具有过人的智慧，是俄国知识界十分敬爱的人，这位小说家在这个理想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部分地描述了作者本人对我们俄国当代现实生活的观点，这对每一个读过这部卓越作品的人来说，都是明白无误的。因此在评论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列文时，我们评论的将是当代俄国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对当前俄国现实生活的观点。甚至在我们如此具有爆炸性的时代，如此充满巨大震撼人心和快速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各种事实的时代，来进行评论，这已经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2章。

如此卓越的俄国作家对所有俄国人如此关注之事的观点（此事指近两年来在东方问题上的全俄民族运动），准确而彻底地表现在作家这部作品的第 8 部，也即最后一部，也正是这一部因作者的信念与《俄国导报》编辑部的信念相左而没有为后者采用，只得于前不久以单行本出现。作家这一观点的实质，就我的理解而言，主要在于，第一，所谓的全民族的运动，我们的人民全然不予以认同，而且人民甚至根本就不理解它；第二，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意捏造出来的，起先是一些有名的人物，随后新闻记者们也大力支持，为了有更多的人读他们的报刊而获利；第三，所有的志愿人员要么是些落魄的人和醉鬼，要么只不过是一些蠢货；第四，这所谓俄罗斯民族精神为了斯拉夫人而高涨的说法不只是某些人的捏造和受到出卖灵魂的新闻工作者们的支持，而且这么说吧，还是违背最基本的民意而伪造出来的……最后，第五，所有那些野蛮行径以及对斯拉夫人所施行的闻所未闻的种种折磨不能够激起我们俄国人感同身受的怜悯，“这种感同身受的对受压迫的斯拉夫人的感情不但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①。最后这一点表达得决然而彻底。

这样一来，“心地纯正的列文”就去独行其是而远离绝大多数的俄国人了。不过，他的观点既不新颖，也不独具一格。去年冬天在我们彼得堡有很多人差不多也这样想，还有一些人就其社会地位来说远非属于低等的，列文对于这些人很有用，也符合他们的口味，因此这本书出得倒是有点晚了，很可惜②。列文为什么竟然苦闷地独行其是，为什么如此忧郁地独来独

① 引号是列文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也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观点。

② 此处以及上文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堡欧洲自由派《欧洲通报》的抨击。

往——我无法说清楚。不错，这是一个热情的人，“不安生的人”，总喜欢对事物追根究底的人，如果严格予以评论的话，他也是一个什么也不相信的人。不过，终归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心地纯正的人”，我还是坚持这一点，尽管很难设想，最反常、最做作和最不成体统的情感是通过怎样隐秘的、而有时还是滑稽可笑的途径竟渗透到另外一个最高度真诚和纯洁的心灵中去的。不过，我还要指出的是，虽然很多人都确信，甚至我也清楚地看到（如同上面我已说过的那样），作者是通过列文这个人物来表述他自己的很多信念和观点，并把它们几乎是强行通过列文的口说出来，从而有时不惜明显地牺牲艺术性，但是，我绝不是把作者描述的这个人物与作者本人混为一谈。我在提到这一点时，处于一种痛苦的困惑之中，因为尽管作者以列文的名义表达的思想，确有许多显然仅属于列文一人，即属于艺术描写的典型人物，但是，终归这不是我所期待于这样的一位作者的！

一个斯拉夫主义者的自白

（《作家日记》，1877 年，7～8 月号，第 2 章，Ⅱ）

是的，这并不是我所期待于这样一位作者的。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我的某些感受，尽管从去年开始出版我的《日记》时，我曾经决定在其中不会有文学评论。但是感受并非评论，尽管我是就文学作品而有所感触。事实上，我写我的《日记》，也就是记录当前事件中最使我感到震惊的事，——那么，我何苦要因故意借口说我自己想出了一种义务要履行，而故意避而不谈或许是留下最强烈印象的东西，仅仅因为它们涉及俄国文学。当然，我去年的这个决定，就其基本思想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死板地去执行它，则是不正确的，我现在发现这一点，那只不过是拘泥字面而已。而到现在为止我避而不谈的这部文学作品，对于我来说，不单纯是文学作品，而已经是具有另外一种意义的整个事件了。或许我表达得太幼稚，不过我还是决定要这样讲：从这部小说、从这一虚构、从这部长诗产生了强烈印象这个事实，今年春天在我的心里，与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宣战这一巨大的事实相遇一起，而且这两个事实，这两种印象都在我的头脑里有它们相互之间实实在在的联系，双方接触的契合点使我感到惊异。人们与其笑我，不如倾听我往下说。

我在很多方面持有纯属斯拉夫主义者们的信念，尽管我可能还不是一个十足的斯拉夫主义者。什么是斯拉夫主义者，人们到现在为止各有各的理解。对于有些人来说，甚至时至今日，还如同过去的别林斯基那样，把斯拉夫主义看成只是克瓦

斯和小辣萝卜。别林斯基在对斯拉夫主义的理解上的确没有再前进一步。对于另外的一些人来说（这里我要指出，对于非常多的人，甚至差不多对于大多数斯拉夫主义者们自己），斯拉夫主义就是要解放所有的斯拉夫人，并把他们联合起来置于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之下，——这领导甚至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方面的。还有第三类人，他们认为，斯拉夫主义除了要把斯拉夫人都联合在俄罗斯领导之下外，还意味着和包含着一种精神的联盟，就是把凡是相信我们伟大的俄罗斯是所有联合的斯拉夫人的首领，能对全世界、全欧洲的人及其文明，讲出自己新颖的、健全的和世人闻所未闻的话的人结成的联盟。为了有利于真正地把全人类联合成一个新的、友爱的、全世界的联盟，这种话是会讲出来的，联盟的基础就植根于斯拉夫人的才智，而更主要的是在于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精神，俄罗斯人民如此长久地忍受痛苦，多少个世纪以来如此默默无闻，但它总在自身蕴藏着伟大的力量，准备在未来阐明和解决西欧文明中很多痛苦的和最致命的误解。我本人就属于这种信念和信仰的人。

这里并没有什么可嘲讽和讥笑的：这些话是老话，这种信仰也早已有之。但是只要这种信仰不消失，这些话有人还在说，那么，它们就将越来越壮大，扩展自己的圈子，并获得新的信徒，新的信念坚定的活动家，——只有这样，最终才会迫使这一学说的反对者们和嘲弄人的家伙们哪怕多少正视一下它，并从空洞的、对它漠然无动于衷的敌意中走出来。不过关于这一问题暂时就说到这里。事情是这样的，今年春天，为了伟大的功勋而从事的我们伟大的战争掀起来了[1]，尽管有些暂

---

① 俄土战争以沙皇于1877年4月12日宣布的谕旨正式开始。

时挫折，推迟了解决问题的时间，但或迟或早，终究要把建立功勋的事进行到底，即使未必能在这次战争中将它进行到完全的和热切盼望得到的终点。这一功勋如此伟大，战争的目的对于欧洲如此不可思议，以致欧洲当然会激愤而反对我们的奸诈行为，当然会不相信我们在开始战争的时候对它所宣布的话[①]，从而要千方百计，竭尽其全力损害我们，以虽然不是公开的、不是正式的政治同盟而与我们的敌人联合起来，——在期待公开的战争时，暗中与我们作对，同我们作战。这一切当然来自于我们所宣布的意图和目的！“伟大的东方之鹰高高飞起在世界之上，它的两只翅膀闪现在耶稣教之巅峰”[②]；它并不是想去征服，掠夺，扩展边界，而是想去解放、恢复被压迫和受虐待的人们，为了他们和人类的幸福给他们以新的生活。无论你怎样认为，无论你持怎样怀疑的观点看待这一事业，要知道，目的本身的实质就在于此，可是欧洲却不想相信这一点！请相信，俄罗斯准备要做出的努力，也就是说，俄罗斯有能力执行这样的任务并达到目的，使欧洲感到害怕。请特别注意这一点。欧洲觉得，不为自己直接的利益而采取某种行动是如此违反惯例，是如此超出国际关系通行常规，以致欧洲自然而然就把俄国所采取的行动不仅视为“落后的、野蛮的和尚未开化的”民族的野蛮行为[③]，而且这个民族在我们这个世纪异

---

① 这里指的是 1877 年 4 月 12 日沙皇的谕旨。谕旨说，俄罗斯人民对在土耳其受压迫的基督徒居民们的命运感同身受，经常关心，现在俄罗斯人民正准备为解除巴尔干半岛基督徒的苦难做出新的牺牲。

② 引自约翰·李赫坚别尔格尔的《预言之书》。见《作家日记》（1877 年，5～6 月号，第 1 章），引文与原文有出入。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是针对欧洲某些人士关于俄国野蛮落后、软弱无力的言论而发的。

想天开地想出了类似老早以前黑暗时代十字军远征这种低下和愚蠢的事[①]。此外，欧洲甚至还把俄国所采取的行动看成是对欧洲危险的，威胁着它伟大文明的不道德的事实。请看看吧，现在在欧洲有谁还特别喜爱我们？甚至连我们的那些坏透的、假装的朋友们，即所谓的真心的朋友们，全都公开宣称，他们很高兴我们的失败。俄国人的失败使他们觉得比他们自己的胜利还可喜，使他们感到欢乐，使他们心满意足[②]。如果取得成功，这些朋友们相互之间则早已协调好要使用一切力量从俄国获得的成功中攫取比俄国自己从中取得的更多的利益……

不过，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我开始说的，主要是今年春天这次战争宣战以来，所有相信俄罗斯未来的、伟大的、全人类的意义的人们本应在自己身上感受的那种印象。这场为了弱小者和被压迫者，为了给他们以生活和自由，而不是将它们剥夺而发动的前所未闻的战争，——这种如今在世界上早已不再听说的战争的目的突然出现了，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来说，如同一件庄严而意义重大的、证实了他们的信仰的事实而突然出现了。这已经不再是幻想，不再是猜测，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已经开始去完成的事。“如果业已开始去完成，那么就会进行到底，就会进行到实现斯拉夫人联盟的首脑俄罗斯将要对欧洲说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是反击英国《每日新闻》报的。该报记者的评论怀疑俄国参战并非是为了履行基督教的使命，解放被土耳其压迫的斯拉夫人，说俄国发起了新的十字军远征，是保加利亚人进行的复仇战争。俄罗斯国内的持民主倾向的《行动》月刊的文章也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幻想进行十字军征伐。

② “真心的朋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揶揄称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是从俄国报刊上看到的西欧国家敌视俄国的报道。报道说，西方认为俄国在战争中难以取胜，因为俄国野蛮落后、不文明，对俄军的失利幸灾乐祸，甚至认为俄国的失败对自己国家有利。

出的伟大的新颖的话。甚至这种话已经开始在说，尽管欧洲还远远不能理解它，并且也将长久地不相信它。”“信徒们”就曾经是这样想的。是的，印象是庄重而具有意义的，不用说，信徒们的信念本应更多经受些锻炼和更坚强一些。然而，已经开始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以致他们也遇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俄罗斯与欧洲！俄罗斯拔出剑来反对土耳其人，可是，谁知道呢，它也将会与欧洲发生冲突——这样做是否太早了一些？同欧洲发生冲突——这可同与土耳其人对抗不一样，这不是只用剑可以对付的。”信徒们总是这样来理解问题。但是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来应付另外一种冲突呢？说实在的，话已经开始说出去了，那么别说欧洲，就是在我们这里是否所有的人都理解这话呢？我们这些信徒，比如说吧，预言说，只有俄罗斯本身才蕴含有这样的因素，这就是无需战斗和不要流血，排除憎恶和恶意，为卑贱的兄弟解决全欧洲致命的问题。不过，当欧洲淌着自己的血的时候，俄罗斯会说这话的，因为此前在欧洲没有人会听到我们的话，而即使听到过，也根本不会理解它。我们这些信徒相信这一点，然而，我们这里，我们的俄国人回答我们的是什么呢？他们回答我们说，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狂乱的猜测、抽搐、疯癫的幻想和狂言，并且要我们举出证据、可靠的说明和业已完成的事实。为了证明我们的预言，现在我们拿什么给他们看呢？拿农民的解放——拿这种我们这里表现俄罗斯精神力量的程度还甚少为人理解的事实[①]？拿我们的天赋和我们自然的友爱之情？这种友爱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鲜明地在多少个世纪以来的压制下显露出来，尽管垃圾

①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争论的对象仍然是那位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幻想家的《行动》月刊那篇文章的作者。

和污泥现今还拦挡着它，使它变得肮脏，将它的面貌扭曲到不可辨认的程度。但是，就让我们把这个拿给他们看吧；可是他们对我们又会回答说，所有这些事实仍然只不过是我们的抽搐、疯狂的幻想，而并非是事实，说这些东西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并且自相矛盾，也证明不了什么，暂时还起不了作用。这就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会回答我们的，与此同时，我们这些不很理解我们自己本身、并对自己缺乏信心的人们，就是我们这些人——要与欧洲冲突！欧洲——要知道，这可是可怕而神圣的事物，欧洲呀！啊，先生们，你们可知道，我们这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家们（在你们看来，我们这些憎恶欧洲的人们），是多么珍视它——这个欧洲；这个"神圣奇幻的国度"！你们是否知道，我们怎样珍视这些"奇幻"的东西[1]，多么喜爱和尊重，我们以胜过亲兄弟的情谊喜爱和尊重这些居住在欧洲的伟大种族，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伟大的、美好的东西。你们是否知道，这一我们所珍视的、情同亲人的国度的命运把我们折磨得和让我们激动不安得要流眼泪，心脏也紧紧地收缩，那些越来越在它的天穹散布开来的悲惨的乌云让我们感到害怕？先生们，我们的欧洲人和西欧主义者们，按照你们的说法，我们这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家们，一向就是仇视欧洲的人，可是你们从来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深沉地爱过欧洲！我们珍视这一国度——它是保存于东方的伟大基督精神的未来的胜利，和平达到的胜利……我们担心在现今这场战争中与它发生冲突，我们更害怕的是欧洲不理解我们，如同过去一贯的那样，用高傲的态度看我们，蔑视我们，与我们兵戎相见，仍然视我们为野蛮

① 指在西方兴盛起来的哲学、科学、艺术、文学、平等、自由、博爱、人道主义思想和对人类幸福未来的信念。

人，认为我们没有资格在他们面前说三道四。是的，我们也曾扪心自问，我们说些什么，或者我们拿什么给它看，它才能理解我们？看来，我们现在还缺少什么东西好让它能够理解，并因之而尊重我们。我们基本的、主要的思想，我开始要说的“新颖的话”，它会很久很久、用很长的时间也不会理解的。它需要现今能予以理解的、用它现今的观点可以理解的事实。它向我们说：“你们的文明在哪里？在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混乱中，能看得出你们经济实力的有序状态吗？你们的科学在哪里，你们的艺术，你们的文学又在哪里？”

《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

（《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2章，Ⅲ）

那时，也就是今年春天，有一次在傍晚，我偶然在大街上遇到我最喜爱的我们作家中的一位。我同他很少见面，几个月才见到一次，而且总是偶然遇见，总也是在大街上。这位作家是我们小说家中五六个最卓越成员之一，这五六位成员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习惯于称之为“一代巨擘”[①]。起码，评论界追随读者之后，把这几位与别的小说家们特别区分开来，而且这事也有相当多的时日了，——总是这五六位，“一代巨擘”不再扩大。我喜欢同我这位亲切可爱的小说家见面，而且还喜欢向他证明说，我不相信，无论如何也不想相信他说的，自己年岁大了，再也写不出什么来啦。在与他短促的交谈中，我总能够听取到一些他的细腻而有远见的话。这一次见面是有可以用来交谈的话题的，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但是他立即直截了当地谈起《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刚刚来得及读完小说的第7部，也就是在《俄国导报》上最后登完的那一部。我的交谈者并不是一个兴奋型的人，然而这一次，他却以他对《安娜·卡列尼娜》所发表的意见的果断精神和既热烈又坚定的精神使我感到惊讶。

“这是一部前所未闻的作品，这是空前的第一部。我们作家中谁能与这位作家媲美呢？而在西欧——谁能写出哪怕是类

---

① 这里指的是伊·阿·冈察洛夫（1812—1891），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70年代与冈察洛夫接触不多，但关系友好。

似的东西来呢？在他们那里，在他们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近几年，甚至追溯到老早以前，曾经有过能与之并列的作品吗？”

在这一我自己也赞成的判断中，使我感到惊讶的主要是，关于欧洲的这一见解正巧与很多人自然产生的那些问题和疑惑联系了起来。这本书在我的眼里是个极有分量的事实，它可以代替我们向欧洲做出回答，也就是我们能够向欧洲展示的事实。当然，人们会狂呼乱叫跳起来讥笑说，这个嘛——仅仅只不过是文学而已，某一本小说，如此夸大其词并拿着小说到欧洲去露面太可笑了。我知道，人们会暴跳如雷和讥笑不已的，但是请少安毋躁，我并不是夸大，并且清醒地看到：我自己知道，眼下这只是一部小说，也不过只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中的点滴罢了，但对于我来说，主要之处就在于这点滴东西已经在眼前，已经有啦，确确实实存在，丝毫不假。因此，如果它已经存在，如果俄国的一位有才华的人能够让这一事实产生出来，那么他命中注定不会无所作为，他能够创造，能够拿出自己的，能够开始说自己的独到的话，时机一到，他就会把话全都说出来。何况这还远远不是什么点滴的问题！啊，在这里我也并非是夸张。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只是在巨擘之中某一成员身上，而且也在整个巨擘之中也找不出，严格地说，所谓的有天才的创造力量。无可争辩的天才，说出了“新颖的话”的无可争辩的天才在我们的文学中仅有三位：罗蒙诺索夫，普希金，部分地还有果戈理①。所有的巨擘（包括《安娜·卡列尼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0年3月24日（新历4月5日）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关于《战争与和平》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您说列·托尔斯泰等于我们文学中所有的一切最伟大的成就，绝对不能这样说！普希金、罗蒙诺索夫是天才。带着《彼得大帝的黑人》和《别尔金小说集》出现在文学中，（转下页）

娜》的作者在内）都直接继承自普希金，普希金是俄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他仍远远没有为人们所理解，没有被人们研究清楚。在普希金身上有两种主要的思想——而这两种思想都蕴含着俄罗斯全部未来使命以及全部未来目的的形象，因此也就是我们全部未来的命运①。第一种思想——俄罗斯的全世界性，它的富于同情心以及它的天才人物同世界上所有时代、所有民族天才人物们的真正的、无可争辩的和极其深远的血缘关系。普希金所表达的这一思想并不只是一种指示、学说或理论，不是幻想或者预言，而是已为他所付诸实施，这一思想就永远蕴含在他天才创作中并为他的创作所证实。他是一位古代世界的人，他既是德国人又是英国人，他深深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天资，自己追求中的苦恼(《鼠疫流行时期的宴会》)，他也是一位东方的诗人②。他向所有这些民族的人民说话并且宣称，俄国的天才人物知道他们，了解他们，如同亲人一样与他们接触，说他能够充分体现他们，说只有俄罗斯精神才具有全

（接上页）这就是带着天才的新贡献，在他之前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根本没有人做出过的新贡献出现在文学之中。而带着《战争与和平》出现，这就是说，在普希金已经做出过的新贡献之后出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托尔斯泰无论向前走多远多高，他都是在发展他之前天才已经第一个做出过的新贡献。”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纪60年代的有关文章中已经阐述过普希金创作中的这两种思想。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这一评价的依据是果戈理论普希金诗歌的文章。果戈理在《论我们诗人们的抒情风格》一文中写道：“他的反响何等准确，他的听觉何等敏锐！你会觉察到土地、时代、人民的气味、色彩。在西班牙他是西班牙人，同希腊人在一起他则是希腊人，在高加索他则是地道的山民……”谈到俄罗斯诗歌时果戈理写道：“我们的诗歌试演过所有的和音，有着所有种族的文学教养，聆听过所有诗人们的琴弦，谋取到某种世界性语言，以便培养好所有的人为重大事业去服务。”

世界性，它的使命是在未来把各种不同的民族联合在一起，并消除他们之间的所有矛盾。普希金的另一种思想——就是他的转向人民和他只寄希望于他们的力量。他呼吁说，只有在人民中，唯独在人民中间，我们才能够完全地获得我们俄罗斯的天才，并意识到他的使命。依然还是普希金，他不仅指明了这个问题，而且他还是在事实上做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从他开始，我们才有了真正地、自觉地转向人民的行动，从彼得大帝的改革后算起，在他之前，这样的事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现在全体巨擘也只是按照普希金的指示行事的，在他之后并不曾说过什么新颖的话。所有的胚胎都在普希金身上，全都是他所曾经指出过的。此外，巨擘所做出的也只是普希金指出过的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不过，由于他们已经做到的一切，由于他们以如此充沛的力量，以如此深邃而明确的精神所完成的一切，普希金当然也会认可他们的。《安娜·卡列尼娜》——就其思想来说，当然并不是新东西，并不是迄今为止前所未闻的东西。当然，不用它，我们也能够向欧洲直接指出渊源之所在，也就是指出普希金，他是俄罗斯天才独具一格的、最鲜明、最坚定和无可争辩的证明，还是他具有最伟大的世界性的、全人类性的和未来团结一切的意义的证明，是他享有这种权力的证明。（呜呼，不管我们怎样一再指明，但在西欧还将长时间不去读我们的东西，即使将来开始去读，那么也将长时间不会理解和评价他们所读的东西。而且他们也完全不具备评价的能力，倒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另外一种世界，好像我们是从月球上下来的，因此，我们最本质的一面他们都很难接受。这一切我都清楚，我之所以说“向欧洲指明”只不过就我们在欧洲面前有权相信我们自己的独立性这一意义而言。）然而《安娜·卡列尼娜》乃是

艺术作品的尽善尽美之作，而且正巧在当代的欧洲文学作品中没有任何类似的作品可以与它匹敌。其次，就其思想来说，这是一种我们的、与我们自己血肉相连的，也正是在欧洲人面前构成我们别具一格、构成我们民族“新的成就”或者起码是它的开端的作品，——这样的见地正是在欧洲听不到的，然而它又非常需要听到，尽管它傲视一切。我在这里不能展开文学评论，只想说不多的几句话。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提出关于人类的罪与犯罪的观点。人被置于异常的条件中。恶早已先于他们而存在。被置于周而复始的谎言之中的人们就犯罪，并且无可抗拒地毁灭。很显然，这是欧洲最喜欢、最古老的主题中的一种思想。然而，欧洲是怎样处理这一问题的呢？在欧洲，这一问题的处理不外两种方式。第一种处理方式，法律已出台，早已成文，正式颁发，制订已几千年。善与恶早已确定，早已作了衡量，其范围与程度早已历史地由人类的智者们规定妥当，早已为对人的心灵的不倦工作以及对人类共同生活中个体力量的作用程度所进行的高度科学考察所认定。对于这样制作出来的法典必须盲目依从，谁要是不依从，谁要是忽视它，那么他就得付出自由、财产、生命的代价，刻板地、惨无人道地付出。他们的文明本身就站出来说：“我知道，这既盲目，又不人道，更是不可取的，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中途不可能制订出它最终的规范，由于没有别的出路，就只好继续采用业已成文的东西，就只好刻板地和不人道地照章办事；不这样办——可能情况更糟。与此同时，尽管我们把这种反常的和荒诞的体制称之为我们伟大的欧洲文明，然而人类精神的力量却永远是健康的而不受损害的，社会相信它日趋完善的信念不会动摇，它也不敢想象美好与崇高事物的理想会泯灭，善与恶的概念会扭曲和变样，合情合理常因条件而变异，单纯与自然受到不断

增长的谎言的压制而毁灭!”另外一种相反的处理方式是:“因为社会结构本身的不正常，那么就不应当让其后果由单个人承担。因此，罪犯本人是没有责任的，罪行暂时也不存在。为了消灭犯罪和人的罪责，就应当消灭社会的不正常和社会结构的反常。由于医治事物现存秩序的弊病需要很长时间，同时也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这种良药，那么就应当一举摧毁全部社会，像用扫帚一样把旧秩序一扫而光。然后在另一种尚不为人知的基础上开始建设新的一切，新的基础终归不会比现在的秩序差，相反，它本身蕴含着很多成功的机会。主要的希望在于科学。”这就是第二种处理方式。人们期待着未来的蚁穴，当前就让鲜血染红大地。西欧的世界并没有提供别的解决犯罪与人的罪行的任何办法。

在俄国作者对犯罪与人的罪行的观点中明确认为，任何的蚁穴，任何“第四等级”[①] 的胜利，任何贫穷的消除，任何的劳动组织统统都不能够把人类从不正常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而也就是说，不能从罪责与犯罪行为中解救出来。这是通过对人的心灵所进行的深厚的心理探究表现出来的，表现极其深刻有力，其艺术描述的现实主义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有过的。这再透彻不过地表明，深藏于人类之中的恶远比社会主义者们的这些医师所认为的要更深，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摆脱不掉恶，人的心灵会依然故我，不正常现象和罪恶都渊源于它本身，人的精神的规律还如此不为人知，如此不为科学所窥测，如此不可确定和如此隐秘，以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良医，不可能有什么终审的法官，而有的只是他，他说:“伸冤在我，我必

① 指工人阶级或劳动群众，相对于第三等级（资产阶级）而言。

报应。”[1] 只有他一人知晓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和人的最终命运。人以其清白无辜的自豪感暂时还不能着手去处理任何事情，这种时刻还没有来到[2]。人的法官本身应有自知之明，应该知道他不是终审法官，他自己也是罪人。如果他手持尺子和天平而不拜倒在尚未破译的隐秘的法律面前，并且也不去走唯一的出路——仁慈与爱，那么天平和尺子拿在他的手里将是荒诞的。正是为了避免人们由于不了解自己的道路与命运，并由于确信恶的神秘的和注定的必然性而在绝望中毁灭，才向他们指明了出路。这条出路还是在小说倒数第2部中[3]，在才华横溢的精彩场面中，被诗人以天才的笔触描绘出来；那就是小说中描述女主人公病危的那幕场景，那时罪人和仇敌突然之间转变成为最高尚的人，转变成为兄弟，相互宽恕了一切，转变成为这样一种人，他们自己在相互宽恕的同时，也从自己身上除掉了谎言、罪过和犯罪，从而他们自己也就一下子证实自己无罪，充分意识到他们获得了此种权利。但是，此后，在小说的结尾，一步一步追踪探究到的人的精神沦落的悲惨而可怕的图景中，恶控制了人这个生物体，控制了他的每一行动，麻痹了他反抗的全部力量以及全部思想和与黑暗斗争的一切意愿，黑暗蒙在心头上，心灵怀着报复的激情自觉自愿地接受了这黑

---

① 《安娜·卡列尼娜》卷首题词。引自《新约全书·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述不准确。《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1章，第7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处误把《安娜·卡列尼娜》第4部中卡列宁与弗龙斯基在安娜病榻前的和解这一情节说成是在小说的倒数第二部。

暗，用它取代光明[①]——在这幅图景中——对于人类的法官，对于手持天平与尺子的法官，是有很多训诫的[②]。当然，他会由于惊恐与困惑而叫嚷说："不，我不总是要伸冤，也不总要报应。"——于是，他就不再不人道地责怪悲惨沦落的罪犯，说他曾鄙视向他指出的那种永恒的光明出路，并且有意识地鄙弃了它。起码，他不再去死抠法律条文的字句……

如果我们有如此巨大的思想力量和执行力量的文学作品，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可能在日后也会有自己的科学，自己解决经济的、社会的问题的办法，为什么西欧要否认我们的独立性，否认我们能说出自己所特有的话，——这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不可设想有这样一种可笑的思想，就是说，自然赋予我们的只是一种文学才能，所有其余的都是历史的、环境的和时间条件的问题。起码我们的那些欧洲人[③]可能会这样来判断，在期待真正的欧洲人做出判断之前……

① 此处讲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第7部。

② 见《新约全书·启示录》（第6章，第5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把俄国的西欧派称为俄国的欧洲人。

从农民那里获得对上帝信仰的地主

（《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2章，Ⅳ）

现在，当我已经倾诉了自己的情感之后，人们也许就会了解，这样好的一位作者的失手以及他的远离俄罗斯共同而伟大的事业，还有他在他那单独出版的不幸的小说第8部中对人民的奇谈怪论等，如何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他简直就剥夺了人民身上所有最珍贵的东西，取消了人民生活的最主要的意义。但愿我们的人民不要全身心地为因信仰而遭难的兄弟奋起，这样他会感到无比快慰。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才否认再明显不过的现象。当然，所有这些只不过表现在小说主人公这些虚构人物的身上，不过我还要重复一次说，明显不过的是，小说的作者本人与他的这些人物靠得很近。不错，这本小说是真诚的，作者说的也是出自内心的话。甚至一些最微妙的东西[①]（其中不乏微妙的东西）仿佛是漫不经意地安排在书中的，因此尽管它们很微妙，您却只会从直接的意义上去理解而不会有任何微小的曲解。不过，我仍然认为这本小册子不是那么毫无瑕疵的。不言而喻，如今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除非是再一次随声附和某些不合群的人。不过，有这样一种事实，即有这样一位作家这样写，毕竟是很不愉快的，这对于未来来说也是堪忧的。现在我最好还是干我的正事，我极想进行反驳，我要指出使我深为惊骇的是什么。

不过，首先还是让我来讲一讲列文——显然，这是小说的

① 可能是指列文对信仰与宗教问题的探求与议论。

主要角色;在他身上表现了正面的东西,与那些导致小说中别的一些人物毁灭或者遭受痛苦的不正常事物相对立,显然,这一人物是作者事先刻意如此安排的,好在他的身上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然而,列文却仍然并非完美无缺,仍然还欠缺些什么东西,为了让列文不用再构成任何疑问和问题,就应当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读者随后将会明白其中缘由,即为什么我停下来谈论这件事,而不直接转入正题。

列文很幸福,小说以他的极大荣耀而结束,但是他还缺乏内在的精神世界。人类的种种永恒的问题一直在折磨着他:上帝、永恒的生命以及善与恶等等问题。使他倍感痛苦的是,他不是一个信徒,他不能够安心满足于所有人都为之安心满足的东西,即诸如兴趣,崇拜自我或者自己本人的偶像,自尊等等。这是宽大胸怀的标志,不是吗?但是寄希望于列文的应当更多。顺便提一下,原来列文是个饱学之士。他熟悉很多哲学家①,熟悉一些实证论者②,以及一些纯粹的自然科学家,等等。然而什么都不能使他感到满足,相反更加让他感到糊涂,因此,在经营农业之余的时间,他就躲避到森林里去,到小树林里去独自生气,他甚至不像基蒂③ 本来应该受到的评价那样来评价自己的基蒂。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碰见一个农民,这个农民向他叙述了道德情操方面各异其趣的两个农民,即米秋赫和福卡内奇,他是这样说的:

---

① 列文"确信从唯物主义者那里找不到解答,于是他重新阅读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并不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人生"(《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9章)。

② 列文所熟悉的哲学家中的实证论者在托尔斯泰小说中提到的是斯宾塞(1820—1903)(见《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4章)。

③ 基蒂是列文的妻子。

“……米秋赫怎么会交不起呢！这个人很能榨取别人，而自己却一毛不拔。他连同教教友都不怜悯。可是福卡内奇大叔难道能这样狠心地勒索人吗？有人负了他的债，他也不催要，往往不能全部收回。人和人不一样。”

“可是为什么他不收回欠债呢？”

“是这样的，人跟人不同；一种人活着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拿米秋赫为例来说，他只为填他那个肚皮活着，可是福卡内奇大叔却是个正直的老人。他为灵魂而活着，上帝在他心中。”

“怎么知道上帝在他心中呢？怎么知道他是为灵魂而活着？”列文差不多喊叫了起来。

“当然是根据真理，根据神的旨意得知。要知道，人跟人是不同的。哪怕拿您作为例子来说吧，您也是不会去欺侮别人的……”

“是的，是的，再见！”列文说，由于激动而喘着气，并返身回来取走自己的手杖，快步朝家里走去。①

他于是又跑到林子里去，躺在白杨树下，差不多是在某种欣喜若狂的情况下思索起来。那句话找到了，所有万世不解的谜团破译啦，这只是那农民说的简单的一句话：“为灵魂而活着，上帝在他心中。”理所当然，农民并没有给他说什么新鲜的东西，所有一切他自己也早已知道；不过农民毕竟点拨了他的思想，在最微妙的时刻给他提示了解决的办法。随之而产生列文的一系列判断，这些判断非常正确，表达得也很准确。列文有这样一种想法，为什么要绞尽脑汁去寻求生活本身早已给

①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1章结尾至第12章，有删节。

出，每一个人与生俱来而且他（甚至不由自主）应当遵循并实际上也在遵循的东西？每个人生而具有良知，具有善恶感，因此他也就生而直接有他的生存的目的；为了善而生，不要喜爱恶。无论农民和老爷，无论法国人和俄国人，也无论土耳其人，全都为此而生——全都推崇善（注意：尽管很多人非常可怕地采取他自己的特有方式）。列文说，而我呢，原来曾经想通过数学、科学、理智来探知它，或者还曾指望出现奇迹，与此同时，这个得来却毫不费力，它是同我与生俱来的。说到它得来毫不费力，这里有唾手可得的证明，世人都清楚，或者说谁都能够明白，那就是应该如同爱你自己一样爱别人[①]。在这一常识中，实质上包含着人类的全部法典，这也是基督亲自向我们宣示的。与此同时，这一常识与生俱来，因此，它是毫不费力而获得的，因为理智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给出这样一种知识，——为什么？因为，如果根据理智来判断，"爱别人"将是不明智的。

> 我从何处获得这种知识呢？（列文问道）是否由于理智，我才能做到爱他人，而不是害他人？在童年时，人们对我这样说，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相信了，因为人们告诉我的正是我心里本来就有的。是谁揭示出来的呢？不是理智。理智揭示了为生存而竞争，揭示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要求扼死所有妨碍我满足自己欲望的人。这是理智做出的结论，可是理智没有能够揭示应该爱别人这个原则，因为这是不理智的。[②]

① 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2章，第31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②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2章。异体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标出的。

接下去，列文想起前不久孩子们中间发生的一幕情景。孩子们开始在点燃的蜡烛上煮覆盆子果酱，并往口里像喷泉一样倾倒牛奶。孩子们的母亲正碰见他们干这样的事，就开始劝导他们说，如果他们打碎茶杯，泼洒掉牛奶，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有茶杯和牛奶了。但是，孩子们显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够设想出“他们所享用的东西究竟有多少，因此，不能够设想他们所毁的东西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①”。

这是理所当然的，孩子们想，这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没什么要紧的，因为一向都是如此，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而且永远是老一套。这都用不着我们去考虑，这都是现成的。可是我们异想天开，想弄出一点儿自己的新玩意儿。于是我们想出了把覆盆子果酱放在茶杯里，然后把它放到蜡烛上煮，而牛奶则如同喷泉一样相互往嘴里倒。这既快活又新鲜，并且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差。

当我们用理智探求自然力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时，我们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我就是这样做的，列文继续往下想。

一切哲学理论通过人所不习惯的奇怪思路，引导人去认识他早已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非如此就不能生存下去的东西，不也正是这样吗？从每位哲学家的理论发展中不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也如同那个农民费奥多尔一样（而且一点也不比这个农民更明确）预先就毫无疑问地知道人生的主要意义，并且只不过想通过令人怀疑的推理方法回到尽人皆知的事物上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那么，好吧，就让这些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餐具，去挤牛奶等

① 此处以及下文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3章，引文稍有出入。

等，等等，他们还会淘气吗？他们会饿死的。那么，好吧，让我们心怀种种欲望和思想，但却毫无上帝和造物主的概念！那将会怎样？或者不懂得什么是善，也搞不清什么是道德上的恶，那又会怎样？

那么，好吧，那就请你们离开这些概念，去建造一个什么东西，试试看！

我们只能够进行破坏，因为我们在精神上是满足的，简直就是孩子！

总而言之，种种怀疑烟消云散，列文也有了信念，——信仰什么呢？对此他还没有十分明确，不过他已经在信仰。但是，这是信仰吗？他自己给自己高兴地提出这个问题：“难道这就是信仰？”应当认为，还不是。况且，像列文这类人，未必能够有最终的信仰。列文喜欢说自己是人民，可这是一位少爷，社会中上层圈子里的一位莫斯科少爷，这个圈子里的历史学家多半也是列夫·托尔斯泰伯爵[①]。虽然农民未曾对列文讲述什么新鲜的东西，但他毕竟把列文推向一种思想，从这一想法开始，也就有了信仰。仅就这一点来说，列文就会发现，他并不全然是人民，他不应该讲自己时说：我自己就是人民。但是，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现在我只是想说，类似列文这些人，无论他们同人民在一起或者靠近人民生活过多久的时间，

① 早在1871年5月18（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谈到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创作时，就已有类似的看法：“您知道——这其实是地主的文学，它所具有的一切全都说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漂亮极了）。不过这种最高级的地主的成就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程度，替代它的新成就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来得及。”

都根本不会成为人民，更有甚者——在很多方面他们永远不会、也根本不会理解人民。想要成为人民，只靠一厢情愿或者只靠一种意志（而且还是离奇的意志）的举措是不够的。就算他是一个地主，一个从事劳作的地主，既懂得农民的活计，又自己亲自参加割草和驾车，还知道，鲜黄瓜很配蜂巢里的蜂蜜。但是，别看他多么努力，毕竟在他的心灵里仍然还会残留某种阴影，这种阴影我以为，可以称之为游手好闲的习气——即是那种最本质的躯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游手好闲习气，这东西无论他怎样自戒，毕竟是来自遗传，在任何一个老爷身上人民都当然看得见它，因为不是用我们的这种目光来看。不过关于这一点，放到以后再说。可是他又把自己的信仰毁坏掉，自己将它毁掉，他坚持不了多久：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一切都一下子就倒塌了。基蒂走着路并且绊了一下几乎摔倒，那么她怎么会绊了一下呢？如果她绊了一下，就说明她不能不绊一下？再清楚不过地可以看出，她之所以绊了一下，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很清楚，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一些法则，而这些法则都是可以极严格地予以确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科学无处不在。那么，天意又何在？它的作用又在何处？人的责任在哪里？而如果没有天意，则我怎么能够相信上帝，等等。取一条直线你就可以延伸到无限远。总而言之，这颗真诚的心是一颗最空洞混沌的心，否则他也就不成其为当代俄国知识界圈子里的一位老爷，而且还是属于中上层贵族圈子里的老爷。

他是在他刚刚获得了信仰的一个小时之后紧接着就光辉地证明这一点的；他证明，俄罗斯人民根本感受不到一般来说人们所感受的东西，他极其专横地摧毁人民的心灵，更有甚者，——他宣称，他对人类的磨难不感到有任何怜悯之情。他

宣称，“对斯拉夫人遭受欺压一事，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感受”①。——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他，而且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不可能有这种感受。据他说，我本人就是人民。他们也未免过于低廉地评价俄国人民了，不过都是些过了时的评估员而已。在获得信仰还不足一个小时，就又开始在蜡烛的火上去煮覆盆子果酱了。

① 见《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5章。

易受刺激的自尊心

（《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3章，Ⅰ）

孩子们跑来对列文说，一些客人乘着车来了，——“有一位客人这样子挥舞手臂”①。原来这是从莫斯科来的客人。列文把他们安排在树底下坐好，给他们拿来蜂巢的蜂蜜和鲜黄瓜，客人们立即吃起蜂蜜并谈论起东方问题来了②。不是吗，他们讲的都是去年发生的事，——还记得吧：切尔尼亚耶夫③，志愿人员，捐献等等。谈话很快就激烈起来，因为大家都不可抑制地力图直捣主题。除去女士不说，对谈者们中有一个来自莫斯科的教授，他是个很可爱的人，不过有点蠢④。其次是一位（他被突出出来）头脑极其聪明，知识渊博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他是列文的同母异父兄弟。这个性格独特的人物被精巧地安排在小说中终究是可以理解的（他是40年代的人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刚全身心地、狂热地扑到斯拉夫问题的活动中去，而且委员会把很多事都委派他办，因此回想去年夏季的情况，很难设想他当时能够丢下事情

① 此处引文不准确。《安娜·卡列尼娜》第6部第14章中托尔斯泰写道：“‘非常可怕的一个人！瞧，手臂总是这样挥动。’塔尼娅在马车里站起身来，学着卡塔瓦索夫的样子说。”

② 见《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5章和第16章。

③ 米·格·切尔尼亚耶夫，俄国退役的将军，曾在土耳其与塞尔维亚作战中担任塞军总司令。

④ 这里指的是列文在大学时的同学，自然科学教授卡塔瓦索夫。他指责俄国政府对1876年塞尔维亚-土耳其战争采取中立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下文中称他为“愚蠢的家伙”。

不管而来到乡下住上整整两周的时间。说实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有在养蜂场上有关人民运动的谈话，因此，也就没有了这小说的全部第8部，这第8部完全是为了这次谈话而写的。不是吗，这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此之前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在莫斯科出版了他的一本论述俄国问题的学术专著，他曾为它早就做了准备并寄予很大希望，可是书却突然化为泡影，丢脸地化为泡影，没有任何人提及它，它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扑向了斯拉夫问题的活动，而且如此热情地投入，本来是不可能料到他会是这个样子的。因此，结论就是，他的投入并非出于本人的原意；他对斯拉夫人的全部热忱是出于 ambition rentrée①，如此而已，别无其他，而且您会清楚地预感到，列文在这样一个人的陪衬下不可能不成为优胜者。即使在小说前几部分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被非常精巧地刻画成很滑稽可笑的样子②；在小说的这第8部中，最终非常明显的是，这个人物被构想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在小说的结尾用以烘托列文的卓越不凡。不过，这个人物写得非常成功。

写得不成功的人物之中，其一就是老公爵。他坐在那里，并且议论着东方问题。他在全部小说中的其他部分都是写得不

① 法文：隐秘的自尊心。

② 《安娜·卡列尼娜》第6部第3章中，列文家中的人全都深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马上就会向瓦莲卡求婚，但是列文却怀疑“神奇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能够迈出这一步：“……他过惯了这样的一种精神生活，因而他与现实生活是无法随便迁就的，而瓦莲卡则总是讲求实际的。”列文在下边还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不是一定不可能恋爱，但是他没有那种必不可少的弱点……这类人头脑清晰，遇事思考周密，一经决定就不易改变。”

成功的，不仅仅在写东方问题这一情节上。这是小说中众多正面人物中的一个人物，写这些正面人物是专为表达正面的美而设置的，——当然，并不违反现实主义。他也有很多弱点，他差不多也有很多滑稽可笑的地方，然而他却是令人敬重的，令人敬重的。他是小说中的一个好心肠的人，也是一个思维能力正常的人，但是并非如冯维辛作品中那种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那种人反反复复地说个没完没了，仿佛是头有学问的驴：只具备正常思维能力而别无其他。不，这位老公爵并非如此，他有幽默感，他有做人的方方面面。有趣的是，这位老人是用来在小说中表达机智的。他是一个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是一个有众多子女（尽管子女们也都各各有了安置）的父亲。到了老年时，他对他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带着一种智者的安闲的微笑，然而这种微笑远非那样温和与不含敌意。他提出建议，但是您却要小心他对您玩智慧的游戏：他会带着斥骂回答您。这里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天晓得为什么，原本是充当起机智作用的这位思维正常的人却落得个并不机智，相反却显得甚至有些俗气。说实在的，整部小说中他都处处要闯出来说些什么机智的话，可是这只是他的一种愿望而已，结果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读者出于客气的考虑最终终于准备把他的这些尝试，可以说，就是把他拼命要说出俏皮话的努力就当做俏皮话，不过，更加不可取的是，在第8部，也就是以单行本出版的小说的这部分中，这个人物被安排来表达的仍然不是机智的东西(在这方面老公爵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却是卑鄙的东西，对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以及我们的人民构成无耻的和诽谤的东西。在这里他不再是一个好心肠的人，而成了一个既否定俄国人民又否定俄国人民身上一切优点的人。可以听出他那种俱乐部式的激愤，老年人的恼怒。不过老公爵的这种政治理论

一点也不新鲜，这是我们没有他也时刻能够听到的重复了千百次的老调重弹：

“我也是这样，”公爵说道，“那时我住在国外，读了很多报纸，并且，我承认，在保加利亚惨案之前，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爱起自己的斯拉夫兄弟来了，而我对他们却毫无爱意呢？我非常懊恼，我以为我是一个畸形人，（请看，他在说俏皮话：只是没想，他以为他自己是一个畸形人！）要么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起了作用（特别大的俏皮话）。但是，回到这里以后，我放下心来了，（这还用说！）我发现，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些人也只关心俄罗斯，却并不关心斯拉夫兄弟……”①

瞧，深刻就深刻在这里！只应该关注俄国。因此援助斯拉夫各族兄弟的事就被直率地认为不是俄国的事；假如他承认这是俄国的事——他也就不会说只应该关注俄国这种话了，因为关注斯拉夫各族兄弟的事当时本身就意味着关注俄国本身的事以及它的使命。因此，老公爵的观点的实质就在于他对俄国利益理解的狭隘性。这种说法怎么能听不到呢？这种说法可以听到千百次，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则仅仅能听到这种说法。然而，却还有比这恶劣得多的东西，这就是在这之前几分钟的一段谈话，老公爵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看在基督的分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请您给我讲一

①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5章。括号中的文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插入的讽刺性的话。下文中的引文分别出自第15章和第16章，有删节，有不准确的地方。文中的异体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标出的。

下，这些志愿兵都要到哪里去，去同谁作战呢？……”

“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平静地笑着回答说……

“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呢？是伊万·伊万内奇·拉戈佐夫和莉季娅·伊万诺芙娜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他就这样脱口而出了。您明白，他是往这里引他的话题，而且，可能为此他才很快地从卡尔斯巴德赶回来。不过，这已经是另一种问题，而老公爵提起这件事来似乎也不算好。当然，这一思想也不是新冒出来的，可是为什么又把它重新提出来呢？去年冬天，甚至有很多很多的人——要多少有多少，都肯定说，在俄国有人向土耳其人宣了战。这是人们推论出来的；可是，这一蹩脚的想法传来传去又传回到它的发明者们那里去了，因为去年在俄国没有人曾经向土耳其人宣过战，而要肯定这个——最起码也不过是夸大而已。说真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下边的话是开玩笑说的，可是天真而忠厚的列文，如同一个真正的 enfant terrible①，直言不讳地讲出老公爵心里想说的话。

“难道也没有宣过战，而是人们同情受苦受难的兄弟民族，并且愿意帮助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道。

“但是公爵说的并不是关于援助的事，”列文站在岳父一边辩解说，“他讲的是战争。公爵说，通常没有政府的允许，个人是不能去参加战争的。”

现在能了解列文关心的是什么了吧？问题已经直接提出来，不仅如此，卡塔瓦索夫的愚蠢举动还把问题解释得一清二

① 法文：无法对付的孩子。

楚。下面是列文接着说的话：

“我的理论是：一方面，战争是一种野蛮的、极其残酷的行为，因此，任何一个人，更不要说是一个基督徒，都不能够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而能够承担这种责任的只有政府。这是它的使命，它也回避不了。另一方面，无论从科学的角度看，无论从健全的思想看，在国家的事务上，特别是在战争问题上，公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同时用现成的话反驳他说：

“老弟，问题就在这里，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时政府不执行公民的意志，那么社会就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卡塔瓦索夫说道。

但是，显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赞成这种反驳……

总而言之，去年的确有人没有通过政府在俄国向土耳其人宣战，这件事被证实了并受到拥护。列文以其聪明的头脑本来可以看出卡塔瓦索夫是个愚蠢的家伙，这类卡塔瓦索夫之流到处都有，而去年的那次运动正是与卡塔瓦索夫之流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因为那是我们真正的俄罗斯的民族的运动，而不是玩什么反对派的游戏。但是，列文仍然坚持他自己的主张，他要把自己的指责进行到底；他所珍贵的不是真理，而是他所想出来的东西。看吧，他以怎样的判断来结束自己的想法：

……他（列文）同米哈伊里奇以及同传说中表示请瓦兰人①

① 指俄国史料中所指的斯堪的纳维亚传说的三个公爵（留里克、西纽斯、特鲁沃尔）、9—11 世纪俄罗斯公爵的雇佣军人以及在“从瓦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经商的商人。这里主要指瓦兰的三个公爵，传说请他们来担任统治者。

来统治的人民都说："来做我们的公爵，统治我们吧。我们愿意俯首听命。一切劳务，一切屈辱，一切牺牲都由我们承受；但是我们不做判断，不做决定。"可是现在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说法，人民已放弃了用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权利。

他本来还想说，如果社会舆论是绝对正确的评判人，那么为什么诸如革命、公社等等就不像支援斯拉夫人的运动那样合法呢？……

您听见了吧？无论怎样的想法都无法使这些先生们搞糊涂，甚至连最明显的事实也都无济于事。我已经说过，如果列文和老公爵根本不提出这样的指责就好了；但是，又有谁看不出来，他们中的一位——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另外一位则是一个爱发表奇谈怪论的人。不过，很可能，连列文也是个自尊心大受伤害的人。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就会突然伤害了人们的自尊心！与此同时，事情是明摆着的，这种指责是胡言乱语，而且甚至这种指责也不能够成立，因为这种指责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些根本就不是事实。

Tout ce qui n'est pas expressément permis est défendu[①]

(《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3章，Ⅱ)

去年曾向土耳其宣战，但宣战者不是俄罗斯，也不是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而是在斯拉夫人的土地上由斯拉夫人的统治者们，由他们的公爵们宣战的。也就是说，由他们的君主塞尔维亚米兰公爵和黑山尼古拉公爵宣战的，他们组织民军起而对抗土耳其，报复土耳其对它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骇人听闻的欺压、兽行、掠夺和屠杀，其中黑塞哥维那人不堪这种最残酷的欺榨终于举行起义反抗压迫者。全欧洲都知道黑塞哥维那人所遭受的前所未闻的折磨与屠杀，这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也传到了我们俄国，传到了我们知识界的圈子里，最终也传到了人民中间。因为它闻所未闻，因此就到处传播。得到的消息说，成千上万的人，老年人、孕妇、无人照顾的儿童，都纷纷离开自己的家园，逃离土耳其，奔赴邻国土地，走到哪里算哪里，没有食物，没有住所，没有衣物，处于一种动物自我保护的绝境之中。公爵们、教会、教会主持们都大声疾呼救助这些不幸的人，并着手为他们募捐。我们的人民也开始给他们提供援助，捐助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向指定的地点，流向各种杂志的编辑部，流向过去的斯拉夫人委员会分支机构——而在这方面，根

---

① 法文：凡是特别坚决不允许去做的，应该认为是被禁止的。(按：这里的两句话是据俄编者的俄译译出的，与下文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译译出的文字，在意义上稍有不同。——译者)

本就没有任何不合法之处，没有反政府或者不合道德规范的地方。相反，可以大胆地说，这只是大大的好事。至于说到那些异想天开向土耳其发动战争的公爵们，那么，无论俄罗斯，无论在俄罗斯的任何人在这方面都没有过错可言。说真的，这两位统治者中的一位，即塞尔维亚米兰公爵，并不是一位充分独立自主的人物；相反，他与苏丹是某种臣属关系，因此，有一份俄国报纸[①]痛苦地责备他说，他是一个叛逆者，而且为了使他十分难堪和羞辱他，还写文章说他起而反叛他的“宗主国”。但是，这毕竟仍然是米兰公爵本人自己的事，对此应由他本人负责。去年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俄罗斯境内的什么人宣的战，因此对苏丹都没有罪责可言。至于说捐献的东西源源不断，滚滚而来，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但是，突然有那么一位俄国将军，当时正无所事事，还不算老，只不过是个少将，过去曾因在中亚作战而知名，就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跑到塞尔维亚，并向米兰公爵表示愿为之效力。他被接受并被安排服役，但根本不是充任塞尔维亚军队的总司令，像长时间在我们俄国所传说的那样。于是就开始有了俄国的志愿人员，然而这些志愿人员无疑过去也曾有过，也就是说，在切尔尼亚耶夫将军之前就有过；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募捐的活动，捐献活动席卷了整个俄罗斯。去年一整年，所有的志愿人员，上帝也不知道有多少，只有不多的几千人[②]，但是为他们去塞尔维亚而来送行的人绝对是全俄罗斯，特别是人民，真正的人民，而不

① 指自由派的《呼声报》。

② 据《莫斯科新闻》报的说法，当时在塞尔维亚的俄国志愿人员共约三千三百人。另据自愿参加塞尔维亚骑兵部队的英国上校迈克-伊维尔说，当他离开时，在塞尔维亚的俄国人不超过三千人。

是恶狠狠的列文特别坚持认为的那种没有出息的角色；他甚至把志愿人员也认为是没有出息的角色[①]。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事不是在角落里暗中发生的，这事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能够看见并且确信，全体，也就是说，全俄罗斯都肯定，这种事是件好事。从人民这一方面表现出了如此多的高尚的、令人感动的和自觉的东西，以致整个去年发生的这一运动，这一支援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运动，无疑将成为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不过，为人民进行辩护而反驳列文这类人，向列文这类人证明说，那些人并不是一些没出息的人，也不仅仅出于迷恋，相反，他们是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的人，——要证实这些，我认为，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是没有必要的，何况——这样做甚至对于人民来说也是有伤尊严的。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公开当众进行的，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所宣布的事实是惊人的、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事实都记录在案，都被牢记而不会被遗忘的，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可争辩的。但是，关于人民的话题以后再说，至于说志愿人员，那么在他们之中既有崇高的援助他人的自我牺牲壮举（注意：基列耶夫[②]），怎么就不会出现普通的勇敢、眼明手快、放荡等等之类的事呢？已经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经常而到处发生的事。真的，还没有计算过，这些游手好闲的酒鬼、爱饶舌的人们中间（如果说志愿人员中间就有这类人的话），有多少人跑到老远的地方，为了慷慨的事业

---

① 这段话是针对他在下文即将引用的列文的一段话而讲的（见下文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列文的话，实际上是在同托尔斯泰争论。而在此下的《……我们的老师们到底教导我们些什么？》（1877年，7～8月号，第3章，Ⅳ）一文的结尾中则直接质问托尔斯泰。

② 尼·阿·基列耶夫，俄国退役的骑兵大尉，于1876年组织并指挥俄国志愿军赴塞尔维亚与土耳其军队作战，最后阵亡。

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对他们没有什么可起而加以反对甚至责骂的。但是，如果断言去年那些志愿人员全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人、酒鬼和堕落的人，——那最起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我不妨再重复说一遍，这事并非在角落里暗中进行的，所有的人全都能够看得见。不过，不论怎么说，去年肯定在俄罗斯没有人超越政府的职权而向邻国宣了战。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莉季娅·伊万诺芙娜伯爵夫人也不可能向土耳其人宣战，即使他们很想这样做。更进一步说，他们甚至也没有去动员志愿人员，他们没有招引，也没有雇用任何人，而去的人全都是充分自愿的，这些事绝对是众所周知的。至于说他们曾经帮助了志愿人员，此外，他们为了帮助不幸者、受折磨者和受伤而身残者还往斯拉夫人的土地寄了钱，而且，还用钱支援了那些奋起反抗以捍卫受难者的那些人——这些事是有过的。啊，这些事是有过的，而且甚至带着非常热切的愿望，就是希望吸血鬼土耳其人都折断自己的脖子，——是的，这些都有过，非常之多！但是，全部的问题在于，这是宣战吗？如果不是宣战，那么是否政府就禁止这一切呢，也就是说，是否禁止用钱支援那些为拯救基督徒而战的人们，并禁止希望土耳其人折断自己的脖子呢？我仍然不认为是禁止过的，因为这是公开进行的事，众人都看在眼里，众人都参与了，而志愿人员也都是从政府手里得到出国护照的呀！我不知道，或者可能有这样的法规，“个人没有政府的允许就不能参加战争”[1]，也就是说，没有自己政府的特别许可不得为外国君主服役。很可能确实有这样一种法规，有这样一种很古老的、还没有废除的法

[1]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5章。异体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标出的。

规；但是政府永远会自己来执行这条法规的，这与列文有何干系？所有这一切关他什么事？然而，他却正是为此而激动不安……

“Pardon monsieur，mais il me semble que tout ce qui m'est pas expressément défendu est permis.”

“Au contraire m-r：tout ce qui n'est pas expressément permis est défendu.”

译成俄语就是：

“是的，但是，我以为，凡是不特别坚持要禁止的，就可以被认为是允许的。”

“完全相反：凡是不特别坚持允许的，毫无疑问应被看做是禁止的。”

这是发生在法国的一个守秩序的人和一个不守秩序的人之间的滑稽的简短对话。但是，要知道，这位解释秩序的人是守秩序的，他是秩序的解释者和维护者，他就是这样的人物。而对于列文来说，又是怎样的呢？他在这类事情上又是怎样的一位专家呢？他总在担心，千万别丧失某些权利。与此同时，全体人民同情被欺压的基督徒，十分清楚自己是对的，没有做任何违反自己沙皇意志的事，而且自己的心是与自己的沙皇一体的。是的，人民明白这一点。那些装备志愿人员的人们同样也是这样想的。哪怕是在暗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用可笑的一种思想宽慰自己说，他干这事是违反政府的意志的。人们以急不可耐的心情和极大的期盼恭候沙皇陛下的谕旨，人们事先就预感到了它，并且没有失误。总之，对宣战进行指责是一种空泛的指责，这种指责不攻自破，而且也不应该予以支持。

但是，列文和老公爵自己庇护人民不受这种指责。他们直截了当地否认人民参加了去年的那场运动，并从而直截了当地

肯定说，人民什么都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所有这一切全都是新闻工作者为了赢得订户而人为地鼓动起来的，而且也是拉戈佐夫之流故意假造出来的①。

> “个人的意见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道，“当整个俄罗斯——全体人民表现出自己的意志时，个人的意见就微不足道了。”
>
> “很对不起，这我可看不出。人民连知道都还不知道。”老公爵说道。
>
> “爸爸，不是这样的……怎么不知道呢？那么星期天在教堂里不是讲了吗？”多莉听着他们的谈话，在一旁插嘴说……
>
> “星期天在教堂，那又怎么样？那是神父奉命而宣读的。他读啦，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明白，只是唉声叹气，就像平时每次布道时一样，”老公爵继续说他的。“然后人家就对他们说，教堂为了拯救灵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掏出一个戈比来并把它捐献了出去。干吗要捐献，他们自己并不清楚。”②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对《安娜·卡列尼娜》第 8 部第 15 章以及第 16 章中列文和“老公爵”的众多怀疑主义的议论感到愤慨，并且反唇相讥。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民间还流传着‘渎神的伊斯兰教徒’压迫东正教徒的传说。人民听说自己的兄弟受折磨，就站出来说话了。”列文含含糊糊地说：“可能是这样……可是我没有看见……”（第 15 章）；在同一章中老公爵莫明其妙地叫嚷说：“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呢？是伊万·伊万内奇·拉戈佐夫和莉季娅·伊万诺芙娜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在下一章中则说“报纸编辑们”受到嘲笑：“不错，所有的报纸都是一个腔调。这是真的。千人一调，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蛙鸣一样……他们告诉我，只要一有战事，他们的收入就倍增。可是为什么他们不顾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而一味这样做呢？”

②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 8 部，第 15 章。

这种意见纯属胡扯，与事实恰恰相反，它出自老公爵的口，不难解释。它来源于过去的监管人民的那个人，来源于过去的农奴主，他无论有多么善良，却总也不能不蔑视自己的奴仆，不能不认为自己在理解事物方面比他们高明得无法衡量；说什么“唉声叹气，什么也都没有弄明白”。现在来看看列文的意见，他起码不是作为过去的农奴主而被展示的。

“我用不着去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见过，现在也正看见成百上千的人舍弃一切来为正义的事业效力，他们来自俄罗斯的天南海北，坦诚而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目的。他们出钱，或者亲自去，直截了当地说出为了什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这意味着，”列文开始激动起来，他说道，“在八千万人民中间总会找到几百个甚至像现在这样几万个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他们就等着参加到普加乔夫一伙中去，到希瓦，到塞尔维亚……”

“我要对你说，不是成百上千的人，而且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而是人民中间的优秀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激动地说，仿佛在捍卫他最后的一份财产似的。“那么那些捐献呢？这可是直接反映出人民的意志。”

“‘人民’这个词的含义非常含糊不清，”列文说道。“乡里的那些文书，还有那些教师，还有千分之一的农民，他们倒可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其余的八千万人，如同米哈伊里奇一样，不仅没有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也丝毫不明白，他们应该对什么表达自己的意

志。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呢？”①

不妨在这里一劳永逸地指出，“人民的意志”一词在去年的那场运动中是不适宜提的，而且也全然没有什么用，因为它并不能准确地表示什么。去年并非是人民意志的表现，而是人民怜悯之情的表现，这是其一；其二，是对基督的热爱之情；其三，仿佛是人民自己的一种悔过，就像是斋戒祈祷一样——不错，可以这样来表达。对此，我在下边还将要做出解释，现在我要补充说，我非常高兴的是，列文的口中就去年的志愿人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道，加入普加乔夫一伙等等②。至少我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这些话归之为作者本人的话，对此我非常高兴，因为我明白无误地懂得，作者在行使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权利。他过分地觉得，火气冲天的多疑病患者列文，即作者本人创造的这一艺术人物，在当前争论的时刻，不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性格，也就是说，不能不用伤害人的辱骂来表达自己对志愿人员以及为志愿人员送行的俄罗斯人民的反应。何况，为去年的这场运动而指责人民愚昧和迟钝的话也曾盛行过，而暗示普加乔夫匪帮之类的话的确也曾出笼。在这里，我不妨顺便尽可能用最扼要的话语试做一点解释。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我们去年那场全民动员支援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运动这一自觉性的不解之谜呢？因为在相当一些圈子里的人们中间这的确

①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5章。

② 列文当时在激动中说：“照我看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乐意去——加入普加乔夫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5章）。

构成了整整一个谜团；说什么："怎么人民只是昨天才听说有什么斯拉夫各族人民，而连地理、连历史都一无所知，但是，瞧吧——为了斯拉夫人突然急得着了疯魔一样，斯拉夫人就那么突然间非常可爱起来！"[①] 除了相当一些圈子里的人们之外，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如同老公爵这样的人，也在他们各自的俱乐部里抓住这个话题不放，而且，显然列文也对它乐道不忘，因为很可以用它来支持他所提出的关于运动是某些人为了某些目的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解释。不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个人物展现出来，好像是为了反衬列文而成为人民运动自觉性的捍卫者的，但是他对自己的事业捍卫得很不得力，他也发火，而且一般来说，我已经指出过，这个人物是以一种滑稽可笑的样子展现的。然而，这种自觉性的和有见识的人民援助被压迫的基督徒的感情是非常明显的，是可以准确地解说清楚的，以致我不能不入迷似的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依照我的看法，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件事才能避免混乱，特别是避免成为谜团呢？

① 这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反讥的口吻转述的老公爵谢尔巴茨基和列文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种方式反驳谢尔巴茨基、列文以及社会上人们否定俄罗斯志愿人员的自觉性的言论。紧接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作家日记》1877 年 7～8 月号的一篇文章中指名反驳列文说："但是一种想法把他弄糊涂了，这种想法就是，人民并不了解历史和地理。"

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文化的俄罗斯人民深知东方问题最深刻的本质

（《作家日记》，1877 年，7～8 月号，第 3 章，Ⅲ）

俄罗斯人民及其国家从最初开始，从俄罗斯土地最初受洗礼之日[①]起，朝圣的人们就开始奔向神圣的土地，他们从自己的土地出发奔赴圣山[②]，朝拜主的棺木。还在十字军远征之时，一位俄罗斯的修道院院长就曾经步行去过耶路撒冷并受到耶路撒冷王“巴尔德文”的亲切接见，这都十分精彩地记述在他写的游记中。之后，一直到现在，这种去东方、去圣地朝圣的活动从来也没有中断。就是现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人曾经在圣山住过。这样看来，愚昧的、完全未曾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民，也就是说，甚至最普通的农民，尽管完全不清楚历史和地理，然而也在很久以前就很好地知道，那些多行不义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土耳其人统治着圣地和在那里的所有东方基督徒，而且也知道，在东方的基督徒生活得极其艰难和痛苦[③]。俄

---

① 俄罗斯受洗的年代为 861 或 862 年，受洗之日定为俄罗斯人民及其国家的开端，1862 年 9 月 8 日俄罗斯庆祝了自己建国的一千年。

② 巴勒斯坦被称为神圣的土地。据传说，基督教的主要圣迹——圣陵即处于耶路撒冷的圣墓大堂（亦称复活大堂）内。圣山为处于希腊哈尔基季基半岛东部的城市和山峦。圣山的寺院与俄罗斯的密切联系始于 11 世纪。

③ 圣地主要是指耶稣基督诞生、传道活动、被钉死于十字架上的地区。15—16 世纪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经过屡次征战侵占了巴尔干半岛诸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塞哥维那、莫尔达维亚等国均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

罗斯人民是怀着一颗悲苦的心明白这一切的；俄罗斯人民的特征就是这样的，它具有历史性，俄罗斯人民自古以来就高度评价步行去圣地悔过的这种英勇行为。他们的心总是向往着那里，——这是历史性的特征。身无分文的人们，老年人，退役的士兵，老年妇女，虽然完全不晓得地理，却背起自己乞讨的袋子离开自己的乡土，有时要遭受数不清的灾难，最终，的确抵达圣地。当他们返回故土时，人们都怀着虔敬的心听他们讲述他们远游的故事。而且一般来说，俄罗斯人民非常喜欢听有关“神的”故事。农民们、他们的孩子、城里的小市民、商人听这些故事甚至都深受感动和叹息唏嘘。比如说吧，提一个问题：谁读过《每月念诵集》[①]？无非是修道院里的某人，世俗人物里由于其职责要求的某个教授或者某一个吃斋并且做晚间祈祷的古怪老头之类的人。要得到这样的经文读物很困难，得去买，您不妨试着去教区暂时借来读一读——不会给您的。但是，您是否相信，在全部俄罗斯土地上《每月念诵集》却知之甚广——啊，当然不是指这整本书，——但是，起码这书的精神流传很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就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圣者传的男、女讲述者。他们根据《每月念诵集》的内容十分优美而准确地讲述，从不添加自己多余的话，人们都出神地听他们讲述。我自己在童年时，在还没有学会阅读之前，就曾经听过这样的讲述。后来，我甚至还在监狱里与匪徒们在一起听过这种故事，匪徒们也在听并且叹息唏嘘[②]。这些讲述的故事并不是根据书本相互传诵的，而是口头传诵的。这些圣者

---

① 进行宗教教诲的古俄罗斯文献，其中每月每日记载着东正教教会圣徒生平、有关节日的资料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白痴》中提到过此书。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回忆他在服苦役时的经历。

传的故事以及有关圣地的各种故事，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里面包含有某种悔过和纯净心灵的东西。甚至一些坏人，一些不齿于人类的人，小投机贩子和压迫人的人，也常常能由此而获得一种奇怪的和不可遏制的愿望去远游，去用劳苦和建立功勋来净化心灵，去执行久远以前许下的心愿。如果不是东方，不是耶路撒冷，那么就奔向俄罗斯的各处圣地，去基辅，去索洛韦茨基显圣者① 等地。涅克拉索夫，在创作他的《弗拉斯》一诗时，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不能够不把弗拉斯设想成一个身锁铁链为悔过而远游四方者。在我们人民生活中的这一特征——乃是历史性的特征，甚至仅仅因为这种特征在无论哪一个欧洲人民中都已不再存在，对这一特征就不可能不予以注意。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很难说清楚，何况通过学校以及识字、文化教育，无疑一些新的问题也逼近我们的人民，这些新的问题能够改变很多东西。不过，现在，用它，也只有用它，也就是说，只有用这一特征才可能理清楚去年我们人民为支援“斯拉夫兄弟”（像去年公开正式说的，而如今则差不多当做笑话说的那样）全部的自觉性的谜团。我们的人民的确关于斯拉夫人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不只是如同列文所说千分之一，甚至可能万分之一都没听说过，而且还是耳旁风似的听说过什么塞尔维亚人呀，黑山人呀，保加利亚人呀等等我们同一信仰的人。但是，我们的人民知道，差不多全体人民，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民都听说过和知道，东正教的基督徒正处在伊斯兰教徒的压制下，正在受苦受难，饱经折磨，而甚至最神圣

① 基辅的圣地是指基辅索菲娅大教堂和基辅洞穴修道院。索洛韦茨基显圣者是指建于索洛韦茨基群岛之一上的15世纪索洛韦茨基修道院。

的地方，耶路撒冷，圣山，也都属于异教徒所有。甚至在二十多年以前，俄罗斯人民就已经听说东方的基督徒受折磨以及圣地受蹂躏的事了，已故的君主开始同土耳其，随后又同欧洲开战，战争以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而告终[①]。那时，在战争开始时，从高层统治者那里也曾经说到圣地这个词，这个词人民从那时起也会牢记不忘的[②]。除此之外，还在去年我们掀起援助斯拉夫人运动的高潮之前，就早已开始了折磨这些斯拉夫人，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俄罗斯已经在谈论和写文章说这事了，而且我自己亲耳听见过那时在人民中间已经有人打听："土耳其人又起来啦，是真的吗?"除此之外（尽管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设想），我觉得，时间仿佛也促进了这一切，也就是说，促进了去年那次运动。相对来说，很长时间以前，我们这里相继发生了解放农民的事，这些年月终于来到了——可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人民究竟看到了什么呢？看见的是日益增长的酗酒滋事，日益增多和强大了的富农，自己的周围尽是贫穷景象，自身也是一副凶残形象，——很多人，啊，很多人，可能有某种悲戚、悔恨的悲戚、自我谴责的和寻求美好的神圣事物的悲戚感揪着心……但是，突然听到基督徒受压迫的声音，听

---

① 耶路撒冷从1517至1917年属土耳其所有；圣山一直到1913年希腊完全独立时，才脱离土耳其的统治。克里木战争（1853—1856）之前，以俄国为一方，土耳其、英国和法国为另一方，曾就"圣地"（即耶路撒冷）问题开展过长时间的外交较量。俄国军队1853年7月开进至多瑙河沿岸，土耳其于同年10月对俄国宣战，翌年3月英、法对俄宣战。英、法、土等国的联合参战导致塞瓦斯托波尔于1855年在11个月的保卫战之后陷落，俄国战败。已故的君主指尼古拉一世（1796—1855)，据说他在这次战败后自杀。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185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谕旨和当时的俄国报刊屡次提到的保卫斯拉夫人的东正教与圣地问题。

到了为教堂、为信仰受折磨的声音，听到了有关为了基督奉献头颅和走向十字架的基督徒们的声音。（因为如果他们同意背叛十字架而皈依伊斯兰教的话，他们就会被赦免并得到奖赏，——当然，这一点人民也是知道的。）掀起了一场进行捐献的呼吁，随后有了一位俄国将军[①] 前去帮助基督徒们的传闻，再随后就开始有了志愿人员，——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民感到震惊。如同我在上文已经提到的，正就是使人民感到震惊，仿佛是为号召悔过、为斋戒祈祷而震惊。凡是自己不能够亲自去的，就出钱，但是为志愿人员送行的则是所有的人，则是全体，全俄罗斯。而老公爵，坐在卡尔斯巴德，不可能理解这场运动，而且是在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刻嘴上挂着幽默的笑意回国的。不过，这位俱乐部的老头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人身上又能理解什么东西呢？聪明的列文本来应该能够比老公爵理解得多些，但是一种想法把他弄糊涂了。这种想法就是，人民并不了解历史和地理，而主要的，他的懊恼还在于，某些拉戈佐夫之类的人甚至也不问问他就宣战。但是，宣战的事并非事实，而从人民方面来说，仿佛只是一种共同的感动人的悔过，渴望参加某种神圣的事业，参加基督的事业，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些热烈维护十字架的人们，——这就是过去发生的一切。因此，这场运动是一场悔过的，与此同时也是一场历史性的运动。请注意，说俄罗斯人民的这种历史性的特征，也就是说，这种对“上帝的事业”、对圣地、对被压迫的基督教活动以及一般来说对所有悔过的、敬神的事物等等的热忱。要知道，我根本无意于为此赞许俄罗斯人民。我既不赞美，也不责难，我只是照实记录在案，用这种事实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我们有这样的历史

① 指米·格·切尔尼亚耶夫。

性特征，有什么法子呢？我不知道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但是，很可能，会得出什么结论来的。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所有最重要的东西总是依据它们最重要的和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特点而形成的。比如说，现在，由于我们上边所指出的我们人民的历史性特征，在我们这里就可能每一次在俄国同苏丹的战争中，就出现我们人民对待这类战争所持的民族自觉的态度，因此，人民热情地参加到这种战争中来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且还仅仅因为俄国人民也并不清楚历史和地理。凡是它所应该知道的，它都知道。啊，我们的人民——不识字的大老粗，这无可争辩，甚至在道德情操方面，关于它身上根深蒂固的、古老的历史的特征，也可以说上很多很多卓越的和最有文化的东西。那些俄国人可能会说，他们的远游朝圣——只不过是对他们的义务和职责的狭隘的理解；没有必要为寻求好的东西徒步走那么远，最好不过的是，不要再酗酒，致力于自己福利的增加，积累经济实力，不殴打妻子，把目光放在兴办学校、修建公路上等等，——总之，哪怕用什么办法让俄罗斯，它的祖国，最终成为一个与别的一些“文明的欧洲国家”相似的国家[①]。最后，可以劝导朝圣的人说，去那些圣地朝拜上帝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主要之处在于，无论对他本人，也无论对他的家庭，以及对任何人，都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相反，甚至还会带来害处，因为去朝圣的人，长时间离去，丢弃自己的家园，实质上是为了一种自私的目的，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

① 此处以及下文中提到的“欧洲国家的文明”是一种讥讽性的表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对欧洲文明在社会和道德层面上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认为欧洲列强对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未曾给予过任何同情和支持，从这里可以看出欧洲文明的虚伪与自私。

与此同时，如果他能利用闲暇的时间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岂不更好？坐在菜园子里，照看照看牛犊等等，这时上帝岂不是无可比拟地感到更加愉快？一句话，还可以讲上很多漂亮的话；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这一历史性特征正是这样形成的，而且在我们人民中间对善良事物的寻求又采取了差不多是这唯一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悔过的形式，以朝圣或者捐献的方式。在期待“文明”的同时，聪明的列文起码应该考虑到人民的这一历史性特征。他起码应该明白，很多的志愿人员以及为他们送行的人的行为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做好事。(对此不可能不表示同意!）因此，无论怎么说，这些人是人民中间的优秀代表，当然，并非是“光辉照人的有文化的人”，但也不是什么堕落的人，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不是没出息的角色，不是没完没了说空话的人，相反，甚至可能是些人民中间的优秀人物。这件事如同基督的事一样是坦直进行的，而在很多人、非常多的人们的心灵深处——则正是一种起净化作用和悔过的事。在全体人民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为此事在自己的沙皇陛下面前有过错！相反，他知道，解放者沙皇陛下以其仁慈的心同自己的臣民是一体的。所有的人都怀着尊敬和期盼的心等待着沙皇陛下的圣谕，而我们，我们坐在我们各自的角落里，暗自高兴，因为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证实了我们对它的伟大而永恒的希望。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怎么可能把它的高尚的和温顺的运动——比作是普加乔夫匪帮，比作是公社等等的呢！正是只有像列文这种激愤到发抖的多疑症患者才能够说出这话。瞧，气量狭窄意味着什么！

列文的激愤发抖。问题：距离是否对仁爱有影响？是否能够同意一个被俘的土耳其人关于我们某些女士的仁慈心的看法？我们的老师们到底教导我们些什么？

（《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3章，Ⅳ）

但是列文的激愤发抖还更进了一步，列文直截了当而且纠缠不休地宣称，对斯拉夫受苦受难的怜悯，“对斯拉夫人受压迫的直接的感受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道：

> “……这里没有宣战的问题，而只不过是人类的感情、基督徒的感情的表露。别人正在杀害同一血缘的同胞和同教的兄弟。好吧，即使不是同胞，不是同教的兄弟，而是一般的儿童、妇女、老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俄罗斯人动了感情，就跑去制止暴行。你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在街上走，你看见一个醉汉正在殴打妇女或者儿童，我想你不会去问是不是向这人宣过战，而你一定会冲向他，保护受欺负的人。”
>
> “但是我不会打死他。”列文说。
>
> “不，你会打死他的。”
>
> “我不知道。如果我碰到这种事，我就凭我的直觉去行事；但是事先我不能够说我怎样去行动。而且这种对斯拉夫人受压迫的直觉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
> “可能你不会有。但是别人会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地皱着眉头说。“民间还流传着‘渎神的伊斯兰教徒’压迫东正教

徒的传说。人民听说自己的兄弟受了折磨，就站出来说话了。”

“可能是这样，”列文含含糊糊地说道，“可是我却没有看见；我本人就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这种感觉。”①

又说什么“我本人就是人民。”我再重复一遍，仅仅在两个小时之前，这个列文才从一个农民那里获得了信仰，至少是后者开导了他怎样去信仰。我无意于称赞那个农民，也无意于贬低列文，而且现在也不想来判断他们之中谁信仰得更好，谁的心灵的状态处于更高和更发展的境界等等。但是，要知道，您会同意，我之所以不厌其烦一再说这一点，就是仅仅从这一事实出发，列文也会想到，他与人民之间是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差异的。看看他说的：“我本人就是人民。”可是，为什么他如此自信地说他本人就是人民呢？就因为他会套车，并且知道鲜黄瓜拌着蜂蜜是不错的。瞧，人们就是这样！多么自命不凡，多么骄傲，多么狂妄自尊！

不过，终归这不是主要的。列文肯定说，对斯拉夫人受压迫的直接感受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人家反驳他说，“人民听说自己的兄弟受折磨，于是站出来说话，”而他却回答说：“可能是这样，可是我却没有看见；我本人就是人民，我却没有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怜悯吗？请注意，列文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关于对斯拉夫人受压迫的怜悯和直接感受的争论处理得转弯抹角，仿佛有意让列文在争论中取胜而结束。比如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竭尽全力争辩说，如果列文走路时看见有醉汉殴打妇女，那么他会扑上去解救她的！列文反驳说：“但是我不会

①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5章。

杀人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却坚持说:“不，你会杀人的。”当然，他这是胡说八道，因为，有谁会在帮助被醉汉殴打的妇女时，会去杀死醉汉呢？可以用不着杀醉汉而把妇女解救出来。而主要之点并不在于大街上的斗殴这种事，这种比喻不正确，不是一码事。说的是斯拉夫人，说他们所遭受的折磨、拷打、杀害，列文非常清楚他说的是斯拉夫人的事。因此，当他说他不知道他是否会去帮助，以及他没有看见和什么也没有感受到等等之类话的时候，那么他正好就是宣称，他对斯拉夫人的受苦受难并不感到怜悯（并非是对受醉汉殴打的妇女的受折磨不感到怜悯），而且他还一再坚持说，对斯拉夫人受压没有直接的感受，也不可能有。他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讲述的。

这里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心理事实。《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的单行本只是在两个半月以前出版的[①]，而在两个半月之前，事情早就已昭然若揭了，关于无数斯拉夫人受苦受难的数不清的故事——完完全全是真实的，——都是如今为各民族的众多证人和目击者所证实了的事实。我们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所得知的有关斯拉夫人受折磨的事远远胜过任何一种病态的和狂乱的幻想。众所周知，这些屠杀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贯的、有意挑起并在千方百计的纵容下发生的。成千上万的人遭受灭绝之灾，其折磨的凶残是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当着他们子女的面，活生生地把他们的皮剥下来；让母亲们亲眼目睹把她们的婴儿抛起来用刺刀挑，奸淫妇女，奸淫时还用匕首刺穿她，而主要的，行刑折磨婴儿时还辱骂他们。列文说，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于“两个半月以前出版”是不确切的。实际时间要晚一些，具体时间是6月底至7月初。

他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并且狂热地肯定说，对斯拉夫人的受压迫没有直接感受，而且也不可能有。但是我敢于让列文先生相信，感受能够有，我本人对此就不止一次是见证者。比如说，我曾经看见过一位先生，他并不喜欢谈论自己的感受，但是当他听说，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儿当着他姐姐的面被用针刺穿了两眼，随后又被插在木橛子上，由于小男孩儿不是很快就能死去，就长时间哭喊着，——当那位先生听到这种情况时，差一点没有生一场病，那一夜他无法入睡，连续两天时间处于极其沉重而无法振作的精神状态中，无法做什么事。我胆敢就此让列文先生相信，这位先生是一个正直而无可争议的正派人，远非是一个没出息的人，更不是普加乔夫匪帮的成员。我只想声明，对斯拉夫人遭受折磨的直接感受是能够存在的，而且甚至还会是最强烈的，而且甚至还会存在于社会的所有阶级之中。然而列文坚持说，这种感受不可能有，说他本人什么也没有感受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解之谜。当然，有一些只不过是没有情感的人，粗鲁的人，发育不正常的人。但是，列文似乎并不是这种人，他是作为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而呈现出来的。在这里起作用的莫非只是距离的缘故？事实上，在另外一些原型人物身上是否就没有这种心理的特别之处呢？“我本人没有看见，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我什么也感觉不到。”试想，在火星上有人，在火星上挖婴儿的双眼。要知道，这样一来，我们在地球上可能就不会怜惜，起码不会是非常怜惜？那么，可能，同样的情况，在地球上相距非常遥远：“唉，在国外另一个半球上，不是在我们这里！”也就是说，虽然他没有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口来，但是他是这样感觉的，也就是说，他什么也没有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距离的确如此影响仁慈，那么自然而然就要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在多大的距离上仁

爱之心就终止了呢？在仁爱方面列文的的确确是一个不解的谜。他坦诚地肯定说，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杀人。

> 如果我碰到这种事，我就凭我的直觉去行动，但事先我不能说我会采取什么行动。①

就是说，他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与此同时，这个人却是多情善感的，瞧，作为一个多情善感的人，他又害怕杀死……土耳其人。请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列文已经在场，在那里，手执上了刺刀的枪，离开他两步远的地方，土耳其人狂暴地正准备用针刺穿小男孩儿的眼睛，这个孩子已经被抓在他的手里。小男孩儿七岁的姐姐哭喊着并且疯狂地扑上去要把小男孩儿从土耳其人的手里夺过来。于是列文沉思地站着并且迟疑不决：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我本人就是人民。对斯拉夫人的受压迫没有直接的感受，而且也不可能有。”

不，在他向我们说了这些话之后，当真他会做什么呢？嗯，怎么不会是去解救小男孩儿呢？难道就让他受折磨，难道不立即从土耳其恶棍手里把小孩儿夺过来吗？

“是的，夺过来，但是，要知道，这样做得狠狠地推土耳其人一把？”

“那就去推他一把！”

“推他一把！而如果他不愿意交出小男孩儿并且抽出马刀呢？可能不得不杀死土耳其人？”

“那就杀死他！”

---

①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 8 部，第 15 章。

“不，怎么能杀死呢！不，不可能杀死土耳其人。不，最好还是让他刺穿小男孩儿的双目和折磨他吧，而我则要去找基蒂。”

这就是列文应当做的，这是从他的坚信中，从他所说那些话语中直接得出的结果。他毫不隐讳地说，我不知道，是否会去帮助那个妇女或者那个小男孩儿，如果这样做需要打死那个土耳其人的话。可是，他却又非常怜惜土耳其人。

> “这事放在二十年前，我们会缄默不语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道），可是现在我们听到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准备团结得如同一个人一样奋起，并准备为受压迫的兄弟而献身。这是一种伟大的行动和力量的保证。”
>
> “可是要知道，这不仅仅是自我牺牲，而且还要屠杀土耳其人，”列文犹豫地说道。“人民去牺牲并准备去牺牲，是为了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为屠杀……”①

这也就是说，换一种说法：“小姑娘，把这钱，把这为了我们的灵魂做出的捐献拿去吧，而你的弟弟就让他们把双目刺穿吧。不能把土耳其人杀死……”

接着就是小说的作者本人关于列文所说的话：

> ……他不能够同意的是，包括他哥哥在内的那么几十个人，根据几百个来到都城向他们说漂亮话的志愿人员对他们说的话，就有权说他们和报纸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也表达了人民要复仇

①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6章。

和屠杀的思想。[①]

这是不公正的，没有任何的复仇可言。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同这些嗜血成性的人们进行的战争中，我们所听到的也只是俄国方面最仁慈为怀的事实。不妨大胆地说，欧洲的军队中没有多少军队能够如同我们的军队现在这样对待如此坏的敌人。不久前，在两三份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说，为了减少暴行，对那些证据确凿的有兽行和残暴行为的土耳其人实施惩处，是否更好一些？土耳其人对俘虏和伤员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折磨之后才将他们杀死，诸如削掉鼻子和别的器官等等。他们那里有消灭哺乳婴儿的专家、行家里手，他们抓住哺乳婴儿的两条小腿，然后立即把婴儿撕成两半，他们就是这样博取他们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同伴们的欢笑的。这个撒谎成性的民族矢口否认他们干的暴行，苏丹的大臣们硬说，不可能有杀害俘虏的事，因为“古兰经禁止做这种事”。还在不久前，仁慈的德国皇帝陛下愤然批驳了土耳其人对所谓俄国人的残酷而到处散布的官方的、虚伪的申诉，并且宣称不相信他们。对于这样一种卑劣的民族似乎不能够以人道相待，但是我们仍然以人道的精神对待他们。我还要斗胆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对那些查有实据的屠杀俘虏和伤员的土耳其人，最好不要实施强制性的报复与惩罚。这样做未必就能减少他们的残忍。据说，当把他们作为俘虏抓获时，他们现在也恐惧而疑虑地看着，并且坚信不疑，马上就会割下他们的脑袋的。最好不要让强制性的报复与惩罚给俄国人以宽厚、仁慈的胸怀进行的战争抹黑。但是刺穿婴儿双目这种事是不能允许的，而为了永远根

① 引自《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第16章。

绝这种暴行，应该断然解放被压迫者，而从暴戾之徒手中永远夺走武器。用不着为他们操心，当他们被解除了武装时，他们将制作并出售长袍和肥皂，就像我们喀山的鞑靼人所做的那样，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为了从他们的手里夺下武器，应该经过战斗。但是战斗并非报复，列文尽可不必为土耳其人不安。

列文本来在去年就可以为土耳其人感到安心的。难道他不清楚俄罗斯人、俄罗斯士兵？人们是这样报道的，说俄国士兵虽然在战斗中用刺刀捅土耳其恶魔，但是人们还不止一次地看见俄国士兵同被俘获的土耳其人分享口粮，给他吃的，怜惜他。请您相信，这个俄国士兵原本就知道土耳其人是怎么一回事，原本就知道，如果他落在这个被俘的土耳其人手里成了俘虏，那么这个土耳其人就会砍下他的脑袋，并把这颗脑袋与别的一些被砍下的脑袋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半月形的图案，并割下躯体的其他部分构成可耻的星形放在半月形的中间。所有这一切那位俄国士兵是清楚的，但是他却仍然给这个在战斗中受到痛苦的而且被俘虏的土耳其人吃东西："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毕竟也是一个人。"一位英国报纸的记者看到类似的这种情况时，就写道："这是绅士们的军队。"列文本来也能够比别人更好地知道，这的的确确是一支绅士们的军队。当保加利亚人在别的一些城市询问统帅大人，他们该如何对待逃跑的土耳其人的财产时，他回答他们说："把财产收拢在一起，保护好，等他们回来；收割他们的田地，取出三分之一作为劳动报酬，其余的给他们保存起来。"这也是绅士的语言。我再说一遍，列文本来就能够为土耳其人放下心来的。这里哪儿有什么报复，哪儿有什么强制性的报复与惩罚？此外，列文这位精确了解俄国社会的人，本来也能够设想到，拯救土耳其人的还会

有我们那种虚伪的欧洲主义，以及我们那种荒谬的、做作的和率直的多愁善感，这种多愁善感在我们受过教育的社会里是很常见的。列文是否听说过我们的那些女士们，她们竟然向在车厢里运载的被俘的土耳其人投掷花束，拿出珍贵的烟草和糖果？人们报道说，当列车启动时，一个被俘的土耳其人大声咯了一口痰重重地吐向那堆向驶离的列车挥动手帕送别的女士们的正当中。当然，很难同这一个无情无义的土耳其人一般见识，而且列文也可以这样判断，从对待土耳其人表示亲切的我们的女士方面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多愁善感的表现和虚伪的、自由主义的欧洲主义而已："看我们多么仁慈，看我们发展得多么欧洲化，看我们多么会表现这一点呀！"然而，列文本人不是也把那同样的直率，也把那同样的欧洲式的多愁善感亲自拿出来进行说教和讲述的吗？在战争中杀死土耳其人，在正当的战斗中杀死土耳其人，不是报复他们，而只是因为，非如此就不可能从他们的手里夺下那不正当的武器。去年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如果不从他们的手里夺下武器，而且——为了不杀死他们，却自顾自走开，那么他们立即就会割下妇女们的乳房，刺穿婴儿的双目。怎么办？最好让他们去刺穿双目，只是为了不杀死土耳其人？要知道，这是对概念的扭曲，这是最迟钝和最愚不可及的多愁善感，这是发狂似的直爽，这是对天性的十足的歪曲。何况，不得杀死土耳其人的士兵本人也要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要忍受折磨和苦痛为代价。俄罗斯人民仅仅是为了杀戮，仅仅是为了报复才奋起的吗？哪里有过这样的事？为了帮助被杀害被歼灭者、被奸淫的妇女和儿童，而全世界又根本没有人站出来替他们说话——却被认为是粗野的、可笑的、几乎是不道德的、渴求报复和嗜血的事呢！这种麻木不仁以及与之并存的多愁善感又都是些什么呢！要知

道，列文本人也有孩子，一个小男孩儿，要知道，列文也爱他，要知道，每当给这个孩子在盆里洗澡的时候，就仿佛是家中的一件大事；当他听到和读到有关大批屠杀，有关被打碎脑袋的儿童们，有关在自己被强奸、被杀害、被割去乳房的母亲们身旁爬行的儿童们时，他的心怎么能不为之淌血呢！这是曾经发生在一座保加利亚教堂里的事，全城洗劫一空，发现了二百具这样的尸体。列文读到所有这一切，但他仍然站在那里沉思：

“基蒂今天很快活，饭也吃得很香，在澡盆里给小孩洗了澡，这孩子开始认我；在地球的另外一半发生的事跟我有什么相干？对斯拉夫人受压迫的直接感受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因为，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列文是否以此来结束了自己的史诗呢？作者是否想把这样一个正直和真诚的人作为范例展现给我们呢？像《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这样的人——是社会的导师，是我们的导师，而我们则只不过是他们的小学生。那么他们在教导我们些什么呢？

加尔通格的自杀和
我们的老问题：谁之罪?[1]

(《作家日记》, 1877年, 10月号, 第2章, Ⅰ)

俄罗斯所有报纸不久前都在议论（至今还在议论）加尔通格将军在莫斯科自杀的问题，此事发生在他听了陪审员们指控他有罪的判决之后十五分钟，区法庭暂时休庭合议的时候。因此，我想《日记》的读者们对于这起非同寻常的可悲事件或多或少都已有所耳闻，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详细说明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一位上层社会身居要职的人物交结上一个从前做过裁缝、后来又成为高利贷者和期票贴现人的赞弗特列卞，这不仅由于他必须向这个赞弗特列卞借钱，似乎还由于友谊。例如，他承担了赞弗特列卞的遗嘱执行人的责任，看来，他非常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嗣后，随着赞弗特列卞的死亡就发生了

---

① 列·尼·加尔通格少将（1834—1877），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女儿玛丽娅的丈夫，被控与其他人一起盗窃期票等现金凭证。加尔通格本人并无盗窃罪，于审判的最后一天，1877年10月13日自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7年10月号的《作家日记》第2章Ⅰ、Ⅱ、Ⅲ节中，借加尔通格将军自杀事件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采用欧洲公开的陪审法庭制度的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审判过程中，检察官和辩护人都是在“昧着良心鼓舌摇唇地撒谎”，旁听者在法庭上学到的不是如何尊重真理，而是撒谎的才能。犬儒主义和虚伪不知不觉中就会在人们心中扎根。造成这些弊端的原因是，这种审判制度是“照搬外国”，“尚未充分俄罗斯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期望在某个时候俄罗斯的民族性、民族精神能清除这些恶劣习惯的弊端，消灭虚伪……那时，事情就可以在一切方面都按照真情实理进行。”法庭将“不再是表演，不是游戏，而是授课、示范和训导。”

几起惊人的事，加尔通格把期票簿丢失了，把期票、证券和单据拿到自己家中，这是完全违反法律规定的。他竟然与一部分继承人达成协议损害另一部分继承人的利益（可能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有个继承人就盯住了他，这位可怜的遗嘱执行人才在事实上不能不认识到自己落入一种未曾料到的处境。此后就开始直接控诉他偷窃期票、期票簿、转让期票和遗失总值十余万至二十万卢布的财产单据……于是开庭审判。这样的审讯使检察官感到高兴，将军与普通老百姓一起坐在被审判席上也使检察官高兴，这就使俄罗斯的忒弥斯[①]有根据宣布，强者、上层人物与小人物、微不足道的人物在法律面前平等，并宣布平等的胜利。

但是，审讯是遵循非常标准的程序进行的（无论有什么说法），最后，陪审员们做出了几乎是肯定有罪的指控，其中包括对加尔通格的指控，指控的内容是“他有罪，也进行了偷窃”。法官退席去拟判决书，然而加尔通格却不想等待判决书，他走进另外一间房子里，据说，他在桌旁坐下，双手抱住自己的可怜的头，后来猛然一声枪响，击中了心脏，他用自己带来的、事先装好子弹的手枪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在他的身上找到早已写好的便条，上面写的是他“以万能的上帝的名义起誓，在这件事情上什么也没有偷窃，原谅自己的仇人”，就这样，他怀着自己无罪的意识和自己的绅士风度的意识死去了。

这起死亡事件震动了莫斯科所有的人和全俄罗斯的所有报纸。人们说，法官和检察官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的时候，面色

① 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妻子，是司法律、正常秩序和预言的女神。她的形象是：眼睛蒙着布，象征不偏不倚；手执天平，象征公正无私。“忒弥斯的祭司”转义是“法官”，但往往带有讽刺意味。

极为苍白。据说，陪审员们似乎也显得很尴尬。各家报纸也都大声疾呼地谈论“显然不公正的判决”，其中一些报纸指出，现在已经不能指责我们法庭的判决软弱无力和姑息养奸：“一名无辜者已经倒下了，这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还有一些报纸公正地指出，对一个人在世上讲出的那么庄重的、诀别的话，几乎是不可能不相信的，由此可见，差不多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发生了可悲的审判错误。各家报纸谈论的，写的，还有很多很多。应该说说，某些报纸的反应是奇怪的，这里有某种矫揉造作，也许都是热情的，真诚的，但却是矫揉造作。加尔通格是值得同情的，但与其说这是由于某个方面的错误造成的，不如说这是俄罗斯生活的悲剧（过分沉痛的悲剧），是命运注定的。或者更恰当些说，在这方面大家都有罪过，无论是我们知识界的伦理和习俗，还是在这个社会中发育并成熟起来的性格，最后还有我们移植过来、但尚未充分俄罗斯化的我们年轻的法庭。但是，如果大家全都有罪过的话，那就是说，每一个个人都没有罪。在所有报纸的反应中我最满意的是《新时代》的反应。恰巧在前一天，我同我们一位精明的法学家和熟悉俄罗斯生活的人谈过一次话。原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结论完全一致，而且，对方还相当确切地指出了这件事情的“悲剧性”和悲剧性的种种原因。第二天，我在一位“陌生人”[1] 的杂文中读到的很多话同我们在前一天谈到的十分相似。因此，我现在如果也要说几句话，那也只是从特别是……和“由于……”这个角度谈谈。

---

① 阿·谢·苏沃林在《新时代》发表的杂文，均署化名“陌生人”。

俄罗斯绅士。绅士不能不自始至终都是绅士

（《作家日记》，1877年，10月号，第2章，Ⅱ）

问题在于一些古老的性格还没有完全改变，似乎还要存在很长的时间，因为一切都需要时间，本性处处都要表现出来。我说的是我们知识界的性格，不过，在这里我要毫不犹豫地、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突然间就变化，如同风向标似的，那就不好了，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性格中最令人厌恶的恰恰就是这种轻浮和空虚的特点。这有点像奴仆，与打扮成老爷的奴仆相似。有时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偶尔接触富人和显贵们，特别是如果我理解了他们，我们就明白，我们的绅士风度的一个特征就是体面的形象和从好的方面显示自己的愿望。请注意，关于加尔通格本人我现在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对他的身世毫无所知，我只是想要指出我们知识分子的尽人皆知的性格的某几个方面，一般地说，在某些情况下，在加尔通格将军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可能一模一样地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的。比如说，一个官衔不高、身无分文的微不足道的人物忽然进入上流社会，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与上层社会进行交往。于是这个除了想方设法挤进上流社会的本领之外别无所长的可怜虫，转眼之间有了自己的马车、“尚可”安身的宅第、仆人、服装和手套。可能，他希望飞黄腾达，出人头地，但他通常只是希望简单地仿效别人，说什么别的人都那样生活，我为什么不可以？他身上有一种无法遏制的耻辱感，总之，他对荣誉与体面有着奇怪的理解，没有丝毫自尊感。这是对自身尊严这种最基本的情感的不理解，可以与这种不理解相提并论的，我认为是，我们的欧洲

派知识分子在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里不理解自由，不理解什么是自由。不过，这个问题留在下面再谈。我们俄罗斯有知识的人的第二个、几乎同样是悲剧性的特点，就是他容易受人影响，容易妥协。噢，很多人是吸血鬼，交易所的经纪人，令人厌恶但却纠缠不休的无赖，当然也有不屈不挠的好人，不过这种人少得可怜。在大多数正派的俄罗斯人身上恰恰都有这种退让精神，总有种让步和妥协的愿望。这完全不是由于宽宏大量，同样更不是由于怯懦，不为什么别的，这是一种礼貌或者是一种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打个比方说，您有多少次与一个固执的、对您步步紧逼、要求得到您的回答的人谈话时，您不得不妥协，不得不在某次会议上从您的意见或发言上后退，可能，您在内心里根本就不想这样做。大家这个词也非常诱惑俄罗斯人，“我跟大家一样”，“我赞成大家的意见”，“我们大家都去，好极啦！”但是这里还有一件怪事，“俄罗斯人非常喜欢自我陶醉，自己谄媚自己，自己诱惑自己，自己说服自己”。他自己本来不愿意做某一件事情，比如说，不愿意做赞弗特列卞的遗嘱执行人，但是他要说服自己：“人家说，这算不了什么，那我就做吧……”

在有知识的俄罗斯人这个阶层里面常有这样几种人，从某个方面说，他们甚至是一些非常有魅力的人，但他们所具有的俄罗斯绅士气派的种种特点，正是我在上面指出的那些不幸的特点。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几乎是纯洁无瑕的，几乎都是席勒之类的人。他们对“事情”的无知使他们几乎显得可怜，但他们的荣誉感却是强烈的。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的荣誉受到损害，他就会像加尔通格那样开枪自杀。可能，这样的人还相当多。然而这些人未必能够知道，比如说吧，自己的债务共有多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都是花天酒地的人，刚好相反，有些人还是

模范的丈夫和父亲，但是酒徒可以挥霍，模范的父亲也可以挥霍。他们中间不少人在开始生活时，从前所剩无几的祖遗家产早在年轻的最初时日很快就花光了。然后就是结婚，再往后就是官衔和满不错的公职，职务虽不能说很好，但总算还有一些收入，比起从前在上层社会漂泊的生活来有了可靠的生活保障。然而债务却在不断地增长，他当然是要偿还的，因为他是绅士，但旧债是靠借新债来偿还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有时独自扪心思量自己的处境时，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什么都从未窃取过，也决不想窃取什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会发生这样的区区小事，有的时候（当然是极其必要时）他居然能够向自己孩子的保姆借用她积蓄的十来个卢布。想想看，这算得了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呢？况且老保姆在家庭里常常是一个相处多年的、亲近的和知心的人。她差不多成了家庭的一员，都与她和睦相处，甚至把最重要的钥匙交给她保管。善良的将军、她的老爷很早以前就许诺把她安置到一处养老院去安度晚年，只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使他总是腾不出手来办这件事情，本来早就应该到那里去为她打个招呼了。而老保姆又始终不敢提醒他，也许一年里头向他提一次养老院的事，还是战战兢兢地提的，她怕惹恼像她的将军那样爱发脾气、心情又总是不安的人发火。"其实他们都是好人，自己会想起来的。"她拖着自己这身老骨头上床的时候，有时这样想；关于十个卢布的事她竟不好意思提，老太婆她有自己的良心。将军就这样突然间咽气了，老太婆的归宿没有了，十个卢布也完了。不必说，这全都是一些琐事，鸡毛蒜皮，然而如果在那个世界突然提醒将军说，老保姆还没有得到她那十个卢布呢，那他就会面红耳赤地说："什么十个卢布？难道会有这种事情！

啊哈，是的，确实如此，那是在四年前！Mais comment，comment[①]，竟然会有这种事情！”于是这笔债务使他遭受的折磨甚至比他留在世上的成万卢布的债务还要强烈！他羞愧难当：“噢，请相信，我不是故意的，请相信，我连想都没有想到，忘记了！”不过，在那里只有天使们（因为他大概进了天堂）才能够听到可怜的将军的话，老保姆在人间终归是失去了十个卢布，老太婆有的时候还心疼这笔钱：“上帝保佑他，提这件事是罪过啊，这可是最高贵的人，不管怎样说都是最正派的老爷。”

还应再说一句，假如这个可爱的人又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又变成从前那位将军，那么他是把十个卢布还给老保姆呢，还是不会？

然而，他们并不总是借贷。有这样一位朋友，非常正直的伊万·彼特罗维奇请求他提供六千卢布的期票。这位伊万·彼特罗维奇说，我把期票抵押到我所在的那家银行，然后贴现，而你呢，亲爱的朋友，就可拿这六千卢布的回报。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期票付出了。此后他经常在俱乐部遇到伊万·彼得罗维奇，显然，两个人都把期票的事忘记了，连想都不去想它了，因为两个人可以说都是我们社会正派人物中间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六个月之后，突然间全部六千卢布都落到了将军的身上，人家对他说：“请支付吧，大人阁下。”于是就向赞弗特列下这类人求助，立字据，百分之百的利息。

您还得相信，我在自己的叙述中没有一句话是要揭露已故将军加尔通格的，因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关于他个人的事我是毫无所知的。我的意图仅仅是刻画这个社会的人们当中一个

① 法文：但是，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人的性格特征，但是这个人如果陷进加尔通格将军对待赞弗特列卞那种事情的纠纷里面，那他的处境就完全可能与加尔通格一样，直至自杀。所以，我认为，在加尔通格这件事情上法庭是无可指责的，法庭也没有理由要惭愧，这都是注定的，是悲剧，因为加尔通格将军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所以才留下了便条……

有些人要说："对，不过这里有个便条。要知道，一个人，还是信教的人，在那种时刻是不可能说谎话的。如果他那样郑重地声明他没有窃取，那就是说他什么也没有偷。再说，在这上面他不可能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情。不管这场混乱的事情把人的头脑搅得怎样颠三倒四，神志恍惚，他既然说'我没有窃取'，他就不能不知道，'他窃取了还是没有窃取?'这是一个人亲手干的事。问题很简单，这就是，装进了自己的钱袋里，还是没有装?如果是装了，他怎么能不知道?"

完全正确，然而，要知道，情况可能，甚至肯定是这样的。他所写的只是涉及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他说的是，我什么也没有窃取，盗窃的事连想都没有想过。然而别的人们是可能盗窃的。

人们会反驳我说："这根本不可能。如果他允许别人盗窃，作为监护人，知道情况却保持沉默，那么，这就无异于他也与别人共同盗窃了！加尔通格将军不能不明白，这里并没有区别。"

我的回答是：首先，"如果他知道并且允许盗窃，那么，这就等于他也盗窃了"，这是一个还可争辩的论据；其次，毫无疑问，这里是存在区别的。再次，这就是，加尔通格将军能够做的恰恰是只能从我们所说的那个意思上写："确切地说，我自己没有拿，也没有想要窃取任何东西，那是别人干的，是

违反我的意愿的。我的罪过是懦弱，但不是欺骗，因为我自己没有想要窃取任何人的任何东西，我还反对这样做。那是他人干的……”他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写下自己那些至关重要的话，但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说：“既然允许了盗窃，那就等于自己也盗窃了。”他死了，他也明白，他既没想偷，也没想放任别的人去偷，而是不知怎的就被偷了。况且还请注意，他决不能把自己写在便条上的话，即罪过是懦弱而不是窃取等话做更多的解释。他是绅士，不能告发别人，尤其是在他“宽恕了自己的敌人”这种庄严时刻更不能这样做。

结果很可能是这样，他在内心里连放任、懦弱和宽厚的纵容都不承认。这里可能有错综复杂的情况，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能够考虑清楚，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期票簿丢失了”，他充分信任的见多识广的人们从一开始就劝告他，说这纯系小事一桩，无意中丢了，因为实际上谁都不需要它。他们用数目字，用计算向他论断说，期票簿即使对继承人自己来说也是有害无益的东西。（后来辩护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就是这个论据，看来，他是正确的。）其余的一切可能都是这样向加尔通格提出并做解释的，他不懂这种事情，可以使他全都信以为真。人家说：“请相信，我们也是正派的人，我们跟您一样，不想窃取继承人的任何东西，但是赞弗特列卞的事情处于那么敏感的情况之中，他们（继承人们）现在如果知道了期票簿和所有这一切事情，他们就要直言不讳地控诉我们诈骗，因此必须对他们隐瞒此事。”“赞弗特列卞的麻烦事”显然不是立刻就暴露出来的，而是逐渐暴露的，所以说，加尔通格是一天一天地逐渐了解真实情况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看不见真实情况而被卷进弄虚作假的。就是这样，继承人之一突然直接冲

到加尔通格将军的面前，即使没有大喊大叫地说加尔通格将军是贼，反正怎样喊都一样，因为他已经趾高气扬地，面带胜利的、恶毒的笑容走进了加尔通格将军的家，他深信不疑地认为，现在他可以在将军的家中肆无忌惮地干一切卑鄙勾当。这时将军才彻底明白他走进了一条什么样的死胡同，此后他就完全慌了手脚，他开始寻求妥协，做私下交易，当然，他使自己愈陷愈深，而控诉的一方则对涉及妥协和私下交易的那些败坏他的名誉的新的事实穷追不舍地揪住不放。一切都被利用了。总之，加尔通格是在明白自己个人毫无罪过的情况下死去的，至于错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没有任何审判错误。这是天命，是悲剧，因为盲目的势力不知为什么选中了加尔通格一个人，为了他所在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恶习来惩罚他一个人。像他一样的人也许有上万个，然而毁灭的却只是加尔通格一个人。在所有这些上万的人们当中，当然，这个清白的、非常正直的人能够以自己的悲惨结局唤起巨大的同情，而对他的审判则在全俄罗斯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以此来警告那些“有恶习的人们”，然而命运这个盲目的女神在惩罚他的时候，未必就有这种考虑。

谎言是为真实而存在的。
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真理。这是真理吗?

(《作家日记》, 1877 年, 10 月号, 第 2 章, Ⅲ)

但是,我心中有一个过去的印象总是浮现出来,很想把它讲出来交流一下,也许这个印象是很浅薄的,这就是关于我们的审判的一般印象。差不多全世界都认为有陪审员的公开审判是完美无缺的:"可以说,这是一次胜利,是智慧的最高成果。"我全都相信,否则人们要说,比如说,"那么您就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吧",其实,我是想不出来的。也就是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来,仅从这点而言,我就必须同意。而事实上检察官先生登台了……不,是登上审判席。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非常善良,聪明,有良心,有教养,信仰基督,在俄罗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了解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于是这个很有良心的人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说,他对"这起犯罪案件的发生感到很高兴,这是因为惩治这个歹徒,惩治这个被审判的人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因为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恶棍!"确切地说,当然,他没有使用"恶棍"这个词。不过反正都一样,因为他以最有礼貌的、最温和的、最人道的方式,最终把被审判者说得比恶棍还坏,甚至比任何恶棍都坏。他虚情假意地委婉地述说着,说被审判的人的母亲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人,结果他也不可能不偷窃,因为最卑鄙的贪欲诱惑着他,使他愈陷愈深。他所干的一切都是有意识的,蓄意谋划的。请回想一下,在他进行犯罪活动的时刻临街发生的火灾帮了他多大的忙,火灾的警报把看院子的人和整个警察所的注

意力都吸引开了。“噢，当然啦，我毫无直接指控他纵火的用意，不过，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这是必然引起人们某种联想的两种情况的巧合。然而，我不把这个联想说出来，我不说，但是，当然，你们自然会把他，把这个贼、杀人凶手（因为他在住宅里一旦遇见什么人，就必定要把这人杀掉），必然还是纵火者，被认定的、证据确凿的纵火者——当然会把他遣送到遥远的某个地方去，从而让善良的人们有可能松口气，让主妇们可以安心地离开家门去购买食品，而房产主也不必为自己的财产担惊受怕，尽管这处房产已经在某个保险机构办理了保险。我没有必要一一数说这一切，主要的还是，你们看看他本人吧！他就坐在那里，不敢正视一眼正直的人们，为了证实他是一个贼，杀人犯，纵火者，只凭一个眼神岂不就足够了。只有一件事我深感遗憾，这就是他没能够做到偷十次衣物，杀十个主人，烧十座房屋，因为，那时犯罪的巨大数量本身就能震撼我们这个昏昏欲睡的公民社会，最终迫使这个社会采取自卫措施，从自己这个有罪的、全民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嗯，我们知道，检察官先生说话要文雅得多。我们的话是漫画，只适用于比如说像带插科打诨和漫画的星期天幽默小报。我们不妨设想，这是足以唤起深刻的社会问题和民事问题的那类事件之一，主要的是在这件事里面有心理学的用武之地，而在心理学方面，人们都知道，全欧洲的检察官们都是极为擅长的。噢，这算不了什么，说来说去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太遗憾了，不是十起、三十起、五百起投毒案件，而是一起，否则，你们的心灵就会被震撼，你们就会团结得俨然如同一个人似地挺身而出，等等。

然而，人们要反驳我说，这有什么不好？例如，很多很多

的检察官根本不是演说家，但是，第一，检察官是官吏，他应该依据自己的职责办事；第二，检察官们向来都夸大指控，这不仅没有任何不道德的地方，而且相反还都是有益的。正是需要这样做，正因如此，才有与检察官对立的被告辩护人，辩护人可以彻底推翻检察官的指控。此外，在全欧洲都允许（当然是要做得彬彬有礼）论证检察官愚蠢、荒唐、卑鄙，允许论证："如果有人前天纵火焚烧了瓦西里岛上第三条街的一所宅第，那么这个纵火者就是这个检察官，因为那时他正在瓦西里岛上参加米哈伊洛夫将军、一位非常杰出非常高尚的人物的命名日纪念宴会。要是他没有纵火烧了这所住宅，他就永远也不会想出那种愚蠢的、那种不伦不类的无耻指控，指控被告在进行那种臆造的、莫须有的、从各方面看都是荒唐的犯罪活动时，为了转移全街人的视线而纵火——仅凭上述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毫无疑问，就是他这位检察官出于对房产主、商人伊万·鲍罗达特的仇恨，纵火焚烧了这所住宅。正是他自己的纵火行为使他萌生了这个想法。"最后，请注意，辩护人可以作手势，可以悲戚流泪，可以咬牙切齿，可以揪自己的头发，可以用椅子敲击地板（但不准他把椅子抡起来），最后还有，如果辩护人非常高尚，他忍受不了不公正，他会昏厥过去。然而，检察官无论如何高尚，似乎都不能这样做，因为身着制服的官吏突然仰面朝天倒在地上，那就太不成体统了，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我说的这一切依然是一幅漫画，一幅漫画而已。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一切都进行得很正常，我同意这样说。（虽然也拿椅子敲击过地板，也不止一次昏厥过！）可是我关心的只是事情的实质，因为用最高尚的方式也与用最恶劣的方式一样，往往导致相同的结果。

人们向我指出说，您这是说到哪里去啦，就是需要这样做，恰恰是需要夸张，双方都要夸张！陪审员有的时候并不是很有教养的，加之又很忙，他还有自己的小店铺，自己的事业，他有时心不在焉，有时简直是自己深入不进去。因此，正是要推动他深入进去，把事情的各个方面，直至根本不可能的情况都摆在他的面前，使他深信不疑，指控把所能想象到的一切都网罗无遗，关于这件事情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与此相同，作为辩护，为了把被告开脱得比山巅的雪还要纯洁无瑕，已经把凡是可能与不可能设想的一切全都用上了。所以他们在那里一间特殊的房屋里进行总结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可以说是机械地知道应该从头脑里冒出什么来：是或者否，从而他们在良心上起码就能够完全问心无愧了。很清楚，为了真理，这一切都是完全必要的，也就是说，既是为激烈的进攻，也是为激烈的防卫。甚至是这样的，如果只是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控诉人的激烈进攻对被告比对控诉人自己更为有利，这样看来，说到底，还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了。

总而言之，现代的审判制度不仅仅是智慧的胜利或者说智慧的最高成就，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办法。对这种说法是不能不同意的，况且审判是公开的，旁听者甚至达到数百人……难道能够设想这是因为他们无所事事或者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吗？不，当然不能。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汇聚到法庭的，必定要带着最重大的、强烈的、有教训意义的和有裨益的印象离开法庭。当时所有的人都坐在那里，都看到，那原本是一个谎言，噢，当然这不是指法庭，也不是从检察官这个意义上说的，而是说，比如说某些习惯，幸运地、轻而易举地从欧洲搬过来，又被我们的辩护人和公诉人奉为金科玉律的某些习惯。我立即回到家中，坐在家里暗自思量：我认识伊万·赫里斯托

弗雷奇这位检察官，这是一位非常聪明和非常善良的人，然而他却在撒谎，他也知道他在撒谎。他罗织罪名，把本来该判个什么警告或者两个月监禁的案子勉强判为流放极其遥远的地方二十年。就算是为了把案子审个一清二楚必须这样做吧，但他毕竟是在撒谎，而且是在蓄意撒谎，要知道，这是关系到人的命运的事。怎么能这样罗织罪名呢？如果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的话，尤其不应这样。因为实际上 il en reste toujours quelgue chose[①]，假如辩护人无能，只会敲击椅子的话，尤其如此。假定说，这里即便是伊万·赫里斯托弗雷奇的自尊心起很大的作用，这纯属人之常情，但是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这种常情却是可以原谅的吗？在这里，把人置于何地，崇高的人，人道的、文明的人到哪里去了？

好吧，即便是终于从所做的这一切里面得到了事实真相，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真相是靠操纵，是以最狡猾的手段获得的。但是汇聚到法庭的听众或许当时真的是去看表演的，去观赏操纵的手段和狡猾之极的手段的。听众在兴致勃勃地倾听，比如说，当有才干的辩护人那样昧着良心鼓舌摇唇地撒谎时，几乎要在自己的座位上为他鼓掌："这个人谎撒得多么高明！"在旁听的群众里面由此就能产生犬儒主义和虚伪，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扎下了根。人们渴求的已经不是真理，而是才能，只是为了欢快和消遣。人道情感变得迟钝起来，用昏厥倒地的办法已经不能使人道情感复苏。那么再请设想，假如撒谎者真的是有巨大的才能，那将会怎样呢？

我知道，这全都是我的无聊的牢骚。不过请听我说，公开

---

① 法文：总不会丝毫不留痕迹。

的陪审法庭的制度毕竟不是俄罗斯的，而是照搬外国的。[1] 难道不能够期望俄罗斯的民族性、俄罗斯精神在某个时候能清除这些恶劣习惯的弊端，消灭虚伪……那时，事情就可以在一切方面都按照真情实理进行下去。的确，现在还不能这样，因为就是在当今辩护和控诉都在炫耀这些恶劣的习惯，一些人是为了钱，另外一些人是想步步高升。不过总会有那么一天检察官不是控诉被告人，竟然是为他辩护，不过检察官毕竟还是对被告人提出一点点指控，所以辩护人如果想要反驳的话，就连这点指控对被告也用不上了，致使陪审员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

我甚至这样想，与从前那种公式化的方式，即由无所不用其极的控诉和野蛮的辩护构成的夸张方式相比，这样的方式不是有助于更迅速、也更确实地弄清事实真相吗？当然，人们要回答我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因为在欧洲也是像我们这样，“越公式化甚至就越好”。

就是这个机械的公式，这个把真理揭示出来的公式化的方式，也许在我们这里将要被真理本身所取代……来自两个方面的人为夸张都将不存在。出现在讲台上的不再是表演，不再是游戏，而是授课、示范和训导。付给辩护人的钱确实要少很多。大概等到我们长出翅膀，都变成天使的时候，所有这些空想都将实现。不过到那个时候也就没有法庭了……

① 俄国审判制度的这一改革始于 1864 年。

我们俄罗斯的罗马教权派分子[①]

（《作家日记》，1877年，10月号，第3章，Ⅰ）

不久前《莫斯科新闻》在第262期的社论中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评论：

> 我们已经第三天在注意俄罗斯内部的一个党派了，这个党派与俄罗斯的敌人协同行动，在土耳其人与俄罗斯人的斗争中准备帮助土耳其人，这个俄罗斯的盎格鲁-马扎尔人[②]的党派憎恨我们人民精神的一切表现，憎恨我们政府的符合人民精神的一切行动，它把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同虚无主义和革命混为一谈，它向敌视我们的外国报刊提供最卑鄙的报道。我们的文章刚刚付印，我们彼得堡的记者就发来电报，向我们转达了《政府通报》[③]发表的揭露这个党派的新阴谋活动实质的通报。正当我们的军队在普列文和奥尔哈尼耶地区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在彼得堡的阴谋活动却散布谣言说，就是这支所向无敌的军队遭到了失败，竭力在群众中扩散沮丧情绪，这种活动正在殚精竭虑地进行着，政府认为必须告诫公众不要听信这种别有用心的谣言。

---

① 教权主义分子为拥护教权主义的人物，亦称教权主义者。教权主义是主张教会与宗教界在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起首要作用的政治派别。天主教的教权主义最为活跃。教会机关、教权主义的政党与群众组织利用教权主义达到其政治目的。

② 盎格鲁人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匈牙利人自称马扎尔人，认为自己属于盎格鲁族。所谓盎格鲁-马扎尔人，实即匈牙利人。

③ 俄国内务部官方日报，发表政府命令和公告。1917年3月更名为《临时政府公报》。十月革命后封闭。

《新时代》第二天在提及这个问题时顺便指出，《莫斯科新闻》扯得有点太远了，《政府通报》指的可能只是在公众中传播的一些街谈巷议，根本没有《莫斯科新闻》所写的那个意思。(我是凭记忆用自己的语言转述《新时代》的观点的。)

完全可能就是这样，《政府通报》所指的确实只是一些“街谈巷议”。尽管如此，《莫斯科新闻》的推测还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不过，《莫斯科新闻》提到的盎格鲁-匈牙利人是些什么人呢？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疆土上，在我们内部是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罗马教权派分子的。现在已经不是5月份了，现在已经是人人都知道，都在评论教权派分子的全世界性的阴谋，就连我们的最自由主义的报纸都同意说这是一个大阴谋。如果说梵蒂冈的阴谋放过了我们的罗马教权派分子，在这种事情上不利用他们，那就不可思议了。混乱，在俄罗斯军队后方的混乱，对梵蒂冈是极为有利的，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时刻。下面又是一段摘录，不过这次是摘自《新时代》第587期。《新时代》在自己的《报刊巡礼》栏中引用《呼声报》对英国“Morning post”[1] 和境外某些波兰杂志的某些文章的评论，下面就是这段引文：

> “Morning post”10月22日刊登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这是报纸自己没有意料到的。这家亲土耳其的报纸在文章中报道，似乎俄罗斯与德国之间已经开始谈判，内容是俄罗斯把维斯瓦河[2] 的沿岸地区让给德国的问题！不言而喻，在“Morning post”报看来，

① 英文：《晨报》。
② 波兰境内的河流。

这是德国必须帮助“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上攫取”领土的交易的结果。伦敦的报纸又继续喋喋不休地议论说，维斯瓦河沿岸地区的波兰人现在完全不考虑起义的事情了，因为“他们不想陷于更为悲惨的奴隶处境”，也就是说不想受普鲁士人的统治，如果说在“俄罗斯的波兰”发生什么混乱的话，那就是“俄罗斯和普鲁士之间纠葛”的直接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Morning post”的文章刊出前几天，“Dziennik polsky”[①]也谈到这个问题，只是语气多少有些不同，“Dziennik polsky”报道说，俄罗斯政府在从维斯瓦河沿岸地区撤出自己的军队时向农民散发了传单，要求他们自己组织农村的武装队伍，监视地主并镇压各种暴乱的图谋。《呼声报》在转述这些文章的内容时，感到惊讶的是不知“Dziennik polsky”和“Morning post”为什么突然这样热心起来？不知它们为什么要制造愚蠢的无稽之谈？为什么说俄罗斯向维斯瓦河沿岸的农民散发传单，并说俄罗斯和普鲁士的 agents-provocateurs[②]力图煽动“人为炮制的起义”？

这些突如其来的异常举动应该有某种目的。刊登这些报道的报纸大概是掌握了令它们担心在维斯瓦河沿岸地区发生动乱的情报，于是竭力事先歪曲运动的意义，因为，看来它们对运动的后果感到不安。这种手段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波兰人和他们的西方盟友在1863年已经运用过了[③]。只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他们就不能不承认，“Dziennik polsk”和“Morning post”的文章并非没有用意的，这些文章与匈牙利人的报刊先前的议论是有某种隐秘的联系的。匈牙利人的

① 波兰文：《波兰日报》。

② 法文：代理人和挑衅者。

③ 1863年1月至1864年5月，波兰王国、立陶宛、部分白俄罗斯地区和右岸乌克兰爆发反对沙皇专制的起义。起义是波兰中央民族委员会发动的。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阿·伊·赫尔岑与俄国驻波兰军官委员会的支持，而沙皇当局则镇压了起义。

报刊曾议论说波兰人同情土耳其人，并说波兰人暗自希望在我们的西部边境以革命的宣传使俄罗斯的局势复杂化。《呼声报》声明说，对于俄罗斯的敌人为了阻挠当前这场战争取得有利于俄罗斯的结局而制造的种种想入非非的图谋，我们不想夸大它们的意义，我们不属于热衷这些图谋的人，俄罗斯的敌人们才抱住它们不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事情是相当严重的，看来，"Dziennik polsky"和"Morning post"的文章突然间无缘无故地出现，对这件事情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这样看来，可能在我们这里也有类似教权派阴谋的活动。已经有消息说，无疑是波兰出身的列多霍夫斯基①成了候选人，因为只有在外国的波兰宣传者的简单头脑才能认真地相信

① 梅切斯拉夫-加利卡·列多霍夫斯基(1822—1902)，伯爵。自1865年起任波兰波兹南教区大主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涉及列多霍夫斯基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时，误把罗马教廷的互选教皇会议与枢机主教联席会混为一谈，文中所说的应为枢机主教联席会。1877年，枢机主教联席会在教皇庇护九世(1792—1878)的赞同下试图改变选举新教皇的规定。按教廷规则，枢机主教联席会的成员应为七十名，其中至少须有二十五名非意大利人。当时认为最有希望的新教皇候选人为意大利的枢机主教卡诺萨，卡诺萨的支持者中有许多教权主义的骨干分子为耶稣会会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文中以嘲讽的口吻说的许多"机智人物"指的就是这些人。文中提到的列多霍夫斯基的情况是这样的：列多霍夫斯基是波兹南教区大主教，1870年，他在梵蒂冈高级神职人员的会议上发表演说，狂热地捍卫教皇永远正确的教义。同年，他又为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而争取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支持。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于1873年任命他为波兰的主教长，1875年又任命他为枢机主教。列多霍夫斯基声称，他的目的就是"恢复祖国"。俄国报纸密切注意着列多霍夫斯基为准备发动波兰起义所进行的活动，并进行了报道。1877年夏初，一则报道说，波兹南副主教霍特科夫斯基写了一封煽动起义的信，征集签名后经列多霍夫斯基之手转交给了罗马教皇。此后，又一则报道说，近来在波兰到处都在谈论即将到来的起义。在梵蒂冈享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参与了鼓动起义，其中就有枢机主教列多霍夫斯基。

拥有那么多机智人物的罗马互选教皇会议竟然那样随随便便地推选列多霍夫斯基，况且这位新教皇要做的仅仅是恢复祖国，而不是重建教皇在罗马和在全世界的统治。不过，这已谈得离题了，可是教权派的阴谋活动在俄罗斯毕竟还是明显的。《新时代》还补充说：

> 现在“Journal de St-Petersbourg”① 与意大利教权派报纸关于波兰的天主教所遭受的臆造的迫害而展开的持续不断的争论似乎表明，在我们的西部边境地区存在煽动宣传的迹象。

唉，已经不仅仅是迹象了。看来，确实是有《莫斯科新闻》所说的那个党派，这个党派在“与俄罗斯的敌人协同行动……憎恨我们民族精神的一切表现，憎恨我们政府的符合这种精神的一切行动，它把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同虚无主义与革命混为一谈，它向敌视我们的外国报刊提供最卑鄙的报道……”

是的，欧洲的报道正是来自俄罗斯，非常非常可能这就是它——这个党派干的事。这种因为俄罗斯的失败而幸灾乐祸，因为俄罗斯刚一显得“软弱，拮据，军队士气低落，人民不满，满腹牢骚，以及腐蚀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就兴奋得轻浮地狂呼乱叫，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无稽之谈，其来源都带有不难识破的痕迹。唉，不可能找不到愿意与教权派唱一个调子的俄罗斯文人，只是这些寄往国外的报道似乎不可能是俄罗斯文人写的，因为这太卑鄙了。然而教权派分子无疑就在我

---

① 法文：《圣彼得堡报》。按：这就是《圣彼得堡新闻报》。该报为俄国最早的报纸。1728 年起由彼得堡科学院出版，1800 年起改为日报，1917 年被查封。

们自己的家里操纵着俄罗斯的文人们，这样做可能并不需要使用很大的力气。教权派分子或许根本就用不着去教唆他们，也不必与他们建立直接的和适当的关系，因为这些机敏的自由派文人有时也是非常正直的人，他们一听到教权派人物直言不讳的提议，可能就会把他赶走。然而教权派分子，特别是在我们这里住久了的教权派分子，很清楚，他不必亲自登门去找机敏的文人，因为这种俄罗斯文人能够自动地为他撰写一切，他们（哎，可爱的人们！）考虑的只是，这样做既正直又符合自由主义。机敏的文人对在法国麇集在麦克马洪[①] 周围的那些教权派分子非常愤慨，于是就写言词激烈的文章反对他们。但与此同时，这种文人不仅对俄罗斯的罗马教权派视而不见，有时还随同他们异口同声地唱一个调子。是有这样一些文人，确实是有的。而我们那些狡猾的罗马教权派分子可能还对他们感到惊讶："他们原来喜欢这样脚踏两只船，频频向双方点头示意。这是多么无私啊！真的是应该做彻底自由派。不就是他们在叫嚷说，俄罗斯连解放斯拉夫人的权利都没有，光是为此奖赏给他们十万卢布都不算多！可是这毕竟是在两只船中间，时时刻刻，时时刻刻都在两只船中间。他们怎么能不痛苦呢？也许痛苦很快就会过去的……"

---

① 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元帅，1859 年在意大利战役中在马让塔获胜，被封为马让塔公爵。1873—1879 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877 年曾参与策划复辟帝制的未遂政变。

旧波兰[1] 夏季的和解企图

（《作家日记》，1877年，10月号，第3章，Ⅱ）

夏季伊始，教权派的吹鼓手们就试图通过我们这里的俄罗斯出版物进行表演。狼披上羊皮，操着近似国外的全体波兰“流亡者”的使者的声调开口讲话。他们提议要和解，他们说，你们接受我们吧，毫无疑问，我们也看到斯拉夫人要团结，我们不想流落在外面。他们说得娓娓动听，还摆出一些理由：

> 他们说，我们里面有工程师、工艺师、工匠、会计师、农艺师，等等。这类人在流亡者中间很多。接纳他们吧！立陶宛的一个人在写给《圣彼得堡新闻》第172期的一篇文章中说，对于曾经给俄罗斯培育出留·瓦·坚戈博尔斯基[2]，为法国培养出沃洛夫斯基[3]这类人物的群体来说，在你们那里难道无事可做吗？而在陶冶人的和善品德，培养人的高尚情操的艺术方面，波兰社会中有目前驰名世界的代表人物：雕塑家维·彼·勃罗茨基，画家扬·马泰伊科[4]。

---

① 这里所谓的“旧波兰”是指1863年反对沙皇俄国的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并继续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波兰贵族与知识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对波兰起义者的。

② 留·瓦·坚戈博尔斯基（1793—1857），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国务活动家。

③ 沃洛夫斯基，路易-弗朗索瓦-米歇尔-雷蒙（1810—1876），法国政治经济学家，温和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出生于波兰，1831年后逃亡法国。

④ 扬·马泰伊科（1838—1893），波兰画家。所绘油画充满爱国主义，画面人物众多，形象富有戏剧性和表现力。

你们不需要这些人吗？（摘自《新时代》科斯托马罗夫[1] 的文章）

科斯托马罗夫先生在《新时代》上对所有这些谄媚的举动回答得非常好。遗憾的是，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摘登这篇杰出的好文章。科斯托马罗夫先生以明白和确切的论据证明，这全都是为我们设置的陷阱，他们要把康拉德·华伦洛德之流的叛徒遣送到我们这里[2]；旧波兰的波兰人本能地、盲目地憎恨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但是，科斯托马罗夫认为也有善良的波兰人，他们与有些俄罗斯人甚至能够友好相处，在危难时刻拯救俄罗斯人，帮助俄罗斯人。当然，确实如此，不过，只要这个俄罗斯人一旦向这位善良的波兰人按照俄罗斯的看法表达自己对波兰问题的政治见解，即便他们已经有二十年的友谊，这位波兰人也会毫不迟疑地立刻就变成自己的俄罗斯友人的公开或隐蔽的敌人，至死都是不可调和的死对头。科斯托马罗夫先生忘记了补充这一点。

整个这次夏季“和解”的尝试找到了俄罗斯的庇护者和科斯托马罗夫先生这样强硬的反对者，这种尝试无疑来自欧洲的

---

① 尼·伊·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俄罗斯和乌克兰历史学家、作家、教授、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资产阶级自由派基里尔-梅福季协会领导人之一。主张乌克兰民族文化自治。

② 科斯托马罗夫在文章中说，波兰的先生们，如果让你们派遣的学者、作家、工业家、手工业者、艺术家渗入到我们这里之后不是诚实地去干他们的本行，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我们这里的一些华伦洛德们怎么办？你们如何保证不可能这样呢？波兰人从前曾经狡猾地欺骗过我们，现在也还有可能欺骗我们。科斯托马罗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华伦洛德是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1828）中的英雄人物华伦洛德。据传说，华伦洛德是立陶宛的爱国者，为了向践踏自己祖国的条顿骑士团复仇，他打进了敌人内部，使骑士团全军覆没。

教权派的秘密任务，是全欧教权派的阴谋的一部分。唉，这些旧波兰的波兰人要人们相信，他们根本不是教权派分子，不是主张建立教皇政权的人，不是罗马人；要我们早就应该了解他们。不过，只须稍微想一想就够了，旧波兰这个波兰的流亡群体不是在耶稣会[①] 的意义上支持教皇，远离教权主义的梦想？噢，这是何等滑稽的想法！在他们充分意识到梵蒂冈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向来就有这种认识，他们能不支持梵蒂冈吗？他们可能吗？实际上梵蒂冈任何时候都没有背叛过旧波兰，恰恰相反，当其他国家对旧波兰的种种梦想不屑一顾的时候，梵蒂冈始终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旧波兰的一切梦想！不，他们不会背叛梵蒂冈，梵蒂冈也不会背叛他们。夏季要求和解的异常举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当时整个侨民群体都行动起来，反对俄罗斯人，当时成立了波兰军团[②]，那时侨民的贵族们都携带着巨额金钱（当然，不是自己私人的）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正如科斯托马罗夫先生指出的，整个的和解行动不过是一个诡计。顺便说一句，他们向我们举荐自己的学者、技师和艺术家，他们说："接纳他们吧，难道你们不需要他们吗？"这里还要补充说一句，他们大概认为我们是野蛮民族，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举荐的一切我们都有，可能比他们的还更好呢。但

---

① 1534 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该会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工具，该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严格的集权制，地位低的必须服从地位高的，总会长具有绝对统治权，会内相互监视。耶稣会主张，"为了上帝的更大的荣誉"，可以不择手段。20 世纪的耶稣会是教权主义的骨干队伍。

② 波兰人在国外组建的志愿军组织，目的是为恢复波兰的独立而斗争。波兰人在为独立而斗争的历史上曾数次组建波兰军团。俄土战争期间，1877 年 5 月至 6 月波兰人在君士坦丁堡组建波兰军团，准备参加土耳其反对俄国的战争。俄国的报纸当时报道说，波兰军团是靠法国和英国的钱建立的。

是，不必生气，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不来呢？我们这里有几位显示了自己才干的波兰人，俄罗斯也敬佩、尊重他们，让他们处于高贵的地位，丝毫没有把他们同俄罗斯人区别开来。有什么可商量的？请来吧！自己就归顺降服吧，但是，要知道，旧波兰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新波兰，被沙皇解放了的波兰，新生的波兰，这个波兰，今后，在未来，等到斯拉夫民族得到解放并在欧洲复兴的时候，这个波兰肯定可以期待与所有的斯拉夫民族相同的命运。但是旧波兰是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它不可能与俄罗斯同时共存。旧波兰的理想是取代俄罗斯在斯拉夫世界的地位，它针对俄罗斯的口号是："Otes-toi de là gue je m'y mette."①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带头的发起人只谈到学者和艺术家，那么侨民的头目和贵族怎么办呢？不妨勾勒这样一幅图景：俄罗斯相信了甜言蜜语，声明愿意和解；他们则坐在那里，高傲地发问："你们的条件是什么？"

这是因为，你们如果建议我们把流亡者们放进俄罗斯来，而他们自己则不肯来，这就是说，他们在等待出现适当的条件。那请设想一下，俄罗斯突然承认他们是一种势力，是交战的一方，于是就要进行各种谈判了！他们开始进入俄罗斯，大领主刚一开始就会捣乱，要求显赫地位和嘉奖；然后立刻就向整个欧洲大喊大叫说他们被欺骗了；紧接着就是波兰的暴动……俄罗斯就会上当，干蠢事！显然，波兰人自己不相信他们的笨拙诡计能骗得了俄罗斯。但是，他们寄希望于俄罗斯的那些支持者们的纯朴心灵。这是教权派分子的伎俩，是教权派踏进俄罗斯的一个步骤，这是毫无疑问的。人们要问，这一步骤的目的是什么？难道说他们就不需要把形势搅浑，把思想搅

① 法文：你从这里滚开，让我来统治。

乱，掩盖自己的真实步骤，笼络俄罗斯的文人，把俄罗斯的波兰人煽动起来，如此等等吗？是啊，他们什么打算都可能有！

《交易所新闻》的反常行径。不是机敏的而是凶恶的文人

(《作家日记》，1877年，10月号，第3章，Ⅲ)

我们现在谈的是“机敏的文人”，然而我们现在有的根本不是机敏的，而是令人厌恶的文人。他们竟然也（而且那么积极）用同一个调门与波兰的夜莺合唱，可波兰人并没有给他们任何指导；一切都是在无私地进行着，无目的地进行着。这里只有仇恨，被欺骗的希望和备受伤害的自尊心。《交易所新闻》（第257期）上关于季·伊·伊洛瓦伊斯基[①]先生的文章就是这样；起码该会写文章吧，不然的话就会落得个自己捉弄自己！

人们都知道，我们的学者伊洛瓦伊斯基先生在加里西亚被逮捕并受到侮辱[②]。他是本着学术目的去的，他不该向一位波兰的天主教教士询问当地的古迹。后来他又找到一位俄国神父，可是那位恶毒的天主教教士立即就告发了他，说他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宣传人员和煽风点火的人。不由分说地就逮捕了伊洛瓦伊斯基先生，搜查他，从一座监狱到另一座监狱把他转来转去，最后，由于当地一位学者的交涉才把他送到俄国的边境。我们这里立刻就把这件事传播开了，《莫斯科新闻》发表了文章。我们的报纸也都站出来讲了话，但是许多报纸并

---

① 季·伊·伊洛瓦伊斯基（1832—1920），俄国历史学家、贵族保守派政论家。著有《关于俄罗斯起源研究》、《俄国史》。

② 季·伊·伊洛瓦伊斯基在加里西亚被逮捕监禁，表面的理由是他的护照上没有奥地利公使的签证，真实的原因是一名波兰教士告密，说他是俄国的间谍。

不怎么愤慨，只不过看做一桩趣闻。一位俄国学者无缘无故遭受侮辱的事件，在所有人看来似乎是一桩寻常的事情。伊洛瓦伊斯基先生本人也是在《莫斯科新闻》上针对敌对报纸的文章写了几行文字，措词温和的寥寥几行，有气无力。然而我们交易所的经纪人，这些只从自己钱袋的角度对待俄罗斯的人，这些对俄罗斯简直没有任何兴趣的人却给俄罗斯作出一个惊人的贡献。下面就是《交易所新闻》的文章：

……伊洛瓦伊斯基先生在加里西亚萌生了什么怪诞念头？他这是想进行什么宣传？

俄罗斯目前所遭受的种种灾难难道还不足以把异想天开的念头从我们这些顽固不化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头脑中驱赶出去吗？在我们大家都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难道他们还有勇气抱着给我们造成无数说不清的全国性灾难和使我们大家都已厌烦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胡言乱语继续出洋相，装疯卖傻吗？

我们那些由于游手好闲而变得愚钝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们，现在还只限于寄送全斯拉夫教堂用的钟，这不碍任何人的事，他们可尽情地借以自慰，但是，当他们随着钟一起开始派遣自己的敲钟教士时，事情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了。

谁要求、谁委托伊洛瓦伊斯基先生进行他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的？

他明白还是不明白，他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现在，在当前这种时刻？先生们，你们咒骂克拉普卡[①]，因为他唆使匈牙

---

① 克拉普卡（1820—1892），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匈牙利国民军的缔造者之一，1849 年曾率领国民军多次打败奥地利军。革命失败后侨居国外，直至 1867 年。

利人帮助土耳其，而你们自己干的又是什么呢？伊洛瓦伊斯基先生在研究斯拉夫古迹的幌子下干的又是什么呢？你们去年出洋相所造成的危害，你们还觉得不够吗？你们还要干什么？你们想再制造什么新的麻烦？要把水搅浑，你们是能够做到的，对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们同样应该记住，你们投进水中的石块有的时候需要用全体人民的力量才能打捞出来，以流血牺牲和人民的筋疲力尽为代价才能够打捞出来。

不要胡闹了，一切都有个限度。如果说迄今为止，你们在头脑清醒的人们心目中唤起的只是对自己的嘲笑，那么现在，对你们就是另一种态度了，是愤怒。

这些人在谈论愤怒！请听着，您不了解事实，怎么竟敢那样武断地向全俄罗斯，向整个欧洲（因为您的文章在欧洲是有自己的影响的）讲话，对伊洛瓦伊斯基先生您怎么敢于说："谁要求、谁委托伊洛瓦伊斯基先生进行他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的？"紧接着，在把伊洛瓦伊斯基先生与克拉普卡进行可笑的比较之后，又写道："而你们自己干的又是什么呢？伊洛瓦伊斯基先生在研究斯拉夫古迹的幌子下干的又是什么呢？"在您完全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之后，对这一切怎么竟敢那样武断地下笔呢？难道您真的认为您可以出卖俄罗斯？关于伊洛瓦伊斯基先生，您质问说："他明白还是不明白？"而我倒要问问您自己，政论家先生，您明白还是不明白，您闹出了什么事！要知道，在奥地利，人们并不问：这是什么人写的，这个人是聪明人还是笨汉，有教养还是没有教养，这个人对泛斯拉夫主义多少有点了解，还是一无所知，或者从来就没有阅读过有关泛斯拉夫主义的东西的人？实际上，在奥地利，人们毫不犹豫地说："这么看来，俄罗斯真的是派去了宣传人员吧？假如这不

是真的，那么这家彼得堡独立的大型日报在极力证实为进行宣传鼓动而派遣密使这件事实时，怎么可能那样武断，那样激烈，以那样谴责的口吻对待泛斯拉夫主义者们呢？人家会说，要知道，写这篇文章的，自己就是俄罗斯人，他的爱国主义也会阻止他写这篇文章，而且，还会使他隐瞒罪恶。但是他没有隐瞒实情，因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对泛斯拉夫主义者们的愤怒迸发了出来，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们以自己在奥地利和斯拉夫各地进行的无所顾忌的宣传和鼓动，看来，正在酝酿着对俄罗斯确实是可怕的灾难。因此，我们无须为在那里逮捕了一个什么伊洛瓦伊斯基而道歉，相反的倒是，需要加紧搜捕，把在奥地利的全部俄罗斯人都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不是我们应该请求原谅，而是俄国政府应该请求我们原谅，因为它在自己那里公开纵容旨在反对奥地利的恶毒的政治团体的活动，不断向我们这里派遣大量的宣传鼓动人员，煽动奥地利的俄罗斯人反对合法政府。”

政论家先生，在奥地利，人们必定要这样说，肯定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您的文章。这算什么，不是出卖吗？您的看法如何？您是不是在向波兰人和奥地利人出卖俄罗斯的利益？您是不是在支持政治上的动乱并且为动乱出力？其实，您肯定、完全、确切地知道，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派遣过任何密使，可是您怎么竟然那样说伊洛瓦伊斯基先生，说他是在研究斯拉夫古迹的幌子下去煽动暴乱呢？在这方面，在俄罗斯有没有一个人相信您？然而您在这件事情上却说得那样武断，好像对这件事情了如指掌。究竟谁在煽动暴乱？

现在谈谈其余的问题。您发泄了您的怒气，写出了彰明显著的谎言，您向旧波兰人和奥地利人，向形形色色的无休无止地进行宣传反对我们的欧洲渣滓，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俄罗斯

的利益，您在您的这种所作所为之后，还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俄罗斯读者对您的同情吗？您真的把俄罗斯人看得如此愚蠢吗？

再说，那是什么姿态？在奥地利面前战战兢兢，低声下气！“据说奥地利发火了！”果戈理笔下的哥萨克首领对哥萨克们说，“一个外邦国王的宠爱，不用说是国王，就是一个用黄皮靴踢他们脸蛋的波兰大地主的宠爱，在他们看来都比任何友爱更高贵。”[①] 这个首领说的是叛徒。难道您希望俄罗斯人也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金钱而处于战战兢兢的本能恐惧之中，以至于像对什么黄皮靴那样卑躬屈节吗？恰恰相反，正是现在，正是目前时刻，我们对奥地利的最好的政治岂不就是，保持自己的高度民族自尊的政治，而不是您所希望的那种政治？我们越是像您所期望的那样卑躬屈节，我们就越会使奥地利的贪得无厌随之增强膨胀。奥地利有什么叫我们惧怕的，奥地利任何时候也没有力量冲我们拔剑相向，即便是想要这样。相反，现在恰恰到了一个采取直接和公开的政治的时刻，以免今后战争结束的时候出现可悲的误会。我们没有必要自己承担责任。我们似乎还应该看看英国。他们起码应该明白，我们不可能惧怕他们，相反，我们有力量使他们受到的危害要比他们使我们受到的还要大。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对我们有错觉，这都是《交易所新闻》这类报纸的异常举动造成的。夏季在奥地利不是有这样一种看法吗，说俄罗斯的力量是欺骗了大家的幻

① 引文出自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第9章。但这里引文与原著略有出入。原著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外邦国王的宠爱比任何友爱都更珍贵，不用说是国王，就是一个用黄皮靴踢他们脸蛋的波兰大地主，只要对他们略施小惠，他们也要受宠若惊哩。”（见果戈理《小说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影，今后再也不能把俄罗斯当成强大的军事大国了。就是那个时候奥地利的嗓门也提高了，在英国，也是上层人士里面，不也是认为在特拉布宗登陆的一万名[①] 英国士兵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在东方和高加索的任务吗？我们了解他们，看来，他们并不了解我们。向我们的敌人出卖俄罗斯的利益，把俄罗斯描绘得仿佛很懦弱和没有尊严感，这是俄罗斯给他们帮的倒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全都是谎言。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使用的是俄国《新时代》的材料。《新时代》在评论英国清醒的报纸和亲土耳其的报纸的争论时说："亲土耳其的报纸给自己的国家帮了倒忙，它夸大了土耳其的胜利，在英国人的舆论中贬低了俄国，例如，它认为，只要有一万名英国士兵在特拉布宗登陆，就足以彻底摧毁俄国的高加索兵团，按照英国的利益结束小亚细亚的战事。"

“СТРЮЦКИЕ”[①]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作家日记》，1877 年，11 月号，第 1 章，Ⅰ)

我在出版《日记》的两年过程中，使用过两至三次“стрюцкие”这个不大通用的词，接到过来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数次询问：“‘стрюцкие’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很抱歉，直到现在我还谁都没有答复，总是想在《日记》中顺便答复一下。现在《日记》即将暂停，我想拿出一点篇幅解释这个难懂的彼得堡词汇。如果说我以这件小事作为 11 月号这一期的开篇，这是因为，如果像从前曾经尝试过的那样，把它放在最后一页，那么其他的题目总是排得剩不下一点空白给“стрюцкие”，每一回都不得不把“стрюцкие”的解释再推到下一期。

“стрюцкий，стрюцкие”这个词是一个民间的词汇，只有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才使用这个词，好像还是只有在彼得堡才使用的词。所以说，这个词似乎是在彼得堡产生的。我之所以写“似乎是”，乃是因为我向“内行人”不知问过多少次，谁都没有答复我说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它的音节是怎样形成的，除彼得堡之外，在俄国任何其他地方是否也有使用这个词的，最后，这个词是否真的是在彼得堡产生的。至于我，那我还是“似乎”觉得（我也不能肯定地说）这个词是一个纯属彼得堡

---

① 俄文：据俄罗斯作家、辞书编纂家弗·伊·达里（1801—1872）的《现代俄语详解大辞典》的解释，“Стрюцкие”就是“下贱的、没出息的、可鄙的人”。此处译为“窝囊废”。

的词，是彼得堡的平民百姓自己造出来的，但是，什么人，什么时候造出来的，是否很早就造出来了？我不知道。它的意思，凭我向人们的多次询问，根据我所理解的，是这样的：

“стрюцкий”是指游手好闲的、毫无用处的、卑微下贱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能总是指无可救药的酒鬼，堕落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似乎被称作“стрюцкий”的人也不是酒鬼。不过这个游手好闲的、毫无用处的酒鬼的主要特征，值得为他起个特别的称呼，造出一个能包含这种人的全部特征的新词，首先就是头脑糊涂、特有的放荡不羁、头脑空虚、举止轻浮。这是那种爱自吹自擂，实则一文不值的人物。节日的晚上酒鬼们在街上狂呼乱叫，阵阵喧嚣和警察的愤怒呼喊，在挤成一堆的人群里面某个人的抗议声、叫喊声、抱怨声和威胁声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有很多装腔作势的愤怒。您走上前去打听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回答是人们笑一笑，摆摆手，说一声“鸡毛蒜皮，стрюцкий！”就走开了。“стрюцкий”这个词是以漫不经心的、轻蔑的口吻说出的，语气总是轻蔑的。那个叫喊的人即便是真的挨了打，受了欺辱，他这时似乎也得不到同情，只能受到蔑视，这只是因为他是“стрюцкий”，这就是说，他所干的一切都是胡闹，他喊叫是胡闹，他挨了打也是胡闹，在所有的人里面这是最“不值钱的人”。我还补充说一句，“стрюцкий”大都穿戴不好，衣着不入时，破皮鞋也裂开了口子。再补充一点，“似乎”只有穿德国衣服的人才被蔑称为“стрюцкий”，不过我不能肯定是这样，但好像是这样的。

被称作“стрюцкий”的不可救药的酒鬼的第二个重要标志，除开他的胡作非为和轻举妄动之外，那就是他在社会中没有足够的稳定的地位。我常想，一个有钱、有住房或者有点财产，此外，还有一份稍微可靠的固定工作的人，即使是在工厂

做工的人，也不会被称作“стрюцкий”。然而如果他有事业、店铺、小铺子或者别的什么事业，但他却不认真经营，马马虎虎，心中没有盘算，那么他就可能沦为“стрюцкий”。这样看来，“стрюцкий”，这就是毫无价值的，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住下去，都不能站稳脚跟的，轻举妄动的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也的人，经常醉醺醺地装腔作势地吹牛皮的人，说大话的人，往往由于自己爱受委屈才经常受气的人，警察、哨所和政府经常传唤的人，总而言之是废物，无赖汉，肥皂泡，引起“唉，没用的东西，стрюцкий”这种轻蔑嘲笑的人。

再说一遍，我觉得这个词主要是在彼得堡使用的。但是，在俄罗斯其他地方是否也使用呢，我不知道。在彼得堡的平民百姓里面是非常普遍地使用的。在彼得堡有非常多的人是从外省涌进来的，因此，很有可能这个词会传入其他省份，即使现在还没有传过去。可能也会进入文学，除我之外，好像其他作家也使用过这个词。对作家来说，这个词蕴含的蔑视语气是有魅力的，人民带着蔑视用这个词称呼那些荒诞不经、头脑糊涂、大喊大叫、轻举妄动、装出愤怒得不成样子的没用的人们。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在上层社会里也很多，不是这样吗？只不过他们不总是醉醺醺的，也不是穿破皮鞋，其实全部区别也常常就在这里。现成的词就放在那里，人民在使用这个词讲话时所流露的轻蔑语气又强化了它的诱惑力，有的时候怎么能够忍得住不把这些上层人士叫做“стрюцкие”呢。

“СТУШЕВАТЬСЯ”[1] 这个动词的来历

(《作家日记》，1877 年，11 月号，第 1 章，Ⅱ)

顺便说说几个新词的起源与使用问题。在我们的文学中有“стушеваться”这样一个人人都在使用的词，这个词虽然不是昨天才出现的，但也不是很早以前，它的出现不过三十年；在普希金的时期还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词，也没有人使用过。现在不仅在文学家的笔下可以遇到这个词——在所有的意义上，从最轻松的到最严肃的意义上使用了，还可以在科学论著、学位论文和哲学著作中遇到这个词。不仅如此，在政府机关的公文中，在报告、总结和指令中都能找到这个词，人人都知道它，人人都理解它，人人都在使用它。但是在全俄罗斯只有一个人知道此词的确切来源，它的产生和在文学中出现的时间，这个人就是——我。因为第一次发明，并在文学中使用这个词的人——就是我。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刊物上是在 1846 年 1 月 1 日，出现在《祖国纪事》上我的中篇小说《化身[2]，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奇遇》之中。

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是 1844 年着手写的，写完之后别林斯基知道了，涅克拉索夫把它收入到他编辑的《彼得堡文集》中，这是 1845 年。这本选集是 1845 年底问世的。就在 1845 年夏天，在结识别林斯基之后，我开始写我的第二个

---

① 俄文：“消退”、“退色”。

② 《化身》过去有多种译法，如《双重人格》、《孪生兄弟》、《同貌人》等。

中篇《化身，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奇遇》。别林斯基在1845年初秋就对我这个新的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还没有见到这篇作品，就把它告知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①]。当时他在克拉耶夫斯基的杂志社工作，并把我介绍给克拉耶夫斯基，我们谈妥，我的新小说《化身》一写成就交给《祖国纪事》杂志1846年第1期发表。这个中篇小说确实是不成功的，但是小说的思想是相当明快的，在文学作品中我再也没有提出过比这更严肃的思想。可这篇小说的形式是完全失败了，后来，十五年后，为了出版的我的《文集》，我对这篇小说作了很大修改，但是，我又一次认识到，这篇东西完全是失败之作，假如我现在处理这个思想，重新叙述它，会采用全然不同的形式；但是在1846年我没有找到这种形式，没能把小说写好。

尽管是这样，大约是在1845年12月初，别林斯基坚持要求我在他那里朗读这篇小说，哪怕是诵读两三章也好。他为此竟然举办了一次晚会（他几乎从来也没有干过这种事情），邀请了自己要好的朋友。我记得，在场的有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他刚听到我读了一半的时候，称赞了一番就走了，他忙着到别处去。别林斯基对我读的三章或是四章非常满意(虽然不值得这样)。别林斯基还不知道小说的结局，不过他沉醉于《穷人》的魅力之中。就是这个时候，在这次诵读的晚会上，我第一次使用了“стушеваться”这个后来广泛传播的词。人们把小说忘记了，它理应受到这样的待遇，而这个新词却被

①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新闻工作者、出版家；主编并出版过《文学报》、《圣彼得堡新闻》（1852—1862）、《呼声报》（1863—1884）、《祖国纪事》杂志（1839—1868）等。别林斯基当时就在《祖国纪事》工作。

人们接受了，掌握了，使它在文学中稳稳地站住了。

“стушеваться”这个词的意思是消失，消亡，可以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这种消亡不是突然发生的，不是一下子就钻进地下去了，也不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消亡的，而是，这样说吧，彬彬有礼地，从容不迫地，不露声色地变为不存在的。就像画面上用黑色涂的阴影渐渐变浅一样，黑色逐渐变浅，最后完全变白，阴影就无影无踪了。大概我在别林斯基那里诵读的《化身》开头的三章里，这个词运用得很恰当，那是描写一个令人不快的滑头滑脑的人物（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人物，我忘记了）如何恰当其时地从舞台消逝的场面。所以我才说，这个新词没有引起听众的任何困惑，相反的是，马上就被所有的人理解了，引起了注意。别林斯基正是为了夸奖这段描述才打断了我的诵读，当时在场听的人们（这些人如今全都健在）全都交口称赞。我记得很清楚，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也称赞了（他现在也许忘记了）。后来，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也大加赞许。此外，还有一些人，我想他们还会记得当时他们对这个新词多少也感到一些兴趣。不过这个词不是立刻就被接受并融入文学的，而是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融入的。我还记得，1854年，我一走出西伯利亚的监牢，就开始翻阅我离开文坛五年期间人们所写的全部作品。（我一口气不停地就读完屠格涅夫在我被流放之前刚刚动笔写的《猎人笔记》和他早期的一些小说，我感到兴奋不已。是啊，当时在我头顶上是大草原灿烂的阳光，春天降临了，而同春天一起到来的是焕然一新的生活，苦役到头了，自由！）就这样，我开始浏览起来之后，竟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怎么常常遇到“стушеваться”这个词。后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个词在文学中就已成为十分惯用的词了，而现在，我再重说一遍，

甚至在报纸上的公文中遇到它，在学位论文中竟也遇到它。这个词的用法也与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完全相同。

其实，如果说是我第一次在文学中使用了这个词，那么发明这个词的人并不是我。这个词是我曾经就读的那个高等工程学校的一个年级发明的，是我同年级的很多同学发明的。可能我也参与了发明，我记不清了。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出现，自然而然进入使用的。学校的全部六个年级都应该绘制堡垒建筑工程、基建工程和军事建筑工艺学等各种图表，严格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得有自己动手绘制高水平图纸的能力，所以没有绘画兴趣的人也不得不竭力在这方面获得一定的技能。绘图所得的分数计入总分，影响平均分数的高低。您从高等军官班毕业出来，可以获得优越的数学家、军事建筑师、工程师等职务。但是，如果您交出的绘图差一些，那您绘图得到的分数在计入总分时就会降低您的平均分数，在毕业时您就会丧失下一步，比如说，取得军衔的相当大的优待条件。因此大家全都努力学好绘画，把所有的图纸都画好，着墨涂上阴影，人人又都尽力学会巧妙地使画面的阴影由深变浅①，由暗变亮，变浅，直到变无；画得好的由深变浅②的画使图画显得美观。我们在班里会突然说："某某在哪儿？哎，他躲到哪儿去啦③！"或者是，比如说两个同学在谈话，其中一个人该学习了，一个坐在那里看书的人会对另外那个人说："喂，现在你走开吧④。"再比如说，一个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的新生说："我刚才喊过您，您到哪儿去啦⑤？"стушеваться 用在这些情况下就是表示离开、消失的意思，用在这里的说法就是借用把阴影由深变浅的形象

①②③④⑤ 这里的"由深变浅"、"躲到哪儿去"、"走开吧"、"到哪儿去啦"等的俄语均为"стушеваться"。

说法，就是取其消失，取其由深色变为无色之义。我记得很清楚，这个词只在我们这个年级里使用，其他年级大概未必掌握这个词，我们这个年级离开学校之后，这个词好像也就随着消失了。三年之后我想起了这个词，就把它写进了小说。

对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词汇的来历，我这样认真地写了这篇冗长的叙述，就算是给将来收集俄语词汇的学者，给某个未来的达里写的也好[①]。如果说现在我使读者厌烦了，那么未来的达里会感谢我的，那么这就算是为他一个人写的吧。如果您愿意的话，那么，为了明确起见，我完全坦率地说，在我的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我最为得意的是，我成功地为俄罗斯语言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词汇，每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这个词时，我总是体验到一种最愉快的心情；看来，你们现在该明白了，我为什么要专写一篇文章来叙述这种琐事。

---

① 俄国辞书编纂家弗·伊·达里（1801—1872）编纂的四卷本《现代俄语详解大辞典》的第4卷（1866）即已收入“стушеваться”（“消退”）一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写于1877年。

奴颜媚骨还是礼让精神?

(《作家日记》, 1877年, 11月号, 第2章, Ⅰ)

尽人皆知，俄罗斯一切有知识的人都是讲究礼让精神的，就是说，这是在他们与欧洲打交道，或者他们认为欧洲在注视着他们的时候，其实，欧洲根本就没有理过他们。哼，在家里，独自一人或和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可就要按照自己的性情行事了，在家里嘛，全部欧洲风度都靠边站吧，只要随便拿我们的最普遍的家庭关系、公众关系、荣誉和义务看看就够了。实际上，我们宣扬“欧洲式的”思想的人哪一个真正相信这种思想？当然，这要除开那些正直的而且必然是善良的人们(因为他们只是由于心地善良才相信)。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人有很多吗？如果把话说到底，可能我们这里连一个欧洲派人士也没有，因为我们根本就成不了欧洲派。我们这里的先进人物、交易所经纪人、千方百计指导别人的人，从欧洲思想里面吸取的只是租金制。我认为，我们这里的情形就是如此，到处都一样。我在这里说的，当然不是指那些头脑很健全的人们。那些人不相信欧洲思想，因为本就没什么可相信的，这是因为在世界上任何时候，任何事物都不像我们在二百年的欧洲化过程[①] 中凑得的那个“思想体系”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朦朦胧胧，那样不确定，也不可界定，实质上它不成其为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大杂烩，一团杂乱的情感，令人不可理解的别人的思想、别人的结论和别人的习惯的杂乱混合体，特别多是空话，

① 指彼得大帝改革以后。

除了空话还是空话，当然是最欧洲式的和最自由主义的空话的大杂烩，然而对我们来说毕竟全是空话，而且仅仅是空话的大杂烩。

完全用鹦鹉学舌来解释这一切是不成的，用思想上的奴颜媚骨、俄罗斯人在欧洲面前的思想上的奴颜媚骨来解释也不成。我们思想上取媚的表现是很多的，甚至是非常多，但是，我们受欧洲奴役的最大原因毕竟不是奴颜媚骨，应该说是我们俄罗斯在欧洲面前与生俱来的礼让精神。人们说，这与奴颜媚骨其实是一回事。在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但不能说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当然，我说的不是前面指出的那种喜欢指导别人的骗子，那种欧洲派分子与欧洲毫不相干，从来就与欧洲无关。他们这些人是依仗聪明在干浑水摸鱼的勾当，他们在两个世纪里一直在干这种勾当。）

比如说，关于当前的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战争请听英国人格莱斯顿[①] 是怎样说的：

> 无论怎样议论俄罗斯历史上的其他篇章，俄罗斯把数百万被奴役的人民从残酷的和屈辱的桎梏下解救出来，这是俄罗斯对人类的贡献，是历史上所记载的最辉煌的贡献之一，是永远不会从各民族的崇高记忆中磨灭的贡献。

如果直言不讳地问一问，您认为俄国的欧洲派人士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吗？一辈子永远都不可能！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说这种话；他只要一听到或读到俄罗斯人用俄语讲这种话，

---

① 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1868 年起为自由党领袖。

就立刻脸红，这可不是在欧洲面前表示客气，这是自己对自己。算了吧，我们怎么敢去……打肿脸充胖子！……而且还说是“为了全人类”，这是我们俄罗斯人干得了的么！说什么为了“解救全人类”，我们可还没有成长到那一步，我们的嘴脸还太难看。再说，这全都是非自由主义的思想。“俄罗斯解救各族人民”，这是何等荒唐的非自由主义的思想！

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欧洲派人士发自内心的观点，他宁肯先把自己的手指剁掉也不写格莱斯顿所写的那种话。“格莱斯顿可以编造那些话；他要不是对俄罗斯毫无了解，就是为将来的目的闭门造车。”这就是欧洲派人士的看法。他们中间还有另外一种人，更善良一些，更激烈一些的人，他们也许还会不无自豪地在心中补充说：“其实我们，俄罗斯的欧洲派人士，看起来比欧洲的欧洲派更富有自由主义精神，更彻底！在我们有头脑的人当中现在谁还会谈论什么‘解救各族人民’？那真是倒退！格莱斯顿说这样的话时，竟不感到羞耻！”

先生们，这一切都应该算什么呢？是奴颜媚骨还是在欧洲面前的礼让精神？

我始终认为，礼让精神在我们历史上的欧洲化阶段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我们的欧洲派人士里面有很多极其正直的、勇敢的人，有尊严的人，虽然这种尊严是别人的，是从外面学来的，可能是就连我们这些骑士本人都不理解的尊严，因为对他来说，这毕竟是欧洲的名词儿，但这总归是尊严感，有这种尊严感的人是不允许别人侮辱自己的。那么，怎么好直接就把他们叫做奴仆呢？不，这是礼让精神害了我们，而不是奴颜媚骨。再说一遍，这里指的仍然是面对欧洲的礼让精神，因为在自己家里我们是要找回补偿的。

热情地向土耳其人送上糖果和雪茄烟的太太们之所以这样

作，想必也是出于礼貌："请看，我们是多么可爱，温柔，宽厚和仁慈，多么有欧洲式的教养！"现在某些粗鲁的人们对这些太太们多少进行了一些开导，但是在开导之前，比方说，在向土耳其人乘坐的那列火车扔花束和糖果的第二天，如果又开来一列土耳其人乘坐的火车，在火车上就坐着报上讲过的那个匪徒，他的特别拿手的本领就是抓住吃奶孩子的两腿一下子把人劈为两半，还能从母亲背上剥下一张皮。那么对他应该怎么办呢？我想，这些太太们仍会以热情的欢呼迎接他，不仅为他准备了糖果，还有比糖果更好的东西，然后，大概要在太太们自己的委员会中提议在当地的中学设立以这个土耳其人命名的奖学金。噢，请相信，在我们这里靠礼让什么都能做到，这种推测完全不是臆想。这些太太们如果照照镜子，我想，她们是会欣赏自己的："我们是多么仁慈，多么富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可爱的太太！"难道您确信这幅想象中的图画不可能变为现实吗？现在有的欧洲派人士以傲慢的眼光看待我们的人民和人民的运动，"除开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中间的某一个傻瓜的愚昧狂妄的异常行为之外"，不承认我们全体人民有任何思想和运动，难道这种观点，这种已经变为现实的观点的可能性与前面描写的那幅想象的图画不相符吗？

在欧洲面前表现礼让精神是我们的普遍现象。土耳其俘虏要求吃白面包，于是他们就有白面包。土耳其俘虏还拒不干活，目击者弗·别·梅谢尔斯基公爵在高加索写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 我们的俘虏从梯弗里斯出发了。本来想让他们乘坐驿站车走，但是他们骚动起来，宣称不走，因为他们不习惯坐俄罗斯的大车。结果给了他们带篷和弹簧座位的邮车，每辆车套六匹马。对此，他

们表示满意，但由于他们占用了大量的马匹，在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上往来的可怜行人就在那里蹲了三天等待马匹。押送俘虏的俄国军官每昼夜只有五十戈比的费用，而且不让他们坐邮车，像安置仆人一样，让他们坐公共马车！这全都是人道精神！（《莫斯科新闻》，第273期）

这不是人道精神，这正是面对欧洲对我们的看法所采取的那种礼让精神，是富于同情心，是多愁善感："欧洲正在看着我们，因此，必须完美无缺，给帕沙[①] 们提供篷车。"

《莫斯科新闻》在另外一期即第282期又继续报道说，当莫斯科人看见我们运送被俘土耳其人的那些从未听说过的舒适条件时，人们都异口同声地发出愤愤不平的议论：

所有的俘虏兵都被舒适地安置在三等车厢里，军官们在二等车厢里，帕沙则在一等车厢的单间里。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舒适？我们的近卫军士兵大概是坐马车离开莫斯科的，可是给他们却开了专门的旅客列车。

人群中一个商人说："近卫军士兵算什么，连伤兵都是运货的车厢运走的，在他们的身子底下连干草都没有来得及铺。这个帕沙膘肥体壮，像你的那头阉猪，该把他装进货车厢，也好让他把膘减一点。他们在那边杀害咱们的伤兵，抽伤兵的筋，用火把伤兵慢慢地烧死，可是现在倒精心侍奉起他们来了，就是为了……"

这些话(《莫斯科新闻》接着又指出）不是个别人的，它们表达出人民中的普遍意见。这些暴徒和这群被自己的帕沙们抢劫一光的穷光蛋们享受到我们自己的士兵们都没有的许多优待……人民看不

① 旧土耳其等伊斯兰教国家的高级军政长官的称号。

下去。

可见，我们看到的，其实并不是任何特殊的情况。这是礼让精神，或者也可以说是在欧洲的舆论面前的礼让精神的外露，一切就是这样的；但是，要知道，可以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两个世纪了，应该慢慢习惯了。

已经闹出了一些笑话，这里就有一则笑话。我是在《彼得堡报》上发现这个笑话的，《彼得堡报》则是从弗·克列斯托夫斯基[①]先生发自战地的信中获得的，信是寄到哪里的，我不知道。《彼得堡报》是如何得到这封信的，我也不知道。笑话是这样的：

> 克列斯托夫斯基先生的信中谈了一件可笑的事情：在侍从身边出现了一个英国人，他头上戴的是软木盔形帽，身上是灰黄色的非军装外衣。有人说他是国会议员，他利用假期为伦敦一家大报（"Times"）撰写"战地见闻"；另外一些人说他不过是一名爱好者，还有些人则说他是俄罗斯的朋友。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不能不看到，这个"俄罗斯的朋友"的行为多少有些古怪。例如，他当着一位大公的面稳坐在那里，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大公阁下在内，全都站着；吃午饭的时候，他竟随意在桌旁站了起来，而大公却还坐在那里，就在同一天，他竟要求一位熟悉的军官帮他穿好灰黄大衣的袖子。这位军官以略带惊讶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顺从地帮他穿上了大衣。当然，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英国人把手轻轻向自己的软木盔形帽檐上一举以示回报。

① 弗·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彼得堡的贫民窟》（1864—1867）。

《彼得堡报》说这是一起可笑的事件。很遗憾，我没有看出这里有什么可笑之处，相反，我看到这里面有许多不愉快的、令人沮丧的情形。再说，我们从童年起似乎就牢牢地形成了一种看法（我想，这是小说和法国轻喜剧的影响），这就是认为所有的英国人都是古怪的人，乖戾的人。但是，古怪的人是什么意思？古怪的人并非时时都是傻瓜，或者是幼稚的人，幼稚得想象不到世界上并非到处都只有一种秩序，都同他们那个角落里的秩序一模一样。恰恰相反，英国人都是非常聪明的，是视野相当开阔的人。他们作为航海者，而且是有文化的航海者，见多识广，见识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很多很多的人和秩序。他们是非同寻常的、天赋很高的观察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发明幽默，用别具一格的语言表达幽默，向人类阐释幽默。难道这样的人，而且还是国会议员，能够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站，什么时候应该坐吗？再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讲究礼仪。[①] 例如，英国的宫廷礼仪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考究的礼仪。假如这个英国人是国会议员，毫无疑问，他仅凭是名议员这一点，就能很清楚地知道一名下级人员如何与别人、与上级交往这种礼仪。就是说，谁在谁的面前可以就坐，而谁在谁的面前又必须起立。如果他同时还是上层社会的一员，那么他们在伦敦的贵族接见、宴会和舞会之类的礼仪也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的。不，如果按照报纸对那个笑话的叙述来判断，那里发生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是英国人的傲慢，而且

---

① 英国人讲究礼节，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嘲笑的对象。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在其小说《名利场》（1846）中就曾以具体的细节对此进行讽刺。陀思妥耶夫斯基此说到英国人讲究礼节，也不无讽刺意味。

不单单是傲慢，还带有目空一切的寻衅味道。这位“俄罗斯的友人”不可能是俄罗斯的真挚友人，他坐在那里，眼睛望着俄罗斯的军官们，心中想的是：“先生们，我知道，你们有狮子的雄心①，你们要做的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可是你们能够做到。你们面对敌人无所畏惧，你们是英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巴亚尔德②，你们有强烈的尊严感。我不能否认自己的亲眼所见。尽管如此，我是英国人，而你们不过是俄罗斯人，我是欧洲人，在欧洲人面前你们理应有‘礼让精神’。你们的身上不论有什么样的雄狮之心，我毕竟是比你们高一等的人。这使我感到非常快意，使我尤其愉快的是研究你们在我面前的那种‘礼让精神’，那种天生的和无法克服的‘礼让精神’，俄罗斯人不能不这样看外国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你们以为这全都是琐事；可是这些琐事使我欣慰，使我异常高兴，我是到这里来散心的，我听说你们是英雄，就跑来看看你们，但是，我回国的时候，还是深信不疑，作为古老的英国的儿子（想到这里他的心自豪得颤抖起来），我仍然是世界上头等的人，而你们最多不过是二等人……”

在前面引证的那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最后那几行：

> 这位军官以略带惊讶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微微一

---

① 狮子理查是英国金雀花王朝国王理查一世（1151—1199）的绰号。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期间占领了塞浦路斯岛和巴勒斯坦的阿克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以理查一世的十字军在解放“圣陵”的思想鼓舞下进行的战争比喻俄罗斯人与土耳其的战争。

② 巴亚尔德（1476—1524），骑士，以勇敢与高尚闻名，被称为“无畏与无过的骑士”。他的传记出版于1524年，广泛流传，以后反复再版。

笑，耸了耸肩膀，顺从地帮他穿上了大衣。当然，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怎么是“当然”？为什么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相反，恰恰可以做点完全不同的事，截然相反的事。可以“以略带惊讶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然后就从他面前走过去，始终没有碰一下他的大衣，这才是应该做的。难道真的看不出来，这个有文化的航海家在耍手腕，这个深明礼仪的人在寻找满足自己的渺小的自豪感的机会？可能正是我们的文明的“礼让精神”妨碍了我们没能在这个瞬间清醒过来，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礼让精神”不是对这个英国人的，不是对这个戴着什么软木盔形帽（什么是软木盔形帽?）的议员的，而是对欧洲的，是对欧洲文明的义务“礼让”，我们就是在礼让精神的气氛中成长起来并且沉溺于其中，直至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我们还将长期甩不掉这种礼让精神。

从英国和美国运送给土耳其军队的弹药，数量极其巨大；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一个土耳其士兵在普列夫纳每一天消耗五百发子弹；要把军队武装到这种地步，土耳其既不可能有这样的物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财力。毫无疑问，英国人和英国钱参与了现在这场战争。他们的轮船运送了武器和一切必需品，而我们有些报纸出于“礼让精神”却大声呼吁：“哎呀，不要说这种话，哎呀，千万不要挑起这个问题，就当我们没有看见，就当我们没有听见，不然的话，文明的航海家就要发怒了，那时……”

那时又会怎样？你们怕什么？关于“礼让精神”这个题目，还有很多的话可以补充。

如果说早在越过巴拉博什桥之前，我们以各种方式向欧洲

许下过大大小小的诺言，毫无疑问，这也应该说是出自我们的“礼让精神”，出自对欧洲，对欧洲的魅力的礼让精神。不过，关于“礼让精神”我们暂且谈到这里。我只要提一句，在这一章的开头，开始提到“礼让精神”的时候，我补充说过：“其实，这仅仅是在欧洲面前，在自己家里我们总是找回补偿的。”我想借这个机会指出，在自己家里我们有时是多么善于找回补偿，进行报复……

无以复加的极端的奴才习气

（《作家日记》，1877 年，11 月号，第 2 章，Ⅱ）

先生们，你们还记得吗，还是在夏季，在占领“普列文”很久之前，我们突然进入了保加利亚，出现在巴尔干山脉的后面，人们由于愤懑而说不出话来。倒不是所有的人，这是首先要声明的，甚至远远不到一半人，要少得多，但是，愤怒的人毕竟还是不少的，他们发表了意见。记者们从军队发回了报道，此后紧接着又是我们的报界，特别是彼得堡的报界议论纷纷。这些言论都是激烈的，坚定不移的，义愤填膺的……

全部事情的起因是，有这些议论的人们正是去拯救被压迫、被欺辱、被蹂躏和被折磨的人们的，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自己很清楚。我记得，早在宣战之前，我在我们最严肃的报纸上就读到过，那是说，毫无疑问，“一踏进保加利亚，我们就不仅要养活我们的军队，还要养活保加利亚那些奄奄待毙的居民。”这是从战争和必不可少的消耗的考虑出发而说的。这是我亲自读到的，我还能够指出是从哪里读到的。这就是我们关于保加利亚人的理解，关于那些被压迫、被折磨的人们的理解，我们就是为了他们而从芬兰湾的沿岸，从俄罗斯的山山水水到那里去抛洒自己的热血的。我们带着这些观念到了那里，突然看到的是优美的保加利亚农舍，农舍四周是田园、花丛、果实和牲畜，几乎是报以百倍收获的精耕细作的田地。此外，每四座教堂中有三座东正教教堂，一座清真寺，这都是为了被压迫者的信仰！“他们怎么敢这样无礼！”有些解放者感到受屈辱的心顿时冲动起来，面红耳赤。“我们是

为拯救他们而来的，所以他们几乎是应该下跪欢迎我们。然而他们非但没有下跪，还对我们侧目而视，好像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感到高兴！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倒也捧出了面包和盐，这是真的，但却斜着眼睛看我们，斜着眼睛看！……"

于是就议论开了。请听着，先生们，如果遇到下面这种情况您会如何对待？您突然收到一封假的，或者是您自己理解错了的电报，说您的亲人，朋友或兄弟病倒了，在某地被抢劫了，或者是被车轧了，再不就是其他类似的事情。您会放下您的一切事情，急忙赶到不幸的兄弟那里去，可是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您面前的人比您还结实，他正坐在桌旁吃饭，大声招呼您也坐下来，并且因为您由于 qui pro quo[①] 虚惊一场而放声大笑。无论您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人，难道您能够因为他没有被抢劫或者没有落到车轮下面而大发雷霆吗？尤其是因为他的面颊是那么红润，他那么安然无恙地又吃又喝而大发雷霆吗？不会的，难道不是吗？相反的是，您还应该因为他还活着，因为他比您还健康而高兴。嗯，当然啦，按照人之常情您是有点生气，可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腿没有被车轮轧断，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实，您也不会立刻就起身离开桌子去写关于他的报道和笑谈，去勾画他的性格，指出他不招人喜欢的特点……哎，关于保加利亚人可真的就是这样的，说是"在我们这里就连富裕的农民也没有像被压迫的保加利亚人那样生活。"还有另外一些人后来竟得出结论说，俄罗斯人是保加利亚的全部不幸的根源，因为，要不是我们先前由于不了解情况而为受压迫的保加利亚人去威胁土耳其人，要不是此后又到这里来解救"被掠夺的"财主们，那么保加利亚人直到现在还在过着无

① 法文：误会。

忧无虑的生活。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这样说。

我只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说，我们在自己家里，也就是在欧洲已经看不见我们，也不看我们的地方，而且也不能按照俄罗斯的方式理解我们的地方，我们有时总是能以自己的方式弥补我们由于在欧洲面前的“礼让精神”和我们文明的欧洲主义所受的损失。而保加利亚呢，其实这不也是家里嘛。我们是来解放他们的，就是说，这跟回到家里一样，他们就是我们的人。他们那里有果园，有财产，而那些财产也如同我的一样；当然我不要他们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是高尚的人，我确实也没有权利要，但他毕竟还是应该体会到，应该永远感恩戴德，因为我既然走到他这里来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无异于全是我送给他的。是同我从他的压迫者土耳其人的手中夺过来又还给他一样，他应该明白这一点……可是，突然听说那里谁也没有压迫过他，这是多么令人难堪呀，不是这样吗？

这不是什么高度文明的礼让精神，而纯粹是奴颜媚骨，难道不是吗？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呀！我们因为披上欧洲式礼让精神这套不合身的装束而承受了重负，要“在自己家里”找到补偿，却出了这样最可笑的事。这些热情的先生们弄出了最为奴颜婢膝的事，这使得我们中间相当多的人茫然失措，这种事情已经比茫然失措地给英国人穿上大衣要严重得多了。

后来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很多当时大发雷霆的人，虽说不是所有的人，直到现在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看清了真相。首先看明白的是，保加利亚人勤劳，他们的土地能生产出多达百倍的收获，在这方面保加利亚人没有任何过错。其次是保加利亚人“侧目而视”解放者，这也不是他的过错。只从他做了四百年的奴隶这一点来说，他遇到新的老爷时，他不会相信他们是兄弟，只会认为他们是新的老爷，更何况他还害怕从前的老

爷，他在心中痛苦地思索着："从前的老爷要是再回来了，他们知道我曾向这些人敬献过面包和盐，那该怎么办?" 正是由于内心这些疑虑他才侧目而视的，他还真的想对了，这个不幸的人，他猜得一点也不错！我们在完成了向巴尔干的第一次英勇进击之后，突然撤退了，土耳其人又返回到保加利亚人那里，他们从土耳其人那里所蒙受的一切如今都已成为世界历史的资料！那些漂亮的屋舍，那些田地、果园、牲畜全都遭到抢掠，化为灰烬，被从地面上铲除了。不是几十人，也不是几百人，而是几千几万的保加利亚人被烧杀了。他们的儿童的身体被劈开，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妻女在蒙受耻辱后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掳走，遭受玷辱后被出卖；男人们，就是那些欢迎过俄罗斯人的人，还有那些从来没有欢迎过俄罗斯人、但在某个时候与俄罗斯人可能有过接触的人，所有这些人都为俄罗斯人付出了被绞死或被烧死的代价。折磨他们的那些畜生们在夜间用钉子把他们的耳朵钉在木板墙上，到了早晨就一个不留地把他们全都吊死，逼迫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去吊别的人，在吊死二十来名罪人之后自己也必须以上吊而告终，在那些折磨他的、号称土耳其民族的贪淫残暴的畜牲的哄笑声中上吊。而我们的某些极富礼让精神的太太们后来还对他们赞赏备至……

注意（附带提一下），不久前，那已是 11 月中旬了，来自皮尔果斯的消息谈到这些强盗的新的暴行。在那次激烈交锋的时候，土耳其人暂时击退了我们，我们没有来得及带走我们的负伤的士兵和军官，后来，就在当天的晚上，我们的人又返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时找到了自己的负伤的军官和士兵，他们都被抢掠一空，赤身裸体，被割掉了鼻子、耳朵、嘴唇，肚子被剖开，最后被土耳其人扔进麦秸垛和粮食堆里烧得黑糊糊的，

他们是在放火之前就把还活着的我们的伤员拖到那里去的。报复当然是残酷的事，况且实质上也不会有任何好处，我在以前出版的一期《日记》中已经谈过这一点，但是对这一群畜生的长官采取严厉措施并不算过分。可以公开宣布，甚至大声向全欧洲宣布（普鲁士人大概是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对法国人就是这样做的，丝毫不差，我们这样对待同我们作战的畜生的理由要比普鲁士人的理由正当十倍），如果发现了犯下的暴行，那么犯下这些暴行的土耳其人的顶头上司被俘虏后应该就地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可能这将会对土耳其的军官和帕沙们产生某些影响。（注意，我认为，现在或者今后，总能知道，比如说，在土耳其的长官里面是谁指挥了对皮尔果斯的进攻。）这种意外的礼物，而不是带弹簧的轿车，也许能够使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清醒一点。现在，正是这个"长官"在沦为俘虏之后看到，在他的暴行之后人们是如何欢迎他的，他简直以为他比"低贱的俄罗斯人"无比高贵。请相信，这个土耳其人永远也不会相信我们的欧洲式的礼让精神和我们在欧洲面前的恐惧，也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也根本想象不到这里的原因。对欧洲客客气气而心怀恐惧纯粹是俄罗斯自身的事情和发明，任何人都永远也无法理解。土耳其的长官的想法是，"可能我昨天允许士兵割掉了鼻子的人就是你的亲兄弟，在这之后，既然你还对我这样毕恭毕敬，那就是说，你自己感到在我面前是下等人，而我在你面前则是上等人。千真万确是理应如此，这是真主的意志，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于自己，被俘的土耳其帕沙该是这样想的，而且也必定会是这样想的。

这样一来，那些由于保加利亚人生活得好而对他们产生不满的人们，在与保加利亚人一起共同经历过悲惨遭遇之后，他

们自然就明白了，保加利亚人的生活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装饰，所有那些房舍和田园、妻子和儿女、那些家庭中未成年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实际上全都是属于土耳其人的，土耳其人想据为己有的时候，那就属于他所有。他想拿就拿，在平常的时候拿，在成熟的时候拿，拿钱，拿牲畜，拿妻子，也拿女儿。如果说拿过之后，还有什么枝繁叶茂的东西继续留在那里的话，那仅仅是因为土耳其人今后还要从这片土地上攫取财物，不想彻底毁灭这片如此肥沃的土地。相反，有些时候在某些地方土耳其人还允许充分地发展，为的是到一定时候去攫取，再攫取……

现在，土耳其人显然正在凶残地肆意妄为，要彻底消灭保加利亚，他们已经在后悔从前没有把保加利亚一点不留地铲除掉。假如我们攻占普列文之后放慢前进速度，那么土耳其人看到他们可能要永远告别保加利亚，就会趁现在的机会在保加利亚灭绝一切凡是能够灭绝的东西。现在有两种高明的见解：我们一些高明的人断言，假如不是俄罗斯进行干涉，保加利亚人至今还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见俄罗斯人是保加利亚人一切不幸的根源。“Daily News”① 的记者，英国人福尔别斯，曾以自己从我方战地发回的出色、翔实的报道而闻名。他在结束自己的文章时，终于坦率地讲出了自己的英国人的全部道理。他真诚地认为，在俄罗斯军队越过多瑙河的时候，土耳其人有“充分的权利”消灭巴尔干以北的保加利亚居民。福尔别斯几乎为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而感到惋惜（当然是从政治上），他的结论是，保加利亚人应该永远感谢土耳其人，因为当时土耳其人没有把他们像绵羊似的一个个全部屠宰掉。回想一下我们俄

① 英文：《每日新闻》。

罗斯人关于保加利亚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见解，再把它与福尔别斯的见解做一番对比，那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保加利亚人提出如下劝告：“既然没有把你们一个个全部屠宰了，你们此后怎么能不生活得无忧无虑呢?”但是，这里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十分显眼，并且还会载入史册。这就是“像福尔别斯这样有教养的人，像英国这样文明、伟大的民族的一员，难道真的就心平气和地、坦然地承认土耳其人有这种权利吗？难道这就是英国文明产生的最新花朵与果实吗?”不过请注意，如果这里所说的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法国人或者意大利人，他当然就不会这样说了。他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这里说的全部都是斯拉夫保加利亚人，由此可见，在他们，在欧洲所有的人的心目中，对斯拉夫人与对斯拉夫种族有多么强烈的渗入世世代代的血液中的蔑视！他们视斯拉夫人、斯拉夫种族如同猪狗！一个不留地屠宰所有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整个种族，都被认为是可能的和明智的。还请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这话不是贝肯斯菲尔德伯爵说的，虽然贝肯斯菲尔德伯爵能够讲出这种强盗的和兽性的观点，因为他受到政治和“英国利益”的驱使。而福尔别斯却是个人身份，不是身负公务的人，无论如何，也无论有什么必要，都没有要求他维护英国的利益，何况从他自己过去写的东西看，他还是一个正直的、有才干的、公正的和有人道精神的人。西欧对于一切冠有斯拉夫民族名称的事物心怀憎恶，就是他讲那些话的原因，原因就在这里。对保加利亚人可以用沸腾的水去烫，就像烫老太婆木板床缝里的臭虫窝那样！这里是否确有某种本能，某种预感在起作用呢？是否预感到所有这些东方的斯拉夫族一旦得到解放，总有那么一天定将在新的未来的人类中担当起重要角色，取代背离了正路的旧式文明，占据它的位置？当然，西方的人们现

在不会自觉地想到这种情况，他们也不能允许某种更高的和未来的东西取代他们，正如他们不能想到臭虫窝一样。但是这里有一个俄罗斯，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它使所有的人感到诱惑、愤怒和惊奇，这里已经出现了一面未来的旗帜。由于俄罗斯不是他们看做“臭虫窝”的保加利亚人，而是巨人和力量，不承认它是不可能的，又由于俄罗斯也是斯拉夫民族，所以这些西方人现在大概在自己的心目中甚至本能地、不由自主地强烈憎恨俄罗斯，对俄罗斯的一切失败和一切灾难都幸灾乐祸！这里正是一种本能，这里就是对未来的预感……

早就想说的有关斯拉夫人的一句完全特别的话

(《作家日记》，1877 年，11 月号，第 2 章，Ⅲ)

顺便说一说关于斯拉夫人和斯拉夫问题的特别的话，这是我早就想说的话。恰恰是目前这个时期，我们这里的人们忽然都议论起很快就要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来了，因此，也就是议论斯拉夫问题很快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的可能性。那就让我们来随意地想象一番吧。我们忽然这样设想，全部问题都解决了，由于俄罗斯的坚持和俄罗斯人的鲜血，斯拉夫人已经获得了解放。不仅如此，土耳其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巴尔干半岛自由了，过上了新的生活。显然，还很难详尽地预言斯拉夫各民族的这种自由，即便是在初期，将以什么形式出现，也就是说，这是否将是各个被解放了的小部族之间的某种形式的联邦(注意，似乎很长很长的时期里还不会有联邦)，或者是以一些小国形式出现的一些幅员不大的单独领地及其由拥有世袭统治权的家族出任的国君？同样不可想象的是，塞尔维亚的边界最后是要扩展呢，或者是奥地利将要阻止它扩展，保加利亚将要在多大的版图上出现，黑塞哥维纳和波斯尼亚将会是什么样子，罗马尼亚人或者希腊人，包括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和另外那些雅典的希腊人，还有新获解放的斯拉夫各民族的关系将会是什么样的？最后还有，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土是完全独立的，还是将处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列强协约国”的庇护和监管之下？(我认为，这些民族自己一定全都要为自己争得欧洲协约国的庇护，哪怕把俄罗斯也包括在内，但这样全是为了保护他们摆脱颐指气使的俄罗斯。)不过对这一切不可能事

先就做出确切的判断，我也不想做这种判断。但有两件事现在大概是能够知道的：1）或迟或早，巴尔干半岛的全体斯拉夫民族到头来一定会从土耳其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过上新的、自由的，可能是独立的生活；2）……正是这第二件大概确切无疑是要实现的，一定能实现的事，是我早就想说的话。

确切地说，这第二件事就是，凭我的内心的信念，凭我的最完整、最坚定的信念说，我认为，俄罗斯将来不会再有、过去也从没有过这样的仇视者、忌妒者、诽谤者，甚至是公然的敌人，这就是所有这些斯拉夫民族，只要俄罗斯把他们一解放，欧洲一承认他们是解放了的人民，就会这样！请不要反驳我，不要同我争论，不要冲着我大喊大叫，说我过于夸大其词，说我是憎恨斯拉夫各民族的！恰恰相反，我是非常热爱斯拉夫民族的，但是，我不想为自己辩护，因为我知道，一切都将确切地像我说的那样实现，而这并不是由于斯拉夫人具有卑下的、似乎是知恩不报的性格，完全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斯拉夫民族的性格同所有的人一样，这完全是因为，这种事情在全世界都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不想多加发挥，但是我知道，我们根本不必要求各斯拉夫民族的感谢，对此我们要早有准备。从获得解放的那一天起他们就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要重申一遍，就是从这一天起他们就将要求欧洲、英国和德国，比如说，为他们的自由提供保证和保护，即使俄罗斯也参与欧洲列强的这台大合唱，但是他们就是要防备俄罗斯，他们是能够达到目的的。他们即使不是公开地大声把话说出来，那么也是在内心里告诫自己，使自己坚定地相信，他们无须向俄罗斯表示任何感谢。与此相反，在欧洲各国的干预下缔结的和约使他们好不容易地挣脱了俄罗斯的野心，如果不是欧洲的干预，俄罗斯把他们从土耳其人的手中夺出之后立刻就会把他们

吞噬下去。“这里指的是扩展边界以及在贪婪、狡猾和野蛮的俄罗斯人奴役斯拉夫各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伟大的泛斯拉夫帝国。”他们还将在很长，嗯，很长的时期里不会承认俄罗斯的无私，不会承认俄罗斯举起了伟大思想旗帜这一高尚的、神圣的和世界上还从未有过的行为，这个伟大思想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思想，离开这种思想，如果在人类里面失去这种思想，人类就将由于痈疽和无力而僵化，而致残，以致渐渐灭亡。现在各族斯拉夫人终于理解了这场战争吗？就是说，理解了现在这场以沙皇为首的全体俄罗斯人民为解放饱受苦难的人民起而反对暴徒的全民战争吗？您是怎样看的呢？不过，关于目前这个时刻我不想说什么，再说，现在斯拉夫人还需要我们，我们正在解救他们，然而等到以后，等到我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他们多少站稳了脚跟的时候，那时他们会承认这场为了解放他们而进行的战争是丰功伟绩吗？这一点请您来判断一下吧。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的！相反，他们视为政治真理，然后还奉为科学真理的是，在这整整一百年当中假如没有俄罗斯这位救星，他们自己很早以前就凭借自己的英勇或者欧洲的帮助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话又说回来，假如在世界上没有俄罗斯，欧洲对他们的解放不仅不持任何疑义，而且欧洲自己就会解放他们呢。大概现在在斯拉夫人那里已经出现了这种狡猾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他们那里今后必定发展成为科学的和政治的公理。不仅如此，他们谈论土耳其人时的那种毕恭毕敬的心情胜过谈论俄罗斯。可能，在今后整整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期里，他们将时时刻刻为自己的自由而胆战心惊，惧怕俄罗斯的统治野心；他们将极力取悦欧洲各国，诽谤俄罗斯，搬弄是非，制造阴谋反对俄罗斯。噢，我的话不是针对少数人说的。有一些人明白，对他们来说俄罗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

也就是说自始至终都具有什么意义。他们明白俄罗斯的事业以及俄罗斯在人类社会中作为旗帜树立起来的伟大思想的全部宏伟与神圣，但是这种人少得可怜，特别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要遭受嘲讽、憎恨，甚至是政治迫害。对于已经得到解放的斯拉夫人来说，最得意的就是诉说，并且向全世界宣扬他们是有教养的，能够接受欧洲最高文化成就的，而俄罗斯则是野蛮的国度，是阴森的北方庞然大物，甚至不是纯斯拉夫的血统，是迫害、仇恨欧洲文明的国度。当然，在他们那里从一开始就会有立宪机构、议会、总理、演说家和演讲，这将使他们得到极大的安慰和喜悦。他们在读到巴黎和伦敦的报纸关于他们的电讯时，简直陶醉在喜悦之中，电讯向全世界宣布说，经过长时间的议会争论之后，保加利亚的政府终于倒台了，自由派的多数组成了新政府，他们的一位伊万·契弗特利克最终同意接受内阁总理的职务。俄罗斯必须严肃认真地对下述情况做好准备：获得解放的全部斯拉夫人都如醉如痴地扑向欧洲，对欧洲模式、政治的和社会的模式迷恋到了丧失自身个性的地步，因此，他们首先要经历整整一个很长的欧洲化的阶段才能对自己的斯拉夫的意义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特殊的斯拉夫使命多少有一些理解。这些国家相互之间将要不停地争吵，不停地你妒忌我，我妒忌你，不停地彼此攻讦。毫无疑问，一旦发生什么大灾大难，他们肯定全都向俄罗斯求援。无论他们为讨好欧洲，为向欧洲表白爱情，怎样地敌视、中伤和诽谤俄罗斯，他们时时都会本能地感觉到（当然是在不幸降临的时刻，而不是在此之前），对他们的团结统一来说，欧洲过去是、永远都是他们的天然的敌人，而他们之所以还能生存在世界之上，那是因为存在着一块巨大的磁石——俄罗斯，俄罗斯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们吸引到自己一边，从而保证了他们的完整和团结

统一。甚至会有一天，他们还可能几乎近于自觉地承认，假如没有俄罗斯这个伟大的东方中心及其强大的引力，他们的团结统一眨眼之间就会土崩瓦解，分崩离析，甚至他们的民族本身都会丧身在欧洲的大洋里，如同几个水滴消失在汪洋大海之中。俄罗斯该当长期地忧虑不安，为使他们和解而操心，开导他们，甚至可能在必要时拔刀相助。在这里，理所当然地立刻就提出一个问题：俄罗斯从这里面得到了什么好处？俄罗斯为他们搏斗了一百年，流血牺牲，耗费国力和钱财，这都是为了什么？莫非就是为了博取那么渺小、可笑的憎恨和忘恩负义吗？噢，当然，俄罗斯总是时时刻刻都意识到，她就是斯拉夫团结统一的核心，如果说斯拉夫人都在过着自由的本民族的生活，那就是因为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希望这样，是她创造了这一切。但是，除开操劳、遗憾和永无穷尽的牵挂之外，这种意识还能给俄罗斯带来什么益处呢？

现在很难回答清楚这个问题，也不可能看清楚。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没有、永远也不应该有扩张自己疆土的思想，以及在政治上把他们同自己合并到一起，把他们的土地变为自己的省份，等等。所有斯拉夫民族现在如同整个欧洲一样，都在怀疑俄罗斯有这种意图，他们还要这样怀疑一百年。但是俄罗斯千万不要有这种意图，俄罗斯对斯拉夫民族在政治上的无私表现越是充分，在今后，经过若干年代，经过百年，就越有可能把他们团结到自己的周围。与扩展疆土的意图相反，从一开始就给他们尽可能多的政治自由，不对他们进行任何监护和监视，只是向他们宣布，俄罗斯将随时打击那些侵犯他们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人们。这样，俄罗斯就使自己从用武力维持监护、维持自己对斯拉夫人的政治影响这类可怕的关怀和麻烦中解脱出来，而监护和政治影响当然是斯

拉夫人所憎恶的，也是时时会引起欧洲猜忌的。但是，俄罗斯在显示出彻底的无私之后，它就能取胜，就能最终把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一方来；最初斯拉夫人是因为遇到灾难才向俄罗斯求援，等到以后的某个时候，他们都将聚集到俄罗斯的周围，与俄罗斯亲密起来，这已经是无保留的、童稚般的信任。全都要回到老巢。噢，当然，现在很多俄罗斯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学术见解，甚至还有理想的见解。这些俄罗斯人期待的是，刚获得解放的和重新走上新生活的斯拉夫各民族一开始就能这样生活，就是说，他们像投向亲生母亲和救星那样扑向俄罗斯的怀抱，并且，毫无疑问，在最短的时间里就给俄罗斯生活带来很多新的、从未有过的因素，开阔俄罗斯的斯拉夫精神和俄罗斯的灵魂，甚至对俄罗斯语言、文学和创作产生影响，使俄罗斯在精神上更加丰富起来，向俄罗斯指明新的前景。我承认，我总是感到，这全是我们的学者的向往；的确，类似的事情当然是会发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会早于一百年，比如说，可能还要整整一个世纪，无论从思想中，还是从文学中，俄罗斯从斯拉夫人那里都毫无东西可取，他们还全都远远没有成长到能够教导我们的程度。相反，有可能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俄罗斯都不得不与斯拉夫民族的狭隘性和顽固不化进行斗争，同他们的恶习进行斗争，同他们对斯拉夫民族的背叛行为进行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贪婪地追求欧洲模式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他们的背叛是必然的，而且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显然，在解决了斯拉夫问题之后，俄罗斯面临的任务是彻底解决东方问题。当今的斯拉夫各民族将在很长的时期里不能理解东方问题是怎么回事！就连斯拉夫的友爱、和谐和团结一致，他们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不间断地以事实和伟大的范例向他们说明这一切，这是俄罗斯今后的长期任务。人们又会发

问：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俄罗斯自己要把这种操心事肩负起来，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了建设高尚的生活、伟大的生活，以伟大、无私、纯洁的思想普照全世界，实现，归根结底是创造各民族的宏伟强大的友爱联合的机体，不是以暴力；不是以刀剑，而是以信念，以榜样，以爱，以大公无私和光明创造这个机体；最终把所有的弱小者提高到自己的水平，提高到使他们能够理解俄罗斯的慈母般的使命的程度，这就是俄罗斯的目的，这就是俄罗斯的利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各民族的生活如果没有高尚无私的思想，没有为全人类服务的崇高目的，只服务于一己的“利益”，那么这些民族无疑一定要灭亡，要僵化、衰落，渐渐死亡。俄罗斯无私地为斯拉夫各民族服务，并不要求他们的报答，为使他们在道德上（而不只是在政治上）团结成为一个伟大的整体而服务，比俄罗斯为自己制定的这些目的更高尚的目的是没有的。只有到那个时候全体斯拉夫人才能向全人类说出自己的新的济世良言……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目的比这种目的更高尚了。可见，对俄罗斯来说，不可能有比这些目的“更有利的了”，就是说，要经常保持这些目的，使自己对这些目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并且在为了全人类而进行的这种永恒的、坚持不懈的和豪迈的事业中，使自己在精神上变得越来越高尚。

只要目前这场战争的结局圆满，俄罗斯无疑就会进入自己存在的一个新的最高的阶段……

关于和平的议论。“君士坦丁堡应该属于我们”——这有可能吗？说法不一

（《作家日记》，1877年，11月号，第3章，Ⅰ）

人们忽然都谈论起战争的结局来了，不仅是在欧洲，在我们这里也是如此，人们全都在就和平的可能条件进行辩论。令人愉快的是，我们大多数的政治性报纸现在也都或多或少地、但却正确地评价俄罗斯所费的周折，所流的血和所付出的努力，并且尽可能设想与这些付出相称的和平条件。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议论的人都考虑到在缔结和约时必然面临的欧洲各国的干涉，开始承认俄罗斯的独立性，如果可能的话，承认俄罗斯自己单独媾和的权利，不邀请欧洲参加，甚至不理睬欧洲。斯拉夫各民族的命运也受到注意。人们都在谈论赔偿问题，强烈要求得到土耳其的铁甲战舰。很多人都表示完全支持兼并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①]，支持我们把这些地区划归自己的权利。

有一些人，他们至今还对我们敢于设想合并诸如卡尔斯的一些地区深为不满。与此相反，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竟然议论起君士坦丁堡来了，更不消说卡尔斯了，他们认为君士坦丁堡应该属于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之后，这些关于和约与和约条件的种种说法和议论都还会不断地反复出现。我只想指出，在我们现在各种（或者几乎是各种）机构的所有议论中似乎潜在着某种疏漏，但还不能算是过失。这种疏漏恰

---

① 土耳其东北部城市。

恰就是，人们都认为欧洲……欧洲嘛，就是这样一个欧洲，就是那个在整整一百年里曾以各种变态出现的欧洲，这就是说，人们依然是着眼于那些大国，依然是着眼于那种政治均势，等等。其实，欧洲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变得不是那个欧洲，甚至不是半年以前的那个欧洲，现在甚至不可能预言三个月以后欧洲会是什么样子，明年春天它从前的面目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当前一些巨大的至关重要的迫切事件，就是那些应该明确提出并且要求得到解决的事件，可能很快就会受到注意，但又似乎还不是以它们在和平之前应该呈现出来的那种规模上受到注意，在媾和的时候可能干涉我们的事情的那个欧洲，成员会包括谁，现在甚至还都无法准确无误地做出判断。从前的全部情况都在变动、变化的过程中，都在消失，它们自身也在等待新的判定，因此，不充分估计这些情况，只根据过去的情况谈论和平条件，我认为是错误的……不过，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吧。现在既然已经提出了君士坦丁堡问题，我就想顺便指出，关于君士坦丁堡最近的“命运”，有种非常奇怪的、几乎是出人意外的见解。发表这个见解的是这样一个人，根据现在已经发生的和肯定将会发生的事件，他本来是可以由此得出完全另外一种见解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①] 一年前写过一部精彩的书《俄国与欧洲》，在这部书中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未来命运只写了含混不清的、没有坚定主张的一章，不久之前，关于同一个问题，他又在《俄罗斯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最后结论是非常离奇的。

---

①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俄国政论家、社会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家。在《俄国与欧洲》（1869）一书中提出一种像生物机体那样发展的各自独立的“文化历史类型”的理论，认为“斯拉夫”类型是崭新的类型。

不过，在这里我不想详细地分析他的结论。

在驱逐了土耳其人之后，君士坦丁堡绝不应该像从前的克拉科夫[①] 那样成为一座自由城市，如果它不想冒险成为各种卑鄙勾当、各种尔虞我诈的活动的巢穴，不想成为全世界的形形色色的阴谋家的避风港，不想成为犹太人、投机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的猎物的话。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在讲了这些精彩的正确论断之后，就断言说，有那么一天，君士坦丁堡应该成为东方所有各个民族共有的城市。所有的民族将与俄罗斯一起在平等的基础上占有这座城市，俄罗斯人也将允许他们在与各斯拉夫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占有君士坦丁堡。我认为这样的解决办法是令人吃惊的。在俄罗斯人与各斯拉夫民族之间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的？谁能在他们之间确立平等的地位？如果俄罗斯同他们，无论是单就每一个民族来说，还是把所有他们这些民族合在一起来说，在各个方面都是不相等的，那么俄罗斯怎么能够与各斯拉夫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占有君士坦丁堡呢？巨人格利佛[②] 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使侏儒们相信，他和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但这岂不是太荒唐了。为什么要故意讲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荒唐话呢？君士坦丁堡应该是我们的，是我们、俄罗斯人从土耳其人的手里夺取来的，应该世世代代属于我们。君士坦丁堡应该属于我们，没有第二者，而我们在据有它之后，当然可以允许所有的斯拉夫人以及我们愿意允许的人进入君士坦丁堡，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但这已经不是俄罗斯与各斯拉夫民

① 波兰城市。

② 指英国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的著名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1726）的叙事主人公船长格利佛。

族共同占有的联邦城市。要想使各斯拉夫民族彼此结为联邦，再过一个世纪您也办不到。俄罗斯将来只占据君士坦丁堡和它周围必要的地区，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①]和其他海湾，在君士坦丁堡驻扎军队和舰队，修筑工事，大概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啊，很多人要抓住这句话大喊大叫起来："原来俄罗斯为斯拉夫的事业效力，看来，并非那样无私！"这种话是很容易回答的，那就是，现在俄罗斯还没有完成为斯拉夫各民族的效力，还将效力几个世纪，只有仰仗俄罗斯和俄罗斯这个伟大的中心，斯拉夫各民族才能生存在世界之上；这种效力是任何时候，任何东西都报答不了的，如果俄罗斯占有了君士坦丁堡，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俄罗斯，在它的任务和它的使命里面，除开斯拉夫问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对她来说是最伟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东方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在君士坦丁堡才能解决。各民族联合占有君士坦丁堡甚至能够扼杀东方问题的解决，与此相反，时机一到，必须坚决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东方问题与俄罗斯自身的命运，与俄罗斯的使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唯有俄罗斯才能使它得到解决。所有在君士坦丁堡的各个民族只能是为了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为了据有君士坦丁堡而争吵不休，关于这个方面我就不说了。希腊人将要调唆离间他们，西方的各斯拉夫民族也将要妒忌他们占据了欧洲和整个地球上那样一个雄伟的据点……总之，到那个时候君士坦丁堡只能成为导致整个斯拉夫和东方世界不和的祸根，阻碍斯拉夫民族的团结，中断他们正常生活的进程。出路就是，俄罗斯为了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占有君士坦丁堡。那时，俄罗斯可以告诉东方各民

① 位于欧亚两洲之间，连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

族，俄罗斯之所以把君士坦丁堡据为己有，因为“无论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民族，还是他们各民族联合在一起，都还没有成长到可以占有君士坦丁堡的地步，而她，俄罗斯则达到了这一步”，确实达到了。就是现在，俄罗斯生活的这个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君士坦丁堡是东方世界的中心，而东方世界的精神中心和首脑就是俄罗斯。鉴于俄罗斯和整个欧洲命运的变化，仅就眼前的、近在“咫尺”的变化，现在，在一段时间里，暂时忘却彼得堡，置身于东方，这对俄罗斯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不过，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共同占有君士坦丁堡的种种不利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危害，特别是对斯拉夫各民族的危害，我们只想，即便是只用几句话来谈谈在那种情况下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和东正教的命运。

希腊人将心怀妒忌地看待君士坦丁堡的新的斯拉夫本原，对斯拉夫人的憎恨和恐惧甚至超过从前对穆斯林的憎恨和恐惧。保加利亚人同大牧首教区不久之前发生的争论可以视为这种情况在未来的一个例子。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主持者可能堕落到耍阴谋，进行卑鄙的诅咒、革除、不正当的集会，等等，还可能堕落为异端，造成这一切的都是由于民族的原因，由于民族的屈辱和义愤。“所有的希腊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斯拉夫人凭什么高过我们，凭什么承认他们对君士坦丁堡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利，虽说是与我们共同享有这种权利？”现在立即就可以看到，俄罗斯如果占有君士坦丁堡，由于它的力量和显而易见的崇高威望，几乎就可以排除提出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即使是希腊人也不可能那样忌妒它，也不可能对它占有君士坦丁堡心怀不满，这就是因为俄罗斯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力量，是东方各民族命运的无可争辩的主宰者。俄罗斯一旦掌握了君士坦丁堡，它就必将保卫全体斯拉夫人的自由，与斯拉夫人不分彼

此地保卫所有东方民族的自由。穆斯林的统治在所有这些世纪里，对这些民族来说不是团结的力量，而是镇压的力量，他们在穆斯林的统治下一举一动都胆战心惊，也就是说，活得根本不像人。消灭穆斯林的统治之后，在这些突然从被压迫状态一跃而进入自由境界的民族里面可能出现极大的混乱。所以说，在他们之间不仅是正常的联邦，就是通常的和谐一致，毫无疑问，都不过是未来的憧憬。现在，俄罗斯将要成为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新的力量，部分原因就是俄罗斯要坚定地留在君士坦丁堡。俄罗斯使他们免于彼此倾轧，就是为了保卫他们的自由。俄罗斯还要保卫整个东方和东方即将出现的秩序。最后，还是俄罗斯，也唯有她才有力量在东方举起新思想的旗帜，并向整个东方世界阐明东方世界的新的使命。原因就在于，什么是东方问题？东方问题实质上就是解决东正教的命运。东正教的命运是与俄罗斯的使命熔铸为一体的，那么东正教的命运又是怎样一回事呢？罗马的天主教为了取得在人间的统治，早就把基督出卖了，迫使人类离开了自己，罗马的天主教就是这样成为欧洲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天主教在欧洲自然也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解决人类的命运，但已不是按照基督的精神，而是抛开上帝，抛开基督，随着基督教原则在天主教教会里被扭曲与丧失的程度，社会主义自然应该出现在欧洲，取代在欧洲已经衰落的基督教的原则。被遗弃的基督在东正教里保留了自己纯洁形象的全部光辉。从东方响起了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对的新的声音，或许这种声音能够再次拯救欧洲的人类。这就是东方的使命，对俄罗斯来说，这也就是东方问题的实质所在。我知道，很多人要说这种论调是“狂言”，但是尼·雅·丹尼列夫斯基能够充分理解我的这番话。为了完成这种使命俄罗斯需要君士坦丁堡，因

为它是东方世界的中心。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并以自己的沙皇为首的俄罗斯已经意识到，只有自己才是基督思想的体现者，东正教的学说在俄罗斯正在变成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已经与现在这场战争一起开始了，而今后，在俄罗斯的面前还有一段很长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它还要付出心血，付出自我牺牲，要培植各民族的兄弟情谊，对各民族，如同对亲生儿女一样给予它们热烈的母亲般的关怀。

是的，这种伟大的基督教事业，基督教和东正教的这种新的事业已经开始了，就是从现在这场战争并从现在这场战争的事件开始的，可是，对此，尼·雅·丹尼列夫斯基仍然不相信……看来，不相信的原因是，认为目前任何人都还不配占有君士坦丁堡，即使是俄罗斯，也不配。是否因为俄罗斯人还没有成熟到占有君士坦丁堡的程度呢，很难理解。很清楚，要使东方所有大大小小的民族和谐地以平等的权利占有君士坦丁堡是很困难的。然而文章的作者不也是有这样的设想吗？就是俄罗斯暂时可以单独占据君士坦丁堡，也就是说，这是为了保卫君士坦丁堡，而不是贸然占领它，目的是等到以后把它转交给各民族共同占有。（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转交？）看来，尼·雅·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单独占据君士坦丁堡对俄罗斯本身来说是有诱惑力的，可以说，是有腐蚀作用的，这将唤醒俄罗斯的恶劣的掠夺本性，等等。不过，现在似乎终于到了应该相信俄罗斯的时候了，特别是在现在这场战争中建树了丰功伟绩之后。俄罗斯已经成熟了，成熟到了甚至可以独自占有君士坦丁堡……

可是，突然间，作者就连暂时把君士坦丁堡托付给俄罗斯也不敢了。请想想看，他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吧。他的结论是，暂时必须延长土耳其的存在期限（在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救了

所有的斯拉夫人、巴尔干人等等之后），把君士坦丁堡暂且仍然置于土耳其的势力之下，这似乎是现时对俄罗斯最有利的解决办法，这几乎是上帝的旨意。不过，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显然，关于土耳其的这种新的存在，作者是以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巨大影响，也可以说，土耳其对俄罗斯的依附为前提的。但是，为什么需要这种伪装呢？请想想看，统治者是俄罗斯，可是暂时还得把土耳其安置在那里。我们要指出，欧洲宁愿让土耳其最终占领君士坦丁堡，也不会赞同那种谋划，因为选择一件已经完结的事件，总比选择还要引起争议的、继续进行着的、在最近的将来还要以新的战争相威胁的事件要好。这样一来，作者在最后就几乎与贝肯斯菲尔德勋爵的政治见解不谋而合了，这就等于说，土耳其的存在是必要的，土耳其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说："土耳其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影子，但是这个影子在一定的时期里还应该（?）遮蔽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因为用充满生机的，不仅仅是充满生机的，而且还是健康的机体来取代土耳其，目前还是不可能的（!?）……"

这不是在说俄罗斯还不是健康的，甚至还不是充满生机的机体，俄罗斯这个机体在东正教的都城里还不敢取代土耳其这具腐尸吗？对我来说，这是惊人的见解。（这还是在取得了当前这场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之后!）我确实有些不理解，作者是否以为不可能让俄罗斯进入君士坦丁堡（为了单独占有君士坦丁堡，或者是为了以后把它移交给各族人民），就是因为欧洲不同意放俄罗斯进去。可能，作者不相信俄罗斯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有力量取得那种最终的结局。他在自己文章的一处就谈到："俄罗斯人如占领君士坦丁堡将要遇到欧洲大多数强国的

坚决抵抗。”如果是这样，他那关于必须暂时把土耳其留在君士坦丁堡的结论就容易理解了。尽管如此，关于“大多数欧洲强国的抵抗”还有两点可以指出：1）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可能，欧洲更愿意在我们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上，而不是在丹尼列夫斯基先生所提议的办法中找到和解的出路，丹尼列夫斯基先生提议的就是土耳其，被剥夺了个性的、在俄罗斯的全面监护下的、没有巴尔干人和没有斯拉夫人的土耳其，没有舰队的、要塞被夷为平地的土耳其，总之，正如作者所说的，是从前的土耳其的“影子”。显然，“欧洲大多数强国”所希望的并不是这样的土耳其，假如仅仅把一个“土耳其的影子”留在世上，这是欺骗不了欧洲强国的，欧洲强国会对俄罗斯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迟早你们是要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因此，对它来说，彻底解决问题，比只是影子的土耳其肯定是更为可取的。2）可以说，这就是由于欧洲本身此时的政治形势，可能，对我们来说，确实从来也未曾有过（也不能再有）像现在这样的对占领君士坦丁堡有利的时机，时机就是这次战争，就是当前的时刻，或者说与当前时刻极其近似的时刻。

又是最后一次“预言”

（《作家日记》，1877年，11月号，第3章，Ⅱ）

您总是说“欧洲大多数强国”不允许，然而，现在“欧洲大多数强国”指的是谁？现在这是能够确切说清楚的吗？我再重复一遍前面说过的话：欧洲时时都在变，已经不是不久以前的那个欧洲，可能，与半年以前的那个欧洲也不同了，现在甚至不能断定再经过三个月它会是什么样子，也不能断言它不再继续变化。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正处于欧洲自身发生最巨大的和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变革的前夜，这样说是毫不夸大的。在当前时刻，在现在，就在11月，这个“欧洲大多数强国”，在签订和约时能够在某个问题上对我们讲出自己的威严的veto[①]的国家只能是英国，连奥地利都不一定，虽然英国千方百计地想要与奥地利联合，英国还希望与法国联合。而我们则不是只有自己（这一点现在已很明显），在欧洲还有德国，这个德国也是站在我们一方的。

是的，欧洲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革，人们的理智拒不相信这些变革，把这些变革的实现看成为什么幻觉之类的事情。然而有很多事情在今年夏季还被看做是空想，是不可能的和夸大的，到了年终在欧洲就全部变为现实了。又比如，关于天主教的世界阴谋势力，在夏季这还是受到嘲笑的见解呢，至少是受到蔑视的见解，现在则为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成为被事实证明了的见解。我重提此事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读者相信我们现

① 英文：否决。

在的“预言”，不要认为这全都是杜撰的、夸大的画面，大体上就像今年5—8月份看待我们夏季的很多预言那样，其实，那些预言全都丝毫不差地实现了。

在欧洲，以自己睿智的目光洞察事情的最深本质的人，毫无疑问，这就是俾斯麦公爵。很早以前他就看到，德国、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未来复兴的最可怕的敌人就是罗马天主教和天主教所孕育的庞大怪物——社会主义（德国将被社会主义吞噬掉）。俾斯麦必须在选举新教皇之际摧毁天主教。是啊，他明白，他不可能彻底摧毁天主教，他只能把天主教置于斗争的某种新阶段上。然而，只要法国还存在，对天主教来说，斗争的旧的阶段就依然会继续下去。只要法国还存在，天主教手中就有一把利剑，就可以寄希望于欧洲的联合。至于法国，在俾斯麦公爵的眼里，这是一个命运已经注定了的国家，对公爵来说，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法国和德国只能是你死我活。因为法国一垮台，天主教和社会主义就将一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欧洲的政治家们在关注着麦克马洪与共和党人进行的没有尽头的斗争的同时，都衷心盼望共和党人获胜，因为他们都还承认并且相信，共和国在法国是人民的和能够使法国团结起来的政府。俾斯麦公爵这时十分清楚，法国的生命已经终结了，这个民族的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了，自己永远彻底毁灭了自己，在法国再也不可能有坚强的、团结一切人的有权威的政权，不可能有健康的、民族的和把一切人团结起来的中心。虽然法国的衰落只有利于德国，但是俾斯麦公爵依然认为，我还要重申一遍，只要法国还存在，罗马天主教在政治上也就一直存在到今天，手中也就还在握着出鞘的剑。不仅如此，天主教也许还能够再一次暂时成为这个崩溃了的国家起团结作用的思想，尽管这是在外交上起的作用。因为要使法国，就算是以共

和党为首的法国或迟或早不为教皇和天主教的命运挺身而出，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共和党人，自己也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如果抛弃了教皇和天主教，那他们自身的生存在法国就成为不可能的事。的确，他们自己直到自己的末日还理解不了这一点，于是他们以及那些自以为有力量再度把法国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政党，直到最后都将是俾斯麦公爵的宠臣（受庇护者），但是，俾斯麦公爵在内心里还是判了他们的死刑。他们不仅是俾斯麦公爵的宠臣，他们还将是德国的奴隶，他们把整个法国都奉献给德国，不仅遭受政治上的，而且遭受内在的、实质的和精神上的奴役，因为，他们使法国丧失了它政治思想和历史思想中最具独立性的思想，拔掉了作为欧洲人类罗曼语族[①] 的代表高举了多少世纪的旗帜。而那些因此才把无能的和无益的共和党人赶下台的人们必然打定主意要做最后一次努力，把反对德国天主教的旗帜树立起来（对此，俾斯麦是知道的），我再重说一次，这是法国自己也已不相信的，法国自己差不多全都否定的旗帜，但在反对新教德国的殊死的进攻（也是最后一次）中，这面旗帜还可以在政治上成为法国抵抗和联合的最后一根支柱，这个新教德国始终都在反对整整半个欧洲人类的西欧的、承袭自古代罗马的原则。

因此，俾斯麦很可能事先就已决定了法国的命运。波兰的命运在等待着法国，从政治上说，法国也不能再生存下去，或许德国也将不复存在。这个目的达到之后，那时俾斯麦就要迫

---

① 印欧语系中仅次于日耳曼语族的第二大语族，其语言主要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部分地区、罗马尼亚、加拿大东南部、中美和南美各国。此处说的是法国，历来是欧洲罗曼语族各国的代表。按：罗曼语族又称拉丁语族，拉丁语曾是古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

使战斗着的罗马天主教（它将一直战斗到世界的终结）步入生存和为生存而斗争的新阶段，步入隐蔽的、曲意逢迎的和阴谋战争的阶段。他就在期待着这个新阶段上的罗马天主教，期待实现得愈快，对他就愈好，因为他这时期待的已经是德国的，同时也是人类的两个敌人的结合，希望这样更容易把敌人击溃，一举击溃……

必须抓住时机

(《作家日记》，1877 年，11 月号，第 3 章，Ⅲ)

只要法国在政治上衰败了，两个敌人无疑就会联合，这两个敌人与法国一向保持紧密的联系，天主教直到最近还是法国的起团结作用的和主要的思想，社会主义就诞生于这种思想之中。俾斯麦公爵剥夺了法国的政治生命，想借此打击社会主义。真正的德国人比任何人都憎恨作为天主教和法国遗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代表人物认为对付社会主义是很容易的，只要从政治上把作为它的根源和基础的法国消灭掉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是可以谅解的。法国如果在政治上衰亡了，大概就要出现这种情况，即天主教失掉自己的剑，就要像从未有过的那样求助于人民，这是天主教为了谄媚人间的国王和皇帝而蔑视了若干个世纪的人民。但现在天主教不得不求助于人民，因为它已经走投无路，它求助的正是人民中那些最活跃的、最容易受煽动的人的首领，即社会主义者。它向人民说，[①] 凡是社会主义向人民所宣讲的一切都是基督曾经宣讲过的。天主教又一次歪曲基督，在人民面前出卖了基督，就像它从前历次出卖基督那样，那时它为了树立在人间的统治权而捍卫宗教裁判所的权利，宗教裁判所折磨的是为了仁慈的基督而保持良心自由的人们，那个基督珍视的只是自由地投向他的弟子们，而不是被收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表述的思想后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赞成与反对”、“宗教大法官”两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1876 年 3 月号的《作家日记》中也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买或者因恐惧而走向他的人。天主教为耶稣会士祝福，称赞“为了耶稣事业的一切手段”① 都是正当的，从而出卖了基督。它向来就认为，全部基督的事业仅仅就是追求天主教在世间的统治，追求掌握全世界的未来国家。在天主教的人们脱离了人们最后向他们描述的那个基督的骇人听闻的形象之后，经过了多少个世纪的新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等等事件，到了本世纪的最初年代，终于出现了抛开上帝、抛开基督解决问题的尝试。人们虽然没有蜜蜂和蚂蚁那种精确无误地营造蜂房和蚁穴的本能，却动起了想要建造某种类似的精确无误的人类蚁穴的念头。他们推翻了来自上帝的和由上帝的启示向人们宣示的拯救人类的唯一的公式，“要爱人如己”② 被“Chacun pour soi et Dieu pour tous”③ 这类实用的结论取而代之，或者是以“生存竞争”这类科学公理取而代之。由于不具备赖以生存并正确无误地建造自己生活的动物本能，人们傲慢地寄希望于科学，同时忘却了，在建造社会这种事情上，科学还如同处在襁褓之中。于是出现幻想，未来的巴比伦塔成了理想，从另一方面说，它又成了令全人类恐怖的东西。但是在幻想之后，很快又出现了另外一些学说，简单的人人都理解的学说，诸如“剥夺富有者，血洗全世界，然后，一切就都自然而然地重新建立起

① 耶稣会士的口号是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是在中篇小说《化身》中提到耶稣会的这个口号的。此后，凡在文学作品与政论中提到这个口号时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② 引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9 章、第 22 章。人类蚁穴，如同巴比伦塔，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期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象征。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思想、哲学主题的章节中，人类蚁穴这一象征具有深刻寓意。

③ 法文：“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来。”最后，比这些教师更进一步，出现了无政府学说，假如无政府学说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在它之后，吃人的时期大概又将重新出现，人们又将像一万年以前那样一切都不得不从头开始。天主教对这一切了解得异常清楚，它也善于引诱隐蔽战争的首领们。它告诉他们：“你们没有中心，没有做事的一定之规，你们是被分散于全世界的力量，而现在，由于法国的衰落，你们又是受压制的力量。我可以使你们团结起来，我把还在相信我的一切人都吸引到你们这方面来。”无论用什么办法，联合总要弄成功。天主教不愿意灭亡，而社会革命和欧洲新的社会阶段也是毫无疑问要出现，因而两股势力无疑应该协调一致，两股力量应该融合到一起。不言而喻，斗殴、流血、掠夺，甚至是吃人对天主教都是有利的。这时它就可以寄希望于浑水摸鱼，因为它预感到时机已到，被混乱和无权所折磨的人们终于要投入它的怀抱，它就会再度成为，但这已经是完全地，真正地，不同他人分享而独自地成为“人间主宰和在当今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威”①，从而也就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唉，这幅画面可不是杜撰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西方有许多许多人已经看明白了这幅图画。大概德国的统治者们也看到了这幅图画，但是德国人民的领袖们则在一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就是把战胜并制服这两个可怕的而且已经联合起来的敌人看得太容易了。他们寄希望于复兴的德国的力量，寄希望于旨在反对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天主教的目的就是追求“人间的主宰和在当今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观点多次出现在他的政论和小说中。他在1876年《作家日记》的《一种垂死的力量和几种未来的力量》一文中对天主教的图谋作了详细阐述，后来，又把自己关于天主教的思考作为主要思想内容之一，写进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

古代和现代罗马及其原则与影响的新教的精神力量和德国的反抗精神的力量。但是，阻挡庞然大物的不是他们，阻挡并战胜这个怪物的是联合起来的东方和它要对人类表明的新的见解……

无论怎样说，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这就是，德国比我国想象的更需要我们。德国需要我们并不是为了暂时的政治联盟，而是永久的需要。联合起来的德国，这个思想是豪迈的，庄严的，是面向世世代代的思想。德国要与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德国的目标是整个西方的人类社会。它把欧洲的西部世界划归自己，它预计在那里实施自己的原则，用以取代罗马的和拉丁的[①] 原则，进而成为欧洲西部世界的领导者，它留给俄罗斯的则是东方。这样一来，两个伟大的人民就注定要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这并不是出自头脑的杜撰和虚荣心的谋划，世界本身就是这样构成的。有一些新的奇怪的事件，它们每一天都要出现。正当我们这里，差不多就在最近几天，还认为谈论和想象获得君士坦丁堡不过是一种空想，这时候在德国的报纸上很多人已把我们占领君士坦丁堡作为最平常的事件议论起来，这与德国从前对我们的态度相比几乎可以认为是奇怪的。应该说，俄罗斯和德国的友谊是真挚的，牢固的，由于这种友谊在两个民族的人民意识中逐渐传播开来，扎下根基，它将愈来愈巩固。所以，对于彻底解决东方问题来说，可能还从未出现过现在这种有利于俄罗斯的时机。在德国可能比我们还急于看到我们的战争的结局。实际上，现在的确不能保证三个月结束战争。在欧洲目前这场致命的动荡开始之前，我们能否结束

---

① 参阅本书上文《又是最后一次“预言”》（1877 年，11 月号，第 3 章，Ⅱ）注。

战争呢？这一切都难以预料。但是，我们无论来得及还是来不及帮助德国，在任何情况下德国都会把我们看成是永恒的盟友，而不是暂时的盟友。至于说到目前时刻，问题的关键仍然是法国和教皇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德国可能发生冲突，现在看来，冲突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何况这中间还有挑拨者。英国对这件事特别关心，到时候，可能连奥地利也要动起来。不过关于这一切我们不久之前刚刚谈过，从那时以来情况没有发生任何足以推翻我们从前的意见的变化，反倒是证实了……

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必须抓住时机，我们这种有利的欧洲时机能够持续很久吗？只要现在德国的伟大领袖们还在行动，对我们来说，这个时机就有最可靠的保证……

涅克拉索夫之死。
关于在他墓前的那次讲话

（《作家日记》，1877年，12月号，第2章，Ⅰ）

涅克拉索夫去世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死前一个月，当时看上去他差不多已经像是一具尸体了，所以，看到这样的尸体还在说话，嘴唇还在翕动，真是感到惊讶。然而，他不仅说话，而且还保持着完全清醒的头脑，看来他还不相信死亡逼近的可能。死前一个星期，他的右半侧身子瘫痪了，28日早晨我得知涅克拉索夫在昨天，也就是27日晚上八点钟去世了[①]。当天我就去向他告别，他那被痛苦折磨得极度疲惫的、被扭曲了的面孔显得特别惊人。离开的时候我看见，在死者的身旁诵经士拖长了调门清晰地念道："没有哪个人是没有罪过的。"回到家中后我就什么都做不下去了。我拿过涅克拉索夫的全部三卷集[②] 从第1页读起来，我读了一个通宵，直到早晨六点钟，我仿佛把这整整三十年又重新经历了一遍。他的诗集第1卷开头的四首诗是在《彼得堡文集》[③] 中发表的，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在这部文集上发表的。后来，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是按顺序读的），我的全部生活好像是又都在眼

---

① 涅克拉索夫逝世于1877年12月27日。

② 涅克拉索夫《诗集》，第6版，1～3卷，圣彼得堡：1873—1874年。

③ 《彼得堡文集》，圣彼得堡：1846年。涅克拉索夫的四首诗为：《在大路上》（1846）、《醉汉》（1845）、《高兴地看到……》（1845）和《摇篮曲》（184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为《穷人》，与涅克拉索夫的上述四首诗均发表于《彼得堡文集》。

前重新呈现出来。我认出来，也想起来在西伯利亚最初读过的他那些诗，那个时候，我在监牢里服完了四年刑罚，刚刚争取到读书的权利。我也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情景，简略地说，这一夜我差不多把涅克拉索夫所写的三分之二的诗又重读了一遍。我的确是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三十年的整个过程中，涅克拉索夫作为诗人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多么大的位置！当然，这里说的是作为诗人。我们私人的交往很少，偶尔有些来往，只有那么一次我们的会晤是在完全忘我的热烈感情中度过的，那是在我们相识的最初日子里，那是1845年，发表《穷人》的那个时期。不过，这件事我已经谈过了。那时在我们之间有过那样几次瞬间而永难忘的接触，在这样的时刻，这个揣摸不透的人把自己精神中最重要的，最隐秘的方面都呈现在了我的面前，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当时我立即感觉到，这是从生活一开始就受到过创伤的心灵，他这*永远也没有愈合的*创伤就是他后来一生中所写的热情洋溢的、充满悲痛的全部诗歌的基础和源泉。那时他眼中噙着泪水向我诉说了自己的童年，说到在父母家庭中所遭受的龌龊生活的折磨，说到自己的母亲。他谈自己的母亲时的那种神态，回忆母亲时的那种感人的力量，使我当时就产生一种预感：如果将来在他的生活中有什么神圣的东西，而且这种神圣的东西在他命运的最黑暗、最危急的关头能够拯救他，能够成为他的灯塔、他的指路明星，那么，当然那就只能是浸透着泪水的最初的童年记忆，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他是这样对我讲的）而找个地方偷偷地与受苦受难的母亲、与这个挚爱他的人拥抱在一起，一块痛哭流涕的童年印象。我认为，从对他的意志和某些朦胧的、难以抑制的、使他一生都不能平静的精神向往所起的影响和强大作用来说，在他后来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一种依恋情感能够与这种情感相比，而朦胧的精神冲动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我记得，后来我们就分手了，很快就分手了；我们彼此的接近没能持续几个月。误解、外在情况，还有些好心的人们都在这件事情上起过作用[①]。此后经过多年，我从西伯利亚回来了，我们虽然不常见面，尽管那时我们在观点上已经出现分歧，但是，我们一见面，彼此有时就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的关系以及他与别林斯基小组的关系是在同一个时期破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年代的书信屡屡提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冷漠直至破裂的情况，如他在 1846 年 11 月 26 日给兄长的信中说："我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我跟以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现代人》杂志彻底闹翻了，他……拼命催着要我的小说，然后又对我无礼……他们全都是无耻之徒，忌贤妒能之辈。"俄国女作家阿·雅·帕纳耶娃（1820—1893）在她的《回忆录》（1889）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她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在《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发生过激烈争吵。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后，涅克拉索夫向她讲了争吵的原因。她写道："涅克拉索夫由于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是发疯了，他来威胁我，不准我在下一期的杂志上刊登我评论他作品的文章。不知是什么人对他胡说，说什么我在到处朗诵我写的诽谤他的诗！他大发雷霆。'"（阿·雅·帕纳耶娃《回忆录》，莫斯科：1972）看来，所谓的"诽谤诗"大概就是屠格涅夫与涅克拉索夫合写的那首嘲笑的诗《别林斯基致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伊·谢·屠格涅夫《作品与书信全集》第 2 版，第 1 卷，莫斯科：1978 年，第 332 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首诗的反应，见同书第 544～546 页。涅克拉索夫以 19 世纪 40 年代的事实为基础写过一部中篇小说，保留下来的是一部未完成、也无题名的手稿。这篇作品是否完成了，写于何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知道这篇作品，现在都无从判断。第一个发表这部手稿的、涅克拉索夫的研究者科·楚科夫斯基（1882—1969）以充分的论据证明，这篇小说一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是以嘲笑的手法刻画小说主人公性格特征的：妄自尊大。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受到这种指责。叶·阿·施塔肯施奈德在自己的《日记与随笔（1854—1886)》（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中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完全知道自己的价值，对自己并没有过高的评价。"

谈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早从青年时期，还是在1845年建立的某种关系似乎真的还在绵延不断地继续着。我们彼此已经有些年头没有见面了，可是这种关系就像不愿意、也不可能中断似的。就是这样，有一次好像是在1863年，他把自己的一本诗集送给我的时候，他指着《不幸的人们》这首诗严肃地对我说："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心中想的就是您"（就是想起了我在西伯利亚的生活），"这首诗写的是您。"到后来，就是最近，我在他编的杂志上发表我的长篇小说《少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又见了……

参加涅克拉索夫葬礼的有几千名他的崇拜者，有很多青年学生。殡葬仪式从早晨九点开始，而人们离开墓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很多人在他的灵柩前讲了话，文学家讲话的人不多。同时，还朗诵了不知是什么人写的几首很好的诗。在深受触动之下，我也挤到他摆满鲜花和花圈的但尚未填土的墓穴前，继别人之后用微弱的声音讲了几句话。我的话的开头是说，这是一生都带着创伤的心灵，这个没有愈合的伤痕就是他的全部诗歌的源泉，就是这个人对一切都怀着炽烈的爱的源泉，他热爱一切被暴力和肆无忌惮的残暴所折磨的人们，热爱我们受压迫的俄罗斯妇女、我们俄罗斯家庭的儿童和我们的饱经厄运磨难的普通百姓，爱他们到了无限痛苦的地步。我也说出了我的见解，这就是，在我国的诗歌中，涅克拉索夫吸收了许多有自己"创新"的诗人的成就。事实上，涅克拉索夫（抛开他的诗歌的艺术魅力和诗歌的气魄不谈）确实是独具特色的，确实是有"创新"的诗人。比方说，曾经有过一位诗人丘特切夫，丘特切夫比他更开阔，更富艺术性，但是，丘特切夫在我们的文学中永远不可能占据那样显著的、难以被遗忘的位置，这个位置无可争辩是属于涅克拉索夫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在一系列诗人（有“创新”的诗人）之中，他的位置应该紧排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当我大声说出这个看法的时候，立即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从人群里发出一声喊叫说，涅克拉索夫高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说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不过是“拜伦主义者”[1]。有几个人随声附和喊道：“对，比他们更高！”不过，关于这三位诗人的高低和比较的尺度问题我不想说什么。可是后来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2] 在《交易所新闻》上发表的关于涅克拉索夫的意义致青

① 关于在涅克拉索夫葬礼上的这场争论，当时在场的弗·柯罗连科（1853—1921）和格·普列汉诺夫（1856—1918）都有文字记述。柯罗连科记载说：“当他（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涅克拉索夫的名字排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时，立刻就有人喊道：‘他比他们高。’接着就有两三个声音支持第一个：‘对，他比他们高……他们不过是拜伦主义者。’”（弗·加·柯罗连科《文集》，第4卷，国家文艺出版社，1953—1956）普列汉诺夫作为民粹派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的代表也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后来，他在纪念涅克拉索夫逝世四十周年的文章《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葬礼》中回忆葬礼上的那场争论时写道：“……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是想遵守这样一条常规，即对死者只讲好话，或者什么也不讲。他讲的全都是涅克拉索夫诗歌的卓越之处，同时还谈到，就其才能而论，涅克拉索夫不在普希金之下。我们感到这是极其不公正的评价，于是我们就齐声大喊道：‘他在普希金之上！’可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毫无准备，刹那间他竟不知所措。但是他对普希金的爱太深了，他不可能同意我们。把涅克拉索夫摆在与普希金相同的水平上，这已是他向‘年青一代’所做的最大让步了。他转身向我们这边看了看，不无愤慨地回答说：‘不比普希金高，但也不低！’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更高！更高！’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了，他不可能说服我们，于是不再理会我们的话，继续自己的演说。”（《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葬礼》，格·瓦·普列汉诺夫《文学与美学》，第2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② 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1838—1910/11），俄国批评家、政论家。

年人的信中说，好像某一个人（就是我）在涅克拉索夫的墓前“把涅克拉索夫的名字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名字进行比较的时候，你们全都（这就是说全体青年学生）异口同声地一齐大声高呼：‘他更高，比他们还高’。”我敢向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说，不像他转述的那样，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相信，我没有记错）。最初只有一个声音喊叫：“他更高，比他们高。”这时又有一个声音跟着说，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拜伦主义者”。一个人，一种意见插话比所有的人也就是上千人在同一时刻，异口同声插话更合乎情理，更为自然。因此，这个事实无疑更能说明我所说的事情的原委是对的。然后才是在第一个喊声之后立刻又有几个人喊，仅仅是几个人，我没有听到上千人一齐喊的声音，我重申一遍这句话，我仍相信，我说的没有错。

我之所以要着重说明这件事，是因为看到我们的整个青年一代都陷入这种迷误，我总是感到痛心。感激已经去世的伟大人物本应是青年人心灵的天性，关于拜伦主义者的嘲讽吼叫声和“更高，更高”的呼声，毫无疑问，完全不是想要在尚未入土的死者的墓前挑起一场文学争论，因为这样做也是不适宜的，他们纯粹是出于一股热情的冲动，想要向这位使我们激动不安的伟大诗人，向这位虽已躺在棺材里，但依然使我们感到亲切的诗人（而从前那些伟大的老前辈已经远远离开我们了！）尽可能强烈地表达出积淀于内心的仰慕、感激和赞扬的感情。然而整个这段插曲在当时立即唤起我一种愿望，这就是在下面的《日记》里更明确地阐述我的思想，更详细地说明，我如何看待我们生活中和我们诗歌中这种杰出的、非同寻常的现象，这就是涅克拉索夫现象，按照我的看法，这种现象的实质和意义是什么。

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
（《作家日记》，1877 年，12 月号，第 2 章，Ⅱ）

首先，不能用“拜伦主义者”这个词进行谩骂①。在欧洲人类的生活中，差不多也可以说在全人类的生活中，拜伦主义虽然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但却是伟大的、神圣的和必要的现象。拜伦主义是在人们极端苦闷、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时刻出现的。上一世纪末，在当时西欧的一个先进民族里面，在法国，提出了一种具有新理想的新信念，对这个新信念进行过狂热赞扬之后就出现了一种与人们期望大相径庭的局面，它欺骗了人们的信念②。在西欧的历史上，也许，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可悲的时刻。新树立起来的偶像顷刻之间就倒下了，这不仅仅是由一些外部（政治）原因造成的，新的偶像还有其内在的缺陷，对这一点，一切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都看得很清楚。新的结局还没有清晰呈现出来，新的阀门还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在评价涅克拉索夫问题上以“拜伦主义”贬低普希金。斯卡比切夫斯基把涅克拉索夫置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上的理由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作品受到西方各种文学的强大影响，涅克拉索夫则是完全独立的、土生土长的纯俄罗斯的天才。阿·苏沃林和亚·斯卡比切夫斯基都因涅克拉索夫未受外来影响而高度称赞他的独特性和本土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论丛》中谈到“拜伦主义”时认为，“拜伦主义”作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在当时波及到整个俄罗斯的知识阶层。缺乏西方文学的修养，妨碍了涅克拉索夫的发展。

② 指 1789 年至 1792 年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没有打开，人类头顶上从前那个空间急剧降低了，缩小了，在它下面的一切都窒息得喘不过气来。旧的偶像已被打倒在地，正是在这个时刻出现了伟大的、卓越的天才，激情昂扬的诗人①。他的声音表达了当时人类的苦闷和人类对自己的使命与被欺骗了的理想的沉痛失望，这是复仇和悲伤、诅咒和绝望的缪斯，在当时来说这是新的、闻所未闻的缪斯。拜伦主义的精神似乎突然间就在全人类里面传播开了，全人类都对它做出了反响。这确实如同一个拧开的阀门；至少在普遍的、低沉的，大部分还是不自觉的呻吟声中，这是一个强大有力的声音，它汇聚、融会了人类的全部呼号和呻吟。那么在我们这里，而且还是像普希金这样伟大的、天才的、启迪心灵的卓越人物，怎么能对此毫无反应呢？任何一个智慧超群的人物，任何一颗高尚的心灵，当时在我们这里都不可能无视拜伦主义。这不只是出于从远处同情欧洲和欧洲所有的人们，这还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在俄罗斯，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众多新的，也是令人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还有非常多的很久以前就已存在的那些失望……普希金作为启迪心灵的天才，他的伟大正在于，他置身于那些对他几乎毫不理解的人们的包围之中，那么快地就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为我们，为俄罗斯人找到了伟大的、渴望已久的出路，并且指明了这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民族性，在俄罗斯人民的真理面前顶礼膜拜。“普希金是伟大的，特殊的现象。”普希金“不只是俄罗斯人，他还是第一个俄罗斯人”。身为俄罗斯人不理解普希金，那就等于他没有权利称自己是俄罗斯人。无论哪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像普希金那样了解俄罗斯人，那样深刻地、那样广泛地领悟俄罗斯人民的使命。他以自

① 这里说的诗人，指的是拜伦及其在俄国的后继者。

己的全人类性这样的天才和善于对欧洲人类多种多样的全部精神领域作出反应的才能，以及他那种善于通过其他人民和民族的天才几乎是把自己表现出来的才能，——以这一切证实了俄罗斯精神的全人类性及其恢弘，从而宣告了作为在全人类里面团结一切、协调一切、复兴一切的因素的俄罗斯天才在全人类中的未来使命。关于这一切我就不谈了。我甚至也不想谈，在我们这里普希金第一个怀着忧郁的心情以先知者的预见大声疾呼说：

> 我会不会看见解放了的人民
> 根据沙皇的诏令，废除了奴役？①

我现在只谈谈普希金对人民的爱。这是包罗一切的爱，在他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流露过这样的爱。"你不必爱我，你要爱*属于我的东西*。"假如谁要是想让人民相信你对他的爱是真诚的，人民就总是要对你这样说。

因为人民的贫困和苦难而怜悯人民，这样的爱是任何一位老爷，尤其是有人道精神的和受过欧洲式教育的老爷都能够做得到的。但是，人民*要求的是*，不仅仅因为他受苦受难而爱他，而是爱*他本身*。*爱他本身*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爱我所爱的，敬我所敬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人民要给你的回答。否则的话，你无论怎样为他而悲伤，人民永远也不会承认你是自己人。无论你用怎样动人的话去瞒哄他，虚假的东西迟早是

---

① 引自普希金的《乡村》（1819）一诗。引文与原诗有出入，原诗为："啊，朋友！我会不会看见人民不再受欺压，／根据沙皇的诏令，废除了奴役？"（冯春　译）

要被看穿的。普希金正是像人民要求的那样热爱人民的，他没有去揣测应该怎样爱人民，他没有事先准备，也没有学习如何爱人民，他自己突然就成为人民了。他崇拜人民的真理，他认为人民的真理就是自己的真理。人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有许多陋习，但他能够认识到人民精神的伟大本质，在他那个时候，几乎没有谁是这样看待人民的。他把人民的本质视为自己的理想放在心上，与此同时，那些最人道的、有欧洲教养的俄罗斯人民的爱好者则在公然惋惜说我们的人民太低级，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巴黎街头人群的那个水平。实质上，这些人民的爱好者向来就蔑视人民。主要的是，他们确信人民是奴隶。他们以奴隶制解释、宽恕人民的堕落，但奴隶终究是不值得爱的，奴隶毕竟是令人厌恶的。普希金第一个宣布说，俄罗斯人不是奴隶，奴隶制虽然存在了几个世纪，但俄罗斯人从来就不是奴隶。有过奴隶制，但没有奴隶（当然，这是从整体上，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而不是说个别的例外），这就是普希金的宗旨。普希金甚至从外表，从俄罗斯庄稼汉走路的姿态断定说，这不是奴隶，不可能是奴隶（尽管处于奴隶制度之中），这一点就足以表明普希金对人民怀着深厚的，发自内心的爱。他认为，我们的人民具有高度的尊严感（这还是就整体而言，不排除任何时候都难以避免的例外）。他预言，我们的人民将以心平气和的自尊心对待自己摆脱农奴地位的解放，而我们那些教养极好的俄罗斯的欧洲派人士在普希金之后过了很久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所期待于我们人民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是啊，他们是真诚地、热烈地爱人民的，但却有他们自己的爱法，就是说按照欧洲的方式爱人民。他们大喊大叫地谈论人民的野蛮状态，谈论农奴制度下人民的野蛮处境，但他们也真心实意地相信我们的人民真的是野兽。可是突然间人民自由了，

这时他表现出豪迈的品质，绝不要求对自己从前的统治者进行侮辱："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要是愿意，就跟我一块做，你做了好事我永远尊敬你。"的确，我们的农民在自己获得解放的时候的表现使很多人感到异常困惑难解，很多人竟然得出结论说，这是由于农民的落后和愚昧，是从前受奴役的遗毒。现在尚且如此，普希金那个时代又该怎样呢？在青年时期我就亲耳听到过，那些进步的、"权威的"人士说，《大尉的女儿》里面普希金那个萨维里奇是地主格利涅夫的奴隶，他跪倒在普加乔夫的脚下请求他宽恕少爷，"为了杀一儆百，最好是把他这个老头子绞死"。他们说，这个人物不仅仅是一个奴隶的形象，而且是对俄罗斯奴隶制的颂扬！

普希金不单单是因为为人民受苦受难才爱人民。苦难是招人怜悯的，而怜悯常常是伴随着轻蔑。普希金爱人民所爱的一切，敬人民所敬的一切。普希金热爱俄罗斯的大自然爱到如醉如痴的地步，他热爱俄罗斯的农村。他不是以慈悲为怀的人道的和怜悯农民的悲惨命运的老爷，他是在自己的心灵中自动转变为普通老百姓的人，接受老百姓的本质，甚至是老百姓形象的人。普希金是以极其历史的古老的眼光忠实于人民的，贬低这样一位诗人是错误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在那些历史的和古老的主题中表现的是爱，是人民的观点，这种爱和观点世世代代，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都是属于人民的，而不只是属于某一个已成过去的历史上的人民。我们的人民热爱自己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他从历史上看到，他寄托着自己信仰的那种神圣的东西直到现在都是不可动摇的，尽管他自己还在遭受着种种苦难与折磨。从《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庄重伟岸的长老形象开始直到描绘普加乔夫的同伙，在普希金的作品中这全都是对人民最深刻的表现，而这一切作为人民自身的本质，人民是

理解的。然而，仅仅是如此吗？普希金的创作中充满着俄罗斯精神，处处都跳动着俄罗斯的脉搏。那些似乎是西斯拉夫人的伟大的、不可模仿的、不可比拟的歌谣，实质上，显然是伟大的俄罗斯精神的产物，在那些歌谣中流露的全都是俄罗斯人对斯拉夫兄弟姐妹的看法，全都是俄罗斯的心灵，昭示于世的全都是在人民歌谣、壮士歌、传说和故事中保存至今的人民的世界观，显示的是人民所爱、所敬的一切，表现的是人民关于英雄、皇帝、人民的保护者和关怀者的理想，反映的是英勇、温顺、爱心和牺牲的形象。还有一些普希金的优美的故事，例如，两个醉酒农夫的闲聊，或者是那个被打死了母熊的熊的故事①，这都是一些可爱的、亲切感人的作品，它们来自普希金对人民的观察。如果普希金活的时间更长一些，他必定会把有助于理解人民的艺术财富留给我们，这些艺术珍品大概将以自己的影响缩短我们全部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真理、人民的力量，认识人民的使命的时间和过程，我们的知识分子至今还在傲视人民，并以自己的欧化而自豪。在涅克拉索夫的身上，在他的优秀作品里面，我也不同程度地看到这种对人民真理的崇拜（唉，可能，在他的所有崇拜者当中仅仅我一个人是这样看的)。我感到可贵的，非常可贵的是，他“为人民的苦难而忧心如焚”，关于人民的痛苦他谈的很多，而且总是满怀义愤，在他身上我感到尤其可贵的是，在自己生活中那些伟大的、苦难的和欢乐的时刻，他把一切相反的影响，甚至是自己本人的信念都置之不顾，全副身心毫无保留地向人民的真理顶礼膜拜，他以自己最优秀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① 分别指普希金的抒情诗《亲家伊万，我们一拿起酒杯……》(1833）和童话诗《母熊的故事》(1830?)。

我把他放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后来者的位置上，把他看作同他们一样，也是为我们带来了某种创新。（因为普希金说的“话”直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新见解。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没有被理解的，没有被研究的，被当做没有用的废话看待的。）

在谈涅克拉索夫之前，我想先谈几句莱蒙托夫，说说我为什么把莱蒙托夫也看做信奉人民真理的人。当然，莱蒙托夫是一位拜伦主义者，但他那伟大的、独具一格的艺术力量使他成为一个特殊的拜伦主义者，一个爱嘲弄的、任性的、鄙夷一切、竟然连自己的灵感、自己的拜伦主义都从来不相信的人。如果他能够摆脱被自己的欧化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病态个性，那他很可能也同普希金一样，在崇拜人民的真理中找到出路，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有很多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又是死亡破坏了一切。实际上，在自己的全部诗歌中他都显得忧郁，任性，想说真话，而又总是说谎，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并为说谎而苦恼，但只要一涉及到人民，他立刻就欢快明朗起来。他热爱俄罗斯士兵，哥萨克，他尊敬人民。有一次他写下一首不朽的诗，写的是一个年轻商人卡拉什尼科夫因为自己受到侮辱而打死了国王的卫士基里别耶维奇，他被沙皇伊万召去之后，面对沙皇威严的目光回答说，他打死国王的仆人基里别耶维奇“是成心的，而不是无意的”[①]。先生们，你们还记得《奴隶席班诺夫》[②] 这首诗吗？奴隶席班诺

① 指《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军和勇敢的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1837)。

② 据说是见于伊万·雷帝（1528—1583）的信。后来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一文中也提到过。诗人阿·托尔斯泰（1817—1875）　（转下页）

夫是16世纪俄国流亡者库尔布斯基公爵的奴隶，库尔布斯基公爵从他安全栖身的外国给那位沙皇伊万写了一封几近辱骂的信，表示自己的反对观点。信写完之后，他叫来自己的奴隶席班诺夫，命令他把信送到莫斯科，当面交给沙皇。席班诺夫按照吩咐做了。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上他拦住了由侍从簇拥着走出教堂的沙皇，把自己主人库尔布斯基公爵的信交到他手里。沙皇举起自己的尖端锋利的权杖，猛力刺进席班诺夫的大腿，自己靠在权杖上开始读信。席班诺夫的腿被刺穿了，却依然不动。而沙皇后来给库尔布斯基公爵回信的时候写道："你应该在你的奴隶席班诺夫面前感到羞愧。"这个俄罗斯"奴隶"的形象大概使莱蒙托夫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他的卡拉什尼科夫对沙皇说话时，没有因为基里别耶维奇而责怪沙皇，他知道等待他的必然是死亡，但还是向沙皇说出了"全部事实真相"，说他打死沙皇的宠臣"是成心的，而不是无意的"。我还要说，莱蒙托夫如果还活着的话，我们就会又有一位承认人民真理的伟大诗人，可能也是一位真正的"为人民苦难而忧伤的诗人"。但这个名分落在涅克拉索夫的头上了……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拿涅克拉索夫与普希金相比，我不是用尺子衡量他们谁高谁低，因为这是不可能进行比较的，甚至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从自己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才能来看，普希金直到今天仍然是照耀我们俄罗斯知识界世界观的太阳，他是一位伟大的尚未被理解的先驱。与普希金相比，涅克拉索夫不过是一个星点，是由这轮伟大太阳生发出来的一颗小行星。不过，抛开他们谁高谁低的尺度不谈，涅克拉索夫是不

（接上页）在其叙事诗《瓦西里·席班诺夫》（发表于1858）则直接写他。下文说的沙皇伊万即伊万·雷帝。

朽的，这样说，他完全当之无愧，我已经说过了其中的原因，这就是他崇拜人民的真理。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要模仿什么人，甚至也不完全是出于自觉，而是受着一种需要，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的驱使。涅克拉索夫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他自己一生都是在有些人的影响下度过的①，这些人虽然也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也可能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人民的真理，而且始终认为自己的欧洲教育高于人民精神的真理。他们没有领悟俄罗斯的心灵，也不理解俄罗斯心灵期待的是什么，要求的是什么，他们经常是满怀爱心为我们的人民寻求幸福，但给人民带来的却恰恰是灾难。岂不就是他们几乎根本不承认最近两年来在俄罗斯的人民运动中人民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吗②？可能，人民还是第一次如此充分，如此有力地把这种精神高度显示出来，并以此表明人民自己的合理的、坚强的和始终坚定不移的充满生气的团结一致，在一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首先是别林斯基的影响，然后是涅克拉索夫在《现代人》杂志的同仁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还有在《祖国纪事》杂志的同仁格·扎·叶利谢耶夫和退出《现代人》之后加入《祖国纪事》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人。叶利谢耶夫在《祖国纪事》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涅克拉索夫受到他人影响的说法进行了激烈的反驳。

② 这里所说的首先是《祖国纪事》杂志，《祖国纪事》不同于保守派的和泛斯拉夫派的报刊，它对巴尔干战争的反应十分谨慎，特别是对1877年4月12日俄国政府对土耳其宣战未作任何反应，关于人民精神的“高涨”也几乎没有写什么。反对派的报刊立即指出了这种情况，致使《祖国纪事》的同仁、民主主义政论家格·扎·叶利谢耶夫（1821—1891）不得不对该杂志缺乏爱国主义的指责作出答复。他答复的文章中说，4月号的《祖国纪事》是在宣战诏书发布之后十天出版的，《俄罗斯世界报》的文学观察家诘难这本杂志中的文章和小说只字未提战争问题，叶利谢耶夫则针对《俄罗斯世界报》的指责，反讥该报是“矫揉造作的爱国主义”。

个共同的伟大思想之上的团结一致，人民自己还几乎预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使命。那些人不仅不承认人民运动的真理，而且还认为人民运动是倒退，是人民毫无自觉性的证明，是俄罗斯人民多少世纪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落后性的证明。涅克拉索夫虽然具有卓越、高超的智慧，但他没有受过认真的教育，至少，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他一生都没有摆脱某些影响，其实也无力摆脱。不过在心灵上他有着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从未离开过他的力量，这力量就是他对人民的那种赤诚、炽烈的，尤其是纯洁无瑕的爱。他为人民的苦难而痛心疾首，然而在他的眼中人民不只是一个被奴役受侮辱的形象，形同野兽之物，他还能够借助自己的爱的力量几乎是不自觉地就理解了人民的美，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和蕴含着痛苦的驯服，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也相信人民未来的命运。唉，涅克拉索夫在自觉的时候可能常常是错误的。在不久前首次发表的一首即兴诗中，他以惶恐不安的责怪目光观察已经从农奴制下获得解放的人民，竟然大声疾呼：

……然而人民幸福吗？①

他心灵的敏锐感受使他意识到人民的悲哀，但是，如果问问他："你希望人民得到什么，怎样才能得到？"那他可能做出一个十分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回答。当然，这是不能责备他的，因为在我们这里政治鉴别力低得可怜，而涅克拉索夫，我再说一遍，一生都处于别人的影响之下。但是，在自己那些优秀诗篇中，他自己的心灵，他自己的巨大艺术灵感使他坚定不移地

---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哀诗》(1874)。

倾心于人民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人民的诗人。任何一个来自人民的人，即使是只受过一点点教育，他也能够读懂涅克拉索夫的很多诗，但必须受过一点教育。现在全俄罗斯人民是否都能读懂涅克拉索夫的作品，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对他的那些杰作，如《昙花一现的英雄》、《寂静》和《俄罗斯女人》等诗篇，"普通百姓"又能理解什么呢？甚至在人民兴许能够理解（但一点也不能鼓舞人民，因为这毕竟是早已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诗）的大作《弗拉斯》中人民大概也能指出二三处不真实之处。在他最有力的、最感人的《在伏尔加河上》这一诗篇中，人民又能明白些什么呢？这是真正的拜伦精神和拜伦腔调。不，涅克拉索夫目前还仅仅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诗人，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爱和热情去谈论人民，诉说人民苦难的诗人。我不想谈未来的事，将来人民会纪念涅克拉索夫的。到那时候人民会明白，曾经有过那么一位善良的俄罗斯老爷，他因为人民的痛苦而悲伤得流泪，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有抛弃自己的财产，逃离自己的老爷生活的罪恶诱惑，在自己最沉痛的时刻向他，向人民走去，以对人民无限的爱来净化自己备受折磨的心灵，因为涅克拉索夫对人民的爱只是他自身所感受到的个人悲伤的出路……

我是如何理解我们已故的亲爱诗人这种自身所感受到的"个人悲哀"的呢？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涅克拉索夫逝世之后，几乎是在我们所有的报刊上，在差不多所有谈论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中立刻就出现了。

诗人与公民。关于涅克拉索夫为人的公论

(《作家日记》, 1877年, 12月号, 第2章, Ⅲ)

所有的报纸只要联系到逝世和葬礼而提起涅克拉索夫，只要一谈到涅克拉索夫的意义，无一例外，马上就得补充说说什么涅克拉索夫的“实际精神”，说说他的什么缺点，乃至过失，说说涅克拉索夫在自己的形象中留下的什么两重性问题①。有

---

① 关于涅克拉索夫的心理的两重性及其形成的原因，《新时代》发行人阿·苏沃林的阐述是有代表性的。阿·苏沃林在他的文章《每周特写与画面》中转述涅克拉索夫自己的话说：“我下决心不死在阁楼上。决不，我想，在我之前毁灭的人已经够多的了，我无论如何也要闯出去。宁可走上弗拉季米尔大道（沙皇时代押送被流放者惯走的一条路——译者），也不孤苦伶仃地在痛苦的折磨中默默无闻地冻饿而死。这个思想白天黑夜都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心中产生的内在的斗争折磨着我：心里想的是一回事，而生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有很多理想，可这都是与生活背道而驰的理想，于是我就开始扑灭自己心中的理想，尽力培养自己的实用精神。”亚·斯卡比切夫斯基认为涅克拉索夫的两重性产生自19世纪40年代那一辈人在理智和道德上的矛盾。这一辈人是在农奴制度下受的教育，染上的是老爷式的生活习惯，同时又受到当时西方各种人道的先进的思想影响。西方的思想与他们从幼年起就接受的传统和习惯发生尖锐的矛盾，从而出现思想上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不仅使19世纪40年代那一辈人与后来的几代人产生分歧，同时也把19世纪40年代的那一辈人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些人的传统习惯征服了思想，为了安抚良心，以莫斯科精神（莫斯科原是俄罗斯的首都，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所谓莫斯科精神就是彼得改革前的旧思想。——译者）改造了思想，他们向右转并与后来的几代人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另外一些人则很难挣脱这些思想，因为他们生活的特殊情况使这些新思想的种子在他们的心灵里深深扎下了根，他们就向左转了，他们还不能使思想和（转下页）

些报纸只用两三行字稍稍暗示一下这个问题，看得出来，这是出于某种必要，它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在另外一些更广泛地谈论涅克拉索夫的报刊上就显得更加离奇了，虽然它们没有详细地提出指责，好像是出于对死者深厚和真挚的敬意，有意避免这样做的，可是事实上，他们毕竟……还是在为涅克拉索夫辩解，这就更加难以理解了，从而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一个问题："你们倒是为他辩解什么？你们如果知道什么，那就无须隐瞒，而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他还需要你们为他辩护吗？"这就是引发出来的问题。然而人们不愿意明确回答，却急于进行辩解和补充说明，似乎是要赶紧提醒什么人，主要的还是想说明他们无论如何也避不开这个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要避开。总之，这是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如果深入一了解，那无论是您还是任何别的人，也无论您是谁，只要稍加思考，您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件事情完全是正常的，谈论作为一个诗人的涅克拉索夫时，的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谈作为一个人的涅克拉索夫，因为在涅克拉索夫的身上，诗人和公民的联系是如此之紧，以致于缺少一个方面就两个方面都说不清楚，只有两个方面同时提出才能相互说明。因此，您在谈论诗人涅克拉索夫时，会不知不觉地转而谈论起公民涅克拉索夫来，您会感到，好像是不得不这样谈，理应这样做，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然而我们能说什么，我们看到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人们讲起了"实际精神"（即善于处理自己的事情，仅此而已），可紧

（接上页）习惯协调起来，到了头发斑白的时候还是充满了道德上的各种矛盾，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后来的几代人站在一起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并且站在后人的前列。尼·阿·涅克拉索夫不容置疑地属于19世纪40年代人们的左翼。"

接着又辩解说："他受过罪，从童年时代起就受环境的煎熬。"他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在彼得堡备尝艰辛，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苦难重重，因而他就成为讲求"实际精神"的人（就是说，他好像不可能不这样）①。还有一些人说得更厉害，他们说，要是没有这种"实际精神"，涅克拉索夫为公共利益也许就做不了那么多有益的事情，比如说，创办杂志等等。如此说来，就是该以高尚的目的而为恶劣的手段进行开脱。这种话难道可以用来说涅克拉索夫这个以自己的诗歌撼人心魄，唤起对善和美的憧憬和赞赏的人吗？显然，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谅解他。不过我认为，涅克拉索夫不需要这种谅解。在这种谅解话题里面总是含有某种类似贬低的意味，被谅解者的形象似乎黯然失色，几乎渺小到平庸的程度。事实上，我要是对一个

---

① 亚·斯卡比切夫斯基就是以童年的遭遇解释涅克拉索夫的矛盾和他的实用精神的。斯卡比切夫斯基写道："他的整个生活状况使他一方面在性格上形成道德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尽管存在所有这些矛盾，他仍然是更加倾心于追求光明和真理。他出生在地主的家庭里，这个家庭的野蛮风习给他留下了极其阴郁的回忆，同时这些风习对这个儿童的敏感天性也不是没有产生腐朽的影响……"斯卡比切夫斯基又继续写道："十六岁的少年就带着这样的素质……被投进首都生活的漩涡，父亲抛弃了他，没有任何支持……同最可怕的贫困进行了几年艰难的和顽强的斗争，这几年的斗争给尼·阿·涅克拉索夫后来的整个生活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斯卡比切夫斯基认为，"这几年为生存而作的斗争，对普通老百姓所遭受的一切的亲身体验"使涅克拉索夫与人民走到了一起，给他的活动打上了深深的印记。"然而也就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他的那种双重性……尼·阿·涅克拉索夫经受的饥寒太多了，这使他下不了决心在清贫作家这个严峻的范围里坚持终生……无论多么可悲，在涅克拉索夫面前摆着二者必择其一的抉择：或者抱着自己的良心……死于冻饿之中，或者不惜以任何手段，使自己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在生活无虞的基础上开始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他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必须承认，对于人民的诗人来说这是一条最危险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能够为他提供很多物质的舒适和慰藉，但同时也在他的心灵里留下沉痛的道德裂痕。"

人的“两重性和实际精神”有所体谅，那我就是以此表明，这种两重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必须同一个人的这种面貌妥协了，这个人今天在家乡的教堂的台阶上磕头忏悔，号叫：“我堕落了，我堕落了。”这就是他在当天夜里写下的不朽的美妙诗篇中说的话，可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眼泪刚刚干，他的“实际精神”就又故态复萌，据说，这是因为，抛开其他一切不说，实际精神还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如此说来，那些通过诗体现出来的呻吟和呼号又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是为艺术而艺术，而且是最庸俗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因为诗人自己吹嘘这些诗，自己欣赏这些诗，他为这些诗而扬扬得意，把它们发表出来，寄希望于它们。据说是，它们将为诗集增光，能激动年轻人的心灵。不，假如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这一切都加以辩护，我们就是在冒犯重大错误的危险，就是在制造困惑，对“你们埋葬的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我们这些护送灵柩的人就不得不回答说，我们埋葬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最光辉的、无与伦比的代表人物①。然而，这是真的吗？不是，这的确不是真的，我们埋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议论的起因是与亚·斯卡比切夫斯基的论争。斯卡比切夫斯基论述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一开头就声明他是面向青年讲话的，因为对其他人讲话已经毫无必要了，那些人已经形成了自己对诗人的见解，再也不可能要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进一步阐述自己观点的话无疑是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说：“一些人崇拜尼·阿·涅克拉索夫的天才，认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甚至愿意把这位天才置于同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两位天才相等的水平上，他们感到遗憾的唯有一件事：尼·阿·涅克拉索夫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才能完全献给‘复仇和悲伤的女神’，他为什么不做纯艺术的艺术家，这些人认为涅克拉索夫的著名前辈们就是这样的艺术（转下页）

葬的确实是“为人民之忧而忧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慰地始终坚持不断地自疚自责的人，他怀着憎恶和自责的心情反对廉价的妥协。

需要把事情说清楚，真诚地不带偏见地说清楚，真相清楚了，就按照它的本来面貌接受它，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下一步还有什么考虑。为了通过考察尽可能确切地认清死者的形象、面目，在这里就力求尽可能把全部实质考察清楚；我们的内心要求这样做，这是为了在我们心中不要留下任何一点疑惑，这种疑惑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给记忆涂上污点，往往会在高大的形象上留下不体面的阴影。

死者的“实际精神的生活”我自己知道得很少，所以我不能谈论这类趣闻，不过，即使我能够这样做，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我就直接陷入到我自认为是诽谤的行径中去了。我深信不疑（从前我就这样相信），人们关于死者的一切议论中，起码有一半，也许有四分之三都纯粹是谎言。谎言、胡说和诽谤。像涅克拉索夫这种独特、卓越的人物不可能没有敌人，实实在在有过的事情、事实上发生过的事情有时也不可能不被夸大。不过，接受了这些东西之后，总还是能够看到，在这些东西之外还有某种东西。这究竟是些什么呢？是某种忧郁的、阴暗的和无疑是痛苦的东西，因为，否则的话，这

（接上页）家。你们自己明白……跟这些先生们争论，向他们证明，涅克拉索夫的所作所为无愧于你们给他送葬时所举的那些花环，无愧于俄罗斯人民对他的永恒怀念，这正是因为他不是纯艺术的诗人，向他们论证这一点就是无的放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论丛》中详细阐述过自己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个问题的观点，他在涅克拉索夫的评价上与斯卡比切夫斯基的争论是他与艺术中的功利主义者的争论的继续。

些呻吟，这些呼号，他的这些眼泪，这些“他堕落了”的自白，在母亲阴影前的那种热情忏悔又都说明什么呢？还有那种自责、自我折磨又说明什么呢？我还是不想卷进这件事情的趣闻里面去，但是我认为，我们诗人生活的另外那一半，即忧郁和痛苦的那个方面的实质，他自己好像早在他写作初期，在他最初的一首诗里就已提到了，这首诗是他在结识别林斯基之前所写的诗篇之一（后来，在较晚一些时候他又做过一些修改，改成发表时的那种样子）。这些诗句是这样的：

夜晚的灯火点燃了，
狂风呼啸，雨声淅沥，
我从波尔塔瓦省
走进京城。
　　肩上担着长长的木杆
　　杆上挑起空空如也的背囊，
　　身上披的是老羊皮袄，
　　衣袋里仅有十五戈比铜板，
没有钱，没有名分，没有门第，
身材矮小，模样可笑，
时间流逝四十年后，
我囊中装满百万。①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是涅克拉索夫的《秘密（当代叙事诗试作）》一诗第二部分的前三节。这首诗叙述的是一位以不正当手段发迹的“百万”富翁之死。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诗句是富翁弥留之际忏悔的开头几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引用时去掉了表示诗句是富翁的话的引号，这样一来，从全诗中摘出的三节诗看上去就像一首独立的诗，可以被看成诗人自己的（转下页）

一百万——这就是涅克拉索夫的魔鬼！难道说他是那样贪婪金钱，喜好奢华和享乐，为了获得这一切才倾心于“实际精神”的吗？不是，这更像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魔鬼，这是最阴郁的卑微欲望。这个魔鬼就是一种高傲，他渴望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想用一堵坚固的墙壁把自己同人们隔离开，以便自由、安然地去观察人们的凶狠和人们的威胁。我认为，这个魔鬼早在这个儿童还只有十五岁的时候就潜入了他的心灵，他几乎是从父亲身边逃出来，跑到彼得堡的街头。这颗怯懦而又高傲的年轻心灵被震惊了，被刺伤了，这颗心不想寻找庇护者，也无意与这跟自己没有共同语言的人群和解。这并非因为在他心中很早就产生了对人的不信任，确切一点说，是在他的心中对人们产生了一种过早的（从而也是错误的）悲观感情。就算是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自己多半也是那样想的），人们不是那样凶狠，也不是那样可怕，然而他们毕竟全都是脆弱的和胆怯的坏蛋，所以只要稍微一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不动声色地把人毁灭掉。可能从那时起涅克拉索夫就有了幻想，可能在那个时候便在街头酝酿成了诗句：“我囊中装满百万。”

这是为了不依附于任何人而产生的对并无欢乐的、阴郁的、孤独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的渴望。我想，我是没有错的，我还记得我与他初次相见时的一些情景，至少在我此后的一生中我都是这样看的。然而这个魔鬼毕竟是渺小的魔鬼。涅克拉索夫的心灵善于响应一切神圣的事情，对神圣的事情从未失去过

（接上页）忏悔。格·叶利谢耶夫当时就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诗是不可取的。阿·苏沃林也说，人们以为涅克拉索夫是一个富有的人，其实，除开一处庄园之外，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

信念，他的心灵所渴望的能仅仅是这样的无忧无虑吗？难道天赋如此杰出的心灵竟然用这样的无忧无虑来保护自己吗？这种人是空手赤脚走上生活道路的，他们的心也是清澈明朗的。他们的无忧无虑不是来自金钱。金钱就是粗野、暴力和专横！只有连涅克拉索夫本人也蔑视的那种懦弱和胆怯的群氓才把金钱视为无忧无虑的保障。一个人，如果自己能够呼唤别人“抛弃一切，拿起自己的拐棍，跟我走”，[①] 他的心里难道能够容纳暴力的场面和对享乐与腐化的渴望吗？

把我领进牺牲者们的阵营
他们在为伟大的事业——爱而战斗。[②]

但是，魔鬼占了上风，人却原地未动，哪里也没有去。

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痛苦，自己整个一生的痛苦。事实上，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些诗，他同自己的魔鬼在内心所进行的斗争无疑是痛苦的，持续了一生的痛苦，关于这一切我们又知道什么呢？涅克拉索夫做的好事就不去谈它了，因为这种事情他没有公开过，但肯定是有的，人们已经在证实这颗“实际精神的”心灵的人道和温情了。苏沃林先生已经公开发表过文章，我相信，一定还会发现很多而且是更好的事实，不可能不是这样。“噢，人们会对我说，您岂不是也在为他辩解，而且还不如我们的辩解有分量。”不，我不是在辩解，我不过是作些说明，我已经达到了目的，这就是我能够把问题提出来，这是最终的、说明一切的问题。

---

① 参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6 章，第 24 节。

②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昙花一现的英雄》。

有利于涅克拉索夫的见证

(《作家日记》，1877 年，12 月号，第 2 章，Ⅳ)

哈姆雷特就曾感到惊讶，一个演员在朗诵自己角色的台词时竟为某个赫古芭[①]哭泣。他想："有什么值得他哭她呢?"[②]摆在这里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涅克拉索夫是否就是那个演员？也就是说他能够由衷地为自己哭泣，为自己丧失的精神瑰宝而哭泣，然后又在不朽的优美诗篇中倾诉自己的悲哀，(真实的悲哀!) 可是到了第二天却又能够以诗篇之美而真正感到慰藉……仅仅为诗的美而自慰。不仅如此，还能视诗的美如同能提供收入、金钱和荣誉的"实际的"东西，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利用这种东西。或者相反，诗写出之后诗人的悲哀并未消逝，他并未由此得到满足；而诗的美，表现在诗中的力量，给诗人自己带来了压抑和痛苦；如果他由于无力降服自己的永恒的魔鬼，无力控制支配他一生的欲望，而又再度堕落，那他是否就会心甘情愿地安于自己这种堕落呢？而在扪心忏悔的隐秘而神圣时刻，能不再次更加强烈地发出呻吟和呐喊吗？这种呻吟和呐喊在他的心中是否会随着每一次的重复和加强而使他最终看清楚，他身上的这个魔鬼对他是怎样一个负担，他为从这

---

①② 赫古芭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 2 幕，第 2 场) 中的伶人念的台词中的皇后。伶人念台词时流了泪。伶人走散后，哈姆雷特独白说："为了赫古芭？/赫古芭对他或者他对赫古芭，/有什么值得他哭她呢?" (卞之琳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第 76 页) (赫古芭或译赫卡柏)

个魔鬼那里得到好处又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总之，即使他能够与自己的魔鬼暂时妥协，甚至在同人们交谈中也可为自己的“实际精神”辩解，但这种妥协和内心的宁静能否永远保持下去，或者相反，转眼间就从心中消失，而留下的却是更强烈的灼痛、耻辱感和内疚呢？这个问题一旦能够解决，那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谴责他，因为他没有力量去抑制自己的欲望，比如说，他没有像古代的洞穴苦行僧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苦行僧由于无力制伏折磨自己的情欲这条毒蛇，而把自己埋在齐腰的深坑里面；既然不能把自己的魔鬼赶开，那就战胜魔鬼吧，自己一死了之。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胆敢去承担这种审判官的角色，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陷入有失尊严和可笑的境地。何况诗人关于自己还写下过这样的话：

你可以不做诗人
但必须是公民。

这样他也就承认了“公民”那样的人对自己的裁判。而像我们这种人，当然羞于去裁判他。我们自己，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又是怎样的人呢？我们不过是不公开谈论自己，我们坦然自若地容忍自己的卑劣行为，并把它深藏于内心之中。也许诗人曾为自己的这类行为哭泣过，而我们如果做了这种事情，连眼都不会眨一下。其实我们只是从他的诗中了解他的堕落、他的邪

① 此处指的是约翰。据说他因要克服肉欲，“挖了一个深至肩部的坑，用双手将泥土埋住自己，只有手和头露在外面，”但此后魔鬼还继续以淫欲折磨这位圣徒……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记错了，约翰没有死在坑里，他经受住了诱惑，再没有为肉欲所困扰。

魔的，如果没有那些他不怕公诸于世的自己真诚忏悔的诗篇，那么关于他的为人，关于他的“实际精神”等等，所有这些议论便都会自生自灭，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干净，直至变成流言飞语，从而也就根本用不着为他进行任何辩解了。我要顺便说一说，对一个讲求实际精神的人，善于安排自己的事情的人来说，把自己忏悔的呻吟和呼号公之于众的做法确实是有违实际精神的，由此可见，他也可能完全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讲求实际的人。我还要说，尽管如此，涅克拉索夫仍然应该接受公民的裁判，因为他自己承认了这种裁判。这样看来，如果说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这就是，诗人是不是因为写了那些浸透着自己泪水的诗就心安理得了，是不是因此就宽恕了自己，“实际精神”竟然又泰然自若地、轻松地故态复萌了，或者与此相反，对自己的宽恕不过是一时的，也许他把这种宽恕看做耻辱，为此而蔑视自己，此后更痛苦地、更强烈地折磨自己，就这样度过一生呢？我还要再次说明，如果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能够像后一种设想那样得到解决，当然，那时我们立即就可以谅解作为“公民”的涅克拉索夫，因为，在我们的面前，他自身的痛苦就可完全荡涤我们记忆中有关他的污点。可以想象，立刻就会有人反驳说：如果您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谁能够解决它呢?）那就没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然而问题在于，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见证人，这位见证人就是人民。

这里说的就是他对人民的爱！首先，一个讲求“实际精神”的人为什么要那样执著地热爱人民？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有的人在忙实际的事，另外的人则在忧国忧民。好啦，可以说这是一种癖好，玩一玩就算了。可是涅克拉索夫却一辈子也没有变，有的人要说：对他来说，人民，这也是赫古芭，是

他为之流泪的对象，这泪水浸透了诗歌，并且带来收益。但是，装腔作势是很难达到涅克拉索夫诗中所表现的那种真挚的爱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不过我只想谈一谈，我很了解，涅克拉索夫为什么那样热爱人民，在生活的艰难时刻他为什么向往人民，在人民那里他找到了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因为涅克拉索夫对人民的爱如同是他个人悲伤自身的宣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样理解它，您对作为诗人和作为公民的整个涅克拉索夫就可以理解了。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才能服务于人民，他认为，这就是自我净化的途径。不单单是为了写诗人民才成为他真正的内心的需要，他在对人民的爱中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以对人民的感情使自己的精神变得高尚。而主要的是，他在自己周围的人里面，或者说在这些人所尊崇、所膜拜的事物当中，找不到自己要爱的对象。当他有时由于意志薄弱和邪恶的念头而沉湎于其中的那种生活使他厌恶时，他便脱离了这些人，反过来，他向被侮辱的、驯顺的、纯朴的和受鄙视的人们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在路遇的贫困农村的可爱庙宇的石板路上磕头，治愈了创伤。他如果不相信这条出路，他就不会为自己选择这条出路了。他在对人民的爱中找到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为他所受的一切折磨找到一条不可动摇的和神圣的出路。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他并没有找到任何更神圣，更坚定，更符合真理而可膜拜的东西，他总不能认为只写一些关于人民的诗就为自己完全开脱了。既然是这样，他也自然就崇拜人民的真理；既然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找到任何比人民更值得爱的东西，那么，他也就承认了人民的真理，承认真理在人民中间，他承认真理是存在的，真理只存在于人民中间。如果说他不是充分自觉地，不是出于信念承认这一点，那就是以整个身

心不可抑制地、不可抗拒地接受了这一点。被侮辱的、被鄙视的和一无是处的农民使他蒙受了多少折磨，但就是在这个一身罪过的农民的身上，他找到了真实的、神圣的东西，他不能不敬仰的东西，不能不以自己的整个身心来回应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在前面谈到他在文学上的意义时，把他摆在那些承认人民的真理的人们的行列里面。对这一真理的永恒探索，永恒的渴求和永恒的向往显然表明，我再说一遍，吸引他走向人民的是一种内在的需要，高于一切的需要，这也就是说，这种需要不能不是在表明，他有一种内心的、时时刻刻都伴随着他的永恒的忧郁，这种忧郁是任何诱惑以任何狡黠的理由、任何异乎寻常的道理和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辩解都无法化解和排遣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见，他是在苦闷中度过了自己的整个一生……说明这一切之后，我们还算得了他的什么样的裁判者呢？即便是裁判者，也说不上是指控者。

涅克拉索夫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典型，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表明，在我们这个可悲的过渡时期，俄罗斯人在道德上和信念上的矛盾和分裂能够达到何等程度。但是这个人仍然留在我们的心中，这位诗人炽烈的爱常常是那么真诚、纯洁和敦厚！他对人民的崇高的向往把他推上了作为诗人的最高的位置。至于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来说，那么他依然是以自己对人民的爱和为人民而遭受的折磨表明自己是于心无愧的。如果确实有什么过失需要赎罪的话，弥补的也很多了……

致 读 者

（《作家日记》，1877 年，12 月号，第 2 章，V）

12 月号的最后一期《日记》延期了很久，原因有两个：在整个 12 月里我都在生病，改换印刷所是没有预料到的，原来的印刷所倒闭了，在新的不熟悉的地点印刷就必然要耽搁一些时间。尽管如此，我还是有责任的，我请求读者原谅。

我的很多订户和读者提出了许多问题：在未来的 1878 年我能否不受每月一期的限制，不定期地出版《日记》？我现在就可以答复，由于诸多原因我不可能这样做。或许我还要再拿出一期来与我的读者们继续谈谈这个问题。其实我出版这个小刊物与其说是为了别人，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是出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强烈需求，想在我们这个如此非同寻常、又十分独特的时代发表点自己的意见。即使是只出一期①，我也要在报上发消息。我没有考虑给别的刊物写东西，在别的刊物上我只发表中篇或者长篇小说②。在定期刊物停刊这一年里我确实是想写一部艺术作品，这是我在出版《日记》的两年期间不知不觉地酝酿成熟的一部作品。一年后，《日记》定会复刊。由衷地感谢所有热忱向我表示同情的人。有些人写信给我，说我在最紧要的时刻停了刊，我要向这些人指出，一年后的时期可能更紧要，更具特点，那时，让我们再度共同为美好的事业而工作吧。

我写的是共同二字，这是因为我确实认为我的很多通信者

---

① 这一期《作家日记》没有出成。

② 指《卡拉马佐夫兄弟》。

都是我的合作者。他们的消息、提示、建议以及他们对待我的那种真诚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抱歉，由于时间和健康的原因对那么多的人不能一一回信，我还是要向迄今还没有得到回复的人们请求友好的宽宏大度的体谅。在最近的三个月里给我写信的人很多，在他们面前我尤其感到抱歉。一位女士来信说到“一些可怜的小伙子们的苦闷，还说她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写信的女士大概能够看得出来这里引用的是她的话）。现在我借这个机会告诉她，我从内心对她的信深感兴趣。本来只要有可能，我就会把我答复她的信刊登在《日记》上，只是由于没有可能把她的信全文刊登出来，我才改变了主意。实际上，她这封信充分表现出我们大多数青年的热烈的、高尚的情绪和为了共同的幸福而服务于一切美好事业的真诚愿望。我要向这位通信者说的话只有一点：在俄罗斯妇女的身上有一股复活了的新的力量和渴求做一番事业、直至为此而牺牲，而建树丰功伟绩的最高尚的愿望，可能，俄罗斯的妇女将要拯救我们大家和我们的社会。她将使其他那些无所作为的力量自愧弗如并率领他们前进，使误入歧途的人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不过，就写到这里为止吧。我怀疑我的通信人过去告诉我的地址现在也许改变了，考虑到这个情况，我才在这里，在《日记》里回答我的可敬的通信人。

很多信件提出的问题我之所以不能回答，是因为那些使他们深感兴趣的重要、迫切的问题是无法写信答复的。这需要写文章，甚至是一本本的书来回答，而不是写信。写信必然会有说不透彻和误解的地方，有些问题是断然不能靠通信处理的。

那位女士要求我在《日记》里宣布我收到了她关于在当前这场战争中被打死的弟弟的信，我立即告诉她，我既为她失去朋友和弟弟的悲痛心情所感动，同时也为她对弟弟为美好事业

而献身的赞扬的精神所打动、所震撼。我高兴地立即告诉这位女士，我在这里遇见一位年轻人，他本人认识她的弟弟，他还证实她在给我的信中关于弟弟所写的一切全都是真实的。

对那位给我写了关于红十字会的五页纸长信的通信人，我深感同情并紧握他的手，我诚恳地向他表示感谢，请求他今后与我保持通信。他向我要求的东西，我一定寄给他。

不久前有几位先生向我写信提出各项问题，我一定写信专门回复每一个人，对那位问我“谁是没出息的人”也同样得回答（我想，写信的人们从这些话中能够认出他们自己的话来）。我要特别请求从明斯克和维捷布斯克写信的人原谅我没有及时回答他们，稍事休息之后我就动手写信，尽可能答复所有的人。所以，请大家不必抱怨，再等一些时候。

我的住址依旧未变，只是请注明街道和门牌号，不要寄到《作家日记》编辑部。

我再次感谢大家，让我们期待愉快的再会。现在的时期是美好的，然而却是严峻的和危急的。在当前有多少事情都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等一年过后我们再来谈论这一切吧！

又及：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东方问题的过去和现在。保卫俄罗斯。男爵、英国议会议员辛克莱先生著。译自英文》，本书的出版者要求我在本期《日记》中刊登此书的广告。读完这本书，了解书的内容之后，我愿意亲自把它推荐给读者，而不是作一般的报刊广告，这是一本难得的通俗有趣的、有价值的书。我们现在十分需要这样的书，而真正对东方问题历史有见地的书却很少。然而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了解这个问题，应该，也必须了解。辛克莱是俄罗斯利益的保卫者，在欧洲他早已是著名的政治作家。三百五十页一大本书定价仅仅一个卢布（附加寄费为一个卢布二十戈比）；所有书店均有出售。

关于下面刊载的纪念普希金的演说的解释

（《作家日记》，1880年，8月号，第1章）

下面刊载的是我关于普希金及其意义的演说，这是本期《作家日记》（1880年唯一的一期[①]）的基本内容，这篇演说是今年6月8日我在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协会的隆重讨论会上对很多听众讲的。当时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谈到自己时说，人们好像都认为他是斯拉夫派的首领，就是他在讲台上说我的演说“构成一件大事。”我现在重提此事并非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说明。如果说我的演说构成一起事件的话，那只是从下面我要指出的一个角度也是唯一的角度出发而言的。我写这篇前言就是为了指出这个角度。其实，关于普希金对俄罗斯的意义，在演说中我只想指出以下四点。

第一点，普希金第一个以其具有先见之明的天才智慧和自己的纯俄罗斯心灵，发现并指出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社会最主要的病态现象，指出它从历史上就脱离了社会根基，高踞于人民之上。他指出了并且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我们的反面典型，这种人困惑不安又不肯妥协，不相信祖国的根基和祖国根基的亲和力，到头来是否定俄罗斯和自己本人（就是自己的社会、在我们祖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不愿意与别的人们共事，真诚地忍受着痛苦。阿乐哥[②]和奥涅金后来在我们的文学中又繁衍出很多像他们那样的人

① 如果我的健康允许，我希望在不久的1881年复刊《作家日记》。

② 或译亚历克，是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的主人公。

物，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毕乔林、乞乞科夫、拉夫列茨基、[①]保尔康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的人物）之类的人物以及其他很多人物，这些人物的出现就足以证明普希金最初提出的思想是正确的。荣耀属于他，属于他那恢弘的智慧和天才，他指出了伟大的彼得大帝改革后形成的我们社会的沉疴。我们借助他的高明诊断才发现，才认清了我们的病症。仍然是他，是他第一个使我们得到慰藉。这是因为他同时也给了我们巨大的希望，他指出这种病症还不是致命的，如果俄罗斯社会接受人民的真理，俄罗斯社会就能够被治愈，能够重现生机，能够苏醒。

第二点，他是第一个为我们塑造了俄罗斯的美这种艺术典型的人（真正是第一个人，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人），俄罗斯的美直接源于俄罗斯精神，寓于人民的真理，寓于我们的土壤之中的美，这些典型就是他发掘出来的。一系列典型都在证明这一点，诸如，塔季扬娜这种不受外来谎言影响的地道俄罗斯女性的典型；还有像《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写编年史的修士等一些历史人物的典型；又如《上尉的女儿》和他的诗歌、故事、札记，甚至是《普加乔夫暴动的故事》这些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形象所体现的日常生活中的典型。应该特别强调的主要之点是，所有这些体现俄罗斯人的高尚的美和俄罗斯人的心灵的典型完全取自于人民的精神。这里还应该把全部真实讲出来，这就是，普希金不是在我们当前的文明中，不是在所谓“欧式”教育（我在这里顺便指出，我们从来就未曾有过这种教育）中，不是在从表面上掌握的欧洲思想和形式的怪胎中看到

① 上述三个人物分别为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的主人公。

这种美，而纯粹是从人民的精神中发现这种美的，而且仅仅是在人民的精神中。我要再说一遍，这样一来，指出了病症，也就指明了伟大的希望："要相信人民的精神，只能从人民那里期待拯救，并且定会得到拯救。"只要深刻领会了普希金，就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三点，我想要指出的普希金意义的第三点就是，他极具特色的、除他之外任何地方与任何人都没有的那种艺术天才的特征——即他对全世界的事情都有敏锐的、能产生共鸣感受的才能，最充分地重现其他民族天才的才能，而且重现到了差不多是完美无缺的地步。我在我的演讲中说过，在欧洲有一些非常卓越的世界艺术天才，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席勒这类人物，然而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看不到这样的才能，只有在普希金的身上我们才能看到。这里不单单是一个敏锐感受的问题，而是重现之完美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很明显，在评价普希金时我不能不指出正是作为他的天才最突出特点的这种才能，在全世界所有的艺术家当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使他有别于所有其他那些艺术家。我不是为了贬低莎士比亚和席勒这些欧洲天才的巨人才说这些话的，只有蠢货才能从我的话中得出这种愚蠢的结论来。我对莎士比亚刻画的雅利安族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典型和他们的全世界的普遍性、易于理解的特点及其无穷的深度我没有稍许怀疑。如果说莎士比亚把奥赛罗塑造成为一个地道的威尼斯的摩尔人，而不是英国人，那也只是赋予他当地民族特点的鲜明色彩，这个形象的世界意义依然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因为在这个意大利人的形象上莎士比亚说出了他本来想要说的话，而且表达得同样有力。我再次声明，我在指出普希金善于重现其他民族的天才人物的卓绝才能时，并不是想贬低莎士比亚和席勒的世界意义，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才能和

这种才能的完美表现说明伟大的，对我们来说是预示性的启示。

第四点，这种才能完全源自我们人民的精神，因此普希金正好在这方面是最最具有人民性的诗人。这种才能完全是俄罗斯的、民族的才能，普希金也不过是与我们的全体人民分享了这种才能，作为完美无缺的艺术家，他也是这种才能的完美无缺的体现者，至少在自己的活动中，在艺术家的活动中是这样的。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内心里就蕴涵着这种对世界事物的敏锐感受和宽容一切的天性，这种天性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的整整二百年当中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来。在指出我们人民的这种才能时，我同时不能不指出这一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我们未来的巨大欣慰，这是照耀着我们未来的、伟大的、伟大无比的希望。主要是，我指出了我们想要变成欧洲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种种迷误和偏颇，从根本上讲不仅是自然的与合理的，而且还是有人民性的，与人民精神本身所追求的完全是一致的，而归根结底当然是有其最高目的的。在一篇简短的、十分简短的讲话中当然不可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不过，我认为，至少我已经讲出来的话是清楚的。没有必要、也用不着对我说的话感到愤慨，我说的是“我们这块贫瘠的土地可能终归有那么一天会对世界做出贡献”。在向世界做出贡献之前，“自身应该在经济上、科学上和公民道德上先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想象对欧洲各国人民这样完美（似乎是这样）的机体做出‘贡献’”，反复说明这一点也是可笑的。我在讲话中强调说明，我并不打算把俄罗斯人民同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西方各国人民相提并论。我要说的仅仅是，俄罗斯的心灵、俄罗斯人民的天才在所有的民族中可能是最善于把全人类团结一致、与全人类情同手足的思想，把宽恕敌人、识别并且谅解不一致的事物、化解矛盾等清醒观点汇集于自身的。这不是经济特点，也不是其他特点，这完全是道德方

面的特点,难道有谁能够否认,能够反驳说俄罗斯人民没有这种特点吗?有谁能够说,俄罗斯人民不过是固守陋习的群众,他注定了只能为高踞于我们人民之上的欧洲派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昌盛与发达效力,群众自身所有的只是一成不变的惰性,对他不应该有任何期待,对他根本不应抱任何希望?不错,很多人都这样断言,然而我却冒险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我再次声明,我当然不能有根有据地全面论证我自己所说的这种思想,即“我的这种幻想”,然而我却不能不把这种幻想说出来。断言我们这块贫瘠的、混乱无序的大地在经济方面和公民道德方面没有达到西方那样程度之前不可能有什么高尚的追求,这纯系荒唐无稽的言论。精神方面的基本的道德财富,至少从自己的基本素质上说,是不取决于经济力量的。我们这块贫瘠的、混乱无序的大地除开自己的上层之外,整个大地俨然如同一个人。这块大地上所有的八千万居民是一个精神上的整体①,不言而喻,这样的整

① 关于俄国的“八千万居民是一个精神上的整体”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俄国文学论丛》(1861)中就已阐述过。他在1876年和1877年的《作家日记》的文章中认为俄罗斯人对斯拉夫民族反抗土耳其的战争的态度就体现出俄罗斯人民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争论和反驳。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瓦·沃龙佐夫(1847—1918)发表文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援用八千万俄罗斯人民了(确实是俄罗斯人民,因为谈的是俄罗斯的人民性的特征)。但是八千万(现在已经是九千万或者九千多万)是俄罗斯帝国的居民的数字,根本不全是满怀理想的俄罗斯人民,在这八千万或者九千万人中除俄罗斯民族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民族。据说俄罗斯人本身只有三千五百万。”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康·卡维林(1818—1885)的反驳:“我建议民族学家和统计学家从这个数目中减掉二千万或者二千五百万;在其余那五千五百万或者六千万人里面确实存在着惊人的团结一致,但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团结?种族的、宗教的、国事的以及语言的,确实如此;至于从道德和觉悟的意义上说的精神团结,那就值得争论了。”

体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从而可见，只凭这一点就不能说我们这块大地是混乱无序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甚至不能说我们的大地是贫瘠的。相反，在欧洲，在积累了那么多财富的欧洲，所有欧洲各个民族的整个公民基础都从根底上被挖空了，说不定明天就会坍塌，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将是某种闻所未闻的新东西，与从前毫无共同之处。而欧洲积累的全部财富也不能挽救它，使它免于衰败，因为“财富也会在一瞬间就消失的”①。其实人们把这个，就是把他们这个根基被挖空的，染了病的公民制度作为应该追求的理想指给我们的人民，说人民只有在实现这个理想之后才有资格向欧洲嘟囔点什么自己的意见。我们则认为，就是在我们目前这种经济贫困的情况下，甚至还不如现在的贫困情况下，我们的人民也能够容纳、孕育充满爱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甚至是在拔都入侵之后，或者是混乱时期的大浩劫之后的那种贫困情况下都能保存、容纳这种精神力量，那个时候，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得到拯救完全是靠了团结一致的人民精神。最后，如果说为了取得热爱人类与团结一切的心灵这种权利，为了获得不因为其他民族与我们不同而仇恨他们的禀赋，为了不想达到自己一个民族独享一切，把其他民族视为只供榨取汁液的柠檬的目的（在欧洲岂不是就有具有这种精神的民族！）而固守自己的民族优于所有其他民族的成见，我再说一遍，如果为了达到上述这一切，难道真的就应该首先变成富裕的民族并且搬用欧洲的公民社会机制？如果确实必须这样做，那么说，我们岂不还是要奴颜媚骨地照搬这种欧洲机制（在欧洲明天即

① 引自《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18 章关于巴比伦的毁灭的典故。原话为：“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

将崩溃的制度）？难道在这方面就不准许俄罗斯人按照自己的民族方式发展，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而是一定不能有自己的特点，只能俯首贴耳地模仿欧洲？那么还要俄罗斯的头脑做什么？这些先生们知道什么是头脑吗？还要侈谈自然科学呢！两年以前，有位交谈者曾就这个问题对一位狂热的西方派人物说："人民是不允许这样做的。"这位西方派人物则不动声色地傲慢地回答说："那就消灭人民！"这位西方派人物不是一位随便什么人，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笑话是真实的。

我以这四点阐明了普希金对我们的意义，我再次重申，我的讲话引起了反响。讲话不是由于自己的功绩而引起反响的（我强调这一点），也不是由于讲话的才能（在这点上我同意我的所有反对者的意见，我不吹嘘），我敢说，这是由于讲话的真诚，还由于我所举出的事实是不可辩驳的，尽管我的讲话是简短的，没有充分展开。但是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所说的那种"大事"表现在哪里呢？这就是斯拉夫派，或者是所谓的俄罗斯派（上帝啊，我们居然有"俄罗斯派"！）在与西方派妥协方面迈出了巨大的、可能是决定性的一步；因为斯拉夫派宣布承认西方派向往欧洲是合理的，甚至承认西方派的最热忱的追求和结论也是完全合理的，以我们的纯俄罗斯人民的追求，即与人民的精神一致的追求来证明这种合理性，以历史的必要性和历史的必然性说明他们的追求是正确的，所以，归根结底，从结果上说（如果在某个时候会做出这种总结的话），这就意味着西方派为俄罗斯大地及其精神的追求所做的事情与所有那些纯俄罗斯人所做的事情毫无二致，这些纯俄罗斯人真挚地热爱祖国大地，可能，至今还有些人过分痴情地保护它免受"俄罗斯的外国人"的各种引诱的影响。最后声明说，两个

派别之间的全部蠢事和他们之间的凶恶争吵至今也都不过是一场大误会。这大概就是可以成为所谓“大事”的事，因为斯拉夫派的代表们在我讲话之后，当场立刻就表示完全同意讲话的全部结论[①]。我现在也声明，其实我在讲话中已经声明过了，迈出这新的一步的荣誉（如果真诚的和解愿望是一种荣誉的话），也可以说，这番新的言论的功绩根本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全体斯拉夫派，属于我们这个“派”的整个精神和追求的。我的声明还要说的是，对于不偏不倚地观察斯拉夫派的人来说，这一点向来就是明白无误的，我在讲话中所提到的思想如果不是有的人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论过的，那也是他们已经指出过的，我不过是能够及时抓住机会。现在就再说说结论。西方派如果接受我们的结论，同意这个结论，那么，当然，两派之间的全部误解确实就消除了，这样一来，正如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所说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因为从此一切都澄清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当然，我的讲话或可算作一次“事件”。哎，不过“事件”这个词仅仅是出自一个方面的真诚愿望，而它是否会为另一个方面所接受，而不只是一个理想，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时，同拥抱我、同与我握手的斯拉夫派人士在一起，就是在主席台上，我刚一离开讲台，西方派人士也立即走到我面前跟我握手，这可不是他们中间的随便什么人物，而是西方派的先进代表[②]，在他们间起首要作用的人物，尤其是现在。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演说之后，伊·阿克萨科夫表示：双方都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论，所谓斯拉夫派的代表们，例如我本人，以及西方派的代表们，例如伊·屠格涅夫，都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

② 指伊·谢·屠格涅夫与批评家帕·瓦·安年科夫（1812—1887）。

他们也像斯拉夫派人士那样热烈、真诚地同我握手，说我的讲话是绝妙的高见。但是，我担心，实在是担心，这句话会不会是在激动时刻“脱口而出”的！噢，我不是担心他们收回关于我的讲话是绝妙高见的看法，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的讲话并非什么绝妙高见，我丝毫也没有因这些赞扬而陶醉，所以我由衷地谅解他们对我的绝妙高见的失望。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倒是可能的，西方派人士稍加思索之后可能会讲出这样的话（注意：我指的不是那些与我握手的人，我现在只是一般地就西方派人士而言，我要强调这一点），啊，西方派人士可能会说（请注意：只是“可能”，“可能”而已）：

啊，经过长期争论和磨擦之后你们终于还是同意了我们向往欧洲的愿望是合理的，正常的，你们承认了在我们这方面也有真理，你们放下了你们的旗帜，好吧，我们很高兴接受你们的坦诚，我们即刻就告诉你们，从你们这方面来说，这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起码表明你们是有些智慧的。其实，除开我们中间那些我们不愿意、也不能对之负责的最愚钝的人之外，我们从来也不否认你们的智慧，但是……这里，请看，又出现一点新的问题，必须尽快把它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设想，即你们的结论是说，我们所追求的好像是与人民精神相吻合的，是受人民精神的神秘指引的。在我们看来，你们这种设想依然是很成问题的，因而我们之间的和解就又成为不可能。你们知道，指引我们的是欧洲，欧洲的科学和彼得大帝的改革，绝不是我们的人民精神，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道路上没有遇见过、也没有嗅出过这种精神，刚好相反，我们把它抛在后面，然后就赶紧离开它。我们一开始就独立走自己的道路，根本就没有遵循俄罗斯人民的什么天性去追求对全世界的敏锐感受和全人类的普遍团结，总之，不是追求你们现在喋喋

不休地谈论的一切。由于现在已经是完全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的时代，我们同从前一样在俄罗斯人民身上看到的只是因循守旧的群众，这种群众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相反，他们在阻碍俄罗斯向着更好的进步的方向发展，必须对这些群众进行重新塑造，进行改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顺理成章地进行这件事，那么，最低限度也要硬性地进行，就是说干脆一劳永逸地迫使俄罗斯永远听命于我们的安排。为了做到使俄罗斯服从，就必须实行与欧洲世界毫无二致的那种公民社会结构，现在谈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的人民既贫穷又愚昧，而且历来如此，他们既不可能有自己的面貌，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我们人民的全部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鬼才知道，直到现在你们从中得出的是什么结论，只有我们才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按说，像我们的人民这样的人民应该是没有历史的，他应当怀着厌恶的心情把已有的貌似历史的东西忘掉，彻底忘掉。应该是只有我们这个知识界才有历史，人民只应该以自己的劳动、以自己的力量为知识界服务。

对不起，不必担心，也不必叫喊。我们说人民要顺从，并不是想要奴役我们的人民，噢，当然不是！请不要引申出这种结论来。我们是主张人道的，我们是欧洲人，这一点，你们是很清楚的。相反，我们想让人民逐渐地按照常规受点教育，使人民上升到我们自己的高度，把他的民族性改造成为另外的样子，在他受到教育后自己就会出现的那种民族性，从而完成我们的建筑物。我们来创办对他的教育，从曾经是我们自己的出发点的地方入手，这就是说，把教育建立在由他自己否定自己的全部过去的基础上，应该由他诅咒自己的过去的基础上。我们一旦教会来自人民的人识了字，立刻就迫使他体验欧洲，立刻就开始以欧洲诱导他，即便是以欧洲文雅的生活方式、礼

仪、衣着、饮料、舞蹈熏陶他，总之，迫使他以自己古老的树皮鞋和克瓦斯为耻，以自己的古老歌谣为耻，虽然在这些歌谣中也自有它的优美动听之处，但是我们还是要迫使他唱歌剧里面那些有韵律的诙谐插曲，无论你们对此如何气愤。总之，为了这一高尚目的，我们千方百计，动用一切手段，首先在性格这根脆弱的琴弦上下功夫，在过去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到那时候人民就成为我们的人民。他将为自己的过去感到羞愧，诅咒过去。谁诅咒自己的过去，谁就是我们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公式！当我们要想把人民提高到跟自己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运用这个公式。假如人民表明他无力接受教育，那就——“抛弃人民”。因为那时就看清楚了，我们的人民是一无可取的野蛮群众，应该迫使他只能服从。因为那时别无他法，真理只在知识分子和欧洲的手中。你们那里虽然有八千万人民（似乎这正是你们要炫耀的），但是所有这千百万人首先应该为这个欧洲的真理服务，因为此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真理。别拿千百万这个数量来吓唬我们。这就是我们一贯的结论，只不过现在说得最明确，我们是要坚持这个结论的。我们不能由于采纳了你们的结论就跟你们一起去谈论诸如 le Pravoslavié①，及其他某些所谓有特殊意义的奇谈怪论。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要求我们这样做，虽然你们没有这样要求，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当欧洲和欧洲科学的最新成就从整体上说就是无神论，文明的和人道的无神论，而我们则不能不跟着欧洲走的时候。

因此，您的讲话中夸奖我们的那一半，看来，我们是同意接受的，自然有所保留，也只能这样，我们这也是出于礼貌。

① 法文：东正教。

可是另外那一半，就是涉及你们和所有你们那些“本原”的那一半，请原谅，那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瞧，结论可能是多么可悲的。我要重申：我不仅不敢借那些跟我握手的西方派人士之口来阐述这个结论，而且也不敢借众多的他人之口做这种阐述，这些人都是西方派人士中最有教养的俄罗斯活动家，不管他们的理论如何，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有威望、受尊敬的俄罗斯公民。可那是个群体，是落伍者和被抛弃者的群体，是你们西方派群体中的中不溜的一群，是抱着思想苟延残喘的市井之徒——所有属于这一“派别”的庶民（他们可能是多如海滩上的沙子），噢，他们在那里一定会喋喋不休地说这类话的，可能已经说过不少了。（注意：比如说，关于信念，有一家刊物已经以其固有的全部机智宣布说，斯拉夫派分子的目的就是对整个欧洲实施皈依东正教的洗礼。）然而，我们要抛开这些阴暗的思想，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欧洲派的先进代表人物身上。即使他们只接受我们的结论和我们对他们的希望的一半，那就可敬可贺了，为此，我们要欣喜若狂地欢迎他们。即使他们只接受一半，哪怕是只承认俄罗斯精神的独立性和自己的个性，承认俄罗斯精神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它对博爱和普遍团结的追求，那么，到那时候就不会再有什么可争论的了，至少在基本问题上，在主要问题上是这样的。那时，我的讲话才真的堪称是一次奠基性的新的大事。最后我再重复一次，不是讲话本身构成了大事（讲话不值得这样称赞），构成大事的是伟大的普希金的庆典，庆典才是使我们团结一致的大事，是个使一切有文化的和真诚的俄罗斯人为了未来的无限美好的目标而团结起来的大事。

普希金（简论）。6月8日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学会会议上的发言

（《作家日记》，1880年，8月号，第2章）

果戈理说过："普希金是异乎寻常的现象，可能是俄罗斯精神的唯一现象。"我要补充说，还是预言性的现象。是的，他的出现对我们大家、对所有俄罗斯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预兆。普希金到来的时候恰好是我们的正确的自我意识产生的最初时刻，这是在彼得大帝改革经过了整整一百年之后，我们的社会中刚刚开始萌发我们的正确的自我意识的时刻，他的出现如同一束新的指引方向的阳光在很大程度上照亮了我们黑暗的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说普希金是一种预兆，是一种启示。我把我们伟大诗人的活动划分为三个时期。我现在不是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在此讲话，当涉及到普希金的创作活动时，我只是想阐述我关于他对我们的预兆意义这一思想和我对预兆意义这个词的理解。但我要顺便指出，我认为，普希金的创作活动的各个时期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叶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我认为它开始于诗人创作活动的第一个时期，其完成则在第二个时期。这时普希金已经在祖国找到自己的理想，以其仁爱和敏锐的心灵毫无保留地接受并爱上了它们。人们通常说，普希金在其活动的第一个阶段模仿过欧洲诗人帕尔尼[①]、安德

① 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诗集《情诗》（1778）和《小诗》（1779）遵循古典风格，又以感伤情调和真挚的感情使诗篇充满了激情，还著有抨击性长诗《新旧神祇之战》（1799）。

烈·舍尼埃[1] 与其他诗人，特别是拜伦。是的，欧洲的诗人对他的天才的开发无疑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在他的整个一生中都保持着这种影响。然而，即使普希金最初的那些长诗也不仅仅是模仿，在那些长诗中他天才的、异乎寻常的独特性就已显示出来。在模仿的作品中决不会有普希金在长诗《茨冈》中所表现的那种独特的痛苦和那么深刻的自我意识，而《茨冈》这首诗我认为还是属于他创作活动第一个时期的作品。如果他是单纯模仿，便不会表现出那么强的创造力和那样急剧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必说了。在《茨冈》的主人公阿乐哥的形象中就已经表现出深刻的、令人信服的纯粹俄罗斯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在《叶夫盖尼·奥涅金》中得到充分和完美的体现，在《奥涅金》中差不多就是同一个阿乐哥，但已不带幻想的色彩，而是在真实可感和易于理解的形式中出现。普希金在阿乐哥的身上找到并且英明地指出了祖国大地上的一种不幸的漂泊者[2]，这种漂泊者是我们这个脱离人民的社会中历史注定必然要出现的历史性的俄罗斯受难者。普希金发现了他，当然不仅仅是靠拜伦发现的。这个典型是真实的，概括得准确无误，这是由来已久的、长期植根在我们俄罗斯大地上的一种典型形象。俄罗斯这些无家可归的漂泊者至今仍在继续游荡着，看来，他们还长期不会消失。如果说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到茨冈的部落去，不再到粗野独特的茨冈人的生活习俗中去寻找自己

---

① 安德烈·舍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曾赞同法国 1789 年的大革命，后暴露出“温和派”的政治立场。最后被判为“人民敌人”，送上断头台。主要诗集有《悲歌集》、《牧歌和田园诗集》等。

② 指流亡或侨居国外的，诸如赫尔岑、屠格涅夫等人；也指与社会格格不入、不能有所作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如奥涅金等多余人。

的世界理想，不再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寻求宁静，去摆脱我们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社会的荒诞不经的生活，那么他们终归还是要沉湎于阿乐哥那个时代还没有的社会主义，怀着新的信念走向另外的田野，在那块田野上忘我地劳动，像阿乐哥那样，相信通过自己的不切实际的行动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仅达到自己个人的幸福，而且达到全世界的幸福。因为俄罗斯的漂泊者为了获得内心的宁静，需要的正是全世界的幸福。降格以求他是不会同意的，当然，目前这还只是理论上的问题。这依然是同一个俄罗斯人，不过是出现在不同的时代而已。我再说一遍，这个人恰巧出生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的第二个百年之初，他来自脱离人民和脱离人民力量的我们的知识分子社会。啊，数量众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当时在普希金的时代，正如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过去和现在都同样温顺地在官府衙门、铁路、银行供职，或者干脆以各种不同的手段赚钱，也有些人从事科学活动，在课堂上教书，所有这一切都干得循规蹈矩，不慌不忙，心平气和，拿着薪俸，玩着纸牌，根本没有往茨冈人的部落或者与我们的时代更相称的任何地方跑的念头。最多不过是跟“欧洲色彩的社会主义”调调情，不过这种社会主义已经被赋予某些温和的俄罗斯特点，其实，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至于说一个人还没有感到内心不安，而另外一个人却已经跑到了紧闭的大门前并且重重地一头撞在大门上，这也算不了什么问题。假如不走上恭顺地与人民相联系的拯救道路，那么到时候所有的人将会遇到同样的结果。即便不是所有的人都碰上这种情况，只要有某些“精英”，哪怕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感到不安，这就足以使其余大多数人因为他们而失去安宁。阿乐哥当然还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的忧伤，在他的身上一切似乎还都是抽象的，他不过是向往大自然，不满上流社

会，追求世界性的抱负，为在某地被某人丢失了的真理、他又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的真理而悲泣。这里面多少有点让雅克·卢梭的情调。这真理是什么，它可能在什么地方，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确切地是在什么时候被丢失的，当然，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他的痛苦是真实的。一个耽于幻想而又性情急躁的人目前主要是渴望从外界得到解救，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据说，真理存在于他自身之外，可能，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例如，在具有牢固的历史制度和已经确立了稳定的社会与民众生活的欧洲国家。"他永远也不能理解，真理首先存在于他自身之内，可是他又如何能理解这一点，实际上他在自己的国家里就不知所措，他已经整整一个世纪脱离了劳动，没有文化，如同贵族女学生一样，是在禁锢的围墙里面长大的，俄罗斯有文化的社会被划分为十四个品级[1]，他就是根据自己所属的等级而履行莫名其妙的义务。他现在只不过是被连根拔出的、随风飘荡的一棵小草，他已经体验到这种处境并为此而痛苦，常常为此忍受折磨！他可能身为世袭贵族，甚至多半还拥有农奴，由于自己贵族的放荡不羁，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幻想而迷恋上一伙"没有法律"而生活的人，一时间在茨冈人的屯宿地耍起狗熊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可以理解，女人，按照一位诗人的说法，即"野性的女人"[2] 最适宜于给他解脱苦闷的希望，于是他便怀着轻率的、然而却是炽烈的信念投向了真妃儿[3]："他说，这就是我的出路，可能，我的

① 俄国在彼得大帝时把官吏分为十四个品级。

② 此词可能是借用诗人雅·波隆斯基（1819—1898）的话。波隆斯基在《关于列·尼·托尔斯泰最新的中篇〈哥萨克〉（致〈时代〉杂志编辑部）》一文中有这样的话："我也到过高加索，自己也曾体验过对半野性的女人的激情……"

③ 或译真菲拉，普希金的《茨冈》中的女主人公。

幸福就在这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远远离开上流社会的没有文明和律法的人们中间！”结果竟然是，自己同这个粗犷的大自然环境刚一发生冲突便经受不住考验，他双手沾满了鲜血。这个可怜的幻想家不仅对全世界的和谐是不中用的，即使对茨冈人来说也是没有用处的。于是他们便把他驱逐出去，并不向他施加报复，也不怨恨，郑重而朴实地对他说：

离开我们吧，骄傲的人哪。
我们是野蛮人，没有律法。
我们不难为你，也不惩罚你。①

当然，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是“骄傲的人”这一点却是真实的、精当的概括。这种人在我们这里是普希金第一个发现并概括出来的，这是必须记住的。真的是稍一不遂他的意，他便由于自己受了委屈而凶狠地折磨人，惩罚人，或者更为得心应手的，也许是这样（因为这是发生过的），一想到自己是属于十四个品级中的一个品级的人，便大声疾呼地向对人施加折磨惩处的法律求助，只是为他个人受的委屈进行报复。不，这部天才的长诗不是模仿！这里已经提出按照人民的信仰、人民的真理解决问题，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的俄罗斯方式，这便是：“驯服吧，骄傲的人，首先放下自己的傲慢。驯服吧，无所事事的人，首先要在故土上耕耘。”这是按照人民的真理、人民的智慧解决问题的方式。“真理不在你身外，而在你自身；要到自己的内心去寻找自己，使自己服从自己，掌握自己，你

① 引诗据冯春译：《普希金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下同。

就会看到真理。这真理不是存在于万物之中，不是在你身外，也不是在海外的某处，首先在于你的自我修养。你战胜自己，驯服自己，从而你也就自由了，这是你从来没有过的，也没有想到过的，你的伟大事业就从这里开始，你能使别的人们也成为自由的人，你也就会看到幸福，因为你的生活将会充实起来，最后，你一定会了解自己的人民和人民的神圣真理。如果首先你自己不配享有世界和谐，你为人狠毒高傲，你要求毫无代价地得到生活，甚至不认为获得生活需要付出代价，那么无论是在茨冈人那里，还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世界的和谐。”在普希金的长诗中就已经突出地提出了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叶夫盖尼·奥涅金》这部已经不是虚构，而是生动真实的长诗中这种解决办法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在这部长诗中普希金以前所未有、在他之后也未必会有的那种创造力和完美程度展现了真正的俄罗斯生活。

奥涅金来自彼得堡，必定是来自彼得堡，在长诗中无疑必须是这样的，普希金也不可能忽视自己主人公身世中这一突出的真实特点。我还要再重复一遍，这还是那个阿乐哥，特别是后来他苦闷得呼喊的时候：

为什么我不是图拉的陪审官，
患了疯瘫长卧在病床上？

不过现在，在长诗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半个花花公子和上流社会的一员，他的生活经历还太少，还不至于对生活彻底失望。但是——

神秘的苦闷这个高尚魔鬼[1]

已经开始光顾他，搅扰他。

在自己祖国的穷乡僻壤和心脏，他自然都不会称心如意，感到不是在自己家里。他不知道，他在这里应该做什么，感到自己像是在自家做客。后来，他怀着乡愁在外国的土地上游荡的时候，作为一个绝顶聪明和极其真诚的人，他愈发感到就是在外国，自己对自己也像陌生人。是的，他也爱祖国，但不信任祖国。当然，关于祖国的理想他也听说过，但并不相信。他相信的只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根本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他以忧郁的嘲讽目光看待相信这种可能性的人，这种人在那个时候同现在一样，是很少有的。他枪杀了连斯基只是出于忧郁症，谁知道呢，也许是由于追求世界理想而患上的忧郁症，大概就是这样，这太像我们俄罗斯人了。塔季扬娜[2] 可不是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坚强地牢固站在自己的立足点上的人。她比奥涅金深沉，当然也比他聪明。她只是凭着自己善良的本性就预感到真理在哪里，什么是真理，长诗的结尾就说明了这一点。普希金如果把自己的长诗题名为塔季扬娜而不是奥涅金，也许更恰当些，因为塔季扬娜是长诗的无可争议的主要人物。这是个正面的典型，而不是反面的典型，这是正面的美的典型，是俄罗斯妇女的赞歌，在塔季扬娜与奥涅金最后一次相会的著名场面中，诗人让她说出了长诗的思想。甚至可以说，俄罗斯妇女如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 1845 年写的一首诗。大意是：有时愚钝的人也陷入忧郁，“神秘的苦闷”这个高尚的魔鬼在他那俗不可耐的脸上堆起皱纹。

② 普希金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的女主人公（或译为塔吉娅娜等）。

此优美的正面形象，除开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丽莎的形象，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几乎再没有重现过。但是奥涅金的傲慢使他在偏僻的乡村第一次遇见塔季扬娜时，丝毫没能透过这个天真纯洁、一见面就在他跟前羞羞答答的姑娘的纯朴形象了解她。他没有能够在这个可怜的姑娘身上发现无以复加的完善和美德，可能，他当真把她看成了“道德的萌芽”。她竟然是道德的萌芽，这还是在她给奥涅金写信之后！如果说在长诗中有的人是道德的萌芽，显然这个人就是奥涅金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的确，他完全不可能理解她。难道他了解人的心灵吗？这是一个抽象的人，一个终生不安的幻想家。后来，在彼得堡，当他在写给塔季扬娜的一封信中，用他的话说，是“以心灵理解了她的整个完美”的时候，他也没有透过这位贵妇人的形象理解她。用心灵理解不过是一句空话，在他的生活中她擦身而过，他没有理解她，也没有把她放在心上，他们的爱情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啊，假如当时在乡村，他初次遇见塔季扬娜时，恰尔德·哈洛尔德① 或者甚至是拜伦勋爵本人也从英国到了那里，发现了塔季扬娜羞怯的、纯朴的美，并向他指出了这种美，唉，奥涅金立刻就会被震撼得惊讶不已，因为在这些世界受难者们的身上，有的时候精神上的奴性太多了。不过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于是这位世界和谐的追求者对塔季扬娜进行了一番说教，所作所为总还算是很正直，然后就无视她的存在，怀着自己的世界性的苦闷，手上沾着由于愚蠢的愤恨而流下的鲜血，到祖国各地游荡去了。他还因为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而大声诅咒：

① 叙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1808—1818）的主人公。

我年轻，精力很旺盛，
我等待着什么？苦闷，苦闷！……

塔季扬娜明白了这一点。在诗体小说中，诗人以不朽的诗句描绘了她去走访这个使她感到奇特和神秘的人的住所时的情景。这些诗句的艺术性、无与伦比的美和深度我就不说了。她进入他的书房，翻阅他的书籍和物品，极力从这些东西上揣测他的内心境界，解开自己的谜，“道德的萌芽”终于沉思起来，她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和解开谜团的预感，双唇发出轻轻的低语：

他会不会是个拙劣的仿造品？

是的，她应该说出这句话来，她猜对了。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他们在彼得堡重逢的时候她就完全理解他了。顺便说一句，有人曾说，上流社会和宫廷生活腐蚀了她的心灵，她之所以拒绝奥涅金，部分原因不正是她的贵妇人地位和新的社交观念吗？不，事情并非如此[①]。不，她还是原来那个达尼亚，还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塔季扬娜的评价与别林斯基早在评论普希金的第九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的发挥。但在如何评价两人最后相会时的塔季扬娜这一点上，两人却有分歧。别林斯基认为，塔季扬娜向奥涅金做最后表白的场面表现出“内心丰富的俄罗斯女人的全部本性”，表现出感情的真挚、纯洁和坦率。但是俄罗斯女人引以为荣的“美德却掩饰着对社会舆论的奴性的恐惧”，她只要置身于“上流社会，这个社会的舆论对她来说就永远是金科玉律”。后来，皮萨烈夫在争论中则特意尖刻地批评她，说她“……为了恪守上流社会的要求而拒绝奥涅金，同时却又蔑视所有那些陈规陋（转下页）

是从前那个乡间的达尼亚！她没有堕落，相反，她因为奢华的彼得堡生活而心情郁闷，感到压抑和苦恼；她厌恶自己的贵妇人地位，谁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她，那就是完全没有明白普希金想要表达的观点。这就是她果断地告诉奥涅金的话：

> 但是已经把我嫁给了别人，
> 我将一辈子忠实于他。

她正是作为一个俄罗斯妇女才说出了这样的话，在这句话里蕴涵着对俄罗斯妇女的赞美。她说出了长诗的真谛。嗯，关于她的宗教信念、她对婚姻的神秘性的观点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不，我不涉及这个方面。但这又如何解释她虽然对他说了“我爱您”，可是她却拒绝跟他走，难道这是因为她“作为俄罗斯妇女”（而不是南方的女人或者法国女人[①]）没有勇气迈出大胆的一步，没有力量扯断自己的羁绊，没有决心牺牲荣耀、财富、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这些诱人的魅力和美德规范吗？不，俄罗斯妇女是勇敢的。俄罗斯妇女相信什么，她就勇敢地

（接上页）习；她既蔑视所有那些陈规陋习，却又从早到晚循规蹈矩”，“我厌恶上流社会，然而我要毫无保留地遵循它的一切要求”。

① 同时代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是暗指屠格涅夫的亲密女友、法国女歌唱家波丽亚·维亚尔多（1821—1910），她是西班牙人。俄国著名生物学家克·季米里亚泽夫（1843—1920）在《科学和民主》（1920）一书中记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讲演时，“屠格涅夫正坐在讲台旁边和善地注意倾听演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瞪着不怀好意的小眼盯着屠格涅夫说：‘塔季扬娜之所以会说：我已经嫁给了别人，我将一辈子对他忠实，因为她是俄罗斯女人，而不是什么法国女人或者西班牙女人。’”

去追求它，她已经证实了这一点[①]。但把她“嫁给了别人，将一辈子忠实于他”。她忠实于谁，忠实于什么呢？忠实于什么样的义务呢？忠实于这位年迈的将军吗？她爱上了奥涅金，而不可能爱将军，她嫁给他只是由于“母亲曾对着我眼泪汪汪，苦苦哀求”，而在她受了委屈和伤害的心中那时只有绝望，没有一丝希望和光明。是的，她是忠于这位将军，她的丈夫，一个正直的人，爱她、尊重她和以她自豪的人。虽说母亲“苦苦哀求”她，但是，毕竟是她，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表示同意的，最后是她，她自己立下誓言要做他的忠实妻子的。她即便是出于绝望才嫁给他的，但是，现在他是她的丈夫，她的背叛将使他蒙受耻辱，使他蒙羞而死。难道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吗？[②] 幸福不仅仅是享受爱情，幸福还是最高的精神和谐。如果在身后留下不正直的、残忍的、不人道的行径，精神上如何安宁？难道仅仅因为我的幸福在那里，她就出走吗？如果这种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的，这又能够是什么幸福呢？对不起，请这样设想，您抱着最终给人们幸福、使他们得到和平与安宁的目的而亲手建造人类命运的大厦。可是您不妨再想想，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也不可避

---

① 这里说的是追随丈夫们在服苦役的西伯利亚度过二十五年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流放服苦役时，曾在途中遇到过她们。

② 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阐述的观点就是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核心。这个核心思想就是认为，以卑鄙的手段不可能达到高尚的目的，以某一个人的痛苦为代价不可能实现共同的幸福，也就是说，非人道的行为对社会和对犯罪者本人都是有害的，他以此谴责个人主义。不过，这么说未免缩小了这两部小说的内涵。在它们中还贯穿着作家的宗教思想，他对当时进步青年的看法等等。

免地要使一个人受罪，仅仅是一个人，再说这个人也算不上什么有身份的人，从某种观点看甚至是可笑的，这人不是什么莎士比亚，只是一个正直的老人，一个年轻妻子的丈夫，他虽然不了解妻子的内心，但却盲目地对她的爱情深信不疑，尊重她，以她为荣，因为有了她而幸福，而心神宁静。可是现在恰恰是要使他蒙受耻辱，使他名声扫地，遭受折磨，在这个被毁掉名誉的老人的泪水上建立您的大厦！您同意在这种条件下做这样的大厦的建筑师吗？问题就是这样。如果这座大厦，比如说，是以一个虽然无足轻重，但却受到无情的、不公正的折磨的人的痛苦为基础的，那么您能够设想，即或是一刹那间的设想，您为之建造大厦的人们自己会愿意从您的手中接受这份幸福吗？即使接受了这份幸福，能够永远都幸福吗？请问，塔季扬娜以她那样高尚的心灵、以她那颗饱经苦痛的心灵能够做出另外一种抉择吗？[①] 不，纯洁的俄罗斯心灵是要这样决定的："就让我一个人失去幸福吧，哪怕是我的不幸比这个老人的不幸要大得无法计量，哪怕到最后任何人、任何时候，包括这个老人在内，都不知道我做出的牺牲，也不知道我的牺牲的价值，但是我不要以毁灭别人而得到的幸福！"这是一场悲剧。悲剧酝酿成了，不能越轨，为时已经晚了，于是塔季扬娜就把奥涅金打发走了。人们要说，其实奥涅金也是不幸的；拯救了一个，可是断送了另一个！对不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能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始准备关于普希金的演说时就决定要突出《叶夫盖尼·奥涅金》的结尾的重要意义，他在最初的一份草稿中是这样写的："《奥涅金》的结尾：讲出了俄罗斯真理的俄罗斯女人，这就是这部俄罗斯长诗的伟大之处。"后来，又在一份草稿的页边上写道："……我在小说最后一章塔季扬娜对问题的处理上看到了长诗的思想和全部真理，可能，长诗就是为说出这个真理而构思的。"

还是长诗中最重要的问题。顺便提一句，塔季扬娜为什么没有跟随奥涅金出走，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起码是在我们的文学里是有自己的历史的，而且是相当独特的历史[①]，因此我才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这样多的议论。最独特的是，对这个问题的道德处理在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就是受到怀疑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假如说塔季扬娜的年老丈夫死了，她成了未亡人，她即使是自由了，那时她也不会跟随奥涅金走。应该理解这个人的全部实质！其实她已经看透了他是什么样的人，终生的流浪者突然看见自己从前没有看上眼的女人出现在富丽堂皇的高不可攀的新环境当中，或许，事情的全部实质就在于这个环境。现在整个上流社会岂不是都拜倒在这个他曾经几乎蔑视的小姑娘面前。上流社会，对奥涅金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他的抱负是世界性的追求，这就是他不顾一切地向她扑过去的原因，事情就是这样！他惊呼说，这就是我的理想，这就是我的救星，这就是我的苦闷的出路。我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而那时幸福似乎已经在望，它就在眼前！”正像阿乐哥从前奔向真妃儿那样，他也投向塔季扬娜，想到新的离奇幻想中去寻求自己的全部问题的出路。塔季扬娜在奥涅金的身上怎么能看不出这一点，她岂不是早已在观察他了吗？其实她清清楚楚，实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是与别林斯基评论普希金的第九篇文章进行辩论。别林斯基在那篇文章中说：“这就是女人美德的真正骄傲！但这是把我嫁给了别的人，被嫁给的，而不是自己嫁给的！永远忠实，对谁忠实，忠实于什么？忠实于亵渎女人情感和纯洁的那种关系，因为有些关系，没有爱情的关系是极不道德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演说的草稿中有这样反驳别林斯基的话：“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被嫁给了谁，嫁给了什么，而是自己嫁给了谁，嫁给了什么。塔季扬娜即使是自由了，她也不会跟着奥涅金走”，“她如果相信他，她就会跟着他走……但是，塔季扬娜相信他什么？”

际上他爱的不过是自己的新的幻想，而不是她这个跟从前一样温顺的塔季扬娜！她明白，他把她看成另外一种人，而不是本来的塔季扬娜，她知道，他爱的甚至不是她，可能，他什么人都不爱，他甚至不会去爱任何人，虽然他痛苦不堪！他爱的是幻想，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一种幻想。要知道，假如她今天跟着他走了，那么他明天就会感到失望，以嘲笑的态度看待自己昨天的痴情。他没有任何根基，只是一棵随风飘荡的小草①。塔季扬娜则完全不是那样的人，她无论是在绝望的时刻，还是在痛苦地意识到她的生活已经毁灭的时刻，她总有一种支撑她心灵的坚定不移的东西，这就是她的童年回忆，她的故乡、偏僻乡村的回忆。她的温顺和纯洁的生活就是在这些地方开始的，这就是“在坟头正庇护着我那可怜的奶娘的十字架和树荫”②。啊，这些回忆和从前的印象现在对她来说比什么都珍贵，留在她心中的只有这些印象了，但它们却拯救了她的心灵，使她没有陷入彻底绝望。这就足够了，不，这已经很多了，因为这是全部基础，是某种坚实的和牢不可破的东西。这是接触到祖国、亲爱的人民和人民的信仰的东西。可是他有什么，他又是什么人呢？她总不能出于怜悯而跟他走，仅仅是为了安慰他，

---

① 奥涅金这个人物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有无根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这个人物的人民性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1 年写的《食古不化与明达事理》一文中曾经批驳米·卡特科夫否定奥涅金人民性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奥涅金这类人物作为典型是有人民性的，是俄国社会中这样一些有教养的人物的代表，这些有教养的人物“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俄罗斯人，感到自己极难割断与祖国根基的联系，极难呼吸异邦的空气……”。在关于普希金的演说的一页草稿上还写着奥涅金也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的忧郁”。然而，接着又补充说：“他也是阿乐哥，脱离了根基的亚历克。”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引文与普希金的原文略有出入。

为了无限的爱怜而暂时赐予他幸福的幻影，况且预先就知道，他明天就会以嘲讽的目光看待今天的幸福。不，心灵深沉坚定的人是有的，即便是出于无限的同情，他们也不会蓄意让自己的神圣信念去蒙受耻辱。不，塔季扬娜是不可能跟奥涅金走的。

所以说，在《奥涅金》中，在自己这部不朽的、不可企及的长诗中，普希金是伟大的人民诗人，在他之前从来没有过像他这样的诗人。他一下子就最确切地最敏锐地指出了我们的实质的核心，指出了我们高踞于人民之上的上层社会的要害。普希金发现了俄罗斯漂泊者的典型，直到现在，直到我们今天还存在着的漂泊者的典型，他凭着自己的天才的敏感第一个认清了这个典型，认识到这个典型的历史命运和他在我们未来的命运中的重大意义，普希金还通过一个俄罗斯妇女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无比完美的典型与奥涅金并列。在俄罗斯作家中普希金当然也是第一个在自己这一时期创作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来自人民的完美的俄罗斯典型，这些典型的主要的美就在于他们的真实，可以感触到的无可辩驳的真实，因此，他们是否定不了的，他们就像雕塑一样竖立在那里。我要再提醒一次，我不是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在这里讲话，因此，我不想为了详尽阐述我的思想而对我们诗人这些天才作品特别进行细致评论。例如，关于修编年史的俄罗斯长老的形象[①]可以写成整整一本书，这样才能说明这个伟大的俄罗斯人对于我们的全部重要性和意义。普希金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发现了他，描绘了他的形象，把他铸成雕像竖立在我们面前，现在他已经永远作为具有无可争辩的谦恭而伟大的精神美的形象耸立在那里，他是人民生活的强大精神的见证，他证明人民的精神

① 指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 中的皮缅长老。

自身能够产生出无可争议的真实的形象。这个典型已经塑造出来，他存在，不能否定他，不能说他是杜撰的，说他纯粹是诗人的幻想，是理想化的典型。您自己观察一番，您就会同意。是的，可见这就是造就了他的人民精神，可见这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命力，伟大的和无限的生命力。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处处都洋溢着对俄罗斯人的信心，对他那强大精神力量的信心，既然是有信心，那就有希望，对俄罗斯人的伟大希望。

> 我毫无畏惧地正视着前方，
> 满怀着对光荣和仁爱的期望……①

这是诗人在谈到别的问题时说的话，但是他的这些话可以直接用来说明他的民族文学的全部创作活动。无论是在普希金之前，还是在他之后，从来还没有一位俄罗斯作家像普希金那样真挚而亲切地同自己的人民结合在一起。噢，在我们作家中间，不乏了解我们人民的行家里手，他们描写起人民来都那么有才华，那么贴切，那么深情，然而，如果拿他们与普希金相比，那么，说实在的，迄今为止，除开一位②，最多两位，他的后来的追随者之外，都不过是描写人民的“老爷”。他们之中最有才华的人，甚至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两个例外，都间或流露出某种高傲的东西，某种来自另一种生活和另一个世界的东西，流露出把人民提高到自己的水平并以此造福人民的愿望。在普希金的身上确实有某种真正与人民血肉相联的东西，这种

① 引自普希金的抒情诗《斯坦司》（1826）。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说的“除开一位”作家，看来指的是列夫·托尔斯泰。而“最多两位”，很可能指的是费·列舍特尼科夫（1841—1871），也可能还有尼·列斯科夫（1831—1895）。

东西在他身上几乎达到真挚动人的地步。请读读他那篇关于熊和他的农夫如何杀死熊夫人的故事①，或者，回想以下诗句：

> 亲家伊万，我们一拿起酒杯……②

您会明白我想要说什么。

我们伟大的诗人留下了所有这些艺术宝藏和艺术洞察的珍品，似乎是对未来的、在他之后即将到来的艺术家和在这块土地上未来耕耘者的指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普希金，也就没有在他之后出现的那些天才。虽然他们拥有卓越的才华，但至少他们不可能那样有力、那样鲜明地显现出来，就像他们到后来，在我们今天所表现的那样。问题不仅关系到诗歌自身，不仅关系到艺术创作，假如没有普希金，我们对我们俄罗斯的独立精神的信念，我们对我们人民的力量所抱的那种现在已经是自觉的希望，还有就是对我们在欧洲各族人民家庭中未来的独立使命的信念，对这一切的信念也许就不会以后来所表现的那种坚定不移的力量树立起来。（这种力量是后来才显示出来的，虽然这种表现不是一切人都有，只是极少数人。）只

---

① 普希金的诗《母熊的故事》(1830?)。

② 这首诗没有标题，此处引用的是首句。这首诗的内容主要是说：一拿起酒杯就会想起三个玛特廖娜，还有鲁卡和彼得，还想起帕霍莫芙娜，应该纪念这些人，于是就开始斟满酒杯，先用啤酒纪念鲁卡、彼得和几个玛特廖娜，然后用馅饼和葡萄美酒纪念帕霍莫芙娜，因为她从那过去讲故事的好手得到好多知识。那些古代东正教特有的民间壮士歌和虚构的故事、民间歌谣中的俏皮话和笑话，都包含着明达的道理，我们必须纪念这些人，现在“我”和“亲家”，把“故事讲下去”。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您会明白我想要说什么”，就是说普希金经常要写的就是上述这些内容。

要深入领会我们归于他艺术活动第三阶段的作品，普希金的伟大功绩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要再说一次，这些阶段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第三个阶段的某些作品甚至可能在我们诗人文学活动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因为普希金永远是一个完整的，可说是整合完美的机体，这个机体本身蕴含着自己的天才所需要的全部胚芽，而不必从外部获得这些东西。外部世界只能唤醒他身上那些早就蕴蓄在心灵深处的胚芽，但是这机体是在发展着，它的发展阶段确实是能够表示出来、区分出来的，能够指出其中的每一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以及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演变的渐进过程。因此，那些以着眼全世界的思想为主的作品，表现其他民族的美好形象，体现他们的天才的作品，可以归入第三个阶段，这些作品里面有一些是在普希金死后才发表的。在自己活动的这个时期，我们的诗人的表现近似某种奇迹，在他之前的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实上，在欧洲各国文学中都曾出现过诸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席勒等那样高大的艺术天才。但在这些伟大的天才当中，你可能够找出一个像我们的普希金这样对全世界的事情都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的人吗？正是普希金同我们的人民一起共同拥有这种才能——我们民族的最主要的才能，因此他才是人民诗人①。欧

---

① 19世纪60年代初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提出普希金的人民性的观点，他在《墨守成规与通情达理》（1861）一文中同米·卡特科夫和斯·杜德什金（1820—1866），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同别林斯基关于普希金的人民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在文章中对普希金的人民性的实质的理解提出了独到的解释。他认为，普希金是有人民性的，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民独具（转下页）

洲最伟大的诗人从来也没有能够像普希金所显示的那样，在自己的作品中鲜明有力地再现其他民族——可能是与他们毗邻的民族的天才，再现其他民族的精神和这种精神的全部潜在的深度及其关于自身使命的全部思考。与此相反，欧洲的诗人们在涉及到别的民族的人民性时，常常是把其他民族的人民性变为自己的民族性，并按自己的民族性去理解他们。即便是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例如他笔下的意大利人就几乎全是英国人。在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中普希金是唯一能够充分体现异族民族性特征的诗人。请看《浮士德中的场面》①，还有《吝啬骑士》和叙事诗《有一个可怜的骑士》。请再读一遍《唐璜》②，假如没有普希金的署名，您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不是西班牙人写的。叙事诗《鼠疫流行时期的宴会》③里面的形象是多么深刻，多么富于幻想！然而在这些幻想的形象中可以听出英国天才的声音；这是叙事诗主人公关于鼠疫的奇妙的歌，梅丽以诗句写成的歌：

（接上页）的“全人类理想”的宣示者。此后，他在《普希金、莱蒙托夫与涅克拉索夫》（《作家日记》，1877 年，12 月号）一文中更明确地把普希金的人民性与其对“俄罗斯人民的真理”的崇拜联系到一起，在他看来，俄罗斯人民的真理的内容就是全人类性、对全世界事物的敏锐感受和渴求普遍的团结。按：俄语中 народный 与 народность 有两种涵义，其一为“人民的”与“人民性”，其二为“民族的”（民族性的）与“民族性”，和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与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同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普希金为人民的（народный）诗人，是用的第二个意义，即民族诗人，但有时他也用在第一意义上。（上下文有同样用法，不再加注。）

① 指普希金的诗《浮士德中的场面》（1825）。

② 指普希金的诗《石客》（1830）。

③ 诗剧的内容源自英国诗人琼·威尔逊（1755—1854）的诗剧《鼠疫城》（1816）。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两首歌，即主席和梅丽的歌均为普希金所写。

在喧哗的学校里
听到了我们孩子的声音

这是英国的歌，这是不列颠的天才的伤感，他的哭泣，他对自己未来的痛苦预感。请回想那奇异的诗句：

有一次在荒凉的山谷中行进……①

这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转述了一本神秘奇特的书的前三页，这本书是英国古代一个宗教的宗派主义分子用散文写成的。然而，难道这只是转述吗？在这些诗句的忧伤和激昂音调中，流露出北方新教派、英国异教徒和极端神秘主义者真正的灵魂，还有那愚笨阴森和难以抑制的追求以及狂放的神秘幻想。阅读这些奇怪的诗句的时候，您仿佛就置身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时代气氛之中，对刚刚兴起的新教的那种崇尚战斗的激情您就不觉陌生了，最后，历史本身也就可以理解了，不仅仅是从思想上理解，而是如同身临其境，就像是从教派分子武装阵地边缘上走过，同他们一起高唱他们的颂歌，当他们处于神秘的兴奋状态时，与他们共同哭泣，与他们共同信奉他们所笃信的一切。顺便说一句，与这些宗教神秘主义同时出现的还有来自古兰经的宗教诗句或者《仿古兰经》②；难道这不是一个穆斯林，难道这不是《古兰经》的精神和它的剑，它的信仰的朴素威严和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指普希金的诗《漂泊者》(1835)。

② 这里指的是普希金的组诗《仿古兰经》(1824)。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把普希金的组诗理解为宗教性的诗篇，其实，引起普希金注意的是古兰经里面的鲜明形象与古兰经富于诗意的内容。

信仰的可怕的血腥力量？这里还有古代世界，还有《埃及之夜》，还有这些人间的上帝，他们作为神高踞在自己的人民之上，他们已然蔑视人民的天才和人民的向往，他们已经成为再也不相信人民的名副其实的孤独的神，由于离群索居而丧失了理智，他们以荒唐的兽行，以虫豸的淫欲，以吃掉公蜘蛛的母蜘蛛的快感来缓解自己死前的孤寂和烦恼。不，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诗人具有普希金那种对全世界事物的敏锐的、能产生共鸣的感受，这里还不仅是一个敏锐感受的问题，还有感受的惊人深度，还有重现其他民族的精神，这种重现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因而也是绝妙的，因为这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诗人的身上都不曾有过的现象。这是唯有普希金的作品中才有的现象，我要再说一遍，从这个意义上说，普希金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现象，而按照我们的说法，是一种预言性的现象，因为……因为这里也最充分地表现出他的俄罗斯民族的力量，正是表现出他的诗歌的人民性，进一步发展中的人民性，蕴含于现代之中的我们未来时代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被预示性地表现出来了。如果不是把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作为自己追求的最终目的，那么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力量又是什么呢？普希金一旦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刚一接触人民的力量，便立刻就预感到这种力量的伟大的未来使命。于是他就成为一位先知，一位预言者。

实际上，彼得大帝的改革对我们意义何在呢？这不仅仅是指未来而言，而且也是指已经存在过的，已经发生过的，已经出现在眼前的事实而言的。这种改革对我们来说意义何在呢？显然不只是说我们掌握欧洲的服装、生活习惯、发明发现和欧洲科学吧。让我们来深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仔细观察一下。是的，很可能，彼得大帝最初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着手进行改革

的，也就是说从急功近利的意义上开始的，但是到了后来，在自己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彼得大帝无疑是受到了某种潜在嗅觉的影响，潜在嗅觉在他的事业上把他引导向未来的比单纯的眼前功利无疑是更加宏伟的目标。俄罗斯人民也正是这样，他不仅仅是从功利主义出发接受改革的，无疑也是凭着自己的预感几乎立刻就感觉到某种比眼前的功利更加高尚无比的长远目标。我还是要再次重申，当然，这种感觉是无意识的，不过却是本能的，至关重要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在追求最迫切的联合，全人类的团结一致！我们不是以敌视的（似乎这是应该发生的），而是以友爱的态度，怀着满腔的爱从内心接受了别的民族的天才，全都一起接受了，并不考虑重大的民族差异，几乎是从一开始只凭借本能就会辨别和消除矛盾，谅解并调和差异，从而表现出我们自己刚刚发现和刚刚显示出来的我们的决心和意向，这就是追求伟大的阿利安人种各民族的、普遍的、全人类的联合。是的，俄罗斯人的使命必然是全欧洲的和全世界性的。要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一个道地的俄罗斯人，这可能，就意味着必须成为（归根到底，还是得强调这一点）一切人的弟兄，也可以说是普世之人。唉，所有我们这些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不过是我们这里的一场大误会，虽然说，历史地看，这个误会是必然的。对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欧洲和整个伟大的阿利安种族的命运就如同俄罗斯自身，如同自己祖国的命运一样珍贵，因为我们的命运就是世界性，这种世界性不是用剑得到的，而是靠友爱和我们致力于人们的联合这种友爱愿望的力量得到的。如果您想深入了解我们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这段历史，您就可以在我们与欧洲各民族交往的性质中，甚至在我们的国策中发现这种思想，也可以说我们的这种幻想的痕迹和标志。因为在整整两个世纪里俄罗斯在自

己的国策上为欧洲所做的事情可能远比为自己所做的还要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俄罗斯做的是什么呢？我不认为纯粹是由于我们的政治家无能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嗯，欧洲的民族还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是多么可贵！我相信，今后，我们，就是说，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不久的未来的俄罗斯人，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要做一名真正的俄罗斯人，这就是要竭力使欧洲的矛盾彻底缓解，以自己的俄罗斯心灵、全人类的和联合一切人的俄罗斯心灵为欧洲的苦恼指明出路，以兄弟般的情谊把我们所有的兄弟都铭记在心，最后，可能，按照基督福音的教义说出关于普遍的伟大和谐、各个民族的彻底友爱和谐的决定性的意见！我知道，我十分清楚，我的这些话可能被认为说得太冲动了，夸张了，不着边际了。就算是这样吧，但我并不为说了这些话而后悔。这些话是应该说的，特别是现在，在我们举行庆典的时刻，在纪念我们这位以自己的艺术力量恰恰表现了这种思想的伟大天才的时刻。其实这种思想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了，我讲的并没有任何新东西。主要的是这些话显得太妄自尊大了："这难道是我们，我们这个贫穷的、这个不文明的国家所肩负的使命吗？在全人类中难道注定要由我们来说出新的见解吗？"那又怎样呢，难道我是在说经济方面的荣耀吗，武器或者科学方面的荣耀吗？我说的只不过是人们之间的友爱，我不过是说在所有的民族中间，可能俄罗斯的心灵是注定最想追求全世界的、全人类的兄弟般团结的。在我们的历史上，在我们的有才华的人物身上，在普希金的艺术天才上我看见了这方面的迹象。即便我们的国土是贫穷的，但是，基督却走遍了这块贫穷的国土、"被奴役的国土，并且为之祝

福。”[1] 我们为什么不能听从他最后的话呢？再说，他自己不就是降生在牲畜槽里吗？我还要说，至少我们已经可以指出普希金，指出他的天才的世界性和全人类性。他已经把别的民族的天赋像自己的一样容纳到自己心中，在艺术中，起码是在艺术创作中，他无可争辩地显示了俄罗斯精神的追求所具有的这种世界性，伟大的指示也就在这里面。如果说我们的思想是幻想，那么这种幻想至少在普希金那里是有据可依的。假如他活得时间长一些，可能他会展现出我们的欧洲兄弟们已经能够理解的、俄罗斯心灵的不朽的和伟大的形象，使他们远比现在更加接近我们，可能已经向他们阐明了我们的追求的全部实质，他们远比现在对我们更为理解，开始琢磨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满腹狐疑和傲慢无礼地观察我们。假如普希金活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们之间的误解和争论可能比现在看到的较少一些。但上帝另有安排，普希金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去世了，当然，把某些伟大的秘密也带进了坟墓，我们现在就是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破解这个秘密。

---

① 这段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诗人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的诗《这些不幸的村落……》（1855）的含义而用自己的词句转述的。

吹毛求疵的挑剔。格拉多夫斯基[①]先生给我上的一堂课引出的四篇不同题目的文章。兼答格拉多夫斯基先生

(《作家日记》，1880年，8月号，第3章)

Ⅰ. 关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我本来就要以6月8日我在莫斯科发表的那篇讲话和关于这篇讲话的序言来结束我的《日记》。我写这篇序言是因为我的讲话在《莫斯科新闻》登出之后，我就预感到后来果然在我们的报刊上掀起的那阵喧嚣。但是，格拉多夫斯基先生，读到您的批评的时候，我就把《日记》的印刷停了下来，以便把对您的攻击的答复加进去。唉，我的预感被证实了，掀起了吓人的喧嚣。我既桀骜不驯，又胆小如鼠，既是玛尼洛夫[②]，又是诗人，应该把警察也找来，以便抑制公众的冲动。当然啦，是道德警察，自由主义的警察。可为什么不能是名副其实的警察呢？其实我们的真正的警察现在也是自由主义的，比起那些扯起嗓门朝着我大喊大叫的自由派分子来毫不逊色。同真正的警察确实没有多大的差别！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些，我现在就直接逐条回答您。首先我要坦率地承认，我跟您个人之间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我们是不能商量的，因此，

---

① 亚·德·格拉多夫斯基（1841—1889），彼得堡大学国家法教授，自由主义政论家与批评家。

②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他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沉湎幻想的地主。

我完全没有想要说服您或者使您改变主意。以前我阅读您的其他文章时，当然就总是对您的思路感到惊讶。既然是这样，我现在为什么还要回答您呢？唯一使我考虑的是评论我们的另外那些人，也就是读者。我是为了这些另外的人才写的。我听到、预感到、甚至还看到正在出现，正在走来一批新人，他们渴望听到新的语言；由于老一代人[①]对寄希望于俄罗斯的一切言论所持的自由主义的冷嘲热讽态度，由于老一代人从前那种自由主义的软弱无力的悲观主义，由于人们忘记掩埋了的、至今仍然视自己为年轻一代的老的僵尸的存在，由于在我们这里作为俄罗斯的领袖与救星而存在了二十五年的老自由派分子，最后，用俗话说，竟然显得像一个“在集市上胡乱吆喝的叫卖者”，由于这一切他们感到苦闷迷惘。总之，除开回答您的指责之外，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因此，我现在对您的回答可以说是借题发挥。

您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甚至责备我为什么不说得清楚些我在自己的讲话中提到的我们那些“漂泊者们”的来历[②]。噢，说起来话就长了，需要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何况在这个问题上我无论如何回答，你们都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关于这些漂泊者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如何形成的，你们早已胸有成竹了：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老一代人”是指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派，他把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都包括在内。

② 这句话是针对格拉多夫斯基的一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问说：“在普希金塑造的典型阿乐哥和《谁之罪?》、《罗亭》等作品的作者们卓越地刻画的那些‘漂泊者’典型之间的历史联系，最初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发现的，不能不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一大功绩。然而，这些脱离人民的‘漂泊者们’、受难者们是如何产生的？这还是有待说明的。”

"由于同斯克伏慈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①] 之流生活在一起而感到苦闷，还由于当时农民尚未获得解放，作为公民而感到痛心。"一般说来，这是与当代自由派人士相称的结论，在这种人士的眼里，凡是涉及俄罗斯的一切早已都以唯独俄罗斯人才具有的那种异乎寻常的轻率精神解决了，做出结论了。尽管如此，无论你们的最终结论如何，这个问题还是比你们想象得更复杂，复杂得多。我要就"斯克伏慈尼克之流和悲哀"的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但是，首先请允许我举出你们的一段非常有代表性的话，同样是轻率地，几乎是信口开河地说出来的话，这种话我是不能置若罔闻的。

> 无论如何说，我们处在欧洲教育的影响下已经两个世纪了，由于俄罗斯人"对全世界的敏感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称之为我们的民族特点），这种教育对我们的作用是异常强大的。要想摆脱这种教育，我们是无处可躲的，再说也没有这种必要。这是我们怎么也无法抹煞的事实，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想要成为有教养者的俄罗斯人，由于俄罗斯的营养空空如也，必须从西欧的营养中获取这种教育。

这话当然是顺口说出的，但是你们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词：教育。那么请问，你们这个词指的是什么：西方的科学，有益的知识、技能，还是精神教养？前一部分，也就是科学和技能，我们确实不应该忽视，我们也真的摆脱不开它们，而且

① 果戈理的剧作《钦差大臣》中的市长，下文有时简称他为斯克伏慈尼克，有时称为德穆汉诺夫斯基。此人的名字和父称是安东·安东诺维奇。

也没有必要摆脱。我也完全同意，除开西欧这个来源我们也无从得到它们，为此，欧洲值得称赞，我们永远感谢它。然而，我所理解（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另外的理解）的教育是“教育”这个词本身直接表示的含义，是精神之光，它使人心明眼亮，开启心扉，引导智慧，指示生活道路。如果是这样，那就请允许我向你们指出，我们无须从西欧的源泉中去汲取这样的教育，因为在俄罗斯的源泉中就蕴藏丰富（而不是没有）。你们感到惊讶吗？要知道，在争论中我喜欢从最本质的问题入手，立刻就从争论的焦点开始。

我敢肯定，我们的人民很早就在以基督为本，接受他的教义之后受到教育了。人们会说，我们的人民不知道基督的教义，也没有人向他传道。这种反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民全都知道，知道正需要知道的一切，虽然他们通不过教义问答的考试。他们是在教堂学会的，他们世世代代在那里听比传道还好的祷词和赞歌。他们跟着别人重复，自己在森林里也祈祷过，在拔都入侵的时候，为了免遭敌人蹂躏，可能还祷告过“威严的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个时候他们大概就把这首赞歌记熟了，因为除基督之外，那时他们什么都没有了，而在这首赞歌中就蕴含着基督的全部真理。至于说很少有人向人民讲解教义，而教堂执事们讲话又嘟嘟囔囔，含混不清，这是自由派分子们所能臆想出来的对我们教会的最严厉的指责，同时提到的还有普通老百姓（那么旧礼仪派[①]教徒呢？上帝啊！）似乎听不懂的教会斯拉夫语这个障碍。然而教士还要走出来诵读“上

① 从俄罗斯东正教分裂出来的教派，不接受17世纪尼康的改革，反对并敌视官方的东正教会，主张保持宗教旧礼仪，亦被称为“分裂派”。

帝，我生命的主宰"[1]，而在这首祷词里则是基督教的全部实质，它的全部教义，人民对这首祷词熟悉得背诵如流。很多圣徒传他也能背诵，能叙述，他们从内心为这些故事所打动。他们所经历的基督教的主要学校就是在自己历史上遭受无穷无尽的苦难的那些年代，那时所有的人都遗弃他们，所有的人都蹂躏他们，他们为所有的人效力，而同他们在一起的则只有一个慰藉者基督，那时他们就从内心永远地接受了基督，从而基督就把他们的心灵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不过我对你们说这一切做什么呢？难道我想要说服你们吗？你们无疑会觉得我这些话幼稚，甚至不得体。不过我要再三说明，文章不是为你们写的。再说这是个重要话题，需要特别谈谈，还应该多谈一些，只要我的手中还握着笔，我就还要谈。可是现在，我只说说我的思想的基本点。如果说我们的人民由于接受了基督和基督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很早就受到启发，那么当然也就同基督一起接受了真正的教育。有了这样的基本的教育根底，西方的科学对他们来说当然只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益处。基督在我们这里不像在西方由于科学而黯然失色，其实，在西方并非像自由派所断言的那样，基督是由于科学才暗淡无光的。西方教会把教会变为罗马国家宗教[2]，并通过罗马教廷的形式再体现出来，西方教会自己从而就在科学之前扭曲了基督的形象。在西方确实已经没有基督教和教会，虽然还有很多基督教徒，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消逝。天主教的确已经不是基督教和教会，它变成了偶像崇拜，而新教则急剧走向无神论，变为摇摆不定

① 4—5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宗教活动家、作家叶弗列姆·西林创作的祈祷词的开头一句。普希金的诗《苦修的神父们和贞洁的妻子们……》(1836) 就是这首祷词内容的改写。

② 4世纪初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家宗教。

的、日常的和随机应变的（不是永恒的）说教。

噢，你们立刻就要反驳我说，基督教和崇拜基督，其本身根本不能囊括全部教育，这仅仅是一个阶段，此外还需要科学、公民思想、发展等等，等等。对此我没有什么可回答你们的，而且回答也有失体面，因为你们虽然在有的方面是正确的，例如，关于科学的方面，可是你们决不会同意如下的观点：我们人民的基督教现在是，也永远应该是人民教育的最主要的和生命攸关的基础！我在自己的讲话中说过，塔季扬娜之所以拒绝跟奥涅金走，因为她是在遵循俄罗斯的方式，遵循俄罗斯人民的真理行事，可是我的一位批评者却因为我说俄罗斯人民有真理而感到受了侮辱，立刻就用这样一个问题反问我："那么成堆的罪孽呢？"对这样的批评家们难道能够回答吗？他们感到受了侮辱，主要是因为说俄罗斯人民能够有自己的真理，从而就是说他确实受到了教育。然而难道在我们全体人民里面都有成堆的罪孽并且被认为是真理吗？全体人民都把这种罪孽当作真理吗？是的，我们的人民粗野，虽然远非全体人民都粗野，不，不是全体，在这方面我可以作为见证人发誓，因为我见到了我们的人民，我了解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相当多的年头，跟他们同吃共住，自己也"被划入歹徒行列"，跟他们一块干真正是满手磨起老茧的活，就是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些人，"双手血淋淋的人们"① 则在标榜自由主义，对人民冷嘲热讽，他们在大学讲堂上和刊物的杂文栏里武断地说，我们人民的身上有"兽性的面貌和兽性的印痕"。你们不要说

① 引文出自涅克拉索夫的诗《昙花一现的英雄》（1862），引文不确切。原文为"欣喜若狂的，信口开河的，双手沾满鲜血的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首诗是涅克拉索夫的杰作之一。

我不了解人民！我熟悉人民，我就是从人民那里重新接受了基督，并把他们铭记在心的。我还在童年时期就跟随父母知道了基督，可是当我自己也变成“欧洲的自由派分子”时[1]，就把他们丢失了。不过，就算是这样，就算是我们的人民有罪孽，粗野，就算他们的形象还像野兽。“儿子骑着母亲走，年轻的媳妇拉边套”[2]，这首歌出自何处？全部俄罗斯歌谣都取自某种往事，你们是否注意到这一点了？但是，自由派的人们，就请你们做一次公正的人吧，请想一想，人民忍受了多少世纪的苦难！请想一想，在人民的兽性面貌这件事上谁的罪过最大，这样你们就不发难了！因为农民没有在大海洋街[3] 的法国人理发店理发而怪罪他，这是可笑的。可是我们的欧化自由派人士在攻击人民，否定人民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几乎就是这种指责，他们说：人民没有形成自己的性格特征，人民没有民族特征！上帝啊，可是在西方，随便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民族内部，酗酒和盗窃莫非就少一些，难道还不是同样的野蛮，再加上残酷（这在我们的人民里面是没有的）和货真价实的愚昧无知、真正的没有教养？因为有的时候这都是与无法无天结合为一体的，无法无天已经不被看做罪恶，确切地说是被看做为真理，而不是罪恶。好啦，就算是这样，说到底就算在我们的人民里面有野蛮和罪恶这些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是无可辩驳的，这就是他们从整体上说至少（不仅仅是在理想上，而是在最名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指的是，自己曾经热衷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且曾经参加俄国秘密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② 俄罗斯民歌《小伙子走在大街上……》、《道路，我的大道……》等歌谣中常见的副歌。

③ 彼得堡的一条繁华街道，街面上有贵族富豪经常光顾的各种商店、饭店、理发馆等，苏联时期更名为赫尔岑大街。

副其实的实际中）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罪过看做真理，将来也绝不会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他们也会做坏事，但他们或迟或早总是要说："我做了错事。"假如做了坏事的人自己不说，那么别的人就会替他讲出来，真实终将呈现出来。罪恶是污秽，当阳光普照的时候，污秽就消失了。罪恶是暂时现象，基督才是永恒的。人民每一天都要干罪恶的勾当，都要干龌龊的事情，然而在美好的时刻，在神圣的时刻，他们从来也不会认错真理。人民视为自己的真理而相信的东西，依照自己的认识视为真理的东西，人民奉为自己的美好希望的东西，人民喜爱的向上帝祈求的和他们为之哭泣祷告的东西，——这些才是重要的。而人民的理想就是基督。教育当然是与基督分不开的，在自己的至关紧要的、危急的时刻，我们的人民向来都是遵照基督的精神去处理自己的共同性的、全民性的问题，并且也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们要嘲笑说："哭泣，这还不够，唉声叹气也不成，要行动，要生存。"而你们，受过教育的俄国欧洲派先生们，有很多虔诚的信徒吗？你们能够把你们用以取代基督的虔诚信徒们给我指出来吗？但是你们要知道，在人民里面是有虔诚信徒的。有积极的人物，他们具有想象不到的美和力量，你们的观察还没有接触到这些人。这些虔诚信徒和为真理而受苦受难的人就在这里，我们能否看得见他们呢？我不知道。应该看到的人当然就能看到他们，并且理解他们；谁要是只能看到兽性的形象，当然他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人民至少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人，而且确信这种人是存在的。人民因为有这种信念而坚强起来，并且深信，在普遍需要的时刻这种人总是会拯救他们的。我们的人民不是已经拯救过祖国多少次了吗？不久之前，当他们在罪恶、酗酒和无权的境地中奄奄一息的时候，一场战争，捍卫被穆斯林教徒践踏的斯拉夫人基督教

信仰的最近这场战争[1]，使他们，整个人民在精神上振奋起来。他们接受了这场战争，把战争看做是清洗自己罪恶和无权境地而作出的牺牲，他们送走自己的孩子去为神圣的事业而捐躯，他们没有叫喊卢布贬值啦，牛肉涨价啦。他们如饥似渴地探听、询问，自己也阅读关于战争的消息，在这方面我们全都是见证人，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件事的见证人。我知道自由派人士是不承认我们人民在这次战争中的高涨精神的，尤其是不承认精神高涨的原因，嘲笑这种思想，他们说，“这种下等人也配有公共的观念，这种人也配有公民情感和政治思想吗，难道这是可能的吗？”然而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欧化自由派人士如此经常地与俄罗斯人民为敌？为什么在欧洲自称民主派的人士总是站在人民的方面，起码是依靠人民的，而我们的民主派却往往是贵族，所做的事情归根结底几乎总是帮助了镇压人民力量的一切举动，结果变成为老爷行径。噢，我当然不是说他们是自觉地做人民的敌人，不过，悲剧也就在这种不自觉之中。你们要因为这些问题而感到愤慨吗？那就随你们的便吧。对我来说，这全都是一些不言而喻的道理，自然，只要我还能写能说，我就要不断地阐述和证明这些道理。

那么，我们就到此结束吧。科学，这是自不待言的事；至于“教育”，我们没有什么要从西欧的源泉里汲取的。也许我们只能汲取这样一些公众的说法，例如“Chacun pour soi et Dieu pour tous”[2]，或者是“Après moi le déluge”。[3] 噢，人们马上就要喊叫：“难道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谚语吗？我们不是也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
② 法文：“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③ 法文：“我死后，哪管它什么洪水滔天”。

说‘好了疮疤忘了痛’以及其他很多类似的警句吗?”是的，在人民中间流行着很多各种各样的俗语，因为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他们的幽默也是层出不穷的。但不断提高的意识时时在提醒他们要注意——这一切仅仅是俗语，我们的人民并不相信这些话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人民自己也拿这些话打诨取笑，从整体上说，人民对这些话是持否定态度的。可是你们敢肯定“Chacun pour soi et Dieu pour tous”这句话只不过是一句俗语，而不是在西方被人人接受，人人相信，并且被所有的人奉为座右铭的社会公理吗？至少，所有那些站在人民头上的人、统治人民的人、占有土地和无产者并且维护“欧洲教育”的人们都是这样看待这句话的。这样的教育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我们要在自己家里找到另外一种教育。科学是一回事，教育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依靠人民和人民的力量，可能，在某个时候就能使我们基督的教育焕发出夺目的光芒。你们无疑要说，这一堆冗长的空话，并非是对我们批评的回答。就算是这样吧，在我自己看来这仅仅是一篇开场白，是必要的开场白。你们在我这里，也就是在我的讲话中发现并指出了我与你们的分歧之点，也就是你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极端重要的分歧，正如你们一样，我也在你们那里发现并提出了我认为是我们之间的最基本的分歧点，妨碍我们达成一致的最大障碍。好啦，开场白到此为止，我们这就来看看你们的批评，现在就回到正题本身。

Ⅱ. 阿乐哥和杰席莫尔达[①]。阿乐哥为农奴而痛苦。笑谈

你们批评我的讲话时写道：

---

① 阿乐哥是普希金的长诗《茨冈》（1824）中的主人公。杰席莫尔达是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1836）中的警察。

普希金创造了具有否定性格的阿乐哥和奥涅金，但却没有指出他们‘否定’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断言他们否定的就是‘人民的真理’，就是俄罗斯人的世界观的根本基础，那就是极大的冒险。因为这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出来。

好啦，看得出来还是看不出来，是冒险或者不是冒险，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而首先要谈的就是你们关于德穆汉诺夫斯基们的议论（阿乐哥似乎就是为了逃避他们而奔向茨冈人的）：

你们说："的确，当时的漂泊者们的世界就是否定另一种世界的。为了说明这类典型还必须有另类典型，普希金虽然不止一次地怀着强烈的愤怒注意过那类典型，可是并没有把他们塑造出来。他的才赋的性质阻碍了他深入这个黑暗的角落，阻碍他对挤满俄罗斯住房地下室（就不是上层吗？）的三教九流人物进行精雕细琢。弥补普希金的巨大弱点的果戈理，做到了这一点。果戈理向世界揭示了阿乐哥为什么跑到了茨冈人那里，奥涅金为什么苦恼，被屠格涅夫定型化了的那些‘多余的人’是如何产生的。柯罗博奇卡、索巴凯维奇[1]们、斯克伏慈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们、杰席莫尔达们、略普金-贾普金[2]们，他们构成了阿乐哥、别里托夫[3]、罗亭[4]

---

① 柯罗博奇卡、索巴凯维奇均为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
② 果戈理的戏剧《钦差大臣》中的法官。
③ 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的主人公。
④ 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的主人公。《罗亭》的结尾场面是，在法国1848年大革命时，他手举红旗出现并战死于保卫巴黎工人居民的街垒的战斗中。

等许多人的反面。这就是背景，离开这个背景，下面提到的这些人物就是不可理解的。要知道，果戈理的这些人物都是俄罗斯人，哎嗨，可是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啊！柯罗博奇卡不知道世界性悲哀，斯克伏慈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极其善于同商人打交道，索巴凯维奇对自己的农民了如指掌，农民们对他也了如指掌。显然，阿乐哥们和罗亭们对所有这一切全然没有看到，也不理解；他们一跑了之，谁能到哪儿就到哪儿去：阿乐哥跑到茨冈人那里，罗亭跑到巴黎，为与他全然无关的事业去赴死。”

请看，他们简单地一跑了之。噢，解决得像小品文那样随便！在你们那里这一切多么简单，在你们那里一切都是现成的，早已解决了的！你们说的是现成的话，一点不差。再说，你们何苦挑起所有这些果戈理的人物都是俄罗斯人的话题：“哎嗨，可是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啊！”这与我们的争论毫不相干。其实，谁还不知道他们都是俄罗斯人呢？阿乐哥也罢，奥涅金也罢，都是俄罗斯人，我们和你们也都是俄罗斯人；而且，正如你们断言的，跑到巴黎去为与他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业赴死的罗亭也是俄罗斯人，地道的俄罗斯人。他到巴黎去为之赴死的事业对他来说，不同于对英国人或者德国人，完全不是那样毫不相干的事业，因为欧洲的事业，世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对一个俄罗斯人来说早已不是身外事了，正是因为这样，罗亭才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这正是罗亭的突出特点。罗亭的悲剧实际上就在于，他在自己的祖国没有找到用武之地，以致客死他乡，不过不像你们所说的，并不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他乡。然而问题恰恰是，所有这些斯克伏慈尼克们和索巴凯维奇们虽然都是俄罗斯人，但那是堕落的、与根基割断联系的俄罗斯人，他们虽然了解人民生活的一个方面，但对另一

个方面则一无所知，甚至想象不到还存在这个方面，即另外那一个方面，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人民的心灵，人民渴望的东西，人民祈求的东西，他们连想都想不到，因为他们极端蔑视人民。也许，离开人口普查的花名册他们甚至不承认人民是人。你们说："索巴凯维奇对自己的农民了如指掌。"这是不可能的。在索巴凯维奇的眼中，普罗什卡[①] 仅仅是可卖给乞乞科夫的大力士。你们说，斯克伏慈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极其善于同商人打交道，算了吧！你们自己再读一读第 5 幕[②]中市长跟商人们的谈话吧。只有同狗而不是同人才那样谈话，这就是所谓的"极其善于"跟俄罗斯人谈话吗？莫非这就是你们所称赞的？这还不如干脆抽嘴巴或者揪头发。在童年的时候，有一次在大道上我看见一个信使，他穿着长后襟的制服，戴着插羽毛的三角帽，一路上用拳头狂暴地捶打车夫的脊背，车夫则发疯似地抽打自己的汗水淋漓的飞奔着的马。不必说，这个信使是地道的俄罗斯人，但是他愚昧，脱离人民，与人民距离之远竟然达到这样的地步，竟至于除开以自己沉重的拳头代替一切语言之外，不会换个方式同俄罗斯人谈话。其实，他自己的一生都是在车夫们中间，在各种各样的俄罗斯人中间度过的。然而对他来说，他的制服的长后襟、插羽毛的帽子、他的军衔、擦得铿亮的彼得堡的皮鞋，在情感和精神上不仅比俄罗斯农民可贵，也许比整个俄罗斯都可贵，他跑遍了俄罗斯的天南地北，看来，他在俄罗斯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一切都只配他拳打脚踢，不配别的。在他的眼里他的长官就是

① 《死魂灵》中地主索巴凯维奇的已死的木匠普罗帕卡。索巴凯维奇说他活着时力大无穷，要以高价出卖这个死魂灵。

② 《钦差大臣》的第 5 幕的剧情是，市长以污秽下流的语言斥骂并威胁告发他的商人，迫使商人们向他下跪求饶。

整个俄罗斯，除开他的长官之外，几乎一切都没有必要存在。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理解人民的本质和人民的灵魂！这种人虽然也是俄罗斯人，但已经是“欧洲化”了的俄罗斯人，只不过这种人不是从教育入门使自己欧洲化的，而是从堕落入门的，很多人，非常多的人都是这样开始欧洲化的。是的，我们常常把这种堕落当作使俄罗斯人变为欧洲人的最可靠的途径。可能，那个信使的儿子将来会成为教授，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欧洲人。所以说，不必去谈论他们对人民本质的了解。如要谈论人民的真正本质，就需要有一些普希金、阿·斯·霍米亚科夫、尤·费·萨马林和伊·谢·阿克萨科夫[①] 之类人物。（在他们之前，人们虽然也谈论过这个问题，但谈得似乎都一本正经，好像在表演。）当他们谈起“人民的真理”时，人们都把他们看成是崇尚“吃小辣萝卜和写告密信”[②] 的癫痫病患者和白痴。是呀，告密！他们刚一出现并且发表自己的见解的时候使所有的人都惊讶不已，自由派人士甚至产生了疑问，怀疑他们是不是想要写信告发自由派人士？你们自己想想看，当代的很多自由派人士对斯拉夫派人士的看法同这种愚蠢观点有多大的差别？

---

① 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政论家。尤·费·萨马林（1819—1876），哲学家、历史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伊·谢·阿克萨科夫（1823—1886），政论家、诗人。此三人均为斯拉夫派代表人物。

② 此语引自屠格涅夫的《地主》（1846）一诗。屠格涅夫这首诗的一节是这样写的：“……莫斯科的聪明人，/肥胖，松弛，还有大喉结……/期待靠自己的平顶卷沿皮帽/获得拯救和新生；/他嚼着小辣萝卜，/责骂西方人，/还写告密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屠格涅夫的诗说出了俄国西方派对俄国斯拉夫派的看法。他在自己的文章的草稿上写道：“正如一位不成功的诗人，后来却成为优秀小说家的人所说的‘以吃小辣萝卜和写告密信为理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则认为俄国斯拉夫派是“我们时代最正直的人”。

不过，回到正题上来吧。您肯定说，阿乐哥逃到茨冈人那里去是为了躲避杰席莫尔达。就算真的是这样。最糟糕不过的是，格拉多夫斯基先生，您自己确信不疑地认为，阿乐哥有权利采取那种轻蔑态度，因为“据说是，他不能不跑到茨冈人那里去，因为杰席莫尔达太坏了”。而我则认为，阿乐哥和奥涅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杰席莫尔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甚至更坏。我们之间的不同就在于，我一点也不为此而责备他们，因为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命运的悲剧性，而您则为了他们的逃跑而称赞他们，“您的意思是，这种高尚可爱的人能够跟那种丑恶的人和睦相处吗?”您大错而特错了。您自己得出结论说，阿乐哥和奥涅金根本没有与根基断绝联系，根本没有否定人民的真理。不仅如此，“他们一点也不傲慢”，这就是您要进一步强调的。然而，傲视一切是他们不合群和脱离根基的直接的、合乎逻辑的与不可避免的后果。其实您也不能否认他们不了解根基，他们是在贵族学校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他们是通过在彼得堡供职认识俄罗斯的，他们与人民是老爷与农奴的关系。即便是他们也在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过，我说的那个信使同车夫交往了一辈子，在他眼中车夫不是别的，是只配吃自己的拳头的人。阿乐哥与奥涅金对待俄罗斯的态度是目空一切，格格不入；他们正如脱离人民孤立生活的那种人，这些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也就是全靠农民的劳动，不费举手之劳而获得欧洲教育。由于某种历史条件，几乎是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我们全部有知识的人都变成了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正是这个情况造成了他们不合群，脱离了家乡的根基。他不是由于杰席莫尔达才毁灭的，而是由于不能够理解杰席莫尔达以及杰席莫尔达是怎样产生的。在这方面他过于傲慢了，由于他不能够理解，也就看不到在故乡土地上工作的可能性。而

对那些相信这种可能性的人，他们则认为是愚昧的人，甚至也同样是杰席莫尔达。我们的漂泊者不仅对杰席莫尔达是傲慢的，就是对整个俄罗斯也是傲慢的，因为他的最终结论是俄罗斯只有奴隶和杰席莫尔达。如果说俄罗斯还有什么高尚的东西，那么，这也就是他们，阿乐哥们和奥涅金们，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样一来，产生傲慢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由于离群索居，跟自己毫无理解的卑鄙的杰席莫尔达相比，他们自然就开始欣赏起自己的美德和高尚来。假如不是那样高傲的话，他们就能够明白，他们自己也是杰席莫尔达，他们领悟这一点之后，那就可能从这种醒悟中找到走向妥协的出路。他们对人民与其说是傲慢，不如说是蔑视，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对这一切您是不会相信的，相反，您虽然承认阿乐哥和奥涅金之类的人确有某些不光彩的特点，同时却盛气凌人地奚落我目光狭隘，责备我"置病根于不顾而去治标，未必是明智之举"。您斩钉截铁地说，我说的"高傲的人，驯服吧"这句话纯粹是指责阿乐哥的个人品质，对事情的根源却不屑一顾，"就是说，事情的全部实质似乎就在于高傲的和不愿意驯服的人们的个人品质。"您说："使漂泊者们为之傲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即应该向什么驯服的问题也没有答案。"您这样说，就是盛气凌人了，我似乎明白无误地说过，"漂泊者"是我们社会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可见我并不是把全部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他们个人身上，推到他们的个人品质上。我的这些话您已经读到了，都已写出来，印出来了，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歪曲呢？您把我的"驯服吧"这句话摘出来，与此同时写道：

在这些话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说出了自己信念中"最神圣的思想"，这是同时既构成《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的力量，也构

成他的弱点的东西。在这些话里面蕴含着伟大的宗教理想，强烈的个人道德说教，但却丝毫未提及社会理想。

而继这些话之后，便立即开始批判“基督教博爱精神的个人修身”思想。我马上就来谈您关于“个人修身”的见解，但是我要先把您的全部真实意图揭露出来，您似乎打算掩饰这样一个意图，这就是，您对我那样怒气冲天并不只是因为我责备“漂泊者”，而是相反，因为我不承认他是道德完善的理想，不承认只有他才能够、也才应该成为的那种俄罗斯的健全的人！您承认阿乐哥和奥涅金有“不光彩之处”，这不过是在玩弄手段。根据您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想彻底亮明的观点来看，“漂泊者”是正常的完美的人，他们逃避杰席莫尔达这一点就说明他们是完美的。假如有人敢于指出哪怕是他们的某一个缺点，您就要怒目而视。您说的已经很明白：“如果断言他们毁于自己的傲慢，他们不愿意向人民的真理驯服，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最后，您满腔热情地肯定，并且坚持说，是他们解放了农民。您是这样写的：

我们还要说：如果说本世纪前半期的“漂泊者”中间的优秀人物在心灵中还保存着什么意向的话，那就是关于人民的意向，他们最强烈憎恨的就是压在人民身上的奴隶制。就算他们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而爱人民，憎恨农奴制的，或者说是按照“欧洲的方式”行事的。然而除开他们，又是谁把我们的社会引向废除农奴制的呢？他们是在尽自己之所能为“家乡的大地”服务，最初是作为自由的

传播者，后来是作为第一批调停官[1]。

问题恰恰就是，“漂泊者们”憎恨农奴制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是按照欧洲的方式行事的”，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问题恰恰就是，他们憎恨农奴制不是为了俄罗斯农民，即为他们干活，供养他们，从而也是被他们与其他的人共同压迫的农民。如果说忧国忧民之心压倒了他们，使他们不得不跑向茨冈人或者跑向巴黎的街垒，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把自己的农民连同土地一起解放了，从而排解忧国忧民之苦，至少是解除个人的责任，什么人能够阻止他们这样做呢？然而在我们这里却很少听到人们谈论解放的问题，关于公民疾苦的慨叹则听到得相当多。“据说是，环境把人毁灭啦，他怎么能够放弃自己的财产呢？”既然为农民竟忧虑到了不得不投向街垒的地步，那为什么还不放弃财产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在巴黎这个地方”，即便是参加街垒战，说到底也还是需要钱的，所以农奴就把地租寄到这里。有的人做得更简便一些，这就是典当、出卖农民或者以农民换钱，（这还不都是一回事吗？）之后得到钱就到巴黎去资助出版法国的激进报纸和杂志，目的是拯救全人类，不仅仅是俄罗斯农民。您不是深信不疑地说，由于为农奴产生忧心，他们全都被压垮了吗？不是为了农奴的忧伤，而是由于人类社会里面的奴役制所产生的一般的抽象的忧伤压垮了他们：“他们说，农奴本来不需要 liberte’，egalite’ et fraternite’[2]，还没有开化”，至于说俄罗斯农民个人，大概为他

[1] 俄国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由贵族中选出为调解农民和地主之间纠纷的中介人。

[2] 法文：自由、平等和博爱。

的忧伤根本就不会那样可怕地折磨这些伟大的心灵。在从前那个美好的时光里，一些非常非常有教养的人在私下里讲的至理名言我知道，也记住了很多。他们彼此之间在私下里都一致认为，“奴隶制，毫无疑问，是极大的罪恶。但是，如果就整体而言，我们的人民，难道是人民吗？唉，他有哪一点像 1793 年的巴黎人民？其实他已经习惯奴隶制了，他的面庞，他的身形就使他显得像奴隶，可以说，用树枝抽打他们一般地说当然是极其丑恶的事，然而对俄罗斯人来说，抽打真的还有必要，因为‘俄罗斯的农民是需要打的，俄罗斯农民如果不挨打，他就会感到寂寞，这个民族就是这样的’。”我可以发誓保证，这是我当时从一些非常有教养的人那里听到的话。这是“清醒的真理”。也许奥涅金不打自己的仆人们，虽然这的确很难说，可是阿乐哥，我相信，他是要打的，这不是因为他残忍，而是因为他心软，几乎是出于善良的目的：“要知道，这对仆人来说是必须的，不打，他就活不下去，他自己就要走过来请求说：‘老爷，打我吧，让我成个有用的人，完全把我惯坏啦！’请问，对这种天性应该怎么办，只好打，满足他！”我还要说，他们对农民的感情常常达到憎恶的程度。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多少鄙视俄罗斯农民的笑话，既鄙夷又下流的笑话，关于农民的奴性心灵、他们的“偶像崇拜”、他们的教士和他们的婆娘，关于这一切他们谈论起来悠然自得，谈这些话的有时竟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常常几乎像一座妓院。噢，当然啦，他们说这些话并非总是出于恶意，有时只是由于过分热衷于接受最新的欧洲思想，比如说像卢克蕾齐亚·弗洛丽阿

尼[①]那样，我们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些思想，并以俄罗斯人特有的迫不及待精神把握这些思想的。这是一些纯粹的俄罗斯人！噢，格拉多夫斯基先生，忧心忡忡的俄罗斯漂泊者们有的时候是大骗子，正是这些关于俄罗斯农民的笑话和蔑视俄罗斯农民的看法差不多总是在化解着他们心中由于农奴制而产生的忧伤的焦灼程度，从而使这种忧伤成为仅仅是胸怀世界的抽象的忧伤。在精神生活上欣赏自己的道德情操的高尚和自己的公民思想的恢弘气魄，而在物质生活上继续享用的却依然是那些农民的租金，而且享受得那么惬意！这一切同胸怀世界的抽象的忧伤是完完全全可以同时并存，互不相扰的，这算不了什么。就在不久前，一位过来人，那个时代的观察者，写了一个故事登在杂志上，谈的是俄罗斯当时的一些最著名的有世界声望的自由派思想家与俄罗斯农妇相逢的场面。[②]这里说的是一批臭名昭著的漂泊者，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漂泊者。那是1845年的夏季，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处豪华别墅里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据这位过来人的记述，很多客人聚集到别墅，其中有极富人道精神的教授，酷爱高雅艺术以及诸如此类事物的人士与行家，久负盛名的民主派，即后来著名的甚至是有世界影响的政治活动家、评论家、作家和教养良好、极富魅力的太太们。突然间这伙人都涌向田野去散步，大概是在喝了香槟，吃过大馅饼和山珍海味（因此宴会才被称之谓“盛大的”）之后，酒足饭饱了。在黑麦丛中他们遇见了割麦的农妇。这正是通常的夏忙季节，农民男男女女清晨四点就起床来收割庄稼，

① 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小说《卢克蕾齐亚·弗洛丽阿尼》（1847）的女主人公。

② 指俄国批评家帕·瓦·安年科夫在其回忆录中谈的关于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和亚·伊·赫尔岑等人及其妻子的轶事。

一直干到夜里。收割这种活繁重异常，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弯着腰一直干十二个小时，常常是一钻进麦田里人就不见了。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伙人在麦丛里遇上一个割麦农妇。请想想看，她竟然穿着"单薄的衣服"。（一件衬衣?!）太不像话了！放眼世界的人道感情冲动起来，立刻就以受到侮辱似的声音议论起来："在所有的女人里面只有俄罗斯女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知羞耻!"嗯，当然啦，马上就作出这样的结论："在所有的女人中唯有俄罗斯女人才是这样的，在她的面前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害羞。"（这就是说无需害羞，是不是?）一场争论爆发了。有的人为农妇辩解，然而，这些辩护士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需要反驳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啊！这就是在一群喝足了香槟，吃够了牡蛎的游荡的地主里面才能够出现的看法和结论。但是，他们花的是谁的钱?要知道，他们占有的就是那个农妇的劳动！胸怀世界的漂泊者先生们，那个农妇正是在为你们干活，你们吃的、喝的就是她的劳动。由于难挨的烈日和汗水，她在没身的黑麦丛中脱掉罩裙，只穿一件贴身的衬衣，她这就是不知羞耻，这就使你们的羞耻心受到伤害，说她们是"所有的女人里面最不知羞耻的"。唉，你们这些正人君子啊！可是你们那些"巴黎的寻欢作乐"，"在巴黎某地"的纵情欢乐，在 Баль-Мабиле 的康康舞[1]（只要一提到它，俄罗斯人就眉飞色舞），还有可爱的小曲：

Ma commère guand je danse

---

[1] 法国的一种下流交际舞，典型舞步是抬高腿部。Баль-Мабиле是收费的跳康康舞的舞会。赫尔岑在《法意书简》中说到，来跳这种舞的都是富有的资产者，一切都显得非常淫荡。

Comment va mon cotillon?[①]

以及婀娜多姿地伴随小曲撩起的衣裙和扭摆的屁股，对这一切，我们俄罗斯的正人君子不都是不感到气愤，而且相反地还心神向往吗？“算了吧，这个康康舞她们跳得那样优美，那些扭摆简直是优雅无比的独特的 article de Paris[②]，而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农妇，俄罗斯的农妇，一根木桩，呆头呆脑！”这一切已经不是蔑视我们的农民和人民的一种观点，不，这一切已经变成一种情感，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憎恶农民的个人情感。噢，当然，这是无意中流露的情感，几乎是不知不觉中流露的情感，连他们自己都丝毫也没有觉察到。格拉多夫斯基先生，我承认，我完全不能同意您的那么重要的观点：“不是他们，又是谁把我们的社会引向废除农奴制的呢？”难道是他们像通常那样滥施忧国忧民的伤感，以抽象的空谈达到的。噢，当然，一切都有益于共同事业，都于事业有利。但是，促成农民解放的、在解放事业上帮助了劳动者的更应该说是类似尤·费·萨马林这种气质的人，而不是你们的漂泊者。格拉多夫斯基先生，实际上有很多像萨马林这种类型的人投身到当时那种伟大的事业，他们是完全不同于漂泊者类型的人。可是关于这些人，当然，您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从所有的迹象看，漂泊者们很快就对这个问题失去了兴趣，他们又开始感到厌倦不满，否则他们也就不成其为漂泊者了。获得赎金之后他们又开始把自己剩下的土地和森林卖给商人和富农，任凭他们砍树毁林，他们则移居国外，在那里过起寓公生活来……您，教授先生，

① 法文：大姐，我跳舞的时候，我的衬裙摆动得怎样？
② 法文：巴黎的时髦。

当然不会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也绝不会承认您十分重视的俄罗斯上层的自由派人士的形象是真正的正常俄罗斯人的理想，您认为这个形象事实上似乎曾经是俄罗斯人的理想，现在仍然是，将来也应该是，这我不承认。这种人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为祖国多少做过一点有益的事，这样说比您颂扬这些过时的先生们的赞歌更切合实际一些。

Ⅲ. 两个一半

现在我就谈谈您对下述问题的观点，即“遵循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进行个人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与“种种社会理想”，主要是“种种社会制度”相比，自我完善似乎存在缺陷的问题。噢，您自己一开口就说，这是我们分歧的最重要之点。您写道：

> 现在我们谈的是我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分歧中的最重要之点。他在要求向人民的真理、人民的理想驯服的时候，把这个“真理”、这些理想看成为某种已经完成的、不可动摇的和永恒的东西。我们要斗胆对他说，不！我们人民的社会理想还处于形成、发展的过程之中。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伟大人民，我们的人民自身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

在文章的开头，第一部分，关于人民的“真理”和种种理想的问题，我已经部分地回答了您。您认为，人民的这种真理和这些理想对于发展俄罗斯的社会理想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您说，宗教是一回事，而社会事业则是另一回事。您用您学者的刀子把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机体分割成单独的两个部分，还硬说这两个部分应该彼此完全独立，互不相关。我们就仔细看一

看，分别把每一半都看一看，也许能够看出一点问题。我们首先看看“遵循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自我完善”这半个部分。您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呼吁人们自我完善，使自己驯服。按照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进行个人的自我完善当然是做任何事情的首要前提，无论大事或小事。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基督教的意义上达到了个人完善的人们必定能够组成完美的社会（?!）。我冒昧地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使徒保罗教导奴隶和主人处理好相互关系。而奴隶和主人是能够听从，通常也都听从使徒的话，从个人来说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但奴隶制并未因此而变得圣洁，它依然是不道德的制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很清楚地知道，有一些很虔诚的基督徒地主和农民。然而在上帝面前农奴制却依然是一种劣迹，于是俄罗斯的沙皇-解放者就成为不仅是要求个人道德，而且要求社会道德的体现者，关于这种道德的适当的概念在古代是没有的，虽然那个时候“好人”也不比现在少。

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并不是一回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任何完善的社会的事业都不可能仅仅通过改进人们的个人品质来达到。我们还是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假定说，许多主张基督教的博爱和驯服的人从 1800 年起就致力于改进柯罗博奇卡和索巴凯维奇这类人的道德面貌。能否想象这些人就这样达到了废除农奴制的目的，而不再需要以强制的语言来消灭这种“现象”了呢？相反，柯罗博奇卡要证明她是真正的基督徒，是自己的农民的真正“母亲”，无论说教者拿出什么样的道理，她都要坚持自己的信条……

从社会意义上说，人的改进不可能只靠“完善自己”和“使自己驯服”来完成。完善自己和驯服自己的欲望可以在荒野里，也可

以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进行。但是，作为社会的存在的人是在相互依靠、相互支持和相互合作的活动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人的社会完善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完善，社会制度在人的身上培养的即使不是基督徒的高尚情操，那也是公民的高尚情操。

请看，我从您的文章中引用了多么大的一段！引文都是对"遵循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进行个人自我完善"的极其傲慢而又严厉的批评，说它在公共事业中几乎毫无作用。不过，您对基督教的理解是可笑的！只要想一想，柯罗博奇卡和索巴凯维奇都已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已经是完善的基督徒（关于完善是您自己说的），那时还能不能劝说他们放弃农奴制呢？这就是您提出来的，当然也是您要回答的狡猾问题。您的回答是："不，不可能说服柯罗博奇卡，即使她已经是一个完善的基督徒。"对这个问题我也要坦率地回答，只要柯罗博奇卡已经成为，或者可能成为真正的、完善的基督徒，那时在她的庄园里就完全不可能再存在农奴制，尽管在她的箱子里依旧保存着一切农奴制法令和契约，也用不着再为农奴制操心了。请允许我再说一句，难道柯罗博奇卡从前不就是基督徒，从一出生就是基督徒吗？可见，您在说到基督教的新的宣传者时，您所指的虽然实质上是从前的基督教，但已是强大了的、完善了的，这么说吧，已经达到了自己理想的基督教，不是这样吗？请问，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奴隶和什么老爷可谈呢！应该对基督教多少有一些了解！这对于柯罗博奇卡，已经是完善了的基督徒来说，她的农民是在农奴制下的农民或者是非农奴制下的农民还有什么意义呢？她是农民们的"母亲"，已经是真正的母亲，而"母亲"立刻就要废除从前的"女主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从前的主人和从前的奴隶如同阳光下的雾霭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将是完全新型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新型的、从前闻所未闻的关系。事情将出现前所未有的转折，处处都是完善的基督徒，这种人在从前即使作为个别的人也少得很难看得到。要知道，这种虚幻的假想是您格拉多夫斯基先生自己制造的，是您自己走进了这种惊人的幻境，既然进去了，您就承受后果吧。格拉多夫斯基先生，请您相信，柯罗博奇卡的农民自己也不会离开她的，原因很简单，每一个人都要找对他更好的地方。在您的制度下，也许他感到比在热爱他的亲生的母亲那里更好吧？我也敢向您证明，如果说在使徒保罗那个时候还保存着奴隶制，那么这正是因为当时出现的教会还不是完善的（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出这一点）①。教会里那些本身达到完善境界的成员们已经没有、也不可能拥有奴隶，因为奴隶已经变为弟兄，而弟兄就是弟兄，不可能把自己的弟兄当作自己的奴隶。按照您的说法，关于基督教的宣传似乎是无力的。至少您是这样写的，说使徒的说教并没有使奴隶制变得开明。而另外一些学者，尤其是欧洲的历史学家常常指责基督教，说它似乎是美化了奴隶制，这其实是不明白事情的实质。只是设想马莉娅·叶基别特斯卡娅有农奴，她不想解放他们，这是多么荒唐！在基督教里，在真正的基督教里现在和将来都会有主人和仆人，但不可能有，也不可想象有奴隶。我说的是真正的、完善的基督教，仆人不等于奴隶。保罗和提摩太一同

---

① 据圣经传说，使徒保罗是从基督教徒的迫害者转变为新的宗教的热烈保卫者的。他原先信仰的原始基督教宣扬反抗，他接受新的宗教后则号召驯服。他号召对国家要驯服，奴隶要服从自己的主人，《新约全书》中保罗致《以弗所书》、《提多书》所宣扬的就是要驯服、顺从。

走路的时候，学生提摩太伺候保罗，但是请读读保罗给提摩太的信吧[1]，他这是写给奴隶的，退一步说是写给仆人的，没有的事！这确实是写给“我儿提摩太”的，他心爱的儿子。如果主仆都已成为完善的基督徒，主人对自己仆人的关系就必然是这样的！那时还将存在仆人和主人，但是主人已经不是老爷，仆人也已不是奴隶。请设想一下，在未来的社会中开普勒[2]、康德和莎士比亚都还活着，他们为大家做重要的事情，大家了解他们的意义，尊敬他们。但是莎士比亚没有闲工夫放下工作整理东西，打扫房间，倾倒垃圾。请相信，有的公民必定会去帮助他，是自愿去做的，是凭自己的意愿去的，他要帮助莎士比亚清除垃圾。他知道，莎士比亚的作用他是无法比拟的，他要对莎士比亚说：“你是我们的骄傲和光荣，我愿意为你服务；我的力量虽然微薄，但这也是我为共同利益的贡献，因为我使你节省了时间用于你的伟大事业，但是，我不是奴隶。我正是由于意识到你莎士比亚的天赋比我高，我才来为你服务，我就是以我自己的这种自觉证明，就人的道德尊严来说，我一点也不比你低，作为人，我和你是平等的。”不过，当时他是不会说这些话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当时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当时也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确实都将成为新人，基督的儿女，从前的兽性的东西都将被克服。当然，您要说，这毕竟是一种空想。然而第一个开始空想的并不是我，而是您自己，难道不是您设想柯罗博奇卡已经成为一个完善的基督徒，她拥有“农奴儿女”，但不愿意让他们获得自由，这已

---

① 见《新约全书·保罗达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2节。
② 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近代天文学的创立人之一，发现行星运动定律（开普勒定律）。

经胜过我的空想了。

聪明的人们于是会哈哈大笑，并且要说："可见，在世界上还完全没有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或者说，真正的基督徒还少得很难找到的时候，谋求遵循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进行自我完善，这真不错啊。假若都成了真正基督徒的话（用我的话说），岂不是眨眼之间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一切奴隶制就都消灭了，柯罗博奇卡这类人都变成了可爱的良师益友，剩下的事就是大家都向上帝唱赞歌了吗?"不错，冷嘲热讽的先生们，当然，真正的基督徒还少得可怜（虽然这种人是有的）。然而你们怎样知道，到底需要有多少这样的人，基督教的理想才不致在人民中间日趋消亡，人民的巨大期望也不致随之日趋消亡呢？换成世俗的说法就是，需要有多少真正的公民，公民的高尚情操才不致在社会中日趋消失呢？对这个问题你们同样是回答不了的。这里起作用的是自己的完全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不明白，您，格拉多夫斯基先生也不明白。人们又要说："伟大思想的信仰者既然那样少，那么这思想又有什么益处呢?"可是，你们怎么能知道，伟大的思想最终会带来什么益处？看起来，迄今为止必须做的事只有一件，这就是不要使伟大的思想逐渐消亡。至于说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某种新的事物正在出现，对此必须有所准备，这则是另外一回事……再说，问题根本不在于有无益处，而在于是不是真理。如果说我确信不疑我相信的事情就是真理，但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我的真理，嘲笑我，并且走上另外一条道路，那么，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其实，伟大的道德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之所以能够把人们团结成为一个极其坚实的联盟，就是由于它追求的不是急功近利，而是指引人们面向未来，面向永恒的目的和终极的愉悦。你们如果没有基本的伟大的道德思想作基础，

你们以什么把人们团结到一起去实现你们的公民目标呢？而这些道德思想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点，这就是，一切都建立在不断按照理想的要求进行个人的无限的自我完善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因为自我完善本身就包含着一切，包含着一切追求，一切渴望，由此可见，你们的全部公民理想也都源出于此。你们能够试一试只用“拯救动物”这一个目标就把人们团结成为公民社会吗？除开“Chacun pour soi et Die pour tous”[①] 这句道德格言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格拉多夫斯基先生，任何一种公共机制都不可能靠这种格言长久存在下去的。

我要继续说下去，我要让您惊讶。有学问的教授，您会明白，您说的那种社会公民理想，也就是与道德理想不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是独自存在的，被你们的学者的刀子从整体上切下来，并以单独的半个的形式而存在的社会公民理想；说到底，即可以从外部拿来，并且可以成功地以单独的“机制”的形式移植到任何新的土壤上的社会公民理想，我要说，这样的理想是根本就没有的，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且也不可能存在！其实什么是社会理想，如何理解这个词？当然，实质上这个词所指的是人们的一种追求，这就是人们为自己寻求尽可能是正确的、人人都满意的社会结构的模式，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人们不知道这种模式，人们在自己的六千年历史过程中一直在寻找这种模式，始终也没有找到。蚂蚁知道自己的蚁穴模式，蜜蜂也知道自己的蜂房模式（虽然它们不是以人的方式理解的，而是凭借自己的方式理解的，它们这样就足够了），但是人却不知道自己的模式。既然是这样，那么在人类社会中公

① 法文：“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民群体的理想从何而来呢？如果历史地进行考察，立即就可以看到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只能是一些人的个人道德自我完善的产物，是从道德自我完善开始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在任何一个人民、一个民族里面，在最初，道德思想总是民族产生之前就存在了，因为正是道德思想创造了民族。而这种道德思想则总是起源于神秘的思想，起源于这样一些信念，即人是不朽的，人不只是大地上的一种动物，而是与另外一些世界，与永恒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信念就形成为宗教，形成为新的思想信仰，向来如此，处处如此，向来都是新的宗教一旦出现，新的民族也就立刻被创造出来。请看犹太人和穆斯林：犹太人只是在有了摩西的律法之后才形成为民族的，虽然犹太人作为民族起源于亚伯拉罕的律法时期，而穆斯林人的民族只是在有了古兰经之后才形成的[①]。为了保持业已取得的精神财富，他们才毫不迟疑地彼此接近起来。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竭尽全力兢兢业业地，以“相互依靠，相互支持和相互协作地工作”（正如您生动地描述的那样）开始摸索，只有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摸索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把已经获得的道德财富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怎样才能够找到一种确实能帮助他们把他们获得的道德财富推广到全世界并享有最高荣誉的共同生活的公共模式。您可以看到，经过若干世代之后，在某一个民族里面，只要民族的精神理想一开始动摇，失落，那个民族也就立即开始衰败，民族的全部公民章法

---

① 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神话传说的祖先。古兰经则认为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是穆斯林宗教伊斯兰教的奠基人穆罕默德的祖先之一。据圣经的叙述，是摩西将写着上帝耶和华诫律的石板带给了犹太人，并把他们领出埃及的。

也随之衰败，在民族内部已经形成的全部公民理想也就黯然失色了。在一个人民中间形成什么性质的宗教，也就会产生、形成同样性质的公民形态。可见，公民理想总是与道德理想直接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的是，公民理想只能出自道德理想这个唯一的源泉，这是毫无疑问的。公民理想本身从来就不是自发出现的，因为，既然在一个民族里面已经形成了道德追求，公民理想的出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该民族的道德追求。可见，在人民生活中“遵循宗教精神的自我完善”乃是一切的基础，因为“自我完善”就是信仰已经获得的宗教，而离开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公民理想”永远也不会自己出现，甚至连产生都是不可能的。您也许要说，您自己已经说过，“个人的自我完善是一切的基础”，您根本没有用刀分割什么。问题恰恰就在于您分割了，把一个有机的整体切割为两半了。个人的自我完善不“仅仅是一切的基础”，它还是一切的延续和结局。它在容纳、创造并保存着民族的机体，唯独它才能这样。民族的公共模式是为了它而存在的，因为公共模式的创立就是为了把它作为最初获得的财富保存下来。当一个民族丧失了遵循民族赖以产生的精神进行普遍的个人自我完善的要求的时候，一切“公共机制”也就渐渐消失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需要保存的了。因此，您在下面这句话中所表达的观点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

> 这就是为什么说，人们在社会意义上的完善，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即使不是以基督教的高尚精神，也是以公民的高尚精神教育人的社会准则的完善。

“即使不是以基督教的高尚精神，也是以公民的高尚精

神！”学者的刀子在这里岂不是显而易见吗？它把不可分割的东西切开了，把完整的有机整体切割成单独的僵化的两个半块，也就是分割为道德的和公民的这两个半块。您会说，“在社会准则中”和“公民”称号中就包含着崇高的道德思想，在成熟的发达的民族里面，原始的宗教思想总是被“公民思想”所取代，宗教思想演化为“公民思想”，“公民思想”理应继承宗教思想。不错，很多人都这样说，然而我们却还没有见到过这种空想变为现实。一个民族的道德-宗教思想衰落的时候，就总是惊慌失措地怯懦地要求团结一致，这种要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挽救财产”，在这种时刻公民的团结一致从来别无其他目的。眼下法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团结起来，其目的就是从破门而入的第四等级的手中“挽救财产”。但是，在把人类团结起来的所有的思想之中，“挽救财产”是最无力的、最落后的思想。这已经是终结的开始，终结的预感。大家都要团结起来，可是每个人自己都警惕地睁大眼睛，以便在危险刚一露头的时候就立刻如鸟兽散。作为一种“机制”，它自己能够挽救什么呢？如果存在志同道合者，那就会有博爱。如果不存在志同道合者，那么利用任何“机制”都得不到博爱。提出一个“机制”，或者在“机制”中写上“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1]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机制”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所以就不得不（这是必须地，不可避免地）把第四个词追加到“机制”的三个词后面，这第四个词就是：“ou la mort”[2]，“fraternité ou la mort”，[3] 于是为了通过“公共机制”获得博

① 法文：“自由，平等，博爱”。
② 法文：“或者死亡”。
③ 法文：“博爱或死亡”。

爱，同伴们就去砍同伴们的头颅。这不过只是一个例子，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您，格拉多夫斯基先生，与阿乐哥一样，想要到外部的事物和现象中去寻找拯救，在我们俄罗斯即便是从来都是蠢货和骗子（据有的观点来看，可能就是这样），但是，根据您的看法，只要把欧洲的某种“机制”往我们这里一搬，一切就都得救了。众所周知，把与我国人民格格不入的，与我国人民的意志不相适应的欧洲制度（这些制度明天就将崩塌）机械地移植到我们这里，这就是俄国的欧洲派最重要的观点。顺便提一句，格拉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您斥责我们的落后，认为这是俄国的耻辱，要俄国以欧洲为榜样，您竟然说：

> “而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够解决的分歧和矛盾，在欧洲很早，很早以前就解决了……”

欧洲解决了吗？不过，谁能对您说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您的欧洲，正处于总的、全面的和可怕的崩溃的前夜。在欧洲，在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因为教会搅浑了自己的理想之后，在那里早就处处都演变为国家）的情况下，早已营造起来的蚁穴的道德基础已经从根基上摇摇欲坠了，已经丧失了一切，丧失了一切共同的东西和一切绝对的东西，我认为，这座已经营造起来的蚁穴的整个根基被掏空了。第四等级即将来临，它必将叩击、冲撞大门，如果不把门打开，它将破门而入。第四等级不愿意要过去那些理想，它将推翻迄今为止的一切律法，它不肯妥协，也不肯让步，你用支柱是支撑不了建筑物的。退让只能火上浇油，而它要得到的是一切，将要出现的情况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所有的一切议会精神、现在宣扬的一切公民理论、已经积蓄起来的全部财富、银行、科学和所

有的犹太人，所有这一切都将顷刻之间倒塌下来，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犹太人能例外，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能知道应该如何动作，以便使事情甚至有利于他们。这一切都“临近了，正在门口了。”① 您在笑吗？笑的人是幸福的。愿您长寿，您自己将会看到的。到那时候您会感到惊讶，您会边笑边对我说：“您这样预言欧洲的未来，真是够热爱欧洲的。”难道我是在幸灾乐祸吗？我不过是预感到结局临近了。这是最后的结算，按照结局进行的清偿可能发生得比最丰富的幻想所能想象的要快得多。征候是可怕的，仅仅是欧洲各国早已过时的不自然的政治状况就能够成为这一切的起因。在这些国家奠定之初就已播下这种不正常的精神，此后又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怎么可能正常呢？人类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不可能把其余的全部人类都作为奴隶而占有，而迄今为止所制定的，现在已经完全成为异端的欧洲的全部公共（早已不是基督徒的）机制其实正是为了这个唯一的目的。这种不正常和这些“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虽说都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大规模的、彻底的、进行肢解的政治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的人都将被卷进去，这场战争即将在当前这个世纪爆发，甚至可能就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十年内爆发。您认为那里的社会现在能够经受住这场长期的政治战争吗？工厂主怯懦，惊恐万状，犹太人也是这样，工厂和银行将全部关闭，只要战争稍一拖长或者出现拖长的危险，千百万饥饿的人们、备受歧视的无产者就要涌上街头。你们是不是还寄希望于政治家们的明智，希望他们不要发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4章，第33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已近了，正在门口了。”这里指的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了。但此处原文没有“临近了”三字。

动战争呢？然而有过能够寄希望于这种明智的时候吗？你们是不是寄希望于议会，指望议会由于预见到战争的后果而不批准进行战争的钱呢？然而那里的议会什么时候预见过战争的后果并且拒绝过稍稍固执一点的领导人所要求的钱财呢？于是无产者就走上了街头。你们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无产者还会像从前那样忍饥挨饿，耐心地等待吗？在有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之后，有了国际主义之后，在举行了代表大会[①]，产生了巴黎公社之后，这还可能吗？不，现在已经不同于从前，他们必然要冲击欧洲，一切旧事物都将一去不复返地毁灭掉。波浪只能冲击我们的堤岸，我们的民族机体是如何独特，如何不同于欧洲的机体，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真切清晰地向所有的人们显示出来。那时你们，固守教条的人们才可能猛然醒悟，开始在我们这里寻求你们现在嗤之以鼻的“人民本原”。而目前呢，先生们，你们现在叫我们注意欧洲，呼吁我们把欧洲那些规则移植到我们这里来，这正是那些在欧洲明天就要成为过了时的荒唐的东西，注定要崩溃的规则，这是在那里很多明智的人们早已不相信的东西，它们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因循守旧这个习性才支撑着存在到今天。其实，除开不务实际、固守教条的人之外，还有谁能够把我们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团结的闹剧当成世界上人类团结的正常状态呢？他们自己早已解决了？在不到一百年的过程中制定了二十部宪法，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十来次革命，在这一切之后还能够这样说吗？噢，格拉多夫斯基先生，可能，只有到那个时候，在我们摆脱开欧洲的短暂时间，在离开欧洲监护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才开始关心自

① 当指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它于 1865 年 9 月 25—28 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是这一协会的创始者和领袖。

已的社会理想，而且必定是源自基督，源自个人自我完善的社会理想。您要发问，离开欧洲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公民理想呢？是的，是社会理想和公民理想，而且是我们的社会理想比你们欧洲的更美好，甚至更坚不可摧！哎，更叫你们吃惊的是，比你们的理想更富有自由主义！是的，更富有自由主义，这是因为我们的理想直接来自我们人民的机体，而不是不顾自己的特色而奴颜婢膝地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现在，当然我不可能展开来谈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即使不这样谈，这篇文章也已很长了。顺便提一句，请想一想，古代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的，它力求成为什么样子？古代基督教会在基督之后立刻就出现了，开始总共只有几个人，差不多是在基督之后的最初时刻就立即开始全力探求自己的“公共模式”，奠定“公共模式”的全部基础就是，按照个人自我完善的原则以满足精神对道德的期望。基督教的群体出现了，然后很快就以总的全体基督教教会的形式开始形成新的、从未听说过的民族，亲如兄弟的全人类的民族。但这个教会是受迫害的，理想是在地下形成的，而在这个理想之上，在地面之上，也建造起一座宏伟庞大的蚁穴——古代罗马帝国，它似乎也是整个古代世界道德追求的理想和结局：出现了神化的人。帝国自身是作为一种宗教思想的化身呈现出来的，这种宗教思想包涵着，同时它本身也就是古代世界的一切道德追求的结果。然而蚁穴并不是无懈可击，教会从根基上动摇着它。在世上仅存的两种极端对立的思想发生了冲突，这就是神化的人遇上了人化的神，望楼上的阿波罗①遇上了基督。于是达成了妥协，帝国接受了

---

① 亦译“观景楼上的阿波罗”，原系古希腊雕塑家列奥哈尼斯（公元前4世纪中叶）所创作的雕像，原作已毁，现保存（转下页）

基督教，教会则接受了罗马的法权和国家。教会的一小部分进入了荒漠僻野，继续干起从前的事情，又出现了基督教的团体，后来出现了寺庙，直到现在这不过全都是一些尝试。教会另外那一个庞大的部分后来分裂成为两个部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在西方的那一部分，国家最后彻底征服了教会。教会灭亡了，最终演变为国家。出现了教皇，这是以新的形态出现的古罗马帝国的延续。在东方的那一部分，国家则被穆罕默德的剑所征服并毁灭于穆罕默德的剑下，只剩下了已经与国家分离的基督。接受并又重新颂扬基督的那个国家遭受了来自敌人，来自鞑靼的统治，来自混乱，来自农奴制以及来自欧洲和欧洲主义的无穷无尽的骇人听闻的苦难，直到现在仍然承受着那么多的苦难，致使在博爱精神的意义上和在基督教的自我完善的意义上真正的社会模式在这个国家里确实还没有形成。但是，格拉多夫斯基先生，不该是您为此一味指责这个国家。目前我们的人民虽然只是基督的信奉者，但只能寄希望于人民。他们称自己是农民，也就是说是基督徒[①]，这不只是一句话，这是他整个未来的思想。格拉多夫斯基先生，您因为俄罗斯没有走上轨道而刻薄地责难它。那么，在直到今天为止的整整两个世纪的全部时间里，特别是在最近的五十年当中，是谁在阻碍俄

（接上页）于梵蒂冈望楼上的大理石雕像是摹制品。按：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和宗教中的宙斯之子，太阳神，保护人类、畜群和农业的医神，艺术的庇护神。古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在实行宗教改革、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最为敬仰太阳神阿波罗，在人民中制造太阳神是自己的保护神、自己能直接与神交流的传言。他在公元325年召集的基督教主教会议上制定了基督教教义法典，实现了教会与国家、世俗权力的结盟，皇帝成为公认的教会领袖，成为基督在人世的代理人。

① 俄语中“农民”与“基督徒”两词的语音相近。

罗斯走上轨道呢？格拉多夫斯基先生，这就是一切像您这类俄国的欧洲派人士，你们这种人在我们这里绵延不断地存在了整整两个世纪，现在则是尤其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谁是阻碍俄罗斯遵循自己本身的人民本原自然地、独立自主地发展的敌人？是谁在冷嘲热讽地否认这些本原的存在，不想理睬它们？是谁要改造我们的人民，奇迹般地“把人民拔高到跟自己一样”？把人民造就成简直跟自己一样的自由派的欧化式的人物，不断把一个个的人从人民群众里面分离出来，使他蜕变为欧洲人，哪怕是让他穿上燕尾服式的长后襟制服也好。我的这些话并不是说欧洲人堕落，我不过是说，像自由派分子所做的那样，把俄罗斯人改造成为欧洲人，常常是不折不扣的堕落。实际上，他们的活动纲领的全部理想也就在这里，这就是把人一个个地从全体群众里面分离出来，何其荒唐！他们不就是想这样把我们所有的八千万人民一个个拉出来进行改造吗？难道您真的认为我们的全体人民，从自己整体上说，都会同意像俄国的欧洲派分子先生们那样，成为没有自己的特点的人吗？

Ⅳ. 一个人应该驯服，另一个人则应骄傲。水杯中的风波

格拉多夫斯基先生，在这之前我一直在跟您争论，现在我要责备您蓄意歪曲我的思想、我的讲话的要点。

您写道：

> 如果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即我们的人民）不仅能够*要求崇拜自己*，而且还能充当把整个欧洲引上真理的道路的角色，对他们来说，为了达到这一点，世世代代的奴隶制留在他们身上的缺陷和残余还太多太多。

真奇怪！一个痛斥某些飘泊者的骄傲的人对他认为是全世界的使徒的全体人民号召说要骄傲。他对一些人说："驯服吧！"对另一个人却说："要高大起来！"

接下去还说：

还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却忽然梦想充当全人类的角色！是不是早了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为欧洲服务了两个世纪。我们承认，这种"服务"在我们的心中唤起的不是愉悦的情感。难道我们引以"自豪"的能够是那个维也纳会议[①]的时期，以及那个总的说来是会议频仍的时期吗？也许，我们为了服务于梅特涅而镇压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运动，甚至居心叵测地盯着与我们信仰相同的希腊人的那个时代能够让我们自豪吗？正是这种"服务"使我们在欧洲招致了多么强烈的憎恨啊！

我先谈谈后面这一段，可以说是不怀恶意的歪曲。我说过，"在最近的两个世纪我们为欧洲所做的事情可能比为自己做的还要多"，难道这就是赞扬我们做得如何吗？我只是要指出做过事情这个事实，而这一事实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们做过事情和我们做得如何，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可能犯非常多的政治错误，即便是欧洲人，他们也不断地犯很多错误，但是我并没有称赞我们的失误，我只是说出了我们做了（几乎总是无私地）事情这个事实。您未必就不明白这是两个

① 维也纳会议1814年10月至1815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参加者有欧洲各国的二百一十六名代表。英、俄、普等国操纵会议，围绕波兰和萨克森问题展开激烈斗争。

不同的问题？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因我们为欧洲所做的事情而自豪”。其实我说这话时根本就没感到骄傲，我仅仅是指出了我们人民的精神特点，意义深远的特点。这样说来，寻找民族精神中美好的健康的特点，就一定是骄傲的表现吗？可是您关于梅特涅，关于种种会议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您是用这些事情来教训我吗？您还在做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谈论为梅特涅做事的问题了，而且谈论得比您还激烈，三十年前，正是由于说了关于为梅特涅所做的不当的事情的话（当然还有别的话），我付出了众所周知的代价。您出于什么目的要歪曲我的话呢？就是为了显示：“你们看，我是多么真挚的自由主义者，而这位诗人，诚挚地热爱人民的人，你们听一听，他由于我们为梅特涅效力而自豪，竟然讲了一些多么落后的话。”这是虚荣心，格拉多夫斯基先生。

不过，这一切，当然，都是鸡毛蒜皮，可是下面的话就不是鸡毛蒜皮了。

这样看来，对人民说“精神要高尚”，难道就等于对他说“要骄傲”，等于诱使他骄傲，教导他骄傲吗？格拉多夫斯基先生，您不妨想象一下，您对自己亲爱的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要做精神高尚的人，你们要善良！”难道这就等于说您在教诲自己的孩子们要骄傲，或者说，为了教诲孩子们，您自己就得骄傲？而我说的又是什么呢？我说的是希望“终归有那么一天成为一切人的兄弟姐妹”，与此同时要求注意“终归有那么一天”这句话。难道说一个美好的希望，就是希望在某个时候，在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实现团结友爱，使我们有可能*成为一切人的兄弟姐妹*，难道这种希望也是骄傲，也是号召人们要骄傲？我在讲话的末尾直截了当地说：“那又怎样，难道我说的是关于经济方面的荣誉，关于武器或者科学方面的荣

誉？我说的只不过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友爱，我不过是说在所有的民族中间，可能，俄罗斯的心灵是注定了最想追求全世界的、全人类的兄弟般的团结一致的……”这就是我说的话。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号召骄傲的话吗？在讲过前面引用的那段话之后我立即补充说：“即便我们的国家是贫穷的，但是，基督却走遍了这块贫穷的土地，被奴役的土地，并且为之祝福。我们为什么不能听从他最后的一句话呢？”基督的话就是号召骄傲吗，希望听从基督的话就是骄傲吗？您愤慨地写道：“我们要求崇拜我们，这还为时过早。”这怎么能谈得上是要求崇拜呢？这是竭诚效力的愿望，这是做一切人的仆人和弟兄并以自己的爱为他们效力的愿望，这就是要求一切人崇拜自己吗？如果说这是要求崇拜，那么竭诚效力的神圣无私的愿望立刻就显得荒唐可笑了。人们是不向仆人躬身致敬的，兄弟之间是不要求彼此屈膝下拜的。

格拉多夫斯基先生，请设想一下，您做了一件好事，或者正要去做，您走在路上满怀善意地思索着，您想象着：“这个不幸的人由于我给他带来的意外帮助该是多么高兴，必然是立刻心情振奋，精神焕发，走去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们述说自己愉快的心情，同他们一起高兴得哭泣……”您在思索，在想象这种情景的时候，您自己必然也会受到感动，有时甚至流泪，（您自己未必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您的耳边说道：“您在心中想象这一切是因为您骄傲！您这是流的骄傲的眼泪！”这是无中生有。希望我们，俄罗斯人，在人类社会中也有某种价值，哪怕是终归有那么一天我们有幸能够像亲兄弟似的为人类社会服务，这只是一种希望，仅仅是这种希望就唤起了上千位听众的热烈情绪和兴奋的眼泪。我并非是为了炫耀，并非出于骄傲才

提起这件事，我不过是在说明那个时刻的严肃性。只是提出了一个美好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在人类社会中是能够起某种作用的，即使只是作为亲兄弟来为其他的人们服务的作用也好，只是一个热情的提示，就用一个思想和一种感情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了。素昧平生的人们相互拥抱起来，彼此保证今后要变得更好。两位老者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们二十年来都是相互为敌，彼此相害的，听了您的话我们和解了。"有人在一家报纸上急忙出来提醒说，所有这一阵子的狂热情绪并不说明什么问题，那种"吻手"的情绪早已出现过，用不着等演说者们登上讲台，发表演说，把自己的演说从头讲到尾……"无论他们讲什么，都会有那种热烈情绪，因为那种和善的情绪在莫斯科已经形成了。"这位记者如果自己也到那里去试试，自己也讲点什么话，人们会不会如同向我拥过来那样向他拥过去，会还是不会呢？为什么在我讲话之前的三天里人们也讲过话，听众对讲话者们也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但是，为什么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遇到过在我的讲话之后出现的那种情景？在普希金的庆典上这是唯一的一次，再也没有重复过。上帝知道，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因为这个情景太重要了，对此我不能沉默不语。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社会里面明显地出现了新的因素，出现了渴求建功立业，渴求令人欣慰的思想和忠于事业的人物。这就是说，社会已经不再满足于我们对俄罗斯一味进行的自由主义的冷嘲热讽，关于俄罗斯永远软弱无力的学说已经使社会感到厌倦！仅仅是一种希望，一个提示，心灵就被渴求全人类的事业、普遍的情同手足的服务和伟大业绩的欲望点燃了起来。这些心灵是由于骄傲才燃烧起来的吗？这些泪水是由于骄傲才流淌出来的吗？我是在号召他们要骄傲吗？哎，你们这些人呀！

格拉多夫斯基先生，您看，这个时刻的重要性突然使我们的自由主义的水杯中的很多人感到震惊，这尤其是因为一切都来得那么出人意外。“这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愉快地，无损于己地嘲笑，贬责一切，可是突然之间就……这岂不是翻了天吗？喊警察来！”几位身份不同的先生吓得惊慌失措地跳了起来：“我们现在如何是好？要知道，我们也曾写过……如今我们能躲到哪里去？擦掉，把一切全都尽快擦掉，不留一点痕迹，赶快向全俄罗斯解释清楚，这不过是在好客的莫斯科出现的一种善良的情绪，酒宴之后的一个令人开心的插曲，仅此而已，至于反叛，那就由警察来制服！”于是就行动起来，说什么我是胆小鬼，我是诗人，我微不足道，我的讲话分文不值，总之，在气头上做得太过分了，读者可能不相信。相反的是本应把事情做得巧妙些，处理得冷静些，哪怕是对我的讲话夸奖几句，“比如说，毕竟还有自己的思路”，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全都诋毁、涂抹掉，让人们都满意。总之，做得不要太笨拙，出现了漏洞，需要尽快把它弥补上，于是马上就找到了一位有身份有经验的、能够把肆无忌惮的攻击同应有的礼貌结合起来的批评家。这位批评家就是您，格拉多夫斯基先生，您写了文章，人们读了您的文章，人们就都平静了。您为共同的、美好的事业做出了贡献，至少是到处都在转载您的文章：“据说是，诗人的讲话经不住严格的批评；诗人毕竟是诗人，而这些聪明的人则在警惕着，总是及时给幻想家泼冷水。”您在文章末尾说，我如果认为您的文章中有尖锐的语言，请求我原谅您。格拉多夫斯基先生，我在结束我的文章时不请求您原谅，即使在我的文章中有这种尖锐的语言。我回答的不是亚·德·格拉多夫斯基个人，而是政论家亚·格拉多夫斯基。就个人而言，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您。如果我不尊重您的见解，而且还坚

持这样做，那么即便是请求原谅，又怎么能够缓解呢？看到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重大的时刻被歪曲地呈现出来，被错误地加以解说，我的心情很沉重。看到我为之效力的思想被抛弃到马路上拖着走，我心情很沉重。拖着这思想走的人就是您。

我知道，周围的人们都要说，写这样的长文回答您那篇比我的文章短得多的文章是不值得的，可笑的。但是，我要再次说明，您的文章不过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我本来就想说几句话的。我打算在明年恢复《作家日记》。所以就让目前这一期作为未来的 profession de foi① 性的一期，权作一期“试刊”吧。

或许人们还要说，我对您的答复取消了我在莫斯科发表的讲话的全部思想，我在讲话中呼吁俄罗斯的两派团结、和解，承认两派都是合理的。不，完全不是，我那次讲话的思想没有取消，而且相反，更加坚定了，因为正是我在给您的答复中指出，两派由于相互疏远，相互敌视，自己把自身和自己的活动置于不正常的境地，本来两派如果相互团结、协调一致的话，或许能够一直都在建树，一直都在拯救，都在激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引导俄罗斯走向新的、健康的、伟大的生活，迄今为止还未曾有过的生活！

---

① 法文：纲领。

财政。被斥为忒耳西忒斯[1] 的公民。从下面竣工和乐手们。议会和清谈家们

（《作家日记》，1881 年，1 月号，第 1 章，Ⅰ）

上帝啊，难道我在沉默三年之后[2] 竟要在我的复刊的《日记》上撰写经济文章吗？难道连我也是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了吗？我从来也没有做过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虽然这是当前的一种风气，我也没有沾染上这股搞经济的风气，可是现在我却要作为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写经济文章了。至于说当前有一股搞经济的热潮——那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人们全都是经济

---

① 古希腊的普通一兵，由于在特洛亚城下的军队会议上同阿伽门农等将领争论，遭到俄底能斯的痛打。他的形象反映出普通农村公社社员要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民族贵族的侵犯。但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把他描写成饶舌、凶狠的可笑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处是依荷马的看法而引用这个形象的。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7 年最后一期《作家日记》中刊登了一篇声明《致读者》，声明说，由于他要着手写一部艺术作品（即《卡拉马佐夫兄弟》），《作家日记》需停刊一年，但也可能在 1878 年再出一期。实际上《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了三年，到 1881 年 1 月，《作家日记》才复刊，复刊后只出了一期，而作家则在这一期《日记》与读者见面前几天就已病逝了。按：《作家日记》停刊后，作家不止一次萌生过发表文章或者恢复该刊的想法，如 1878 年 8 月致康·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忙于写小说（要到明年才能结束），可是我焦急地想要继续出《日记》，因为我确实有话要说，正像您所希望的那样，不作徒劳无益的、泛泛的争论，要讲坚定明确的、无所畏惧的话。"1880 年，他参加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庆典，并发表了引起激烈争论的长篇演说。同年 8 月专门为发表这篇演说出版了一期《作家日记》。这期《作家日记》是自 1878 年停刊三年后出版的唯一一期。

学家。每一种新出的刊物都像经济刊物，刊物介绍也是这样说的。其实怎么能不是经济学家，现在又有哪一个人不是经济学家呢？卢布贬值，赤字！近几年来，在我们的土耳其战争之后，我们这种普遍的经济形势表现得更为突出了。嗯，从前我们这里关于财政问题的议论也很多，不过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人们都关心起财政来了，主要是财政。当然，归根结底，这一切都发生得很自然，因为卢布贬值、军费借款等等。其实这里除开卢布本身问题之外还有报复问题，这种报复迄今也还在继续着，这就是对战争的报复。他们说："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事先就指出过。"有一些人特别热衷于谈论经济，因为这些人在当时，即在1876年和1877年曾经说过，金钱比宽宏大度可贵；东方问题纯粹是胡闹，是假象；不仅没有什么人民精神的昂扬，战争也不仅不是人民的，不是民族的，而且实质上连人民也没有；有的只是一如既往地始终因循守旧的群众，沉默的、迟钝的、照例交纳赋税、供养知识分子的群众；这种群众如果也向教堂施舍铜板，那是因为神父和官长有命令。所有俄罗斯的忒耳西忒斯们（在我们的知识分子里面这种人非常多）的高尚感情在那个时候都受到了侮辱，忒耳西忒斯式的公民受到侮辱。于是他们就进行报复，从财政上发难。渐渐追随他们的已经不仅仅是忒耳西忒斯们，就是从前的"英雄们"也同他们站在一起了。人们全都有些气鼓鼓的，有一些人尤其强烈。的确，柏林会议① 不利的和平更是火上浇油。（请注意，顺便谈谈柏林会议。有一次在穷乡僻壤的一条村间小路上，一个村

① 为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在英国与奥匈帝国的倡议下，1878年召开了柏林会议，修订了结束俄土战争的圣斯忒法诺和约条款，俄国政府做出让步，签订了柏林条约。

妇、客店的老板娘突然问我："老爷，你说说，现在国外人家是怎样欺负咱们的，你听说了吧?"当时这个村妇叫我很吃惊。不过，这一点，也就是当时人民精神振奋昂扬的问题，容待以后再谈。）我现在想要说的只是，现在人们都在写有关卢布、有关赤字的问题。当然，这里有的人也是随声附和：人人都在写，人人都在惊慌不安，我怎么能够例外呢？否则，人家会说我不是公民，我不关心这件事。我不想说昧良心的话，实际上，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真正的爱国忧思，有真正的隐痛，有对未来的重重疑虑。不过，虽然是真诚的公民的痛苦，可是话题却几乎到处都是相同的：为什么我们这里的一切都不像欧洲那样？"在欧洲塔勒[①] 到处受欢迎，而在我们这里卢布则不值钱。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欧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是欧洲?"聪明的人们终于解开了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是欧洲和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不像在欧洲那样？解答是："因为建筑还没有落成[②]"。于是人们全都开始谈论起要落成建筑来，他们忘记了任何建筑都还没有，这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落成的；他们忘记了，并没有建筑物，充其量不过只有一些自己认为自己是建筑物的穿白坎肩的人[③]；他们忘记了，如果要完成的话，最好是直接从下面，从粗呢大衣和树皮鞋[④] 开始，而不

① 德国 1907 年以前使用过的金币或银币名称，一塔勒等于三个银马克。欧洲其他国家也曾用塔勒作货币单位名称。

② 法国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普遍使用"落成建筑"一语比喻实施政治民主与自由。在俄国，19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则借用这种语言委婉地表示实行宪政。

③ 指自由派人物。大翻领白坎肩为 1793 年法国雅各宾党人模仿罗伯斯比尔（1758—1794）的流行衣着。

④ 为从前俄罗斯农民的衣着，在本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以象征农民。

是从白坎肩开始。说到这里，我们要做点必要的说明。从下面开始落成建筑，乍一看当然是荒唐的，即使单纯从建筑学的意义上来说也是荒唐的，这与欧洲过去的和现在的这类事情都是矛盾的。但是，由于我们这里一切都是独特的，一切都不同于欧洲，有的时候甚至与欧洲完全相反，那么在落成建筑这样重要的事情上也就可能做得与欧洲不同，我们俄罗斯的有欧洲头脑的人们对此是会惊异和愤慨的。出乎欧洲意外的是，我们的下层，我们的粗呢大衣和树皮鞋，事实上，就是独特的建筑，不仅是基础，而且是建筑本身，虽然是尚未竣工的建筑，但却是牢固的、坚不可摧的，经过许多世代营造起来的，可以肯定地说，它自身就预示着我们未来落成的建筑物的全部真实的、正确的构想，虽然是尚未充分成熟的构想。实际上我们的欧洲人所有关于落成建筑的呼声，如果把全部实情说出来，正如我们在上面说的，更多的是随声附和的，是机械地安慰性质的，而不是理智性的、实实在在的公民性的、具有公民精神的。他们之所以向着这种新的安慰一拥而上，是因为所有这些表面的、其实是机械地令人宽心的慰藉向来是容易做到的、令人愉快的，而且是非常顺手的："只需要一个欧洲的公式，一切就都可以得救；把这个公式运用起来，把它从现成的皮包中取出来，俄罗斯马上就变成欧洲，卢布马上就变成塔勒。"这些机械性的安慰之所以令人愉快，主要是因为，完全用不着去思考，至于痛苦和辗转不安那就更谈不上了。我说的是一大群人，并没有涉及正人君子们。正人君子们到处都有，在俄国的欧洲人当中也不乏其人，我尊敬他们。不过请相信，在我们这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切都进行得如同跳舞似的那样轻松。有什么好想的，何必绞尽脑汁，还要头痛；从别人那里把现成的东西拿过来，立刻就能演奏起一台和谐的音乐会：

我们只要并排坐好，
准能拉得协调。①

先生们，如果你们还不适合做音乐家，而且是大量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不适合，那可怎么办呢？如果穿白坎肩的人只能成为空谈家又该怎样办呢？假如说在将来的某一天建筑落成了，但却根本不准许绝大多数穿白坎肩的人进入已经落成的建筑（当然，这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那又怎样办呢？这就是说，可以也应该允许接纳他们，因为他们毕竟是俄国人（再说他们很多人都是好人），只要他们在某种共同的伟大事业中愿意谦恭地同整个大地② 在一起③说出自己的主张。不过，他们实际上不愿意与大地共同说出自己的主张，他们要凌驾于大地之上。直到今天，整整二百年了，他们始终都是单枪匹马，现在却能突然结合到一起吗？要知道，这不是在演滑稽戏，这需要有历史和文化，而我们现在没有文化，过去也没有文化。请看一看，认真想一想某位欧洲的俄罗斯人④ 的那股疯狂劲，而且有时这股疯狂劲出自那种从个人性格来看还是最纯洁和很可爱的欧洲俄罗斯人；请看一看，想一想这个人为自己所推崇的思想进行辩护的那股疯狂劲是多么荒唐，多么恶毒，甚至走到狂言乱语和信口诽谤的罪恶地步，而他所坚持的思想却正好

① 引自俄国寓言作家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的寓言《四重奏》（1811）。

②③ 这里的“大地”指俄罗斯老百姓。与大地在一起，指与老百姓结合。

④ 不是指欧洲的俄国侨民，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以此指俄国的西欧派。

与俄罗斯人民的世界观的性质，与人民的极其神圣的期望和信仰毫无共同之处！为了同散发着土布衣服和树皮鞋气味的大地相结合，这样的老爷，这样娇生惯养的人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要牺牲他多少神圣的书本和欧洲的信念啊？他是不会牺牲的，因为他厌恶人民，他本能地蔑视俄罗斯大地。他们说："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够出谋划策，我们对其余那些人（也就是整个大地）进行教育，把他们渐渐提高到我们这个水平，并且教导人民懂得他们的权利义务，目前这样就足以使他们感到满意了。"（原来他们是打算教导人民懂得他们的权利，主要的是懂得他们的义务！嘿，多么不自量力！）据说，"俄罗斯社会不能同脚穿树皮鞋的衣衫褴褛的人民永远停留在县城监狱里。"岂知从这样的心理出发就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再度奴役人民，奴役穿土布衣服和树皮鞋的人，当然不是走从前那种农奴制的途径，而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庇护及其政治后果：

而我们要再度锤炼人民！①

当然啦，结果将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为他们建立议会。议会一定要建立，可是打开头起，就会自己不了解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相互之间也是彼此不了解，不认识，事情必定会是这样的，他们只能是莫名其妙地互相碰碰撞撞。先生们，你们且慢生气，因为这不只是在一个像你们这种整整两个世纪脱离一切实际事情、没有任何独特文化的社会里，在第一次轮到它发表

① 这是佚名作者的一首诗的末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札记中有诗的全文，题名是《老爷的客厅》。这首诗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当时俄国社会上到处都在流传即将实行宪政的谣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宪政称作"老爷的客厅"。

自己的主张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是在有高度文化的各个民族里面也曾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他们毕竟是有悠久的文化，而且他们首先总是或多或少地依靠人民，所以他们很快就能恢复正常，走上坚定的道路，当然，也不是没有碰得鼻青脸肿的时候。而你们呢，我们的欧洲人，你们依靠什么？又是怎样对付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们都一起坐下来。可是如今我们这里出现了多少空谈家啊，有多少啊！他们好像真正在准备做一番事业。坐在你面前的是那么一位先进的、好教诲人的先生，他一发起议论来，没有头，也没有尾，全都搅到一块，混作一团。讲了一个半钟头，主要的是，讲得那样娓娓动听，就像鸟儿在歌唱。你在心中会想，他是什么人，聪明人或者是什么别的人？你也闹不明白。听起来，他的每一句话既明白又清晰，可是通篇讲话汇合到一起你却不知所云。是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简直是丝毫弄不清楚，你看见的只是夸夸其谈的母鸡，它生下来的不是鸡蛋，却是怪物。结果你只能呆呆地瞪大双眼，脑袋里是一锅粥。这是一种新型的人，不久前才出现的，文学作品还没有触及的这类人。我们现代的、最近的文学作品没有涉及到的事情还有很多，把很多事情都完全忽略了，大大落后了。越来越多的19世纪40年代的类型挤进了文学作品，50年代的也很多，大概是由于对当前一切的意义不理解，文学竟然一头扎进了历史小说①。

① 在80年代，俄国出现了许多历史小说。其作者不仅是小说家，而且也有历史学家、政论家，发表于报纸以及多种杂志。

在我们这里能够要求欧洲式的财政吗?

(《作家日记》, 1881 年, 1 月号, 第 1 章, Ⅱ)

什么叫财政? 什么是财政文章? 人们要问我。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算什么经济学家, 算什么财政专家? 我也根本就不敢写财政问题。那怎么又鼓起了勇气, 准备写呢? 这正是因为我相信, 我一提起财政问题, 就会转到完全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上, 我写出来的将不会是财政文章, 而纯粹是另外的什么文章, 就是这个原因鼓励了我。我根本没有资格谈财政问题, 因为我知道, 我全然不是以欧洲的观点观察我们的财政, 同时我也不相信能够把欧洲的观点运用到我们这里来, 这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是欧洲, 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极其特殊, 同欧洲相比, 我们几乎像生活在月球上。比如说, 在欧洲, 下等阶层对上等阶层那种奴隶的封建关系已经废除了几个世纪, 结果是爆发了革命; 总之, 一切都是文明地、历史地进行的。在我们这里农奴制及其全部后果都在刹那间就崩溃了, 谢天谢地, 没有任何革命。这样, 看起来, 怎么会有动荡, 也就是怎么会有重要的、非常巨大的动荡呢? 的确, 一切突然倒塌的东西倒塌得总是非常危险, 就是说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动荡。当然, 不是我因为突然倒塌而感到惋惜。恰恰相反, 简直好极了, 我们整个这桩可耻的历史的罪恶由于解放者的一句伟大的话顷刻之间就废除了[①]。尽管如此, 历史的法则是不能跨越的, 还是发生了强

---

① 指当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里说的是他提出农民改革, 并于 1861 年实行了农民改革。

烈的动荡。动荡强烈就强烈吧，但是怎么还是那样伟大呢？显然，一切事情都有历史法则，毋庸置疑，已经有相当多的事情在今天还能够明确指出，为什么当时一切都是那样的。不过，不再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太大，太广泛了，这是只有未来时代的历史学家才能胜任的问题）——不再多说了，我只想指出某些首先引人注目并且令人困惑的个别事实。比如说，阻碍一切，甚至阻碍农业正常发展的农奴制崩溃了，应该说，庄稼人的日子马上就该兴旺起来，庄稼人马上就该富裕起来了。可全然不是这样，庄稼人在农业上一直下跌，土地上的收获极低。主要的是，不幸就在于现在还不知道，即便到以后能否得到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又是什么），能使庄稼人敢于超越土地上现在的薄收，向土地索取高产。聪明人会说，这是一个早已尽人皆知，不值一提的问题，可是我却深信，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这是一个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无比重大、内容无比丰富的问题。其次请再看看，从前老爷的庄园全都衰落了，降低到了可怜的程度，与此同时，所有过去的土地占有者阶层明显地开始向不同于过去的某个阶层转变，向人民，向有知识的人民转变，看起来，他能往哪里变呢？看来这种转变太好了，似乎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了，因为人民非常需要给他领路的知识分子，他渴望知识分子，并在寻找知识分子。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这种事目前还停留在理想上，只能把它看做是令人向往的未来，实际上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和从前的地主是否愿意成为有知识的人民呢？问题就在这里。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里面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问题，可能还是关系到我们未来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甚至不能想象将会如何解决。这个阶层会不会反过来又想盛气凌人，依仗力量的优势再度高

踞于人民之上呢？当然不是依仗先前那种农奴制的办法。可是，比如说，它想不想利用自己的教育，不是与人民结合到一起，而是制造新的作威作福的、起分裂作用的影响，从而作为监护人民的知识分子贵族凌驾于人民之上？它是否愿意自今以后永远真诚地把人民视为自己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是否愿意尊重我们人民所尊重的；是否愿意热爱人民所热爱的事物胜过热爱自己呢？要知道，无论是什么人，他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永远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结合到一起，因为凡是人民所尊重的、热爱的东西在人民的心目中是不可动摇的，人民不会为了任何知识分子而放弃他所尊重和热爱的东西，尽管他热切地期待着知识分子。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极端迫切的，又都是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的一切，现在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重要的是，这一切的解决都要求时间、历史、文化和几代人，而在我们这里则与此相反，要在片刻间加以解决。我们与欧洲的主要不同之点就在于，我们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由于事情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进程而产生的，而是突然间，甚至纯粹是猝不及防地猛然发生，有时还是由于谁也没有料到的长官的一纸命令。当然，一切都已发生了，并且不是由于某个人的过失才发生，可能，也是历史导致的，不过，你们会同意，欧洲是没有这样的历史的。这怎么能够要求我们像欧洲，并且还要有欧洲那种财政体系呢？我如同相信经济定理那样相信，占有土地的不是铁路职工，不是工业家，不是百万富翁，不是银行家，也不是犹太人，首先全都是土地耕种者；我同样相信，谁耕种土地，谁就主导一切，土地耕种者们就是国家，就是国家的核心、心脏。然而在我们这里情况是这样的吗？在当前这个时候是不是都完全相反呢？我们的核心在哪里，都是哪些人呢？难道不是铁路占有者和犹太人掌握着我们

的经济力量吗？请看，我们在建筑铁路，这又是一件不同于别人的事。欧洲尽管有自己那种财力，还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才建成了自己的铁路网。而我们最近建的这一万五六千俄里的铁路十年就建成了，这还是在我们如此贫困和刚刚消灭农奴制之后，经济发生巨大动荡的时期！还有，明显的是，正在土地急需资金的时候，铁路把全部资金都拉到自己那方面去了。铁路是靠农业的衰落而建筑的。个体的私人土地占有问题，直到现在在我们这里得到解决没有呢？今后这种农业能否与农夫的农业以及某种工人的力量——健康的、牢靠的工人力量，而不是以无产者与小酒馆为基础的工人力量，同时共存呢？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种问题，还能有什么合理的结果呢？我们需要的就是合理的解决，在此之前是不会有安静的，可是只有安静才是一切伟大力量的源泉。现在怎么能够向我们要求欧洲那样的预算和正规的财政呢？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欧洲那样的经济和良好的财政，现在的问题倒是我们依靠什么还能够屹立不动？我们之所以屹立不动，还是依靠坚强的、团结一致的、全民的力量。

可是我们还很不安定，尤其是精神上的安定，这是最重要的安定，没有精神上的安定就不可能有任何安定。人们对这方面的安定是毫不重视的，只顾追求一时的物质上的安定。在人的头脑中没有安定，在我们的信念中没有，在我们的观点中没有，在我们的神经中没有，在我们的兴趣中没有，在所有的阶层中都是如此。甚至于连劳动和只有靠劳动“才能得救”这种意识都根本没有。没有义务感，其实义务感又从何而来呢？一个半世纪没有正常的文化了，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化。“如果我自己的文化本身都使我否定我周围的一切，我为什么还要白费事呢？假如说还有那么一些傻瓜，他们打算用欧洲的

某些谎言挽救整个建筑物，我就连这些傻瓜也全否定，我只相信一点，这就是越坏越好，这就是我的全部哲学。”请你们相信，我们这里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至少是在心里这样说，可也有人大声说出来。不过，要知道，说这些格言的人自己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说：“越坏越好，然而这只是对其他人，对大家而言，对我自己则应该尽可能地好。”你看，他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哲学。他的胃口大得像狼。这个壮得像熊一样的男子汉，神经都像女人，那样脆弱，那样娇惯；他残忍又贪图女色，经受不起任何挫折，“其实何必折磨自己，何必受罪呢?”在饭店里断了粮，妓女也销声匿迹了，那还活着干什么，干脆对准脑壳啪地一枪。如果朝自己的脑壳开一枪，从法律观点上说那还算好；否则的话，可以走出去，盗窃别人。事情已经发展到迫不及待的地步，普遍的贫困日甚一日。商人们到处都是满腹怨言，抱怨没有人买东西。工厂把生产削减到最低限度。走进商店的时候，你问一问买卖如何，他们会向你说：“从前一到节日人们一次至少买半打衬衣，可是现在呢，都是买一件。”再到时髦的饭店去问问，因为这是流露寒酸的一个最明显的地方。人们会告诉你：“不，如今人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大把花钱了，人们的手头都很紧了，很多人来到这儿都是要家常的饭菜。”要知道，这还是从前那种讲究吃喝的人，大吃大喝的人。赎金① 花光了。现在总算还可以砍伐最后的森林，一旦砍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森林的情形现在又怎样呢？乘车沿铁路走一趟，你们看看车站上堆积的木材，早先砍伐的是大树，现在常常看到的不是木材，而是细木棍，砍倒的已经不是

---

① 1861年实行农民改革时，农民从地主手中赎回应得的份地所花的金钱。

大树，而是灌木，新生长的树。显然，你会以为同当代那些重大问题相比，这一景象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的财政专家把森林完全忽略了，似乎是根据某种原则，不愿意提这件事。如果深思熟虑一番，就可以知道，没有森林，财政就会下降到可怕的程度。但是，在灾难没有降临之前，关于林业问题人们似乎只是轻描淡写地顺便提提而已。灾难会突然到来的，由于市场上的木材价格还不错，人们暂时还能沉住气。可以说，他们不愿正视这种价格是人为造成的，是那些把一切都花净光的人们不仅砍大树，连小树都一齐砍，加紧向市场提供木材而造成的。现在还在砍伐，突然就会什么都没有了，那也就没有东西可向市场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再谈吧，我是从普遍的贫困和与之相反的胃口的发达说起的。

我只是想顺便指出，我们这里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戈贝金大尉[①]，有真正的戈贝金大尉们，也有上流社会的和身上喷洒香水的戈贝金大尉们，总之，形形色色的戈贝金大尉们，他们全都要染指国库和社会财富。显然，这些人如果不是很快就变成像真正的戈贝金那样的打家劫舍的强盗，那也会变成小偷小摸的窃贼，有一些窃贼是不犯法的，还有一些则不想用法律来掩护自己，另外还有一些则大言不惭地声明："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否定一切，并且促进这种否定。"噢，难道就没有自由主义的戈贝金们吗？他们很清楚，现在自由主义是时髦的，

① 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第1卷第10章《戈贝金大尉的故事》中的人物。戈贝金大尉在保卫国家的战争中负伤，丧失了谋生的能力，但掌管国事的大官僚却置其疾苦于不顾，致使戈贝金大尉沦为传闻中的聚众抢劫的强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人物的解释不同于果戈理的构思，认为戈贝金大尉是精神卑贱、自私和贪婪的体现。

做自由主义者有好处。这种人谁都看见过，无所不在的自由主义者，廉价的无神论者，他以自己的价值一枚铜板的文化傲视人民！在我们的伪自由主义的所有的庸俗表现中他是最庸俗的，然而他的胃口却发达得无法满足，因而他是最危险的。正是这些人第一个接受一切从外部移植过来的思想，以便进行机械的医治，他们聚集在一起，结合成群，率领这一群的常常是十分正直的人们，这些正直的人有一个定规（其实他们是不能为这个定规承担过错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变革都可以，只要是不费力气就可以一举成功，"——自由主义的戈贝金这样说，——"对我来说，外部的变革，无论是什么样的变革，总是要比现在好一些，因为我准能找到从一开始我就能得到的好处。"可见，从这个方面说，他是非常危险的，虽然说他不过仅仅是一个戈贝金。然而，我们还是把戈贝金放在一边吧。关于我们这里还没有安定这个问题，现在谈过的这一切不过只是这个问题的最小的一个部分。我看，我这篇前言写得太长了。还是回到财政，回到财政吧！

为了改善根基而忘却当前需要。我因笨拙而陷入宗教说教

(《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1章，Ⅲ)

我要从结尾说起，而不是从开头说起，这是我的性格，这样，我就把我的全部思想一下子全都亮了出来。我写东西从来不会逐步展开，一步一步地前进，预先把整个思想阐述透彻，尽可能地进行论证，然后再把思想和盘托出。我没有这种耐心，性格妨碍了我，显然，我这样做对自己也有害处。因为，有的最终结论没有经过事先的酝酿，没有经过事先的论证就直截了当地讲出来，有时候简直令人惊讶和困惑，也许，还会令人见笑。我已经预感到，我的论断正是这样的，如果不让读者对它预先有思想准备，那么一说出来就会立即引起嘲笑。我的思想、我的见解是这样的："在一个经受了某些震动的国家里，为了获得充裕的国家财政，就不要过多地考虑当前的需要，无论这种需要是多么迫切，而要专心致志地去考虑改善根基，财政就会有了。"

嗯，不用说，立刻就会听到笑声："这是谁都知道的！"人们对我说，"您的说法没有一点新鲜东西；谁不知道呢，不能伤了根子，根干枯了，你就收不到果实。"等等，等等。不过，请允许我声明，我还没有说出我的全部思想。唉，我即使是写出整整一本书来阐述我的这一思想，我也不能把它解释到使人能够充分理解（这一点我又是已经预感到了），这就是我的不幸之处，因为在这个思想里面包含着的仿佛是某种天意。

要知道，关于改善根基的问题，当然人人都知道。我们的

哪一位财政部长没有或多或少地关心过根基呢，尤其是当前这位部长，他直接从根基入手，眼下已经取消了盐税。还将有一些改革，而又都是些不寻常的、基本的、确实是“根本性的”改革。而且从来如此，在从前，在十年以前就运用过许多手段改善根基：规定了各种监察，设立了各种委员会，以便考察俄罗斯农民的福利、工业、法庭、自治、疾病、道德和风习，等等，等等。各委员会又下设分会，收集各种统计材料，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也就是说是以最好的行政方式进行的，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可是，我现在谈的完全不是、根本不是我要谈的。不仅如此，不仅是各个分会，在我看来，就连废除盐税或者是期待中的重大的税制改革之类的基本改革，都不过是一些治标办法，是外在的措施，不是从根基入手的，这就是我想要说明的。从根基本身入手，这就是我们即使不是全部忘掉，至少也要忘掉一半下列问题：当前的问题，现实的迫切需要，我们的预算的紧急需要，外国借款的债务，赤字，卢布，还有就是我们的外国朋友无论怎样幸灾乐祸地预言，但我们绝对不会发生的破产。总之，我们要把一切，一切当前的事物全都忘掉，只去注意改善根基，直到取得真正丰硕、有益的成果。那时可以再回到当前的需要，或者更恰当地说，回到已经成为新的当前的需要上去。因为，应该看到，在这段间歇期间，从前的需要（也就是当代的、现在的我们当前的需要）都在急剧地变化，改变着自己的性质，以至于我们都辨认不出来了。可是这又算什么呢？不必说我也知道，人们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奇谈怪论，不能把卢布、偿还借款、军队置之不顾，这一切都必须得到圆满解决，而且，看来还得首先解决。但是，请相信，我也理解这一点。请注意，我向你们说实在的，我是故意把我的思想说得露骨，把我的希望表达到极端理想的程

度。我认为，只有达到极端，我才能更好地被人理解。因此我才说："如果我们能够迫使自己把当前的需要即使是只忘掉一半，把我们的注意力用到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事情上，用到迄今为止实际还从未考察过的深层问题上（因为人们向来都是在表面上寻找深层的东西），那又会怎样呢？"但是我立即就准备缓和自己的说法，代替这个说法，我提出："不是把当前的需要忘掉一半，我并不坚持一半，而总共只要忘掉二十分之一，但条件（必须有这个条件）是，从忘掉当前需要的二十分之一开始，每过一年就往从前那个二十分之一的数目上再增加二十分之一，就是这样，一直增加到，比如说吧，增加到忘掉四分之三。这里重要的不是比例数字，这里重要的是原则，就是采纳了的、树立为自己的目标的、然后又坚持不懈地遵循的那个原则。噢，说到这里又是那个老问题，把当前的需要摆到哪里去呢，总不能把它当做不存在的事情一笔勾销吧？我也不是说一笔勾销；我知道，不能把存在的变为不存在的，但是，先生们，你们知道，有的时候这是可以的。其实假如每一年把现在这种令人极其不安的关注只减少二十分之一，把每一年这二十分之一的令人极其不安的关注转移到别的问题上去，那么事情差不多就会出现不是空想的而是完全可能的开端，何况关于当前的需要（我要重申这一点），每年只是少注意二十分之一，它既不会失落，也不会被勾销，只凭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值得不放心的。不过，我要再次说明，它自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样子，它本身要顺应新的原则，接受新原则的意义与实质，必定要变得更好，甚至是最好。人们要说，我的话是猜测，其实这丝毫也不是猜测。关于怎样才能够立即开始从关心当前转向"改善根基"这个问题，在开头，作为例子我仅仅提出一篇最短的前言。

譬如说，如果彼得堡由于某种奇迹突然同意在自己对俄罗斯的看法上减少一点傲慢，那又将怎样呢？噢，这对“改善根基”将是一个多么可喜的、合理的开端！彼得堡意味着什么？彼得堡已经走到把自己看做整个俄罗斯的地步，这种观念代代相传，愈演愈烈。从这个意义上说，彼得堡在仿效巴黎，虽然它与巴黎毫无共同之处！巴黎是自然而然地在历史上形成的，巴黎体现着整个法兰西，体现着法兰西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意义和法兰西的整个精神，假如从法兰西拿走巴黎，法兰西还剩下什么呢？那就只剩下一个法兰西的地理定义。在我们这里有些人认为，彼得堡差不多同巴黎一样汇合了全部俄罗斯。然而，彼得堡根本不等于俄罗斯。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看来，彼得堡的意义仅仅在于那是沙皇居住的地方。其实，我们是知道这一点的，我们彼得堡的知识分子一代比一代越来越不了解俄罗斯，这就是因为知识分子脱离俄罗斯而独处于自己的楚赫纳人① 的沼泽地上，对俄罗斯看法的变化越来越大，某些人的目光最后竟至缩小到极其狭隘的地步，缩小到卡尔斯鲁厄②。然而从彼得堡向外眺望，眼前就会呈现一片汪洋大海似的俄罗斯大地，一片辽阔深邃的海洋。而彼得堡父辈的儿女却无动于衷地否定这片俄罗斯人民的海洋，把他看成是因循守旧、没有觉悟、在精神世界方面毫无价值的、极端落后的。他们说:“费奥多尔③ 是伟大的，但却是蠢货，他只配供养我们，

---

① 旧时对芬兰人的蔑称。

② 位于莱茵河畔的德国城市。俄国作家伊·屠格涅夫于1868—1869年在这个城市居住过，他的“西方化”小说《烟》即写于距卡尔斯鲁厄不远的德国城市巴登—巴登，这里提到卡尔斯鲁厄的用意可能是隐晦地攻击屠格涅夫。

③ 这里的费奥多尔似是泛指俄罗斯人民。

为的是要我们教给他智慧，教他懂得国家大事。”祖国未来的儿女们是在彼得堡游乐无度的舞会上造就的，而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赫列斯塔科夫[1] 所说的“耗子似的文牍员”[3]是在办公室里研究祖国的。当然，他们能够学懂某些事情，这完全是另一样的、有时很怪的东西，但不是俄罗斯。他们就把这另一样很怪的东西强加于俄罗斯。与此同时，那一片汪洋大海却过着独特的生活，一代比一代在精神上离开彼得堡愈来愈远。你们不要说，他的生活固然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他的生活还是不自觉的，不仅是彼得堡人，甚至是为数不很多的某些了解俄罗斯的俄罗斯人，直到现在还坚信不疑地说这种话。哎，你们要是明白这种话是多么不正确就好了。举个例子说吧，只是在当今这个沙皇统治的朝代俄罗斯人民的觉悟就增长了多少！是啊，觉悟在提高，不断地提高，人民理解和思考的事情多得令彼得堡的人们都难以置信。善于观察的人们才能发现这一点，这一点是可以预感到的，只是还没有整个显露出来，尽管在某些地方，某些角落，某些家庭和茅舍中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什么地方才能整个显现出来呢？要知道，这是一片汪洋大海，一片汪洋大海啊！但是，有那么一天整个显现出来，或者只是开始显现，那将使彼得堡的知识分子受到多大的意想不到的震惊！不错，这种人会在很长时间里否定这一切，不相信自己的五官，这种欧洲人[3] 要在很长的时期都不服输，

---

①②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人物；“耗子似的文牍员”一语出自赫列斯塔科夫。原话为：“我到部里去，只去两分钟，把事情交代一下：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另外有文牍员，像只耗子似的，只是拿笔来，嗖，嗖……地写。”

③ 这里提到的俄国的“欧洲人”，与下面文章提到的“我们的欧洲人”，均指向往西欧文明的俄国人。

有些人还要坚持到死。然而，为了避免重大的、未来的误会，最大的希望是，我重说一遍，彼得堡，即使是通过它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自己对俄罗斯的看法中能够稍稍减少一点傲慢！而在汪洋大海面前，在俄罗斯的伟大土地面前，能够增加一点真挚的、理解和谦逊的态度，这才是必不可少的。在走向“改善根基”的道路上这是多么正确的第一步……

“但是，对不起”，人们打断我的话说，“这些话不过是老一套，斯拉夫派的陈词滥调，毫无现实意义，而且带有某种宗教色彩；可是‘改善根基’是什么意思，您还没有详细解释。根基是什么？什么样的根基？您是怎样理解的？”

“你们说得对，先生们，说得好。”我们这就开始谈谈“根基”问题。

第一个根基。我以老生常谈取代明确的财政语调。汪洋大海。渴求真理和有益于财政稳定的必要性

（《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1章，Ⅳ）

第一个根基，第一个最重要的根基，一定要健全，尽可能要健全的根基，毫无疑问，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俄罗斯人民，我刚刚谈到的那一片汪洋大海。我现在要谈的就是我们普通的俄罗斯人民，就是平民百姓和农民，就是负担税赋的力量，就是那双长满老茧的劳动的双手，就是那片汪洋大海。在当今沙皇统治的朝代，我们的政府自从把俄罗斯人民由农奴的依附地位解放出来的那个时候起，已经为俄罗斯人民做了些什么，并且还在继续不停地做着什么？噢，我怎么能够不知道这一切呢？是的，政府关心俄罗斯人民的疾苦，关心他的教育、他的医疗，在必要的时候豁免他拖欠的捐税，总之，做很多事，非常关怀，这是无人不知的。但是我不想从这里说起，我想说的只是这个伟大的根基，作为一切本原的根基在精神上的健康。是的，他在精神上患病了，但不是致命的，因为他心灵的主要的强大的核心是健康的，然而病还是很严重的。是什么病，病的名称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大概可以这样说："渴求真理，但没有得到满足。"人民不断地寻找真理，寻找通往真理的途径，但始终也没有找到。我本来只想谈谈从财政观点对这种病症的看法，但不得不再说几句老生常谈。从农奴制的从属地位刚一解放出来，人民就要求和渴望某种不同于从前的新东西，这就是渴望真理，但渴望的已经是全部真理，在获得伟大的解放之后渴望走向新生活的彻底的公民新生。新的语言

应运而生，新的情感开始沸腾，对新的秩序深信不疑。在第一届第一期调停官[①] 之后，突然出现了与人民所期待的不同的另外一种秩序。人民本来很愿意相信的新秩序降临了，但是人民对它了解得很少。人民不了解它，于是便张皇失措，因而就不能相信它。出现的是某种表面的东西，似乎是同他格格不入的东西，而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不厌其烦地反复谈论这个早已谈过的问题没有必要，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人谈得比我好，读一读《罗斯报》[②] 就可以了。后来就出现了肆无忌惮的酗酒现象，酗酒如同海浪似的在全俄罗斯泛滥开来，人民如今虽然还在狂暴地喝酒，但是，他们即使在沉湎于酒的时候也仍然没有失去对新事物的渴望，对真理、新的真理、全部真理的渴望。大概人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接受某些影响和某些思潮，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没有防御力量。就以那个史敦达教派[③] 来说吧，请看看史敦达教派在人民里面取得的成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寻求真理和为真理而不安。确实是不安，现在人民在精神上确实是“惊惶不安”。我还深信不疑，如果说虚无主义的宣传至今还没有找到“通向人民”的途径，唯一的原因就是那些不善于接近人民的宣传员的无能、愚蠢和缺乏训练。不然的话，只要稍微能干一点，他们就会像史敦达教派深入人民那样渗透到人民里面去了。必须保护人民。耶稣说：

①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设置的官员，由贵族担任，任务是核准规约，调停农民与地主的纠纷，有权审判和逮捕农民。

② 俄国斯拉夫派报纸，1880—1886年在莫斯科出版，主编兼发行人为伊·谢·阿克萨科夫。这里指的是《罗斯报》上伊·阿克萨科夫的社论和H·M·帕夫洛夫的小品文。

③ 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中的宗教派别，受新教影响，是新教教义与精神基督派教义结合的产物。俄国自由派认为史敦达教派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温和反对派。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1] 就是在现在，似乎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不仅是发生在人民中间，也许就在我们的上层中也是如此。譬如，关于重新划割份地、关于新的金字诏书[2] 的各种非同寻常的谣言难道能够不使人民骚动不安吗？不久前在教堂向他们宣读了声明[3]，叫他们不要相信谣言，告诉他们那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可是你们能相信吗？正是宣读之后，在有些地方"真有这回事"的思想反而更加坚定了："不会无缘无故就宣读声明，既然要宣读，那就是真有其事。"这就是宣读之后他们立即开始议论的事，至少在有些地方是这样的。我自己就知道这样一件事：农民买了附近地主的土地，价钱也谈妥了，可是在宣读声明之后，农民不买了，说是"不花钱我们也能得到土

① 基督告诫自己的门徒防范假基督、假预言家的话。原文是："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4 章）

② 关于新的金字诏书，在人民的意识中，金是权力，首先是皇帝权力的象征。俄国宣布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后，各地谣言蜂起，说已经公布的宣言是假的，另外还有一个用金字制成的真正的沙皇诏书被隐藏起来了，沙皇的金字诏书允许给农民完全脱离地主的全部自由。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俄国革命者也不止一次地把自己向农民发出的呼吁称为金字诏书，有时候还以沙皇的名义发布假的金字诏书，号召农民起义反对地主和官僚。

③ 1879 年 6 月 17 日俄国政府的《政府公报》登载了《内政部长的声明》。声明说，近来各地农村盛传即将平分土地，划割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消息，纯系谣言惑众。《声明》奉沙皇旨意宣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再划割土地给农民。政府在辟谣的同时又深恐引起扩散谣言等相反的结果，又特别指示省督选择有利的时机向农民宣布声明，后又指示不要在教堂宣布。但看来，有的地方政府还是在教堂宣布了。因而，革命民粹派的"土地平分社"在自己 1879 年 11 月的秘密宣言中指出沙皇是站在地主方面的，号召农民要认清沙皇政府的真实面目。

地”，他们都在笑眯眯地等待着。我只是说谣言，说轻信谣言，说明人民在精神上的不安。而主要的是，人民在我们这里是孤单的，也就是说，是孤立无援的，一切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精神上任何人都不支持他。有地方自治局，但它是“长官”；有法庭，但那也是“长官”；有村社，最后，还有村民会议，而这一切现在似乎也要倾向于变得与长官差不多。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说人民如何在“长官”、某位常任委员的指导下选举自己的代表以及选举的进行情况①。但是笑话层出不穷，我就不一一去说了。有的头脑简单的人向自己周围看了看，突然明白了，只有财主和吸血鬼的生活过得好，似乎一切都是为他们而做的，所以，他说，我也要做财主，于是他将要成为财主。其他的，比较温顺一些的人干脆就成了酒鬼，这并非因为被贫困压倒了，而是由于毫无权利而苦恼。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命运。要知道，似乎是早已有了管理机构，有了官长，应该平静下来了，可是不知为什么，结果却相反。这不是，有人数过了，现在，就是目前这个时刻，人民差不多有二十个官员，都是专门为他们设立的，站在他们头上的，保卫他们、监护他们的。除开这些官员，这些可怜的人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官长了，而这里又有了二十个专门的官长！活动的自由如同落到糖浆盘子里的苍蝇的自由。而实际上像这样活动的自由，不仅从道德观点说，就是从财政观点说也是有害的。主要的是，人民是孤单的，没有给他出谋划策的人。人民只有上帝和沙皇，他就是依靠这两种力量和这两个伟大的希望支撑着。而其余那些出谋划策的人都不理睬他们，与他们毫不相干。例如，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毫无例外地都不理睬人民，这是因为

① 选举地方自治局的农民代表。

在我们的知识分子里虽然有很多头脑精明的人，但是他们对俄罗斯人民很少理解。在我们这里一个劲地否定，而且还不停地抱怨："社会为什么不能'振作'，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使其振奋起来，这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啊！"不能使它振奋起来，这是因为你们不依靠人民，人民在精神上跟你们不一致，同你们格格不入。你们好像在构成一个盘踞在人民之上的、笼罩着俄罗斯大地的上层领域，对你们本身来说，至少是像你们说的和写的那样，改革者之所以让人民留在农奴的地位，目的是使人民以自己的劳动为你们效劳，向你们提供你们向欧洲教育靠拢的手段。你们于是受了二百年[1]的教育，可是人民却离开了你们，你们也离开了人民。你们要说："难道不是我们为人民劳心费神吗，不是我为人民而执笔不停地写吗，不是我们在呼唤人民并且呼吁关心人民吗？"对，你们是在做这一切，可是不知为什么俄罗斯人民却深信你们关怀的不是他，而是早就深深印在你们头脑中的与俄罗斯人民不同的另一种人民，对俄罗斯人民你们甚至是鄙视的。对人民的这种鄙视态度在你们某些人中间完全是不自觉的，可以说，肯定是无意识的，这是农奴制的残余。自从有了我们的欧洲教育，使人民在公民的意义上被窒息以来就出现了这种鄙视态度，并在我们这里毫无疑问一直存在到今天，存在到人民新生的日子。要知道，如果在俄罗斯的大地上不出现什么奇迹的话，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与人民走到一起了。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早已说过的老话，俄罗斯人民绝大多数是信仰东正教的，毫无保留地忠于东正教思想，虽然他们对这一思想还没有明确的科学理解。实际上在我们人民那里除开这一种"思想"之外没有别的思想，一切都来源于这个

① 指彼得大帝改革以来。

唯一的思想，至少我们的人民希望是这样的，他自己全心全意地希望着，以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念希望着。他希望的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赐予他的一切全都是出自这个唯一的思想。人民自己也有很多东西是荒唐的，但它并非出自这个唯一的思想，而是来自令人厌恶的、卑鄙龌龊的、犯法的、野蛮的和罪恶的人。但是这些罪犯和野蛮人尽管在进行罪恶活动，同时却还要向上帝祈祷，这是在自己精神生活的最重要时刻所做的，目的是阻止他们的罪行和卑鄙勾当，这一切又是出于他们那个可爱的“思想”。我知道，我们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嘲笑我了，他们竟然不愿意承认人民中间的“那种思想”，他们在罗列人民的罪过、人民的劣行时（由于他们压迫了人民两个世纪，他们自己对这一切是负有责任的），他们举出人民的种种偏见，人民对宗教的似乎冷漠的态度，还有些人甚至认为俄罗斯人民纯粹是无神论者。这些人的全部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承认俄罗斯人民的宗教。我现在说的宗教不是指教堂，也不是指教士，我现在说的宗教是指我们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无论看上去是多么奇怪，我使用这个与宗教完全相反的词汇就是为了说明我的思想），由于大地能够容纳这个宗教，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与结果就是在世界上实现全人类的与全世界的宗教。我说的是在俄罗斯人民里面始终固有的，那种为了基督而永不懈怠的，对伟大的、普遍的、全人类的、人与人的兄弟般的团结的渴求。如果说这种团结还没有实现，如果说这种宗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里说的不是在祈祷中建立，而是说在实际上建立），那么这种宗教的本性，这种宗教的永不懈怠的渴求，即使有时这还几乎是不自觉的渴求，在我们千百万人民的心中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俄罗斯人民的社会主义不是表现在共产主义上，也不是表现在机械的形式上，因为俄罗斯人民相信，归

根结底只有通过为了基督而实现的全世界的普遍团结他才能得到拯救。这就是我们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欧洲人，先生们，你们嘲笑的就是存在于俄罗斯人民中间的这种高尚的使人团结的“宗教”思想。噢，在人民中间还存在许多别的“思想”，你们是永远也不会赞同这些思想的，以你们的欧洲世界观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些鞑靼人的思想。关于这些思想，关于所有其余那些思想，我现在就不想提了，虽然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的真理你们根本不理解。但是现在我要说的只是我们人民的这个主要的思想，说说人民对未来的、由于上帝的旨意而存在于他们自身的，也就是对他们的世界宗教的期望。在这里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论断：在我们人民中间谁要是不理解他们的东正教和东正教的最终目的，他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的人民本身。不仅如此，他也不可能热爱俄罗斯人民（其实，在他们，也就是我们的欧洲人里面有很多人的心灵是纯洁的，追求正义和爱心的），他热爱的只是他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的俄罗斯人民，他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的俄罗斯人民。然而，由于人民永远也不会变成我们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们希望看到的那种样子，而是原封不动地保留自己的本来面目，由此就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危险的冲突。上面说的这个论断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人民从来也不把那种俄国的欧洲人当做自己的人：“你要首先爱我所珍视的东西，你要尊敬我所尊敬的东西，到那个时候你就跟我一模一样，是我的弟兄，尽管你穿的不跟我一样，你是老爷，你是官长，有的时候甚至不会很流利地讲俄语。”这就是人民要对你们说的话，因为我们的人民是坦荡和聪明的。他有的时候也尊敬并且热爱不相信他所珍视的东西的好人，如果那个人聪明的话，他也倾听那个人的话，感谢并且利用那个人的主意。俄国人民能

够跟一切人和睦相处，这是因为在最近这二百年的漫长、艰难的生活岁月里他们饱经世故，见多识广。（可是你们是不会同意认为他们见多识广这种说法的，因为这样说来，他们就是自觉的了，这样说来，他们就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因循守旧的群众和仅仅是负担税款的力量了。）然而，与人和睦相处，甚至于是亲切地和睦相处——这是一回事，而把这个人看做自己的人——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而没有这种认可，就不可能有团结。

我只想说明，使我们与人民分裂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人民始终是孤单的，人民孤立无援，除开他始终不渝地相信的沙皇之外，他已经不指望，也看不到来自任何人和任何地方的支持。他当然很想看到，但他却极难看得到。当然，如果在我们这里能够实现知识分子阶层与人民的结合，噢，那时在罗斯将会出现多么强大的、积极的和极其美好的力量，新的、从未有过的新的力量！这里说的是精神上的结合。嗯，财政部长先生们，那个时候你们编制的年度预算就不会是像现在的预算了！在大地上牛奶要像河水一样地流淌，你们的全部理想将会立即实现！“这倒是好，可是怎样做才能够达到呢，难道说这都归罪于我们的欧洲教育吗？”噢，根本不是教育的问题，而且，说实在的，我们还没有教育，直到今天也还全然没有。不过，隔阂毕竟还是存在的，隔阂的原因似乎确实是由于我们所还没有的欧洲教育。实际上，真正的教育在这场合是没有过错的。我甚至于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教育，我们这里就根本不会发生任何隔阂，因为人民渴望得到教育。可是，我们一获得教育，就要离开人民，飞向月亮，失去走向人民的一切道路。我们这种飞离人民的人们怎么能够担当起关怀人民、使人民强健起来的责任呢？为了使普遍苦闷不安的人

民精神振奋起来，平静下来，应该做些什么呢？要知道，财富本身和财富的运行都在寻找精神上的平静，如果没有精神上的平静，它们就会是销声匿迹，或是白白浪费。为了使人民的精神看到真理并由于真理而平静下来，应该怎样做呢？可能，真理就在眼前，但是需要使人民相信这个真理。可是怎样能使人民在内心相信，俄罗斯大地上有真理，而真理的旗帜又高高飘扬呢？又比如说，要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深信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代表性，并承认后者与自己血肉相关呢？我不想说得很详细了，如果我要把一切全都详细地述说并描绘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① 但是，要是能向人民保证真理在于未来，使得他们深信真理定会到来，该多么好；要是能让苍蝇即使稍微挣脱装糖浆的盘子，那时就会实现无法估量的伟大事业。我坦率地说，全部灾难都是由于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与我们的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怎样才能使上层与人民这片汪洋大海和解起来，怎样才能使人民这片汪洋大海平静下来，不致发生激烈的动荡呢？

① 引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21章。原文为：“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让别人先说[①]，我们暂且旁观，唯一的目的就是学聪明一点儿

（《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1章，V）

回答这些问题有一句魔法般的话，这就是："要信任。"是的，我们的人民是可信任的，因为他们值得信任。请把穿一身家织灰粗呢衣服的农民叫过来，问问他们自己，他们有什么需要，问问他们要求什么，他们会把真理告诉你们，我们所有的人可能还是第一次听到实在的真理。不需要任何郑重的动员和集会，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县份或一个农舍向人民询问。因为我们的人民即便是坐在各自的角落，他们说出来的话也跟同大家凑在一起时所讲的话丝毫不差，因为人民是一致的，聚在一起是一致的，分散开来也是一致的，因为人民的精神是一致的。每一个地方只不过增加上自己的地方特点，而从整体上说，从总的方面说，都是吻合的，一致的。必须恪守的是，发言的人只能是农民，只能是地道的农民。不错，富农和高利贷者也要冒充农民，不过他们其实也是农民，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就是富农和高利贷者也不会背叛大地，也要说实话，我们人民的特点就是这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噢，拥有权势的人们能够比我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只相信一点，这就是完全不必使用特别的说法。我们的人民不注重形式，特别是现成的、外来的形式，他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些形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章中提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应该首先倾听人民的声音。

式，因为在他的头脑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不仅从来就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是因为他对这种事情有不同的观点，特殊的、纯粹是他独具的观点。是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像我们的人民这样的人民，是十分值得信赖的。没有谁没看到过他在沙皇前后左右的情形吧？他们是沙皇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亲生的孩子，沙皇则是他们的父亲。难道说，"沙皇对他们来说就是父亲"这句话在我们这里仅仅是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吗？谁要是这样想，他就是对俄罗斯毫无了解！不，这是一种思想，深刻的独特的思想，这是一个机体，朝气蓬勃的、强大的机体，与自己的沙皇融为一体的人民的机体。这种思想就是力量。这个力量是几个世纪形成的，特别是最近两个对人民来说可怕的世纪形成的。我们为了我们所受的教育而对这两个世纪备加赞扬，与此同时，我们却忘记了，早在两个世纪之前，为我们服务的俄罗斯人民就以其农奴的劳役和背负十字架的苦难为我们接受这种教育做好了准备。人民在期待着自己的解放者，他终于等到了，因此他们怎么会不是沙皇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子民呢？对人民来说，沙皇不是外在的力量，不是某个胜利者的力量（例如，法国从前历代皇帝的王位就是这样的力量），而是全体人民的、联合一切的力量，这是人民自己期望的、人民在自己的心中孕育的、人民热爱的、人民宁愿为它而承受苦难的力量，因为人民只能把自己走出埃及[①] 的期望寄托在这个力量上。在人民看来，沙皇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是他的思想、希望和信仰的化身。不

① 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故事讲摩西率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个典故比喻俄国人民希望摆脱受奴役的处境。

久之前这些希望圆满实现了，人民怎么能够放弃下一步的期望呢？相反，他们的期望怎么能不更强烈，不更坚定呢？因为在农民改革之后，沙皇不仅在思想中，也不仅在人们的期望中，而是在事实上成了人民的父亲。人民对待沙皇如同对待父亲一样，这种态度是我们这里能够实施、也正在实施的一切改革的真正的、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在我们俄罗斯，除开人民与自己沙皇的这种本能的、生机勃勃的联系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扶持、保护和引导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一切都源于这种联系。就以农民改革这件事情做例子来说吧，假如事先不知道也不相信对人民来说沙皇就是父亲，正是人民对沙皇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的信赖在拯救一切，保护一切，消灾灭祸，这件事谁又能够想象得到呢？唉，由于某种偏见和异己的信念而无视真正的、确实是生机盎然的人民力量的经济学家-改革家是蹩脚的经济学家-改革家。俄罗斯人民对自己沙皇的这种态度是我们的人民有别于欧洲和全世界所有其他民族的最独特之处；这种态度绝非我们的一时之计，不是转瞬即逝的态度，也不像有的聪明人所认为的那样，比如说，是人民成长过程中的幼稚阶段的标志，等等。这是世代相传的、永恒的，任何时候，至少是很长很长时期内不会改变的。可是我们虽然知道也理解人民对沙皇的这种态度，但是我们却不能把我们命运中的这个最重要的、须臾不可或缺的因素与我们的血肉完全融为一体，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不能与人民站到一起，不能理解人民。由于这一切（仅仅根据这一点），我们的人民怎么能够不是有别于一切其他民族的独特的人民呢？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呢？反过来说，显而易见，我们的人民本身具有不同于全世界的固有的思想。这种思想自身就拥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必将对我们整个未来的历史发生作

用，由于这是任何民族都没有的完全独特的思想，我们的历史也不可能与欧洲其他民族的历史相似，尤其不是对他们的历史的奴颜婢膝般的模仿。这就是我们那些聪明的人们所不理解的，他们相信我们这里的一切都要改造成欧洲，没有任何独特性，他们厌恶独特性，显然，由于这个原因事情甚至会以灾难告终。至于说我们的一切基本的东西是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可以向你们举出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我们这里的自由（等到将来，在我们熬过我们的伪欧洲主义阶段之后，大概将会是这样的），我们的公民自由能够成为比世界上、比欧洲、甚至比北美都最充分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的，这不是靠一纸文书确定下来的，而是以人民对沙皇如同对父亲一般纯真的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于孩子们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允许的，这在其他民族里面是不可思议的，对于孩子们可以给予那么多的信任，允许那么多的事情，这在任何地方都是见所未见的，这是因为孩子们是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父亲的，再说，孩子们也会作为孩子怀着敬爱的心情接受父亲对他的任何错误与任何迷误的一切纠正。

难道可以拒绝信任这样的人民吗？应该让他们自己说出自己的需要以及有关这些需要的全部真实。不过我要再说一遍，应该让人民自己先讲话；而我们，“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就暂时先温顺地站在旁边，首先只是观察，看看，听听人民将怎样说他们的需要。噢，如果说我建议暂时排除知识分子，这并不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请不要把政治目的强加到我的头上。但是我可以从纯粹的教育目的出发提出这个建议（请原谅）。是的，就让我们暂且站在旁边倾听，听听人民在没有我们的任何帮助下是多么明确，多么透彻地讲述自己的真理，关于事情，实实在在的事情讲得是多么切中要害，如果牵涉到我们的

话，那也不会使我们难堪。那就让我们站在一边，向人民学习如何表达真理吧。就让我向人民学习人民的温顺，人民的干练，人民智慧的现实性和他的智慧的严肃性吧。你们会说："您自己不是说过吗，人民很容易受各种道听途说的影响，从他那里能得到什么智慧呢?"是这样的，不过道听途说是一回事，在共同事业中的一致则是另外一回事。整体的事业必定会有的，而整体的事业必将自己对自己产生影响，从而唤起智慧。的确，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真正是一所学校，极其富有教益的学校。从人民那里看到那么高度的干练和严肃精神，我们会感到困惑不解，毫无疑问，我们中间会有人不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不过这种人是非常少的，因为一切确实是真心诚意的人们、一切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主要是追求事业、追求真正的事业和共同利益的人们都会赞成人民的至理名言；凡是心无诚意的人们也会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全部真相，而且是自我暴露。如果说依然还会有那么一些心地真诚的人们始终不相信人民，那么，这就是那些头脑守旧的人，死死抱住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教条不放的人们，过时的和不可救药的孩子们，他们只能令人发笑，但于事无害。除开这些人之外，所有其余的人都是第一次擦亮自己的眼睛，澄清自己的理解。这种行动从后果来看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因为这种形式可能就是我们对人民那么傲慢的整个知识阶层与我们人民的精神结合的开端，是第一步。我说的只是精神上的结合，而且只是说这种结合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它对一切都有极大的帮助，使一切得以更新，并提出新的思想。我想，我们的优秀的、朝气蓬勃的青年将会毫不犹豫地首先把自己的心灵献给人民，最先从精神上理解人民。我之所以把希望首先寄托在青年身上，是因为我们的青年也正在为"寻求真理"、渴望真理而

苦恼，这就是说，我们的青年是最接近人民的，他们最容易理解人民是在探求真理。一旦深入了解了人民的心灵，他们就会抛弃那些极端的胡思乱想，而那些自以为在纯粹的欧洲学说中找到真理的许多人就是受了这些胡思乱想的诱惑。嗯，我相信，我不是在幻想，也不是在夸大从那么好的事情中能够得到的有益后果。傲慢将会消失，对土地的敬意定将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新思想将会突然进入我们的心灵，照亮我们内心中迄今未被发现的一切，并以自己的光辉揭穿谎言，把谎言铲除干净。说不定，可能这就是那种从自己的意义上说比农民改革还重要的改革的开端，因为这里发生的将是又一次"解放"，我们的头脑和心灵摆脱某种类似农奴的依附性的解放。在欧洲我们已经整整两个世纪处于这种依附地位了，正如我们这里的农民，我们不久前的奴隶所处的地位那样。假如这第二次改革能够开始并且得以实现的话，当然那只能是沙皇登基之初实行的伟大的第一次改革① 的后果。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把人民与知识分子分割了两个世纪的墙壁实际上就倒塌了，而现在这垛墙在精神上已经摇摇欲坠。难道说还有什么东西比各阶层的这种精神结合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更重要、更有益吗？自己的人第一次了解自己的人。一直都在认为自己的人民野蛮、阻碍发展，因而以自己的人民为耻的人们将会感到自己从前这种耻辱感是可耻的，在很多人和事的面前都将变得温顺，对从前不尊重的、蔑视的很多人和事都会加以尊重了。在人民做出回答，讲出了关于自己的一切，在他那谦恭的话声一落时，这时就请问一问，试问我们的知识分子，只须问问他对人民所说的话有什

① 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及1861年的农民改革。下文说的"两个世纪"是指彼得大帝改革以来。

么见解，你们立即就可以看到结果。噢，这时他们的话也将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最后的论断将由他们来做。但是，人民在知识分子之前至少是讲出了自己的意见，人民的榜样将使我们避免许多过失和蠢事，而如果我们自己必须先于人民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话，这些过失和蠢事就将是不可避免的。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不会讲出任何与人民背道而驰的话，他们仅仅是用科学的语言表达人民的真理，并且竭尽自己的全部学识发展它，因为知识分子毕竟是掌握着科学或者科学的基础，而人民则如饥似渴地需要科学。即便是有什么人想要背道而驰，即便是出现了某些与我们人民的基本精神不一致的看法，他们也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对人民的精神，也就是反对人民的观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

的确，很有可能，在我们这里正是从这一步做起，精神的安定就开始出现了，共同的、整体的希望就形成了，我们的目的就会被明确地意识到并且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自觉的力量，我们的全体知识分子对我们将来的目的，也就是全民族的、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是什么，都毫无所知，或者是知道得很不彻底，非常模糊。恰恰是现在，在当前时刻，这是我们的极大弱点。而在这方面的混乱，在这方面的无知，毫无疑问就是严重的不安和紊乱的根源，而且不仅是在目前，就是到了将来也是前所未有的苦难的根源。所有这一切本来是能够说清楚，能够阐明的，或者至少是初步指出，关于这个目的应该如何阐明，如何解释，并引向一种想法……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谈到这里就够了，我能说的话全都说了。如果我没有能够表达透彻，人们什么也没能理解，这只能责怪我自己。但是，如果人们理解了什么，那就务

请看到它是不含恶意的，是和善的，从而加以采纳。我只有一个愿望，这就是不带偏见地理解我，我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护人民，我如同相信最神圣的事物一样相信人民的心灵，相信人民的伟大力量，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力量的宏伟和重要意义。主要的是，我相信这种力量肩负的拯救的使命，相信伟大人民的保卫和创造精神，我热切期望的只有一点，这就是期望所有的人都认清人民的伟大力量。一旦认清了，其余的一切也就立即能够理解了。

怎么能说这一切全都是幻想呢？其实我说的并不是包罗无遗的全部事情，我说的只是庄稼人，庄稼人自己的基本的事情，只是涉及到他的事情。难道说庄稼人就没有独特的、唯独他们自己才有的事情吗？可以说，这里所说的是作为任何继续开展的改革、即使是规模非常宏大的改革的开端与前奏而必须了解的事情。实际上，这里所能获得的益处是极其巨大的。知道了事实，把握了很多事情的真实情况，获得可贵的材料，使我们很多人免于陷入虚无缥缈的希望，免于按西方模式扭曲自己，免于夸张。我还要再说一遍，主要的是，能够得到一种基调和思想，得到一种这样的精神——能够赖以完成一切今后继续发展的规模宏大的事业的精神。在这种事情上似乎刻画着一种烙印，这就是民族的烙印，极其保守的烙印。即使到以后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摆脱这种烙印，就连那些最富于幻想的人也摆脱不掉，就是他们也要受这种烙印的诱惑，心甘情愿地接受它。

机智的官僚。他对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和欧洲派人士的看法

（《作家日记》，1881 年，1 月号，第 2 章，Ⅰ）

写完我这第 1 章之后，关于财政的文章我要暂告停笔，因为我感到我写得太枯燥了，不过这仅仅是暂停。我还想要谈谈我认为应该加强的另外那些根基和另外那些本原。我之所以暂停还是因为在我的《日记》的两个印刷页[1] 中即使不写财政问题也已经不足以容纳全部文章了，所以不得不把财政问题留到以后的几期……

"没有必要，在以后的几期中也不需要。"有人以厌恶的口吻打断我的话（我已经预感到这种声音）。"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谈财政，而是胡闹……这一切全都不现实（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现实），这一切都是一种内容神秘的东西，而不是迫切需要的日常的东西！今后的各期刊登小说吧。"

真是奇谈怪论！其实我主张的就是，从我们现时迫切需要的、日常的事情中抛弃很多东西，同时为自己创造另外一种迫切需要的、日常的东西，这要比我们已经陷入进去，并且请原谅，也如同蜜糖盘子中的苍蝇似的坐在其中的那种现时更现实得不可比拟，这就是我的全部思想。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头脑和目光转向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方向，这就是我的思想。有权力的人们是能够着手做这种事情的，从这个角度说，我的那些幻想就全然不是那样虚无缥缈，因为当局如果动手去

[1] 按：《作家日记》每期的篇幅为两个印刷页。

做，很多事情甚至顷刻之间就能实现。原则，我们的某些原则必须完全改变，把苍蝇从糖浆盘子中拉出来，解放它。这个思想似乎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习惯于不行动，坐在糖浆盘子里面还觉得很甜蜜。的确，我又离题了，人们立刻就会提醒我，我已经写了那么多，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打算说明我认为现时的日常需要是什么，我认为比现时的日常需要更重要的未来的日常需要是什么。这正是我想在我的未来几期的《日记》中竭力说明的。为了现在就结束我的话，我说说我与一位相当机智的官僚的一次谈话，这位官僚对我讲了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关系到改变我们现在的“日常需要”的某些原则的事情。谈话是在一个团体里进行的，谈的恰恰是关于财政和节约问题，特别着眼于如何珍惜我们的财力，积蓄财力，把钱财运用于事业，一个戈比也不要损失，不要无谓地耗费掉。我们这里现在时时刻刻都在从这个意义上谈论节约问题，政府也在不遗余力地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进行监督，每年都在削减编制。近来甚至提出裁减军队，在报纸上还提出了数字，就是要裁减五万名军人，还有一些人论证说可以把我们的军队裁减一半，不会因此而出现任何问题，这本来是很好的，只是我头脑中不由地冒出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裁减军队，开始就算减五万人吧，可是省下的钱不知不觉就从手指缝中漏掉了，那里花一点，这里用一点，当然都是国家的需要，然而，可能都不是那种值得做出忍痛牺牲的需要。裁减的五万人我们再也建立不起来，或者要付出极大的力量去重建，因为一旦消灭了，再要恢复是很困难的，而军队对我们来说又是多么需要，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在心怀诡计反对我们的时刻。但这只是在现在，也就是在需要花钱的目前时刻，选择这条路是危险的。只有在我们实行，比如说，彻底的、严厉的、痛苦的

节约的时候，以彼得大帝（如果他决定要节约的话）的精神和力量实行节约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深信不疑地说，这些宝贵的钱财确实用在了真正的事业上。然而，我们正在以我们日常的“迫切需要”束缚着自己的手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呢？我还要指出，我们如果这样做了，或者开始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从过去的不切实际的日常需要向新的、现实的和应有的需要转变上迈出的第一步。我们经常不断地压缩编制、裁减官员的人数，实际结果却是编制和人数好像总是在增加。然而我们能不能这样来裁减，比如说从四十名官员一下子就减为四名呢？这四名官员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四十个人做的事情。当然，对此，任何人都不会反对，尤其是对削减文牍事务以及现在的办事方式整个进行激进的改造。这就是我们一些人议论的题目，有些人认为，这至少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另外一些人则反驳说，其实，我们已经实行的是远远超过这种改革的极其重要的改革。第三种人则说，可以给新的官员，就是取代那四十人的四名官员增加三倍薪俸，他们会毫无怨言地心甘情愿地工作。其实，即使给四个人增加三倍的薪俸，结果不过是等于现在的十二个人，那时我们减少的费用差不多是现在的四分之三。

谈到这里我的官员打住了我的话。我要指出的首先是，这令我极为惊讶。他一点也不反对以四个人代替四十人的可能性，他说：“即使是四个人事情也照常进行。”这就是说，他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反对的是别的东西，反对的正是原则，他认为上述原则是错误的，是有罪过的。我不仅不是逐字逐句地转述他的反对意见，而且还突出了我自己的看法。我再重说一遍，我之所以要转述他的话，就是因为我感到他的思想独特，含有某些近乎异常的思想。当然，他不想与我详谈，因

为我在这方面不是内行，“懂得很少”（不必说，我自己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一点），不过，他希望我能理解他的原则。

他开始严肃而又深刻地说：把四十名官员裁减成四名对事业不仅无益，而且从事实本身看还是有害的，虽然国家花费确实省下了不少。其实从四十人减到四个人，人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您这样就严重侵犯了基本原则。从彼得大帝以来，已经将近二百年了，我们，官僚阶层就构成国家的一切；实质上我们就是国家和一切，而其他的东西不过是个尾数。至少直到不久之前，直到农民解放之前还是这样。过去所有那些选举出来的职位，例如贵族的职位自然而然地，可以说由于引力的作用都接受了我们的精神和想法。而我们尽管看到这一切，根本没有感到不安，因为二百年前制定的原则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民改革之后确实刮起了一股新风，出现了自治制度，还有什么地方自治局之类的东西……现在看清楚了，所有这些新的东西立刻就自然而然地开始接受我们的面貌、我们的灵魂和躯体，演变成为我们。这种情况的出现丝毫不是由于我们的压力（这是错误的思想），纯粹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抛弃世世代代形成的习惯是很难的，也许，本来就没有必要抛弃，尤其是在这种基本的和巨大的全民族的事业中。您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是您要是能够深入想一想，自然就理解了。因为，我们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们就是一切，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一切，今后也仍然是一切，虽然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孜孜以求要成为这样，可以说，我们一点也没有花过力气，这确实是不由自主地形成的，事物的自然进程导致的。早就有人在大喊大叫，说我们这里的事情都是例行公式，毫无生气，死气沉沉，文牍主义，说俄罗斯已发展成熟了，这些对它都不适合了。可能，俄罗斯已经发展成熟了，然而目前依然是我们这些人在支撑着它，建设

它，保护它，使它不至于瓦解！你们叫做呆滞僵化的例行公式的事情，也就是作为成规的我们这些人和我们的全部活动，假如打个比喻的话，可以这样说，所有这一切就如同一个活的机体中的骨架。骨架一散，全部骨骼就散架了，活的机体也就毁灭了。好啦，就算事情进行得死气沉沉吧，但是要遵循制度、遵循原则、遵循伟大的原则，请原谅我这样说。就算事情办得如同例行公事一样，甚至办得不好，不完美，然而，实际上好歹是在进行着，而且，主要的是，一切都存在着，没垮掉，都还没有垮掉，这正是要害。我同意，也愿意向您的看法让步，这就是，事实上，也许我们并不是一切，噢，我们还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知道在俄罗斯我们并不能取代一切，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时刻；不过即使不是一切，但毕竟还是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一个部分是现实的，真实存在的，不言而喻，虽然有可能这个部分局部地是无实体的。嗯，可是你们有什么能够用以取代我们的东西，哪怕这东西也是一个部分，但它要能够不丧失任何东西就取代我们，使我们能够因此而满怀信心地退避三舍呢？其实所有你们那些自治制度和地方自治局，所有这一切只是在天空中翱翔的鹤，迄今还只是美丽的、在天空中盘旋的鹤，却还没有落到地上。可见，虽然美丽，但终究等于零，而我们呢，虽然不漂亮，并且令人生厌，但我们却是一个部分，完全不是一个零。就是你们为了这只鹤众口同声地责怪我们，说这只鹤之所以没有落到地面上，是我们的罪过，似乎是我们在极力用我们的面貌和精神改造这只美丽的鹤。假如这里真的仅仅是我们的过错，显然，我们就承蒙嘉奖了，因为我们借此就证明了，我们是在捍卫世世代代的、基本的和崇高的原则，我们把没有的零变成为一个有益的东西。不过请相信，我们在这方面毫无过错可言，可以说过错非常之小，倒是这只美丽的

鹤自己迟疑不决，他最终应该变成什么，就是说，变成我们或者真正地变成什么独创的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摇摆不定，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几乎是不知所措。我向你们保证，他是自愿归附我们的，根本没有受到我们的压力。看来，我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如同一个自然磁体，直到现在，它还在吸引着一切，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它还会吸引一切。你们还是不相信我的话，你们觉得可笑吗？可是我愿意随便拿什么打赌，你们不妨试一试，把束缚你们那只美丽的鸟儿翅膀的东西完全松开，给他充分的自由，例如对你们的地方自治局不妨下达要它进行活动的正式规定，同时严肃地告诉它："从现在起你就独立了，不再是官僚主义的仙鹤了。"请相信，他们无一例外，形形色色的鹤都要比过去更迫切地主动向我们求援，结局是他们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员，接受我们的精神和形象，全盘照搬我们的一切。即使被选举出来的庄稼人也向我们求助，而这是使他感到非常荣耀的。二百年间形成的好恶不是没有意义的。可是现在你们想要我们，即坚实的、牢靠的一个部分拿自己去同那个谜、那个难以捉摸的东西，同你们美丽的鹤相交换吗？不，我们宁愿保留自己的山雀，我们宁愿自己想办法改善自己，清除污垢，实行某些新的措施，这样说吧，更进步的、更符合时代精神的措施，从而变得道德更高尚一些，等等，然而我们决不会拿我们的实实在在的、现实的一个部分去交换幻影，去交换出乎意料地梦见的东西，因为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能取代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抵制消灭我们的意图，可以这样说，是出于惰性。我们身上的这种惰性是可贵的，因为，说实在的，在现代，一切都只是由这种惰性支撑着。所以说即使由四十人裁减为三十八人（更不用说由四十人减为四人）也是极为有害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事情。你们得到

的是一枚铜板，而毁了的是一个原则。你们就消灭、更改我们的规则吧，只要你们的良心让你们做这种事情。其实这将是对我们全俄罗斯的欧洲主义和教育的背叛，这个你们知道吗？这将是否定我们即国家，否定我们即欧洲人，这是背叛彼得大帝！你们也知道，你们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我们的也是一样）那么热衷于在报纸上反对官僚制度，为地方自治辩护，实质上他们是在自己跟自己作对。实际上，地方自治也好，所有这些新东西和“人民性”也好，其实都不过是我们那些欧洲派人物深恶痛绝的“俄罗斯派”①（也许你们已经知道了，在柏林就是这样称呼他们）所大肆宣扬的“人民的本原”，或者是那些“本原”的初步表述；就是我们的自由主义和欧洲主义所激烈否认、冷嘲热讽、不愿意承认其存在的那些“本原”！噢，我们的自由主义和欧洲主义非常害怕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事实上是存在的，并且能够实现，那将会怎样，要知道那将是某种惊人的奇闻！可见，你们的所有欧洲人真正是与我们一致的，而我们则是与他们一致的，他们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且把它牢记在心。无论怎样说，我们不仅同他们一致，我们同他们就是一回事，因为他们身上，他们自己的身上就是在你们的欧洲人身上，存在着我们的精神，甚至是我们的形象，确实如此！这里我还要向你们补充说：欧洲，就是说俄罗斯的欧洲，在俄罗斯的欧洲——这就全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我们才是俄罗斯的欧洲主义的种种类型的化身，我们体现着所有类

① 1880年11月德国一家报纸刊登的文章称俄罗斯的斯拉夫派为“俄罗斯-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俄罗斯派”就是指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俄罗斯-斯拉夫派”。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俄国社会已陷入危机，要想从当前的困境和无所作为中摆脱出来，必须像彼得大帝那样学习西欧经验，必须有德国人的帮助。

型，只有我们是这些类型的诠释者。我也不明白，如果说我们与他们这样纯洁无私地融合为一体了，为什么不把已经制定的奖章授予他们以奖励他们的欧洲主义呢？他们会高兴地挂在身上，这样做还可以吸引他们。但是我们不善于办事，而他们则在谩骂我们，这真是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现在为了结束这场关于你们的地方自治以及所有这些新玩意儿的话题，我斩钉截铁地告诉您：不！因为这是需要很长时期的事情，而不是那么短时间可以一蹴而就的。为此就需要有自己前期的文化，自己的历史，可能，同样需要两个世纪。噢，一个世纪，退一步说，半个世纪，因为现在是电信和铁路的时代，一切关系都简化了，方便了。即使这样，那也毕竟是半个世纪，总还不是一刹那。“要么现在，要么立刻”——这毕竟是一句讨厌的俄罗斯话。刹那间除开像我们这样的人之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这样的时间还要继续很久呢。

说到这里，我的那位官员就傲慢地、威严地把话停下了，您知道，我也没有反驳他，因为在他的话里面似乎确实有点“什么东西”，有点可悲的真实，确实存在的真实。当然，在内心我是不赞成他的。何况只有过时的人才用这种语气说话，不过在他的话里面总还有点“什么”……

克雷洛夫关于一头猪的古老寓言

（《作家日记》，1881 年，1 月号，第 2 章，Ⅱ）

为了最终结束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谈话，我想引用克雷洛夫的一则简短的但很有趣的寓言，可能现在人们已经把这则寓言忘记了。在我们如今这个务实的、人心惶惶的时代，谁还有闲心顾及克雷洛夫呢？我正要着手写我的关于财政和关于改善根基的文章的时候，无意中想起了这则寓言。克雷洛夫这则寓言有很精辟的劝诫意义，不过那是谈的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尽管如此，这则寓言用于我们还是合适的。下面就是这则寓言：

一头猪在一株百年的橡树底下
贪吃橡实，已经撑得不能再咽下；
饱餐一顿，就躺在树下睡大觉。
后来，它睁开眼睛，站起身来，
用嘴巴去拱橡树的根。
“这样会把橡树伤害，”
一只乌鸦从橡树上对猪说道，
“树根暴露出来，树就容易枯死。”
“那就让它枯死。”猪说道，
“这对我毫不相干；
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
一辈子没有它，我也一点不惋惜；
只要有橡实，我就能长肥。”

"你这没有良心的东西！"橡树开始说话了，
"抬起你的猪头往上瞧瞧，
那你会看到，
这些橡实是在我身上生长的。"①

寓言很好吧？难道我们也情愿做这样的角色吗？

---

① 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橡树底下的猪》（1825）。此处引用的是寓言的前一部分，未引用其劝喻部分。本译文参照辛未艾译克雷洛夫《寓言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并补上其漏译的一句。

格奥克杰彼。亚洲对我们的意义何在?
(《作家日记》,1881 年,1 月号,第 2 章,Ⅲ)

格奥克杰彼被攻下了,帖金人被击溃了,他们虽然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但是我们战胜了,这是毫无疑问的。[①] 在社会上、报刊上都在欢呼胜利。然而,还在不久之前,社会上和部分报刊还以异常冷漠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尤其是在洛马金将军失败之后和开始准备第二次进攻的时候。“我们到那里去干什么,这个亚洲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浪费了那么多钱,而在我们自己家里却是饥饿、白喉,没有学校,等等,等等。”是啊,这些议论沸沸扬扬,我们都听到过。不是所有的人全都持这种见解,噢,当然不是,但是终究得承认,最近时期有很多人对我们在亚洲的进取政策是反感的,这次远征行动的保密性确实也助长了这种态度。仅仅是在最近这个时期我们才得到一些从外国报纸上透露的消息,斯科别列夫的电报也是到了战争结束时期才在全俄罗斯传开。虽然是这样,无论如何也难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明确意识到我们在亚洲的使命,已经意识到亚洲对我们自身有什么意义,今后可能有什么意义。其实,总的说来,包括西伯利亚在内,我们俄罗斯的整个亚洲部分,对于俄罗斯来说一直就像是一个累赘,似乎全然引不起我们的欧洲部

---

① 俄国政府为占领中亚土库曼的阿哈尔帖金绿洲,先后发起两次战争,第一次远征失败后,最后又发起由米·德·斯科别列夫将军(1843—1882)统帅的第二次远征,于 1881 年初击败了帖金人(土库曼部族之一),占领了格奥克杰彼要塞与重镇阿什哈巴德。

分俄罗斯的兴趣。有人说："我们是欧洲，我们在亚洲要干什么？"有的话甚至比这更尖刻："我们这个难办的亚洲，我们在欧洲还没有给自己安排妥当，还没有就绪，现在又塞给我们一个亚洲。这个亚洲对我们纯粹是多余的，要是能够把它放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就好了！"我们那些高明的人现在有时候还发表这种议论，当然，这是他们的智慧卓绝的表现。

斯科别列夫胜利的消息如同雷鸣传遍了全亚洲，直到最遥远的边疆，人们说："看吧，又一个残暴、高傲、虔诚的民族向白沙皇[①] 臣服了。"就让这胜利名声大振吧，让白沙皇不可战胜和他的刀剑所向无敌的信念远及印度，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千百万各族人民中间树立起来吧。其实在洛马金将军失利之后，对我们所向无敌的威力的怀疑看来肯定在全亚洲都传开了，俄罗斯的声威无疑是动摇了，因而我们不能就此止步。这些民族可能有自己的汗，自己的埃米尔[②]，在他们的头脑中、想象中威严可怕的可能是英国，英国的力量令他们惊诧不已。然而白沙皇应该高于汗和埃米尔们，应该在印度女皇之上，也在哈里发的名字之上。就算是哈里发[③] 吧，可是白沙皇是哈里发的皇帝。这是必须牢固树立的信念！它也正在一年比一年越来越牢固，对我们来说，这个信念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训练那些民族接受未来。

"为什么要接受未来，这又是什么样的未来？有什么必要在未来占领亚洲？我们在那里要干什么呢？"

---

① 俄国沙皇。中亚民族称俄国沙皇为白沙皇，俄罗斯民间口头文学中也常见这种称呼。俄语 белый 一词含有独立、自由的语义，称沙皇为白沙皇，可能与此语义有关。

② 东方某些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者、国家元首或军事首领。

③ 某些伊斯兰国家集教权与政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

这个必要性就是，俄罗斯不单单存在于一个欧洲，俄罗斯还存在于亚洲；因此俄罗斯人不只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不仅如此，可能，比起欧洲来，我们的希望更多的是在亚洲。不仅如此，可能，从我们未来的命运来说，我们的主要出路就是亚洲！

我已经预感到有些人在读到我这个落后的设想（对我来说这个设想却是公理）时所引起的满腔愤怒。应该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必须改善的最重要的根基，那么这个根基就是我们关于亚洲的观点。害怕欧洲说我们是亚洲野蛮人，害怕欧洲说我们与其说是欧洲人，不如说是亚洲人——这种自卑自贱的恐惧症必须摒弃。担心欧洲把我们看做亚洲人这种想法差不多已经折磨我们两个世纪了，然而在当前这个 19 世纪，这种耻辱感在我们身上却异常强烈起来，几乎达到令人惊慌失措的地步，甚至到了莫斯科女商人惧怕“丧钟和地狱之火”[①] 那种程度。我们这种不应有的耻辱感，我们认为自己只能是欧洲人，而非亚洲人（我们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做亚洲人）的错误观点，——这种耻辱感、这种错误的观点使我们在这两个世纪里付出了高昂的、极其高昂的代价。我们为此而付出的是，丧失我们的精

---

① 出自俄罗斯剧作家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剧本中的一个情节：一名法律代理人向女商人解释他在书中遇到的“丧钟和地狱之火”这两个词。女商人则说自己愚昧胆小，一听到这些词汇就吓得全身发抖，请他不要再提这些词了。在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论中，欧洲派的作家、评论家叶·马尔科夫讥讽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把“资本主义精神”视同“地狱之火”。他说，当前有些人常常以“资本主义精神”恐吓我们，以为我们是莫斯科的女商人，一听见“地狱之火”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他们应该明白，我们是不会被吓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丧钟和地狱之火”显然是对马尔科夫反唇相讥。

神独立性，导致我们失败的欧洲政策，最后还有金钱。金钱，为了向欧洲证明我们纯粹是欧洲人而非亚洲人，天知道，我们花费了多少钱。彼得大帝把我们推进了欧洲，这一推动在开头是必要的，起了拯救的作用，但是这一推动用力过猛了，这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是没有过错的。为了使欧洲承认我们是自己人，是欧洲人，只是欧洲人，而不是鞑靼人，我们什么事情都做到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不畏艰苦地向欧洲靠近，我们自己时时刻刻、孜孜不倦地干预欧洲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以武力恫吓欧洲，把我们的军队派到那里去“拯救各位皇帝”①，有时候却又毫无必要地在欧洲面前卑躬屈节，向欧洲表白，我们的存在仅仅是为欧洲效劳，使欧洲幸福。在1812年，把拿破仑驱赶出俄罗斯之后，我们没有像为数不多的某些有远见卓识的俄罗斯人士所建议的那样，同他和解②，而是为了欧洲的幸福全面推进，从僭位者③手中解放了欧洲。显然，这就构成这样一幅鲜明的画面：一方面是暴君、僭位者，另一方面则是和平的缔造者与助人复辟④者。然而，在当时我们政治上的机遇完全不在于上述这种情景，而在于这个僭位者当时正在面临的处境，这是他自从发迹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情况，这就是希望实实在在地、真诚地、长期地，可能是永

① 1798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应奥地利的请求派遣俄军去救援被法军击败的奥地利军。1813年至1814年俄国参加反拿破仑同盟，大败法军，恢复了波旁王朝在法国、西班牙和两个西西里王国的帝位。1849年，尼古拉一世派兵镇压匈牙利革命，保住了哈布斯堡王朝。

② 据说拿破仑溃逃出俄国之后，俄国宫廷内部有主战与主和两派。俄军统帅库图佐夫（1745—1813）不主张俄军在1812年击溃法军后继续出国作战。

③ 正统派因拿破仑夺取了波旁家族的王位而给他起的绰号。

④ 在古时一般指恢复王位，并无贬义。此处也不用在贬义上。

久地与我们和解，交换条件是，我们不在欧洲妨碍他，他则把东方交给我们，这样一来，我们现在的东方问题——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灾难与不幸——现在早就解决了。僭位者自己后来曾经这样说过[①]，他在这样说的时候，大概不是在说谎，因为他能够做到的没有比在未来同我们结盟，让东方归我们，西方归他这个出路更好的了。那个时候，毫无疑问，他就能够对付欧洲各国人民了。欧洲各国当时要想在东方妨碍我们，那时他们还太软弱，甚至连英国也是如此。可能，拿破仑以后仍然要垮台，或者是在他死后他的王朝仍然要垮台，可东方则总归要留在我们手里。（那时我们就有了海洋，我们进而能够在海上与英国相遇。）然而我们却为了上述那种情况付出了一切代价，结果却是：所有这些被我们解放了的民族[②]，还没有等到打败拿破仑，就立刻开始怀着最明显的恶意和充满敌意猜忌地盯着我们。在一些会议上他们立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我们，他们为自己攫取了一切，但是不仅什么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反而又从我们这里取得各种保证，正如后来所表明的，这些保证确实是自愿承担的，然而对我们却是十分不利的。此后，尽管已有这些教训，而我们在直至今天的这个百年的其余年代里，又做了些什么呢？不正是我们帮助各个日耳曼国家得到巩固，不正是我们为他们缔造现在可能比我们还要强大的国家吗？的确，如果说正是我们促进了他们的成长与强大，这一点也不是夸大。难道不是我们接受他们的要求去平息了他们的内乱，难道不是我们在他们可能受到灾难威胁的时候去保护了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综合了各种消息而做出这个论断的。

②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是俄国帮助各国王室恢复王位，实际上是帮助为拿破仑所推翻的各国封建势力复辟。

他们的后方吗？最终结局却是，现在在欧洲的每一个人，那里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怀中都有早已藏好的准备投向我们的石块，只不过是在等待爆发冲突的时机。这就是我们为欧洲如此效力而得到的报偿吗？得到的只是它的憎恨！在那里我们扮演了列毕季洛夫的角色，他追名逐利，结果却是：

> 嫁妆分文未得，
> 仕途也成泡影。①

但是，欧洲对我们的这种憎恨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为什么他们所有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始至终地相信我们呢，不相信我们不会伤害他们，不相信我们是他们的朋友和仆人，善良的仆人，不相信我们在欧洲的整个使命甚至都是为欧洲和它的安宁服务呢？（因为在整个一百年当中难道我们不正是这样行事的，所做的不就是这件事吗？难道我们为自己做过什么，为自己攫取过什么吗？一切都是为了欧洲！）不，他们不能够相信我们！主要的原因恰恰就在于，他们绝不承认我们是自己人。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永远也不相信，我们确实能够与他们共同地、平等地参与解决他们的文明的未来命运。他们认为我们是与他们的文明格格不入的人，外来人，冒充的好人。他们认为我们是从他们那里窃取他们文化的窃贼，是乔装成他

① 引文见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4幕，第5场。

们的人。比起我们雅利安人[1]来，土耳其人、闪米特人[2]在精神上与他们更亲近。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带给人类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完全不同——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俄国的欧洲人”竭尽全力向欧洲表白说，我们没有任何思想，而且今后也不可能有；俄罗斯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够模仿；说来说去，一句话：我们总归是要模仿，我们根本不是亚洲人，不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一模一样，是地地道道的欧洲人。然而，这都无济于事，欧洲至少是这一次没有相信我们俄国的欧洲派。相反的是，可以这样说，这一次，欧洲自己的结论却与我们的斯拉夫派如出一辙，虽然它对我们的斯拉夫派一点也不了解，只不过听到一点传闻而已。这个吻合恰恰就是，正如斯拉夫派一样，欧洲也相信我们有“思想”，有自己的思想，独具的而不是欧洲的思想；相信俄罗斯能够有自己的思想，也具备这种能力。关于我们这种思想的实质，欧洲当然还什么都不了解，因为它如果已经知道的话，那么它马上就会平静下来，甚至还会高兴。不过它迟早必然会知道的，等到它的命运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刻它才会知道。但它现在还不相信我们的思想的实质，它在承认我们有思想的同时却又害怕这种思想。结果是，它竟然厌恶我们，甚至厌恶我们个人，虽然在欧洲有时对我们温文有礼。例如，他们愿意承认俄罗斯的科学已经能够产生出几名杰出的人物，提出若干优秀的、甚至对欧洲科学都有益的著作。然而欧洲现在绝不相信在我们俄罗斯能够涌现不单单是科学人才（尽管是非常有才

---

① 印欧语系一个民族的名称。种族主义者认为雅利安人（主要是指日耳曼人）是“高等”种族。

② 操闪米特语的诸民族，主要指阿拉伯半岛的居民、犹太人、叙利亚人等。

干的），而且也能够涌现像培根[1]、康德[2]和亚里士多德[3]那样的天才和人类的导师。这是他们根本不能相信的，因为他们既不相信我们的文明，也还不了解我们的未来思想。从目前来看他们是正确的，因为直到我们自己站立起来之前，我们在精神上成为独立的人之前，无论是培根也好，牛顿[4]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我们确实都不会有，我们的艺术、工业等所有其他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欧洲准备夸奖我们，抚摸我们的脑袋，但不承认我们是自己人，明里暗里蔑视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人，作为人种是比他们自己低劣的，有时候还厌恶我们，竟至于什么都厌恶，特别是当我们搂住他们的脖子，兄弟般地亲吻他们的时候。

但是要关闭向欧洲打开的这扇窗子是很难的，这是命运注定的。然而亚洲，其实这才真的可能是我们未来的出路，我还要高声说出这个思想！我们即使能够部分地领会这个思想也好，噢，那时多么重要的基础就会得到改善了！亚洲，我们的俄罗斯的亚洲，要知道，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疾病缠身的基础，对它不只是要清理，而是要使其彻底更新，彻底改造！这是原则，是新的原则，是对问题的新的看法——这才是必须的！

---

① 培根（约1214—1292），英国哲学家和博物学家。
②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③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
④ 牛顿（1643—1727），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

问题与答案

(《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2章，Ⅳ)

“可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已经听到愤怒的声音。“我们的亚洲事情现在就不断向我们要求军队和非生产性的耗费。再说那里有什么工业?他们的商品在哪里?您到哪里去找我们商品的消费者?而您现在竟莫名其妙地提议我们永远脱离欧洲!”

不是永远(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暂时，而且也不是完全，我们无论脱离多少，也不可能彻底脱离开。我们不应该完全放弃欧洲，再说也没有必要。一位最热心的斯拉夫派说，这是一个“神圣奇迹的国度”[①]。欧洲如同俄罗斯一样，也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第二位母亲；我们从她那里拿到了很多东西，今后还要去拿，我们不愿做不知感恩的人。去年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庆祝会上，关于俄罗斯人民在欧洲未来的伟大意义(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我讲了几句话[②]，过后人们就纷纷向我投过来污秽和谩骂，当时那些为了这几句话而拥抱过我的人们竟然也是这样，那时我讲了这些话就像是干了一件什么卑鄙下流的坏事。

也许我的这些话还不会被遗忘，不过，关于这件事现在无

---

① 出自斯拉夫派代表人物亚·斯·霍米亚科夫的《幻想》一诗(1835)。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1880年，8月号，第2章，《普希金(简论)，6月8日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学会会议上的发言》。

需多说了。可我们总还是应该考虑我们重新受教育和我们如何走出埃及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把欧洲变成了自己的某种类似精神上的埃及。

“对不起”，人们打断我的话说，“可是，亚洲拿什么使我们独立？在那里我们要像亚洲人那样睡大觉，而不是成为有独立精神的人！”

我还要说：“要知道，在我们转向亚洲，以我们的新的眼光观察亚洲时，在我们这里就可能出现类似欧洲在发现美洲的时候所遇到的那种情况，因为对我们来说亚洲确实是尚未被我们发现的当时那个美洲。在向亚洲进展的同时，我们这里在精神上和力量上就会重新出现高涨。我们只要有一些独立性，我们在那里就能立刻找到我们该做的事情，同欧洲在一起的两个世纪我们已经丧失了做任何事情的习惯，成了饶舌者和懒汉。”

“既然我们这里都是懒汉，那么您怎样把我们发动起来向亚洲迈进呢？关于我们的幸福就在那里这个道理，即便是能向大家论证得如同 $2 \times 2 = 4$ 那样清楚，谁又会第一个挺身而出呢？”

“在欧洲我们是寄人篱下的人，是奴隶，在亚洲我们则是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在亚洲我们则是欧洲人。使命，就是我们在亚洲传播文明的使命使我们的精神得到补偿，吸引我们到那里去，只需开始动作了。只要建造两条铁路，一条通往西伯利亚，另一条通往中亚，从这件事入手，你们立即就能看到后果。”

“想的倒不错！”人们会嘲笑我。“钱在哪里，我们能够得到什么：除开损失，一无所得。”

“首先，在最近二十五年里，如果我们每一年只向这两条铁路投放三百万卢布（三百万在我们这里不过是从手指缝漏出

来的区区小数），到现在就已经建成七千五百万卢布的亚洲铁路，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计算都超过一千俄里了。然后你们再算算亏损吧。噢，假如在俄罗斯居住的不是我们，而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他们早就让你看到这是什么样的亏损了！他们早就会发现我们的美洲了。你们是否知道，那里有我们比对非洲腹地了解得还少的土地？我们是否知道在那片辽阔无垠的土地下面蕴藏着什么财富？噢，他们会把一切金属、矿产、无尽的煤炭矿层全都找到，从原材料到原材料的利用全都考察清楚。他们要运用科学，迫使那块土地为他们生产出比投入多五十倍的东西。就是这块土地，我们始终认为它不过是如同我们的手掌一般光秃的荒原。人们会为了充足的粮食而拥向这里，在这里建设工业，建立生产行业。不必担心，消费者和通向消费者的渠道都会有的，他们要从亚洲的地下把现在正在那里沉睡的千百万消费者发掘出来，铺设通向这些人的新的道路！”

“那么说，您也赞赏科学，可是您自己又劝说我们背叛科学和教育，呼唤我们做亚洲人。”

“那里确实更需要科学！（我又在赞赏科学了）现在我们在科学中能算什么？一知半解，不学无术。而在那里我们要做事业家，需要本身就在催促我们、逼迫我们，只要稍有一些独立的、进取的精神，在科学里我们就将立即成为主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总是做附庸。主要的是，从一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就要理解并且深刻领会我们在亚洲传播文明的使命。这种使命使我们的精神变得高尚，使我们获得自尊和自觉，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或者很缺乏的。向亚洲进展，在我们中间只要产生出这种愿望，那它就不仅仅是一种愿望，对于那些不计其数的心神不安的人们，所有那些内心苦闷的人们，所有那些怠惰的人们，所有那些百无聊赖的人们，它就会成为一

条出路。疏通水道，污泥浊水就会消失。一旦置身于事业之中，就不会再孤寂，人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即便是自尊心受了伤害，牢骚满腹的平庸之辈也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地方是才智平庸的人，换一个地方则面目一新，几乎成为天才，在欧洲的殖民地就时常出现这种情况。在俄罗斯，人是不会全都走光的，无需担心，因为这是逐渐开展的，开始到那里去的是少数人，不过关于这些人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又把其他的人吸引过去。然而对于这片俄罗斯海洋来说，这毕竟还算不了什么。把苍蝇从糖浆里救出来，让它尽可能地舒展开双翅，可是向那里飞去的终归还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少得甚至觉察不出来。然而在那里，噢嗬，在那里可就不容忽视了！在亚洲，俄罗斯迁移到哪里，那里的土地就立即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新的俄罗斯就将建立起来，她会重振老的俄罗斯，使老俄罗斯逐渐地重现生机，为老俄罗斯指明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新的原则和转折，而新的原则和转折引起的破坏和动荡是极少的。只不过要求一定的理解（但是要真正理解），在将来，亚洲就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财富在亚洲，亚洲是我们的海洋；到时候，欧洲只是由于拥挤不堪就不得不实行不可避免的、他们自己也厌恶的、有损人的尊严的共产主义，人们一群一群地拥挤在一起，单独的家业渐渐被毁灭掉，各个家庭也都开始抛弃自己的住所，大家都在一起过公社生活，儿童将在教养院里接受抚养（四分之三都将是弃儿）。到了那个时候，那时我们还有辽阔的幅员、田野和森林，我们的儿童还是在自己双亲的家庭里成长，不是在石筑的牢笼中，而是头顶青天，生活在花园和庄稼茂密的田野上。的确，我们的很多希望和很多机会都寄托在那里，关于这一切我们在这里还不可能有充分的认识！在那里不

仅仅是地下埋藏着黄金。但是需要新的原则，新的原则将会带来事业所需要的金钱。如果要把一切全都谈出来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为什么（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时候）要在那里，在欧洲，保持那样多的大使馆，那些大使馆富丽堂皇，在那里进行风趣机智的谈话，举行招待宾客的宴席，那里的人员个个都才华出众，然而却又都毫无奉献。在那里甘必大[①]之流与我们有何相干（恰恰是目前这个时候）？教皇[②]及其未来的命运与我们有何相干，尽管他受到俾斯麦的压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不如暂时在欧洲面前装穷，坐在马路边上，把帽子放在自己面前乞讨小钱，让他们说："la Russie 又在 se recueille。"[③]。而与此同时在家里进行准备，在内部进行建设！人们要说，为什么要这样凌辱自己？其实，这丝毫不是凌辱自己！我说到帽子只不过用作譬喻。不仅不是凌辱我们自己，而且是一下子把我们自己抬高了，结果就会是这样！欧洲既狡猾又聪明，立刻就会明白，请相信，立刻就要尊重我们！噢，当然啦，我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在开头会使欧洲感到困惑，但是，多多少少也使它高兴。假如它看到我们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而我们又下决心量入为出；假如它看到我们也精打细算了，我们自己又首先出来保护、珍惜自己的卢布，而不是滥印卢布，那么他们也会立即在自己的市场上珍惜我们的卢布。那又怎样呢？他们看到我们竟然不顾亏损和破产，径直奔向自己的目标，于

① 甘必大（1838—1882），法国第三共和国奠基人之一。1879—1881 年任众议院议长，1881 年 11 月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但不到 3 月因未获支持而下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篇文章时（1881 年 1 月）俄国报刊对他进行了诸多报道，揣测他可能是未来的法国政府首脑。

② 指利奥十三世（1810—1903），1878 年起为罗马教皇。

③ 法文："俄罗斯又在思考"。

是他们自己也会来向我们提供金钱，把我们看做已经学会办事、知道需要怎样办理每一件事情的严肃认真的人而来向我们提议的。

“等一等”，有人说道，“您谈到加姆别塔，要知道在那里我们不能全都抛弃不管。首先就拿东方问题来说吧，这个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我们怎么能把它丢开不管呢？”

“在眼前这个时刻，关于东方问题我要说的是：在眼前这个时刻，在我们这里，在政界，大概没有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会认为主张君士坦丁堡应该归我们所有的说法是明智的（除非说的是在我们的遥远的、难以捉摸的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还等待什么呢？在目前，东方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德国和奥地利的联盟[①]，再就是在俾斯麦公爵的怂恿下奥地利掠夺土耳其。[②] 在某些紧急关头我们能够、当然也要提出抗议，但是，只要这两个民族还站在一起，我们在避免对我们发生巨大震动的情况下，当前能够做些什么呢？请注意，可能，这两个同盟者需要的就是我们终于忍无可忍而怒火中烧。我们可以像从前那样鼓舞斯拉夫各族人民，热爱他们，在必要时还尽可能给他们以帮助。再说，在某个时期内他们也绝不会灭亡，不过这个时期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只要我们表明，我们再也不愿意像从前那样热衷于参加欧洲事务了，那么没有了我们，他们留在那里，可能，他们之间的内讧会发生得更快。实际上奥地利从来就不相信，德国仅仅是为了它那双漂亮的眼睛而那样钟情于它。它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事情恰恰相反，说

① 1879 年 10 月德国与奥地利签订了旨在共同反对俄罗斯的条约。

② 在 1878 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上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占领土耳其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俄国政府被迫做出让步。

来说去，德国终归是要把奥地利的德国人合并到德国的。而奥地利则绝不会交出自己的德国人，它极其珍视自己的德国人，即使以君士坦丁堡作交换，它也绝不退让！可见，那里已经有了发生内讧的火种。同时在德国身边还有那个仍然没有解决的法国问题，现在这已成了德国的永恒问题。除开这些之外，又突然发现德国自身的统一不仅没有完成，而且还受到动摇的威胁。原来，这里的欧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灭亡，甚至依然是非常严重的威胁。总之，我们只需要等待时机，即使是他们邀请我们，我们也不参与，只等他们那里一爆发内讧，他们的“政治均势”一开始动摇，我们就一举解决东方问题，像在普法战争时那样抓住瞬间出现的时机，就像当时我们关于黑海问题的声明[1] 那样，突然声明“我们不承认奥地利对土耳其的占领”，顷刻之间占领就会土崩瓦解，也许奥地利也随之一起土崩瓦解。

这样，我们就把暂时似乎放弃的一切……全都拿了回来。

“那么，还有英国呢？您把英国忽视了。英国发现我们向亚洲伸展，立刻就会惊慌不安。”

“惧怕英国，那就什么都别做！”我用这句改头换面的谚语表示我的反驳。其实，使英国感到不安的并没有什么新东西，现在使它不安的仍然是原来那些事。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现在就使它处于不安状态，不让它知道关于将来的事情，而它从我们这里等待的也是最坏的情况。当它明白了我们在亚洲的全部活动的真实性质之后，可能它的担心就会减轻很多……不过我

---

① 俄国外交大臣亚·米·戈尔恰科夫乘普法战争（1870—1871）后法国失败之机，宣布俄国不再受1856年的巴黎和约不准俄国在黑海保持舰队条款的约束。1871年初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等国在签订伦敦公约时，不得不接受俄国的要求。

也赞成它的担心不会减轻的说法和它要走到这一步还有很大距离的说法。我要再说一遍，要是惧怕英国，那就什么都别做！所以，还是要说，格奥克杰彼的胜利万岁！斯科别列夫和他的士兵万岁！“从名册上勾销的”① 勇士们永垂不朽！我们将把他们载入我们的名册。

① 指将战场阵亡的士兵从军人名册中除名。

附　录

我们的寺院

(《恳谈会》[1] 杂志，1872 年)

(《公民报》，1873 年 1 月 22 日)

这是《恳谈会》杂志关于我们的寺院财产的系列文章[2]。在提出令人十分感兴趣的计算结论时（这种结论在文章里是很多的），作者依据的是确切的材料和自己的判断。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每名僧人需要“国家负担”一千一百五十五卢布。看来，作者掌握了相应资料，为自己的著作付出了极多的心血和劳动。数目字是否准确，僧人干什么需要“国家负担”，这个数目字是否真实可靠，我们不准备谈这些问题。作者的文章已

---

① 俄国自由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倾向的杂志，1871—1872 年在彼得堡发行，发行人兼编辑为 C. A. 尤里耶夫。

② 指《恳谈会》杂志 1872 年发表的总标题为《我们的寺院，他们的财产和他们获得的资助》的系列文章。匿名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关于寺院财产的详细材料。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寺院拥有如此巨额的财产是与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誓愿相矛盾的，作者表示希望寺院将部分财产捐赠给教育和慈善事业。

经招致“受伤害者们”的一些反响，我们不是“受伤害者”，我们要指出另外的事。

我们自己就极其厌恶那种贪图酒色的僧人，贪得无厌，倒卖圣物，在僧帽中藏匿钱财的僧人，厌恶那个由于在学校淘气而将一个十岁儿童殴打致死的心肠冷酷的僧人（如果不久前的那个消息属实的话）。一千一百五十五卢布养活一名僧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大得有失体统的和令人愤慨的数目。（我们再说明一次，这是平均数，当然，在俄罗斯有些非常贫穷的僧人，甚至可能，这种僧人是大多数。）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赞同文章作者的说法，即为养活一名僧人“国家负担”的那个数目的钱。养活僧人那个数目的钱不是“国家负担”的，而是人民拿出的，人民是自己自愿把这样大的数目的钱（据作者计算将近八百万）施舍给寺院的，再也没比他的这种施舍更自愿的了。谈完这一切之后，我们还要提出另外一种考虑。其实这些财产既然已经被人得到了，它就成为获得者的私有财产了，至于这笔私人财产如何使用，每一个人确实得到多少，存储多少，用作日后的积累、存款是多少，这一切与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这是个人的私产；我们是不会去过问某某财主、商人、农人是如何支配自己的财产的，不会去张望人家的厨房，不会去数人家有多少食品，不会去操心人家往嘴里放些什么吃的……

问题恰恰是，谈到这里无意中就出现另外一个想法。“神职阶层应该保持自己的圣洁，不应该酒色无度，积蓄钱财，应该做自律甚至是清贫的榜样，如果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那就失去了目的，在俸禄如此丰厚而又无所事事，毫无节制，等等等等的情况下，利益和心灵就要激愤不安，这篇文章就是要引导出这个思想，毫无疑问，文章的主要目的也在这里。”

假如是这样就太好了。最理想不过的是，神父们不是存钱，不是狭窄地关注自己的丰衣足食，而是在获得钱财时依然保持从前的清贫生活和与僧侣身份相称的自律精神，时时刻刻身体力行做出圣洁的示范，对上帝一片赤诚，以所得的巨额财富为邻人谋福利，造福寺院所在的整个地区；在灾荒年月救济难民，教导儿童学习，与贫困神职人员共享财富，总之，要在施舍者与贫穷的、负担沉重的人们之间做明智的、心地纯洁的桥梁。这是多么好的创举，这是多么光明、美好和英明！

表示这样的愿望是令人感动的，但也不能不做这种表示，不幸的是，这种话有时能够沦为极大的谎言。首先，向僧侣们献出自己钱财的人民大概不是要他们大吃大喝，再说也不是给他们私人的，而是给上帝的。（在这里我们要排除那些朝圣的老爷，我们谈的是人民。）法律和人民教育（关于这些事文章作者叙述说，国家花在这些事情上的钱数与对僧侣一样），当然，这也是重要的事情。然而内心的怜悯和宗教情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们还保留在社会之中，大概它们也与法律和人民教育有同等价值，没有宗教同情心的社会是可悲的。不言而喻，我们的纯理性主义者惋惜的是，用在这种怜悯心上的钱，在他们看来是不合理的。最好是人民直接捐献给学校和养老院，不要中间人，是不是这样？最好是卖掉芬芳的香膏①，把钱分发给穷人，对不对？——想一想这个福音书的故事吧。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些揭露手段，这些手段极为离奇古怪，但却能异常准确地达到目的。例如说："这些人是圣洁的，这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也应该是圣洁的，但是，由于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方面，所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手段所

① 出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6章，第8～13节。

起的作用是异常有力的。有一系列尽人皆知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但在为了某种目的把这些事实归纳为完整体系之前则起不到一定的作用。

实际上，在归结起来的这些事实中只有一半真实，我们认为，仅仅是全部真实的一半比谎言还坏。直接了当的谎言可以推翻，但是如果事实都是真实的，那又如何推翻事实的完整体系呢？我们知道，早在圣者费奥多西① 时期，在建造基辅洞窟修道院时，在聚集到一起的僧侣中间就已经有一些一模一样的酒色之徒和猥琐人物。我们知道，邪恶、自私自利甚至暴行在最初的基督教社会中，在基督教创立的时候立即就出现了。我们指出这一切，完全不是建议因袭历史事实，或者说得确切些，以信条自慰，这是令人厌恶的。如果邪恶和丑事早在圣者费奥多西时代，在创立基督教的初期就已存在，然而也还有费奥多西本人，还有为了基督而苦修者，还有基督教的创立者，还有整个现代基督教社会的创立者，全部情况就是这样。谁知道，也许在当代俄罗斯寺院中有很多悲天悯人、内心苦闷、心地纯洁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自由主义精神都无济于事，寺院才是出路，才是难以抑制的精神需求……我们不愿用暴力，即使为了革新社会我们也不想专横行事。

在这里，作者肯定要参与进来，并且要声明，他谈的根本不是这件事，这里说的已经完全是另外的题目，另外的材料，他谈的只是我们寺院的财产和收入。

那又怎样？也许，文章作者是正确的，但我们还是要再对

---

① 费奥多西（？～1074），古罗斯作家，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奠基人。自 11 世纪 60 年代起为基辅洞窟修道院院长，当时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著有训诫录和书信集。

他说，一半真理不仅是谎言，而且比谎言还要坏。我们感谢他提供的材料，但不是感谢材料的归纳体系。

依兹玛伊洛夫村的火灾

（《公民报》，1873 年 6 月 11 日）

火灾季节！不言而喻，这个季节降临了，这一年也躲不过去。在我们的报纸报道的各种消息中，尤其特别的是《莫斯科新闻》第 134 期报道的依兹玛伊洛夫村火灾的消息。消息的特别之处并不是火灾（火灾就是火灾，处处都一样，这种火灾还会有很多），特别的是这场火灾的特别情况。在自己的报道的结尾，通信员是这样说的：

总的说来，这场火灾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注意的：严重缺水；池塘距离村庄很远；由于漠不关心，无所事事，主要是由于酗酒，在农民家中不仅没有灭火水管、钩竿，甚至连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撬棍、斧头和水桶都没有，女人们不得不用挤奶桶灭火。这些东西全都喝光了，典当到小酒馆里了。

就是这样，"由于漠不关心，无所事事和酗酒"，不仅没有灭火工具水管、钩竿，甚至没有撬棍，没有斧头和水桶，女人们不得不用挤奶桶浇水灭火。全都喝光了，典当到小酒馆里了！……

这还是在莫斯科郊区有名的村庄里发生的事情！不久前关于可能的最近未来我们描绘过一幅想象的画面[1]，想象那个时

[1]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他的《作家日记》中的文章《幻想与憧憬》（《公民报》，1873 年 5 月 21 日）。

候所有的工具——不仅是灭火的工具，就连斧头、犁、耙一切都将被喝光，被典当，拆房屋时必须到当铺老板那里去赎回斧头，或者是恳求他借用一次；耕地——也要赎买犁和耙。可是，赎耙有什么用？马又在哪里？房屋、家庭、独立自主精神，任何一种秩序又都在哪里？在我们虚幻的梦境里一切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富农和犹太人以及整个村社都受他们奴役的全体穷人。可以设想，犹太人和富农替他们支付赋役，但却要求他们为支付的一百归还一千！我们极力摆脱我们的梦幻，称之为“噩梦”，“九级文官波普里希钦的梦”。看吧，波普里希钦的梦的一个角落突然显露出来了，如果相信《莫斯科新闻》的报道。（凭什么不相信？从艺术上说一切都写得那么切实。）不过，如果斧头和水桶全都典当了，毕竟还剩下了挤奶桶，剩下了，竟还用上了。可见还不是一切全都丧失了！奇怪的是，这些东西是怎样剩下的：尚有奶牛还是没有奶牛了？是怎样终于剩下的？难道说挤奶桶分文不值，因而不能把它喝掉？为什么不能把它喝掉？我们大胆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从事实本身看，现在提出挤奶桶为什么没有被喝掉，远比提出为什么把它喝掉了更为顺理成章。

让人民再放荡放荡吧，而以后……以后会清醒的。

顺便说说，现在谁为农民在罗斯重建焚毁的地点呢？从前通常是地主们重建焚毁的村庄。这个古老的宗法制方法（虽然也有好处）现在应该以更适应现代情况的方法取而代之，这就是发展人民信贷制度。不错，如果通过这种“发展”能够得到钱，立即就会有很多钱进到斧头和水桶去的地方。但是，这是不能永远这样继续下去的。不久前我们读到一个农夫自杀的消息，他为了养活全家人冬天向包工头预支了夏天的工钱，春天到了，应该去上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甚至连买块面包的钱都

没有，于是自缢了。值得注意的是，预支的钱数有多少，包工头从上一年的秋季把人民奴役到下一年的夏季，他这样赚了多少钱？不过，还有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笔钱的数目有多少，据现在的情况看，由于没有别的贷款，实际上这终归是一件好事。

不久前我们还读到席格罗夫县的一则消息（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这则消息说，当地很多富裕的农民忽然开始把自己积存了一冬的肥料、牲畜、动产出卖给周边的地主们，准备移民到奥伦堡地区。据说法捷日县的一个地主在奥伦堡省购买了大量土地，他向移民提供这些土地，把全县都轰动起来了。有一万人响应他的召唤，（有趣的是，这个地主提供土地的条件是什么?）出售财产的热潮立即掀了起来。然而这些移民能否得到许可，尚未可知，所以，农民可能还要留在原来的住地，比从前更苦，已经没有牲畜，没有了动产。我们熟悉我们的习俗，我们确信，事实上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就是说一方面事情会拖延（也许拖延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没有经过任何考虑的盲从，感情冲动，就像平时我们人民的一切内心冲动一样。至于说这里必定有内心冲动和高昂激情，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承认，我们非常希望农民达到目的，不受拖延。这说明，与从前的酒馆分不开的从前那种生活使他们感到极端厌恶了。报道虽然一句也没有提到酒馆，但我们不知为什么深信不移，憎恶老地方的农民之所以跑向乐园，部分原因是酒馆。我们相信，到了新的地方，他们立刻就会全体立下誓言：不喝酒。难道说，他们做出如此严肃的事情就是为了在新的地方立刻就又酗酒？这种移民措施是有拯救作用的，是最可喜的事情，就是这样。这是更新，是新生活，是建立在另外一种道德基础上的。所有这种振兴性质的事业今后必将保留在家族的传

说中,善良的回忆是会巩固家庭的。你试一试现在把他们留在原地,即使只留到下一个冬季,运用公事拖延之类的办法,禁止他们迁移,到了冬季那就将遍地是小偷和醉汉,凶恶的强盗……

现在有不断来自奔萨省的消息说,那里关于停止酗酒的村社决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省啊!更重要的是,这是在一个火灾多发季节。如果能够列出数字来说明,酗酒是如何导致火灾频仍的,那就更加引人注意了。酗酒加重火灾,这是不容置疑的。对于酗酒的人还能要求什么小心谨慎呢?要知道,我们这里是一家失火,家家遭殃。再比如说,假如在休假日或者教会的节日到处都是醉汉,那又会是怎样一副情景呢?不言而喻,那时"不能不发生火灾",如果说没有失火,那除非是什么例外。按照道理讲,起码应该是这样。在实际上情况则多少有些不同,也就是说,火灾比预料的要少很多。然而,上帝啊,假如不喝酒,村庄的人们在节日干什么呢?有什么事可做呢?迄今为止有没有谁哪怕是有一次想过:在节日有什么事情让六千万俄罗斯老百姓去做呢?我们在此前已经讲过,唯一的尝试(已经成功)就是由奠定了史敦达教派的移民牧师来做的事。没有牧师的地方则进行"集体拳斗",据《俄罗斯世界》报道说,近来在莫斯科郊区斯威司图赫村附近,在圣灵降临节那一天举行了集体拳斗或者拳击等活动,而且有一名斗士被打死。

可以说,这还是荷马时代的消遣活动,对于消遣的人来说这不仅是很大的耻辱,而且也让消遣的人很不愉快。的确是应该有其他办法让人民消遣了!

编者的两篇札记

（《公民报》，1873 年 7 月 2 日）

I

我们非常愉快地在《公民报》上刊登莫斯科妇女进修班一位女学员的这封来函[①]。我不想反驳作者的某些特殊的见解，比如说，关于莫斯科的“健康空气”的见解[②]，作者本人就证明，在莫斯科不能没有诽谤，——这就是莫斯科空气的不健康的特点。我们任何时候都准备同意说莫斯科比彼得堡好，但说莫斯科绝对好——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无论情况如何，为了可敬的女通讯人向我们的刊物表示的同情，我们首先要向她致谢。不过，尽管是同情，她的信的目的是以事实反驳我们《公民报》第 22 期的声明[③]。我们的声明是说，允许妇女接受大学教育和医学教育的实验，迄今为止

---

① 《公民报》的第一篇札记是答复莫斯科高等妇女培训班学员、署名 Л 的来信《莫斯科高等妇女培训班的印象。致编者的信》。

② 署名 Л 的致《公民报》编者的信中称赞莫斯科的妇女培训班是妇女教育的卓越组织，与此相反，彼得堡的工作则脱离了俄国生活的健康基础，追随并在实践中扭曲了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

③ Л 致《公民报》编辑部的信对编辑部文章《我们的女大学生们》的观点提出了批评。Л 在信中说，编辑部文章使她感到惊讶的是，文章指责妇女高等教育事业方面的一切开创性的举动；文章使她感到痛心的是，妇女高等教育事业的开展极为艰难，或者是在沿着错误的方向开展，导致的结果也是相反。不过 Л 在信中也肯定了《公民报》，说《公民报》不怕毁损声誉，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作者现在是带着莫斯科成立妇女高等培训班的个别事例而来的，她为事业的顺利开端而欢欣鼓舞，表现了美好的和善良的情感。就信心而言，我们也许还更为强烈。我们早就相信，并且坚信莫斯科的大多数女学员们定将以完满的成绩把自己的学业坚持进行到底。我们大声说明，任何人都不比我们更深信不疑，我们追求教育的妇女们渴望受教育的感情是纯洁的，真诚的。我们所想的只是，这种善良愿望的真诚和纯洁有可能，而且也常有这种情况，受到不良的引导，陷入某种与真正的启蒙毫无共同之处的先入为主的思想的影响。如果在莫斯科的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从学员到教授都只服务于启蒙这个唯一的目的，我们就是第一个为之欢欣鼓舞的人，祝贺这一美好事件的人。来函的作者先生，请您相信，我们比别人更喜悦，因为出现的事情完全是我们自己希望的，呼吁的，自己提议的。

我们记得，在《公民报》第22期我们提出的愿望是什么，我们的声明是什么：

1）应制定严格的学习纪律，规定的目的是要求妇女必须学习，为了她们的利益排除一切姑息纵容，立即开除不学习或者学习不好的人。

2）任何违犯道德规范的行为应该承受立即从就学妇女中除名的处分。

3）每个年度的考试应该绝对严格执行。

正是由于这些或者类似的愿望，在报刊上和社会中常常宣布我们是反动分子。至少是现在，在您关于莫斯科的培训班的声明之后，我们已不是唯一的反动分子，这首先是因为，与我们在一起的有莫斯科妇女培训班的教授们，他们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还有那些没有其他

目的，只是为自己的学业而来的女学员们；最后，就是在自己的信中因为那些教授和女学员而感到高兴的您本人。

的确，我们在《公民报》第22期的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谁如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那些为了获得高等教育而鹤立鸡群的妇女的世界，我们这里的道德上的虚伪就会使所有的人震惊，"还写过，"这些妇女获得一种信心，深信他们由于学习科学或医学的高等课程，她们也就因此同时成为解决某个当代妇女问题的活动家。"

因为我们写了这些话，全部麻烦也就由此而生。于是就对这些话挑毛病，再说怎么可能不挑毛病呢？事情本身现在还处于可以任意理解的状态，想挑什么毛病可以任意而为，任意从什么角度描述它，讲的话是最含混不清的、有争议的当代语言，"妇女问题"怎么可能不出现混乱呢？

我们现在不再谈论这个麻烦，只向我们的通信女士说明一件事：您就是想以您的信证明一件事，这就是在莫斯科的妇女培训班中没有那种女学员，没有一个以"成为解决当代妇女问题的活动家"为己任的人，所有的人只是学习；从而可见，可能有"不虚伪"的女学员，最后，可能，绝大多数俄罗斯女学员是"不虚伪"的，从而可见，我们是夸大了。

如果是我们夸大了，那么我们还是要为此而最先感到高兴的。至于说在最近的未来我们这里将会出现没有一丝"虚伪"的女学员，我们自己也是深信不疑的；但是直至现在虚伪都是相当多的，您能否认吗？如果我们没有掩盖事实，公然把它说明了，我们之所以直言不讳，那也正是因为我们衷心希望我们的妇女获得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教育。至于说"要成为解决某个妇女问题的活动家"的幻想，那么，对此我们要指出：怀着受教育的思想与希望而成为高等培训班的学员，从而掌握高

等的精神力量，通过教育获得一种手段，使自己在不幸的生活境遇中更有保障，更能自卫。此外，妇女的普遍被推崇为高尚的观念，说它为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带来新的伟大的智慧和道德力量，我们宣布，这个思想，这个希望，不仅在俄罗斯未来的高等培训班每个学员的心目中崇高、美好和令人向往，而且也正是在我们这里，在欧洲和所有的地方都是唯一的和真正解决“妇女问题”的开端，是真实、正确提出这个问题的开端！就让每一名女学员坐在学生板凳上去幻想在解决妇女问题上自己未来的活动吧。我们还要问，您是否相信，就算是在你们莫斯科现在所有坐在学生板凳上的女学员都对自己向往什么有明确意识，而不是被空泛的理论搅浑了头脑吗？正因如此，我们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三条才希望妇女们首先要学习，要求他们必须学习，以最严格的方式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科学寄于很高的期望。真正的严肃的科学会杜绝一切弄虚做假，杜绝一切与事无关的、虚伪的思想，也就是潜入对思想尚未习惯的那种妇女的头脑的思想，某种外界的、通常是男人的影响引发的思想。可见，除非首先要求妇女的自立精神，妇女的智慧与心灵的自立精神，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像人们的大喊大叫那样，说我们是妇女教育的反对者，对还是不对？

您在您的信中说，我们“不怕毁损名誉”决心讲出自己的观点。唉，我们非常清楚，名誉已经毁损了！我们珍视的只是我们享有一批有头脑的人士的某种同情，这些人在我们这个普遍的思想趋炎附势的时代敢于有自己的判断①。

我们希望的只是，这些人的群体切实地、显著地扩大。再

① 引自阿·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引文是剧中人物莫尔恰林的话。

次感谢您的来函，期望今后得到有关莫斯科妇女高等培训班的命运的消息，我们对她们的成就绝非漠不关心。

Ⅱ

顺便谈谈，现在正好是我们刊物发行半年的时候。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们的活动，我们的编辑工作花的力量；还可以构想并且开诚布公地谈谈，大声问问：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说了什么，还有什么没能说？等等，等等——如同在写未来一年发行刊物的声明时通常要说的那样。但是我们把这些暂且放在一边，只是回答旁观者向我们提过几次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很少，甚至根本就不回答不断投向我们的批评、攻击和谩骂；特别是在年初时这种批评、谩骂纷至沓来，大概在年末，下一年的征订开始的时候也将如此？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成为所有杂文作者的救命稻草：没有什么好写的，——还不是有《公民报》，骂它；而且这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题目！——于是骂起来。

为什么不回答呢？首先，也是主要的，总不能对每一个小丑都回答吧？

噢，毫无疑问，也有的不是小丑；有聪明的人，有时还是机智的人，还有有文艺修养的人，这是现今少有的，是你要重视的人。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根本不能回答的，虽然有的时候你想要回答，——但不能回答，因为说来说去你不知道他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昧良心说话，要那样自相矛盾，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追求什么，他们的传统在哪里，他们的未来是什么？他们写得很痛快，有时写得还真有点道理，可是你看，就在同一页纸上他自己突然就把自己推翻了，而且是故意推翻，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自相矛盾

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目的？难道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文字游戏？说到底你也不知道回答什么，为什么要回答。

这种人是有的，我说的就是我们的一现即逝的文学。但也有的人不属于一现即逝的文学，相反的是非常真诚的人。说到这里我不能忘记《祖国纪事》的尼·康先生[①] 和我欠他的“债”。我没有同他相识的荣幸，也没有机会听说他个人的任何情况。我由衷地相信，这是只能在彼得堡才有的最真诚的政论家之一。这是件完全与我无关的事，不过我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圣彼得堡新闻》的可敬的 Z. 先生[②] 对尼·康先生的那么强烈的和无休止的敌意。对这种情况我多次真挚地表示过遗憾，我相信，这两位活动家彼此如果不是那么敌视，他们二位是完全能够和好的，当然这是与我无关的事。尼·康先生第一次令我惊讶的是他关于我对别林斯基、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评论所发表的评论，后来还有关于我的长篇小说《群魔》的评论[③]。

---

① 尼·康先生即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俄国著名社会学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

② Z. 先生即 B. П. 布列宁。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提到的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对他的评论是指米哈依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1873 年第 1～2 期发表的系列文章《文学札记与杂志评论》。米哈依洛夫斯基在文章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的《老一代人》一文中说别林斯基是“热情的社会主义者”，还述说了自己与别林斯基结识的情况和别林斯基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恋。米哈依洛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社会主义者对待经济和宗教问题的态度上提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的见解，他特别指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所做的那种毫无根据的说明和论述使社会感到恐惧，并且使真理遭到歪曲，从而导致很多可悲的后果，我们只指出其中的一件事就够了，如涅恰耶夫事件。如果社会主义学说在我们这里没有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歪曲丑化，俄国社会，特别是俄国青年就有可能理（转下页）

关于我的长篇小说我虽然想过回答他，但我错过点儿时机；但是关于社会主义，我必须回答他。本来关于社会主义，我打算在我的编辑工作的下半年再写。主要的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尼·康先生要我相信，社会主义在俄国必定是保守的[①]，他想以此对我说明什么呢？他是否认为这样就可以多少给我一点安慰，因为他设想我肯定是保守派。我斗胆告诉尼·康先生，我本人非常不喜欢“这个世界的形象”[②]。但是写并且论证说社会主义不是无神论的学说，社会主义全然不是无神论的公式，而无神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基本的实质，出自

（接上页）解并正确地评议它，那么作为工人国际同盟的代表的涅恰耶夫所获取的成果就会极少。”米哈依洛夫斯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惊讶的对《群魔》的评论是，“如果您没有玩弄‘上帝’这个字眼，走近一些了解被您羞辱了的主义，您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至少是与人民的俄罗斯真理的某些部分是一致的”。

① “社会主义在俄国必定是保守的”这个观点是米哈依洛夫斯基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他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的核心在我们俄国并不是革命的学说，因为我们的大多数人民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联合组织——土地公社的帮助达到的。”关于涅恰耶夫对俄国青年的可能的影响，米哈依洛夫斯基指出：“俄国青年本来可以回答他的（即涅恰耶夫——译者）一切诱惑说：‘我可以同情在欧洲的工人国际同盟，也可以不同情，但这个同盟在俄国是无事可做的。社会主义在欧洲是革命的，在俄国则是保守的。’”

② 比照《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31节。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米哈依洛夫斯基的文章中关于社会主义对宗教的态度的言论。米哈依洛夫斯基在文章中说：“社会主义从未研究神学问题。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很多分歧见解”，但“特别是在涉及到基督教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它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学说……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地谈论社会主义，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把任何一种神学学说或者任何一种道德、政治学说强加于它。我们只把它作为经济学说来谈论它。”

一位看来对这个题目做过很多研究的作家之口，这是使我深感惊讶的[3]。我现在顺便写到这些事，就是为了以实例说明，现在在我们这里与某个人就某个问题在文学上进行探讨或争论是多么困难，甚至同不装腔做势的人、单纯老实的人也是如此。(注意：单纯老实绝不排除智慧和天才。）我之所以想到尼·康先生，正是因为一直想要回答他，但又总是做不到。

但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你要回答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因为他们谩骂而气愤——他们骂得是多么凶啊！不过有的谩骂只能给你带来荣誉，没有任何坏处。我是气愤……不过，用不着，我不生气，不能生他们的气。他们是整整一群从事写作的同事，这个群体在某个时候从前人那里继承了一点自由主义思想，但继承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是浮皮潦草，没有任何发展和阐释。在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那里提出的带有某种连续性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则完全失去了终点和起点。我相信，假如别林斯基再次出现，人们不用手指着别林斯基告诉他们，这就是别林斯基，他们就会立刻开口谩骂他，没有任何道理。显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要表现出自由主义精神。但如何写才算有自由主义精神？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忘记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也全然不知道，实际上怎样做才是自由主义。他们大部分人都在盲目地写，以备万一。一个小女孩儿用针刺了另一个孩子的头，于是他发现女孩子做得好，因为她是反抗专横，有自由主义精神。面对愈来愈多的自杀事件或者目前这种可怕的酗酒，他们根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他不敢冒险写这些事可憎可怕。万一不符合自由主义怎么办，于是他以嘲讽的方式转述这些事。为了运用这种方式他们养成了一种令人极其厌恶的和愚不可及的腔调。占领希

瓦[1]，他就立即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这是自由主义精神抑或不是？称赞吧，——大概不符合自由主义。欢呼吧——一定不符合自由主义！指摘吗？大概也不是自由主义，因为万彼里[2]已经赞扬过了。于是他左右为难："我高兴……不过，也许不高兴……可是，看来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然而，说来说去，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等等，等等，——总是这三句说法。开个玩笑，左右逢源，总能显得比较自由主义一些。

最可笑的是，在这种窘境中他们使出手腕，显示他们知道一些什么："我们不过就是让你们写，让你们说；等着瞧吧，到时候我们要说些什么！而现在我们不得不说些玩笑话！不过，我们知道的可多了！……可是不能讲出来我们知道多少！"

难道对这种人也要回答，也要同他们进行争论吗？你只要把这群人一搅动起来，那就是灾难！其实，看来他们是愿意纠缠的，这是我从很多迹象上看到的。看看他们是怎样挑衅吧！他们宣布我是"警探作家"，还宣布我是留恋"奴隶制"的奴隶主。难道我还要回答他们吗？

这是最近的一个笑话，它足以说明这群人的特点。

不久前我们的报纸刊登了一个现已尽人皆知的故事，是关

---

① 为中亚的希瓦汗国的首都，1873年被俄国军队征服，成为俄国的保护国。俄国报纸，包括《公民报》在内，广泛报道了这次远征的胜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可能是《呼声报》上的一篇杂文，这篇文章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的《关于一个新剧本》一文。

② 万彼里即万彼里·格尔曼（阿尔米尼）（1832—1913），匈牙利学者、作家。1873年6月俄国报纸发表了他刊登在英国《时代》报上的关于俄国远征希瓦的文章，他认为俄国军队深入中亚腹地是对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威胁，但他同时不能不指出，在欧洲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俄国那样，从那个地带出发到达希瓦。

于修士尼尔神父的故事[1]，报道提到他的一些隐秘行为。

我们同时就已声明，我们这里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老爷，他们虽然非常虔诚，但却倾向于对教会的神职人员采取不能允许的宽容行为。我把我们当时的话摘录出来，问题就在于他如何理解这段话："……确切地说，虔诚信仰的热情变成极不正常的要求，比如说，要求他们最尊重的、敬仰的神职人员按照世俗那样对自己甜蜜、亲切、爱抚。我们注意到，在天主教里这种情况比在我们这里多，在我们这里是很少有的……起初，比如说，出于热诚的信仰向神职人员赠送糖果、甜食，不考虑这些馈赠无论如何纯洁，它们总还是强烈的诱惑；再后，赠送糖果的想法就逐渐膨胀起来，达到完全不能允许的地步。再重述一次，最有意思的是，所有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差不多全都出自可嘉奖的情感，它把本性都蒙骗住了，以至在严重犯罪的时刻都与祷告文、祈祷、斋戒等等并行不悖。再补充一句，这种细腻微妙的事情老百姓是完全没有份的，这只是老爷的事情，那也是少有的。如果同老百姓的妇女发生这种罪行是在寺院里，这就纯粹是罪恶——赤裸裸的、没有丝毫虚伪的圣洁色彩。"

这种恶劣的，但十分奇异的，引人注意的人物是我们的文明的病态的寄生物。艺术家在小说中真实描绘的这种类型可以给艺术家带来荣誉，杂文家既没有理解这种类型，也没有理解我们的叙述的揶揄语气，有什么办法呢？他以为我们是在赞赏

[1] 陀思妥耶夫斯基1873年6月11日在《公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尼尔神父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其他报纸的报道得知这一事件的，文章的内容是尼尔神父与女教徒的暧昧关系。

这些老爷！于是就开口骂起来：自由主义的主题！[①]

“我请您相信”，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我曾怀着惊讶的心情把那篇小文章告诉我的这位朋友。“我请您相信，他所理解的完全与他所写的一样，没要任何诡计。相反的是，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样说吧，杂文的感受、思想和一切想象的迟钝——十年的迟钝，是由人云亦云和非他自己固有的十年的自由主义造成的迟钝。在这里，对他们的方式、习惯、他们的官方的和艰深的杂文风格之外的一切已经彻底丧失了理解能力，……几乎是丧失了人类的语言……”

我相信，因此甚至是可以谅解的。那么对这种人应该怎样回答呢？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杂文作者署名为 ЗКС.，真实姓名为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切比雪夫—季米特里耶夫，他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报》发表的《尼尔神父的故事》一文，在《交易所新闻》发表杂文《随笔》，嘲讽《公民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极力掩饰、平息尼尔神父的丑闻。

求情者

（《公民报》，1873 年 9 月 24 日）

有一次已去世的 Д. 说："我知道一位很使人感兴趣的乞求者，这个人就是已故的 C.。人们还记得他，这是一个聪明、谦虚的人，他明白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独具的、相当有意思的自尊风度，他总是善于在比自己的社会地位多少高一层的社交界中交结。顺便说一句，我发现他极其善于以强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别的人似乎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事，人家却能为他去办。我的一位亲戚，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在 T. 省省长手下谋得了一份差事。关于那位省长，人们都说那是一个很固执的人。那位可怜的青年从彼得堡来的时候有些胆怯，他很想找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给他写一封私人的推荐信。他知道 И. 将军是我的一个没有深交的熟人，可是这位将军与省长的关系很好，省长还由于什么事情非常感谢将军。但是这位将军是一位很傲慢的、高不可攀的人物，求他写什么推荐信之类的事情尤其难办。即便是他亲密的朋友也求不动，有过这样一件事情是人们都知道的。

青年人叹口气说："不可能，没有办法。"

这时 C. 来到我这里，于是我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喂，您不是认识 И. 将军吗？"我问他。

"是的，认识。是这样的，我从未进过他家，他没有邀请过我，不过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在 Щ. 那里遇见他，同他一起多次玩过纸牌。他愿意和我玩牌。"

我向他讲了年轻人的事。我承认，我没有抱多大希望，但

是我头脑中老是有一种想法不停地冒出来。我感到，由于某种原因我可以有把握地指望他高兴地去完成我的要求，当然啦，只要他力所能及。

“如果您恳求将军写两三行字推荐的话就行了。可以吗？”我心怀侥幸地问道。

“可以。”他说。

“啊，您可是给我们帮了大忙。可是怎么办呢，您刚才不是说您还没有进过他的家吗？”

“没关系，可以。”C. 语气肯定地说。

“您知道，在这类事情上他是很难求的。前不久他曾拒绝自己的妹妹……”

“知道，知道，不过……可以试一试。明天就给你们回音。”

“怎么，明天就可以！”

果然是这样办了。第二天一封非常好的推荐信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将军给省长的信：

> 亲爱的朋友和老伙伴米哈依尔·斯切潘诺维奇，我向您推荐这个申请者、愿做您的下属的小官吏、一个很可爱的青年人，我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面，但是一些可靠的人都对我说他很好，所以我才毫无疑虑地向您推荐，您如能对他给以格外的关照，这将是给我的极大帮助，怀念您并如从前一样忠于您。 您的
>
> 依万 И.

信交给了我们，为了我们能够阅读，有意未封口，大概C. 想以此在我们面前炫耀一番。信封是将军亲手写的，此

外，C. 的手中还有以花字签名的将军的便笺，这是将军表示信任给他的。

“要知道，这简直是奇迹！”我惊讶得喊起来。“您这是怎样办成的？”

“对付什么人用什么办法。”C. 笑了笑说。

“说说看，这太有意思了！”

我们坐下了。年轻人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C. 得意地向四周环视一番。首先，他因满足了我的要求很高兴；其次，看得出来他自己也特别得意。这种得意就如同一个能工巧匠刚刚解决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这是我们之间的话，我全都告诉您。”他就开始讲起来。“我再重说一次，对付什么人用什么办法。但是有一种办法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都用得上，我就是用了这种办法。我是在十二点钟支找将军的，他在家。我对您说过，他很愿意同我玩耶拉拉什[1] 牌；有的时候我讲故事他也喜欢听。您知道，我并不是爱讲故事，是人们喜欢听故事，所以有些人尊重我。将军与我交往已有四年。如今他很清楚，我根本不是那种所谓蹭吃蹭喝的人，或者是什么 pigue-assiette[2]，好像他从前，两年以前对我的看法那样。总之大体上我还是清楚的，大概只需再过两年他肯定就会请我到自己家中做客……可是他没料到我自己突然跑去了，完全出乎意料。将军很有礼貌地接待我，但是在脸上则显现出疑问，而且每一分钟疑问都在越来越明显。平时我们在 Щ. 家相遇总是立刻笑起来，我也就马上讲点什么。今天我没有以笑回报他的笑，我显得似乎有些困窘。我把脸绷得紧

① 一种老式的纸牌玩法。

② 法文：食客。

紧的，也不做解释。将军脸上的问号则显得越发严肃了。突然间我单刀直入地开了口，说明我是为了急切的请求而来的。请把急切的这三个字加重强调三倍。将军回问说：‘您有什么要求吗?’他神情紧张得直晃动安乐椅，变得极端严肃。眉目间呈现出难看的皱纹。我开始从远处说起，好像我自己都很难启齿。说得语无伦次，装出说每一句话我自己都很难为情的样子，而且很苦恼。‘这样说吧，在生活中有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简直是求告无门……我深深感到，我在打搅您，我感到很难为情。但是，这种情况……这样说吧，每一个人都有债务……您，将军，如果知道的话，我是多么难才下了现在这个决心！……我们在可爱的Щ.那里与您相遇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会落到……现在这样打搅您，打搅您本人……而且看来还是在这样不合适的时间……’

“一句话，肯定是来借钱！您可以想象得到，将军的脸早已在泛红了；眼眶湿润，显出难过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而我呢，就一句又一句地加深这种气氛。我用一些辞句使他琢磨，我如果真的是来借钱，要借的就不是一笔小的数目。您现在想想看，现在对将军来说无论如何我已经不是那种可以断然拒绝，甚至是可以逐出门外的人。我们相互需要……我们还将长期在一起相聚……不过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他的钱是不会给任何人的，无论有什么理由……此外我同样清楚，他很高兴同我一块玩耶拉拉什牌，——要他放弃这种心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上一周我和他玩牌的时候，他说与谁玩也没有与我玩得愉快……可是在我的这种恳求之后还怎么能再玩牌呢?一句话，我在折磨他……使他喝下满满一杯酒；我使他精疲力竭，在四个小时里我眼看着他消瘦了！这时只要开始谈钱，‘就说，将军，两三千吧，借用最短的期限。’然而我突然用完

全另一种声音说：‘一个青年人来到T. 省，需要一份推荐，而我则处在实在不能拒绝他的地位。恳求您写上两三行，将军，您想象不到，您将使我多么愉快！’……

“您可以想象，他是怎样高兴！他如同感受到惊喜似的跳了起来，从肩上卸下了一座山！这时我即使请他写四封信——他就会给我写四封——纯粹是出于感谢！信是我自己向他口述的。您只要看一眼他那个签名……只凭一个签字您就能判断一个人的喜悦心情。他送我到门口，十分客气地责怪我何必为这样一点小事那么为难！的确，还没有邀请我到家中做客，但我已经看出来，话已经到了他的嘴边：‘怎么回事，伯维尔·米哈依洛维奇，从来也没到过我家，不必客气，请随便。’……不过我们约定在Щ. 家见面。我答应告诉他关于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的趣闻……总之，我向您建议的永远有效的方法是，——C. 最后说，——如果您必须向什么人提出什么要求，而且很难做到的要求，那么最好的一个办法——装出一副是来向他借钱的姿态。当然，这要因人而异！从前的关系越是高雅越好。要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去，你的到访要使他感到惊讶，从远处说起，迫使他感到为难，使他惧怕，使他疲惫不堪，——这时突然改变语气，直接了当地讲出真实的事情。请相信，他会真心实意地感激您，不会拒绝，您会得到所要的一切，这是最可靠的办法。不过，这一切都是只对您讲的秘密……”

C. 由于对我讲了这一切他感到非常得意，我也真正明白了，他为什么总能达到目的……

小幅图景汇集[①]（在途中）

（《作品汇集》，圣彼得堡：1874 年）

我所说的路途，是指汽轮机、铁路和轮船。我们这些来自

---

① 《小幅图景汇集（在途中）》是 1874 年彼得堡的作家们为救济灾民而合作出版的文集《作品汇集》中的一篇作品。1873 年底彼得堡的部分作家倡议出版一本文集，筹款赈济萨马拉地区歉收的灾民。倡议在彼得堡的作家会议上得到支持，随即选出编辑委员会，老作家伊·阿·冈察洛夫负责来稿阅读、审查、编选并与作家联系。文集定名为《作品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提供自己的作品参加赈灾义举，1874 年 2 月将自己的新作《小幅图景汇集（在途中）》交给冈察洛夫。冈察洛夫阅读《小幅图景汇集（在途中）》时对其中一个人物——“狂放的神父”的刻画提出意见。他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这个人物“被刻画得用笔太刻薄凶狠，竟至如同讽刺画，似乎失真”。两位作家就这一问题展开通信讨论，陈述各自对文学创作的类型与典型问题的见解，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函未能存留下来。不过，冈察洛夫在反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的信中提到他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的要点。冈察洛夫在一封反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他关于神父形象的说法，坚持这个人物的真实性，说“这种类型正在诞生”。对此，冈察洛夫反驳说：“……如果说正在诞生，那就是说还不成其为类型。您比我更清楚，类型的形成是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重复，或者一些现象和人物的层层积淀，在时间的流程中类似现象和人物经常出现，最后，形成，定型，为观察者所熟悉。创作（我指的是客观的艺术家的创作，比如您）只有生活定型时（我认为）才能出现，创作不能适应新的正在出现的生活，生活就需要另一类的天才，例如谢德林。您已不是 sine ira（拉丁文：不带愤怒地）描写神父，在这里艺术家让位于政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辩解说自己描写的神父“不是讽刺画，也不是臆造的，而是摄取自……现实，如同摄像”。对此，冈察洛夫反驳说：“……他之所以未成为……类型，其原因正在于此。”在讨论过程中冈察洛夫请陀思妥 （转下页）

各自首府的居民们，对于前不久一位老农所说的过去“乘马而行”的路途，早已开始要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当然，如今在过去的路途上，也会有很多新鲜事物不同于往日的种种状态了。起码，我从讲述故事者们的口中就听到过很多引人入胜的东西，由于我终归不完全相信到处有什么劫匪之类的歹徒，于是我准备差不多每年夏季都要深入地到过去的那些路途上走一趟，以便给自己增长一些见识和获取一些教益。那么，现在就请听我从铁路说起吧。

瞧，我们现在正在走进车厢，出现在公众面前以及混杂在群众之中时，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俄罗斯人总是引起看人学样的观察者的好奇，这在路途中则分外明显。在我们的车厢里相互之间交谈起来十分勉强和艰难，这在旅途的最初时刻更是如此。所有的人仿佛都有对立情绪，大家似乎都心情不好；人们都以一种最不信任的好奇心环视左右，而这种最不信任的好奇还必定混杂着一种敌意。与此同时，人们还尽量装模作样，好像不仅相互没有注意到对方，而且根本也不想要去注意。

在列车上的知识阶层区域中，对于非常多的旅客来说，入座以及途中相识的最初时刻简直绝对是一种受苦受难的时刻。这种苦难时刻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有的，例如在国外就不可能有。这是因为在国外每一位乘客都明白，而且自己就能够立即去寻找自己的座位。在我们这里，没有乘务员的帮忙，而且一般来说，没有一位领路人的指导就很难办，就很难为自己立即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不仅仅指在车厢中（甚至在车厢中尽管自

(接上页）耶夫斯基自己决定，是保留还是删节关于神父的部分。在将《小幅图景汇集（在途中）》收入《作品汇集》发表时删节了这个部分，冈察洛夫在信中说，他是遵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删节的。

己手里还拿着车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毫无例外是这样。我并非针对为争夺座位吵架一类事而言。有时候，要询问邻座的陌生人某件最急切的事，——那么，就用最怯生生的，最甜腻的语调提出问题，仿佛您冒了极大的危险似的。不用说，被询问的那个人顿时就惊慌失措起来，并且以一种不寻常的神经质的惊惧左顾右盼。尽管他回答得比问话者加倍地匆忙和甜腻，然而，虽然问者与答者二人都相互竭尽甜言蜜语之能事，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某种怪异之极的担心害怕的感觉：可不要引发斗殴啊！这种猜测虽然不是总会变成事实，但是，在第一时刻，当任何一个地方有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聚集为不熟习的人群时，这种猜测，哪怕在瞬间，哪怕只是以一种不经意的感觉的样子，的确，必定会在聚集起来的这群受过教育的俄罗斯的精英们中间漫延开来。

“这全然不是因为”，“痛心疾首者们”中间一位悲观主义人士气急败坏地针对我的看法说，“这根本不是因为他们相互不信赖他们自己的教养受过欧化的熏陶，而且还必定因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在自己欧化心灵的深处都同意说，应该好好揍他一顿……不，啊，不，我彻头彻尾地胡说八道！”我的这位悲观主义者立即纠正他自己的话叫喊着说，“我们的西欧派人士任何时候也不会承认，认为应该把他揍一顿！不，这有点太给他脸上贴金啦！应该抽他一顿鞭子。即使是最含糊不清的承认，这也已经是一种美德的起点，可是我们的美德又在何处呢？自欺在我们这里已经远比欺人更为根深蒂固了。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应该用鞭子抽他，但是甚至暗自对自己也从来不会承认说，确实应该狠狠地打得他皮开肉绽。”

我把一位悲观主义者的意见作为一种，多多少少具有令人

好奇的独特性引述出来；至于我嘛，我则全然不赞同他的观点，我倾向于更为宽容缓和的意见。

*　*　*

于旅途中聚集在一起的俄罗斯文化层人士群体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开始攀谈起来的第一阶段之后，即在担心害怕的左顾右盼和全身抽搐哆嗦之后，就总是来得异常地快。不善于交谈只是开头难，只要一开了头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很难控制住。有什么办法？走极端是我们的特点。罪过就在于我们的缺乏才智，不管谁怎样说和说什么，最最可怕的是我们有天赋有才气的人太少了，且不论这种才气高的人是什么类型；与此相反，最最可怕的恰恰是所谓的“中庸之道”太多啦。中庸之道——这是一种胆小怕事的，随波逐流没有主见的东西；与此同时，却也是一种妄自尊大的，甚至是滋事好斗的东西。为了避免损害自己的声誉，人们都害怕自己首先开口说话，人们都腼腆起来和不好意思起来。人聪明，因为他认为任何一种独立自主的行动仿佛都低于自己智慧的水准，人蠢笨则是由于高傲。然而，俄罗斯人就其天性来说是全球最善于交往和喜欢群体活动的人，其结果就是，最初一刻钟的时间，大家都不得不忍受着极其痛苦的折磨，而一旦有谁终于首先站出来打破人们身上的玻璃罩，开始与大家攀谈起来时，于是，尽管人们内心还难免忐忑，却能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一事实。在铁路的旅行中，这种打碎玻璃罩的情况有时发生得相当滑稽可笑，而在乘轮船出游时情况差不多总是另外一种样子（下文我将会宣告其原由）。有时，在全场“中庸”和缺少才智的情境下会突然，

会非常出人意外地，冒出一个很有天资的能人，他现身说法立即吸引着无一例外的所有人。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位先生，在全场紧张沉默的气氛中和在惊厥抽搐的艰苦中，这位先生没有受谁的任何邀请，甚至也没有任何原由就出现了，这还不算，他讲话甚至没有一点儿错发的语音。根据我们大家的理念，每位绅士处于不熟悉的圈子里时，讲话中发错某几个音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他在选择最通常字眼时，丝毫没有特意玩弄字斟句酌的把戏，这在我们某些绅士圈子里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在解放农民之后立即出现的，似乎是一种因此而受了屈辱的表示。恰恰相反，他以一种最久远之前古老绅士固有的姿态开始向所有的人而不是特别向某个人叙述起仿佛是自己本人的经历，不言而喻，这不免引起听众们十分不解的诧异。大家开始甚至有些不知所措起来，继而疑虑地相互交换起眼神；大家得以振奋起来的是这样一种想法，即无论如何，这可是某人在讲述，而不是他们自己。如此隐秘的，有时甚至是妙不可言的，包含着详情细节的讲述可以延续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随便若干个小时都行。

逐渐地，所有的人都开始感觉到受到这位有才能人物的魔力吸引，——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感受，就是由于他们没有感到自己不受尊重，尽管他们有这种准备。这位有才能的人让所有听众感到震惊的主要是，他绝对既不吹捧谁，也不要谁奉承他什么，他全然无求于听众，这是一般常见的平庸无华的吹牛大王所需要的；他之所以要讲述，仅仅因为他不可能将自己的珍贵之物秘藏于自身。“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悉从尊便，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只不过我是想造福于你们而已。”——如果要他说些什么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这样说。不过，甚至他也不这样说，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完全放松了，可是在起

始的那一刻（嗯，不可能没有开始的那一刻），当他如此突然地开口讲话时，理所当然，在场的每一个人刹那间觉得自己本人受到了屈辱。慢慢地大家都鼓起了勇气，以至于开始打断他的话，提出问题，追根问底，当然啰，尽可能保持着戒备。一位绅士虽然并无任何曲意逢迎的用意，以不寻常的高度注意力立即聆听起您的讲述来，立即回应您起来——如果您有说错的地方，就予以纠正，如果您略微有正确的地方，忙不迭地就表示同意。不论他纠正您也好，同意您也罢，他必定给予您毫无疑问的满足感；您全身心都感受到这一点，每时每刻，您根本不了解他怎么会做得这般好。譬如说，您刚刚反驳了他，虽然才不超过一分钟的时间，他又说了完全相反的话，可是现在出现的情况却是，他所说的话却又与您认为对他的话需要有所纠正之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他完全同意了您的意见，于是您受到了恭维，而他也保持住了他的充分的自主性。有时候，在您卓有成效的反驳之后，而且是在大庭广众的情况下，您受到的恭维与奉承往往如此之大，于是您开始以真正主角的姿态扫视公众，尽管这全在于您的聪慧，不过，这却已经是一位有才华的人物的魅力所在了。啊，他见多，他识广，他到处去过，他到处行走过，他到处停留过，只不过昨天在那里大家才刚刚同他告别分手。三十年前，即上一朝代，他曾走访过一位部长，后来又走访过州长将军勃——夫，控诉这位州长的一个亲戚，这一点就是他以自己回忆往事而出众之处，那位州长将军勃——夫当时竟立即请他坐下来与自己一同享受雪茄，这样好的雪茄他后来则再也无缘吸过。当然，就其外貌来说，他才五十岁，因此他才可能记得州长勃——夫，昨天他还送别了刚刚逃往国外的犹太佬Φ.，这个犹太佬Φ. 在离开的最后时刻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全部最新隐秘，因此，全俄罗斯如今只有他一

个人晓得这一事件的底细。在谈到州长勃——夫时，大家还比较平静，何况讲述的是什么雪茄之类的事；可是提到犹太佬Ф. 的名字时，甚至连听众中最庄重体面的人也表现出特别感兴趣的样子来了。他们甚至不惜身子向讲话的人倾斜过去，贪婪地听着，这倒不是说他们有丝毫羡慕的意思，似乎讲述者同如此高级的犹太佬有交情而他们则无。气球“茹利·法夫尔”[①]是一吹就破的玩意儿，普法战争时飞行的是另外一种[②]，而这一种是新型的。于是，就说到有关俾斯麦公爵的 un mot de Jules Favre[③]。这还是去年在巴黎时有人咬耳朵对他说的悄悄话，——信不信由您。看起来，讲述者本人甚至也不特别坚持自己的说法是可信的，不过有关征收消费税的新的法规草案他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前天在国务会议上对此事有过议论。他甚至比在国务会议里参与此事的人们知道得更清楚，同时还有如同×××讲的有关酒馆老板等最最辛辣的、逗人捧腹的笑话。大家都抿着嘴笑，都感到非常有趣，因为这一切好像再真实不过了。一位上校工程师低声告诉他的邻座客人说，前不久他也听到过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东西，这差不多是实有其事的啊，于是讲述故事者的声望立即又提升起来。他说也同戈——夫其人共同在车厢里乘火车出行过上千次，上千次的啊，而在这里关于他的说法却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戈——夫的奇闻趣事没有人知道，而且涅兹纳科梅茨也不会有什么事，因为某位

---

① 1873年5月3日的《呼声报》上曾报道气球“茹利·法夫尔”升空的事。

②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被德国人围困的巴黎与外界联系时曾依赖气球。

③ 法语：茹利·法夫尔的言辞。普法战争时，法夫尔曾任“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

大人物也被牵连进去了，这位大人物要求这一切一定得有个了结。这位大人物曾予以宽恕并且还说过，他不会干预此事。不过得有某种限度，因为这二人都做过了头，那么这位大人物理所当然就得过问了。大人物本人亲眼目睹了一切，他还亲自在车站的薄子上写下证词。不用说，大家会和解的。[1] 至于说到猎犬，说到名贵的犬，我们这位绅士却是这样一种说法，即仿佛他生活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这些猎犬。不言而喻，最终所有的在场人全都如同二二得四那样明白，他其实从来没有与戈——夫其人乘火车出行过，从来也没有在簿子上写过什么，从来也未曾同勃——夫其人一起抽过雪茄，从来也没有养过猎犬，至于国务会议更是离得有十万八千里之远。尽管如此，所有的人，甚至是专家都明白他知道这一切，甚至知道得相当透彻，因此，完完全全可以听下去，而不会有失自己的身份，还是听下去吧。而且问题还不在这些新闻本身，而在于聆听这些新闻得到的满足感。这位万事通的讲述中明显有空白之处，很少甚至几乎完全不谈中、小学问题，不谈大学问题，不谈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也不谈文学，——似乎他都怀疑有这些课题的存在。请试着问一问自己，这人可能会是什么人呢，那么，你肯定不会有答案。你只知道，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而他的专长你却猜不出。然而，你预感到，这是一个怪异的家伙，如同任何一个在你眼皮底下出现的怪异的家伙一样，他必定有他的专长，如果你猜不出来，那么，正是因为你不了解怪异的家伙，

① 戈——夫，是指奥尔洛夫斯克-维捷勃斯克铁路主管人戈卢别夫。1873年7月22日《圣彼得堡新闻》第199期上刊登苏沃林（笔名涅兹纳科梅茨）的小品文说，戈卢别夫利用职权把车上包间里的乘客全都撵走，供他一人享用。只有一位乘客拒绝他的要求并索取意见簿，这位乘客原来是部长。

以及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遇见过。其外表也特别令人困惑不解，他穿着很阔绰，他显然有一个不错的裁缝，如果是在夏季，他必定着一身夏装，身穿缎纹麻布衣，带有护腿套，头顶度夏帽，然而……所有这一切在他身上却显得多少有点陈腐，因为，如果说他曾经有一个好裁缝，那也只不过曾经是而已，可是如今可能就已经不是。他身材高佻，体态瘦削，身板挺直得与年纪不相称；他直视前方，一副无所畏惧和不可抗拒的尊严模样，与厚颜无耻毫不沾边。相反，处处表现得温良恭俭让，而拿捏得又不温不火。留着一把不大的斑白山羊胡，不完全像拿破仑时代的那种，然而却剪成贵族人物的样式。总的说来风度是无可指责的，而我们这里是非常看重风度的。他很少吸烟，甚至可能根本不吸烟。随身没有携带任何行李，——只有一件不起眼的网袋，它如同妇女们手提的那种样式，无疑是以前某个时期的舶来品，如今则早已磨损得不堪入目了。关于这位绅士就说到这里，结局就是，这位绅士突然地，完全出人意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必然还是消失在某个最不起眼的小车站，这小车站处在最无关紧要的通向某处的转折点上，而那某处是无人会走的。这位绅士刚一离去，最留神倾听和随声附和的听众中的某位人士便做出反应大声叫喊，说他“说的全都是骗人的谎话”。当然，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两个人什么都相信并且挑起争论；当然，与之对立的，也肯定会有一两位相反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感到备受屈辱，如果当时保持了沉默而没有反驳那个“信口雌黄的家伙”，则仅仅是由于义愤填膺的缘故。如今他们双方热烈地争辩起来，乘客们都笑着。迄今为止非常谦恭而且正经八百默默无语的某位人士以显而易见明白就里的姿态提出一种猜测说，那位绅士是一个特殊的遗老类型的怪异家伙，他属于第一流的高贵的寄人篱下充当食客的人。

他本人是一个地主，只不过是一个小地主，从娘胎里出来就是一个高贵的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的确有很好的新交和旧识，一辈子都依靠上层社会人士而过活，——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怪异的家伙其实是异常有用的，特别是在农村偏远的地方更是如此。因此，这些地方他才要常常去瞧瞧，才特别喜欢前去做客。在场的所有人不知如何突然就同意起这种意外的看法来，争论也就随之而止。如今罩在人们身上的玻璃罩业已被击碎，相互交谈的话匣子也已打开。甚至即使没有交谈，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如同在自己家里那样自如，所有的人都突然觉得全然无所拘束起来。说来说去，这还多亏了那个有才华的人。

假如不去计较所谓的偶发性大吵大闹、打架斗殴以及有相当不愉快的其他不可避免的突发事件发生的话，不幸的是这类事件毕竟是发生得太多了，那么，就我们的路途而言，说到底，还是可供出行的。不言而喻，当然是应该有所戒备。

我早已撰写并且发表文章说过，在我们的铁路上出行要想过得欢乐和愉快，需要做到的主要之点就在于“要善于让别人谎话连篇地说，并且自己也要尽可能地相信这些骗人的鬼话；于是，如果您自己免不了受诱惑，那么您也有权卓有成效地来撒一次谎，这对双方都有利”。在这里我要肯定地说，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坚持上面的说法不变，而且我所说的话毫无幽默的意思，相反，是最肯定的正面意思。至于说到说谎这件事，特别是就铁路上出行时的谎话而言，我在当时就曾经声明说，这几乎算不得什么毛病，相反，这却是我们民族的善良温厚的自然流露。心术不正的撒谎者在我们这里几乎不存在，差不多所有的俄罗斯的撒谎者都是善良的人。不过，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优秀的人。

然而，无论如何，有时候，甚至在路途中，甚至在车厢

里，使人感到震惊的是，破天荒地萌生某种渴求，渴求谈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渴求有些导师们出来议论有关国计民生大事的社会问题的课题。于是，果真有些导师出场。关于这些导师我也曾经写过，特别令人惊讶的是，愿意学习和略知一些皮毛的人们中间大多是些妇女、姑娘和太太们，我敢向你们保证，她们都还是未曾剪短头发① 的妇女。请告诉我，如今你在什么地方，在路途中或者甚至在大街上，你会碰到不带着书本的少女和太太们吗？可能我是有点夸大其词，但是终归很多妇女都是随身携带书籍上路的，带的不是几本小说，还都是些值得称赞的书，诸如教育方面或者自然科学之类的书等等，甚至还有人在读翻译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泰西塔斯的作品。总而言之，渴求和热忱是非常迫切的，也是最高尚和光辉照人的，不过……不过所有这一切仍然有些不那么适宜。举例来说，最简单易行的是，要让这样的少女随便信服什么都可以，特别是如果有人能说会道就更会让她们信服了。例如，原来宗教信仰很深的妇女突然眼看着就会同意差不多是无神论的种种结论，而且同意把推荐给她的这些结论加以应用。举例来说，教育学，那么，有什么，有什么样的东西不会灌输给她们呢？有什么，有什么样的东西不会让她们信以为真呢？有时候，一想到下面的情况，全身就会为之颤抖，即当她从旅途中返回家以后，她就立即要把路途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她的孩子们和她的丈夫身上。能让你振奋的恐怕只有一点，那就是可能你会猜想到，她毕竟没有充分领会到她的导师的教导，要么完全错解其意，于是，在家中，作为一个母亲以及配偶的本能和健全的思想拯救了

① 1860—1870 年俄国保守派报刊称虚无主义者女孩子为剪短头发者。

她，这种健全的思想在俄罗斯妇女身上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它可以追根溯源到俄罗斯的远古时代。毋庸讳言，思想归思想，终归应该期待科学的教育，坚定而真正的教育，而不是从随便什么书册中以及车厢中受到的教育。在这里，最值得赞许的步骤可能会转而成为凄惨可悲的起步。

在我们各种路途上出行时好处还在于，——再说一次，如果不把那些不伦不类的“偶然事件”计算在内，——你可以全程几乎 incognito[①] 到底，默默无语地同谁都不开口交谈，如果你非常不想说话的话，你完全可以这样做。除非是那些神父们他们会径直开始查询您是何许人也，要往何处去，去干什么，有什么期待云云。不过，这类好心肠的家伙似乎正在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惜，不久前，类似的情况还是不期而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　　*　　*

如同我已经交代过的那样，在轮船上开始交谈的情况与在车厢中多少有点不同。其原因是自然而然的，首先，乘客是较为高级一些的。当然，我所讲的只是指轮船头等舱里的乘客，指在船尾的乘客。至于船首部分的乘客，也就是二等乘客，则不值得一提。这些人也不是乘客，只不过是一些旅客。在那里，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在那里，是网袋装着的行李，是拥挤不堪；在那里，是孤儿与寡母；在那里，母亲们正在用乳房给自己的儿女们喂奶；在那里，是一些身无分文靠领取养老金

---

① 拉丁语：匿名。

苟延残喘的糟老头子们；在那里，是一些迁移的神职人员，一些工人的组合，带着自己老婆和装着大块面包袋子的老农们，是轮船上的仆役和厨灶。无论在何处和何时，在船尾的乘客们完全不理睬在船头的那些旅客，而且甚至对他们一无所知。或许，有一种意见会显得有点怪异，即轮船上“头等舱的”乘客甚至比车厢内相对应的等级的乘客总是要更加高级一些。实际上，当然，这是不真实的，所有这些头等舱里的乘客只要一下了船而返回家里时，那么立即就会在自己家庭的深窝里把说话的调子甚至降低到最自然状态的程度。但是，只要这一家人还是在轮船上，那么就不由自主地说话时把嗓门提高到不可忍受的上流社会人士说话的程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表示自己不比别的人差。就其原因而言，全都在于在轮船上比在铁路上可以占有较大的空间和富裕的空闲时间，以便扭捏作态一番，正像我早已说过的那样，这种原因是自然而然的。这里人们并不是挤压在一起，乘客们并不用去冒险用自身去挤做一团，人们也不如此急急匆匆，不必如此服从于必要性、规章、短暂的分秒时刻，受制于那些入睡的或者啼哭的孩子们。在这里你们无需暴露你们另外一方面的天性、本能，而且也不必勉强地以本来面目和匆匆忙忙的形态展现你们的本性的另一方面。相反，在这里一切的一切犹如在一个严肃的客厅里，一登上甲板，你们仿佛是被邀请来的客人。终归有五六个小时的共同旅程，也可以说是整整一天的共同旅程将你们联系在一起，因此，你们必然知道，应该一起到达行程的终点，并且相互几乎要结识起来。一般来说，女士们在轮船上差不多总会比在车厢里穿着考究一些。假如你们多少还有点自尊心的话，那么你们的孩子也会穿着最迷人的夏季衣装。不言而喻，在这里有时也会碰到手提网袋的女士们以及完全像居家时一样的真正的一家之长的父

亲们，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还抱着自己的孩子，有备无患，胸前还挂着各种奖章。然而这只不过是“地地道道旅行者”中低级的货色，像平民似的严肃对待旅行的旅行者。他们没有崇高的理想，他们有的仅仅是急急忙忙自我生存的感觉而已。真正的轮船乘客们是不会理睬这些可怜的人的，那怕这些可怜的人就坐在他们的跟前，何况这些可怜的人本身立即也就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能牢牢占住自己花钱买的座位就不错了，在这种众情难犯的声势下，他们也只好无保留地和恭顺地收敛起自己，不显山不露水起来。

一句话，空间与时间彻底改变着条件。在这里，即使是最“有才华的人”也不大可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起，反而倒是应该寻求另外一种开始讲话的途径，可能即使如此甚至也根本不会取得成功。在这里，交谈几乎不可能仅仅从路途中的急迫需要开始。主要之点在于，谈话的调子完全应该是另外一种，即“沙龙式的”，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不言而喻，如果轮船上的乘客们不是早先相互认识，那么玻璃罩的击碎要比在车厢里难得多。共同参与的谈话在轮船上是极其罕见的。由于自己的谎话和扭捏作态而引发出来的自己的痛苦，特别是在行程开始的那最初时刻，远比在车厢中要厉害得多。如果你们哪怕是一位略微留心的观察者，那么肯定会感到惊愕的是，在那么一刻钟的时间里，所有这些衣着华丽的女士们说了一套又一套的谎话，多得可以同她们那些自尊自爱的伴侣们说的谎话相媲美。当然，这一切，呈现出原本面貌的这一切通常是在所谓的欢快的、休假时的行程中，在全程两小时到六小时的出行中才遇到。人们竭尽说谎之能事，连各种姿态、各种优美的举止都无不是在做假，每一个人仿佛每一刻钟都照着镜子看自己。最矫揉造作的和令人反感的是尖着嗓子强调的句子的抑扬顿

挫，最令人不可忍受的词语的发音（如果稍微还有点自尊自爱之感，没有人会这样发音的）等等似乎在轮船上要比在车厢更常见。那些一家之主的父亲们和母亲们，也就是说在甲板上共同的一般性交谈暂时还没有开始之时，都尽力把相互说话的声音提得超乎自然地高，他们这是全力想表示他们完全和在家里一样。但是，立即丢人现眼，未能坚持下去，相互之间开始说起鸡毛蒜皮的事，不看地点与场合，非常非常不合时宜。有时，丈夫对待妻子如同是一个陌生的骑士面对他在某处做客时遇到的一位陌生的女士。突然，他们会无缘无故地中断已经开始了的谈话，他们神经质地和心情紧张地环顾他们左右的人，心有疑虑地注意听取相互的对答，甚至还怀有恐惧感，甚至有时相互为对方羞得感到脸红。如果有时（也就是紧迫需要时），他们俩相互需要谈一谈眼下正经八百的事情时，——任何一个丈夫在行程的开始都需要与妻子就某些事交换意见，诸如种种家务事，诸如孩子们的什么事，像米申卡咳嗽啦，而这里有点凉，或者，索妮奇卡的裙子系得太高啦，等等，——那么，他们就感到难堪起来，于是，很快就放低嗓门悄声交谈起来，尽量不让别人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尽管他们所说的不是什么见不得人或者不体面的事，相反，他们所说到的这些事都是最可尊重的，何况，他们所谈到的家务操劳以及孩子们的事等等也不是只有他们一家才有，甚至即使在这艘船上，任何一家人也同样会有的。可是，正是这一最简单不过的思想却蹿不进他们的头脑，甚至认为有这种想法似乎就降低他们的人格。相反，每一家庭中的这一簇人尽管对别的家庭怀有妒忌之心，却大多倾向于把这同一甲板上差不多任何别的家庭中的一簇人视为无足轻重的人物。究其原由，无非是，第一，他们比自己高了若干度；第二，他们是某种特殊的一族人，如来自芭蕾一族等。然

而，无论他们是什么样式的人，他们也如同自己一样有家业，有孩子们，有保姆，有空空如也的钱袋，有在店铺中尚未偿还的债务等等。对他们来说有这种想法岂非太可耻，甚至扫兴之至！这么说吧，这种想法有损于理想形象。

在轮船上，差不多先于所有的人，最早开始大声说话的人们之中，要算那些家庭女教师们，——不言而喻，她们是用法语同孩子们交谈。在次一等级的社会群体中的家庭女教师大多数总是同样一种派头，也就是说，清一色的年轻稚嫩，清一色离开学校时间不长，清一色不怎么漂亮，但是也从来并不很丑，她们一律都穿着深色的轻巧连衣裙，一律都是紧束着腰，一律都尽情地把她们娇小的脚显露出来。一律都带着一副高傲的谦虚神态，但这种神态极其轻松自如，说明她们的高度纯贞品质。一律都忠诚于自己的职守到了狂热程度，她们每人必定都往往随身带着一册关于某种旅行方面的英语或者法语书，书的内容则是培养美德的。瞧吧，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她手里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儿，却目不转睛地，严厉地，但却又爱护地呼唤着另一个玩耍的怀中抱着的那个小女孩儿的六岁的姐姐(她头戴插着勿忘我花的草帽，身穿白色镶着花边的小小的连衣裙，脚上是一双极其好看的儿童皮鞋)。家庭女教师的呼唤是用保姆式的法语讲出的："Wera，wenz-ici."① ——这一喊声必定是经典式的"wenz-ici"，必定要把极强的重音发在"zi"这个起联接作用的语音上。这一家庭的母亲，非凡的上等社会的体态丰满的妇女（她的丈夫也在这里，虽然是一副地主模样，却是西欧式装束的一位先生，身材不算矮小，颇为壮实而不瘦弱，头发略显斑白，一撮淡黄胡须，胡子虽然长了一

---

① 法语："薇拉，到这里来。"

点，但无疑是巴黎模式，头戴白色绒毛帽子，身着夏装，官职不详)，她立刻注意到，那个家庭女教师怀里抱着两岁的尼娜，却要超出讲定的条款去多管闲事；于是，为了提醒那个家庭女教师，说她这位母亲根本不看重家庭女教师的这种做法，就用不同寻常的亲切口吻（然而，却让听命于她的家庭女教师明白，下次她丝毫别指望会再听到如此客气的话语）向她指出，手里抱着尼娜已经够“沉——重——的——了”，别的事应该呼唤另一个家庭女教师去做，与此同时不安地和要发号施令般地环顾四周，要寻找那个不知偷偷溜到什么地方去了的家庭女教师。她的那位西欧化的丈夫甚至做出一种未完成的动作，意思是想跑去寻找那个溜走的家庭女教师，但是又改变主意，停了下来。显然，他很得意自己终归改变主意而没有去寻找那个走开了的家庭女教师。看来，他多少有些惯于受自己身为高级女士的夫人的差遣，而且总把此事放在心上。那个抱着尼娜的家庭女教师为自己这件事马上安抚高级女士，朗朗动听地说她“非常爱尼娜”（说着给了尼娜一个热吻)。同时，又用法语对薇拉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唤，呼喊中使用着那个“zici”的音节，这个忠诚的家庭女教师的眼神里闪耀着爱意，这种爱意同时也是针对那个有过失的薇拉的。薇拉终于蹦蹦跳跳跑了过来，并且假情假意地表示亲热。（六七岁的小孩子，本分应该像一个纯洁的小天使，却不学好，倒已经学会做假骗人和使起坏来了！）家庭女教师立即毫无必要地去理一理小姑娘的小衣领，之后叫她……

*　*　*

这艘轮船只有六个小时的行程，一路上差不多还算欢快。我还要说的是：毫无疑问，如果船航行在伏尔加河上或者从喀琅施塔得到比利时的奥斯坦德有那么两三日的旅程，那么，大家就都会得其所哉。客厅会因需要而不再成其为客厅，芭蕾舞剧也会失去其色彩和混乱不堪，羞涩地隐藏着的人的本能会以最赤裸裸的形态暴露无遗，这种本能甚至会为自己有权挣脱出来而兴高采烈。然而，三日与六个小时毕竟是有区别的，在我们所乘坐的这艘六个小时行程的轮船上从始至终仍然是处于一种最“纯净的状态”中。我们就在这明媚的6月时光中，早上九点来钟，乘船在平静而宽阔的湖上驶行。船首部分由于那些“旅客们”而向下倾斜，但是，在那里只不过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对此，我们根本就不想要知道。如同我早已说过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沙龙。不过，在我们这里也有这类人，他们到处给人出难题，说实话，真不知该怎样办才好。比如说，有一位德国大夫带着一家人，家庭成员是由他的母亲和三位德意志式歪嘴姑娘组成，这三位姑娘看来很难引起俄罗斯未婚夫中的某位的钦羡，我们的法律对所有这些人还没有明文规定。这位老年大夫很自在；他早已戴好了出行戴的德式漆布帽，很蠢的一种样式，他这样做是特意为了表示他的独立性而不随俗，起码这是我们的看法。不过，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暂且放在一边，我们这里还有一位极其优雅姣好的女士和一位上校工程师；还有一位老太婆妈妈，这位老妈妈还带着三个韶华多少已经早逝但穿着却非常入时的彼得堡将军一级圈子里的中、上层姑娘，

她们应该是爱招惹是非、生事好斗和见过世面的姑娘。还有两个花花公子，一位画家，还有一个士官生和一个来自著名近卫骑兵团的骑兵军官。骑兵军官始终保持着某种高傲而独来独往的姿态，并且渺视一切，沉默寡言。当然，他自认自己并非处于属于自己的社会圈子里。不过，很明显，我们之中的所有人对此却很高兴。同我们大家无意中共同相处一起的长官比所有的人都更引人注意，他相应占有自己的地位。其实这是位有着非常宽厚外表的大人阁下，他头戴制帽，身上是制服与便装参半的衣着。大家立即就弄清楚了，这是一位最大的官员，即所谓的“一个州的父母官”。大家甚至肯定说，他如今是外出进行“观察”。确切点说，他只不过是陪伴他的夫人和家人去不远处的他们的度夏官邸。他的夫人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美丽女士，年龄大约在三十六七岁，出身于姓 C 的名门望族（轮船上的人对此都很清楚）。这位夫人是带着全部四个孩子（都是女孩儿，长女是十岁）和一个瑞士女家庭教师上路的。让我们船上某些女士感到十分愤怒不满的是，这位夫人身上的小市民习气，尽管她令人不可忍受地“把鼻子翘得老高”。她一身家常装束，“如今，在一些——家庭的——母亲们——那里，这可是她们的时髦呢”——对于这位夫人的穿着，将军女儿中的一位小姐拖长声音低声说，同时忌妒地仔细观赏着州的父母官夫人太过简朴的连衣裙的精美样式。此外，有一位绅士也引起人们对他特别明显的、甚至多少更高一层的注意，他的身材高佻、瘦削，头发斑白得很厉害，年龄大约是五十六七岁，由着自己的性子刻意坐在轮船的折叠小椅里，而小椅子则几乎紧紧摆在通道中；他刻意地背向公众，懒洋洋地和毫无目标地越过船舷盯着水观看。大家都晓得，他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他在前一朝代曾是一位宫廷高级侍从和追求奇装异服的公子哥儿，

尽管天晓得如今这有什么意义，然而他目前毕竟还是最高层社会圈子里的一位老爷，他一生曾挥霍过大量的金钱，最近时期他则长期在国外流浪。他现在的穿着甚至多少有些随便，式样最普通不过，然而却保持着最无可挑剔的俄罗斯式大人阁下的姿态，而且甚至几乎没有混杂着法国理发师的那种气味，这一点在一个真正俄罗斯的英国人身上是十分罕见的。他在船上有两个仆役，他随身携带的塞特种猎犬惊人地美丽，这只猎犬在我们甲板上走来走去想同大家结识，按顺序在坐着的乘客们膝盖间把鼻子蹭来蹭去。虽然这也很无聊，但没有人为之见怪，我们之中的某些人还试着去抚摸一下猎犬，而且必定摆出一副行家里手的模样，好像很会评价名贵猎犬的品质似的，而且似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说不定明天就可能也会有这样好的一条塞特种猎犬。然而，这条塞特猎犬却如同一位货真价实的达官显贵一样，对他们的抚爱漠然对待，在他们膝盖间只稍一停留就离开，尽管也略微摇摇尾巴，但是也只不过出于上流社会客气的礼仪，懒洋洋地，毫无兴致地。显然，在船上并没有我们这位大人阁下的熟人，就其脸部肌肉的松弛以及身体瘫软的状态来看，十分清楚，他不需要任何熟人，不是由于某种原则性的问题，而只不过就是因为他不需要任何人而已。对于“一州之长的父母官”的行政管理意义，在他这位安坐在自己小折叠椅上的人看来，是最平淡无奇不过，他处之泰然，他这种漠然视之的态度也是极高度的无原则意义可言。但是，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交谈无疑已经准备要启动。行政管理长官在那个小小折叠椅左近踱步，而且竭尽全力想要开口说话。虽然他娶的是姓 C 的名门望族小姐为妻，但他以其固有的胸襟率真似乎承认自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比这位大人阁下要低一级，——不言而喻，即使在他面前也不要丧失其自身任何的一点尊严，这

样一个最后的难题现在就摆在他的面前要他解决。另外，有一位“低一级的”先生，他一直在这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由于他的努力促成，一州之长的父母官与大人阁下终于仿佛偶然在并未事先结识的情况下得以交换两句话，交谈的由头是“低一级的”先生提供的，他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一位邻州的州长，也是一位显贵达官，他在国外赶赴矿泉疗养地找自己的家人时，在车厢里突然摔断了自己的腿。我们的将军州长惊诧万分，他极想得知详情细节。大人阁下知道这件事的详情细节，于是相当必要地透过自己嘴里镶着的假牙含糊不清地嘟嘟哝哝迸出两三句话，这且不说，大人阁下嘟哝时既不瞅着将军州长，同时也不晓得是对着谁而发的，——是对将军州长或者是对“低一级的”那位消息提供者。将军州长以真诚的不可忍耐的期待之情，背着手站立于座椅之后等候着。但是大人阁下却让他大失所望，不但索性突然闭口不再说话，反而忘记他说了些什么。起码，看起来他是这样。生龙活虎的“低一级的”先生颤抖着俯身在大人阁下面前表示不让他沉默下去的愿望，他为自己担负起一项最神圣的责任，就是要使这两位高级绅士相互结识。

*　　*　　*

引人注目的是，“低一级的”这类先生在旅途中相当不少，特别是在一些“大”人物周围更是如此，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旅途中不能把他赶跑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人们也不会驱赶他们，因为他们还的确相当有用，不言而喻，这里所指的是，如果他们本人具备某种良好而适宜的条件。例如，目前就我们这位先生来说，他的脖子上甚至还挂着一只小小的奖章，他身

穿虽说是文职的衣装，却又具有某种制服似的样子，他的帽子上有类假制帽的一道帽箍，——这样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很体面。如此这般的一位先生就来到大人物面前，他用不着开口，只靠他的这一体态，这一活生生的个人本身就预告说："要知道，我是低一级的人；没有与您同起并立的企图，绝对不会谋求强占您的第一级地位，尊贵的大人，您绝对不会对我有所抱怨的，如果能让您消愁解闷甚至会使我感到幸福，您永远不妨从上而下地向着低一级地位回答我，我自己的位置甚至终我一生我都永远铭刻在心。"毫无疑问，再清楚不过的是，这些先生们之所以如此卖力是由于有利可图，然而，这类先生们中的"纯净之徒"甚至并没有谋取什么好处的打算也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某种小官吏的灵感。于是在这种场合他就派上用场，于是在这种场合他就感到由衷地欢快，于是在这种场合他就心境平和到在他身上连奴仆的影子都消失殆尽。然而，如同事实和它的不可缺的结果一样，他的好处终归会自然而然就来到。

*　*　*

对于"两位大人物"正在开始的谈话，在甲板上的所有人都突然异乎寻常地关注起来，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也想凑上去，这样做岂不是太过分，他们只不过想去看一看和听一听而已。有些人已经漫步到左近，比所有人更难受的是"上流社会高级女士"的那位西欧化丈夫。他觉得，他不但可以走到跟前去，甚至还可以参与到谈话中去，而且甚至对此他有自己的某种权利。不管您怎么说，将军就是将军，欧洲就是欧洲。他全然、

全然不比别人差，他也能够谈论在欧洲摔断腿的那个将军！他甚至为达此目的而想出从亲近塞特猎犬做起，他已经向猎犬伸手过去，可是突然又傲慢地收回伸出的手，甚至突然感到一阵想要踢那猎犬一脚的不可克制的欲望。他逐渐装成一副仿佛不合群的和受委屈的模样，片刻之间他走了开去，并且开始注意瞭望湖泊十分美好的远景。他的夫人（他看得见）则以最令人难堪的嘲讽目光盯着他看，他忍受不了这个，于是又返回到“谈话”之处，如同一个幽灵在炼狱里一样在交谈之处荡来荡去。如果这一无辜的幽灵能够憎恨什么的话，那么，在此刻他会憎恨那位“低一级的”先生，要竭尽全力地憎恨，要不是这个低一级的先生作怪，那么，之后发生了的一切很可能就是子虚乌有的了！

“给——这里——来了——一封——电报，”那位干瘪的大人阁下吐字清晰、抑扬顿挫地勉勉强强回答将军州长说，同时留心关切着他的塞特猎犬，“您——可以——设想，接到电报的一瞬间，我——不知——所措……”

“那么，是您的一位亲戚？”将军州长想探询一下，但是克制着自己，等待着回答。

“您可以设想，一家人还在卡尔兹巴德，可是他发——了——一——封——电报，”大人阁下重新又含糊不清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反反复复死咬住一个词不放：“发了一封电报。”

将军州长继续等待着，尽管他的脸上已经表现出最强烈的不耐烦情绪。可是那位大人阁下却突然哑口无言了，完全彻底忘记他们正在进行的谈话。

“要知道，好像……他有一份最大的领地……在特维尔州？”将军州长终于忍不住亲自开口询问起来，不免带有几丝

不太自信的羞涩之情。

“是两个兄弟，两兄弟都是干瘦的身材，一个叫亚科夫，另一个叫阿——里——斯塔尔赫……是两个兄弟。现在兄弟在比——萨——拉——比亚。亚科夫摔断了腿，而阿里斯塔尔赫却远在比——萨——拉——比亚。”

将军州长的头颇为之一震，他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莫名其妙之中。

“都是干瘦身材，而领地是妻子一方的，妻子出身于加——鲁——宁——家族。她的娘家的姓是加——鲁——宁——娜。”

“啊！”将军州长高兴了起来。显然，他对“她就是加鲁宁娜”这一点感到满意，他现在弄明白啦。

“原来，是一位最最善良的人，”他热烈而深情地喊道……“我过去就知道他……也就是说，我原本正是打算在这里与他结识的……真是最最善良的一个人！”

“大人，的确是一位最最善良的人，最最善良的人！您也知道，正如您刚才所确定的：‘最最善良的人！’”低一级的那位先生一抛拘谨的神态热情地插嘴说，他的眼神中还闪耀着并非做作的喜悦之情。他面带威严地环视乘客们，他觉得自己比甲板上所有的我们这些人都在道义上高出一头。

那位在“谈话左右”荡来荡去的西欧化的先生却完全不能接受这一点。呜呼，这里出现的事甚至简直是天意！

*　*　*

所谓天意，主要之处在于，西欧化先生的那位夫人，也就

是“上流社会的高级女士”，还在做姑娘的时候，差一点没有成为“一州之长父母官”夫人的女友，州长夫人娘家的姓是C，那时也是个待聘的姑娘。“上流社会的高级女士”——也是有其“娘家姓氏”的，她也是把自己归为比她的丈夫多少要高一些等级的类型人物里面的。前些天登上轮船之时，她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一州之长的女主人公也是乘坐着这艘船，她原本打算同州长夫人“碰面”的，但是，可惜，她们未曾得以“碰面”，而且甚至从踏上轮船的第一步开始，从相互瞥见的第一眼开始，就以超乎常情的明白无误表明，她们是不能够碰面的！“而一切的罪过全在于那个令人厌恶的人！”

而“那个令人厌恶的人”，从自己方面来说，对于自己夫人在七年之久的夫妻共同生活中不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知道得太清楚了，而且对此也太习以为常。恰好，他也是“在阿尔卡季亚出生的人”。他在这里，即在这个州里，老早以前甚至还曾经有过八百个农奴！他们就是用农奴的赎金在国外游荡了七年，还用上了三年前卖掉的一处橡树林。（三百俄亩[①]!）如今他们已经回到了祖国，而且在祖国的土地上也已经四个月了。现在他们正要回到他们破烂不堪的地产那里，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之点似乎是，上流社会高等级的这位女士连知道都不想要知道他们已经既不再有赎金，又不再有橡树林。然而最激怒她的却是，他们回国四个月来，她都没有能够得以同谁“碰面”，这次同将军州长夫人的遭遇也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罪于这个微不足道的贱货！”

“就算他有一把西欧式的胡须，那又怎么样，既没有什么

① 一俄亩相当于一点零九公顷。

意义，又连小小官职都没有，还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他自己什么都不会谋算，甚至他自己连结婚成家都不会。可是我怎么就会嫁给了他呢？我是被他的那一撮胡子迷住了！就算他在国外那边说什么他曾经同米勒谈过话，并且曾经协助推翻梯也尔。可是，为此在国内这边他却什么也得不到。何况他说的全都是谎话，如若他曾推翻梯也尔，我怎么没有看见……”

幸运的丈夫正是在这一刻非常清楚无误地知道，他的妻子，“上流社会高级女士”，心里关于他所想的正是上述的内容。她并没有直接向他讲出她想要同将军州长的女主人“碰面”的话，然而他明白，如果他不为她安排这样一次会见，那么他这一辈子就够受的了。此外，他本人也很想让她首先意识到，他不仅仅能同米勒，而且甚至也能同国内的将军们谈话，他也是一个人物，而且不是普普通通随便什么人物，而是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可汗一样的人物。可悲叹的是，从他们夫妻生活最初时刻开始，他就是如此被忽视，而实质上成为他全部生活的最主要任务，甚至也不妨说，成为他全部生活的目的所在，就是要夫人心甘情愿承认他的完美！怎么竟然会是这样，需要太多时间去说，此刻就说到这里为止吧。这位丈夫突然神经质地，昏头昏脑地迈步向前，并且直冲冲地面对那位大人阁下停下脚步。

“将军……我……我也在卡尔兹巴德待过，”他嘟嘟哝哝含混不清地对将军州长说，“请您试想，将军，在那里我也碰到过摔断腿的事……请问，您说的是阿里斯塔尔赫·亚科夫列维奇吗?”他忍受不了将军州长，可怕地迅速转向大人阁下。

将军州长昂起头，略显惊讶地看着跑过来的这位先生，只见他一边说着话，一边还全身颤抖着。但此时大人阁下连头都没抬，啊，多么可怕，他却伸出手，那位欧化的先生感觉到，

大人阁下从侧面扶着他的腿，并且用力要把他从原地推开去。他哆嗦着，朝下边看去，突然发现原由所在：当他跑过来并且轻率地站在大人阁下的小折叠椅和小凳子中间时，他没有注意而碰到了大人阁下放在小凳子上的手杖，此刻手杖正要从小凳子上滑落下来。他迅速跳开了去，手杖落地，于是大人阁下哼哼叽叽说着什么弯腰拾起手杖。就在这同一时刻，响起了吓人的尖叫声，这是塞特猎犬发出的，跳开两步的西欧化先生踩上了塞特猎犬的脚爪。塞特猎犬肆意尖声狂吠；它的主人大人阁下在小椅上扭转身躯，并且暴怒地朝着西欧化先生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说道：

"我极——其——恭顺地——恳请您别打搅我的——猎——犬的安——宁……"

"这不是我。这是它自己……"曾经和米勒谈过话的西欧化先生嘟哝着说，同时恨不得钻到甲板底下去。

"您不会相信，您不会相信，我该为这个平——庸——的家伙要忍受多少痛苦折磨啊！"他听到身后他的夫人对着娇小女教师的耳朵以暴怒的不高不低的声音说，他甚至不是听到，只是全身心地预感到，很可能，他的夫人根本就没有对娇小女教师耳语什么……

但是，已经无所谓啦！他不仅窘得要钻到甲板里去，甚至要溜走消失在船头的某处，哪怕躲藏到轮机那里也好。似乎他果真会这样做的，起码，在剩余的路程中，在我们的甲板上就再也没有看见他露面。

*　*　*

结局就是，行政管理长官州长再也忍耐不住，将自己的夫人介绍给大人阁下之后，自己就回到船舱里去。船舱里由于船长的精心安排已经摆好了一张玩牌的桌子，大家都很熟习行政管理长官州长的这一小小的嗜好。那位低一等级的先生早已策划好并且根据当前可能的情况找好玩牌的伙伴：被邀请来的是——一位官员，参与近期要建筑的铁路工程，薪金高得非同一般，而且他多少与将军州长大人还有些熟识；另一位是上校工程师，虽然并不相识，但是同意入局玩牌；这位仁兄有些抑郁和愚钝（他的人格品质的表露），但是牌却玩得很好。那个铁路建筑官员多少有点俗不可耐，但他善于自持；低一等级的那位先生，作为第四位玩家入座，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玩得很得体。将军州长享受到极大的满足。

与此同时，那位大人阁下正与将军州长夫人套近乎。关于她的娘家的姓是C这一点，他完全不记得了，而且也没有料到，如今他徒然想起她还是一个十六岁少女时的情况。将军州长夫人对他不免有点傲视，态度很随便，不过这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她手里正在编织一件什么物件，很勉强才看他一眼。可是阁下大人却越来越显得亲切可爱起来，他变得很活跃，不错，说话是低声含混不清的，而且还口水纷飞，然而却讲得很好（不言而喻，是用法语讲述），他重提那些美妙之极的笑话，的确非常好的机敏的俏皮话等等……他所知道的用流言飞语所编撰的故事那就太多啦！将军州长夫人则越来越频繁地报之以微笑。这位十分姣好的女子的魅力对大人阁下起了非常强烈的

作用，他把自己的小坐椅越来越近地挪向她，他终于变得精神有点不济起来，并且不知怎么就嘻嘻嘻叫起来……看到这种情况，那个不幸的“高一等级的女士”终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神经质地抽搐起来（tic donleureux①），她回到女士船舱的特别单间，与娇小的女教师以及女儿尼娜在一起。开始忙着用醋酸敷覆治疗，呻吟之声响个不停。娇小的家庭女教师觉得“良辰美景全都给泡了汤”，于是毅然决然地绷起脸，不高兴地噘着嘴。她没有开口说话的愿望，她把小女孩儿薇拉安排坐好，然后，自己则盯着她的那册书，盯着它，却并非在读它。

三个月以来，她这还是第一次这种样子，——受着痛苦折磨的高一等级的女士用眼睛打量着娇小的女教师。——她原本就应该说话，原本就应该！她应该逗我开心，应该怜惜我；她是个家庭女教师，她应该讨我欢心，恭维奉承我，可是如今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由于那个卑劣可憎的家伙！——接着她继续用憎恶的目光斜着眼扫视那个家庭女教师。为了要保持住自己的高傲，她不愿意自己主动开口同女教师说话。娇小的女教师此时则遐想着自己刚刚告别的彼得堡，想着留有络腮胡子的表兄，想着表兄那个当军官的朋友，想着两个大学生。她还想着一群伙伴们，其中有很多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而且他们也已经邀请过她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见他们的鬼去吧！”她最终下决心说道，“在这些言行怪诞的人们这里再待上个把月，如果仍旧还将是这么苦涩无味，我就一走了之，到彼得堡去！而如果没有东西填肚皮，就去当助产妇。呸，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才不在乎呢！”

① 法语：神经质的抽搐。

*　*　*

轮船终于靠近码头，大家一涌而冲向出口，好像是从沉闷的监牢空气中冲出来一样。多么热的天气，多么明朗、美好的天空啊！但是我们却并不看什么天空，无暇顾及，我们急匆匆，我们要埋头赶路。天空嘛，它不会离开去的。

天空是家常便饭的事，天空并非多么稀奇古怪。可是要生存过日子，就没有那么简单。

题　解

噼噼啪啪

《噼噼啪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以怪诞手法写就的讽刺短篇。他写这个短篇的起因是回击一名叫Л. К. 潘纽京（1831—1882）的作者在《呼声报》发表的嘲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这篇文章说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瓦·格·别罗夫（1833/34—1882）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画的像是"一幅被沉重的苦难折磨得苦不堪言的人的肖像"。《噼噼啪啪》的故事情节的叙述者，即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幻视幻听症的精神病患者，一个不成功的作家。他在故事的开始就谈到画像，实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小说人物回击潘纽京。小说的情节是主人公叙述自己在坟场的幻觉，其中有的情节是对社会中一些实际存在的现象的讽刺，如小说人物——死人克利涅维奇呼吁坟墓中的人们要不顾廉耻地尽情表达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死人之间的无耻表现都有现实针对性，针对的就是当时流行的作家彼·季·博博雷金（1836—1921）的色情文学，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夜晚的祭品》（1868）。故事的叙述者关于文学的言论，表现了陀

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关于现实主义及其反对文学“功利主义”的观点。不过，尽管《噼噼啪啪》中有的情节是对现实中的真实事件的影射抨击，它却不是政论、杂文，而是一篇艺术作品，它的描写并不都是针对现实中的具体人或事，而是讽刺抨击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现象。（张　羽）

与基督共度圣诞节晚会的小男孩儿

在俄国农奴制度没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俄国儿童的身心成长，尤其是贫困儿童的悲惨处境问题始终没有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视野，儿童主题贯穿在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中，他晚年的作品更是频频提到儿童问题，他在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写了天真无邪的儿童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残害的几个情节，每一个情节都蕴含着深刻的寓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对无辜儿童的摧残标志着一个社会已经丧尽人性，它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权利。在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前、准备发行《作家日记》时他就表示想谈谈当代俄国儿童问题，在他的片断札记中也提到这个念头。直接促使他动笔写作的则是1875年圣诞节期间的一些活动的印象。1875年12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自己的女儿参加彼得堡艺术家俱乐部组织的圣诞节儿童舞会，27日他访问了彼得堡市郊的少年儿童罪犯教养院。节日期间他在路途上遇到的行乞儿童尤其使他感到心情沉重。儿童舞会、犯罪少年和沿街乞讨的儿童——所有这些汇聚在他头脑中的观感和思考，都促使他写写儿童问题的渴望愈加强烈。1876年1月11日他在写给弗谢·索洛维约夫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写作情况时说，想“写点

关于儿童的东西——一般地谈谈儿童，有父母的儿童，特别是无父母的儿童，参加圣诞晚会的儿童和不能参加圣诞晚会的儿童，还有犯罪的儿童……”1876年1月号的《作家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停止在《公民报》发表《作家日记》之后，作为月刊发行的《作家日记》的第1期）发表的几篇以儿童为主题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这几篇作品所写的都是关于贫富不同的儿童如何度过同一个圣诞节的，都是这些天来盘旋在他头脑中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其中的两篇作品的情节是描写穷孩子的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而《与基督共度圣诞节晚会的小男孩儿》则采用了传统的圣诞节故事的体裁，作品呈现出来的是真实的残酷的现实生活与蕴蓄着作家的理想的虚幻世界糅合在一起的画面。从作家在写作这篇作品的札记材料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与基督共度圣诞节晚会的小男孩儿》时，参考过在他之前的欧洲作家的同类体裁的作品，模仿了他们的圣诞节故事的情节架构，与德国诗人弗·吕克特（1788—1866）的圣诞节故事——诗歌《孤儿的圣诞节》有相近之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与基督共度圣诞节晚会的小男孩儿》也有自己的特色，借助地点、人物与圣诞节风情的描写突出了俄罗斯的、彼得堡的圣诞节特点。故事的内容虽然如同传统的圣诞节故事，叙述的是在人世间被遗弃的、受尽苦难的儿童，到了上帝的天堂才感受到人间的亲情温暖和欢乐，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但是，作家的笔触没有沉浸在欢乐气氛的描绘中，没有停留在对贫苦儿童的同情和慰藉上。作家没有忘记，他曾许诺要在《作家日记》中写实际发生的事情，因此他需要向读者说明，《与基督共度圣诞节晚会的小男孩儿》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他总觉得，故事的前半部，即冻死在柴堆中的孩子和他的死在地下室的母亲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这母子二人与基督

共度圣诞节的温馨欢乐的场面则是他杜撰的，因为他是写小说的。他最后的这笔交代，使读者从虚幻的世界返回到现实生活。(张　羽)

农夫马列伊

《农夫马列伊》是包含有两个情节的短篇小说，两个情节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身经历，所以说这个短篇实际上是作家的回忆。其中一件事是1831年九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自己的农奴马列伊的一次邂逅，另一件事是1851年他二十九岁时在服苦役地点鄂木斯克与服苦役的波兰革命家亚历山大·米列茨基之间发生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两起前后相隔二十年、互无关联的事件拼合成为一篇完整的作品，这两起事件使他联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认识、评价俄罗斯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作家的这个思考构成两起事件的内在联系。在服苦役的住宿地米列茨基对愚昧残暴的犯人的消极、厌恶态度使作家联想起二十年前他遇到的马列伊。在他的回忆中，马列伊是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温厚、善良、自信、可以倚重的人，在这个形象上焕发着一种道德感化的力量。马列伊的形象否定了米列茨基对俄罗斯人民的悲观绝望的心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以政论文章，而且以艺术创作加入关于如何认识人民问题的争论。(张　羽)

温顺的女人

《温顺的女人》发表于1876年11月，这时他几乎是在全力以赴地为《作家日记》写作政论时评，只是间或写过几个短小作品。他为什么突然萌生了创作《温顺的女人》这样的艺术作品的不可抑制的欲望呢？原来最初激发他的这种创作欲望的是一则新闻报道。1876年10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时报》城市新闻栏读到一则简讯，一名叫玛丽娅·鲍利索娃的女裁缝从一栋楼房的六层的窗子跳下，自杀身亡。"鲍利索娃来自莫斯科，在彼得堡无亲无故，做按日付酬的零工。近来时常抱怨干活挣的钱很少，从莫斯科带来的钱已快用尽，对以后如何生活十分担心。9月30日她说自己头痛，后来就坐下喝茶吃面包圈。这时她的女主人要去市场购物，刚走下楼梯，就见到一些玻璃碎片从楼上落到院中，紧接着鲍利索娃就掉了下来。住在对面楼房的人们看到鲍利索娃打碎两块窗玻璃，然后爬到房顶，画了十字后就双手捧着圣像从房顶跳下。这圣像是圣母像，是父母为她祝福送给她的。"这种温顺的、心地平静的自杀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震惊，此事一直萦回在他的头脑中，使他思绪不宁。在此之前，侨居国外的赫尔岑的女儿自杀事件就已引起他思考。赫尔岑的女儿丽莎自杀的消息是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于1876年6月告知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札记中多次提到这件事。此后，10月初，他又读到那则关于女裁缝手捧圣像跳楼自杀的报道。作为对两起自杀事件的反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两起自杀事件》（《作家日记》，1876年，10月号），文章对两起事件做了评论和比较。评论

说，自杀者是两个不同的姑娘，她们的死亡也是两起不同的死亡。丽莎的死是由于愁闷和无聊，可以说，是怀着本能的、莫名其妙的痛苦而死去的。女裁缝则是因为无法生活下去，祈祷后不怨天尤人，从容不迫地手捧圣像跳楼自杀。这个温和地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心灵，使人不由自主地感到痛苦。10 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要用艺术形式来表达温顺的、平和的自杀的构思。但在开始写作时他又犹豫起来，按照他向读者的许诺，《作家日记》应是以发表政论、杂文等体裁的作品为宗旨的刊物，如果他全力投入写作小说并在《作家日记》发表，岂不背离了许诺。出于这一考虑，他一度辍笔。然而他难以抑制自己艺术创作的欲望，况且在已发行的几期《作家日记》中已有插入几篇短小作品的先例，于是他终于决意暂时停写政论，集中精力完成新的中篇《温顺的女人》。同时向读者声明，他将以1876年11月号的《作家日记》的全部篇幅刊载他的新作。

构成小说故事情节的基础的是女裁缝鲍利索娃自杀的真实事件，但是故事中有关鲍利索娃的一切则是她死后在她丈夫——开当铺的放高利贷者的回忆中展现出来的。这样的叙述形式就产生了故事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女裁缝的丈夫。关于这个放高利贷者的形象的来历说法不一。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者格·米·弗里德连杰尔认为，这个人物的形象是与当时轰动彼得堡的“伪造近卫军大尉谢德科夫遗嘱案件”有联系的。谢德科夫是放高利贷者，他原本是军官，因在军官中间放债食利而被驱逐出军队。此后，他又贪图嫁妆而娶了十六岁的姑娘索菲娅，婚后，索菲娅不堪丈夫的折磨曾萌生自杀念头。后来被丈夫吸引参与了放高利贷活动，丈夫死后，她因伪造丈夫的遗嘱而受到审判。弗里德连杰尔认为，在《温顺的女人》中的那个当铺老板的形象中可以看到谢德科夫的身影。现实生

活中的真实事件引发了作家的创作动机，在作家的创作构思中酝酿着以“手捧着圣像的”，“温顺柔和的自杀”为主题的作品。在对素材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以自己的创作札记材料充实、深化了最初的构思，完善了作品结构与叙述形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开篇中说，小说是“虚构的故事”，但同时又声明，虚构的是故事的叙述形式，故事本身是真实的。故事的叙述形式类似男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的速记，叙述从故事的结尾开始，回溯事件如何一幕一幕地演变到女主人公自杀的悲剧结局。室内的桌上停放着女主人公的尸体，她的丈夫、当铺老板在室内一言不发地踱来踱去，他竭力梳理自己紊乱的思绪，凝神寻思导致眼前悲剧的原因。他时而自言自语，自我表白；时而如同与并不存在的对话者陈述事件，解释，争辩，这一切都是在他的内心中展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善于发掘深埋于他笔下人物心底的心理矛盾、冲突的技巧描绘出人物的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呈现出蕴藏于人物内心的心态两重性。在《温顺的女人》中，它的男主人公是被社会摒弃的人物，他生活贫困，人的尊严受尽凌辱，这使他对人冷酷无情，对社会心怀憎恶，蓄意报复；另一方面，他又如同所有正常的人一样渴望生活的幸福，想要重树做人的尊严，显示自己的并未泯灭的人性的善良。但他失去了对人的信任，疑虑重重，每走一步都唯恐招致人们的误解与轻蔑，他要掩饰自己真实的善良的情感，甚至掩饰自己对妻子真挚的爱。正是他心理的这种两重性导致妻子的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前的作品中也曾一再塑造两重性格的人物，在《温顺的女人》中刻画的虽然也是这种类型的人物，但在这里作家着力展现的是人物的内在的心态。（张　羽）

一个荒唐人的梦

《一个荒唐人的梦》确实如副题所表明的，是一篇虚构的故事，它的内容是主人公的一个梦。故事的主人公荒唐人决意要自杀，在自杀前由于思考问题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对准自己的胸膛开枪自杀了。荒唐人讲的就是他梦中的见闻和经历以及他从梦境得到的启示。他的梦可分为三个阶段：1）他死后被一个怪物——精灵从坟墓中拖出来，拉着他在夜空中飞行，飞抵一颗光彩夺目的小行星时，怪物把他留在那个与地球一模一样的星球上；2）他看到的小星球上人们生活幸福，那里的人们团结友爱，融洽无间，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人与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3）小星球上的人间乐土毁灭了，追求进步的卑鄙彼得堡人把自己的“文明”带上小星球，把它变为罪恶丛生的土地，使那里出现了地球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忌妒，凶残地流血厮杀，荒唐人承认是自己教坏了小星球上的人，毁灭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荒唐人在梦中度过的三个阶段是传说中人类从幸福的童年到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几千年的历史的缩影。

人类在历史上真的有过荒唐人梦中的那种乐园吗？其实那不过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愿望理想化了的世界，是人们希望享有的生活和社会，也就是自古以来的传说中的人类生活的黄金时代。这个传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公元前8世纪末—前7世纪初）的史诗《工作与时日》（或译《田功农时》)。赫西奥德在史诗中说，人类社会经过五个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铜器时代、半人半神——英雄时代与诗人

所生活的铁器时代。他盛赞人人安居乐业的黄金时代，谴责没有正义和公理的铁器时代，他相信正义必将胜利，黄金时代必将返归人间。赫西奥德之后，关于人类失去的黄金时代的各种传说不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熏陶，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关于黄金时代的观点，即黄金时代不是过去曾经存在过但却消逝了的时代，而是人类的未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后不能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的心目中仍未泯灭对黄金时代的憧憬，他不时通过自己作品的人物之口流露出对黄金时代的向往，他晚年的《作家日记》更是频频谈到黄金时代。可以说，黄金时代是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过去的作品中关于黄金时代的阐述不同，《一个荒唐人的梦》是以小说的艺术形式描绘的黄金时代的生动画面，它通过人们日常生活的描绘呈现出人们的高尚道德情操，人与人之间的纯洁无私的情谊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文学的渊源来看，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可以看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观点的反映，这就是人同自然界与动物王国友爱地自由结合在一起，和谐相处，人们根本不知道谎言、欺诈、个人专横、淫欲等等为何物。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美好理想与罪恶现实的对比，要比堂吉诃德的言论与现实的对比更为强烈。故事中表现了所谓“天堂”的情景，而幸福的人们在堕落后生活的可悲的血腥历史则是人世历史的缩影。作品的最后一部分是乐观而庄严的，与沉重阴暗的梦的开头形成鲜明对比。梦前，荒唐人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传统的那种生活在底层的人物。梦后，出现的则是一个新的人物。他激昂地声言自己亲眼看到了光辉的真理，他不相信那只是梦，不管人们如何

嘲讽，他要坚持不懈地宣扬他看到的真理。至于这真理能否以及如何成为现实，他则不能不承认，这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人们“如同爱自己一样去爱所有的人”，说不定在一天之内，甚至是“一小时之内”，梦境就可以变为现实。显然，在这篇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作品人物之口宣扬了人类道德完善的决定性作用。（张　羽）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作家日记　　下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１１７６
ＳＳ号＝１２６８４７１５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２８５９７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目录

《交易所新闻》的反常行径。不是机敏的而是凶恶的文人（《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０月号，第３章，Ⅲ）
“СТРЮЦКИЕ”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１月号，第１章，Ⅰ）
“СТУШЕВАТЪСЯ”这个动词的来历（《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１月号，第１章，Ⅱ）
奴颜媚骨还是礼让精神？（《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１月号，第２章，Ⅰ）
无以复加的极端的奴才习气（《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１月号，第２章，Ⅱ）
早就想说的有关斯拉夫人的一句完全特别的话（《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１月号，第２章，Ⅲ）
关于和平的议论。“君士坦丁堡应该属于我们”——这有可能吗？说法不一（《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１月号，第３章，Ⅰ）
又是最后一次“预言”（《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１月号，第３章，Ⅱ）
必须抓住时机（《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１月号，第３章，Ⅲ）
涅克拉索夫之死。关于在他墓前的那次讲话（《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２月号，第２章，Ⅰ）
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２月号，第２章，Ⅱ）
诗人与公民。关于涅克拉索夫为人的公论（《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２月号，第２章，Ⅲ）
有利于涅克拉索夫的见证（《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２月号，第２章，Ⅳ）
致读者（《作家日记》，１８７７年，１２月号，第２章，Ⅴ）
关于下面刊载的纪念普希金的演说的解释（《作家日记》，１８８０年，８月号，第１章）
普希金（简论）。６月８日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学会会议上的发言（《作家日记》，１８８０年，８月号，第２章）
吹毛求疵的挑剔。格拉多夫斯基先生给我上的一堂课引出的四篇不同题目的文章。兼答格拉多夫斯基先生（《作家日记》，１８８０年，８月号，第３章）

Ⅰ　关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Ⅱ　阿乐哥和杰席莫尔达。阿乐哥为农奴而痛苦。笑谈
Ⅲ　两个一半
Ⅳ　一个人应该驯服，另一个人则应骄傲。水杯中的风暴

财政。被斥为忒耳西忒斯的公民。从下面竣工和乐手们。议会和清谈家们（《作家日记》，１８８１年，１月号，第１章，Ⅰ）

在我们这里能够要求欧洲式的财政吗？（《作家日记》，１８８１年，１月号，第１章，Ⅱ）

为了改善根基而忘却当前需要。我因笨拙而陷入宗教说教（《作家日记》，１８８１年，１月号，第１章，Ⅲ）

第一个根基。我以老生常谈取代明确的财政语调。汪洋大海。渴求